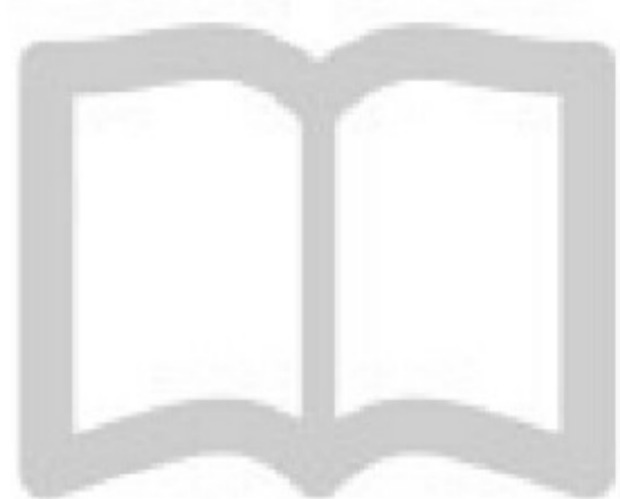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一卷

1980-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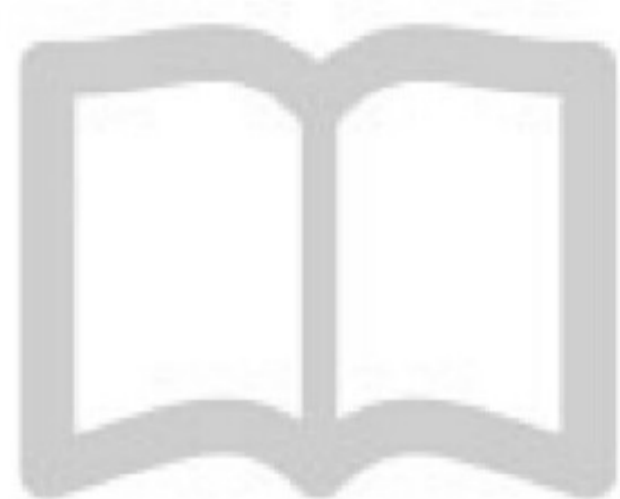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

第一卷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赵紫阳文集 1980 — 1989

第一卷

1980 - 1982



中文大學出版社

《赵紫阳文集（1980-1989）：第一卷（1980-1982）》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编

© 香港中文大学 2016

本书版权为香港中文大学所有。除获香港中文大学书面允许外，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制或转载本书文字或图表。

国际统一书号（ISBN）：978-962-996-806-9

出版：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学
传真：+852 2603 7355
电邮：cup@cuhk.edu.hk
网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1980-1989), Volume 1 (1980-1982) (in Chinese)

Edited by Editorial Group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o Ziya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806-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出版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至1989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批语等,共498篇,180余万字,依时间顺序分为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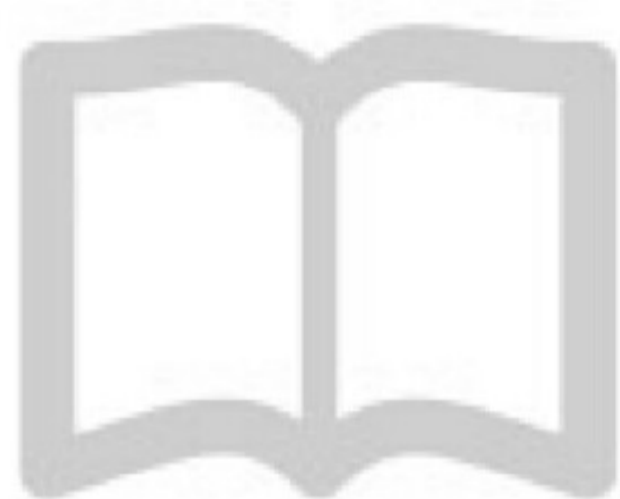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文集》涵盖经济、政治、党务、外交、国防、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展示了1980年代中国高层推行的各种政策主张、理论观点及相关政治博弈,呈现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

《文集》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原始文献编纂而成,来源可靠、编排规范、忠实于原件,多数篇目属首次公开或首次完整公开。《文集》虽非同期文献的全部,却是迄今为止最系统、也最具规模的赵紫阳文献汇编,为还原和理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

《文集》出版过程中,本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文本考订、原件比对、史实核查、信息增补等工作,力求达至文献史料出版的最高准确度、客观度。除文字史料外,本社对视觉史料也极为重视,试图通过对历史图片及原始文献的搜集和选用,将其携带的历史信息传递给读者。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6年5月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编辑说明

《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主要汇集了赵紫阳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等,近500篇。其中有一部分曾公开发表过,大部分则在当时党政机关的文件、简报上印发或传达过,是首次公开出版。

文集所涉及的十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奠基时期。当时,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四化建设掀起了新的高潮。其间经历了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两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国民经济大调整,制定并胜利实施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彻底扭转了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被动局面,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第一步目标(头十年翻一番),从而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决心。

这十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由工业、商业发展到其他第三产业,从承包经营、股份制试点到城市综合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到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从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到实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和保护环境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从立足国内到坚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主动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勇攀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套文集既见证了这十年

间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逐步重新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也反映出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工作难度异常巨大，为政者甘苦备尝的秘辛。这十年既有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有些不尽人意的遗憾；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出现通货膨胀的教训。

从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领导支持下，本书作者与胡耀邦、万里等同志一道认真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从而大彻大悟，立志为民，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崇尚法治，勇于开拓创新，努力遵循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在日新月异的新产业革命、新科技革命中尽心竭力，弃旧图新，不断探索新的为政之道、治国之策、兴业之本和强国之路，以掌握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这十年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了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书中所反映的每一项巨大成就或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真实记载和深入研究这段难忘的史实和第一手文献资料，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让历史告诉未来，促使我们进一步开拓思路，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融入世界，为实现振兴中华，攀登世界强国的新高峰而奋斗！

本书编辑组由原赵紫阳办公室部分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为保持文稿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编辑中均保持了原貌，编者仅对个别文字作了订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4年4月

目 录

一九八〇年

| | |
|--------------------------------------|----|
| 研究新情况 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 9 |
| 研究新问题 把经济改革搞好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 | 18 |
| 关于农工商联合企业问题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 | 24 |
| 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 | 27 |
| 在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 31 |
| 经济体制改革步骤要积极稳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 38 |
| 关于发展家庭专业户养鸡的批语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 41 |
| 对外贸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 43 |
| 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 | 44 |

| | |
|-------------------------|-----|
| 关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承包到人责任制的批语 | |
|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 46 |
| 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的谈话 | |
|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六日 | 48 |
| 关于国外贷款问题的一封信 | |
|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 52 |
| 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 | |
|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 | 54 |
| 用改革的思路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 | |
|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一日 | 61 |
|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 | |
|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 68 |
| 关于节约能源和科研管理体制 reform 问题 | |
|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 77 |
| 今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 | |
|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 | 79 |
|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 |
|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 89 |
| 专业联合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 |
|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 92 |
| 国务院今冬和明年要抓的几项工作 | |
|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 | 93 |
| 关于编制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设想 | |
|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 | 107 |
| 处理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 | |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 109 |
| 刹住乱涨价滥发奖金的歪风 | |
|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23 |

| | |
|--|-----|
| 经济工作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 125 |
|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 129 |

一九八一年

| | |
|---|-----|
| 抓好调整和改革 努力稳定经济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 145 |
| 关于杜润生报告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 | 151 |
| 对农村建房占地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 152 |
| 在调整期间如何搞好改革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 154 |
|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搞对外合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 | 157 |
| 当前经济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 | 159 |
|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 | 163 |
| 对石油部年产一亿吨原油包干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五月 | 182 |
| 给四川大学陈力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 | 184 |
| 关于煤炭开发的两个批语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 | 185 |

| | |
|----------------------------|-----|
| 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些设想 | |
|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 187 |
| 要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五日..... | 191 |
| 对《济南石油化工厂财务混乱惊人》一文的批语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 196 |
| 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 | |
|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月..... | 197 |
| 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思想要解放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 | 200 |
| 企业整顿要把落实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 204 |
| 利用税收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 207 |
|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找出路 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 | 210 |
|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 |
|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 234 |
| 财政工作要适应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 235 |
| 关于煤炭出口问题的批语 | |
|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 242 |
| 既要精神振奋 又要实事求是 | |
|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 244 |
| 关于“六五”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 | |
|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 九月三日、四日..... | 247 |
| 挖掘企业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 256 |

| | |
|-----------------------|-----|
| 改革挖潜 聚资生财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261 |
| 关于今年经济情况和“六五”计划设想的通报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 263 |
| 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 273 |
|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 276 |
| 保证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 290 |
|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 293 |
| 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的讲话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 300 |
|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大有希望 | |
|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 305 |
| 想方设法把引进的石化项目搞起来 | |
|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 307 |
|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 311 |
| 对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 |
|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 314 |
| 在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坎昆）会议上的发言 | |
|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 318 |
| 怀念陈郁 |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 | 321 |
|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 323 |

| | |
|-------------------------|-----|
| 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 实现讲求效益的增长 |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 327 |
| 物价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335 |
|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 |
|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 339 |
| 同人大代表讨论物价等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 | 374 |
|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的民事纠纷》一文的批语 | |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376 |
| 研究经济新情况 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 |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 377 |
| 关于科技工作的一封信 | |
|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385 |

一九八二年

| | |
|---------------------|-----|
|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 | 389 |
| 改进工作作风 提高办事效率 | |
|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 392 |
| 关于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 | |
|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 393 |
| 发挥城市作用 促进工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 | 397 |
| 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 409 |
| 提高经济效益 搞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 411 |

| | |
|-----------------------------|-----|
| 打击走私贩私 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 415 |
| 厂长必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 | 419 |
| 关于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批语和指示 | |
| 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 | 420 |
| 让文明礼貌成为全民行之久远的风俗习惯 | |
|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421 |
|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 |
|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 | 423 |
|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 做好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工作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 432 |
| 关于抽纱出口问题的批语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 447 |
| 技术改造是振兴机械工业的重大步骤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 448 |
| 有重点地建设山西特大型煤矿井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 449 |
| 对当前财政和银行工作的几点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450 |
| 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 | 453 |
| 关于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及借用外债的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二十日 | 457 |
|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 |
|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 459 |
|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 | |
|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 |
|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 463 |

| | |
|----------------------------|-----|
| 组织“一条龙”开发新产品大有希望 | |
|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 | 469 |
| 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是搞好煤炭生产的关键 |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 471 |
|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应适当放宽政策 |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472 |
| 对制定“六五”计划的几点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五、六月..... | 473 |
| 听取国家计委赴苏考察小组汇报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时的讲话 | |
|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十四日..... | 480 |
| 农业和粮食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 487 |
| 把山西建设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 | |
|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 492 |
|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 498 |
| 正确认识经济形势 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 |
|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 509 |
|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解决野蛮装卸等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 | 517 |
| 商业要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促进引导作用 |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 518 |
| 企业整顿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 | 522 |
| 开发西北新的产粮区与调整贫困地区农业结构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 530 |
| 对大连市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情况报告的批语 | |
|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 | 536 |

| | |
|-------------------------|-----|
| “六五”、“七五”要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 | |
|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 537 |
| 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 |
|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 545 |
| 给《四川日报》的复信 | |
|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 551 |
| 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 552 |
| 关于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 554 |
| 开创外交和国内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556 |
|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567 |
| 给四川昇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复信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572 |
| 适时调整化纤和棉织品价格 改变居民衣料结构 | |
|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 573 |
| 关于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工作的意见 | |
|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 574 |
| 坚决制止乱砍森林和滥占耕地 | |
|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 580 |
| 建材工业要抓紧技术改造 | |
|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 585 |
|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 | |
|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 |
|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 589 |
| 给山西省平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复信 | |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 604 |

| | |
|----------------------|-----|
| 端正指导思想 积极推进改革 | |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 605 |
| 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 |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 616 |
|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 |
|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 |
|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 626 |
| 关于进料加工出口问题的批语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 | 660 |
| 对环保和出现酸雨等问题的批语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 661 |
| 体育战线的成绩鼓舞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 662 |
| 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 663 |
| 对开发海南岛问题的批语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 665 |
| 充分发挥重庆市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 | |
|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 666 |
| 后 记..... | 667 |



1982年6月25日，和山西省负责人在襄垣县豆店公社桥头大队农民白清娥家，与农民和基层干部交谈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问题





左上： 1981年9月19日，参加检阅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的军事演习
(从左至右：李先念、秦基伟、邓小平、胡耀邦、杨得志、赵紫阳、华国锋)

左下： 1982年3月，在河北省唐山开滦煤矿深入数百米井下考察，返回地面后与同行人员合影(右四李尔重、右六赵紫阳、左二白美清)

右： 1982年7月，在甘肃省玉门油矿鸭儿峡矿区观看钻井队取出的地质岩芯样品

第九版

世界... 经济... 导报... 1980年9月20日第7期

世界经济导报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研究所 主编 1980年9月20日第7期

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他指出，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谈中国社会主义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谈中国社会主义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住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中国磁讯即将开航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中国磁讯即将开航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中国磁讯即将开航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中美贸易关系日趋紧张

赵紫阳说，我们现阶段，不是在资本主义已经搞垮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已经崩溃，党是全心全意依靠这民族，“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今后要防止类似悲剧，及直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问题。

《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是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接见香港新闻工作者时的讲话(1980年9月15日)，收入本书时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为题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

各位委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是非因瞩目的
一件大事。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以后，两个多月来，
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现报
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务院精简机构的方案和进展情况

现在，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安定团结的局面日
益巩固，政府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条件也已成
熟。抓紧做好这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
其重要的一环。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一结束，国务院根据这
次大会决议的精神，在对政府各项工作做出全面安排的同

就任总理后，于1982年3月2日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所作的报告（首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公报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GUOWUYUAN GONG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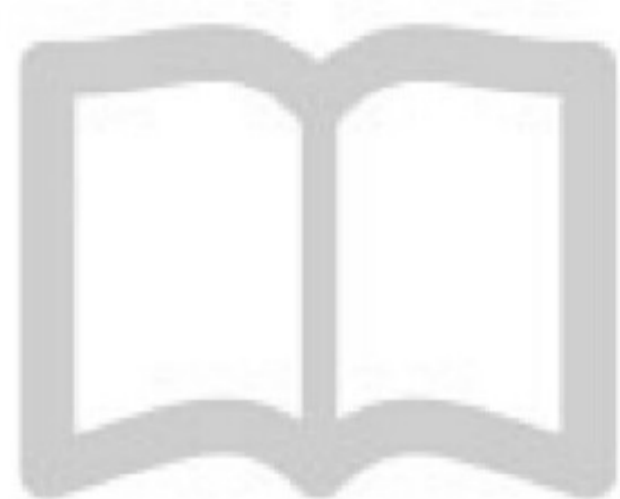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12月10日 一九八二年 第十七号 (总号: 391)

目 录

| |
|--|
|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赵紫阳 (723)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 (737) |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指示..... (743) |
|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祝贺参加运载火箭研制和发射试验的同志 们的电报..... (744) |
| 国务院关于强化纤维制品、手表等商品价格管理的通知..... (745)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主要数字的公报..... (746) |

《国务院公报》中收录的《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一文，是1982年10月24日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研究新情况 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

一、今年的工业生产

今年，我们要力争农业、工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工业问题，今年有些困难，也有一些新情况要注意研究。从四川省的情况看，主要应抓好几个环节：一是搞好三百个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二是挖潜、革新、改造；三是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四是节约能源；五是把生产资料供应工作搞活。

由于国民经济的调整，今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任务，要自己“找米下锅”。很多企业有一个怎么样围绕着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的问题，特别是机械、冶金行业。现在还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原来那个工厂生产的东​​西，现在没有任务，或者勉强生产了，卖不出去；另一方面，社会上很多需要的东西又买不到。今年工业生产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工业部门只是埋头生产，不问市场，这样不行了。尤其是那些因调整而任务不足的行业，更要解决这个问题。调整本身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需要。如，我们今后要加强商业设施，就有个设备问题，轻工业要发展，也需要增加设备，

* 《研究新情况 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和后面《研究新问题 把经济改革搞好》这两篇文章，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有关会议上就当时四川省改革试点经验和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鉴于四川省改革先走一步，对全国各地有参考价值，中央报刊曾予以转载，供全国各地参阅。

工厂挖潜、革新、改造也需要设备。所以，看来机械行业有个转产的问题，有个生产方向的问题。机械行业想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情况，产品很单一，又小而全、大而全，这种结构是不行的，势必要改变。现在调整时期，任务不足，也给我们一个机会，促使我们注意研究市场，改变产品结构，搞好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这样，我们就可能闯出一条路子来。如果现在是全面大上的形势，物资非常紧张，搞什么设备还要“走后门”，产品质量再坏都有人买，有些企业就会不重视市场调节。现在有一些产品供过于求，我认为这正是改革工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就会逼着企业研究社会需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所以，我认为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今年要突出抓增产节约，特别是抓节约能源。节约能源，单纯的限制一下，一般的少用一些，那还不行。要和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相结合。要把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进一步搞活。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例如，搞生产资料交流会、信托公司，等等。我们的物资管理体制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把它搞活，有一些可以用交流会的形式，货栈的形式。

二、农业的增产主要靠政策 靠科学

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和机械化，只能根据整个国家财力、物力有步骤地进行。政策问题，由于多年来“左”的流毒比较深，发挥政策的作用，潜力还很大。不要以为我们这几年经过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个潜力已经没有了。政策问题，主要的是如何进一步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和农民的积极性。

我国农业现代化，当然包括机械化。农业总是要实行机械化的，我们不能永远是手工操作。但是，要考虑轻重缓急。我国人口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搞机械化节约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排不好，还会增加社会问题。机械化本身最大的效益是节约劳动力，不一定增加多少产量。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对增加产量的作用并不那么大。所以，我们拿很大的力量投到这上面，现在看来不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人多，把劳力节约出来，马上还没有地方去，原来想什么城乡挂钩，什么扩散产品，现在看也比较困难，因为城市劳力也多。所以，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这方面潜力很大。四川现在已经尝到甜头。比如说养蘑菇，就有科学技术，这是过去没有的。又如，温水养鱼，搞冷冻精液配种，也是好办法。还有农业良种，有了好种子，产量就提高很多。从科学种田来讲，这两年搞的多蘖壮秧，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效果很明显。在成都坝子，有几个地方，水源没有问题，过去历来是渠灌、漫灌，现在改为喷灌，对玉米、小麦增产效果都很明显。又如配合饲料这个东西，以前觉得很神秘，最近许多公社都开始搞了，证明效果确实很好，也没有那么神秘。现在有一些还不够标准，说不上是配合饲料，实际上是混合饲料。原来我们农村养鸡、养猪，是有什么喂什么，有红苕就喂红苕，有苞谷就喂苞谷，这样饲料有很大浪费。现在简单一混合，有粮食，也有含蛋白质和纤维的其他饲料，猪吃了长得快，增重百分之三十以上。所以，农民很高兴，自己拿粮食换这种饲料。这说明这个领域里门路很多。我们搞现代化，应当重点搞这个。这方面有些需要机械，有些并不需要机械，至少不是全盘机械化。科学饲养，科学种植，科学栽培，这些方面有很多名堂。总之，现在要讲究科学。有人主张，农业现代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机械现代化，一个是生物技术现代化，应该有个轻重缓急。我觉得有相当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后应该运用科学，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用到农业上，这对提高单产，对利用资源作用很大。除此以外，还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有步骤地继续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我这里说的不单是农田基本建设，而是农业基本建设。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讲的就是农业基本建设。因为，过去讲的农田基本建设内容有些狭窄，一讲就是水利、改田、改土，太窄了。农业基本建设范围就广一些，包括水利、改土，也包括建设配种站、种子站、晒场、仓库这些东西。现在我们农业建设究竟搞什么东西？应当从生产的需要出发，看哪个对生产最迫切，效果来得最快。有些生产队，一些很简单的非常必要的建设都没有，如保管室、晒场都没有，晒谷子的席子都没有，这些都影响农业生产，可以搞一些。从四川来讲，水利必须坚持搞下去。但前些年水利花钱很多，效果并不是都很好。所以，我有这么个想法：四川水利还要搞，但不能只是搞水利。有些基本建设并不需要花多少钱，从全省来讲，一年拿出几千万元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今后要挤出一点儿钱用在其它一些急需的事

业上。我们现在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建设太差。如桑蚕可以大发展，但一个大问题就是没有蚕种，要建设蚕种场就得拿钱。畜牧、兽医也有很多东西要搞。总之，不能单打一，要全面一点。水利，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搞下去。其他的一些农业基本建设也必须安排上。过去长期只有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概念，现在要宣传农业基本建设这个概念，我们大家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农业机械化，看来应围绕着生产的需要，先解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全国很多人讲这个问题。我看很有道理。当前农村中究竟是拖拉机更重要，还是农用汽车更重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拖拉机到公路上跑，很少下田？可见，运输比犁田还急需。过去多年来不研究农民的拖拉机上公路的原因。其实，农民是会算账的，他买辆拖拉机不下田，上公路，总有道理。这说明，拖拉机虽然是需要的，但更需要运输机械化。这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从生产的需要出发。要研究什么投资最少，见效最大、最快。农业机械化问题，应当研究从何着手，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不少地区，烘干机很重要，可以减少很多发霉的粮食，又容易搞，应当重视。山区不先修公路，还能讲什么机械化？总之，农业的指导思想应该明确：搞农业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机械化要量力而行；要改变过去只讲农田基本建设的思想，应当从农业基本建设这样一个概念去想问题；农业机械化一定要围绕生产需要去进行。

农村经济政策要进一步落实。农村有很大潜力，资源有潜力，人才也有潜力。关键就是要采用一些好的责任制形式，把人才和资源结合起来，使资源真正变成社会财富。最近找成都的同志谈养鱼问题，对我也有启发。以前我找他们谈了好几次，成都那么多水塘，为什么不养鱼，他们几次都对我讲还有很多问题，如没有饲料，还要供应粮食，等等。这次找他们谈，我说你们就包到户，谁会养谁来养，包下来，不要包那么高。他们说，你只要这样讲，鱼就可以养起来了。他们再没提饲料问题。可见，政策问题很重要。我们很多资源没有利用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光讲搞粮食，不讲搞别的；另一方面，与缺少明确的责任制也有很大关系。

畜牧业这些东西，不像大田作物，更要精心管理，更要有明确的责任制。关于农村政策，我想在这里说几个问题：

（一）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在四川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思想上还有很多框框，根本的问题是不相信群众。强调生产队自主权后，可能我们讲话没有那么灵了，生产队可能不大听县委、公社领导的话了，这也可能带来一点损失；但是要看到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们的主动性增加了，积极性高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也高了，它所带来的好处，要比可能的损失大得多。强调生产队自主权，完全不出一点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本问题就像讲工业企业自主权的道理是一样的。生产队是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不把它搞活，而使全省五十多万个单位都处于被动状态，搞什么它也不用动脑筋，事事等上面布置，有什么好处呢？有的生产队打下来的谷子要发芽了，还非要等县委书记召开电话会布置，才能把谷子分下去晒，这怎么行呢？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这就不能使他们面向实际。所以，不把生产队搞活，不把生产队的主动权发挥出来，生产想搞好是困难的。生产队自主权问题，从省到县都要摸一摸情况，研究一下，要解放思想。这里，除了生产队财物、劳力不能平调，不能侵犯以外，重要的一条就是生产队自己的事应该由生产队自己决定。今后，对生产队下达生产计划，主要抓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主要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在目前还要下达面积指标，其他那些计划面积指标都只供参考，什么水稻栽多少，包谷种多少，小春作物种多少，都是参考数字，主要由生产队自己决定。棉花因为价格低，群众不愿种，国家又很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得下达播种面积的指标。大邑县的经验很好，他们说计划能否实现，根本的是要看计划是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的，还是自上而下下达的。今后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应当自下而上提出来，自上而下作一些综合和调整，一个县把生产队的计划汇集后，看有什么问题，然后再给生产队做工作，不要什么都管得那么细。至于生产的技术措施，更应当由群众根据本地情况自己决定，我们可以提倡推广一些东西，但最后还是由生产队自己定。至于分配问题，管理形式问题，也应该这样。生产队管理怎样搞，上面不要管那么细，我们可以总结好的经验推广。

（二）适当调整自留地的问题。自留地各地可以安排适当时间进行调

整。调整自留地，多数可以不动，只动两头，一是多得很多的，一是差得很多的，连抽带补恐怕还得增加一些自留地。按本队原划的每人平均数量为标准来调整，不足的户要补划，少数过多的户抽出，不要打乱原来基础重划。在调整自留地当中，要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这很重要。不要一讲调整自留地就按现有人口划，实际上鼓励了盲目生育，这不对。要认真按中央和省里规定的计划生育政策办事。另外，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可以拿出一部分边远的或瘦薄的小片土地，按常年产量包到户经营，所包产量顶社员一部分口粮或饲料，超产部分全部归己。他自己把土壤改良好了，经营好了，超产收入的完全归他。原来已经划分饲料地的不再动，原来没有划分饲料地的，今后不再单独划分了。自留地加上这一部分包产地，不超过本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大体上将来农民自己经营的土地，一个是自留地，一个是小量包产的土地，可以顶一部分口粮或饲料。劳力弱无力经营的户可以不包，对他们的困难，生产队应加以照顾。还有社员房前屋后的范围也不要限得太死，要鼓励社员种植零星树木。怎么划，可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历史习惯确定。

（三）社队企业问题。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但三级都搞确实矛盾很多，大队有条件的当然也可以搞，重点还是搞公社和生产队的。一个是把生产队多种经营搞好，一个是公社企业搞好。另外还有一种设想，也是一种试验，就是除了办好现有社队企业以外，今后兴办社队企业，应当多提倡生产队联办的形式，不要脱离生产队这个基础去办公社企业，而是要把公社企业建筑在生产队的基础上。这种生产队的联营，可以是公社范围的，也可以跨公社，一个区范围内几个公社联办。一个是生产队内部搞“四专”，专业队、专业户、专业组、专业人员；一个是生产队以上搞生产队联营，需要联合多大规模就联合多大规模，可能开始范围小，以后范围大，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这也是个新问题，应当很好研究。原来设想生产队通过发展社队企业过渡为大队所有制，然后又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这个设想究竟怎么样？将来还要实践来作结论。这是个设想，也可能将来不是这个形式，而是在生产队这个基础上联合的形式。看来今后搞农、工、商一体化、专业化的形式，很可能是生产队联营的形式。要注意解决与生产队的利益联系起来，使生产队得到实惠的问题。社队企业要通过整

顿，改进经营管理，挖掘潜力，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造更多的利润，并尽量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给生产队纳入分配，使生产队和社员增加收入。

（四）因地制宜地逐步调整作物布局。现在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在农业上都实行作物种植区域化、专业化，搞大的地区分工。我们国家日前完全按这样的办法去做，还不具备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那种带有自然经济性质的小而全的作物布局不应当改变。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各种不同的自然条件的优势，在保证粮食和经济作物都增产的原则下，逐步地、合理地调整作物的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使农业生产逐步区域化、专业化的重大措施，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也是发展生产的很大的潜力。这也是农业生产上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比如中江县南部地区适合种棉花，一般亩产可达百斤，而中部和北部地区就不适合种棉花，每亩只产六七十斤。但中部和北部种粮食，却可以超过南部。如果调整一下，南部多种棉花，中、北部多种粮食，这样就可以使棉、粮都得到增产。再如乐山市，过去棉花种植分散，以面积保总产，往往还完不成国家的生产任务。今年全省因受灾棉花减了产，他们却由于调整了布局，增了产；面积比以往减少了九千亩，单产和总产分别比过去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和百分之十。这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应当认真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县、社、队都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使农业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省、地也要抓好调整作物布局的试点。

（五）少数生产队太大可以分开。特别是过去“四清”运动中合并的大生产队，有的貌合神离，一直搞不好。我认为这些队是可以分的。当然不要搞运动，要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解决，也不要怕一分就怎么样。有些大的队搞得很好，这就没有问题了。总之，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所有制的规模要照顾到群众觉悟程度，这是个原则。

三、抓商业工作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相当多，工业方面有个工商关系问题，农业方面也有个收购、推销问题。除抓工业、农业外，各级党委应当关心商业，

抓商业，解决流通领域的问题。商业问题里面，一方面是商业本身有些问题，商业部门应当好好改进自己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商业确实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地方党委帮助它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商业体制必须改革。但是改革只能有步骤地进行，改得太猛也容易引起物价波动等问题。大体上要恢复一九五七年的办法，有些容易恢复，有些一下恢复不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恢复。体制不改，商业活不了。

商业活不了，工业就活不了，农业也活不了。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工业搞活和农业搞活。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加强商业设施的建设。商业设施，如仓库、冷冻设备、冷藏车这些东西跟不上，这也是目前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突出的薄弱环节。我们现在搞调整，也要包括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仓库、冷冻、冷藏车等设施不足，还是以前那个状况，你再发展生产，发展越多，由于不能及时收购和贮藏，浪费越大，多少年来由于商业设施跟不上，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农产品发展起来，特别是鲜活商品多起来了，你不搞冷库、冷藏车这些设备，商业部门就没有办法，就不收购，你再责备也不行，这是个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今年起，我们各级都要拿一点钱搞商业设施。财政上还要进一步研究怎么给商业系统规定一点灵活的政策，解决投资问题。如从利润中留点成，或者可以先预支点钱，设施先搞起来，建好了以后再还。

除此以外，商业部门一定要积极地收购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努力打开销路，为工农业服务。工业生产、农业生产都要减少盲目性，要关心市场，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生产。将来的趋势是商业对工业或农业统购包销的产品逐渐减少。因此，工业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不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光叫商业部门来收购，这样也不行。要从两方面讲：一个方面是商业部门一定要积极推销产品，帮助工业、农业打开销路；另一个方面是工业、农业生产单位，一定要避免盲目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现在要提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许多政策办法一落实，各项生产都会发展起来，如果不注意市场需要，将来有些东西就销不出去。总之，各级党委要抓商业、

要抓流通环节。这个环节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工业和农业搞活的问题。

四、关于调整问题

以上说的几个问题，都在三年调整这个总题目里边。在经济工作中，总的是要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过去经济工作中矛盾的焦点，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过多，挤了农业，挤了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调整的关键是要压积累，下基建，加强薄弱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要下最大的决心，不能小调，要大调，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压缩长线，加强短线。剃平头不能达到调整的目的。越是财力小，越要集中投资，保证重点，打好歼灭战。但调整绝不是简单的压基建，而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牵涉到各个方面。基本建设规模缩小后，带来一系列新问题，过去被掩盖着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机械、冶金等行业首当其冲，面临着根据市场需要组织转产和改组的问题。其它行业同样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计划等上面、原料待分配、产品靠包销、产销不见面的做法。这些都涉及到经济结构、管理体制等根本性的问题。调整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只有通过调整 and 改革来解决。现在是形势逼人，非改不可。有的企业在去年任务不饱满的情况下，走向市场，一揽活儿，二推销，使企业有了生机。我们要正确认识调整中出现的新形势，不能只看到调整带来的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这正是工业进行改造的大好时机，实行市场调节的大好时机，进行计划、物资等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因势利导，趁热打铁，抓住调整这个中心环节，并把它同改革、整顿、提高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还跟不上，在很多问题上，思想还没有和调整的方针一致起来。我们必须自觉地按照调整的方针去考虑问题，观察形势，安排工作，该上的上，该下的下，齐心协力把经济调整这一仗打好。

研究新问题 把经济改革搞好*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六日

四川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商业，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已经迈出了比较大的一步，当然还是初步的。经济开始搞活了，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效果。情况是好的。但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市场调节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已经进行的初步改革，同尚未改革的整个经济体制、现行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通过改革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同现在的生产关系中某些方面的矛盾，同上层建筑中某些环节的矛盾。这方面的问题是主要的、大量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要进一步地改革，也就是要改革整个经济体制。但目前处于调整时期，进行大改大革的条件还不具备，经验不足，如果看得不准，改得不好，反会引起大的波动，因此不能骤然进行大改大革。但是，也不能对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漠然置之，不去解决。在不能进行大改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在领导上、工作上、政策制度上多想办法，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

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企业扩大自主权、经济搞活以后，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当的作法，搞歪门邪道。比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弄虚作假，挖国家墙脚，以邻为壑等等。这些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带来的，但也是改革中间我们的工作要跟上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第二部分，曾发表于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

去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扩大下边的权力，把经济搞活；另一方面监督和检查工作要跟上去，执行纪律和经济立法工作要跟上去，符合规定的不要干涉，违反规定的及时制止。否则就会给某些人以可乘之机。只要加强领导，采取监督、检查、限制的有力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研究解决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四川的改革试点比较早，出现矛盾和问题也比较早，要使改革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具体指导，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绝不要以为试点比较顺利，总的情况好，就掉以轻心。要知道，改革不进则退。我们是在总的体制没有变动的情况下，自下而上改革的，各方面矛盾很多，牵扯很大，如果不解决新矛盾，就前进不了，甚至已经改了的也巩固不住。所以，从四川改革的情况来看，有一大批新问题，推着我们去研究、去解决。从全国来看，各省都在试点，四川改得早一点，有责任继续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今明两年还不能大改，一两年内基本上还是按照现在的办法搞一些改革，四川就是工业改革十二条、十四条，商业调整改革的若干规定，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基层供销社独立经营的试点等。两年内就搞这些，深度就这样了，主要是由点到面向广度发展；当然有的在深度上也可以继续作些试验和探索。四川的初步改革，就广度来说，是全国最大的，经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带来很多连锁反应，如果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好，就能为将来大改大革摸索经验，作好准备，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在改革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坚定性、坚韧性，要锲而不舍，抓住不放，长期搞下去，但步骤上要稳。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一方面不要不知所措，重复过去那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教训，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犹豫徘徊，走回头路。另一方面，要注意加强领导，深入调查，精心研究，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及时解决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不要放任自流。经济体制改革是四化建设中一个大问题，有关各部门都要加强具体指导。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如果不参加经济改革的实践，不研究解决经济改革中的问题，领导四化建设就有很大的困难。要钻进去，学会它。各级党委不要局限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要从整个经济改革的角度，从全局、从长远来多想一些问题。省

委准备以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主，结合实际工作的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搞一个研究机构，集中力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研究改革中的新问题，摸索运动的规律，及时提出方案和对策。

关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最近同有关部门座谈了一下，看来还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一）自有资金的使用和流向问题。企业扩大自主权后自有资金增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现在国家财政有困难，而企业的钱比过去多。从国家来说，要承认企业的物质利益，承认它的所有权，不去上收；同时，又要加以指导、协调，不能撒手不管。如何指导企业把这些资金用好，减少盲目性，发挥经济效益，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改革的深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企业有了资金，它就要扩大再生产，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解决：第一，它要扩大再生产，就有原材料、设备、施工力量等问题，有些它自己解决或通过市场调节解决，有些要在计划上给以安排；第二，它扩大再生产，往往从本企业考虑得多，而不大了解整个地区动力、原料的情况，不大了解其它厂是否也在搞同类项目，搞不好就会拉长长线，搞小而全，搞重复建设，这就需要经济领导机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到地区、行业长线、短线的状况和交通、能源等条件做好综合平衡，对企业进行指导、合理安排；第三，有的企业有了钱没有用场，有的需要搞挖、革、改¹，自己的钱又不够，这就需把企业自有资金组织起来，按自愿互利的原则和协商的办法进行调剂。可以通过银行进行调节，采取存款付息的办法，把企业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作为中短期贷款，用于搞能源、轻化工等短线。或者采取合营的办法，投资分红的办法，使这些资金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二）利润留成悬殊，造成苦乐不均的问题。在扩大自主权企业中，有些利润很高，企业基金就多，有些又很低，形成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不同产品之间苦乐不均的情况。这里讲的苦乐不均，不是指由于经营好坏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主要是指资源条件、技术装备不同，特别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收益上的悬殊。过去，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此价格与价值长期严重背离，利润悬殊很大，并不能真正反映经营的好坏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如，现在加工行业的利润就比

较高，原材料、燃料工业和农机工业的利润就比较低；同是纺织企业，有的厂搞化纤、混纺利润就高，有的厂织坯布利润就低；在一个针织厂内，织尼龙袜利润就高，织线袜利润就低。利润高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多，利润低的付出的劳动不一定少。苦乐不均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职工积极性，影响生产发展。现在有些利润低的，如小五金和一些支农产品，企业就不愿去搞。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是要改革价格体系，使之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但这个问题很复杂，目前条件还不具备。在价格体系还不能作大的改革的情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办法：第一，在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内，研究定出一个合理的内部价格，作为计算利润留成和奖励的依据。上海纺织工业局就是这样搞的。但是，也不要调整得太多、太猛。我们政策的出发点，主要应当考虑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全行业内部，拉得很平也不行。第二，调整工商利润。第三，从税收上进行调节，有的要减点税，有的要加点税，如资源税、资产税，甚至可以加征企业基金所得税。第四，在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上区别对待。总之，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不能急，不能搞平均主义，要注意保护搞得好的企业的利益，要稳步寻找一些解决苦乐不均的妥善办法。

（三）关于市场调节问题。在企业扩大自主权和实行市场调节以后，要注意加强计划指导，克服生产和经营的盲目性。现在企业比较注意市场需要，这是好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什么商品短缺利润高，就一拥而上都去搞，以致重复生产，造成浪费。经济领导机关要搞好调查研究，加强市场的预测预报，给企业以指导。在销售方面过去是采购人员满天飞，现在是推销人员满天飞。在一个时期内，对于打开销路，建立经济联系，有它的积极作用。但也要进行指导，采取一些措施，如设货栈、生产资料交易中心、委托代销等，建立经常的渠道，逐步改变推销人员满天飞的状况。

实行市场调节，就必然涉及价格的调整、价格体系的改革。在调整时期，价格体系不能大动，要尽量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央已经定了这个方针，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农副产品、工业品中属于人民生活的必需品，零售价格要从严控制，不能随便涨价。当前物价上突出的问题，一是有些单位擅自扩大议价商品的范围，任意提高商品的销价，把应按计划调拨的商品按议价出售。要注意这个问题，不准这样搞。还有

蔬菜涨价的问题。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基地，不能把蔬菜拿到集市贸易去出售，必须由蔬菜公司收购，按牌价销售，如果搞产销见面，必须按照蔬菜公司的牌价，否则，要实行经济制裁。农副产品中，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如果品，可以组织城市直接到产区去议价采购，减少中转环节降低销价。二是有的企业自销产品的售价同商业零售价格不一致，特别是畅销产品任意提价，要同商业价格一致起来。三是原料提了价，加工产品是否提价？凡是生活必需品，销价不要提，可以用别的办法，如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从利润的分配上或税收上调节。物价不能政出多门，一定要严格检查，统一管理。对于违反政策随意涨价的，要严肃处理。

（四）扩大自主权与专业化改组结合问题。专业化改组是经济发展的要求，非搞不可。过去用行政的办法搞专业公司，看来不成功。上海以一个中心企业为主，把周围同行的小厂联合起来，搞专业化改组，重庆也开始这么搞了，这个办法看来是好的。搞公司，一定要从生产需要出发，不能一开始就搞全能的，把人财物、供产销都管起来。开始可以搞松散的公司，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五）发挥大城市作用的问题。扩大自主权以后，要按经济的内在联系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使国民经济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就需要研究如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问题。最近，上海市同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联合办企业，上海出技术，那些地方出原料、出劳动力，共同办厂或搞跨省公司，采取“补偿贸易”或其它办法，合理分配利益。利用这种形式，就在大城市同中、小城市之间，甚至同县社企业之间，建立了经济联系，这个办法很好。不仅可以把大城市的企业搞好，经济搞活，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起来。重庆、成都朝这个方向做。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关的企业就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就要求发展经济联系，要因势利导，建立大城市企业与外地的企业横向的经济联系。组织专业公司，也要建立在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打破条条、块块分割的状况。

（六）奖金问题。我们要作具体分析，凡是符合政策规定，体现了按劳分配，推动了生产的，都要肯定。现在有的单位滥发奖金，主要是违背政策规定，巧立名目，或者是搞平均主义，这些都不能体现按劳分配，不

能促进生产发展，要认真检查，坚决改正。根本的问题，还是要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兼顾，保证国家多得。奖金的发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今年四川试点的企业，继续按照省里规定的办法去办。对于那些滥发奖金，搞歪门邪道，挖国家墙脚的，要进行调查，如果发得不合理，要坚决退回。现在有的单位搞生财之道，不搞正道，而是搞歪门邪道，要抓住最突出的，从严惩处。这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最怕的是不加分析，眉毛胡子一把抓，一说纠正滥发奖金，连正当的奖励也不让搞了；一说要肯定奖金的作用，连最糟糕的滥发现象也不查了。

总之，经济工作一要搞活，二要严格纪律。搞活以后，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就有人要钻空子。因此，越是搞活了，越要严格纪律，越要加强监督。我们要承认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并不可怕；企业计较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奇怪。这样，企业才有内在的经济动力，才有真正的积极性、主动性。上级领导机关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采取经济的办法，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企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作法进行干预，把企业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引导上正确的方向，使企业自身的利益同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推动生产的发展。经济搞活以后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止这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要很好研究解决。

注 释

1. 挖、革、改，指企业挖潜、革新、改造。

关于农工商联合企业问题*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

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可以有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有大农场群的地方办，如广东海南岛、黑龙江、新疆石河子、四川的阿坝地区。大农场群多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内地没有这个条件。

第二种，依靠分散的比较大的农场，先将这些小农场联合起来，以他们为基础同周围生产队联合。重庆、成都就适宜这种形式。联合并不是两种不同所有制的合并，主要搞专业化联合，开始可以搞合同制，搞生产前、生产后的联合，生产前的联合主要是生产资料的供应，生产后的联合主要是加工、冷冻、贮藏、运输。我到欧洲看到好多地方就是搞这种联合。我们的联合企业大量的是和周围的生产队签订合同，他们是否入股可以看看再说。签订合同完全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现行体制矛盾没有关系，要支持。要以生产队为对象，直接同生产队打交道。在经济上生产队和联合企业联系起来，公社就可以成为单独行政组织。中国三级所有怎么过渡，不一定是原来的想法，由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再过渡到公社。生产队可能永远是一个生产核算单位。最近看了一个美国的材料，他们的生产单位大都是家庭农场，合作社经济是兴起的趋势。美国在六十年代，有些大工商业资本家财团渗透到农业里想搞大农场农业，效果不好。我们城市郊区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就是要同生产队搞联合，内地许多中小城市郊区适合这种形式。联合企业的加工厂同许多生产队联合起来，就有了可靠的原料。这个路子

* 这是赵紫阳与当时农垦部负责人的谈话。

比较宽，这就不单是农场了，而是以农场为基础和周围生产队联系，把农民也吸引进来了。

第三种，一般公社怎么搞法？一般公社都有些社办企业，也要采取在生产队的基础上搞联合，困难的是没有依托。联合，所有制不动。水果、茶叶、蚕桑都可联合，可以搞加工厂，实行利润返还。这类加工厂太小了不行，但也不能搞得太大。搞社会化、专业化的联合。水果加工可以联合，包装可以联合。现在商业搞包装浪费很大，比如外贸，生产队把水果直接交给他们是多少钱，包装好了又是多少钱，包装的这笔钱就可归农民了，现在都归了商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如生产、加工、运输、饲料都可以联合。植物保护原来分散搞，现在四川有一个县联合搞了，用东方红喷雾器搞微量喷洒，生产成本大大下降，群众非常喜欢。至于养猪、养鸡开始不一定搞很大的，不一定搞万头猪场，要逐步发展。没有农场的地方就可搞这种形式的联合企业。要有先有后，需要什么就先办什么，将来小生产也就变成大生产了，也就全部做到专业化、社会化了，这也就是农工综合体、一体化，我们叫“一条龙”。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个大问题，这是农业的组织结构问题，全国还没有接触这个问题。

中国人多，不要搞过分机械化的东西，但是分工要强调，分工分业，这就是专业化。一开始规模不要搞得很大，逐步前进。要提倡养奶山羊，山羊奶同牛奶一样，我喝过。一家一户都可搞。成都搞了千把头，旺产期一只羊一天可出十斤奶。学外国经验也要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办。

大洪湖渔场属于重庆、达县两个地、市，怎么搞法，我主张搞企业，大家入股，独立经营。企业内部的事谁也不要干涉，可以搞个养殖公司，成立董事会，市、地、县代表参加，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定。企业内部利润给谁，怎么分成，产品给谁，都由企业来定，谁也不能干涉。这样，企业就搞起来了。如果这个搞得通，几个城市周围还有几个水库就可利用起来了。现在都是行政区划在扯皮。长寿湖是另一种情况，没有这类矛盾。

长寿湖炸鱼的问题，要用经济办法解决，附近社队干脆要他们入股，他就不炸了。用调整物质利益的办法解决，不承认物质利益不行。这样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和群众利益连起来以后，有人干坏事，群众就不同意了。

现在，流通环节的问题相当的多，压级压价的事固然有，但很大的问题是设施太少。前一段成都每天有几百头猪没办法收。冷库装得满满的，农民意见很大。外运活猪不行，我要他们搞厂外加工腊肉。四川的猪肝每天烂掉很多，卖不出去，搭配着卖。猪头、猪蹄降价处理。广东人喜欢吃猪肝，能运到广东就好了。农业国家发展生产，没有商业设施不行，东西一多就没法处理了。现在是羊皮有人收，羊肉没人要，二三角钱一斤。哪里有冷冻仓，那里生产就能继续发展。广汉有了冷冻仓，他们的兔子就可以继续养了。只讲农业不讲商业不行，要调整商业的设施。

城市近郊要搞科学方面的东西。农业现代化有机械化，也有科学饲养、科学种植和科学栽培的问题。比如养蘑菇，并不需要多少面积。日本大量养蚯蚓，一个平方米可以生产很多，拿蚯蚓喂鸡、养鱼，产量很高。近郊农业要搞工厂化，种菜要搞工厂化，养鱼要搞工厂化。不能只靠种地，要用科学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

为什么只提两个“靠”

去年十月，我在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过一次话，提出几年内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我只讲了两个“靠”，而没有再加一些“靠”。当然从广义上讲，要靠的方面还很多。当时我想，讲的“靠”太多了，就体现不出这几年的侧重点，针对性就不那么突出了。我讲靠政策、靠科学时，有两个限制词，一个是“几年内”，一个是“主要的”。我所以这样提，第一，考虑到在几年内，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搞农业机械化。实际上，今年的水利投资比去年还减少了。第二，在政策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潜力，两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见效最快的。为什么提靠科学呢？这也是因为这方面潜力大，花钱少，收效明显，而各地对这个问题认识还不够，所以有强调的必要。这样讲，并不是说不要搞农田基本建设，搞机械化了，这方面的投资还是要尽量用好，讲究效益，但几年之内靠这些来更大的增产靠不住。当然，这是指一般的地区，像东北那些人少荒地多的地方，只要搞机械化，马上就可以增产，又当别论。

农业要现代化，根本解决农业问题，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必须实现机械化。为此，国家必须大量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这是肯定的。

*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可是这只有在工业有相当的发展，有大量的资金积累以后才能办到。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全局上来看，国家对农业支援力量的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的财力。像西欧、日本这些国家工业高度发展，有大量的资金积累，因而是工业补贴农业，而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农业补贴工业，还存在不等价交换。我们应当逐步减少不等价交换，并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资金的积累，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逐步做到工业补贴农业。但是要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我们由现在农业补贴工业逐步过渡到将来由工业补贴农业，归根结底，还是要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工业利润大量增加才行。看来在调整时期，以至调整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还是要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搞上去。从全国来看，现在经济建设矛盾的焦点，最短线的就是能源、交通、公路设施，另外就是科学、教育。这些都是最薄弱的环节。工业上现在之所以有百分之几十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就是因为煤、电、气不足。我们国家不论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它经济建设也好，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前提条件，但是搞能源、搞交通，建设周期长，而且需要大量投资。所以说，在现在情况下，想要对农业增加很多投资还没有这个条件。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一定的时期内，农业能否在目前投资增加不大的情况下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取得一定程度的增长呢？能否使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集中财力、物力，解决最迫切的能源、交通和适当加强教育、科学，以取得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动？如果能这样的话，就为今后更多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创造了条件。现在就是要研究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认为是可能的。

首先，政策的潜力是不可低估的。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下达后，变化这么大。省委发出和在全省贯彻 100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起来的意见》）后，那些长期低产多灾的穷困地区，采取的一些特殊办法这么灵，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们的农业发展缓慢，中央两个文件一发，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无非第一

是提价，这实际是很大的调整，第二是生产队有了自主权，第三是按劳分配，第四是责任制，第五是家庭副业，不外乎就是这么五条。贯彻这五条，一下子就使全国东南西北都有了程度不同的明显的好转，多年来没有肉吃的地方有肉吃了，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四川省委 100 号文件下达后，群众就很欢迎，说这是致富的好文件。这里我说一下安徽的凤阳县，这个地方长期多灾低产，去年在那里搞了一条特殊政策，就是大包干，就这一条，凤阳县去年增产百分之五十，卖给国家的粮食，等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每人口粮五百斤。当然那个办法是适合他那里的情况，不是说每个地方都可以那样搞。尽管各地区情况不同，但总的证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在农业方面的一套“左”的思想、“左”的政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国有那么一些地方，估计有一亿人口，基本上是合作化以来就没有吃到多少甜头，或者三年困难时期垮下来后一直上不去，这些地方农民丧失信心，人口增加了，粮食还没有一九五七年多，究竟是什么问题呢？灾情也有，但不是年年都有。根本问题是挫伤了那里农民的积极性。显然这些地方不是自然灾害问题，而是政策问题。对这些地方国家每年都要调进很多粮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像这些地方，现在不是怎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而是要恢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因为这里的农民对集体经济不相信，没有信心。为什么有的地方一搞包产到组一年就翻过来了呢？这说明调动农民被“左”的政策挫伤了的积极性，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那些长期困难的地方，按照那里的情况，采取一些能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有些显然是临时性政策，是权宜之计，是迂回一下，首先解决农民的温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前进。这样，在这些地方国家就能够减少很大一部分负担。只要我们思想解放，因地制宜，真正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这方面是有很大潜力的。

要解决生产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考虑在生产方针上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我们要真正因地制宜，从人多、山区多、耕地少这个特点出发，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想问题，研究如何合理利用资源，

趋利避害，发挥优势。这方面的潜力很大，窍门很多，可以多快好省。有些地方不适宜种粮食，硬要去种粮食，于是又要修水利，又要改土，花了很多工，投了很多资，效益并不大。如果因地制宜去搞畜牧，种经济林木，或者搞其它的东西，水利就可以晚点修，土地也不一定搞那么平，这就可以大大减少投资，创造的价值比种粮食还要高。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同国际市场结合起来了，不能光从自给经济去考虑，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上去考虑，这就可以发挥我们的长处。所以我们应该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搞农林牧副渔，这样门路就多了。不搞自给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包括到国际市场上去交换，这样经济就活了。我们中国要发挥人多这个优势，不仅工业上要搞劳动密集的产品，农业上也要搞劳动密集的产品。我们拿劳动密集的农副产品到国际市场上交换粮食，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就是我们的港口还不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都要注意人多资金少这个特点，农业上还有个山区多、耕地少的特点。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去想问题，去研究生产方针，去考虑长远的规划。

在全国长期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首先，对依林¹同志刚才讲的关于制订长期计划的方针和这次座谈会的评价，我完全同意。这是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四个半天会议的讨论，作了很好的综合，代表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意见；同时也是对这次座谈会的总结。下面，我讲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供大家研究讨论。

一、制订长期计划要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到二〇〇〇年达到什么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除了这个目标外，还有四化的路子究竟怎么走，怎样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课题。在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如何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发挥长处，避免短处，值得好好研究讨论一番。这次大家都回顾了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过去经济工作搞的结果不大理想，根本问题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够，不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去年，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害。我们应当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认识这个课题。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展开讨论。

* 这是赵紫阳在1980年4月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出：“制订长期计划要认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重要课题”，强调“经济建设一定要十分重视经济效益”，“农业、工业发展主要靠政策、靠科学”等指导思想，对当时制订长期计划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比如，从近代历史来看，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取得的，而是首先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的。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应当大力发展生产。旧中国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在革命胜利，并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是不是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抓经济建设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应该注意发展商品经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这里面还有一个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的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充分发挥它们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中的积极作用。

又如，中国是个大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如何发挥大国的长处，避免大国的短处，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国家大，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建设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项目。但也要看到国家大，情况复杂，更加不平衡，加上交通不发达，通讯又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避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不然，势必产生官僚主义，效率很低，压抑地方的积极性。

再如，我们国家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很丰富。要研究如何发挥这些优势，充分利用资源，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的产品，即容纳劳力多、投资又少的产品，同外国进行交换。在技术政策上，要从我国的现实出发，有些要采用先进技术，同时要采用适用技术（中间技术）。这个问题也应研究。

同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而且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从这个现实出发，在确定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时，积累率就不能太高，发展速度不能要求太急。如果主观上要求过高、过急，欲速则不达，实际上反而慢，过去吃亏就是如此。

还有，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下，经济结构是轻一点好，还是重一点好。是否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多发展一些消费资料生产，解决积累、财政、就业、出口等问题。

当然，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决不止我上面讲的这几点，甚至可能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但这个问题是值得很好探索、研究，认真总结经验。

二、在讨论长期计划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经济建设一定要十分注意经济效果。这是经过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同志讲，注意经济效果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过去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变过来。过去经济效果差，是经济工作各种弊病的集中表现。我们搞建设三十年了，人民节衣缩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经济效果不好。这里面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

注意经济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我们的国家，各个地区、各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这方面的潜力很大。如果我们不搞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大而全”，“小而全”，而是从各自的具体情况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突出重点，就能大大提高经济效果，大大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有些地方搞地方的经济体系，明明是得不偿失，但也要干，造成很大浪费。这个问题除了我们有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思想以外，我看，同我们的体制、政策有很大关系。由于大锅不开饭，就只能各自另起炉灶。我到四川，就搞小铁厂，因为老百姓没有铁锅。东北开了不少小铝厂，影响大铝厂供电，后来确定把产品分给地方一部分，各地的小铝厂就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适合搞煤的，要去搞煤，不适合搞铁的去搞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说明我们政策上、制度上还有问题，扬长不能补短，不能互通有无。有的地方宜于搞经济作物，不给它粮食，也就发挥不了它搞经济作物的长处。所以就发生了在全国讲平衡时，每个省也讲平衡，甚至专区、县也讲平衡。大家都讲自给自足，这就根本谈不上发挥优势了。今后应该扬长补短，互通有无。要加强地方与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解决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不产煤的省市，可以投资到有煤的地方去，搞联合经营。在经济改革中，根据生产的需要，提倡各地发展经济联系，搞联合经营，这样就加强了计划指导，避免重复建设。

联合有各种形式，如联合投资、合作办厂、产品交换等。在这方面要制订一些政策，立点法。如果体制、政策经常变来变去，大家就不放心，就不愿搞，所以要从政策、制度上作些规定。首先对于有突出优势的地方，要给它创造条件，给它机会。比如湿热带地区，全国约有五万平方公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就要帮它解决必需的条件。总之，要从体制、政策、办法上进行改革，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搞各项事业，进行各项建设，都必须择优。哪个地方，哪项事业投资最少，见效最快，就先搞哪个，要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当然这样搞，会发生不平衡。我们要承认不平衡，允许不平衡，不要怕不平衡。允许一个时期的不平衡，正是为将来缩小不平衡创造条件。如果不首先把经济效果最好的地方搞起来，而是齐头并进一起搞的话，那么，哪里也搞不起来。例如教育，必须加强，但也要承认各地的不平衡，全国各地在教育上都按一个标准要求，国家的财力办不到。

如果能把四亿人口地区的教育搞好，人才就有的是，就可以输送给各方面去。对于教育问题，既要看到搞四化，培养建设人才的迫切性，又要看到我们国家大，全国不可能平衡发展。要有不同要求，抓好重点地区和重点学校，让一些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得快一些，多培养一些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总之，要解决怎样做到投资少，收效大。当然，我们不是要永远扩大差别，而是从我们国家现在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状况出发来考虑，把容易搞上去的先搞好，就可以达到多快好省。这样，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差别会扩大一些，那些优势少的地方可能发展慢些，优势多的地方会发展快些，但优势多的地方先发展了，再回过头来帮助发展优势少的地方就有力量了。美国是先发展东部，后开发西部。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平均每人国民收入三千美元，而黑山地区只有五百美元。我们国家里，在一定时期内也有“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存在，应该允许这样。

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现在中央定下了积累率百分之二十五的杠子，这是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确定这样的积累率，对于经济的稳步发展，避免折腾，对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有很大的意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从今年开始，要在三四年内把积累率降到百分之二十五，这确实是矛盾和困难很多。

今后三四年是非常重要的三四年，是由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三四年搞得好不好，关系很大。在这三四年中，主要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使人民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改善，当然幅度不可能很大，但必须有所改善。

二是无论如何不能继续发生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问题要解决，物价要

保持基本稳定。通货膨胀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加重。如果通货膨胀扩大，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安定团结，保持局势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通货一膨胀，问题就大了。

三是为今后新的发展作最必要的、最基本的准备。在三四年后，要有新的速度，就需要作最必要的准备。主要是指生产建设上的准备。要通过调整，使比例失调的状况能够改善，这就要上一些能源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项目。体制改革上也要有准备，二三年内要完成大改革的准备，现在还只是小改小革。

这三条，我们必须做到。但要做到会有很多困难，是充满着矛盾的。例如，去年财政有赤字，今年仍然有赤字，要避免通货膨胀，不能连续出现赤字；而用于消费的部分不仅不能减少，并要逐步增加一些；为今后发展作必要的准备，也需要一些投资，确实矛盾很多。在积累减少的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如何把钱用好，把经济效果提高。我们要从以下方面想办法：

一是进一步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如果不下一些不必要的项目，必须上的项目就不可能上。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只有把轻工业搞好，才能活跃市场，安排就业，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轻工业能源消耗也少。

三是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把各种资金引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弥补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解决以小挤大，重复建设的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在经济上搞联合，走联合之路。现在实行两级财政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地方和企业的钱会逐年增多，但无论如何再不能把地方和企业的钱收上来，这条路不能走。只能采取经济的办法，自愿协商，实行互利，搞合营或联合，把资金引导到国家急需的、重要的建设上来。比如轻工，与其各个地方自己搞，不如集中在条件好的地方搞，可以成立股份公司，分利润，分产品。国家要制订有关的政策，要立法，所有制不能随便变。这样，矛盾可能会缓和些。

四是随着整个经济战线大家按经济规律办事，讲究经济效果，以后流动资金会节约一部分下来。现在全国流动资金二千多亿元，数字这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产销脱节，产品压在仓库里。今后货不对路的情况改善了，

流动资金就可以减少，基建投资就可以适当增加，看来，节省出几十个亿到百把亿是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这几年，但这几年一定要搞好。现在的有利条件之一是可以借到外资。应该优先把外资用在调整上，这样就不会因积累率压的过猛而带来不良循环，就会减少一些矛盾，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不至增加新的困难，就能使调整进行得顺利一些。在这几年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外资这个有利条件，让外资为调整服务。

四、最近几年之内，农业、工业发展主要是靠政策，靠科学。以前我讲过发展农业，主要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工业也是这样，要靠扩大企业自主权，还有按劳分配和实行市场调节等；靠技术改造。我们能不能在一般不增加或不多增加投资的情况下，使农业、工业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使我们能够集中一些财力、物力去加强能源、交通、建筑业和城市建设呢？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这涉及我们对工农业的潜力怎么估计和潜力在什么地方问题。现在工农业的潜力很大，最明显的是长期以来，“左”的政策和统得过死的体制限制了潜力的发挥。所以把体制搞活，政策适当放宽，潜力就可以挖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了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农村形势好转；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后，利润迅速增加，就说明了这点。过去，统收统支那套办法使各经济单位浪费严重。这两年凡是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产值比面上的企业并不增加多少，但利润却增加比较多，主要是浪费减少了，效益提高了。现在就是要靠把直接生产者、直接经营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承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样就能把多年没有挖掘的潜力挖出来。这是最现实的、吹糠见米的办法。现在“左”的一套的流毒是否全部肃清了？我看并不如此。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农业上中央两个文件的精神要进一步落实，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也要继续抓紧抓好。

经济搞活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大量的、主要的是，小改小革以后解放了的生产力同现行规章制度、同整个经济体制的矛盾。另外，放活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反映了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即监督、检查与纪律跟不上。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怎么看、怎么办？总的讲，现在活得还不够，工作还跟不上，需要加以解决。这次改

革一定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决不能重复过去那样“一放就乱，一乱就收”，而是要继续改革，把工作跟上去研究一些解决的办法。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后出现的一些问题，像原料产区同原来城市加工的矛盾，可以采取办联合企业的办法来解决。也可以采取把计划内统一调配的基数定下来，并保证调拨，超产部分可以拿到原来的工厂去加工，分产品或者分利润，不要自己再搞小加工厂。如烟叶等原料可以这样办。还有茶叶，精制茶利润大，归外贸搞；而粗制茶利润小，归社队搞，就不愿干。浙江等地采取规定粗茶交售的基数，超过计划部分送到精制茶厂加工，返回一部分利润或产品，就解决了矛盾。还有些产品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互通有无，在省、市、区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进行交换。总之，要在承认各自的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发展经济联系，避免重复建设和自成体系。这样既可以活，又不会乱。实际上这就是要在活的基础上加强计划指导。这个问题，各地方各部门可以进行研究。

注 释

1. 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曾任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经济体制改革步骤要积极稳妥*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体制改革的步骤

大改什么时候搞？我认为两三年内不能大改，只能搞大改的方案，搞一些步子较大的试点。根本问题是，两三年内价格不能大改。价格不改革，体制大改中的什么价值规律作用，什么市场调节，就都会是空的。而价格是个大问题，大改搞得不好，要出大乱子。现在国内无论经济情况还是政治情况，都要求物价稳定，不允许大动。所以，从今年算起，三年内要搞好调整，不能大改。

但三年内，体制改革工作还要积极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大改作准备，包括理论探讨，历史、现状的调查研究，积累和总结现有改革和试点的经验，在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城市作较大步子的试点，拟定改革方案等等；二是抓好当前的改革。企业扩大自主权、市场调节、两级财政这三项改革带来很多变化、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二、体制改革工作怎么抓

体制改革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抓起来。原来中财委有四个调查组，有的可以不要了，如进出口小组的工作由进出口委员会搞。体制小组要保留并要加强，成为中央财经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它的任务是，在中央财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时的发言。

经小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起草文件，指导当前的改革工作。

三、要保护竞争，推动联合

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两级财政或财政包干后，出现一些重大问题。当前体制改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

（一）一些原料产区不愿把烟叶、茶叶、蚕茧等原料调给城市加工，矛盾十分突出。

（二）企业、地方有了钱，而且越来越多。怎样把这些预算外的资金尽可能用得恰当一些，做到既有助于解决一些必须建设项目投资不足的问题，又防止地方和企业的盲目性。

（三）出现了地方封锁，搞地方保护政策，不许外地产品到本地销售，不许到外地订货。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奖金问题，利润留成苦乐不均问题。但以上三个问题，原料问题、防止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问题，是当前更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调整和改革。如果不制止封锁，那么，就会保护落后，我们说的发挥优势、提高经济效益都会成为空话。国务院要有一个态度，要采取措施。我们采取什么态度？要保护竞争，制止封锁，提倡在互利的基础上搞联合。要起草一个文件，由国务院发，让各地区、各部门都试点，推动联合。

可以有几种联合，如联合投资、来料加工，利润分成或返还利润、产品交换、互通有无、补偿贸易等。都要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联合。一定要搞互利政策，不搞互利，都走不通。要在互利的基础上搞多种形式的经济联系、经济联合。这个路子非走不可。

我的看法是，我们今后基建资金不能再恢复搞一个渠道。如果过去一个时期这样做有它的必要性，现在这个时代已过去了。今后，我们的投资渠道、资金来源，恐怕是多条的、多方面的，问题是要用经济办法，要有经济措施来吸引、筹措、集中各方面的资金。国家投资除用于国防建设外，主要搞一些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项目，如能源、大水利工程、港口等。其

他建设、赚钱的项目，由投资公司、合股公司，地方、企业的资金来搞。此外，银行的作用十分重要。无论地方、企业的存款，银行都要给利息。有些新老企业，企业基金多，用不了，可以存入银行。银行吸收了存款，就可以把一部分用作长期贷款，起到筹措、集中资金的作用。我为什么讲多种形式的联合呢？因为，将来联合的路子会越来越宽。现在什么都压在财政部身上，那不行。中央财政只能量力而行。所以，联合不是权宜之计，它既可吸引、筹措各种资金，用于国家建设，解决国家资金的不足，还可以防止地方和企业盲目建设、重复建设。这样搞，将来所有制就复杂了。全民、集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是社会主义的。

当然，搞联合，要自愿互利，要签订合同。现在地方、企业最怕的是“肉包子打狗”。合同要有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谁改变，谁负经济责任。

竞争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基础上的必然趋势。竞争还能促使企业联合。例如，通过竞争，上海一个厂比不过四川一个厂，就主动愿意为四川那个厂生产配件。我们要做几条规定，保护竞争，推动联合。

四、关于公司和经济中心

这两个问题，今后我们要专题讨论，要早一点讨论。

体制改革中，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公司的问题。我不主张搞全国性的丝绸公司。现在这样搞法，就要打击四川农民养蚕的积极性。要研究一下。如果每个部都搞公司，就会把城市工业搞得四分五裂。

经济中心可以试验，搞它几个试点。

关于发展家庭专业户养鸡的批语*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此件请印送主席、副主席、耀邦¹同志并书记处、财经小组(扩大)、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阅。

哈尔滨市退休女工王淑兰，一面带孩子，一面发展家庭养鸡，采用手工劳动和一些简单的机械，养母鸡二百五十只，一年产蛋三千斤，纯收入二千一百元。这个材料看了很受启发。四川江油县城关公社也有类似情况，社员在家里因陋就简养几十只鸡，效果也很好。看来采取这种经营方式发展养鸡事业，是解决大中城市禽蛋供应的一条投资小、见效快的路子，比搞大的机械化养鸡场容易得多。城市郊区的生产队，可以把养鸡包给一些热心的、有技能的专业户、专业人员去干，建立责任制。有关部门要帮助解决饲料问题，就地取材，选配适量的添加剂做成有营养的、成本低的配合饲料，供应给饲养人员。这样做，我们城市禽蛋的供应就可能很快好转。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赵紫阳

五月二十四日

* 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 1318 期刊登一份材料反映，哈尔滨亚麻厂老工人王淑兰退休以后，利用家中八平方米的旧厨房，采用四层叠层笼养、全封闭、机械通风的办法，养了 250 只鸡，半年时间就向国家交售鸡蛋 3000 斤。这是赵紫阳在该材料上写的批语。

注 释

1. 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党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外贸体制改革中一些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主席、副主席、耀邦同志、书记处、副总理和国务院各委、外贸部党组：

送上春季广交会的一份材料，供参阅。前一段，对广交会、对进出口的问题反映很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外贸体制的改革带来了混乱。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缺乏分析的。应当看到，一年多来我国外贸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同三中全会以来外贸体制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调动了各级的积极性分不开的。至于在改革中出现一些问题，那是难于避免的，是需要我们工作跟上去的问题。正如广交会的化工等交易团那样，只要把工作做好，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们绝不能留恋过去闭关锁国、独家经营、统得过死的老办法。今后外贸事业要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稳妥地进行改革；同时，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加以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应精心研究、指导，做好统筹、协调工作，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统一步调，及时解决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外贸部门要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地发现和总结在搞活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管理的新经验、新办法，做到活而不乱，统而不死。以上意见，供参考。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 这是赵紫阳就广交会一份材料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材料反映，1980年春季广交会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积极开展工作，协调解决矛盾，坚持统一对外原则，维护了国家利益，效果很好。

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

万里¹同志并转耀邦同志：

最近看了几个地方的材料。目前正当夏种夏收的大忙季节，部分县社在所有制、责任制上仍在变动。如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有的还在继续扩大，有的又布置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不定。这对当前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收作物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根据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到不同类型的地区 and 社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第一，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第二，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包产到户（至于社队的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可以包给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第三，现在有些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产到户的，允许进行试验，经过一段实践看看结果如何。新华社《内部参考》第五十期登载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的一个材料，这个队有十六户，共十二个男全劳力。生产队把粮食包产给八个男全劳力（老弱户和女劳力不包），另外四个男全劳力，有二人包放羊，有二人到农田基建队。四属户²和女劳力到农田基建队参加劳动，评记工分。结果，去年粮食总产量由三万多斤增加到

六万四千斤，全队人均生产粮食一千斤，社员增加了收入，集体增加了积累。看来，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在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包产到人，比一般地平均包产到户要好，这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不仅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的，应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在那些落后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要逐步朝这个方向引导。

以上问题，建议在书记处议一议，请酌。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九日

注 释

1. 万里(1916-2015)，山东东平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中央建工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铁道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四属户，指户籍在农村的现役军人亲属、烈士亲属、工人亲属和干部亲属的农户。这些农户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缺乏劳动力，当时需要生产队给予照顾。

关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承包到人 责任制的批语*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主席、副主席、耀邦同志、书记处、财经小组并国家农委：

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的这个材料很有特点，值得一看。这个生产队搞的不是一般的包产到户，而是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在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建立个人责任制，社员分工去包产种粮食、养羊、造林，搞农田基本建设，使这个穷山沟的面貌很快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比一般的包产到户要好。它能够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把生产搞好；同时又不至于把生产队架空，改变队的统一核算，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种办法，不仅产品比较单纯的社队可以这样搞；就是在生产多样化、经营门路多的社队也可以这样搞。生产队根据生产的需要和每个社员的特长，按专业分工协作，有的可以包产种粮食，有的包林业，有的包牲畜养殖，有的包工副业，有的包农机、防治病虫害等。包产种粮食，也不是每户都平均一份，会精耕细作的可以多包，劳弱户可以不包，去干其他活。总之，要分工合作，各尽其能。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形式。在那些困难落后的地方搞包产到户的，现在马上推行这种形式有困难，应逐步往这个方向引导。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

* 这是赵紫阳就新华社《内部参考》1980年第50期上刊登的陕西省米脂县的材料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

不要搞包产到户，已经包产到户的，应按这种形式进行试验，这样生产力就会大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会日益巩固。

以上意见，供参考。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日

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六日

赵紫阳(以下简称赵)与世界银行副行长夏希·侯赛因(以下简称侯)谈话要点如下:

赵:请坐,欢迎你们。

侯:谢谢。

赵:你们都是世界银行主管东亚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官员,很欢迎你们常来。

侯:谢谢。

赵:相信我们的合作还会更好。我们将大力支持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活动。今年五月你们的执行董事会决定恢复中国席位,这是一件伸张国际正义的大事。在这里,对麦克纳马拉¹先生、副行长先生和所有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努力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侯:谢谢。我带来了麦克纳马拉先生对您的问候。自从他来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在世界银行恢复代表权的问题已经完成了。我们希望不要多久,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表决权的比重,将会同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麦克纳马拉先生正在努力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在三个月内具体研究中国和世界银行的合作。我在和中国官员的三天接触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官员的坦率。我们认为,这对于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即实现现代化。我们希望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将是你们的一个伙伴。

赵: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但是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实现现代

化。我们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譬如资源丰富，这是长处。人口多，这既是长处，又是短处。人口多，劳动力充足，而且中国人是勤劳聪明的。但是人口多，负担也重，积累建设资金很困难，资金不足是我们搞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另外，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落后。国外朋友们对我们这方面的议论很多，反映我们办事慢，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这个批评符合事实。但这不是中国工作人员的个人作风问题，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五十年代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现在决心要改革。我可以告诉朋友们，从开始改革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今后将毫不动摇，坚定地改下去，当然我们现在的改革是初步的，是小改小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看来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一边实践和总结经验，一边前进，按照一个既定的方向，有步骤地在各个领域里把我们的改革推向前进。

我们的改革方向，是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发展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就是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起来。在座的都是经济学家。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理论分析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它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由小生产状态向社会化大生产过渡。

我们改革的基本方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要使我们的企业或经济单位，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承担者，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可以相当独立地进行自己的经营活动，包括生产和销售。每一个企业或经济单位都要进行经济核算，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也就是有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责任。我们现在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起步的。我所以说它是一个起步，因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领域要改革。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要运用经济杠杆，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来引导企业的发展。一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什么，如何销售，不只是靠国家计划来调节，而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价格、利润、税收等经济因素来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向，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价格不只是一要符合价值，还要考虑供求关系。

我这样讲，不是不要计划。我们讲的计划，主要是对生产起指导作

用，而不是对生产的各个方面通过规定各种繁琐的具体指标来直接干涉企业。我们将来的计划应当是灵活的，而不是硬性的，对企业是一种参考，是建立在预测基础上的，主要是在宏观方面的。当然，我们要完成这么一个改革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两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在改革中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我们在两年的调整中，已取得相当的成效，这个成效同我们的改革是分不开的。你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兴趣，可以在北京和四川找一些企业负责人谈谈，他们会比我讲得更生动一些。我上面讲的这方面的困难是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短处，要靠我们自己解决。

我们另一个困难是资金不足。关于资金问题，我们主要是依靠自己积累，但同时也要积极引进外资。这个总政策是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们将坚持这样做下去。现在国外一些朋友有议论，认为中国资金缺乏，但是很多国家和财团愿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国使用又不多，是不是中国的政策发生变化。我可以肯定地讲，我们这个政策没有变。

我们确实在一二年里使用国外资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对外资如何使用得更合算，效果更好，需要一个摸索过程。大家知道，借钱是要还的，如果使用效果不好，就会影响中国的信誉。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当然，随着我们中国在这方面逐步取得经验，我们运用外资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这里我还想说一个问题，我们搞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缺乏基础设施。所谓基础设施就是指交通、能源、电讯、港口以至城市建设。大家知道，这是搞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前提。

在这方面除了煤炭、石油这样少数几项外，其他基础设施，包括水电建设周期都是比较长的，往往是自己缺乏偿还能力。所以这些项目我们很需要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因为你们的贷款周期比较长，贷款条件比较优惠。我们有了这样的贷款把基础设施这个薄弱环节很快搞好，其他方面就可以利用商业贷款了。所以我们很欢迎世界银行在开发能源、发展交通、建设港口以及教育、电讯等方面提供贷款。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我们对人类贡献还太少。我们希望在本世纪末我们国家的面貌有一个变化，到那时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比现在会大得多。

侯：非常感谢您这样非常全面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设想。你们现在正在从事第二次革命。你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本世纪末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都有很大影响。我的确希望你们正在采取的步骤将解放中国人民的潜力。世界银行不仅是一个借钱机构，也是一个搞建设的机构。我们希望世界银行同中国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借贷关系，而且使这个机构同中国为了解放伟大的力量而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对贵国经济、对你们的项目与计划还很不了解，但我们一定尽快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贵国各个政府部门，例如计委、统计局、建委和各部的充分合作。你谈到中国需要外资，我们希望在适当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要做到这一点要花很多时间。原因之一是我们必须了解你们的计划、你们的项目，这要花时间。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需要很大，世界银行正在找各种办法来满足它的需要。我肯定你们同我一样，希望中国在世界银行里面的地位不至于会影响朋友们及其他国家的地位，尤其是穷国的地位。你提到中国在四川进行一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我们是要到四川去的。我们希望在那儿看到你和你的同事在这方面作出的成就。

赵：现在正是盛夏季节，在小暑和大暑之间。所以我对副行长先生和你的同事不辞劳苦到中国来为促进世界银行和中国合作所做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有关部门会同你们很好配合的。它们会向你们提供你们需要的情况。请你，副行长先生回去以后，向麦克纳马拉先生致意。我们对他为了促进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合作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努力表示欣赏。在你们访问后期，谷牧副总理要同各位会见，他是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同大家会见是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也表示对你们的工作的支持。将来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和谷牧副总理充分交换意见。

是不是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在中国生活愉快！

侯：谢谢。

注 释

1. 麦克纳马拉 (Robert Strange McNamara, 1916-2009)，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时任世界银行行长，曾任美国国防部长。

关于国外贷款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小平同志并报华主席、先念¹、陈云²副主席：

关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提出向我贷款二十亿美元问题，经了解，其利率高达百分之八点七五至九点二五，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买方信贷利率都要高，条件并不优惠。但美国的这种贷款，对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办法，并不是特别对我苛刻。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财经小组研究后，认为对这笔贷款可采取冷而不断的办法，可继续与其谈判，要求美方降低利率、放宽条件，把皮球踢给对方，而不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回绝。目前，美国正在竞选总统，这样做，也可避免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波折。

另外，我正争取从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基金，借用长期低利贷款，这项谈判目前进行得比较顺利，这样处理留有余地，也有利于其他国际信贷的继续进行。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 李先念(1909-1992), 湖北红安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2. 陈云(1905-1995), 上海青浦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 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

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搞活全国农业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把全国的农业搞活，一个是要抓政策，一个是要贯彻因地制宜的生产方针。实行因地制宜的结果，全国多数地方的农业产值会大量增加，但粮食不一定增加很多。因为南方讲因地制宜，发挥本地优势，有些地方粮食种植面积就要减少。

要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考虑东北的商品粮基地建设问题。上一次在国务院汇报会上，我讲了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支援全国把农业搞活，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东北不多搞一些粮食，全国农业很难搞活。

关于粮食问题，为了把全国农业搞活，采取三条方针：第一，确定每年进口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的长期方针。一千万吨就是二百亿斤，一千五百万吨就是三百亿斤。我们进口这些粮食，可以使国内有些地方休养生息，有些地方可以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不要看三百亿斤粮食数量不大，作用可不小。进口三百亿斤粮食，是不是说就改变了我国粮食要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没有改变。十亿人口吃饭就不是三百亿斤粮食的问题，而是几千亿斤的问题。这三百亿斤粮食，只是为了使农业因地制宜、搞活一些的措施，丝毫不改变中国粮食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二，就是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希望能从东北多拿一百亿斤粮食，五年不行，十年嘛！十年以后从东北多拿一百亿斤粮食我看可能。第三，全国粮食征购任务虽然都定死了，固定了，但每年都有丰收地区，在丰收地区议价收

* 这是赵紫阳在黑龙江省考察时的谈话要点。

购几十亿斤到一百亿斤粮食，这也是可能的。这三项加起来就是五百亿斤，全国也就好办了。所以，确定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这是从我们国家整个农业上考虑的，是一项战略措施。就是这么一个来龙去脉。

黑龙江是搞现代化大农业的一块宝地

东北这个地方，首先是黑龙江，确实是我们国家具有建设现代化大农业优越条件的一个地区。建设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现代化大农业，东北，首先是黑龙江这个地方具备这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黑龙江是具有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优越条件的一块宝地。黑龙江人少，土地多，土地肥，有一定的降雨量，交通也比较方便。全国土地肥的地方有，但人口多。人口少，土地多的地方也有，但降雨量少，交通也不方便，如新疆。而黑龙江省这几个条件都具备。

另一个条件，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省、地、县委，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都有很高的积极性，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可以讲是群众的强烈要求，因为这是使群众富裕的必由之路。有些事，从上面看应该搞，但下面没有积极性，这就搞不好。在东北建立商品粮基地，对国家利益大，对群众利益也大，上下都想到一起了。

再一个是有各方面的条件，有了路子。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好的地方，像克山县黎明大队、建设大队，爱珲县罕达气大队，友谊农场五分场，富锦县的开荒点等，虽然不能代表普遍水平，但它代表了一条道路，前进有了路子，有了经验。

再一个是有了措施了。拖拉机呀，贷款呀，肥料呀，都有规划，作了安排。总的看是有条件，有路子，有措施，大有希望。上下各方面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成功。

农业机械化是建立商品粮基地的关键

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这件事，农业机械化是关键。土地多人少是个困难，但是有了机械化，它就可以转化为很高的生产率、商品率。抓住了机械化这个环节，黑龙江农业资源丰富，人少地多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所以爱琿县委书记的话讲得很好：“机械化显神威，农业优势大发挥。”抓住了机械化这个关键，整个东北商品粮基地这盘棋就活了。我们原来在北京也有这个想法，看了以后加深了。全国农业机械化，毫无疑问应当把重点摆到黑龙江，摆在东北，其它地方一时化不了，先化你们。搞农业机械化，要同作物种植区域化结合起来。这样，拖拉机后面的东西就容易配套了。东北搞农业这一套和关内有很多不一样，这里就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机械化前提下，施用化肥，化学除草，改良种子，狠抓这么几条，增加粮食产量。今后不强调粮食的单产多少斤。报纸也不宣传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主要强调总产的增加，总产增加才体现农业生产水平。在产粮区，主要讲每人生产多少粮食，每人占有多少粮食，向国家交多少粮食。这样，你荒地多，就扩大耕地面积；土地少，就努力提高单产。谁搞的粮食多，谁就有本事。机械化问题看来不仅可以扩大耕地面积，还提高单产。从一些地区的情况看，机械化加化肥，加化学除草，可以提高三分之一的产量。

关于水利问题，要依靠各地自力更生来搞。从灌溉的角度来讲，在那些地下水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打井加喷灌是个好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措施。三江平原排水问题要和扩大开荒一起来搞。要在排水确有把握的地方开荒。头几年在不需要排水的地方多开一些。因为这几年正旱，还可以，如果排水不解决，发起洪水来不但现在开荒没把握，过去开的能否保住也没把握。三江平原排水用水要一块一块解决，干渠和支渠配套要同时搞。光把干渠挖通了，没有支渠，有了涝灾照样淹。要搞一块受益一块。哪个地方排水不落实，开荒就不能落实。现在旱，如果将来涝，洪水排不走，沼泽地发起洪水来不走了，那你开荒就没有用了。

扩大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是容纳多余劳力的有效办法

农业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发挥机械化的优势，发挥机械化效率，就要实现全盘机械化。但是一经全盘机械化，就马上出现劳动力紧张变为劳动力充裕。农活全过程都是机械化，整个工序配套，大体上只要原来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就够了。因此，农业机械化后就发生个多余劳动力的出路

问题。省、地、县委要考虑这个问题。劳动力出路究竟怎样解决？急需总结经验来研究这个问题。在这里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我认为在这样一些地区，比较现实容易做到的是扩大家庭副业，扩大自留地。这是目前容纳多余劳动力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越是机械化，适合用机械化搞大农业的地方，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越应该搞。有人提出养奶牛，我赞成这个意见。我看只要大量发展畜牧业，劳力多没活干的问题就可解决。

国营农场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划点地让家属搞。农场职工可以一个人在农场劳动，一个人在家养奶牛，养猪。中国人不是多吗？划给他一块地，让他去就业。自留地开放，市场需要什么就种什么，让他在这里“绣花”。黑龙江为了适应机械化的发展，划了作物带，这很好。农作物区域化就可以更好地发挥机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家庭副业、家庭自留地要扩大一些，搞多种多样的农副小商品，满足市场需要。机械化大生产，不外乎就是稻谷、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以及大面积能种的一些其它东西，不可能搞小商品。用机械化搞大农业，同时扩大自留地，扩大小宗作物的生产，两者可以并行不悖。

随着其它条件的具备，再逐步发展其他一些事情，比如社队工业，以及其它一些事业。但是那些东西需要很多条件，不是那么简单，不可能一下子大发展。东北这样的地方，将来机械化以后，剩余劳动力向哪方面发展，这个事情值得研究。但是可以肯定一条，东北搞社队工业不能像江苏那样，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特点。社队工业搞些产品不那么简单，有产、供、销问题，还有技术问题，弄不好搞起来产品销不出去。我看了肇东县宋站公社的社队企业，那里是搞得很好的。但是像宋站那样的条件，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另外，农村这些东西搞得太多了，将来还有城市就业问题怎么办？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不要因为搞了机械化，就对家庭副业、家庭自留地经济的作用估计不足。

黑龙江具有发展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的优越条件

东北不仅具备搞粮食基地的优越条件，还有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东北发展畜牧业，一方面它有相当大面积的草原可以放牧。今天在报上看

到科学家讨论黑龙江这个地方草原利用问题，讲到人工种饲草，这个意见可以考虑。草原放牧也好，人工种饲草也好，这里是一个优势。除了草原以外，农业区本身也有很好的条件可以发展畜牧业。从长期来说，这个地方在发展机械化搞粮食的同时，要把畜牧业也很好地发展起来。将来这个地方，一个是搞大田机械化，一个是搞畜牧业机械化。

畜牧业一发展，羊毛、奶制品加工，肉食加工问题就提出来了。根据这里的条件，我觉得黑龙江可以发展食品工业。食品工业讲来讲去是粮、肉、油、糖、奶，这五大原料，这里都具备。剩下的就是加工技术了。有了这些东西，各式各样的食品都可以做。黑龙江有这么多粮，这么多草，畜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有了畜牧业，发展食品工业又有了条件。黑龙江搞长期规划，要把食品工业考虑进去。食品工业在世界上是从农牧业分离出来的新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除了发展畜牧业、食品工业外，还要围绕农业搞生产前的服务和生产后的服务。生产前那套服务，就是供应化肥、农药、种子等等；生产后的服务，就是储存、运输、销售。这套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事业，这一部分原则上不应由城市下去占领，应由农村自己搞，通过农工商联合企业自己解决。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联合的基础上可采取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形式，这样逐步发展小城镇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总的来讲是这样一条思路：农工商结合，农林牧结合。

要注意机械化以后出现的新情况

这里大农业一搞机械化，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新事物，从现在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些苗头，有的现在就提出来了，有的不久就会提出，希望能注意摸索一些经验。此如经济结构问题，组织结构问题，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联合体等问题。现在有些说法是初步的，要进一步摸索经验。比如农业发展起来后，就有个仓库储运问题，这在东北比较突出，粮食多了，仓库不够用。仓库储运这一套组织，我的看法，不能搞官办的，要按企业办，而且最好是纳入农工商轨道。除了农工商以外，也可以搞些小的集体所有的。手工业、服务行业不仅要允许集体所有，还要允许个体搞。不如

此，我们方便不了。服务行业，什么修鞋的，洗澡的，完全允许个体搞。服务行业由个体搞特别方便。将来农村小城镇一建设，有的是集体的，有的是工农商联合体的大商店。还能不能有点个体的？也可以，搞活一点嘛！搞仓库也不能都由公家办。

农民有了钱也可以搞仓库出租，谁用谁出钱。如果是国家粮食存在人家仓库也得拿钱。外国仓库就是一个很大的企业。

这次你们不是要求解决农机修理的投资吗？我认为将来农机修理不挣钱不行。我们多年来搞支农工业，一讲支农就要降价。你又让他降价，又让他支援农业。支援农业，为农业服务的这些单位越支农越糟，不能这样搞。今后宁可采取提高农产品价格，也不能降低支农产品价格。要不，谁搞支援农业谁就赔。将来农机修理价格要调整，否则农机服务事业不能发展起来。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转变过来，让支农的有利可赚。我们原来那些想法不行，要为支农事业开辟一条路，让大家多办一些为农业服务的事业。如果你让他赔钱来干，那人家当然不干。

要讲步骤 讲政策

在黑龙江农村，将出现一个新的形势。真正把机械化搞上去，很多新的变化就带来了。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冷静。现在下边情绪很高涨啊！关键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要讲步骤。做到量力而行，不要一哄而起。比如现在有些地方，对买康拜因¹很急迫，将来不要发生到处乱买，买一些破烂家伙，一趴窝就是一两万元。根据多年经济建设的教训，尽管这件事情是好事情，还是要稳步前进，开始慢一点不要紧，底子打好了以后迈的步子就会加快，不要一看那事情好就不量力而行，不讲步骤。

第二是要讲政策。抓机械化在黑龙江有很大的优势，但还必须注意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经济政策，要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因为机械化的优越性掩盖了政策的重要性。好事情如果办不好，也可能是折腾，不要看得很容易。我们这次来考察，总的感觉很好，但不要看得太容易，这种事办成了实在了不起。

国营农场在黑龙江省是个很大的力量。开荒扩大耕地，搞机械化，农场是一支骨干力量。你们这里的农场，中央不上收了，以省为主。但要注意农场的自主权问题。农场是个大企业嘛！有的农场上百万亩土地，要扩大农场自主权。现在财政包干了，变化很大，还要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如农场农工商联合企业怎么搞，产品销售怎样给他们一点余地等，要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省里要把两股劲拧在一起，一是农场，一是人民公社。建设商品粮基地，既要对社队搞一些经济政策，也要对农场搞一些经济政策。

我们这次来考察还改变了一个观点。原来想往这里移民，来了以后看到黑龙江人少也是优势。如果人多了提供的商品粮就少了，那不行。所以第一，你们要控制人口盲目流入；第二，要搞好计划生育。

注 释

1. 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音译自 combine。

用改革的思路 解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一日

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一个问题：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如何再前进一步。你们感觉试点后有些什么问题还影响、限制、束缚企业生产，今后如何解决？

企业竞争起来以后，将来会有这种情况：有些经营得好的企业，产品质量好，成本低，销路广；有些工厂管理不好，产品没销路，就没事干。这就要看各家的本事了。他们没活干，这就出现了要求联合的条件。当然，我们的竞争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大鱼吃小鱼。但是，我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竞争后联合也是形势所迫。有些企业在竞争情况下不能生存。我在国务院会上讲，对这样的企业要“收编”，用好听的话讲叫联合。在竞争情况下会出现联合的可能，如果不竞争，就联合不起来，都是“宁作鸡头不为牛后”。一竞争有些厂子没活干了，发不出工资，就非联合不可了。优胜的企业也不要新建多少厂房，你把那些厂子联合起来，搞专业化协作，厂房就有了，所以竞争能造成非联合不可的形势。在这个形势下，就有个因势利导问题。重庆铝加工厂是个大厂，四川省委给它外贸自主权，它的产品在远东畅销，香港一家铝加工厂被他挤垮了，宁愿作他的代理商。

实行市场调节后，为什么很多机械加工企业还可以吃饱，一些长线产

* 这是赵紫阳在沈阳市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座谈会上的谈话。参加会议的有沈阳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电缆厂、沈阳第八木制品加工厂、沈阳冶炼厂、沈阳卷烟厂、东北制药总厂的负责人。辽宁省委任仲夷、陈璞如、郭峰等参加了座谈。

品还有销路，这里有个假象。物资部门压了很多机械工业产品，没有进入市场。企业的产品可以降价出售，物资部门不能降价，积压的机械产品就卖不出去，压在仓库里。现在确定了一条，物资部门可以参加竞争。我估计，物资部门一出动，不少机械企业存在不下去，产品销不掉。该垮台的垮台，该淘汰的淘汰，这可以造成一种形势，叫企业感到照老样子搞不行了。现在是不管工厂办得怎么样，都心安理得，这怎么行！

我们的机械产品非打入国际市场不可。你们沈阳可以组织一个机械产品进出口服务公司。这个公司和各厂子不是上下级关系，是一种业务往来，它可以去外国考察，可以接待外商，向工厂介绍情况，介绍工厂和外商见面，收点手续费，还可以为一些小厂搞代购代销（小厂都直接对外也不可能）。这个服务机构的业务如果搞得好的，可以扩大到大连，甚至扩大到省外。服务公司的任务主要是服务、协调、协商以及代购代销。我们国家最缺的是服务性机构。成都有七八个待业青年搞的服务性公司，专门帮助工厂企业沟通关系，现在业务已发展到九个省市。这说明我们社会需要这类服务机构。

沈阳出现了新技术推广公司。搞这种服务性机构是需要的，要鼓励它，保护它。现在的问题是，争权要利的多，搞服务的少。解决这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一件大事。

省不要限制大市的权力。许多属于省的权力，都可以委托大市办。要给大市以方便，这样就省事多了。我在四川讲过多次，中央交给省的权力，要尽量放到大市。

要加速设备更新，首先更新那些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和节约能源的。比较关键的设备，更新要以节约能源和提高产品质量为重点。属于一般增加产量的，只能逐年搞。关键设备的更新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边贷边还，边还边贷。将来对企业采取征收所得税办法，不要上缴利润。现在企业自主权不配套。扩大自主权，光是对企业有好处，搞得不好的没有坏处，这也不行。现在一是权不全，一是责不清。将来所得税一征，责任、压力就大了。比如我收你百分之六、七十所得税，然后其他房子、工资、奖金等等，国家都不管了，国家只规定个原则，剩下其它事都靠厂里自己去办。这样就搞活了，企业的责任也加重了。

老工人退休，子女顶替。这个得改！老工人退休，子女可以顶替，但是不能只在那个工厂顶，可以在全市范围招工，考试择优录取。现在这样搞，整个工人队伍越搞越差，不考虑个人兴趣、才能，“划地为牢”，根本不可能因材施教。有些医院、学校里搞顶替，问题更严重。子女顶替，包干就业，这两个东西把工人阶级技术水平越搞越低。哪个单位知识青年就在哪个单位就业，老子干什么，儿子就干什么，这种搞法不行。当然，一下子还改不过来，但要逐步改。

将来工厂要有提资权、辞退权。对不好好劳动的工人要有辞退权。我建议不用开除这个词，需要给工厂一个辞退工人的权力。如果真正给他这个权力，他不可能辞退多少。辞退一个就会影响一片。但是没有这个权不行，有的人胡搅蛮缠，谁也管不了。

机械产品价格可以上下浮动，但是消费品价格要稳定。钢材价格总是向下浮动，有些小钢材也可以向上浮动。机电产品，有些质量很好、有销路的，价格可以向上浮动，大量的还是向下浮动。只有允许浮动，才能把劳动力和资金吸引到短线产品上来。为什么长线长、短线短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呢？就是因为价格问题。不承认价值规律是不行的。

厂子都要作这个精神准备，将来国家对企业一般不投资，而是实行由银行贷款的办法。老厂改造、新厂建设、设备更新，都要靠贷款。要实行这样一条：使用贷款以后增加的利润，首先用来还贷款，然后再上交。

要搞技术革新。进行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项内容。资金来源是自主权加贷款。将来准备采取这么一条政策，一个工厂折旧率是不是提高，要看它节能的情况。节能措施多的，设备折旧率就给它增加。新企业折旧率高，钱没地方用，老企业可以吸收它投资，发股票，搞联合，投资分利润。将来股票、证券业务也会逐步开展起来。你们可以先搞所得税试点，测算一下，按去年和今年这两年上交利润的平均数搞所得税。你们找财政部门参加算一下。不要害怕用贷款。哪个企业怕贷款，说明他没有信心。每个企业都应该在银行那里有很高的信用。将来银行也要进行改革，银行也要有自主权，钱贷给谁，由银行决定，各级行政部门不要干涉。日本银行贷款的时候严格得很，调查得很细，真正确定贷给你款以后，他就千方百计地帮助你，因为利益一致。

京津沪都没有包干，唯独对辽宁搞包干，这已是照顾了。不管怎么样，只要包下来，就比不包好，苦一年两年，过了一两年大有希望。

所得税可以搞试点，你们能不能按原来水平包下来。上缴利润不得减少，否则财政部门就不同意了。你们厂子可以和计委、财政部门研究一下，搞一个改造方案。我们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工厂有潜力，这个潜力被现在的某些制度束缚住了，所以要改革这个制度。如果你不是挖潜力，而是向财政部要钱，那就说明是制度上有问题。企业不能指望把本来交给财政部的白花花的钱，挖一块出来，那行不通。出发点是要承认工厂有巨大潜力，现行制度妨碍它，所以要改革。

城市住房要实行统建，建成以后出卖，房子商品化，企业和个人都可以买。房子可以分几等，有远郊的、近郊的、市内的，价格有差别。企业买一栋也可以，买多少套也可以。这样企业就不用自己去征地皮、买材料了。我在成都作过调查，企业自己盖房子，造价是三百元一平方米，买统建房子只合二百元一平方米，如果包括服务行业的面积，一平方米二百五十元就够了。这样搞，对执行城市建设规划也有好处。凡是形式主义东西都不要搞了。

关于工厂组织直接对外公司问题。公司有些可以搞松散的，业务也不一定一开始就搞很多，可以先从服务开始，从某些专业开始，或从外贸业务开始，先联合起来。不要一搞公司就人、财、物，产、供、销几大项都统起来，要有个发展过程，顺乎自然。九个市化工系统搞了一个销售、情报中心，中心设在武汉，有没有你们？这种形式很好。外国这种东西多了，机构很小，有的只有一两个房间，有个电话，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一搞公司就收厂子，这种做法要改变。联合必须是互利的。联合的内容，要由少到多，可以先从某一个专业开始，先易后难，由低级到高级。

对企业的社会负担要作一点调查，算一算社会负担占它的成本多少，将来干脆征一道税就算了，把税收交给当地，社会负担也交给当地。不能只交负担不交钱，也不能只交钱不交负担。解决企业社会负担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企业现有的服务部门联合起来，成立服务公司，专业化、社会化，经营独立，和市有关部门挂钩，原来企业拿的股金还是属于企业的，有利润可以分成。第二个办法是，调查一下，现在企业社会负担占它成本

多少，将来干脆变为一道税。这个税就交当地政府，服务工作由政府管理起来。市政府每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收地方税多少，怎么用的，公布出来。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就有内容了，大家也就关心了。现在光讲工厂社会负担大，着急也不能解决问题。负担总有来龙去脉嘛。在目前情况下，工厂如果不办子弟学校，都甩给社会也不行，地方政府也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过渡，办法只能是逐步地把企业负担转向社会。

国家经委的同志从西德考察回来介绍，西德有一个制度，中学毕业以后进工厂做学工，还不算就业，一个月只领很低的生活费，由企业出钱送到市里职业学校学习，两三年后，学习成绩合格才能正式就业。我们也想搞过渡，至少可以缓和就业的矛盾。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搞一两年，考试合格再作正式职工。北京就要这样作，沈阳也可以试点。这将减少企业负担，同时对提高工人技术水平有很大意义。进工厂，先发一定生活费，边工作边学习，这比分到工厂包干就业好多了。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干，搞得松松垮垮。宁可一半人紧张张张地工作，一半人紧张张张地学习。外国人说，你们人多可以，我们人少不能这样办。我们说，人多也不应当这样，再这样下去，就把工人队伍的纪律搞坏了，把技术水平降低了。

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所得税以后，工资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固定工资，一部分叫活工资。活工资部分可以变，个人劳动得好，企业经营得好，就多得，搞得不好就少得，今年好就多得，明年不好就少得，“水涨船高，水落船低”。这样就活了，厂和厂之间就有差别了。将来还要允许工人有小的流动，经营得不好的厂要垮台就是了，东西卖不出去，银行不贷款，工人不在那里干了。老实讲，以后要当好经理不容易。外国的经理比我们的经理紧张得多。这样一搞，企业的领导人不光是对上级负责，还要对职工负责。你搞不好，群众也不让你当领导。要是上级把他拿下来，他会说，我没有腐化，没有贪污，为什么降我的职？改革以后，你搞不好，群众就不拥护你，你这个厂长就要下台。这样，工人势必要选一些能干的人上来。

体制改革说起来很难，千头万绪，但是只要把主要的东西抓住，我看并不难。主要抓两条，一条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搞联合。还有一条是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包括对物价体系进行改革等。企业自主权是根本的，起步的，是基础。自主权问题，有人有点看法，说企业自

主权不应从分配开始。但是，不从分配开始，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从分配开始，能够暴露很多矛盾，促使你去解决。改革不与工人利益相联系，他不关心。改革既然开始，就必须改下去，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解决出现的问题。

沈阳搞木材综合利用，和江苏一些地方搞内部补偿贸易，这是一个好办法。联合的根本道路是给企业自主权。只要企业有了自主权，当地封锁不住。当然，要经过曲折，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最近国务院讨论了一次。自主权问题从分配开始，现在看分配问题本身也需要进一步改善。最根本的办法是搞所得税，国务院想明年搞试点，后年全面铺开。明年企业自主权试点要全面铺开。在分配问题上，明年大面积恐怕还是按今年办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企业分配开始，但决不能停止在分配上。企业自主权要扩大，我们用了“扩大”这个词，就是说企业原来的自主权太小了，要承认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经营的权利和地位。仅仅讲分配不够。明年在计划、产品销售、劳动、外贸等方面，都要前进一步，给企业以更大的权力。现在全国的情况不平衡。我在北京派一些同志到工厂看看，发现扩大自主权后，利润留成的钱虽然是企业的，但是它不能用，因为不论干什么还是都要上边批准。权力不能实现，有了权不能用，算什么自主权？等于没有嘛！现在要向生产领域、分配领域、流通领域进一步扩权，计划权也要解决。国家对企业计划不能管得那么具体，尽量少搞指令性的东西。

随着自主权扩大，工人当家作主的问题必须解决。从根本上讲，企业自主权不应理解为把这个权交给厂长，应该交给厂里的工人。因此，民主管理，工人当家作主问题要很好研究。职工代表大会要不要设常设机关，哪些事情必须经过厂长，哪些事情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都要研究。现在看，全民所有制企业那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使工人感觉不到他的主人翁地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反而感到工厂是他们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感到是受雇佣，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工人积极性。企业自主权一扩大，就要体现工人当家作主，也就是马恩说过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能参与剩余产品的分配。现在我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无法参与对剩余产品分配方面的决定。问题的实质是承认不承认工人的

主人翁地位，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多年，有些工厂搞得死气沉沉，不是生龙活虎，不是朝气蓬勃，这与高度集权，统得过死有关。毛主席关于民主管理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工厂没有一点自主权，因此实际上没有落实。工厂怎么建设，钱怎么分配，工人没有这个权。这恐怕是长期以来压抑工人积极性、影响工人关心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要看到，扩大企业自主权，从本质上讲，就是扩大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有权参与剩余产品的分配，包括工人对干部的监督。关于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南斯拉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创见。当然，他们采取的一些具体形式，我们不一定用。任仲夷¹同志讲的一个想法很好，企业要从部门、地区的管辖下解放出来，使它能够相当独立地经营。

所以，企业自主权试点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除分配权要继续扩大外，相应的其它权力也要前进一步。扩权以后，还要在独立经营和互利的基础上搞联合。第二，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必须认真解决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当家作主问题。企业自主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开始、一个基础。有些地方仅仅把它看成是利润留成问题，这就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意义理解得太浅太窄了。当然，存在利润留成问题，但绝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它是整个体制改革的起步，这着一活，全局就活，这着不活，全局就受影响。各级领导和经济管理部门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搞好服务、统筹、协调和监督工作。

注 释

1. 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曾任中共北平西北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七至八月十一日，我和国家农委李瑞山¹同志到黑龙江、吉林了解建设商品粮基地的情况，回程途中顺道在辽宁住了两天。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

这次我们在东北，行程三千多公里，沿途农作物长势普遍较好，小麦已获丰收，如无早霜等特大灾害，玉米、大豆、甜菜等作物也可望增产。我们所到之处，从黑河之滨到三江平原，从长春地区到长白山麓，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情绪很高。怎样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争取早富快富，逐渐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而且越到基层，信心越足，干劲越大。

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人少地多，土地肥沃，年降雨量五六百毫米，交通也较方便，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一块宝地。从关内到这里有进入了一个新天地的感觉。中央关于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的战略部署，调动了东北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反映：过去是在富地方过穷日子，现在上上下下想到一起了，有奔头了。国务院规划的到一九八五年从黑、吉两省调出七十亿斤商品粮豆的任务正在各地落实。从了解的情况

^{*} 这是赵紫阳率国家农委的人员到东北调研建设商品粮基地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看，我们总的印象是：有资源，有路子，有措施，有群众基础，而且各地一般都留有余地，实现这个规划是大有希望的。如吉林省规划到一九八五年上调商品粮二十亿斤，而四平地委说，他们一个地区就可以包下这个任务。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去年交售商品粮二十八亿斤，八五年计划可上交五十亿斤，等于全省当时的上调任务。

在和干部、群众的座谈中，大家都认为东北农业的潜力是很大的。黑、吉两省面积六十四万平方公里，比法国还要大一些（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耕地和法国差不多。两省人口五千四百万，耕地二亿多亩，人平五亩多，一九七九年粮食总产四百七十二亿斤，人平占有粮食八百七十四斤，商品率很低，除本省消费外，去年调出的粮食才十一亿斤。而法国也是五千三百万人口，耕地二亿九千万亩，人平六亩，一九七九年谷物总产八百七十四亿斤，人平一千七百零八斤，比黑、吉两省高一倍，出口的谷物每年在二百五十亿斤至二百九十五亿斤之间。除气温条件法国好一些外，其它自然条件也差不多。法国把农业搞上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在黑、吉两省也有条件去搞。这些都说明差距很大，而潜力也很大，要实现每年调出粮食七十亿斤至一百亿斤的目标，是有现实可能性的。这几年，在东北涌现出了一大批收入高、贡献大的县、社、队。吉林榆树去年一个县就交售八亿斤粮食，计划今年突破十亿斤大关。黑龙江爱珲县的罕达气大队，二百零二人，去年实现机械化，播种粮食一万五千亩，总产三百三十六万斤，人平占有粮食一万一千二百斤，交售给国家人平八千二百二十五斤，人平分配七百二十二元，每个劳力分配二千四百八十元。社员高兴地说：“我们的收入相当于十三级干部！”榆树县富家大队人平土地四亩多，去年生产粮食八百八十万斤，人平占有粮食三千二百斤，交售二千二百斤，每个劳动日值三元。他们虽不能代表普遍的水平，但却积累了经验，指出了致富的路子。应当看到，实现国务院提出的任务还存在不少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措施落实，一面依靠社队的力量，一面依靠国营农场，就一定能够实现规划。东北之行后，我们对此感到更踏实、更有信心了。

二

根据这次调查了解，在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工作中，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机械化是关键。在东北这块人少地多的地方，农业机械化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机械化一上去，粮食生产就可以大幅度增加，就会很快形成很高的生产率、商品率。正如爱珲县群众所说：“机械化显神威，农业优势大发挥。”著名的友谊农场五分场二队，引进了美国一套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农业机械，每个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九七八年二十一万斤，一九七九年四十三万斤，今年预计可达五十万斤左右。据他们说，如果全部采用国产的机械配套，每个农业工人每年也可以生产二十万斤。在黑龙江，我们看到一些后进社队靠机械化迅速翻了身。克山县建设大队人平七亩地，在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十二年间，粮食亩产在一二百斤徘徊，社员分配长期人平六十元。去年县委帮助这个公社实行机械化，集中投入，一次配套，当年化，当年富，当年贷款当年还。这一年共收粮食三百九十七万斤，卖给国家二百四十七万斤，人平分配二百四十元，归还贷款二十八万元（包括旧欠四万元）。机械化不仅在开垦荒地上，而且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上作用也很显著。据调查，机械化加上化肥，加化学除草，大约可以增加产量三分之一。当地农民总结的增产经验是：“拖拉机加化肥，优良品种加大粪堆（农家肥）”。“要想富得快，开荒种小麦”（有了康拜因，开荒种小麦生产率很高），等等。黑龙江等地，具有搞现代化大农业的有利条件，在这里抓紧实现机械化就全盘皆活。实现机械化，每亩投资约三十至五十元，如果用低息或无息贷款，三年至五年可以还清。在这些地方机械化进度是可以加快的。国产的农业机械，只要进一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进行配套，农民也是欢迎的。

与耕作机械化相联系，要求解决作物种植区域化的问题。黑、吉两省都因地制宜地划分了大的作物种植地带，改变“小而全”样样都种的状况，作物成片集中种植。一些地方，看来已具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雏型。这一趋势目前正在发展。

二、积极抓好农、林、牧全面发展。机械化为充分利用东北的农、林、

牧业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了可能。农业一经机械化，不仅使农业由简单的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大生产发展，而且使过去的粮食单一经营向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发展，使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这是机械化后出现的新形势。在东北建设商品粮基地时，切不可忽视和放松了林、牧业生产。

在东北发展畜牧业有很大的优势。过去我们考虑畜牧业问题往往只想到边疆草原的潜力，以后认识到内地农区发展畜牧业也同样大有可为。现在看，东北不仅有上亿亩的草场，而且耕地多、粮食多、副产物多，饲料充足，农业机械化后，有一半以上的劳力解放出来，加上这里交通便利，工业有基础，的确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有希望的牧业基地。从东北的实际出发，除了有计划地养猪外，要大力发展牛羊。当地农民说：“机械化，马换牛，牛吃草，人吃牛。”这是很有道理的。大养奶牛，一举数得，应普遍提倡。现已有一些好的苗头。爱辉县四嘉子公社初步实现机械化后，腾出部分劳力喂养了三百五十八头奶牛，每年出售鲜奶五十万斤，活跃了市场，增加了收入。农牧业的发展，必然带动食品工业的发展。粮、肉、油、奶、糖，这五种原料都有了，就可以造出多种多样的食品来。将来不仅应把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的粮食调入关内，而且可以调出食品供应京、津、沈等大城市。这是有广阔前途的。

东北有几亿亩宜林地带，发展林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黑龙江、吉林的许多社队，机械化后抽出一部分劳力，组成林业专业队植树造林，改造次生林，三五年就见成效。我们到过的吉林德惠县布海公社，从一九七三年开始育苗，按新农村的规划，以九十九垧地为一方，全公社造成二百二十七个网眼的防护林带，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以后又以两年时间在村前村后、屋前屋后种植，每人植树达到四百株。现在已经一片葱绿，每年间伐木材一千立方米，还为社员盖房八百多间。黑龙江的爱辉、克山等地有不少社队每人植树达到五亩至十亩。应当下定决心，经过五年到十年的努力，利用机械化后的有利条件，把东北的林、牧业发展起来，做到林茂粮丰，牲畜兴旺。

三、适应机械化的新形势，搞好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在东北，我们看到，农业机械化的结果，农村的劳力结构、经济结构开始发

生深刻的变化。过去的生产队、大队是“小而全”，样样都搞。机械化后的必然趋势，是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克山县黎明大队实行机械化以后，根据生产的需要，按专业组织生产。全大队劳力有五百多人，分别组织了机耕、工副业、畜牧、多种经营、建筑、后勤、文教卫生等七个专业队。搞农业的，仅有机耕队四十人，积肥队六十人，就担负了全大队的耕作任务。其它很多生产活动，都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专业化、社会化了。在榆树、德惠等县，一些机械化属中等水平的社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首先是大队的农机站统一使用农业机械，实现专业化。他们超越生产队的范围，把全大队土地的机耕任务承担了；原来的生产划分成了专搞积肥、田间管理、畜牧、工副业等的专业小组。总之，机械化以后，原来许多事业从农业中分离出去，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大减少，而从事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性事业，以及生活服务性行业日益增加。这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标志着向现代大农业方向迈进。

与专业化、社会化相辅相成的是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机械化以后，许多事业超出生产队、大队的范围，需要经济上联合，需要农工商的综合经营。队的内部的专业分工，和队的外部专业联合应当结合起来。吉林省今年在榆树、怀德、农安三个商品粮基地县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他们的做法是：以县为单位，以一两个骨干企业为依托，按专业把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联合起来，如粮、油、糖、畜产品的加工，建材、建筑业，运输等，梳成几条辫子，在生产、销售上实行各种形式的联合，效果较好。这种在全县范围内按专业自上而下先搭个架子，再逐步发展的办法，步子可能迈得更快一些。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下一步县与县之间，再逐步扩大联合。中国农村的劳力很多，机械化后多余劳力的出路是个很大问题。我们认为，这需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从农业分离出来的走上专业化、社会化的许多事业，原则上应当由农村自己来搞，走农工商结合的道路，城市着重从技术、装备等方面给予支援，不宜与农民争饭碗。

在专业化、社会化和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黑龙江省提出建设小城镇问题，这很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为生产、为生活服务的事业日益增多，农村新的居民点和住宅建

设不断发展，将会逐渐出现一些小城镇，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我们要十分重视吸收农村社队的力量参加小城镇的建设和旧城镇的改造。这对活跃农村经济，进而逐步缩小城乡差别，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适当扩大自留地、家庭副业，搞好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机械化后多余的劳力如何安排是个很大的问题。除了广开门路，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外，看来把自留地扩大，把家庭副业扩大，是容纳多余劳动力的很现实、很有效的办法。让一部分劳力在自留地上精耕细作“绣花”，按照市场供需情况，生产一些小宗产品，对活跃农村经济有利，而且也是就业的一条出路。有的县、社干部认为，机械化以后，收入多了，自留地经济无足轻重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用机械化搞大农业，同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多种多样的农副小商品，二者应当并行不悖。越是搞机械化的地方，越要注意发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经济的作用。榆树县义山三队，集体生产搞得不错，去年人平均分配二百三十元。他们重视家庭副业、自留地的收入人平一百五十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不应当苛刻对待，应该把它看成是潜力所在，看成是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黑龙江省有的地方规定，队里的拖拉机可以为自留地耕种，肥料分配上给予安排等。东欧许多国家自留地经济占了很大比重，匈牙利等国还设有“自留地经济委员会”。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把自留地、家庭副业搞好。

机械化以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应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不要因为机械化的优越性掩盖了政策的重要性。东北，不能硬搬关内那套作法，要从实际出发，破除“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什么样的责任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就应当采用。在机械化的地区，看来大队、生产队内部的分工协作，建立各种形式的专业队、组是很主要的形式。克山县黎明大队，实行“专、定、包、奖”的制度，有的包工到组，有的包工到人，有的联系产量计酬，有的实行计件。队里的一些家禽，还包到户饲养。榆树县富家大队实行“以垧定工，以垧计分，包工到户，责任到人，管理到棵，有奖有罚”的办法，对搞好大田田间管理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在队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还开始出现了跨队的专业联合。这些办法，要进一步研究，总结推广。

五、在生产措施上，要切实解决防寒以及防旱、防涝的问题。早霜冷冻，是东北农业的最大威胁。机械化、科学种田都要围绕这个问题采取一系列趋利避害的措施。如选育早中熟高产品种，提早育苗、播种，改进栽培技术，适时收割，等等，这方面各地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要总结提高，使这些经验配套，发挥它在抗灾中的作用。

防旱问题，除了量力而行兴修水利以外，应研究保墒抗旱的办法。黑、吉两省，一年种一季作物，年降雨量有五六百厘米，且集中在六、七、八几个月，冬春冰冻，蒸发量很小，这与南方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通过保墒，使土壤涵蓄一定的水分，解决一季作物保收的问题，是可以做到的。灌溉的方式，发展喷灌很有效，有些地方地下水源比较丰富，可以采取打井喷灌配套，经济划算，效果也好。在三江平原等沼泽地开荒，还必须注意防涝问题，对河流综合治理，保持生态平衡。在这里，扩大开荒要同排水防涝统一考虑。头几年，可在不需要修水利的地方多开一些。需要排水的地方开荒，一定要采取措施治理，不要因近几年天旱而存在侥幸心理。否则，洪涝一来，新开荒地受害，过去开的也保不住，而且一年涝，往往影响三年。防涝排水，要一块一块地解决，干渠和支渠同时配套，搞一片受益一片。

六、在工作部署上，要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当前东北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开拓荒地，买拖拉机、康拜因表现出很高的热情，纷纷表示要提前实现建设商品粮基地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存在的困难，注意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见机器就买，不讲核算，不计效果。开始时宁可稳一点，慢一点，把工作做扎实，把底子打好，以后的步子就会迈得更大更快。在指导思想要进一步明确择优的原则，讲求经济效果。开荒，搞机械化，首先要从那些效益最大、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开始，这样容易取得成功，收到实效，振奋人心。不要把投资、机械设备先陷在潜力小、效益差的地方，啃“硬骨头”，以致投资多年收不回来。从东北的实践看，一种是基础比较好的队，帮他一把，他就会较快地先化先富；另一种是一部分潜力很大的穷队，黑龙江采取投资重点使用，机械集中投放，一次配套的办法，一下就翻过来了，贷款也很快偿还了。这样做，资金周转快，搞一批后再搞一批，化一片后再化一片，速度也加快了。

三

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是一项战略措施，对搞活全国的农业有重大的作用。这项工作涉及面比较广，必须切实加强领导，认真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才不致使规划落空。为此，我们建议：近几年内，国务院每年应专门讨论一次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的工作。国家农委每年应去一二次，进行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有关措施的落实，并经常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农机、农业、水利、粮食、农垦等部，要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农机部应把东北作为农业机械化的重点，集中力量，务必抓出成效。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积极支持这一工作的开展。

关于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的报告已作了规定。这次去东北，三省还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和他们研究，议论了一些解决的意见。

一、调出粮食的亏损补贴问题。黑龙江提出，由于粮食购销价格倒挂，每多收购一亿斤粮食用于省内消费，省里要多赔六百万元，上调给国家一亿斤，要多亏两百万元。吉林也反映，国家核定该省财政包干基数中，粮油亏损指标为二亿一千八百万元，粮油差价补贴为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一定五年不变。今后每年收购递增五亿斤，每年约增加亏损四千万元，形成收购增加，上交增多，亏损越大。我们的意见，不应当让调出粮食的省（区）吃亏，调出的粮食亏损，应由中央财政或调入粮食的省（区）负责。

二、建立农机修理站问题。黑龙江反映，全省一千零七十五个公社中，还有四百多个公社没有农机修理站，不能适应机械化发展的需要。鉴于农机站等单位往往是赔本的，因此，要求国家给一部分投资补贴，帮助公社建站。我们的意见，根据生产的需要，增加一些修理点是可以的，但不一定每个公社一个站，有的可以联合几个公社建站。

在有国营农场的地方，修理站不必另搞一套。对支农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改变旧的观念。过去，一讲支农就不能讲利润，一再降价，为农业服务的单位越搞越穷。支农吃亏，支农亏损，这个政策值得研究。主观上是想支农，实际上是限制了支农事业的发展，老是亏本，谁愿意干？长期以来，一方面我们把农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一方面又叫有关部门去亏本“支援”，结果把积极性都搞掉了。解决农产品价格过低的问题，宁可

逐步提高价格，也不要从支农事业上打主意。农机修理站也不能老是赔钱，要搞企业化，使它有一点利润。要提倡联办，国家也可以投资一部分，予以支持。

三、仓库问题。黑、吉两省反映目前仓库严重不足，一些粮食主产区更为突出。吉林省仓库容量仅五十亿斤，去冬今春有四十亿斤粮食露天保管。两省要求国家列入计划，投资兴建仓库。我们的意见，仓库储运事业，不能完全由国家包下来建设，应当提倡联合的办法，集资兴建。仓库、冷冻、储存，是为农牧业服务的一种产业，应当企业化。修建起仓库，要实行收费办法，谁用谁出钱。

四、糖料加工问题。黑、吉等省，甜菜有大发展的趋势，现在加工能力不足。黑龙江今年甜菜扩大到四百万亩，预计可收二十八万吨，比去年增加一倍多。“六五”期间，计划续建、新建糖厂八座，新增能力二十三万吨，每年约需投资一点四亿元，国家只落实五千万元，差额很大。我们的意见，糖厂建设一定要有原料，不要搞无米之炊。投资不足部分，可以向银行贷款，或通过联办解决。

五、肥料、农机供应等问题，三省希望按国务院批转农委的纪要落实。另外，要求给省里一点自主权，除了上交国家任务以外的超产的大豆，允许地方出口一点，换一点磷酸二氨复合肥和必要的农业机械。这个意见，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两省还提出，国家已确定大豆由二角三分调为三角一斤，建议明年一月一日起实行，请有关部门考虑。

注 释

1. 李瑞山(1920-1997)，陕西延长人。曾任湖南宁乡县委书记，常德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国家农委副主任、顾问。

关于节约能源和科研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过去总认为，能源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工业总的增长速度，这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一个带方向性的苗头，去年能源增长百分之三点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点五，今年预计能源增长百分之一一点五左右，而工业总产值可以增长百分之七以上。这个变化很值得研究。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说明能源增长速度高于工业增长速度，不一定是个必然的规律。问题是要加快进行技术改造和改变产品结构，转向集约经营。这涉及到今后的能源方针。开发能源，投资大、周期长，还要相应地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我们能否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主要靠节约能源来保持工业的一定的发展速度。如果这条路能走通，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大有希望。节约能源，这两年做了一些工作，但主要还是挖管理方面的潜力，而更大的潜力在于技术改造。是把投资用于新建煤矿等增加能源，还是用于技术改造节约能源，哪个更合算？这要好好算算账。看来搞技术改造节约能源更合算。我们要以节约能源为中心，进行技术改造和工业结构改革，这方面潜力大得很。我们的设备技术落后，工业结构整个说来是消耗能源较大的结构，而不是节能的结构。在世界上日本节能最好。它一年消耗的能源，折合标准煤六亿吨，同我国差不多，而生产总值相当我们四倍。日本用于能源技术改造的投资，比欧美大两倍多。在资本主义世界能源危机的情况下，它还

* 这是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四川代表团会上的发言。

提出八十年代工业增长要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把宝押在节能上。为了节能，它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我们国家，节约能源的问题还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一方面感到能源紧张，另一方面浪费很严重，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能源问题，中央要统一考虑，地方安排计划时，也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算工业发展的账，不算能源平衡的账。

科研、设计等部门如何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很好研究。现在不少科研、设计等事业单位“衙门化”，它的编制、设备、任务都取决于上级，本身没有承担任务的积极性。可不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它向企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除了长远、基础研究仍由国家定项目、出经费外，对搞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和设计的单位，采取国家计划与合同制结合的办法，国家只给一定的补贴，也可以下达任务，但更多地是靠使用单位同它们签订合同、提供经费，使之转上为使用单位服务的轨道。服务得好，业务就兴旺，可以跨地区、跨行业地发展；搞得不好，就会被淘汰，科技人员会流动到别的单位去。这样，就可能改变现在一些科研、设计单位机构重复、架子大、效率低、经费平均分配、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况，使科技事业更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

我们搞经济建设有不少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我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体制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旧的体制却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为什么有的人在国内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一出去好像就很吃香，变聪明了，这值得我们深思；二是基础结构太差，能源、交通、港口等等，当然还有教育、科技。我们把体制改革搞好，把基础结构搞好了，就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把巨大的潜力发挥出来。

今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日

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年的经济形势。

总的说是好的。今年年初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一九八〇年的计划，现在看可以实现。这里我主要说几个大的轮廓。

第一，财政收支。现在看来，可以做到基本平衡。去年开人大，财政部的报告讲，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后来在人大常委会就改口，叫基本平衡。现在看，基本平衡可以做到。到八月底，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同期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比去年多六十七亿元。估计到今年底，赤字不会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前年我们的赤字是一百七十亿元，去年是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可以做到赤字不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就是基本平衡。

第二，农业。今年的情况看来是一个全面增长的形势。粮食，预计夏收报上公布是增产六十亿斤，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些。早稻是增产二十亿斤。也就是说，早稻加夏收增加了八十亿斤。秋季是一部分地方受灾，大部分地方长得比较好。当然，还要看东北早霜怎么样。全年预计可以增加二百亿斤左右。当然，估计不同，有的说可以增加更多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绝大多数地方都比较好。棉花大概会到六千万担（去年五千四百万担）。去年的五千四百万担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油料，大家都知道，油菜籽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成）。花生也是大增产。糖料，预计今年可以达到七千七百万担，就是可以增长百分之十三，这就可以增加三十多万吨糖。生猪，情况是好的。多数地方还是猪多，不好卖。

* 这是赵紫阳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

这里特别说，烟叶的情况很好，预计可以收到一千九百万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由于今年烟叶的丰收，加上现在采取的烟酒专卖措施，估计明年烟的供应会有较大的改变。这是讲主要几项。农业的产值，我估计可以达到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第三，工业。预计今年增长可以达到百分之三。轻工业，可能达到增长百分之十一（一到八月数字是十二）。重工业，一到八月下降百分之八；从二季度以来，情况逐渐好一些，估计全年要下降百分之五。现在我们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大体上也是一半一半，轻工业的增长补了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以后，预计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工业，截止到八月，总的增长百分之一。但是第四季度现在看来是个翘尾巴的形势。因为我们第一季度是负数，从六月以来逐渐回升，八月份的情况比七月份好，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二点五。

第四，市场、物价。一月到七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是一千三百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八点六，预计全年可以增加百分之九。这就等于实现的购买力。商业库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六。这个情况是好的。油料增加，混纺布（化纤）增加，自行车增加，手表增加，这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外贸进出口总的也是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全年计划可以完成。由于今年实行了冻结物价，加上农副产品和消费品增加，物价形势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上半年社会物价总的水平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七。这主要是指国营商业卖的东西，不包括集市贸易（城乡集市贸易上升百分之三点二）。

第五，上半年净回笼货币没有完成计划。原来计划回笼五十亿元，实际只回笼四十亿元。虽然没有完成计划，也是建国以来回笼最多的一年，截止到八月底，大概净回笼二十三亿元左右，预计全年增加投放六十亿到七十亿元。货币问题，一方面是票子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情况。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有个分析，银行、财政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新的因素，特别是农村，手头存放的票子多了。今年一月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最多的时候达到四百亿元。一个是手头存的增多，一个是现在市场渠道扩大，比如农贸市场这个范围就比过去扩大了，商业的渠道也比过去大了。还有一个，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经营单位划小，都要直接用货币支付（过去很

多不用货币支付), 这方面都需要增加些通货。究竟这些因素要增加多少发行量, 还要研究。现在还说不清楚, 看法也不一致。人民银行讲, 大概是五十亿元左右。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总的形势好,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 还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 一个, 就是蔬菜问题, 今年以来, 多数城市都不好, 城市人民反映强烈。原因我就不多讲了。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很好研究。看来, 除了其他原因之外, 城市近郊兴趣不放在蔬菜上, 可能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主要的兴趣是搞工业、搞副业。因此, 蔬菜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多。最典型的例子, 像北京四季青这个地方, 那么好的菜地, 他在那里搞了个很大的厂房。还不是个别的,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 煤炭情况不好。最近刚刚开了会, 报上发了消息, 万里同志抓了一下, 秋里同志一直在抓。煤炭如果九月以后没有大的转变, 冬季取暖用煤都会紧张。再一个, 就是华北的水荒, 特别是天津和北京。首先是天津, 很有可能到明年以后, 天津相当一部分工厂要停工。现在官厅水库的水只有四千万方, 密云水库的水只有八千万方。

总的来讲, 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稳步前进, 经济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这么大的调整, 社会比较安定, 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 这是不容易的。今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 当然这是最低点了。从今年以后, 会逐步有所回升。当然不会很高, 但这是最低点。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 是能够稳步上升的。

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稳一点, 工作要抓紧一点, 要振奋精神, 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 循序而进。中央提出的调整结构, 稳定经济, 逐步改革, 这个大章法和大措施, 主要是个继续落实的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同外国人谈话后, 大的章法就是这样, 不宜搞很多章法, 不宜出很多主意, 主要是个贯彻落实的问题。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第二个问题, 关于“六五”计划问题。

现在看来, 有这么几个问题(这是初步议论的看法):

第一, 速度。工业、农业, 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准备定在百分之四。执行的结果可能要超过, 但是看来还是以定在百分之四比较好。过去, 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 其他的长远规划, 统统没有完成过。所以,

为了提高信心，宁可把计划放得低一点，将来能够完成，超过当然更好，不宜搞得太高。工业、农业都是百分之四，轻工业大体上是百分之七到八的样子。重工业增长定到百分之一，因为有个能源问题。重工业增长定高了，能源解决不了。想把国民收入也定到增长百分之四，就是刚才小平同志讲的，经济效益好一点，产值的指标搞得稳妥一些。过去一般概念就是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大约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三。国民收入低于生产总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六点一）。今后五年主要靠挖潜，工业、农业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是增长百分之四。估计八四、八五年会稍高一些。“六五”定到百分之四。今后怎么样？小平同志问过这个问题。“七五”会比“六五”要高一些。经过“六五”的调整，我的看法，第七个五年计划肯定要超过百分之五。搞得好，这个十年有可能达到年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第一个五年低一些，第二个五年高一些。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年能够这样搞的话，第二个十年会更好。这是我的看法，姚依林同志他们都这样看，第二个十年就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七。这样，我们以前讲过的二十年里两个倍增的计划，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最近我也看了一点外国的材料，在箱根开的中日两国的经济讨论会，日本的一个专家也是这样讲的。他认为，我们第一个十年不要搞那么高，搞低一点大概是增长百分之四、五，第二个十年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八。还有个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调查报告，基本上也是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十年真正把国民经济搞成一个良性循环，根本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果搞好。比例关系搞好，使资源、能源、交通这些基础结构有所改进，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好一些。把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管理体制解决好，中国人是聪明的，资源有，如果更多地考虑些经济效益，不忙于追求速度，总的经济情况会好。“六五”定到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决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前途。

第二，财政。现在讨论“六五”计划，大家都知道一点消息，主要就是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金比较困难。现在准备五年方针怎么定呢？基本平衡，每年准备有个二十亿到三十亿元的赤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到五年中间我们既能基本平衡，建设又有一定的规模？途径有这么一些：

(1) 财政本身要采取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举一个例子，譬如烟酒专卖，加上高级烟适当提价。第一，烟要发展，要多搞烟。烟叶情况，估计今后也会好。第二，要多搞高级烟(甲级、乙级烟)。第三，专卖。烟叶专卖，就好调整，就好统一使用。现在很多烟叶是在小烟厂加工，加工了很差的烟。专卖，烟叶能统一调整，烟叶生产能够多一些，好一些。第四，甲级、乙级烟适当提高点价，丙级烟稍涨一些，其他不涨。这四个措施，每年可以多收三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当然，也会挨骂，但是也值得。骂的人不多，少数人骂，抽好烟的人骂。

再一个，税收方面，现在管得不严，漏税非常严重。税还想适当增加一点。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搞得太少了，太简化了，要适当增加一些。主要是整顿一下税收，加上财政监督、财政纪律。这个大概可以多搞二十亿到三十亿元，今年大概就多搞十几亿元(今年抓晚了)。每年还要发国库券三十亿到四十亿元，个人也要买一点，大概一半向个人发放，一半向企业和地方发放。

还有一个，在纺织上想些办法。现在纺织有比较大的潜力。国际上化纤便宜棉花贵，我们国内是棉布便宜化纤贵。如果我们国内棉花搞上去，不进口棉花，多进口化纤，在国内扩大化纤的比例，而且化纤还准备降价。有一个专家算了一个账，一年可以搞四十亿元，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元左右。再加上搞一些其他的高档产品(一九六二年陈云同志搞高级糖果，现在要搞一些高档产品，搞糖果不行了)，价钱就要卖高一点。加到一起，大概可以搞到三十亿元。

另外，外贸的亏损要设法控制一下，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控制一下。这样也可以减少很多开支。按原来算账，这里头也可以有一二十亿元。这都是可以搞的。这是财政本身。

(2) 从国内筹措一批资金。现在我们资金困难，一个就是向国外借，另外也可以筹集一些国内资金。因为按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经济体制，企业有钱，地方有一部分省份也有钱，中央的钱比较少。现在预算外的资金增加，预算内的有一千亿元左右，预算外的资金大概还有五百亿元左右。预算外，包括挖革改都在内。还有分成，企业的钱，留成的钱，各种各样的钱。另外，城乡储蓄增加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一九七八年以前，

每年的储蓄最多增加一百亿元。一九七九年以后，一年就可以增加二百亿元。不完全是个人储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比较快，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百零五亿元，一九八〇年又增加二百一十八亿元。这是总的。下面分开讲：企业存款，一九七九年为四百六十九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五百七十三亿元，今年六月底就已经达到了五百六十二亿元。城镇个人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二百零二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二百八十二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三百二十三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七十八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二百一十七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一百四十四亿元。而且相当大部分是定期储蓄。看来，我们的消费品也没有那么多，将来要通过银行把地方的存款、企业的存款、个人的储蓄拿一部分来作为建设资金。多了不行，能拿多少还要研究。办法是通过发行债券，或者银行来办。就是说，把银行储蓄中本来用作消费资金的，转一部分为建设资金。甚至将来还可以把长期储蓄的利息提高一点，鼓励长期储蓄。长期的好动用，短期的不好动用。国内的资金，中国不能完全按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我们中国也不能完全只按过去的旧制度，只是财政这么一个口，收多少然后开支多少，还要通过银行筹集点资金。

（3）借国外的资金。国外的低利资金，将来还可能配一部分买方信贷。低利的自由外汇，像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买方信贷不自由，低利资金有一部分是自由的，世界银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这是自由的。买方信贷，譬如说欧洲贷给我们钱，利息也不高，但是你要拿他的钱买他的设备。这些不能用多了，用多了对国内机械企业影响太大，但是可以用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搞能源、交通，在这几年内不搞一些，以后再借就比较困难。究竟国外的借款借多少，还要研究，现在计委初步提出个意见，折成人民币，一年可以用五十亿元，那就是十几亿美元。我想，还可以稍微多一些。多到多少，还要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我们借到的低利贷款、自由外汇，加上国内的黄金，首先把一九七八年搞的一批高利贷冲掉。因为这个我们负担很大。一九七八年搞的这一批，明年光还本付息六十五亿人民币，要连续二三年，三年以后高峰才能过去。

(4) 企业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个有很大潜力。要从增加财政来讲,它比生产的增长还要可靠一些。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每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收入只能搞十亿元左右。如果成本降低百分之一,也是十亿元。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办法,加上多年的经营管理混乱,浪费很大。我说的浪费,还不是人多,就是不负责任这种浪费。所以,现在企业的潜力特别大。这两天报上发了个消息,抚顺市今年生产全面下降(因为它是重工业),但是它今年财政收入不减少。首钢,铁少炼了三十万吨,钢少炼了十二万吨,今年财政收入大概比去年还要增加。就是说,企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政策,要能够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今后这几年,一个是靠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一个是要靠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来增加收入。这里我估计潜力相当大。

(5) 中央财政的负担要逐渐收缩一些。有一些事,将来中央财政不负责。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拨款,将来主要用在能源、交通、城市建设一些关键问题上。一些轻工业,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又比较大的项目,依靠地方、依靠企业来搞。刚才讲的通过银行的办法。中央财政的投资范围适当收缩,一开始能搞多少,还要研究。

第三,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今后几年还是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当然,天灾人祸,哪一年不怎么样,这完全可能。总的来讲,今后几年,农业还是个持续全面增长的趋势。粮食不可能增很多,因为有些地方粮食面积还可能减少一点。但是,棉花、糖、油料以及其他的各种土特产,包括山货,会有个持续的较大幅度的增长。今后五年内,每年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用来调整农业结构,解决经济作物、畜牧业的发展问题,很有必要这样搞下去,不动摇。今后我们的棉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在这里冒讲一句,如果我们政策不变,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很有可能搞到八千万担棉花。棉花主要的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光鲁西北就可能搞到二千万担。它原来是四百万担,去年达到一千零七十万担,今年还超过去年。我在鲁西北做过调查。北方种棉花,包括河北、河南、山东,这是非常合算的。在北方来讲,两斤粮食可以换一斤棉花。按国际市场来算,一斤棉花可以换十斤粮

食。所以要多进些粮食，把棉花搞上去。再一个是糖，也是北方的甜菜希望最大，关键都是个粮食问题。我们用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把国内的农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我看，这在我们国内是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还没有搞到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数字（二千万吨）。他讲是几年之内，可以长期地搞。总的我觉得，我们棉花、糖、畜牧业、水果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大发展。

轻工、纺织、建筑材料。轻工里边，特别是最近耀邦同志讲的食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的饮料太少，为外国人搞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就是啤酒、矿泉水、汽水三样东西。青年一代和我们老年不一样。不仅是旅游，国内市场，各种各样的饮料都很需要。还有个日用化工。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就可能冬天要用点雪花膏。农民如果每家买一瓶雪花膏，这就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小孩子、独生子女再用点花露水，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总之，我们中国的日用化工，香料香精、化妆品，当然不能和国外比，但现在化妆品在街上很多都买不到。这些东西都是一本万利。食品和化工，我认为都有可为，这都是些赚钱的东西，可以回笼货币。

重工业主要还是围绕着发展消费品，调整服务方向。不是不搞重工业，是重工业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任务。

第四，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就是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五年计划里头，我们还得下点力量，搞能源、搞交通。中央的投资，无论如何也要挤一些搞这些。外资也还要用一部分搞能源，搞交通。能源和交通如果不搞，肯定会妨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搞能源，一是开发，二是节能。五年之内，节能的技术改造是重点。我们这五年能不能为下一个五年作些准备，关键是两个：一个是能源、交通问题，一个是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五，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现在的企业所以效率低，一个是管理问题，一个就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五十年代苏联援助我们的一百五十六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落后的设备，特别是消耗能源比较大。再过上几年，我们现在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更年期了。当然，不是说全部设备都不要了，都要重新改。但是，原有企业在这五年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而且这一个挖革改不像我们过去讲的，专门是为了增加产量，

应该重点是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挖革改过去主要是为了量的增加，今后应强调质的提高。这样，经过五年到十年，我们原有企业的面貌逐渐有了变化，这本身就积蓄了力量，就是生产力。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段新搞的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了，原有的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都能够多搞一些。这样，重工业、机械工业不至于下降太多。现在我们的机械力量很大，完全有力量搞这个。为了提高经济效果，提高产品质量，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技术改造在这五年里也应该很好地抓一下。

第六，进出口。我们要继续发挥现在国际的有利条件，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以我们的优势来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国际上交换。既然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了，就不能完全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来搞，应当利用自己的长处，同国外来交换，弥补自己的短处。无论农业、工业，都需要这样。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拿粮油这个问题来讲，如果我们善于同国外交换，有很多是非常有利的。刚才我讲的棉花是一类。现在讲油料。现在我们长江流域的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因为农民收入也多，而且茬口也合理，也比较稳定。如果我们逐步地在东北从城市开始不吃豆油，吃菜籽油，把东北的大豆转为出口，那就非常合算。东北一年用三十亿斤大豆榨油，而东北的大豆，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榨油的大豆，东北是含蛋白质高的大豆，美国对我们这个大豆非常有兴趣。它榨油出油率很低，但在国外卖价钱很好。如果说东北都少吃豆油了，那就是一大笔财富。因为长江流域的菜籽油多的是，这几年控制不住。菜籽油出口不行，不合算。国外也不愿意买这个东西。我们的大豆可以搞高蛋白质的食品和饲料，很多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大豆，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我们过去只强调自给，拿这种大豆去榨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地把农业结构加以改组，少种小麦，多种油菜籽；如果全国能够逐步逐步都吃菜油的话，这就能把东北的大豆、山东的花生替下来出口。当然，这要有个过程。如果逐步来搞，能够拿十亿也不得了。还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上一次我跟粮食部讲小麦和大米的问题，我们中国虽然大米很紧张，但中国是在世界上生产大米最多的国家。不仅现在，再过些年也是这样。总之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小麦，甚至还会更多一点。如果我们城市里边采取一些措施，多吃一些面粉（这要采取些政策措施），逐步挤出一些大米出口，一百亿斤

大米就可以换二百亿斤小麦。当然，这不容易。像江苏、浙江一直到广东，主要都是用大米作食品，喂猪也是大米。湖南也是。但是，大米喂猪并不好，养分并不好，还不如苞米。如果我们将来把饲料工业搞好，用好的饲料换大米，又便宜，又把大米换出来出口，那是很合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些。我说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是闭关自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国际市场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研究善于经营的问题。耀邦讲的善于运筹，就是通过交换，通过国际上的贸易，以己之长，补己之短。我觉得，这个方面，无论农业、工业，都有极大的潜力。这是一条。现在我们很多人考虑问题，好像还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比较好。我觉得，真正的自力更生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拿自己的东西换另外的东西，这怎么不叫自力更生？我并不是依靠你，我是拿我的东西跟你换。如果我们不是自力更生，他也不是自力更生。这个框框，现在还束缚我们很厉害。再一个，就是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怎么样把它的工业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进养出。上海、青岛、天津、广州已经这样做了，从国外进原料，搞产品，然后出口。

当然，全国其他地方也可以搞，但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优势，经验、技术、交通、电讯、社会联系都有利。我在上海讲，将来上海相当大的力量是对外。还有天津。这样一搞，沿海这些地方，二亿人口，可以创造很多财富，也可以克服很多弱点。进出口我就讲这么一个观点。

最后，人民生活。那一天小平同志说了一下，大概这五年，人民生活不能提得太高，对消费的部分要有所控制。农产品提价问题，工资问题，奖金问题，都要有所控制。消费的部分不能增加太多。主要的是搞点宿舍，搞点房子。虽然个人的购买力是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动力，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压力太大了不行。所以，还要控制一下。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现在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

这是新总理赵紫阳于九月十五日在会见香港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时讲的话。在讲这段话之前，他还引用了列宁的话，除了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这是他在担任总理以后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赵紫阳说，中国的病根已经完全弄清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进行治疗。他有充分信心能治愈这些病。参加会见的，是在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会议的香港新闻界知名人士，其中有《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和副社长兼总编辑李侠文，《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等。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第一社长王匡和第二社长李菊生也参加了会见。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以及中国现在的情况时，赵指出当前关键是我们是否已经看清楚问题所在。医生在处方之前，首先要找到致病的原因。

* 这是1980年9月15日赵紫阳在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第一次会见香港新闻界知名人士和记者的谈话摘要，当时曾以“赵紫阳畅谈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为题，在香港《大公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赵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阐述了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的许多重要意见，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相结合。这也是赵担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公开的施政宣言，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

因。如果能够查清病因，病就能治好。赵确信中国的病根，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我们有信心治愈这些病。

关于华国锋在人代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赵说，这并不是一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由中央总结出来的看法。赵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大彻大悟，反省到1957年以后的问题，那就得花上更多时间才能做到目前这样的解放思想。

赵说：中国曾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正毫无保留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的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工作将肯定地得到改进。人们不应期望事前搞出一套完整的办法，在一夜之间把什么都改变掉。这样做，弄不好，就会陷于全面被动。

我们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他说：只要方向正确，我们就能在实践中，一边走，一边探索，稳步地前进。

中国是一大片，世界是一大片，中国应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他指出，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肯定会发生一些问题。香港一些人士反映外贸工作有些混乱。这正是新旧交替时期的反映，这也正是我们预见到的。在过去内外贸易分别由一个部门包办，统得很死，那就难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某些省份迫切需要某些商品时，这种商品却在另一个省份积压很多。在国内尚且会有这样的事，对外贸易中问题当然会更多。

赵又说，中国是一大片，世界是一大片，如果只有一条线来沟通，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赵说，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们统得太死，闭关自守，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改变。但是，我们的立法还没有跟上，统筹协调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因而产生了一些难免的混乱。

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永远乱下去。如果说欧洲共同市场尚且可以做到协调，我们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呢？伦敦旅游协会是一个民办机构，但它却能够把航空、交通、旅馆各方面都协调得很好。我们今后要在立法范围内，

放手去干，统筹协调，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官僚主义比以前少了，和外部世界的接触也比较多了。

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解决了，就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

赵紫阳强调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当前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引进外国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使之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解决了，那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说，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由于过去极左路线的影响，统得过多，无所不包，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我们过分强调了集中，企业缺乏自主权，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

他还说，从宏观经济出发，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又要吸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管理、经营方面的经验，还要承认商品经济的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商品经济和大规模生产发展起来的，银行起了杠杆作用。过去我们沿袭了苏联的管理方法，同时还继续采取了过去老解放区的那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的管理方式。这一切阻碍了我们经济的大发展。

赵说，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毕竟比封建主义进了一步。如果连资产阶级民主形式都不讲，岂不是向封建主义后退了。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1980年9月30日第7期，译自香港《大公报》英文版增刊）

专业联合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一机部贾庆林¹同志的建议很好，请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和各位副总理参阅。同类型的工厂组成工厂集团，或在经济中心组织专业性的外贸服务公司，这样既有利于打进国际市场，把外贸搞活；又能把分散的企业组织起来，协调行动，联合对外。这种专业联合可能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请一机部机械进出口公司先选择几个中心城市的工厂，抓紧进行试点，摸索经验。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八日

注释

1. 贾庆林(1940-)，河北泊头人。河北工学院毕业，曾任一机部成套设备局团委副书记，时任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 这是赵紫阳对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0年第2601期上刊登的一个建议的批语。

国务院今冬和明年要抓的几项工作^{*}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

今天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议程有四个：一是由我向同志们通报一下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分工，今冬和明年国务院要抓的几项工作；二是请万里同志讲一下国家机关的整顿和改进作风问题；三是请杜润生¹同志对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制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文件作个说明；四是请杜星垣²同志对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作个说明。

国务院今冬到明年要抓的工作，总的来说，就是要贯彻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精神。整个工作要按照邓小平副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华国锋主席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讲话去办。他们的讲话中提到的很多工作，国务院应当认真贯彻落实。今天，我不是讲政府的全面工作，主要讲讲围绕经济工作要抓的几件事。至于外交、民族、政法、文教卫生，等等，都按人代会精神和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去办，我这里不再讲了。

一、进一步抓调整

今年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当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形势好的情况下，要看到潜伏着的、可能出现的危险。现在看，有以下几个因素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是能源本身比例失调的情况比预想的严重，明年石油的产量比今年大约要下降四百万吨或者还更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多一点。在当前能源缺乏的情况下，这四百万吨石油可不要小看，对生产、对财政收入、对出口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还有统配煤矿的产量也要下降一些。二是农业今年是个重灾年，南涝北旱，粮食减产可能在三百亿斤以上，棉花可能是保产甚至稍有减产。这不能不影响到明年。三是过去的欠账太多，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今年的财政赤字比向人大报告的预计要大一些，货币的投放要多一些。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讨论时认为，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的讲，是要进一步抓调整，继续保持经济稳定。稳定经济主要有两条，第一，物价，特别是主要消费品的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第二，明年财政赤字无论如何要控制在五十亿元以内。做到这两条，要作很大努力。如果明年财政赤字突破五十亿元，连续几年的赤字都很大，那么，经济上可能就要出大的问题。“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是关键。我们进一步抓调整，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有利于给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现在看来，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对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抓得不够有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以来，用较多的精力抓长远规划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必要的，今后还要大力抓。但同时必须继续抓调整，对调整要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应当认识，进一步抓好调整，是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是今后经济上出不出大问题的关键。

在思想指导上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搞活经济的同时，必须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我们要研究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在微观经济方面，在企业的具体活动方面，应该使它更活一些，这确实有很大的潜力；但在宏观经济方面，在决定国家全局的一些问题上，必须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目前我们正在改革的过程中，立法一下子还跟不上，经济上的手段一下子也配不了套。在很多经济措施、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国家尤其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不论外国的经验也好，我们过去的经验也好，经济上活了以后，是会出现一些新问题的。有一些问题关系不大，国家不必干预；但对一些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国家必须进行干预，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健康地发展。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企业进一步搞活，把经济进一步搞活。但在一些

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上，国家必须进行干预。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

在进一步抓调整，继续稳定经济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稳定经济，中心环节是要进一步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这里打个招呼，原来确定的一九八一年的基本建设规模要压缩，二十二个重大项目也要进一步研究。原来决定明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五百五十亿元，现在看来，不能搞那么多，只能按五百亿的规模搞。特别是重大的建设项目，一定要慎重，严加控制。再一个是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解决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以小挤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基本建设的规模也控制不住。这里包括挖、革、改在内，这方面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也不少。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不注意，今后势必会一年比一年严重。我们实行两级财政，扩大企业自主权，地方的钱、企业的钱会一年一年多起来，这是个好事，这一条政策我们坚定不移。今年我们执行计划的结果，中央财政有很大的赤字，而地方财政可能有三十亿元的节余，这三十亿元还不包括企业发展基金。实践证明，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后，对调动企业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增产节约找门路，讲求经济效益，作用是很显著的。但是地方、企业有了钱以后怎么使用，用在哪里，不能用在哪儿，国家要加强计划指导。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指导，我认为解决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然宏观经济，不仅是这一个问题，它包括的内容还很多。从当前看，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是第一位的。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国家计划指导，包括国家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首先应该在基本建设上。我们应当想办法使地方和企业的钱，在几年之内更多地用在解决比例失调的方面，比如人民生活的欠账，像住宅、教育、必要的生活设施以及安全生产等，这些方面要多用一些。还要注意用在节约能源上。本来现在欠账就很多，薄弱环节就很多，所以千万不要从局部出发，把钱用在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上面，再去扩大比例失调。地方和企业把钱用在轻纺方面有积极性，因为资金周转快，利润比较大，又可以多安排就业。这是好的。但加强轻纺，也要避免盲目性，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无计划地去扩大生产能力。现在轻纺主要的还不是生产能力的问题（当然有些方面有生产能力的问题），而是能源、原材料、质量、品种的问题，要把钱用在这些方面。

近来纺织工业各地都在搞，一下扩大很多锭子，根本没那么多原料，建起厂子以后也只好闲起来。这种做法一定要改变。所以轻纺工业哪些搞，哪些不搞，要作分析。还有挖革改，也要分析，也不能盲目地、笼统地扩大生产能力。地方的钱归地方，企业的钱归企业，你自己有使用的权力，这是个原则。但哪些根本不能搞，哪些一两年内不能搞，国家要有规定。地方、企业的钱如何使用，也不是统统都要国务院批准。但国务院应当根据整个国家的情况，讲清哪些是长线，哪些是短线，哪些是薄弱环节，哪些是生产能力过剩，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哪些东西不准搞。像有些地方搞很多小烟厂，盲目地扩大纺织厂，这些都不行。各个地区都想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优势，出产棉花的想搞纺织，出产羊毛的想搞加工，大量减少原料的外调，这样搞就会出问题。发挥各地的优势，改变生产布局，只能逐步地经过相当一个时期才能办到，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改变过来。我们国家正处在调整时期，还有相当的困难，各个地方都那样搞，会增加国家的困难。我这里只是原则上讲一下，还准备搞一条一条的具体规定组织实施。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中央用于建设的财政拨款，要逐步更集中地用在那些建设周期长，地方、企业、银行都没有多大积极性，但国家又必须搞的建设项目上去。如能源、铁路、港口、科学事业等。那些建设周期短、利润比较高的，应当更多地让地方去搞，让企业自己去搞，还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去搞。将来地方的钱，企业的钱，银行的钱，第一不搞盲目建设，第二用在大家有积极性的方面。这样就可以把国家财政拨款，也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财政拨款，用在那些建设周期长、利润又不大，但又必须搞的建设项目上去。轻纺工业必须加强，但轻纺需要的建设投资，要更多地由地方去搞，更多地通过银行贷款去搞。当然这些要逐步地去做，但从明年开始就要体现这样一个方针。

还有社队企业的发展，也要适当控制，要认真搞好整顿提高。整个社队企业的发展要有个步骤。这里也有个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也有个争原料的问题。还有个应当引起注意的普遍的问题是，社队企业占用土地的情况很严重，搞不好，过几年在这个事情上就要出很大的问题。当然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要一步一步地发展，但要避免盲目性。我们国家农业人口结构的改变，究竟要个什么样的速度，农村劳动力出来多少去做工才合适，在长远规划里要很好研究。这个事情搞不好，也会产生盲目

性。农业人口转到社队企业，转为吃商品粮，这是一个趋势。从长远看，中国的农业人口总是要减少的。但人口结构的改变，要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适应，如果发生盲目性，一哄而起，搞得过快，也会出问题。

（二）进一步抓轻工生产，搞好轻工和市场。今年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明年还要继续这样做。要通过发展轻工，活跃市场，广开财源，回笼货币。明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主要靠轻纺。我们应当继续提高轻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包括那些虽然不是轻工，但属于生活消费品的比重。明年我们宁肯少进口一些设备，挤出一部分外汇，多进口一些轻工原材料、耐用消费品的零部件和部分回笼货币多的高档商品。物资部门、外贸部门的库存都比较多，明年要进一步清理压缩，用于轻工，用于市场。明年还要考虑适当减少钢铁生产指标，让出能源用于轻工。对上海和一些轻工生产比较集中的城市所需的原材料，要想方设法保证供应，产区一定要按计划调拨。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事情，但必须这样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明确地提出来要保上海。当然不只保上海，天津也得保，各个省的省会和重要城市也得保。总之，农业上的原料，烟叶也好，棉花也好，羊毛也好，还有其他东西，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调拨计划。只有超计划的部分，可以自己支配，进行协作。只要这些城市生产能力有多余的话，就不要盲目建厂。我看至少两年以内，要坚决采取这个方针。两年以后，根据发展的情况再看。这就是说，第一，按照计划完成调拨任务；第二，超计划的部分提倡同城市进行协作，充分发挥城市的生产能力。如果确实原料很多，才允许增加一些生产能力。在原料产区和城市之间，国家要加强计划协调。

（三）节约能源。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明年要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去落实。首先明年的节能计划要很快搞出来。对消耗能源很大、成本很高、长期亏损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五小”企业，要继续关、停、并、转，节省出能源。这里要采取一些政策，就像东北对待小铝厂那样的政策，小厂停下来以后，地方所需要的铝，由大厂给；地方所需要的钢材，由大厂调，规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像四川、贵州、云南的小化肥厂也烧天然气，而大厂天然气不够用，就可以把小厂停了，把天然气调给大厂，由大厂给一定数量的化肥。还有烧油，也要考虑停小厂，保大厂，大厂给返还东西。明年必须抓紧石油的节约，工业用油、农业用油、交通运输用油，

都要研究一些节约的办法。现在世界闹能源危机，采取很多节油措施，而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节能的风气，明年一定要改变过来，在节能上真正做出成效。

（四）稳定物价。明年物价要保持基本稳定，无论如何不能够出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认为，所谓基本稳定，应当划出一些杠子。一是占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的百分之七十几的商品价格，要基本稳定；二是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中等以下收入的人，生活水平要保证，生活费指数不能超过多少，也要划个杠子。如果生活费指数超过了多少，国家就得采取措施。至于有些东西，比如甲鱼、螃蟹等，也可以在价格上放宽一些，随行就市。这些东西涨价，对中等以下生活水平的人没有什么影响。所有的东西统统不涨价，一律稳定，也不行。很多零零星星的三类产品，如果价格管得很死，就没有了；一放活，要涨价，如果都要国家补贴，国家也吃不消。所以要有一个方针，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品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至于有些零星商品，并不影响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的生活的，价格可以放活，收入多的人可以去买那些东西。还要注意，城市的蔬菜价格一定要稳住。农村的农贸市场的粮价也不能有大的波动。因为今年减产了，农贸市场的粮价一定程度的回升是很难避免的，但要通过必要的办法，使它只能回升到一定的水平，不能够大涨。还有很多二类产品和一些三类产品，国家也必须掌握一部分。在主产区，通过议购也好，派购也好，国家收购起来，以便解决城市最急需的供应。比如水果集中产区，像产苹果的地方，产葡萄的地方，产荔枝的地方，等等，国家商业部门必须收购掌握一部分，其余的由社队自己出售。议价问题要很好整顿一下，不能统统搞议价，议价商品的价格，也不能没有限制。现在除了粮、油、猪，很多农产品统统是议价，这个不行。这里有几种情况：小宗的零星的农副产品可以议价；有一些产品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搞议价；有一些产品国家收购一部分，其余的搞议价。对这个问题，要有个办法。

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最近对经济形势讨论了几次，准备写一个文件，先向书记处汇报，再召开一次省长会议（和计划会议一起开），重点讨论经济形势，讨论明年进一步调整和稳定经济的措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部署，也要进行讨论。

二、制定长远规划

制定长远规划的工作已经搞了半年，现在已有了一个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这个初步设想，距离制定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十年规划，这个规划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发展的规划，还差得很远。我们过去制定规划是专讲生产指标的，现在制定的这个长远规划应该是经济的、社会发展的规划，不仅包括经济的要求，也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要求，包括社会福利、人民生活的要求；不仅有物质增长的内容，还要有劳动就业、节制生育、人口结构变化的内容。所以，我们搞的初步设想，离上面这些要求，还差得很远，工作量还大得很。真正制定出这样一个规划，任务还很艰巨，很繁重，需要时间。特别是我们目前处在调整时期，很多问题看得不清楚。从现在到开省长会议这一段时间，要集中力量抓一下调整和稳定经济问题，先把明年的计划安排好。省长会议后拿出较大的精力，继续去搞长远规划，力求搞好一些。鉴于我们制定计划的水平很低，数据、资料以及预测工作非常薄弱，因此可以考虑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方针性的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十年长远规划纲要。这是一个高方案。

第二个方案，在十二大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方针性的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十年规划的轮廓设想。这个轮廓设想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可以提两种设想，重要的生产指标两种设想，达到什么标准两种设想，重大措施也可以提两种设想，在以后的实践中来看看哪种更符合实际。与此同时，着重制定一个从明年开始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要求详细一些、准确一些。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以后采取五年滚动计划较好。就是每年都要搞五年计划，如明年起，就是八一年到八五年，后年就是八二年到八六年，顺延一年，每年都有五年计划，去掉一年加上一年。通过制定这样的五年滚动计划，两三年后，我们的计划工作就可能会有一个像样的水平。鉴于当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水平比较低，只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因此，可不可以采取除了提个长远规划设想以外，重点搞五年计划，而且五年计划采取每年修订一次的滚动的形

式。这是第二个方案。这样搞很有好处。如果按过去的办法，五年计划一订就算了，到后来看五年计划不行，结果越搞与实际的距离越远，越搞越没有指导意义，只好抛开，另外搞一年一年的计划，这就等于没有长远规划。如果搞滚动式的五年计划，计划工作的重点每年都放在五年计划上，每年修订一次，这样计划水平就可以逐步提高。这实际上解决了五年计划每年进行调整的问题，同时也把当年的计划定下来了。采取这样的办法，对提高我们制订长远规划的水平，对我们整个经济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提出这个想法，大家可以议论，然后省长会议议论，最后报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决定。

两个方案，不管采取那个方案，都要下很大力气来做这件事。

三、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效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点开始的。一九八一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前进一步，要在全中国全面铺开，并且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财政部的同志建议，明年的这种试点不要搞得太多，我原则上同意。但光在个别企业试点也不行，要选择几个城市试点。总的来讲，明年试点不能搞得太多。因为，这个试点办法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如何，还摸不清楚。

与扩大自主权相配套，要酝酿和逐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像计划、物资、劳动、物价、银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这里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和轮廓，说说我们的想法。我们国家搞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使企业相对地独立，在这个基础上，自愿地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另外，就是要建立行业组织。国家经委邱纯甫³同志考察日本行业组织有个报告，讲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行业组织对推动企业联合，比现在的地区、部门的作用都大。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拿过来为我所用。行业组织，各种各样的协会组织，是民间的，或者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是跨部门、跨地区的。它的任务就是搞服务、协调、

培训人才。在扩权以后，要发展经济联合、行业组织、经济中心。同这样一个进程相适应，原来各经济主管部门，部委也好，局也好，就逐步转为制订政策、立法，搞监督、协调、服务，进行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干预，搞技术交流和培训等工作，要使行政部门向这方面转化。所以，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把分散的企业，一个一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起来，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加上行业组织，加上经济中心，加上经济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监督、服务，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轮廓。当然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样搞就能使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改而不乱。

在改革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方向要准，决心要大，步子要稳，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我们这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采取把一切方案搞好，一个早上全部改过来，而是要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办法。现在改革的方向定了，但是究竟这个路子怎么走，步骤怎么定，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我们还没有经验。改革的路很长，要很好寻找它的步骤、形式、方法。所以，第一，采取的步骤要始终很谨慎，要“摸着石头过河”，使改革的每个步骤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避免折腾。要承认我们的经济工作管理水平还很低。刚才讲了，经济资料也很不齐全，很多连锁反应在事前并不知道得那么清楚，那么准确。我们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总的是要前进，这要坚定不移。但步子不要一下迈得太大，一下迈大了再来调整就困难了。在改革中间，有些步子迈得不恰当，可以再移动一下，作一些调整，要有这个准备。步子迈得稳些，别的方面容易跟上去，产生了新问题也容易解决。第二，要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改革中间总会出现问题，要认真分析原因，正确总结经验，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不要走回头路，走老路。旧的东西确实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改革后一出现新的情况，容易不是用主要精力去研究如何适应它、解决它，而往往是想退回来，回到老路上去。这种情况是容易发生的，我们要警惕。

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困难是不少的。除了“左”的一套影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阻挠以外，从工作上来看，有两个问题，难度很大，又是改革最关键的问题。一个是打破地区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这在整个改革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联合也联合不起来，竞争也竞争不起

来。但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现在有许多联合，从企业的共同需要来讲非常合理，但就是卡在这个地区，或者那个部门，因为涉及到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企业之间发展生产的需要体会很差，但是对权和利归你还是归我，却成为他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这就会成为联合的障碍。我们要进行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有些事涉及到这个地区、那个部门就难办，很合理的事情，就是走不通。为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个是权，一个是利，归你还是归我。要改革，非打破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不可。不如此，企业就不能合理地组织起来。二是价格体系。所谓按经济规律办事，所谓市场调节，归根结底是价格问题。多年来形成的商品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问题很复杂，牵动面很宽。这个问题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但要改起来，确实是连锁反应很多。对这个问题，既要坚定，又要谨慎。特别是目前处于调整时期，财政还有赤字，搞不好往往会影响到整个物价的稳定，影响到经济建设，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改不行，改得不好也要出乱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这么两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比较好办。在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研究、妥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明年改革的部署，杜星垣同志还要讲。主要是一个继续试点，一个制定方案。

四、加强经济立法

各级政府都要加强经济立法工作，逐步做到主要通过经济政策、法令，通过运用经济杠杆来指导和管理经济。现在对企业、对基层单位放活了，对它的干预减少了，但是没有配套的法令、法律让它遵循，因而发生了一些问题。很多问题的产生是这个原因，包括外贸。外国一个企业的经理有很大的权力，但在企业外边有很多法律、条条管住它。我们现在有很多权要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但必须有很多带有立法性的东西跟上去，使它有所遵循。经济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已开始搞了一点，要继续积极地去。

我们现在要首先把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全部经济立法拿过来一个一个

研究，看哪些适合我们的情况，哪些不适合，作为我们经济立法的参考。经济立法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将来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律、法令，恐怕要有几千个就是了。明年和以后，经济立法问题要摆到国务院工作的重要日程上，要摆到各部的重要工作日程上。有些法令的制定，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和条例，先试行一段，经过实践，逐步完善；第二步再报经立法部门批准，成为正式的法律。

通过改革，下边逐步搞活以后，那么对企事业怎么进行管理呢？一个是联合，一个是行业组织，一个是经济立法，还有一个是统计。我认为统计工作是指导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只要统计搞好了，监督就比较容易搞，国家干预也就比较好搞。现在我们国家的统计太差。像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如果统计工作没有基础，经济工作就很难搞好。你说要管，那也很容易出瞎指挥。放活以后，统计工作没有跟上去，你就没有办法管理，干预也没法干预。因为哪些应当干预，哪些不应当干预，怎么引导，你搞不清楚。所以要搞好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指导，必须加强统计工作。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怎样加强，请计委研究一下。一个统计，一个预测，这两件事能搞好，我们国家的计划指导就可以大大加强。通过经济杠杆，通过必要的国家行政手段，就可以使国民经济协调地、健康地发展。

五、逐步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过去这方面欠账很多，现在调整就是要逐步还账，逐步地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个问题，也要根据我们的情况量力而行。明年工资、奖金，总的来讲是个稳定情况，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工资也是在很小范围内的调整，依林同志讲了，只能有重点地解决知识分子以及机关干部中工资过低的问题。明年在生活上主要应当把市场供应搞好，把物价稳住。还有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事，如城市建设、住房、安全、卫生等方面要有所改善。明年住宅建设要继续抓紧，灾区生活安排要落实，城市蔬菜供应要解决好。改善人民生活包括的方面也是很广的，不要只看一面。明年把市场搞好，在物价、市场、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多用些劲儿。

现在人民生活中的爆炸性问题不少，就业、物价、住房、安全、环境保护等，确实问题很严重，人民确实是不满意的。但是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量力而行，逐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地许愿绝没有好处。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论了经济宣传问题，认为是个大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跟人民讲清楚，确实过去对人民欠账很多，人民付出了代价；同时也要讲，这两三年里，党和政府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比如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城市住宅建设的增加，就是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还必须讲，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根据我们的国力状况逐步解决。这样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执政党如果随便开支票许愿，最后没做到，比不许这个愿要糟得多。宁肯少许一点愿，最后做的结果超过。我看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事情，要切实切实去做，大话少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准备建议书记处正式讨论一下经济宣传的问题。

六、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

万里同志要专门讲这个问题，我不多讲了。我只简单说两点。今年以来，方针、办法议了不少，但有的做了，有的还没做。今后国务院的工作，有一个狠抓落实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和各委都要加强检查督促，各部也要认真地抓落实。今后国务院一定要树立起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作风。

我们机关现在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压了许多干部，不管今后机构怎么调整，各部都用不了这么多人。一九五七年以前，当时毛主席主张向科学技术和文化进军，这是很对的。那个时候，很多干部开始学业务，学科学，有些还派到苏联去学习。但一九五七年后，讲外行领导内行，就不学了，就轻视知识，轻视专业，排挤以至打击知识分子。应该说这样把老干部耽误了。现在我们的干部构成，同东欧国家对照，就看出了问题。这一点就没有他们高明。南斯拉夫也好，罗马尼亚也好，胜利以后，老干部都进行了专业培训。我们去访问时遇到一些经理、厂长，都受过专业培训，是大学程度。而我们却是大批“万金油”⁴干部一直搞下来了。现在我们机关还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中青干部，科员、科长、副科长，处长、副处长，有一层人，专业知识少。反正现在我们用不了这么多人，要想法给他们重

新学习的机会。我讲的是专业学习，专业训练。专业学习要补课，特别要组织学习经营管理。让这些干部成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要培养他们能够掌握系统工程学方面的知识，搞经济工作的懂得怎样经营管理，搞科研的知道如何组织领导科研工作。我最近同农业部的同志谈，他们部里有九百人，拿出二百人通过训练增加专业知识。建议各个部都可以进行专业训练，搞学院也好，搞学校也好，补习班也好，要补这一课。我们的大学也要根据条件，增加这方面的专业。各个部都要筹办这个事情。我们这一代被耽误了，不要再把他们耽误了，这些人好多年龄也不小了，再过几年也就晚了，错过时间就可惜了。所以，第一，要给他们受教育、学习专业的机会；第二要给他们一个涌现的机会。我们在干部路线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不通过涌现的办法发现干部，使用干部。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条值得我们学习，有的人也没有什么资格，反正你干得好就可以晋升。现在我们经济改革需要大批经济人才，需要大批会搞联合、会搞行业工作的人才。把这批人从机关里抽出来训练以后，撒出去，到下边去搞企业联合，参加行业组织的筹备工作。干事也好，科长也好，只要搞得不好，就当经理、总经理，就当协会的会长、副会长、高级顾问。我们很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一个涌现的机会。我过去同国家经委讲过这个事，由他们规划一下，现在看来不要等，给各部门打个招呼，都可以按这个路子去搞。至于行业组织怎样搞，安排一个会议，范围可以广一些，请经委邱纯甫同志介绍，看外国那么多资本主义企业是怎样联合起来组织行业公会的。我们要么就是统得死死的，要么就是下边一放活，就没有什么办法去调整、协调。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一套办法，我们对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套生产、经营管理形式和办法太生疏了，现在需要学习。

另外，专门说一下认真处理人大提案的问题。在这一次人大和下一次人大会议之间，国务院和各部门要把处理人大提案的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而且要落实到计划和工作安排上。绝不能采取人大会议开完就算了，等到下一次人大要开了，才匆匆忙忙搞个东西去应付。应当把落实和处理人大提案的问题，作为两次人大会议之间的经常工作，一年要抓几次，检查几次。这件事由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对待人大提案的

认识和态度，都得有所变化，要使提案成为改进和推动政府工作的动力，不能像过去那个样子。

我就说这么六件事。这六件事是影响到各方面的，至于日常工作，那就由各个部门的同志去安排了。

注 释

1. 杜润生(1913-2015)，山西太谷人。曾任太行六分区专员，太行行署副主任，中共中原局、华中局、中南局秘书长，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办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2. 杜星垣(1914-2011)，福建霞浦人。曾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广州市委副书记，一机部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3. 邱纯甫(1915-2005)，江苏丹阳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办公室主任，冶金工业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太原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河北省冶金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兼进出口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国家计委顾问，中国包装总公司董事长，中国包装技术协会会长。

4. 万金油，即清凉油，由华人富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在20世纪初制售的“虎标万金油”而得名，是用薄荷脑、樟脑、桂皮油、丁香油、桉叶油等加石蜡制成的膏状外用药物，可治头痛、轻微烫伤等，应用范围很广，但不能治大病。人们常以此比喻什么都能做，但什么都不擅长的人。

关于编制长远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设想*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

主席、副主席并耀邦同志：

关于长远规划，原来准备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十年建设的方针性文件；然后，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十年建设的规划纲要。

第一件事，正在进行。预计在十二大以前，把一些重大的方针问题理出一个头绪来，是可能的。

第二件事，受到几个因素制约：一，统计资料不全，也不够准确；二，我们的计划水平不高；三，目前正处在调整时期，很多问题还看不清楚。要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前编制规划纲要，要求似乎高了。

我考虑，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以前，可否不搞十年建设规划纲要，而是搞一个十年建设轮廓设想。不是规划，而是一种设想，一种预测。内容也可以跳出过去的框框，搞得粗一些，主要是对十年内应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经济建设问题、科技文教建设问题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做一些综合研究。其中，许多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采取哪些措施，可以不是提一种设想，而是提两种以至多种设想，留待在实践中检验。

明年是“六五”的第一年。要着重搞好五年计划。对五年计划的要求，要详细一些，准确一些。过去搞过五次五年计划。“一五”比较好，顺利

* 这是赵紫阳给中央领导人的一封信。

地完成了。“二五”以后的历次五年计划，都没有真正起作用，往往是越搞距离越大，最后只好撇在一边。这样，实际上等于只有年度计划，而没有中期计划，使年度计划失去指导。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建议，今后采取五年滚动计划。例如，明年搞八一年到八五年的计划；到后年，去掉一年，加上一年，顺延为八二年到八六年的计划。这样，可以根据上一年的实绩和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既利于落实当年的计划，也利于始终保持一定的预见。这样，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我们计划工作的水平。

上述这个想法，我已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各部长均参加）提出，征求大家的意见。

这一设想，是否可行，请批示。

赵紫阳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

处理好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次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分析经济形势，研究经济工作应当采取的方针和重大措施。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经济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是一个讨论稿，经过这次会议讨论修改，然后报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审批。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进一步讨论明年计划，感到经济工作上有些重大问题需要提出来研究，有必要请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来共同商议。这次会议和计划会议衔接起来开。先讨论国务院的这个文件，最后也要拿一段时间把明年计划议一下；至于具体问题，由下一段的计划会议去讨论。国务院文件写了十二条，我不一一讲了，只就我认为需要统一思想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讲一些意见。现在讲以下六个问题：

一、在大好的形势下必须看到潜在的危險

当前的整个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形势是大好的，但是有着潜在的危險。搞得好，大好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搞不好，就要出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形势大好这一点，姚依林同志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已经讲了，这是事实，有很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首先农业的情况是好的。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以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直辖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上的讲话。

下去后，可以说是非常灵。今年虽然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但农村基本是稳定的，直到现在粮价还是比较平稳。前不久，我到河北受灾的易县，那里自由市场的苞谷一角五分一斤。至于安新，就是白洋淀那个地方，粮食没有减产，苞谷一角四分一斤。由于我们的政策放活了，有相当一些地方，粮食虽然受灾减产，但多种经营收入不减，或者减得少。今年这么严重的天灾，农村的形势还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提出，要把农民这头稳住。现在看，农村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工厂工人也是高兴的。大多数职工的工资、奖金等收入有了增加，生活也有了改善。最近三年合计，社会购买力增加了七百七十亿元（过去二十年来，平均每年只增加五十亿元）。除去物价上涨的因素，大多数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还是增加不少的，生活都有相当的改善。现在购买手表、电视机等高档商品、中档商品的人多起来了。工业生产这两年继续增长的，去年增长8.5%，今年预计增长8%左右。这些都是在能源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取得的。城乡市场比较活跃，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头十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15.8%。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今年头十个月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4%。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势头是好的。

但是，从整体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我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并没有扭转过来，而且还潜伏着一种危险。危险在什么地方呢？从局部看，从眼前看，不太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加以分析，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所谓危险，所谓被动局面并未扭转过来，反映在很多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就财政来说，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于是财政就发生赤字，货币投放量增加，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看来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去年财政赤字是170亿元，今年财政赤字实际上可能还是在170亿元左右（财政上算是110亿元，另有60亿元由银行负担）。明年财政赤字原来测算为50亿元，现在看来要是没有有力措施，还可能同今年的数字差不多，而且后年还会有赤字。如果连续几年有这么多的赤字，我国的经济就可能出大问题。去年银行增发了56亿元票子，今年又要发70亿元票子，明年如果不采取措施，还可能发90亿元票子，这样三年累计就要多发票子200多亿元，相当于一九七八年以前的全部货币发行量。而且，

外汇也出现了不小的逆差。这样下去，通货膨胀，物价就会大幅度上涨，经济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由于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所增加的收入，工人由于提级和发奖金所增加的收入，都可能重新失掉。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由于没有奖金，实际生活水平更将严重下降。这种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局势也就不能稳定。东欧有的国家，就是因为基本建设摊子大，积累率高，消费也高，维持不了，就靠多发票子，多借外债，最后导致群众起来闹事，出大乱子。

第二，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了我们国力的可能。这几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压缩下来，而且越来越大，有控制不住之势。同时，基本建设内部也存在着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长线产品的项目多，短线产品的项目少；加工工业项目很多，能源、交通很薄弱。我们国家经济的根本情况是，能源和交通满足不了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的要求，卡脖子就卡在这里。现在的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不足，有相当一部分是闲置的。因此，从当前看，工业主要不是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能源、交通严重不相适应的问题。但现在基本建设中这些项目上不去，而加工工业项目、消耗能源多的项目还在大量增加，这里搞起来挤那里，那里搞起来挤这里，新厂挤老厂，小的挤大的。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就会长期打消耗战，甚至使整个经济长期徘徊不前，谈不上有什么速度。

以上这些问题，不是一时造成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全局不稳，改善人民生活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下决心抓好调整，退够，并且尽量退得好一些。

当前很需要把经济形势好好地分析一下，弄清在大好形势下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各地和各部门的同志由于所处的地位，对全局性的问题不大容易看清楚。我们前一个时期也不是现在这样看的。促使我们认识这一点，倒是最近三件事起了作用：一是农业受灾，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二是石油明年预计要下降五百万吨；三是今年财政赤字比原来的预计增加了几十亿元。在讨论明年计划时碰到这三个情况，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重新研究，一研究就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今年没有这三条，可能一年以后，至少是几个月以后，才能看到这个问题。我们整个经济潜藏着的危机，不

仅仅是明年原油下降五百万吨，今年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和财政多了几十亿元赤字，问题比这还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同志们不加掩饰地、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来，共同研究，以便求得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各省市、各部门的同志对形势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很有必要，这是我们统一步调，战胜困难，发展大好形势的前提。

二、我们的方针是狠抓调整，稳定经济

在经济工作上，总的讲是要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当前经济情况的实际出发，明年要突出地抓调整，抓经济的稳定。我们要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避免前面所讲的可能出现的危险，关键在于搞好调整。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抓好调整，才能根本扭转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最近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现在退得不够，要退够。看来这两年吃亏就吃在这里。这两年由于没有像一九六一、六二年那样退够，调整的决心不大，局面没有改变过来。一九六二年那时退够了，工人回乡两千万，停了很多小高炉，等等，虽然当时损失很大，但国民经济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从当前经济情况看，只有搞好调整，坚决退够，才能很快见效，取得主动。

第二，只有抓好调整，才能为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创造必要的条件。总的讲，调整 and 改革要结合进行，不能等完全把调整搞好了再改革，但改革要有利于当前的调整。现在如果不狠抓调整，不用很大力量解决经济失调的问题，只是把企业搞活，那也不巩固。只有国家在宏观经济上抓调整，同时又在微观经济上尽量搞活一些，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只有抓好调整，才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好调整，稳定经济，是使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也是保证政治局势稳定的一个关键。

前一段我们对调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该退的没有退够，还有些该退的没有退。现在看来，该退的不但必须退，而且必须退够。明年

整个经济工作要以调整为中心来进行安排，再不允许对调整采取抵制的态度，采取阳奉阴违、敷衍应付的态度。考虑地方、部门的利益，一定要把位置摆恰当，要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从整体利益出发。如果国民经济这个整体搞不好，全局出了问题，覆巢之下无完卵，哪个部门、哪个地方也好不了。只有在全局稳定的情况下，才能有部门和地方的利益。

总之，为了扭转全局的被动，防止整个经济出现大的问题，就需要坚决地、认真地抓调整，抓稳定。稳定经济，对明年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财政赤字无论如何要控制在五十亿元以内。二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明年发票子一定要控制在三十亿元以内，一定不能多发。这样，人民生活才能基本稳定。当然，做到这一步，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赤字还有五十亿元，总是不稳定的因素。因此要多想一点办法，各方面的开支都要紧缩。

抓好调整，稳定经济，还必须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上加强计划调节。要把国家在宏观经济上的计划调节，同充分调动基层生产经营单位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应当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很重要的。只是这样还不行，必要时还应采取一些行政的办法，指令的办法，规定哪些准许搞，哪些不准搞。当前我们讲在宏观经济上国家干预，就是要解决文件上说的四条：一是切不可在改革中使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二是切不可使加工工业的发展失去控制；三是切不可使工资福利的增长失去控制；四是切不可使物价的变动和外汇的收支失去控制。加强计划调节和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要解决这四个控制。

我们今后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在处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上，我看就是“牵牛鼻”和“放牛腿”的关系。不是用很多绳子把牛腿捆住，而是要把牛放开走，同时又必须牵住牛鼻子加以引导，让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在宏观经济方面，国家的计划调节和干预，包括运用经济杠杆、行政手段、组织协调等方面。日前讲宏观经济的控制，是不是同改革有矛盾，或者说改革就不搞了？不是。恰恰相反，在经济工作上，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调节和国家干预，和在微观经济上把它搞活，使二者结合起来，这正是我们改革的方向。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要研究如何

在宏观经济方面发挥计划的调节作用，而在微观经济方面调动各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不同于苏联的模式，也不同于南斯拉夫，更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要把调整 and 改革，把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微观经济的放活结合起来，使改革有利于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

三、突出地抓压缩基本建设和搞好关停并转

解决积累和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途径，除了要增加国民收入以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压积累，基建投资占了积累的相当一部分，因此压积累首先要压基建。二是适当控制消费。过去两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工资，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应当说尽了很大的努力。这对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是很必要的，不如此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形势。但这是属于偿还多年欠账的性质。在调整的这几年内，不可能继续再迈这样大的步子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人民生活的提高，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建设要量力而行，消费也要量力而行，不能开大口子，不能乱许愿。在当前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做到的应当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尽量去做，但二十多年的欠账，都想在几年还清，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喊叫也解决不了。我们切忌把群众的思想引导到这方面来。

这次调整最重要、也很难做的，第一是压缩基本建设；第二是关停并转，就是下马。当然，不是统统下马，有的下，有的还要保。没有这两条，被动局面就扭转不过来。这是一九六一、六二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这次会议可不是大上的会议，而是一个停缓的会议，关停并转的会议。抓好这两条，我们的经济才能稳定，才有希望。

当前调整的关键是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明年基本建设的总规模要大大压缩，同时该上的如能源、交通等还要有计划地上一些。钱就这么多，所以要下很大决心，多停建、缓建一批项目，以便能够上一些急需的项目。这么办虽然要受一些损失，但这个损失比长期打消耗战要小得多。要把那些效果差、耗能多的项目，特别是那些生产能力有余的“长线”，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停下来。文件中说，要打破部门、地区界限，大中型项目由综

合部门直接安排，不再采取这个部门给两个亿，那个部门给一个亿的办法。基建投资的分配，不受原来行业之间投资比例的限制。中央的基建投资不再分下去，要高度集中，真正合理使用，按项目直接安排。

压基本建设不光是压小的，压地方的。这次国务院对 22 个引进项目动了手术，大力压缩。许多项目停建后，引进的设备要封存。这些封存的设备要尽量检验好、保管好，当然也难免有损坏，但权衡利害得失，总比长期背包袱，把整个国民经济拖垮要好得多。中央的项目，该下马的，中央下决心。地方的项目，该下马的，地方也必须下决心。为了稳定全局，必须坚决动“手术”，把包袱甩掉。当然要尽一切努力，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调整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切实搞好关停并转。当前能源不够，原料不够，不能供应大大小小那么多工厂。在生产上，必须关停并转一些工厂。现在各地盲目生产、重复生产的问题很大，办起的工厂许多是无米之炊。例如，全国已拥有棉纺 1660 万锭，本来就吃不饱，全部开动尚缺棉花二千万担。但近两年来在产棉区又新建了不少棉纺厂，在建规模达 300 万个锭子。全国县以上酒厂原来有 1500 多个，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据 17 个省市的统计，就办起小酒厂 12000 个。全国计划内的卷烟厂 83 个，年产能力 1500 万箱，完全可以吃掉全国的烟叶。去年以来各地又办起小烟厂 100 多个，形成了小挤大，落后挤先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这些做法，只能加重我们的困难。所以要下决心，把那些没有原料、没有能源、消耗大、产品质量差，严重亏损的企业关掉。关掉以后，工人养起来，搞培训。这个问题，要相应采取一些经济政策。小厂原料消耗高、亏损大，大厂没原料开工，干脆把小厂关了，把原料拨给大厂，由大厂给他分一点产品，或给一些补偿，这样对全局有利。比如四川、贵州，还有云南，天然气很紧张，大的化肥厂吃不饱，小化肥厂还在大量消耗，干脆停一些小厂，把天然气调出来给大厂，原来生产碳氨的调给他一些尿素，在经济利益上进行一些调剂。我看很多厂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涉及中央各部和地方的关系的，由国家计委加以调整；涉及省和县的关系，由各省加以解决。关停并转工作，要同工业的改组、搞专业化协作，同发展经济联合结合起来。对关停并转的企业，要注意善后工作，处理好遗留问题，避免发生混乱。

以上两条，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下决心做好了，就能取得主动。全局主动了，各地也才会真正掌握主动。

四、把分散的资金和现有的原料使用好

在调整中，我们有个很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尤其是中央财政每年增加有限，用于支付每年必要增加的消费基金就所剩无几了。重要的是要把国内分散的资金使用好，发挥它的效益。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分灶吃饭以后，地方和企业的资金逐渐多起来了。这点和以前不同。地方有了一点钱，企业手里也有了一点钱，这是好事。但如果用得不当，也可能出问题，甚至出相当严重的问题。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资金渠道多，很分散，使用很不合理。前面已经讲了，各地资金用于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铺摊子的现象很严重，盲目性很大。因此，文件中讲了今后中央和地方的投资要有个适当分工。现在中央财政有赤字，从地方看，多数省区有结余，少数省区也有赤字。算总账地方结余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亿元。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总想搞些有收益的工业。明年中央财政中的基建投资不多，主要搞些能源，搞些交通，还有一些在建项目要续建，没有力量搞别的东西。如果地方的钱不去搞短线，而是搞长线，问题就大了。因为既没有原料，也没有动力，即使把工厂盖起来，将来也开不了工，要开工就得把给别人的原料、动力挤掉，这个地方挤那个地方，新的企业挤老的企业，后进企业挤先进企业，小企业挤大企业，这样弄得缺口很大，大家吃不饱，无论对全局、对长远都很不利。尤其在调整期间，更不能这样干。现在不管谁的钱，都要用在有利于调整的方面，用在搞短线，解决生活的欠账、能源和交通的欠账，用在教育、卫生等这些方面来。

应当认识，从总体上讲，当前工业不是规模小了，而是规模大了，生产能力多了，各方面不能适应。在这种状况下再去新建工厂，就没有效益，就造成浪费。如果地方的钱都用去扩大工业生产能力，不搞短线，不还欠账，就会加重我们的困难，扩大比例失调。所以国务院讨论认为，在这几年之内，地方的钱一般不搞工业。当然能源非搞不可。除此以外，有些小的项目，你那个地方确实很需要，又有能源，也不争原料，而且技术也先

进，也可以搞一点。但从总的投资使用方向上说，不要再去多搞工业。这样我们就能够上上下下同心协力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

把地方的钱用来盖点房子，搞点能源，搞点交通，搞点城市建设、教育卫生，这是不是同搞工业有矛盾？没有矛盾。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下一步更好地去发展工业。我们的工业建设，一条要量力而行，还有一条叫做循序渐进。回顾二十多年来我们搞工业，由于要求过急，不讲循序渐进，光是孤立搞工厂。工厂不是个孤立的东西，它需要很多东西配合，需要“基础结构”，包括各种服务行业。我们许多基本建设项目往往不充分做好前期工作，就急急忙忙地去搞，后来又发展成简易投产，发展成“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许多项目，不考虑各种条件的配合，不考虑能源、交通，也不考虑城市公用设施和生活服务等，总是孤立地去建设。这种作法，是违背建设规律的，结果必然出问题，往往搞起来也不能发挥作用，或者遗留一大堆问题。实践证明是不行的。现在还是搞一些基础结构，搞一些宿舍，搞一些城市建设，以及教育、科学设施等等，为以后的发展作好准备。文件中对地方、企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原则规定。将来还要具体化，详细规定哪些东西在一定时期内就是不能搞。全国明明是长线的，尽管在某个地方、某个部门是短线，也不能搞。

除了上面讲的各地的资金要用之于调整的需要以外，国家还准备想办法集中一批分散的资金用于关键的项目上。地方、企业的资金，是谁的还是归谁所有，这条政策不变。不能又把地方、企业挤得干干的，统统拿到中央来，走回头路。但是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正确地、适当地集中使用好多种渠道的资金。国家明年准备发行国库券五十亿元，专门征集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的资金，采取认购，也就是分摊的办法，给一定的利息，连续搞几年到十年，主要用于能源建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用这个办法，南斯拉夫也是如此。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办法，就是说钱是你的，但是你得买一些国库券。我们承认各地方各企业的合法利益，让大家发挥积极性，多增加收入，同时要求大家买一些国库券，使国家能够把资金适当集中一些。除此之外，还要搞计划协调，将来有些项目，虽然是用你的钱，但政府可以组织地方和企业在一起讨论，搞什么，不搞什么，进行协调，也可以组织经济联合，再加上前面讲的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通过这几条，把分散的资金使用得合理一些。

原料问题。当前我们原料的增长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为了把现有的原料使用好，真正提高经济效果，国务院讨论时提出要保上海、保天津，要保其他历来的轻工业基地。各个省各个地区也有自己的轻工业基地，也必须保。各个原料产区必须按计划完成调拨任务，这要立法，要正式发布命令。只有保证完成计划调拨任务以后，其余的部分，才能到条件好的地方去搞来料加工或搞合营，可以分产品，也可以分利润，但不能另起炉灶建新厂。当然，将来农业发展了，原料多了，加工能力不够时，可以逐步搞些农工商联合企业，搞些地方工业。

现在，各地都在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个方针是正确的。至于在当前条件下如何实施这个方针，那就不能离开我们国家经济结构的现状，不能离开全局。地方发挥优势，也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改变经济结构不是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的，否则就会带来混乱。我在四川讲过，四川就是“第三世界”，你不可能一下改变过来，就要承认上海是“第一世界”，同它搞协作，搞互利。“第三世界”要采取和“第一世界”合作的方法，或者和“第二世界”合作的方法。一下子把自己变成“第一世界”，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全国原来形成的这种经济结构，只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改善。比如说，今后哪一类厂子不要在上海搞了，作些这样的规定是对的。今后有多余的电力、原料，应当由原料产区去搞。但不能说现在就要把上海的厂子关起来，由你去搞。上海的技术比较好一些，生产效率比较高一些，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一些，在你这里搞又多花了一套设备的投资，经济效果也不好，这种重复建设是极大的浪费。轻纺工业要发展，主要也不是要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把低级产品变为高级产品，消耗大的变为消耗少的，价廉物美，适销对路。这才是发展轻工的正确办法。轻工贷款今年二十亿元，有相当部分是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这种作法要改进。加强轻工也有一个如何做的问题。总之，今后各部门、各地方都一定不要再去扩大比例失调。

顺便讲一下发展社队企业、农工商企业的问题。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也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去搞。一哄而起，遍地开花，也会带来很大困难。搞不好，就把很多原料消耗掉了。本来这些原料可以制成较好的产品，但结果制成比较差的产品，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社队要富起来，就要

真正增加社会财富，而不应着眼于社会财富的转移。财富不增加，只转移，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富起来，因为这是个分配的问题。社队企业和农工商联合企业，都应注意克服盲目性。社队企业在能源、材料、产、供、销等方面都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社队企业占用土地也很随便，这也是个大问题。现在城市郊区菜地被占用很多，最近不少城市蔬菜供应紧张，除了气候、政策方面的问题外，还与近几年郊区盲目搞加工、搞产品扩散有很大关系，有些社队不愿种菜，把许多劳动力调去搞机械加工。大中城市都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郊区历来种菜的社队，应当主要种菜，保证城市供应，而不要盲目安排搞加工工业。社队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都应注意整顿提高，把基础打好，稳步前进。

五、关于明年的计划和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

完成一九八一年的计划很艰巨。明年要压基建，原油又要减少，国民经济还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主要抓几条：一是力争明年农业丰收，这在文件上已经有了。夺取农业丰收，看来主要还是靠政策，特别是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二是采取切实措施发展轻纺工业，增加消费品生产。这是在能源困难的情况下要保持一定速度的一个主要措施，因为轻纺工业消耗能源少一些。同时，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也是明年活跃市场、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各级政府对轻纺工业要当成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来抓。要把一部分进口各种设备的外汇，转为进口原料和某些零部件，生产一些市场急需的高档消费品。明年重工业的比重要减少一些，钢铁要比今年指标每年增长4%—5%就不得了。而我们每年增长7%—8%，人民生活却不能改善。这说明，尽管我生产增长的速度不算低，但经济效果不好，突出地表现在一是生产上消耗大，效益差，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少；二是基本建设上投资效果差，浪费大，形成的生产能力小。国民经济说起来增长了多少多少，但不少是虚假的，有些产品有“产值”而没有使用价值，没有成为有用的、社会所需要的财富，没有成为真正可分配的国民收入。这种状况暴露了整个经济建设的效益很差，人民付出了代价，但得不到应

有的好处。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速度不那么高，但是国民收入、社会财富的情况比较好，经济效益比较高。我们应当研究今后走这条路子。我看这是可能的。

第一，靠挖潜。今后除了能源、交通和特别重要的项目外，主要依靠原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搞好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而不再去多铺新摊子。

第二，靠提高质量。今后各种产品要提高质量，而消耗并不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同样一个产品，消耗的能源、材料差不多，但由于低档变中档，中档变高档，净产值就会增多。这样，虽然本身消耗并不那么多，但是速度出来了。这样的国民收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假的，是真正可分配的收入。

第三，靠讲求效益。要加强经营管理，减少浪费，使整个经济建设的经济效益提高，用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好的效果。工业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我们不能光靠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来解决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而必须靠科学技术，发挥科学作为生产力的作用。首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考虑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任务和部署问题。这样，我们将来的速度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经济效益却比较好。

以上几条抓好了，不一定要搞大量的基本建设，不一定要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国民经济也会有一定速度的，而且效益会更好些。我认为，我们应当走这条路，有可能走这条路。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开创一条路子。

六、关于经济宣传问题

这个问题在文件上写了一段。前一段经济宣传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前经济宣传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左”的路线、“左”的思想、“左”的政策，消除其影响。在批判“左”的错误中，有几个问题要注意。

第一，对中国的三十年究竟怎么看？讲错误多得很，讲失误多得很，作为批判“左”的错误，可以揭发很多严重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错误，我

国的情况会好得多。就是有这么多问题，我们三十年是不是漆黑一团？不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不能简单地拿欧洲、美国、日本同我国类比，他们的情况跟我们根本不同。他们在什么基础上，搞了多少年？最近接待了一些外国总统、总理，他们对我们都有个好的看法。他们到中国来，看到中国确实很穷，但又都说，看起来从农村到城市，中国人还是满健康的。最近世界银行有些人到陕西，这是我国比较穷的地方，他们参观后认为，第一确实你们很穷，第二比印度还好得多。虽然我们国民收入平均很少，但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在分配上的差别不是太大。有一些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国民收入跟我们差不多，平均每人250美元左右，甚至比我们高，每人平均400、500美元，他们的社会问题就严重得多。我到过一个亚洲国家的大城市，你一进这个城市，大概像我们解放前的上海那样，一边是高楼大厦，花天酒地；一边是大面积的贫民窟，那个贫民窟很难设想是个什么样子。在沙滩上面用一些塑料纸盖起来，下边就是一片席子，又热又臭。繁华的大街上，只要红灯一出现，车子一停，就有很多小孩子冲过来，给你擦车，向你借钱。我们中国的情况比这好多了。外国对我们也有一种说法，你们三十年尽管有很多教训，但还是有成绩的。十亿人口的国家，你们的成绩很大。不要小看这十亿人口，十亿人口就是不好办。十亿人口的国家世界上就这么一个，五亿人口以上国家，全世界只有两个，印度并不比我们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们肯定建设得比印度好得多。所以现在要来总结经验教训，作为我们今后的借鉴。我们确实犯过很多错误，受过很多折腾，造成很大损失，但是总的要看到，三十年来中国并不是搞得一塌糊涂，还是有很大成绩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还讲什么要有信心，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年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不能闭着眼睛看不到这个事实。当然有一些人没有提高，有些人还降低了，但大多数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确实还有很多问题，物价啦，房子啦，等等。这几年国家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三年，全国四分之三左右的职工升级。许多企业实行了奖励制度，加上岗位津贴，再加上有两千万人就业，大多数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国家统计局用抽样的办法，对八万六千户职工家属生活费用作了调查。

平均每个被调查的职工的收入，包括经常性收入和一次性收入在内，每月为六十三元。平均每一就业者赡养 1.8 人（包括职工本人在内）。就这些职工家庭的全部成员来说，平均每人每月收入达到三十五元八角。当然并不平衡，有差距。每人每月生活费达到五十元以上的户占 9.3%，这是高水平的。收入在 15 元以下的户占 2.1%，他们的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现在，一般说，党政机关、科技、文教、卫生等部门的职工困难比较多一些。真正直接在工厂的工人，这两年收入有增加。农村也是一样，农民收入也增加了。所以，我们不要光讲欠账，还要讲这两年花了很大力量还老账。从国家的财力来看，做到这一步是尽了很大力量，再过多要求是不可能的。

第三，揭露矛盾，讲存在什么问题，一定要考虑我们现在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如果当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天天去讲，要求解决，那等于开空头支票。比如城市污染的确很严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有些是能够解决的，有些由于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一时是解决不了的。对于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天天宣传，讲了后，又怎么办？人民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许多困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要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当关心群众生活，但要扎扎实实做工作，而不能空口许愿。

经济宣传，我今天就讲这么三条。在批判“左”的错误中，同时要注意三点。第一，三十年不是一塌糊涂。第二，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收入还是增加的，人民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是事实。当然也有一些人没有改善，物价也有提高。第三，不要宣传一些近期不能解决的矛盾。这就是说在经济宣传上必须围绕着调整 and 稳定经济来宣传，不能离开调整 and 稳定来讲这些问题。调整时期要多宣传同心同德，克服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讲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如果不全面讲，就会造成问题很容易解决的错觉，结果你又不能解决，致使群众失去信心。

刹住乱涨价滥发奖金的歪风*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找北京市的同志来谈谈物价问题。物价上涨，北京的反映比较突出。群众议论的问题，一个是特殊化，一个是物价，更集中的是物价。现在是管不住，管不好，我担心明年春节，可能大幅度上涨，很可能出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应用主要力量抓物价，把涨价风刹住。刹涨价风，北京要带头。要有加强管理的办法，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国务院要直接抓一下北京。

物价很可能牵动奖金，真正是超额劳动的奖金，要保护，要保护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但不能为了得奖转嫁负担。奖金要控制，超额劳动可以发奖，现在有的不是，而是转嫁负担。这样发奖金，人家不满意。奖金要整顿。不搞运动，但要雷厉风行。我主张市委、市政府要拿出很大力量来抓。典型的要处理一些人，当然也要保护工人的积极性。奖金必须整顿，要是只对超额劳动发奖金，就没有危险。但是，很多不是超额劳动的也发奖金。结果奖金发得多了，很多群众不满意。正当的，不超过两个半月的奖金，还要发。滥发奖金，就会转嫁负担。很多好东西，一开始就把路子走歪了。我们不搞运动，要组织力量检查整顿，不准走邪路。

物价问题，奖金问题，你们研究一下，我们也要研究。

* 这是赵紫阳在一次研究北京市物价问题座谈会上的谈话。姚依林、刘卓甫、王磊、薛暮桥、林乎加和北京市财办、物价局的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关于议价问题，或是恢复派购，或者严格管理。过去想恢复派购，但管死了也不行。议价价格上涨，主要是各地国营商业、供销社和集体企业到主产区抬价抢购造成的，只要加强管理，是可以管住的。可以把产地价格涨一点，直接运到销地，减少中间环节，销地的价格可以不涨或少涨。对于长途贩运，得有个说法。现在农民出去经商的很多，农民反映很大。滥涨价，变相涨价的问题，能不能管住？对集市贸易、农贸市场，要加强管理。

当前物价只准降不准涨。议价不准超过现在水平，可以规定最高限价。

经济工作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下 解放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刚才依林同志讲了国务院提出的初步盘子，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因为还要开第一书记会议，我们这个会议可以结束了。昨天上午国务院开了常务会议，提出在会议结束时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要打个招呼。

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退够。国务院提出的初步盘子还很粗，仅仅是看水平够不够，基建投资三百二十亿元，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什么情况，请常委考虑这样行不行。现在常委不是认为退多了，而是怕退得不扎实。三百二十亿元可能还要往下退，大体上只会下不会上，只会少不会多。同志们可以把这个精神带回去。

我们原来考虑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无论如何不能爆发危机，再是这次调整总要考虑以后的速度，特别是能源、交通。现在看来，这种两全其美的想法不好，容易影响克服面临危机的决心，不能考虑那么多，退三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要解决经济工作中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彻底地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做不到的事不要勉强去做。要按照常委的指示精神，坚决退够，做到平衡，不爆发危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解放思想。首先要考虑退够，把盘子定下来，放在退够的基础上，然后再考虑怎样退得好一些。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我们的认识，可能还没有完全反映真实情况，还要仔细研究。我们只会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把问题讲严重了，过头了，还是我们认识够不够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二十多年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带来的严重问题认识不够。我们现在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在经济工作方面，计划工作方面，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从“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

二、调整要强调集中统一。根据过去的经验，克服困难，必须讲集中统一。当然，不是什么都由中央统得死死的，主要是指关系全局的大的方面，即在调整方面扭转经济工作被动情况的重大措施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至于生产上、流通上必须搞活的还要搞活。一方面要承认企业、经济单位和地方的权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在大的调整措施上保证中央和主管部门能够指挥得动。现在想来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集中统一：一是重大方针政策和带全国性的措施；二是基本建设总规模，哪些可以搞，哪些不可以搞；三是重要物资，包括主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只有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之后，各地才能自己处理；四是财政税收，财政纪律要集中；五是对外贸必须坚持统一对外。现在讲集中统一，不赞成笼统回到过去那样搞死。集中统一是有利于在一些扭转国民经济被动局面的重大的调整措施上能够有很高的效率。

三、关于调整 and 改革问题。三中全会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但仅仅是开始。我们经济工作的弊病集中表现在经济效果差，根本的问题是要进行改革。改革要坚定不移。当前的问题，一是我们目前正处在大调整时期，调整是关键，是中心，是决定全局的，因此改革只能在调整中进行，步子不能迈得太大。有一些可能影响调整的改革要往后放，如价格体系的改革，就要往后放。当然不是一点不改。再是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总之，改革要采取一系列过渡的措施办法，而不是一下全改。

扩大企业自主权、市场调节，也是在困难情况下把企业搞活、提高效益的重大措施，也是有利于调整的。这次调整不同于一九六二年的是，在调整中要把经济搞活，把企业搞活，增加商品。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原来设想明年全面铺开。现在可以有三种方案：一是全面铺开；二是继续搞

好六千个试点企业，不全面铺开；三是在继续搞好六千个试点企业的基础上，对面上的其他企业实行财务包干。哪个方案好，请大家研究。

发挥优势的方针是对的。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为了避免搞大而全、小而全。现在看，各地方发挥优势，一是不能离开全国的全局，二是只能逐步进行。因为涉及经济结构改组的问题，不能变动得太大太快。发挥优势要按这个来搞。

奖金问题，总的讲，这两年企业搞奖金，对调动职工积极性、改善职工生活起了好的作用，大部分是发得合理的，但确有一部分不合理或很不合理。今后奖金制度要继续实行，超额劳动必须给予奖励，而滥发奖金则必须制止。明年要搞个文件。

四、几件紧急的事情请各地抓一下：

1. 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
2. 紧缩基本建设支出。
3. 制止对森林乱砍滥伐。

关于制止破坏山林的紧急通知稿，大家提的意见比较多。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来修改森林法；一是现在先发个紧急通知，规定几条，先把乱砍滥伐制止住。第一，所有采伐都要纳入计划，凡是超过国家计划的一律停止采伐。第二，议价要改，要规定个比例，比如木材议价不得超过生产计划的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议价价格的幅度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三，木材不能开放自由市场，非林区群众自有的木材进入市场要经过一定机关的批准。第四，机关、团体、部队不得到林区和市场采购木材。其他问题将来修改森林法再解决。

制止破坏山林不能再拖了，不要等国务院通知，各地能采取什么措施就采取什么措施。

五、增产节约。解决当前困难，一是要退，一是要增产节约。首先要把轻纺工业搞上去，供应市场，回笼货币。一九六二年时靠高价商品，现在要靠生产大批适销对路的商品，包括高档商品。除此以外，要清仓。外贸、物资、商业都要清仓。基本建设下马后多出来的建筑材料要多供应农村。

明年工业生产要与调整 and 改革相结合，要狠抓企业整顿和改组，提高

经济效果。要改善经营，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我们不仅要通过竞争来促进企业的联合，还要通过调整来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

要节约能源。明年能源投资不可能增加，甚至要减少，今后几年也不可能多增加。因此节约能源更加重要，要想各种办法节约能源。

军工生产的产品，要进一步抓好，要纳入各级计划。军工搞民品，各级都要统一协调一下。

六、粮食问题，绝不能放松。我们一年进口一千多万吨粮食，把经济作物搞活，这个方针是对的。过去讲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是不对的。但我们国家要进口更多的粮食是不可能的。现在进口一点粮食，主要是为了把棉花和糖搞起来，减少进口。各地不能因为要致富、要增加收入、要发展多种经济作物，而要求减少粮食上调量或增加调入。各地调整作物布局，不能建立在减少粮田和要求国家增加供应的基础上。我们发展经济作物要靠开发荒山荒地，不能靠减少粮田。各地要控制减少粮田的趋势，想方设法增产粮食。

这次会后，从国务院开始到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组织大批干部下去，搞三件事：一是压缩清理基本建设，二是清仓压缩库存，三是检查物价。各级领导要带头下去抓调整，各级政府要组织力量，重点抓调整。

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陈云同志的讲话，分析了经济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经济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他讲的十四条，都贯穿着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精神。照这些原则去办，对于我们渡过困难，使经济建设走上正确的轨道，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讨论明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的讲话和陈云同志这次讲话精神，代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国民经济调整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

在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调整工作之后，现在提出从明年起还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这是中央在对当前经济形势作了全面估量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

现在，全国的经济形势很好，但是有潜在的危险。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形势，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经济中还有困难，大家也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对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强调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必要性、紧迫性，对调整的主要政策措施作了系统部署。他特别强调要加强领导，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对于当时全国各地统一认识和行动，全面贯彻落实调整方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普遍感到了。但对于困难的严重性，对于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有些同志还将信将疑。这次经济困难，同六十年代初有很大不同。那次最突出的表现是，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们吃不饱饭，很多人得浮肿病，农村甚至饿死人，商品供应十分紧张，物价上涨很多，当时大家对经济困难都有切身的感受。这一次，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是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得到实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广大农村是稳定的。工业生产在能源几乎没有什么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轻工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较大，加上农副产品供应增多，市场供应情况是比较好的。两年来解决了一千多万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城镇住宅建设的规模也是空前的。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有所改善。经济体制实行初步改革以后，企业和地方有了一些机动财力，增强了经济活力，景况比过去好多了。但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应该说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性。去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今年大约也是一百七十亿元，靠向银行借贷和透支过日子。这两年，银行增发了一百三十亿元的票子，可以说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要引起经济危机的临界点。现在物价上涨，而且商品涨价的面相当大，人民议论纷纷。如果不对经济进行大的调整，明年财政仍然要出现庞大的赤字，银行还要增发大量的票子，其结果必然是物价暴涨，整个经济就可能发生危机。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和职工在经济上得到的好处就会失掉，就会引起很大的不满。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政治局势也难以稳定。对于经济中潜伏着的危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认识得很不够。随着问题的逐步暴露，经过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的讨论，进一步把矛盾摆开，问题的严重性和调整的必要性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造成当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的成因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调。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量十年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

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我们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进口成套设备的规模也搞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这种冒进的错误，加剧了比例关系的失调，更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本来应当成为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个根本转折。但是，这一年多来，我们对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认识不够，党内思想也不一致。在提高城乡人民的消费水平以后，基本建设总规模没有退下来，二十二个大的引进项目该停的没有停，地方和企业又盲目地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国防战备费、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又增加了。这样，在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因此，虽然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中央决定对经济进行一次大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从当前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克服困难，消除潜在的危险，保证经济全局的稳定，逐步地使我们的经济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自觉地进行全面的经济调整，也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摆脱“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真正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各项事业都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使经济的发展同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从而避免今后再次出现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大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大调整，费了五年的时间。那时把困难渡过去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理，经济情况一好转，老的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又继续贯彻执行起来，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以致又一次酿成了比例的严重失调，潜伏着新的经济危险。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且坚持下去。我国的民主革命所以获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几次失败之后摸清了中国的国情，纠正了“左”的错误，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革命道路。全国解放以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多次跌跤子，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

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老是急于求成，老是犯“左”的错误。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把指导方针搞端正，我们就能够较好地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就能够使我国的经济协调地、健康地稳步发展，避免再发生大的折腾。

我想，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否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总的来说形势是很好的，但潜伏着大的危险，只要坚决采取调整措施，危险就可以消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好的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

二、明年经济调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

根据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为了稳定经济，明年的调整工作总的要求是三条：一是基本上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出赤字，而且不给后年留下窟窿。二是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三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

按照这些要求，我们对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期间酝酿的盘子又作了一些调整。当时的方案是，一九八一年的财政收入九百七十六亿元，比今年预计的财政支出少一百四十亿元，为了把收支打平，支出比今年净减九十亿元，另外发五十亿元国库券来弥补收支差额。经过这一段研究，感到这个方案还不踏实。明年发几十亿元国库券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全部要用于弥补今年的赤字，并且后年再要发这么大数量的国库券就困难了，如果发不了，财政又会出现窟窿。因此确定，一九八一年的各项支出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再减少五十亿元，同今年的预计支出相比，净减一百四十亿元，把收支打平。四十亿至五十亿元国库券照发，用于弥补今年财政赤字。发行国库券时，各地方、各部门应尽力多承担些，有条件的个人也可以自愿认购一点，注意不要把企业挤得太狠了。

怎么减？首先减基本建设投资。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由今年的二百四十一亿元减为一百七十亿元，减少七十一亿元。加上地方、部门和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国外到货设备安装工作量以及其它建设，总规模由今年的五百亿元，减为三百亿元。

其次，压缩国防费，压缩行政管理费。国防费由今年的XXX亿元减为XXX亿元，减少XX亿元。行政管理费由六十二亿元减为五十七亿元，减少五亿元。

其他各项支出，有增有减。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有所增加。增减相抵，净减三十七亿元。

这样减下来，当然许多方面困难很大。把许多事业费减下来，把国防战备费减下来，要做艰苦的工作。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下来，大批工程要停建，大量设备要封存，要承担很大的损失。同时，能源、交通的薄弱状况得不到加强，对今后发展会有影响。这些都应当看到，并且向全党说清楚。但是，为了全局的稳定，现在只能也必须这样安排。而且在今后几年内，也不能希望基本建设投资有什么增加，国防战备费和行政费用还要继续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使支出的比例有所降低。

这里说一下明年中央要向地方借用一部分财政收入的问题。明年的财政收支，从全国来看是打平了，但分开中央、地方来看，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赤字，只好要求地方财政节约开支八十亿元左右，借给中央使用。这样做，当然给地方增加了不少困难，有些需要办的事情就不能办了。但是，如果不这样做，中央赤字那么大，日子过不去，又得向银行透支，增发票子，结果还是要转嫁到地方和老百姓身上，其后果更坏。希望地方支持中央渡过困难。

把财政收支搞平衡，银行就可以不再搞财政性发行，这对于稳定物价会起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人民生活要保，对于没有奖金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那一部分职工，明年还要适当加一点工资。城镇的待业人员明年还要继续安排一部分就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购买力还会继续提高。因此，明年社会购买力仍将有较大的增长，市场商品的供需矛盾仍然比较大。这同六十年代初的那次调整不同，那时精减了近两千万职工，财政开支和社会购买力同时大幅度降了下来。现在，要保证物价的稳定，在保证财政、信贷收支平衡的同时，必须下大力量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

明年在生产上，要突出抓农业，抓轻工业，抓节约能源。明年的农业投资要减少，发展农业主要还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看到中央关于农

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巨大作用。在农业内部的结构上，除了以畜牧业、林业为主的县旗和主要经济作物基地以外，要把粮食生产放在第一位，粮食的播种面积不宜再减少。增加经济作物产量，主要靠实行责任制，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要利用一些没有利用的土地，一般来说不能挤占粮田。在抓好农业的同时，要注意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的发展。明年轻工生产增长百分之八的速度，必须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所有轻工企业都要努力降低消耗，提高产品质量，扩大适销对路的中高档产品的比重。钢产量比今年减少四百万吨，腾出燃料动力和运输力保轻工。一切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包括军工企业，都要了解市场的需要，有计划地积极地生产消费品。商业、外贸和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拿出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各行各业都要继续抓紧节油、节电、节煤、节水的工作。

在计划方案确定之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下大力气抓生产。我们所说的退，主要是指基本建设投资要减少，各项开支要压缩，超过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可能的加工工业要控制，过高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但是在生产上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能只看不利因素，而不看到和不利用有利因素。凡是客观条件允许、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生产任务，要坚决完成。把社会需要的、有条件搞上去的生产搞上去，这也是调整的要求。在生产上，要确定两条原则：一不搞高指标；二不允许对有条件实现的指标也不接受，不努力完成。没有完成国家规定指标的，不能享受超产待遇，不能提奖分成。

调整要搞几年？把基本建设退够，消灭财政赤字，明年就要努力做到。但是要把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调整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整个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都要继续进行调整。我们要准备慢，争取快。只要把该退的退够，把脚跟站稳，将来可能前进得更好一些。

三、加强集中统一，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

为了搞好调整，克服当前的困难，避免在后退中发生混乱，必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中央常委在讨论明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时，强调了要集中统一。邓小平同志说，历来解决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

现在强调集中统一，指的是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具体说，有下列几项：

（一）对于中央决定的调整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要集中统一，不能三心二意，不能阳奉阴违，不能顶着不办。

（二）各种渠道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管起来，综合平衡。各省、市、自治区的建设规模和投资方向，要经国家计委审查，由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各部委的基本建设，由国家计委统一安排，不受原来行业之间投资比例的限制。

（三）财政税收制度和重大财政措施要集中统一。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应该上交的税收和利润，不得超越国家规定的权限免税收。

（四）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必须严格遵守信贷管理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非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不得在计划以外增加贷款。各级党政机关不得强令银行增加贷款。

（五）国家规定的重要物资的调拨计划，包括重要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打折扣。轻纺工业的原料，全国要首先保证上海、天津、北京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要保所属轻纺工业集中城市的需要。凡是同大厂争原料、争燃料动力而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厂，要关停并转。

（六）坚决执行国务院十二月七日发出的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业都不得违反。

（七）统一规定发放奖金的条件，严格检查监督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

（八）加强外贸和外汇的管理。外贸体制改革以后，要加强内部协调，统一对外，联合对外，防止互相拆台。对于地方、部门和企业以各种形式向外借款，要规定严格的审批办法和统一管理的制度。

以上八条，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坚决执行。违反者，要追究责任。

搞好调整，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这是大局，是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对地方的利益、部门的利益、企业的利益，应当兼顾，不能忽视，但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服从大局。如果全国的经济不稳，通货膨胀，不论哪个省、哪个单位都要波及，没有例外。我们应当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共同承担困难，战胜困难。这是我们多年来克服困难的有效的经验。上面讲的一些措施，有些是从调整时期的具体情况出发而采取的，有些也是我们进行体制改革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是保证整个经济协调发展所必需的。

现在强调集中统一，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次调整，要汲取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的特点。这就是在加强宏观经济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的改革。实践证明，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经济形势之所以这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否则，就没有今天这个局面，困难还会更大。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同经济体制不合理密切联系的。过去体制的最大的弊病，一个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个是吃大锅饭，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束缚住了，造成经济的僵化，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和弹性。这种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 and 经济活动的效果。因此，在改革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就企业来说，一方面要严格制止它盲目建设和滥发奖金，另一方面对企业应有的权益必须加以保护，不得乱加干预。在调整时期，前一段行之有效的一些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新的改革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具体说来是：

（一）已经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六千多个企业，要继续把试点工作搞好，认真总结经验，使各项办法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再扩大。

（二）面上没有进行试点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基金制度，或者实行财务包干办法。亏损企业减亏增盈的，也应当给予奖励。

（三）少数企业和个别城市，已经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试点的，要继续进行，取得经验，但试点的单位不要搞得太多。

(四) 市场调节, 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继续搞好。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预测和预报工作, 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以减少盲目性。

(五) 继续促进企业的改组和联合。要利用调整的有利时机, 在对企业关停并转中, 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 改组工业, 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 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形成新的生产力。在作法上, 要把自下而上的联合同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协调结合起来。

(六) 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 要按照中央的规定, 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 取得经验, 逐步推广。要搞好企业的民主管理, 所有企业要认真发挥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作用, 发挥工会的作用。

(七) 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 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些改革搞好了, 不仅不会妨碍调整, 而且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有利于调整的进行。当然, 在调整时期, 各项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些改革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 必须搞的, 但同当前调整有矛盾的, 就推迟进行, 如整个价格体系的改革, 近几年内不能搞了。把改革的步子放慢一点, 稳一点, 准一点, 可以使各级领导集中精力抓好调整, 也可以使改革本身健康地进行。调整搞好了, 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

四、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

把基本建设投资减下来, 会不会出现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现在看, 如果不坚决退下来, 不退够, 就要爆发危机, 那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 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当然, 退下来以后,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 经过几年的努力, 把脚跟站稳了, 可以更好地前进。一种是, 工作做得不好, 生产就有可能长期上不去, 甚至出现萎缩的局面。我们要争取前一种可能, 避免后一种可能。关键就在于, 在搞好调整的同时, 能不能使各方面的经济效果有一个大的提高。

长时期以来, 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 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 集中大量的资金建设新厂子, 特别是投资大、工期长的重工业厂子。许多基本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很差, 各项建设之间又互不衔接, 甚至搞了一大批不具备建设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工程, 搞了一

大批已经属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其结果占用的财力物力很多，建设周期拖得很长，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或者建成了也不能正常生产。而对于已经建设起来的老企业，则不用极大的精力把它们经营管理好，不注意它们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致使它们长期陷于高消耗、低质量、产品性能多少年如一日的落后状态。同时，在生产上追求产值，不顾市场需要，产销脱节，造成大量积压。生产的这种落后的、盲目的不合理状态，又造成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紧张，促使再去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规模。这几乎成了一种顽症，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的。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再也不能走这条老路了。我们应当寻找一条新的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多铺新摊子，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会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关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

多年来，在经济工作中形成了一种争投资、争物资，争去以后不问使用是否合理、不问投资效果好坏、不问创造财富多少的坏习气、坏作风。拿经济效果来说，同我们过去曾经达到过的较高水平相比，大体上是，现在两块钱办的事情只相当于过去一块钱办的事情。在工业生产中，按单位产值提供的利税计算，每年国家大约少收入两百多亿元。按单位产值和单位商品零售总额占用的流动资金计算，现在要多占用流动资金几百亿元。过去花三年到五年时间建成投产的项目，现在要花八年到十年。在生产、基建和流通方面浪费之大，是惊人的。对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收效不大。如果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各个经济单位都能把主要精力转到抓经济核算、抓经济效果、抓减少浪费，那我们的经济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我们要抓现有的三十多万个企业，提高其经济效果，把它们的潜力发

挥出来。要做到这一点，空喊不行，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方针上来个转变，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来个转变，而且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具体措施跟上来，包括企业的整顿、企业的改组、技术的改造、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调整的这几年里，我们要抓紧时机下功夫把现有的几十万个企业整顿好建设好，首先是把几千个大中型企业搞好。有几项工作要抓紧进行：

（一）一定要做好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健全责任制，搞好经济核算，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和严格的劳动纪律。

（二）抓关停并转，结合进行企业改组，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

（三）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首先是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要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加强新产品的试制工作，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机械工业要由过去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转到主要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服务。这样做，机械工业就不是没有多少事情干，而是可以大有作为。今后的引进，要大大减少成套设备的进口，主要买技术、买软件，把技术引进和老企业的改造结合起来。

（四）要建立比较正规的职工教育制度，有计划地实行全员培训。

总之，在调整时期，一是要把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调整好，使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二是办好现有企业，提高经济效果。要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们的现有企业在组织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技术水平等方面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在这同时，要加强资源普查、地质勘探、规划设计、方案论证等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为今后必要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今后的基本建设，同样要在提高投资效果上下功夫，用较少的投资、较短的时间，形成较多的有用的生产能力。

我认为，只要这样做了，就不会出现生产长期徘徊的局面，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五、做好这次调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的调整，是经济建设方针的根本转变。它牵动全局，影响到各

个方面。同六十年代的调整相比，现在物质条件比那时好，但工作难度比那时大。因此，需要把全党全民的精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上下一心，全力以赴，务期必胜。

搞好调整，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但进行这么大的调整，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如果动荡不安，这里干扰一下，那里干扰一下，调整就无法进行。现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成堆，社会矛盾很多，而且在调整过程中，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应当注意三条：第一，要引导干部和群众，以大局为重，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它各种问题的解决，必须服从于调整。调整搞好了，经济稳定了，生产发展了，可以为解决其它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在，不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允许妨碍经济调整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第二，我们在调整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步骤上，事先应尽量考虑得周到一些，慎重一些，力求不引发乱子。一旦发生乱子，领导干部必须履行职责，深入群众，做好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第三，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趁调整之机，进行捣乱。对反对党的领导 and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决不能听之任之，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批判。对一切违反宪法破坏法制的活动，必须依法取缔。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使调整得以顺利进行。

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的转变的时期，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重要的在于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保持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一致。邓小平同志讲过，到本世纪末，经过努力，我们也只能达到小康的水平。陈云同志这次着重讲了，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的。某些在国际贸易方面具有或暂时具有特殊条件的小国和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我认为，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这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条。总结过去的经验，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老是犯“左”的错误，搞冒进，受挫折，问题就出在离开了中国的国情。现在搞四化，搞经济建设，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统一到这点上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指望一下就出现什么奇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本事，只

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我们讲解放思想，就是要正视中国的国情，破除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才能在当前的调整工作和以后的经济建设中，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有共同的语言和统一的行动。

实事求是地把国情讲清楚，可以使人民体谅国家的困难，理解我们的方针，增强前进的信心。现在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有些埋怨、失望情绪，其根源也在于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大而穷，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印度和中国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国大党领导，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很可以比较一下。印度独立三十多年了，一九七九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一百六十七美元，粮食按人口平均只有四百一十七斤，而且贫富悬殊。我国的情况比印度好，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如果不是几经折腾，我们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现在，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总结历史经验，从过去的失误中，分清是非，汲取教训。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三十年来，在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并不是一团漆黑；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党和政府在困难的条件下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尽了很大努力的。我们的事业是在不断前进的，悲观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对自己的国情，认识得不够，考虑得不够，也宣传得不够。今后，要把这个问题向干部、群众讲清楚，使大家认识国情，看自己，比人家，办事情，提要求，都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这在调整时期尤为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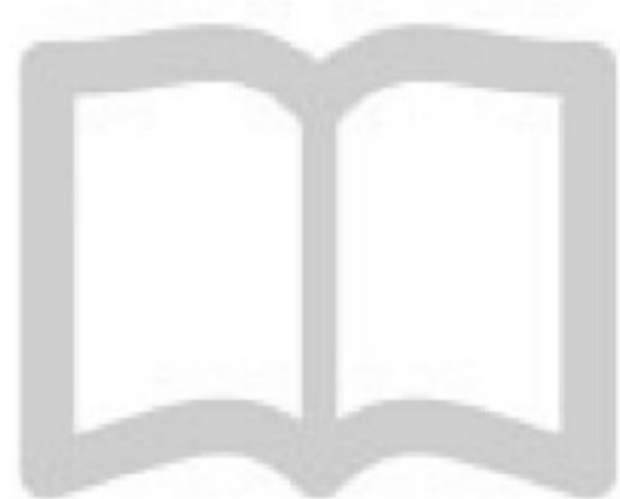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为了领导和组织好这次调整，必须使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次调整，对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对每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考验。我们要在调整过程中，端正党风，改善领导，培养干部，加强党的战斗力。要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与群众同甘共苦，克服特殊化、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必须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的生活，但是必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歪风邪气，不允许涣散党的组织。现在有些干部思想波动，精神不振。有一种说法，“书记等着免，厂长等着选，干部等着减”，反映了这种情绪。各级党委要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所有的老、中、青干部，都振作精神，团结一致，

艰苦奋斗，积极工作，为调整的胜利和国家的中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要通过调整，在党的建设上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这次会议只能把调整的方针、调整的总盘子和一些重大措施定下来，许多具体问题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逐个解决。为了使调整工作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中央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印发一个向干部和群众宣讲的宣传提纲，全面地分析当前的形势，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把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动员起来。根据调整的总的要求，国务院将陆续制订一些具体措施和实施细则，并将组织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带领一批得力干部下去，同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结合在一起，抓基本建设项目的清理，抓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抓清查仓库，抓物价的检查和整顿。要切实抓好下马工程的收尾工作和关停并转企业的善后工作，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发生混乱。要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和检查制度，改变拖拉推诿、无人负责的现象。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提出的办法是否可行，请中央常委和到会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抓好调整 and 改革 努力稳定经济*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

一九八一年元旦到了，我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八〇年刚刚结束。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继续前进的一年。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形势好，主要表现是：通过初步的调整和改革，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把广大基层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经济开始活了。第一，农村通过休养生息，经济开始繁荣，农民这一头基本上稳住了。去年虽然是个重灾之年，南涝北旱，粮食减产三百亿斤左右，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较快，农业总产值预计可以和前年持平。特别是棉花，总产可达五千万担，比前年多收六百四十万担，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第二，工业生产比预期的要好，工业内部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全年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八，其中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四。连续两年，轻工业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重工业。第三，市场商品供应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由于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发放奖金，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因素，使城乡购买力比前年增加三百亿元。过去是许多基本生活资料供应比较紧张，高档商品很少有人问津。现在情况变了。一般消费品基本上能够保证供应，不少中高档消费品供不应求。城市住宅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新建面积预计可以达七千万平方米。第四，民族地区，因地制宜，治穷致富，

* 这是赵紫阳在 1981 年元旦茶话会上的讲话。

方向明确了，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第五，经济体制的改革，迈出了新的一步。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保护竞争，推动联合，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等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发展，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总之，势头很好。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这个很好的形势。

在大好形势下，新的一年怎么办？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召开了省长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经过反复研究，慎重考虑，认为一九八一年在经济工作上，我们的方针是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现在，不是要大上，而是要继续调整；不是进行小的调整，而是要进行大的调整；某些方面不但要继续退，而且要退够。这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的：

从当前的经济情况看，尽管形势很好，但是潜伏着可能爆发的危险。这集中反映在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国家安排的基本建设开支和各种消费开支，超过了财政收入，因而连续几年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一九七九年财政赤字达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财政收入虽然可以基本完成计划，但开支过大，赤字将超过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告中的估计，达到一百几十亿元。这就不得不向银行借贷和透支。两年来，银行已增发一百三十亿元票子。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今年还会有大的赤字，还要再发九十亿元左右的票子。如果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三中全会以来改善人民生活的成果就会丧失，不仅经济不能稳定，也会影响政局的稳定。这是二十多年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当然，不是说现在已经不得了了，而是说，我们应当有冷静的头脑，察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党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治标，而且要治本，准备向人大常委会建议，从根本上进行大的调整，改变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逐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长痛不如短痛，今年就要基本上做到不出赤字，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要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现在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只要坚决采取调整措施，潜在的危险就可以消除，经济工作就可以转向主动，三中全会以来好的形势就可以发展下去。

这次进一步的调整，不是一时的应急之计，而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和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它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底子薄、水平低的大国搞建设，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指望一下就出现什么奇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量力而行，循序而进，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跌跤子，受挫折，就在于离开了中国的国情，指导思想上老是搞冒进，急于求成，犯“左”的错误。这次我们自觉地、清醒地进行全面的调整，就是要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彻底摆脱过去那一套“左”的思想和做法的束缚，真正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站稳脚跟，稳步前进，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避免今后经济上再发生大的折腾，更有利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要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和切实搞好关停并转。今年基本建设的规模要大大压缩，包括一些超出我们国力的大的引进项目在内，都要退够。现在各地重复生产、盲目生产的问题很大。办起的工厂，许多是无米之炊，能源不足，原料不够，于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对那些没有原料、没有能源、消耗大、质量差、亏损严重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国防费、行政费、管理费和其他开支，都要紧缩。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量力而行。要扎扎实实多做工作，不要轻易许愿。当然，对于没有奖金收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的那一部分职工，今年还要适当增加一些工资。压缩基建，关停并转，紧缩开支，虽然要承受一些损失，增加一些困难，但是，从全局看，这样退够，要有利得多，主动得多。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今年准备发行四十亿到五十亿元国库券，主要由各地方、各部门、各企业认购，有条件的个人也可以自愿认购一点。

在调整期间，不必要的基本建设要下，各项开支要紧缩，但生产要努力搞上去。特别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要努力增产质优价廉、适销对路的消费品，活跃市场，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满足人民需要。商业、外贸和物资部门，要压缩库存，拿出一部分商品，投入市场。各行各业，都要突出地抓节约能源的工作。要从各个方面，开源节流，增产节约，以利于克服困难，搞好调整。

这次调整，牵动全局，影响到各个方面。小平同志说，历来解决困难，权是要集中的，不是分散的，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现在强调集中统一，是指在宏观经济方面，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局面的重大措施方面，要集中统一。但并不是什么都要集中，把什么都搞得死死的，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次调整，要吸收六十年代初期调整经济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有新的特点。这就是以调整为主，把调整和改革结合起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把该搞活的事情搞活。应当看到，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的一些初步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搞活经济，提高经济效益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经济形势之所以这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调整时期，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同当前调整容易发生矛盾的，要推迟进行，把步子放慢一点。但前一段行之有效的改革，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成果要巩固和发展；少量的新的改革的试点，也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在改革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既要慎重，又要坚定，政策不能变来变去，要取信于民，取信于企业。搞活，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可贵的，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一点丢掉了。

这次调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某些方面的退，正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进。我们要通过调整，抓紧工作，使各个方面的经济效果有一个大的提高，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路子，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铺新摊子，忽视已经建设起来的老企业的改造和发展，使它们长期陷于高消耗、低质量、产品性能多少年如一日的落后状态，盲目追求产值，产销脱节，大量积压。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是创造的社会财富很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这条路子，是靠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实现的。我们不能再走这条路子，而应当走一条新路子。这就是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主要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进行合理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来扩大社会生产。这条路子，速度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经济效益会好，社会财富会增加得多，人民得到的实惠也多。只有走这条路子，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国家，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生产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从根

本上解决财政经济的困难，求得经济的稳定增长。现在，不论在生产、基建和流通方面，浪费十分惊人，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调整期间，一是要把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解决好，使经济结构逐步趋向合理；二是要抓紧时机，下功夫把现有几十万个企业办好，提高经济效果，把潜力挖掘出来。要认真搞好企业的整顿，企业的调整和改组，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企业的体制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们现有的企业在组织程度、经营管理水平、生产技术等方面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搞好调整，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动荡不安，这里干扰一下，那里干扰一下，调整就无法进行。要把工作做细，做扎实，注意克服不安定的因素。在调整的具体政策、措施和步骤上，打算尽量考虑得周到一些，慎重一些，力求不引发乱子。这次不少基本建设项目要下，一部分企业要关停并转，涉及到几百万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发生混乱。这次不能像一九六二年那样，精减大批职工下乡，而是要采取这样一条政策，基本工资照发，队伍不散，不使他们闲散到社会上去。要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必要的生产劳动，例如设备的保管和维修，新产品的研究和试制，以及绿化环境，搞市政建设等。更重要的，是要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对职工进行正规的培训，补“智力投资”这一课，提高职工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把这件事抓好了，意义很大。如果说，调整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那么，培训就是这种积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把现有的职工安排好以外，明年还要尽量广开门路，通过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镇个体经济，继续安排社会上的待业人员就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动员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积极行动起来，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调整的顺利进行。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的、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但要警惕极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机进行破坏。对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

要坚决打击，决不能对这些非法活动放任不管。对这极少数人实行专政，才能充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当然，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运用宪法和法律作为武器。经济上的调整，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只要我们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振作精神，艰苦奋斗，当前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调整是能够搞好的，我们的国家是很有希望的。

关于调整问题，国务院将向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报告。今天趁这个机会，先和大家谈一谈。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杜润生报告¹给胡耀邦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八日

耀邦同志：

送上杜润生同志报告一件，其中反映了我的一些看法。请考虑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副总理一阅，并在《内部参考》上刊登。请批示！²

赵紫阳

元月十八日

注 释

1. 指杜润生随赵紫阳到鄂、豫、鲁三省贫困地区考察后给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汇报了上述贫困地区自1978年实行包产到户、尊重农民生产自主权以后带来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这些农村的好政策稳定下来。报告中多处引用了赵紫阳在考察时的讲话。

2. 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按紫阳同志的意见印发和登《内部参考》。（润生同志的信可不登）。胡耀邦 一月十九日。”

对农村建房占地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

《内参》十九期《农村建房要十分注意节约用地》一文，值得重视。农村经济形势好转后，纷纷准备建房，这当然是大好事，但如在占地上失去控制（还有社、队企业占地），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建议农委、建委联合进行一次调查，并为国务院拟出一个农村建房和办社、队企业节约用地的规定（法规），以公布执行（必要时，可提交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以上请农委、建委研究，并将意见告我。另外，黄老（克诚¹）还提出农村建房不要宣传，农村住房不像城市那样紧张，建筑材料应优先满足城市的意见，亦请考虑。

请星垣同志指定一位秘书长过问一下这事。

赵紫阳

三月十二日

* 这是赵紫阳对新华社《内部参考》1981年第19期《农村建房要十分注意节约用地》一文的批示。

注 释

1. 黄克诚(1902-1986), 湖南永兴人。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曾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 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 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 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湖南省委书记, 国防部副部长, 中央书记处书记, 军委秘书长, 总参谋长, 中纪委第二书记,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在调整期间如何搞好改革*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

两年来的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显著，由于经验不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地方、企业自主权扩大，尽管这个权还扩得不够、不完全，但这些权的使用在一些方面与宏观经济的要求发生矛盾，产生了一些重复建设、盲目生产、滥发奖金、哄抬物价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利于调整，也妨碍改革。怎么解决？采取老办法，把放下去的权统统收回来，这是没有出路的，又会回到“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老路上去。我们要采取新的办法、走新的路子，即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研究采取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制约办法。

第一，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要用经济杠杆、经济手段、经济利害关系来调节部门、地方、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

要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税收不像物价影响面那么大，在调整期间价格不能大动的情况下，可更多地利用税收来调节。

用税收促进调整。对一部分长线产品、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加税，促使企业截长补短，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

用税收促进改组。对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厂加税，促使企业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特别是要使企业摆脱地区、部门的束缚，合理地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组织起来，必须改上交利润为上交税收。要研究改组公司和联合体的利改税问题。

用税收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把一部分企业由于价格不合理而多得的利润通过税收收上来，解决企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悬殊带来的苦乐不均问题。

用税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通过税收的调节，使经营水平比较好的企业得利，迫使经营水平差的企业改善管理，长期不改善的就被淘汰。目前扩权试点中，哪个办法有利，企业就选择哪个，搞不好不吃亏、也不担责任的做法要改变。

用税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一部分产品需要减免税以外，今后重要的是加税。对一切有营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要征税，还要通过税收逐步改变目前地方财政结余、中央财政赤字的情况。

要运用税收杠杆，必须改变目前“协商办税”的做法。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利害关系的重要手段。采取协商办法，谁都愿意减税，不愿加税，使许多应该采取的税收措施久拖不决、难以实施。税务部门一定要加强，根据税收任务增加人员编制。

在调整期间，价格要保持基本稳定。不可能大动，但小动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不能设想价格哪一天可以一下子调整合理，只能采取逐步调整的办法。因此，需要尽快搞出价格改革的长远规划，定下改革的总盘子，然后制订分步骤实施计划。当前，配合调整，可以把一部分利高的长线产品的价格调下来，或实行浮动价格，适当提高对市场价格影响不大的短线产品的价格。配合工业改组，逐步把一个行业内部各产品之间的比价调整合理。为解决行业之间利润水平相差悬殊的问题，可先调整出厂价、批发价或中间产品的价格。在联合企业、行业或局的范围内可以推行内部价格。要按质论价，实行优质优价的价格政策，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银行贷款要实行“择优扶持”的原则。对适销对路的产品优先贷款，对长线产品控制贷款，对与大厂争原料、燃料、动力而消耗高、质量差的小厂，要停止贷款。要实行差别利率、浮动利率和加息制度。对需要发展的行业的贷款，利率可低一些；对限制发展的行业，利率可高一些。对逾期归还、积压物资和财政性开支占用的贷款，要加收利息。要增设银行网

点，开办代办业务，解决群众排队储蓄的问题。发展金融事业，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门路。

第二，要制订经济法规，实行法治。

我们国家缺乏经济法规，多年来靠行政命令、首长意志来管理经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要靠经济法规、规章制度来管理，使各种经济活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体制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搞活经济的同时，要用经济法规来制约。搞市场调节，就要有市场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就要有相应的管理企业的办法。各项改革如果不形成规章制度，就难以进行下去和取得成效。因此，要把制订经济法规的工作摆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要组织有关部门及高等院校，立即着手制订各种法规。这方面可以借鉴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经验，把他们的各种法规翻译过来作参考。在法规没有制订出来以前，可先制订各种管理条例、规定，经过试行后逐步形成法律。有了法，就要有执法机构，要建立仲裁机构和经济法庭。要赋予执法机构应有的权力，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要加强经济监督工作。

要发挥物价、税务、银行、统计、财政和工商行政等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把经济活动的各种信息及时收集起来，便于作出正确的宏观决策；对微观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保证宏观决策的贯彻执行。

由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由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部门起草有关的条例、规定和法规。

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搞对外合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

在海上勘探开发石油¹，必须搞对外合作，这个方针要确定下来，坚持下去。我们现在财力不足，技术不高，要面对这一现实，利用当前国际条件，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加快海上石油开发。

注释

1. 中国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是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70 年代国务院曾经作出决定：“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石油部可以采取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直接与外国石油公司建立商务关系，开展对外合作。”1980 年 5 月经国务院批准，渤海和南海北部湾分别与日本和法国的石油公司通过双边谈判，签订四个石油勘探开发合同。当时，有人提出对外合作开发海上石油是“出卖资源”，“丧失主权”，“得不偿失”。为此，经国务院同意，于 1981 年 3 月，由能源委、进出口委组织有关部门六十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渤海中日石油合作这一主题，从技术、经济、税务、法律等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对合作的必要性取得一致认识。赵紫阳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这次讨论，并作出上述明确的表态。1981 年 11 月，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赵紫阳讲到与外国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时宣布：“我国政府确定，根据互利原则，近期内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能源委和进出口委组织六十多名专家、学者研究讨论渤海中日石油合作问题汇报后的讲话摘要。

招标，加紧勘探，尽快投入开发建设。”1982年2月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开发，在国务院对外合作和自营开发相结合的方针指引下，经过石油系统广大干部工人共同努力，为进一步开发海洋石油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96年中国海上生产油气当量500万吨，2010年当量5000万吨。现在中国海洋石油开发方兴未艾。

当前经济形势和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

一、今年第一季度的形势是好的。财政收大于支，货币有较多的回笼，轻工业增产，商品销售增加，物价稳定。这说明调整见到了效果。但要实现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任务还相当艰巨，要再接再厉，抓紧抓好。

二、要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实现今年财政收支平衡。今年能否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事关全党的信心问题，具有政治意义。必须力争实现财政平衡，至少要做到基本平衡。现在不要讲赤字可能有多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开支一定要卡紧，控制集团购买力也有潜力。关于支出开口子的问题，要逐项审查一下，哪些事情现在还不能办，就明确讲清楚；哪些事情必须办，也要明确规定是中央财政解决还是地方财政解决，不要把矛盾下放给地方。在紧缩财政开支的同时，企业资金要继续搞活。企业购买国库券后剩余的资金，应允许使用。要向企业讲清楚，哪些事情不能搞，剩余资金也不能一下用完，要分批安排，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审批。今年一季度对企业资金控制紧一些是必要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死了一点。既要节流，又要开源，以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职工宿舍建设规划比去年减少了，在今年已经安排的基础上，要适当开点口子。增加宿舍也是调整，今后要强调宿舍建筑的配套，以住进多少人为完成任务的标准。

三、回笼货币要抓紧。议价要收紧一些，议价范围要控制，议价要逐步降低，以利稳定物价，减少货币投放。要把生产搞好一些，争取今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年下半年多组织些商品回笼，非商品性回笼也要组织好。农村收回农贷，要强调一下，尤其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在抓紧货币回笼的同时，也要有些必要的投放，把中短期贷款搞得活一些。生产投放的重点，一是轻纺消费品，二是短线产品。在工商关系方面，商业部门收购减少，工商矛盾较大时，银行要注意放宽贷款尺度，商业部门要把市场需要的商品尽可能收购下来，以利生产和流通。今年重点抓调整，前一段的理解主要是压缩基建和企业关停并转，对生产调整注意不够。今后要讲增产增收，生产应当有一定的速度，否则矛盾解决不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

在抓紧货币回笼的同时，要研究市场需要多少货币量才合适的问题。现在流通的票子多，和一九六二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现在市场情况是好的，特别是农贸市场价格平稳。除几种耐用消费品比较紧张外，还没有发生抢购现象，甚至有些商品降了价群众也不买。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需要保持多少货币流通量，请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很好研究。

四、企业整顿问题。企业要抓好厂长责任制、按劳分配、民主管理、劳动纪律、经济技术的基础工作和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近两年，农业方面一些政策措施落实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工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成效不大，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真正解决好按劳分配的问题。对于企业的现状，必须要看到两点：一是多数企业有潜力，浪费严重；二是吃大锅饭的现象普遍存在。企业的整顿，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强企业职工的责任心，减少浪费，这是吹糠见米的措施。具体办法有以下几条：第一，全国有六千个企业已经实行扩大自主权试点，总结经验，继续提高。搞得好的多得，搞得不好的少得，不能中途退出。第二，亏损企业实行包干办法。在原有亏损的基础上，适当减少一些亏损额，对企业包干。第三，对于一些小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要考虑提前一步实行自负盈亏，即由利润上交改为征收所得税的办法。第四，选择若干城市试行按行业、按公司利润包干的办法，和技术改造结合起来。另外，个体所有制要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实行以上办法，没有危险性。也可能出些问题，可以用经济杠杆、经济立法和经济监督办法加以管理。一定要看到，中国这样大，千百万个大小企业都躺在计委、财政部身上吃大锅饭是不行的。

五、关于纠“左”的问题。要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搞形而上学。不要搞层层检讨，不要上挂下联。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具体总结经验。要注意保护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振作革命精神。基层同志的革命精神，始终是可贵的。“左”或右，是讲上边领导的指导思想。日常工作，具体指标，很难说是“左”或右，往往属于情况判断上的问题。涉及指标高低，逐级联下去不得了。其结果是，任务越小越好，困难越少越好。纠“左”的问题，从领导总结指导思想是重要的，但不能层层搞。

六、关于奖金问题。当前奖金发放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存在平均主义，生产表现不论好坏，奖金基本一样，有的甚至把奖金变成了附加工资。发了奖金，并未真正起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生产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要下决心，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如果把现在这种状况扭转过来，把奖金和小组核算、个人劳动定额、责任制结合起来，工交战线就会大有起色。奖金问题，要贯彻执行国务院十号文件规定的基本精神，进行整顿。第一，巧立名目的、滥发的奖金，必须取消。第二，绝大多数地区的奖金要比去年降低，发放奖金总额要有明显的减少。第三，平均奖金水平已经超过一个半月的，不一定一下压到一个半月；去年没有达到一个半月水平的也不要再增加。第四，有特殊情况必须多发奖金的，要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这个问题，请劳动总局、经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订出一个有关奖金问题的补充规定，以便执行。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可以找几个大市具体商谈一个执行办法。

七、物价问题要持慎重态度。现在市场物价刚刚稳定一些，不宜轻易变动。要看到过去工业产品，首先是轻纺产品的利润高，是建立在原材料价格比较低的基础上取得的。现在农副产品原料和工业产品原料提了一些价，企业就发生了成本提高、利润减少甚至亏损的现象。这就暴露了工业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落后。要求工业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经营管理，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增加收入。

今后价格问题要很好研究。现在外贸亏损，主要原因是国内外价格不挂钩。出口产品，按工厂成本还是按国内销售价计算盈亏，也是个问题。国内有些商品的收购价和销售价也是倒挂。这些问题长期拖下去不解决，

财政赔不起。我们对价格问题心中要有个数。要用两年的时间，把我国的主要商品，按照平均利润率，计算出合理的价格应当是多少，并编制出一套商品价格目录。价格问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八、关于学上海问题。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可以考虑不提学上海的口号，只讲把上海和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移植到内地。这些经验对内地是很适用的，比学外国的经验更为有效。学习要用科学方法，不要搞运动。经委要编好上海和沿海地区经验资料，供各地学习。上海等地要有咨询机构。去上海的人数必须控制，上海老工人要合理使用。学习上海经验，可以首先规划若干城市。日本有行业协会，我们也可以搞行业协会或咨询服务公司。

沿海城市以进养出问题，要专门研究。沿海可以发展来料加工，等于劳务、技术、能源出口。没有原料，从国外进口，加工成成品，组织出口。企业搞联合体，搞工贸结合。沿海城市对外发展经济往来，面向国外。内地的原料和产品，面向国内。沿海内地各自发挥优势，各得其所。这个问题请经委组织外贸、商业等部门组成专门小组，先到沿海地区进行调查。

各项服务行业种类很多，方面很广，群众很需要，既有利于安排就业，又可回笼货币，需要大力发展。但是服务行业分别属于几个部门，缺乏统一领导，存在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关服务行业的方针政策、体制、服务网点建设规划和相互关系等问题，由国务院财贸小组和体制改革办公室共同负责进行研究，并可请北京市搞一些试点。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四日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国务院对今年的工作已经作了安排，同时开始着手制订“六五”计划。今天，我准备就今后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讲一些意见。

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大家普遍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在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各项开支以及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今后生产和财政收入能不能稳定增长，人民生活能不能逐步有所改善，新增加的劳动力能不能得到安排？这是制订“六五”计划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左”的错误的影晌，急于求成，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畸形发展。过去走的这条路子投资大，消耗高，增加社会财富少，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今后不能再走，也走不下去了。

出路何在？国务院讨论多次，认为出路就在于提高经济效果。有的同志说，现在是“遍地皆黄金”，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关键是要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把各方面的潜力挖掘出来，大大减少各个领域内的浪费，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经济效果呢？还是这样两句话：一是调整，二是改革。通过调整和改革，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体制合理化，企业组织合理化，走出一条发展我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国经济的新路子来，使国民经济能够协调发展，稳定增长，实现良性循环。走这条路子，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

今后，我国经济建设走什么路，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现在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

我们在经济调整中，正在采取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开支等措施，这对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稳定经济是非常必要的。这项工作丝毫不能放松，要继续抓下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稳脚跟，消除潜在的危险。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结构调整合理了，就能出效益，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地发展。所以，调整国民经济是积极的方针，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全面理解调整的内容和意义，才能正确地执行这个方针。

在调整经济结构中，要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重要位置上，认真抓好。这是使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的关键一着。

发展消费品生产，有利于增加收入，回笼货币，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增加出口，节约能源，安排劳动力，使国民经济尽快摆脱困难。从根本上说，不断满足人民吃、穿、住、用、行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人民政府应尽的职责。东欧有些国家长期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带来消费品匮乏，这是造成他们国内人民不满、政局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发展消费品生产，相应地要求机械、电子、化工、冶金、建筑材料等部门提供设备和各种原材料，这就要求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奋斗”的不合理状况，使重工业转向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我们强调发展消费品生产，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重工业，而是对重工业提出了调整的任务，要求重工业的发展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相适应，要求生产资料

的生产同最终消费品的生产相适应，更好地发挥重工业的作用。所以，发展消费品生产，实际上将引起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合理的内在联系逐步得到恢复，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更好地衔接起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果，积累和消费的矛盾也就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到什么位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历来讲农、轻、重，但在计划、方针、措施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是想从重工业、从钢铁工业上起飞，形成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吃了不少苦头。根据我国的国情，我们在建设方针上，应当从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转向着重发展消费品生产，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消费资料的生产相协调，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发展消费品生产，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里有着广阔的市场。这是发展我国经济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今年一月，我到豫东和鲁西南的兰考、东明、菏泽去了一趟，那里是有名的穷地方。这两年落实了农村经济政策，农民收入大大增加。农民说，往年上面来人，我们一定跟你要粮食，现在要“三大件”，要化肥。过去老百姓没有钱，工业品在那里几乎是空白，现在好多商品都脱销了。估计全国有一亿五到二亿人口的地区是这种情况。这几年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城乡都出现“持币待购”的现象。外国人很羡慕中国这个市场，而我们长期以来却忽视自己的市场，商品不足，不是去积极发展它，满足需要，而是靠发票证，抑制需求。当然，某些生活必需品在供不应求时，发一下票证是可以的，但长期依靠这个办法，就会把市场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搞没有了。现在，许多高、中档商品有销路了，推动我们去发展生产。

发展消费品生产，要从重点城市、名牌产品抓起，上海、天津、北京以及其他轻纺工业生产重点城市要先走一步。要根据市场的需要，排出一批适销对路的产品，落实措施，把它抓上去。要以生产名牌优质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化协作，进行大批量生产。要同工业的调整、改组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尽量利用原有企业和关停并转企业的厂房、设备和技术力量，一般不搞新建。所需资金，除企业自筹以外，可以由银行给些中、短期贷款。需要的设备，主要由我们自己造，

必要时，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和少数关键的零部件。在发展中，注意不要一哄而起，到处铺摊子，以后又收缩，造成损失。要搞好行业规划，认真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稳步前进，避免盲目性。发展消费品生产，不能追求数量，粗制滥造，而要强化质量，做到花色新颖、品种多样、质优价廉、适销对路。我们的导弹、卫星都可以上天，轻工产品的质量为什么不能解决？只要集中力量，从材质、工艺、设备、管理等方面入手，组织军工、民用工业、科研部门等几个方面进行协作，就可以攻破技术难关，提高质量。要妥善安排好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兼顾内销和出口、农村和城市的不同需要，以及兄弟民族的特殊需要。在努力增产价值高、回笼货币多的高档商品的同时，对人民群众需要的利润不高的大路货，尤其是品种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也不能忽视。今年，我们就要下力气把消费品生产抓紧、抓好，做出成效，在“六五”期间，使消费品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抓好能源的节约和开发

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就是能源、交通、城市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相当落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较长的周期。在制订长远规划中，应当认真地加以研究，切实地作出安排。在调整时期，把这些基础设施搞好，就能为今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当前，能源比较紧张，特别是石油探明的后备储量不足，产量有可能下降，影响很大。中国无论如何不能靠进口石油过日子，这要作为一条国策定下来。解决能源问题，应当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内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当前，首先要抓节能，特别是节油。今后十年，如果每年都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多挤出一二百万吨油出口，我们在经济上就会增多一些回旋余地。

全世界产油上亿吨的国家只有九个。我国年产一亿吨油，这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是我国经济的一张王牌。问题是我国石油从一千多万吨上升到近九千万吨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盲目地把石油的消费量增加上去了，浪费了宝贵的财富。现在，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国内的用油问题。目前，我国每年出口原油、成品油一千七百万吨，剩下八千

多万吨全部在国内消费了。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和日本差不多，但产值只及日本的四分之一。每万吨能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现在大体上只相当于“一五”期间的一半，比一九六五年还低百分之二十，能源的浪费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每吨二百七十美元，重油的价格只比原油低百分之十至十五，油就是“金子”。我反复考虑，如果原油产量不能大幅度增加，就要下决心到一九九〇年把国内用油控制在六千万吨左右，再挤出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吨油出口，换来的外汇用在开发煤炭、电力和相应的铁路、港口建设上。这样，就能为能源和交通的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并有助于扭转我国的外汇收支逆差。

节油的潜力是很大的，首先要把烧油这个大漏洞堵住。一九八〇年全国作为燃料油烧掉四千万吨，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真是太可惜了。烧油最多的行业是电站，共一千六百四十万吨；其次是工业锅炉和炉窑，共一千三百多万吨。各部门自备电站一年也烧油三百三十万吨。节油的重点，要放在烧油的电站、工业的锅炉上，办法是烧油改烧煤。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如果从现在起，烧油改为烧煤，每年节省二百万吨油，到一九九〇年，可达到一年省油二千万吨，这就需要四千万吨煤来代替。改为烧煤的投资，包括新建电站、相应的煤炭开发、铁路和码头的改造等，共需二百亿元。十年间累计省油一亿一千万吨，不算价格上涨因素，可换汇三百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八百四十亿元。用去二百亿元，再除去成本一百九十亿元（按每吨一百七十元算），还净赚四百五十亿元。如果留有余地，按一九九〇年达到节油一千五百万吨计算，十年累计节油八千二百多万吨，除去成本，也净赚二百九十亿元。现在，要走好第一步，今年就下决心从各方面挤出一百万吨油，明年挤出二百万吨，共计三百万吨出口。有这三百万吨作基数，这样每年驴打滚，就可使烧油改烧煤的步子加快，用油换来的外汇也越来越多。所以，要渡过困难，搞活经济，这是重要的一着。

开发能源需要建立专用基金。以上讲的以煤换油、节油出口的钱，就是能源基金的重要来源。其次，还要考虑动用一点国家储备，再借一些低息的外资。有以上三个方面的资金，专款专用，就可以加快能源的开发。在编制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时，一定要保证这个重点，坚决这样搞，积十年、二十年，就会见效。在开发能源中，过去对水电注意不够，

今后要特别重视利用水力资源，建水电站。近期内主要是以煤代油，挤出石油出口。从长远来讲，应当努力以水电代煤、代油，节约石油、煤炭出口。

三、依靠现有企业

过去一讲发展生产，就向国家要投资，搞新建，铺摊子，这是以前搞经济建设的老路子。在新形势下，要使建设方针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主要不是依靠建新厂、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而是依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逐步由外延为主转向内涵为主，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今后五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除了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还要新上一些必要的项目以外，基本上不搞什么新建，就是靠现有的企业吃饭。正如农业上我们主要依靠八亿农民在现有耕地上精耕细作、增加产量一样，在工业上我们也是主要依靠四千多万职工在现有企业里搞集约经营，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我们工业的摊子是相当大的。全国工业企业有三十七万多个，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五千一百亿元。目前，资金短缺，能源不足，不允许多搞基本建设。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采取坚决依靠现有企业的方针。现在企业各方面浪费很大，效益很差，许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至今还未达到历史的最好水平，更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五千多亿元资产的作用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人说，我国现在的经济是“克朗猪”，只有“骨头”没有“肉”，今后是育肥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是投资的时候，今后是真正出效益的时候。要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优先用于现有企业的改造上。今后基本建设的投资，要更多地用于老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六五”期间达到多大比例，可以具体研究。

在调整时期，我们要下功夫把现有企业，尤其是几千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办好，把它们的潜力挖掘出来。现在不少企业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弛，生产秩序不正常，亏损增加，如果不抓紧整顿，依靠原有企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各级主管部门要重视这项工作，把基础打好。企业的整顿，要围绕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来进行。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贯彻

按劳分配原则，加强企业管理，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严肃劳动纪律。我们的工厂，有些产品不是不能做，也不是不能做得更好，而是因为责任制不健全，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很好贯彻，不严格执行规章制度，操作马马虎虎，所以产品质量不好。现在农村的形势很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农民的收入与劳动成果挂钩，落实了按劳分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工矿企业里，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论上是被大家承认了，但是，在实践中，不少企业还是搞平均主义，奖金没有少发，钱没有少花，可是没有换来好的经济效果。要研究如何把克服平均主义，改革工资制度与加强责任制结合起来。当前，要推广一些工厂实行的记分计奖、上海纺织系统试行的小组超额计件奖以及其它行之有效的办法，把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收入，同岗位责任、经济效果挂起钩来，坚决纠正乱发奖金和平均发放奖金的错误作法，使奖金真正起到鼓励超额劳动的作用。要建立生产技术责任制，先从厂长责任制抓起。党政要明确分工，企业的重大问题经党委讨论决定以后，属于生产、行政上的工作，经营管理方面的事务，由厂长负责实施。要划分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和科室、车间、班组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实行逐级负责，一层一层把责任搞清楚，并要规定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要加强各项基础工作，全面推行厂、车间、班组的经济核算。与此同时，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进行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细致的思想教育，使干部和群众顾全大局，振奋精神，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天津手表厂原来规定的定额比较低，想提高一些，但工人不接受。后来发动“国家有困难，工人怎么办？”的讨论，定额很快就落实了。还要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企业的民主管理，在决定企业的大政方针方面，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办好工厂。

每个企业都有很大潜力，但更大的潜力在于把企业合理地组织起来，实现工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我国的工业企业是按部门、地区管理的，形成部门林立，条块分割，多头领导，管理分散，不仅使现有企业不能通过互相协作，形成更大的生产力，反而由于互相牵制、自搞一套，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严重阻碍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分割状况不解决，工厂的潜力是很难挖

掘出来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进行工业改组和促进企业的联合。要按照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根据不同行业、地区的条件和特点，实行专业化改组，把企业组织成各种形式的公司或联合体。公司集中管理的范围和程度，应根据不同的条件，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来确定，有的可以实行人、财、物、产、供、销的“六统一”，有的也可以在产、供、销上先统一起来，组成比较松散的联合。

在调整改组的基础上，要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加速企业的技术进步。企业要重视技术工作，不断开展技术研究和试验，采用各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发展各种新产品，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改善性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各级计划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安排一定的资金和物资，为企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必要的条件。公司或联合体要按照行业规划所确定的改造方向，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样，合理的组织，为技术改造创造条件，指明方向；技术改造，又使合理的组织发挥更大的优越性。把二者结合起来，就能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四、搞好机械工业的改组和改造

机械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关系极大。我们应当确定这样一个方针，要发展什么行业，就要相应地把为这些行业提供装备的机械工业搞上去。不能一说发展什么，就靠进口设备。这是某些产油国家所走的道路。他们一是美元多，二是机械工业基础差。我们与他们不同，不能采取这个办法，要立足于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机械工业。引进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削弱我们自己的工业。当前要着重抓好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这既是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现代化的起步工作。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就是要实行专业化协作，使机械工业的组织合理化，改造落后技术，使机械工业的技术现代化；就是要调整服务方向，从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转到“四个服务”的方向上，即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国内市场服务，为扩大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通过改组、改造，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产品，改进技术服务，以现代化的设备武装国民经济各部门，以优质的耐用消费品满足市场需要，并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增加机械产品的出口。

日本五十年代振兴机械工业的措施，对我们有参考价值。日本机械工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满足军火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战后生产能力过剩，没有饭吃。当时日本机械工业存在的问题，同我们现在相类似：设备陈旧，技术落后，重复生产，产品批量小、品种杂、型号多、性能差，缺乏竞争力。一九五六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机械工业振兴法》。他们的方针是，通过抓基础部门，如工作母机、测试设备、通用的基础零部件等，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的发展。他们选择十九种产品（以后扩展到四十种），作为“特定机械工业”，规定一九六〇年在产品性能、质量、成本上要达到的目标。为帮助企业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企业专业化，即组织措施。采取限制品种，减少规格，划分各企业的生产范围，改组“兼业厂”，规定一种产品只能集中在几个企业生产，一个企业只能集中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变多品种、小批量为专业化的大批量生产。通产省还向企业发出“共同行动”的指令，要他们联合生产一定品种的产品。二是技术现代化，即技术措施。制订企业技术标准制，规定特定企业必须采用的生产设备、检验设备、质量控制制度和生产人员的技术水平，并发放专项贷款，帮助企业更新设备，推行“机械设备国产化”。他们当时认为，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的机械工业，单靠市场经济自然循环的作用，已经不能改变，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日本政府的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五年间，机械工业的生产增加了三倍半，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销路。

我国的机械工业现在已有相当规模，但体系杂乱，管理分散，小而全、大而全，装备水平差，效率低，结构很不合理。实行市场调节、自愿联合，对改变机械工业的局部不合理是有作用的，但不能改变整个机械工业的不合理状况。特别是在目前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完全由企业自由选择，还会加剧结构的不合理。所以，要使机械工业结构合理化，以至整个工业结构合理化，在调整时期，就必须从经济的全局和社会的需要出发，采取行政办法和经济办法，实行改组。在改组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听取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意见，使改组的措施符合实际，真正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改组中，难度最大的是要打破地区、部门的界限。我的想法是，从行业搞起，从中心城市搞起。先建立各种行业组织，进行调查，提出行业改

组规划。然后对规划展开可行性的辩论，经过充分论证和比较，确定改组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以后组织实施。同时，要围绕中心城市的企业和重要产品，组织专业化协作，不受地区和部门的限制。

改组中，要从全国着眼，从中心城市着手，处理好全局合理与局部合理的关系。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产品和重复生产严重的产品，由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全局合理的原则提出改组规划；一般产品，由地方根据中央提出的改组原则进行规划，以地方为主。

改组中，一定要立足于取得实效，通过改组，实现大批量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做到适销对路。不能追求形式，为改组而改组，也不要搞成新的大而全、小而全。当前任务严重不足而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厂子，可以划过来，与轻纺工业的厂子合并、改组，搞专业化协作，不要搞成新的全能厂。有些重工业厂或军工厂，可以根据工艺相近的原则，与轻纺工业的厂子固定协作关系，上一条生产线，搞零部件。不要一说发展消费品生产，就什么都想自己包下来，结果投资大、批量小、周期长。

改组、改造中，要认真研究企业的技术改造方向和产品方向，从各个方面落实措施。要抓好技术标准的制订工作，规定产品的批量、质量和能源、原材料消耗量，以及必要的技术设备条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一定期限内，凡是达到规定标准的，允许开业，允许继续生产；凡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要停产整顿，服从改组。各部门、各行业应立即抽调人员，从重要产品入手，进行这项工作。把这项基础工作做好了，不仅有利于推进工业改组，而且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重复建设、重复生产。

整个工业都有改组和改造的任务。机械工业改组、改造的许多原则，也适用于其它工业。改组、改造是个很复杂的工作，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需要各地、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抓这件事，协调和解决出现的各种矛盾，有所突破。

五、沿海与内地合理分工、发挥优势

现在世界上有个“南北对话”的问题，可以说，在我国国内也有个“东西对话”的问题。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西部内地比较起来要落后

一些。如何使东西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有个合理的分工，发挥所长，从而使全国整个经济发展得更快，这是长期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

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工业城市，有很多优势，一是靠海，交通方便；二是经营水平、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比较高，具有发展外贸的有利条件。许多沿海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就是靠搞加工出口发展起来的。我们是个大国，内地占的比重大，从整个国家来说，不能靠装配加工立国。但是，像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城市，以进养出的政策应放开一些，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装配以后出口，逐步加大这方面的比重。这等于出口技术，出口劳动力，既扩大了就业，又增加了外汇收入。今后，我们要注意发挥沿海城市的这个优势，支持它多出口，把国内生产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要建立专厂、专车间，作为外贸出口基地，集中力量搞好出口商品的生产，提高档次，降低成本，参加国际竞争，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当然，内地也要利用自己的具体条件，努力生产传统的出口商品和发展一些新产品出口。

内地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有丰富的原料，有广大的市场，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工业已初具规模，而且还有不少先进的设备，应当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在沿海工业逐步转向加工出口产品，转向高精尖产品的同时，要把一般产品逐步让出来由内地生产。目前原料短缺的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沿海地区不要再扩大了。比如上海、天津、青岛就不要再发展一般棉纱的生产能力了，不能粗粮、细粮都吃掉，总要让出一部分来给别人吃。作为内地来说，不能一说发挥优势，有烟叶的就大办烟厂，有棉花的就大办棉纺厂，造成沿海生产优质产品的工厂原料不足，停工停产。这个转变过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步子一下迈得太快了不行。从目前看，内地的原料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调给沿海。超过计划的部分，双方可以协商，调节税利或返还一部分产品给内地。

近期内，沿海地区会发展得快一些，从长远看，更大的潜力在于内地。内地工业要赶上来，把潜力挖掘出来，很现实的一个办法，是向沿海学习，特别是要把上海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技術移植到内地来。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上海等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有长期的技术积累。拿上海来说，它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果都比全国高得多。现在上海每

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千六百美元，比天津多七百二十美元，比北京多六百九十美元。资金利润率，上海为百分之五十七点六，为北京、天津的两倍多，广州的四倍多，武汉的六倍。如果全国各重要城市接近或达到上海同行业的水平，固定资产不变，产值和税利就会成倍地提高。

学习现代化技术，是不是一定要学外国的最新技术呢？新技术应该学，但也要具体分析，要根据我们的吸收和消化能力，循序渐进。现在很多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多采用适用技术，不一定都引进最先进的。对中国内地来说，上海的许多技术就是适用技术。内地的工厂不一定都要到外国去买最先进的技术。把上海的技术学到手，比起学外国，更现实、更接近一些。我们的技术应该是从东向西逐步转移。外国的先进技术，一般地说，可以先在上海，以及天津、广州这些基础较好的沿海城市消化，再逐步向内地的中、大城市推广，这是一个比较妥善的办法。

学上海，不光是学技术，硬件、软件都要学，尤其要学经营管理。工业可以学，商业等其它行业也可以学。江苏纺织行业学上海，湖北按行业请上海的老工人帮助，都收到了好效果。学习和移植上海的先进经验和技能，应贯彻到日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去，持久地进行，不要搞突击，一拥而上，纷纷派人到上海去，搞形式主义，这样是学不到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上海也吃不消。请国家经委和有关部门研究组织一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广上海等地的经验。

沿海和内地之间，要发展各种经济联系：一是联合的办法。主要是搞技术扩散。上海等沿海城市的一些产品，有市场，但在当地扩大生产又没有条件，可利用内地的厂房、劳力、原料，由沿海城市出技术，搞联营，办分厂。二是搞技术转让、技术输出。宜昌有个棉纺厂，上海派出技术人员给他们设计、安装、指导，实行利润提成，两年提完，上海保证它第一年一等品率达到百分之八十。这是个办法。三是搞人才输出。上海等地的退休老工人，是很宝贵的财富，要有计划地请到内地来帮助工作。四是咨询服务。上海可以建立咨询服务公司，在经营上、技术上为内地服务。总之，沿海对内地，有技术输出、知识输出、人才输出的任务，这是沿海地区应该做的贡献。

在生产的布局上，除了注意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以外，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还要考虑国防建设的要求，有计划地使军工生产向内地转移。

六、发挥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现在的问题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提高经济效果、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国外有一种评论：中国在某些难度很大的尖端技术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攻坚能力；但在大批量的质优价廉产品的生产技术方面，却相当落后，水平很低。这种看法，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注意克服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相互脱节的毛病。在长远规划中，要把经济、科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

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但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果的问题服务。基础研究不能忽视，但大量的应当是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开辟性的工作要做，但要特别重视世界上已经有了的、适合于我国情况的生产技术。要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充分发挥独创精神，在应用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科研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研究确定今后的科研任务，选好课题。

当前，要着重抓好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我们有许多单项的科研成果，不能配套应用；许多新产品，长期停留在样品、礼品、展品阶段，不能大量投产；不少新技术，长期局限在军工生产中，没有及时普及到民用产品的生产中来；引进的一些新技术，没有很好消化吸收，加以推广。今后，要组织好科学技术由实验室向工厂转移，军用向民用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

要做好科学技术的转移工作，需要逐步改革生产与科研的管理体制，采取不同的形式，加强科研部门同生产单位的联系。科研单位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各类应用研究所应当同企业挂钩。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研究所、研究小组，也可以按行业建立研究所。生产、设计、施工以及咨询等方面，可以由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订立各种经济合同，包括联产计酬的经济合同，进行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应该允许打破地区和部门的界限，谁服务得好就找谁订合同。还可以逐步向高级的形式发展，组成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或公司。

在调整期间，必须大力加强职工的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新工人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无论是关停并转的企业，还是生产任务饱满的企业，都要抓紧这项工作。同时，要编制各种技术规程和技术标准，加强技术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并且先行一步，做好下一阶段的技术论证和新产品的设计工作等。我们不仅要看到当前，而且要看到下一步的发展，搞好科研，搞好智力开发。现在抓得越紧，将来就越主动，我们就能在新的基础上前进。

七、节约资金、用好外资

建设资金不足，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困难之一。我们不能靠压缩消费基金来提高积累率，主要靠增产节约，靠现有企业挖掘潜力，提供积累。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着重讲一下节减流动资金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注意了投入资金的不断增长，但却极为忽视资金使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去年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达到三千亿元以上，但周转慢，效率差。据统计，一九八〇年国营工业流动资金周转的次数为三点一次，比历史上最好水平一九六五年的四点八次低得多；国营商业内贸部分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二点三次，也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二点六次。各部门占用流动资金过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库存物资长期积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经济体制不合理的综合反映。我们要争取在几年内节减流动资金百分之十左右。这要从宏观经济决策、计划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等方面，采取措施来解决。对企业来说，要逐步推行固定资产有偿使用、流动资金全额付息的制度，调整税率和利率，使企业既有内在动力，又有外部压力，自觉地节约使用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这项措施抓好了，如果一年能省下流动资金二三百亿元，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合理利用外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了一些亏，应当吸取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第三世界有些国家成为中等发达的国家，除了发石油财的以外，没有哪个不利用外资的。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条件下，

合理地使用外资，特别是使用一些低息的、带援助性质的贷款，弥补我国资金的不足，对四化建设是有利的。

利用外资，一定要细致地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不能仓促拍板，盲目进行。低利的外资主要用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利用外资开发能源，既可以缓和能源紧张的状况，又有一定偿还能力，要下决心干这件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借给我们的低息贷款，要考虑重点用于这些项目。当然，轻纺工业周转快，换汇多，也可以用外资，以进养出。过去对国外资金没有同需要国内配套的资金统一起来考虑，往往国内的钱都安排完了，使引进的项目无法配套，条件优惠的外资无法利用。今后，在制订年度计划、长远规划中，要对国内、国外资金通盘考虑，统一安排，使已有的急需的建设项目尽快建成投产，不要有一笔外资就另上一个新项目。用好外资是个新课题，尤其对大笔贷款的使用，要有专门机构组织专家进行研究。

八、开辟就业的新门路

今后，我们不搞很多新的基本建设项目了，这就给就业增加了困难。在安排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上，也要考虑开辟新门路：改变劳动力结构，发展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包括商业、金融、通讯、城市公用事业、科研教育、文化娱乐、旅游等，也就是国外所说的“第三产业”。

从世界上看，工业发达的国家，由于他们生产力水平比较高，国民收入比较多，“第三产业”发展很快。一些国家“第三产业”占了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我国的经济水平不高，短期内达不到这么大的比例，但就我们现在这个家底，服务行业应该容纳比现在更多的人。解放初，上海、天津的工业就那么一点，但在服务行业中养活了很多。后来“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就业的路子越走越窄。现在，一方面城市很多人等待就业，另一方面服务业很少，人民生活很不方便，需要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和劳动密集行业。在长远规划和城市规划中，要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发展商业、手工业和其它服务行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

方式。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就业的主要方向。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和本地区的实际需要，制订发展集体、个体经济的规划，解决它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包括资金筹集、货源供应、招工带徒、产品价格、工资劳保等方面的政策和管理集体、个体经济的条例。经营方式也应灵活多样。商业、服务行业，过于集中，吃大锅饭，不可能有好的服务质量。东欧有的国家，把基层零售业包给或租给个人经营，据说效果不错。辽宁省营口县把浴室包给职工经营，效果较好。黑龙江省宾县供销社把长期亏损的两个门市部，包给售货员个人经营，他们想尽办法搞好服务，节约开支，很快扭亏为盈。可以考虑，先把小型的零售商店和服务网点逐步办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有的可以办成夫妻店。要经过试点，逐步在面上推开。

九、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存在的比例失调、产需脱节、效益低、浪费大等问题，是同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分不开的。要显著地提高整个经济活动的效果，除了要有一个正确的建设方针、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外，还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一定要坚定而又稳妥地把这件关系现代化建设事业成败的大事抓好。

改革经济体制，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要改变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把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改变单一的计划调节，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把经济手段和行政干预结合起来，主要运用经济杠杆、经济法规来管理经济，等等。根据改革的总方向，我们对改革的脉络和轮廓有过一些设想：要逐步实行党政企分工，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职工民主管理的权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建立行业组织，把企业合理组织起来；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等。与这些改革相配合，需要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

物资、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是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的。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改革的步骤可能会有所变动，但改革的总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两年来，我们对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改革。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开展了市场调节；贯彻“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发展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和协作；进行了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试点；实行工贸结合，发展外贸出口；以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的存在等。这些改革从生产、分配、流通以及所有制等方面，开始突破现行经济体制的束缚，对推动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今后的改革探索了道路。总的来看，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

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以后，我们对改革的部署相应地作了一些改变，这是必要的。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难以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总的改革步子比原来设想的要放慢一些，改革要服从调整。但是，也要看到改革对调整的促进作用，许多调整措施必须与改革配合才能奏效，有些改革是与调整密不可分的，这些有利于调整的改革就应当积极进行。从长远看，我国经济要稳定协调地发展，还有赖于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因此，强调调整，决不意味着改革的停顿，而是要以调整为中心，使调整和改革相辅而行。

为了巩固改革的成果，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也为今后的改革创造条件，在微观经济搞活以后，必须相应地研究如何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指导。当前，在经济生活中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的现象有所发展，滥发奖金、补贴的情况比较严重。解决这些问题，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采取堵死的办法，还是采取疏导的办法？是把微观经济的决策权统统收上来，还是在搞活的同时加强管理？如果采取前一种办法，就会回到“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老路上去，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当采取新的办法、走新的路子，使微观经济的活动符合宏观决策的要求。

一是要发挥物价、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在调整期间，价格体系不可能进行全面调整，但逐年进行一些小的调整是可以的，也是必要

的。在物价不能大动的情况下，要更多地发挥税收的作用。税收的牵动面比较小，但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却相当大。应当利用税收来控制盲目建设，限制长线产品的生产，促进工业改组，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鞭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银行也要通过发放贷款、调整利率，使企业的活动符合经济调整的要求。

二是要通过经济法规来制约。我们提倡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并不是不要行政干预。这里所说的行政干预，除了采用指令性指标的办法来管理和控制微观经济活动以外，大量的还是通过经济法规和规章制度来管理，以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要抓紧做好经济立法工作，否则改革就难以前进，取得的成果也很难巩固。

三是要加强经济监督，发挥工商行政、统计、物价、税务、银行、财政等机构对企业的监督作用。

最近，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了当前企业改革的问题，提出了几条意见：第一，六千个国营企业已实行的利润留成办法不再变动，不能有利就干，不利就退出。试点办法要继续搞好，进一步完善。第二，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按行业利润留成的办法。上海的冶金、纺织系统已经这样做了，有利于解决苦乐不均的问题。这是企业利润留成办法的进一步发展，是经济联合的必然趋势。第三，对亏损企业，原则上都可以实行亏损包干的办法，超亏不补，减亏留用，两三年不变，以推动企业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扭亏增盈，战胜困难。第四，对大量分散的小企业，包括零售商业、服务行业，可以考虑提早实行上交所得税、自负盈亏的办法。这样，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搞好经营管理，改进服务工作，增加国家和企业的收入。此外，还要注意发展个体经济，允许个人经营小型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客货运输业、房屋修缮业等。在我国国营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应当允许个体经营者招少量的帮手和学徒。这对发展生产，活跃市场，满足人民需要，扩大就业，都是有好处的。

关于改革的部署，在“六五”期间，前两三年应着重巩固、完善已有的改革，抓好新的改革的试点，总结经验，培训干部，做好全面改革的各项准备和基础工作。以后根据经济调整的情况，继续推进经济体制的各项

改革。体制改革办公室草拟了《关于调整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大家讨论修改以后，还要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然后制订具体方案，予以实施。

以上九个问题，是一些初步的考虑。今天提出来是为了征求意见，进行酝酿。有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包括进去，比如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搞好综合平衡的问题，还有发展农业、发展教育事业的问题，都很重要，需要另作研究。以上讲的概括起来就是：稳定经济，调整结构；依靠老厂，挖潜改造；改革体制，提高效益。这条路子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按这条路子走，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对石油部年产一亿吨原油包干¹ 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五月

一、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石油部《关于稳住一亿吨原油年产量需增加的钻井和建设工作量的报告》上批示：“请催一下秋里同志，并尽快落实。可否考虑在此基础上一包三年。”

二、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听取康世恩《关于石油部一亿吨原油年产量包干的具体方案》汇报后指出：“石油部一亿吨原油年产量包干，一包五年，包到一九八五年。”国务院随后正式批准实施这个方案。

注 释

1.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石油勘探投资和勘探工作量大大减少，储量增长速度跟不上原油产量增长速度，老油田自然递减加快，油田调整和增产措施的资金受到限制，1980 年全国原油产量 1.05 亿吨，较 1979 年的 1.06 亿吨有所下降。1981 年国民经济调整，国家大幅度压缩基建投资，给石油部的投资 17 亿元，仅为 1980 年的一半，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严重不足。当时石油部领导给国务院写信，要求增加投资，不然 1981 年原油产量将从 1 亿吨降到 8700 万吨。这样下去，势必再次出现原油进口的局面。国务院领导见信后，深感问题严重，赵紫阳第二天就在研究 1981 年计划的会议上，专门听取汇报，决定给石油部增加 5 亿元投资。但要保住年产原油 1 亿吨，还有很大困难。赵紫阳作出上述批示后，1981 年 6 月石油工业原油年产量 1 亿吨包干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石油工业实行 1 亿吨包干政策后，扩大了石油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解决了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1981 年到 1985 年共筹集石油

勘探开发基金 117.3 亿元，相当于国家投资的 93%，石油勘探工作量第六个五年计划比第五个计划增加了 54%，1983 年起出现储量增长幅度高于产量增长幅度的新局面。全国原油稳定 1 亿吨的基础上，逐年增长，1983 年原油产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1985 年达到 1.25 亿吨，从 1979 年世界第九位上升为第六位。1 亿吨年产原油包干政策是石油工业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开创了工业战线行业改革的先河，使中国石油工业走出困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给四川大学陈力¹ 同志的信

一九八一年五月六日

陈力同志：

你的论文我已阅过。我认为你提出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初期阶段，更应该区别不同企业，实行多种经营管理办法。

你的论文，我将批给中央财经小组所属的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薛暮桥² 同志）进行讨论，讨论的意见可由他们告你。

近两个月，因我到外地出差两次，加上出国等原因，你的文章看得晚了，至今才给你复信，希谅！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五月六日

注 释

1. 陈力（1930- ），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硕士生导师。1981年初，她撰写论文提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分类管理、抓大放小的思想和建议，获得中央领导和读者的广泛赞同。

2. 薛暮桥（1904-2005），江苏无锡人。时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体改办顾问。曾任政务院财经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体改委顾问。

关于煤炭开发的两个批语

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六月二十日

对于余秋里¹一九八一年五月三日报告²的批语

看了秋里同志的报告，很令人高兴。总得要振奋精神，才能有所作为。综合采煤机的问题，同意秋里同志的意见，请煤炭部、能源委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

另据煤炭部报告，如让他们出口四十万吨精煤，就可买回井下安全的一套技术，整个煤炭生产的安全工作就会有大的改观，亦请计委、能源委同有关部门研究。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委及有关部。

赵紫阳
五月九日

对梅行³一封信⁴的批语

梅行同志的意见很好。连同秋里同志的报告印发财经小组、计委、建委、经委、能源委、机械委、煤炭部、电力部、经济技术中心。秋里同志的报告，对开发山西（包括河南豫西）煤炭提出了很重要的方针和设想。这件事，关系着今后国民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全局。应集中力量把研究、论证、规划进一步深化、具体，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开发方案。我已将秋

里同志报告批给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及马洪⁵同志，请他组织专家讨论论证。请财经小组及各有关同志都关心一下这件大事，认真研究一下。

赵紫阳

六月二十日

注 释

1. 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能源委主任。曾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顾委常委。

2. 余秋里在该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煤炭生产要坚持机械化方向、提高煤矿机械化水平的建议。

3. 梅行(1919-2000)，江苏张家港人。时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周恩来总理秘书，中央办公厅财经组组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4. 梅行在1981年6月18日一封信中同意余秋里提出的方针性意见，同时提出了加强规划、节约投资和发挥投资效果、研究国内机械制造能力等七条建议。

5. 马洪(1920-2007)，原名牛仁权，山西定襄人。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曾任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工部第一研究院院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一些设想*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第六个五年计划主要搞经济的调整，调整时期速度不可能高，但也不能没有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整个经济就会萎缩。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速度也不可能太快，不能要求“七五”时期也像前次调整以后那样，有很高的速度。这是因为，这次调整同1962年那次调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注意了和1962年那次调整相同的东西，而对于和1962年不同的东西，研究不够。采用1962年那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全部问题，是不可能的。要研究这次调整同1962年那次调整的不同之点。

二、“六五”期间的速度不能太快，但不能没有一定的速度。1962年那次调整不但没有速度，而且有两年是负数。今天国民经济的发展能不能有负数？总的来讲，不能有负数。如果这样，问题就会很大。因为工人减不下去，农产品价格又提上来了，轻工业由于农产品的提价和进口原料比重的增加，即使有一定速度，利润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所以，整个工业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行。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1962年那次调整，“小土群”¹和许多“摊子”都被撤销掉了，很多人因撤了摊子回农村去了，不用国家再发给工资，速度虽然低，甚至是负数，但背上的包袱被甩掉了。这次调整，虽然也搞关停并转，但工厂的工人一个都没有减少，都得照发工资，奖金少发，还有意见；同时，还要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工厂关的很少，关了的，设备要维护，工人工资照拿；没有关的，人和设备也

* 这是赵紫阳与马洪的一次谈话。

都闲着没事干，照样开支各种费用。还有许多材料、设备在积压，基建工人在窝工，背上还背着这个大包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行。不可能有高速度，但也不能没有一定的速度。否则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现在3%的速度看来是低了些，如果能争取到4-5%的速度，那就好了。

三、1962年那次调整，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到1964、1965年速度一下子就上去了，1964年达到17.5%，1965年达到20.4%，1966年达到17.3%。这当然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而且在那些年代，石油生产逐年有所增长，这对于解救当时的经济困难，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如果期望在“六五”期间速度低些，而到“七五”时速度就会一下子搞上去，这种想法不符合实际。现在没有什么恢复问题，而且许多情况，如工人工资、奖金增多，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增长不上去，甚至还会下降。这种情况，同1962年那次调整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再要求那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的。以上两种情况都要向党内和党外、干部和人民说清楚，使大家有个底，有个奔头。

四、计委的预测，今后四年，每年赤字100亿元；财政部算的账赤字更多，财政没有出路，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暂时冻结资金和物价，这是必要的，正确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怎样使经济活动起来，使财政摆脱困难。只有经济活动起来了，才能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经济不活动起来，不增加生产，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最近抓了一下消费品的生产，收到一些效益。但重工业部门大量的工人没有事干，设备闲着，基建队伍很多人在窝工，许多设备搁在仓库里，许多材料在积压，还要发工资，出保管费、维护费。总之，只在消耗，而不能创造出新的财富。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除主要抓重工业的调整、为日用消费品服务外，能不能从银行拿出10亿、20亿、30亿元来周转一下，使经济活动起来？

五、目前，农业生产形势喜人，日用、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也搞得不错，要继续大力抓下去。要使“六五”期间的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重工业。能源工业我们是要尽一切力量去发展的，最成问题的是机械工业和冶金工业。根据当前的能源供应量，在搞好调整使经济结构逐步合

理化的条件下，我们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有没有出路呢？能否使他们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而避免负数呢？我想是有可能的，应当努力争取做到。

六、机械工业，有大量的制造能力在那里闲着。现在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只占用机械制造能力的15%-20%，余下的制造能力如何利用？为什么不可以有计划地预先安排一些大型电站设备、采煤设备等，由国家贷款组织生产，因为这些设备生产周期长，不是在需要时一下子就能制造出来的。现在安排生产，过几年总是需要的。尤其是对那些能耗高、效率低的锅炉，要下决心进行技术改造，作出规划，今年改多少，明年改多少，五年改多少，相应地要回炉多少，都应列入计划之内。能不能在十年之内基本上把这类锅炉全部都改造成为能耗低、效率高的锅炉？必要时，可以引进样机。

七、冶金工业，如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1）降低铁与钢之比；（2）提高钢材的成材率；（3）提高质量，提高合金钢的比重；（4）增加品种规格。那么，即使分配的能源有所减少，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增长速度。

八、在上述这些方面，我们确实要想些办法，不能把我们的重工业看成是包袱，而应当看成是宝贝，想方设法使它活起来。经济搞活了，财政赤字也就可以解决。怎样使经济活起来，使生产活起来，把现在看起来是消极的东西变成为积极的东西，这是当前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速度虽然不能高，但也要有一定的速度，就要在这方面想办法，不然轻工业也不能较长时期维持现在这样的速度。

九、货币流通量和拥有的实物量的比例怎样才是合理的？过去是1:8为最好，1:7也好，1:6以下市场上就有点紧张了。到了1:5以下，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们过去都是按这个比例来估量经济形势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一五”时期的经验数据。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集市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工厂也有一部分产品实行自销，货币的流通量肯定比过去增多了，今天货币流通量和拥有的实物量这个比例，究竟应以多少为宜，要研究。

十、资金不足，怎么解决？有三个办法：一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二是把人民消费基金的一部分转化为积累，就是要搞好储蓄，长期储蓄的利率要适当提高一点；三是利用外资。

十一、利用外资，这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方针。外资一定要利用，问题是怎么用，用到哪里最合算。我们现在不会利用外资。有外资可以利用，这也是我们这次调整同 1962 年那次调整很大的不同点。那时我们的国际环境，不但没有外资可以利用，而且苏联还向我们逼债。这次许多国家争着要借钱给我们，但我们用不出去，或者用得很不得当。要利用外资，就要付利息。付利息，对我们当然是个负担，但却可以把经济搞活，就好像抢救病人给输点血一样。

我主张开发煤炭工业也考虑利用一点外资，但用外资大量买外国的设备不行。这样做，不仅对目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很不利，而且对将来我国工业的发展也不利。

十二、这次“决议”草案，对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作用问题，作了修改。我认为很好。这是我们今后进行经济改革的重要的指导思想。国民收入的分配，基本建设的投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石油、煤炭、重型机械、重要的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等等，不仅产品单一，而且重要，必须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此相联系，大企业的自主权力，也不能过大。至于产品复杂的中小型企业，与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它们的自主权，则应当比大企业大一些。对这些企业，有的要实行包干，实行间接计划，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然，不仅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而且大型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应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

十三、对于余秋里同志提出的开发山西煤炭的重要方针，要抓紧进行论证。这个问题，过去就议论很久了，一直没有解决。这次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注 释

1. “小土群”指 1958 年大跃进期间为完成年产 1070 万吨钢的生产任务，到处搞小高炉、土高炉和群众运动大炼钢铁的做法，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要在调整中把经济搞活*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五日

一、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非常正确，否则经济稳定不下来。现在要冷静分析这次调整和一九六二年调整，有哪些不同之点。一九六二年是“小土群”、小高炉拆掉，基建下马，工人下乡，工资也就少发。现在是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不能解散，而且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进口的原料还涨了价，支出少不了。基建下马后，基建队伍窝工，机械工业闲着，物资积压在仓库，工人工资照发，只是节省了购买砖瓦灰砂石的货币投放。

上次调整，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上三线建设。调整期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建设，积蓄新的力量。现在，如按一九六二年的办法，三四年内不能有新的建设。必须从国内找到新的资金，同时运用外资，进行必要的建设。

二、要想办法，从国内筹集资金。一九六二年农民购买力下降，大批工人下乡。这次城乡购买力增加，今后几年还会继续增加。企业的资金也多起来，渠道多，增加快。这是这次调整的有利条件。走老路，资金集中，钱就少。搞包干等办法，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钱就多。广西国营农场包干，就扭亏为盈。王光英说：遍地皆黄金。吃大锅饭，大家都不去捡。包干、自主权，企业、小组、个人实行经济责任制，潜力就能挖出来。现在预算内的钱在财政部，预算外的有五百多亿元。要是高度集中，钱不会

* 这是赵紫阳与薛暮桥、马洪、刘明夫、房维中、梅行、吕培俭、刘礼欣、邱晴、杨培新等的谈话要点。

有那么多。当然，钱用得不得当，也不行。要调动企业积极性，给以经济利益，挖出潜力来。然后再用债券等方式，在不影响企业积极性的前提下，把钱聚拢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要研究。利润分散在许多企业里，依靠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把它集中起来，由财团在投资政策指导下使用。

对企业，包干有负作用，但不包干负作用更大。要使企业积极起来，然后对其盲目性，实施经济管理。国家让它包干，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企业内部，工人收入高低要和劳动成果联系起来。现在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整顿离不开改革。现在不同于解放初期，光讲政治，不讲经济利益，整顿不下去。现在有些改革不搞，利润就下降。云南有个企业，原来实行包干，年赚五十万元；现在不包了，亏损六十万元。企业包干，怎么包？试点时，企业认为有利就包，不利就不包。应改变制度，有奖有罚，不试不行，企业不改善经营管理不行。改革，举棋不定不行，步子稳一点可以。过去我们集中了又分散，分散了又集中，几次循环，说明单集中、单分散都不行。假如统收统支再搞下去，不出两年，还会要求改革。这是规律。联合国调查报告，说我们分散就比例失调，解决失调又集中。这次有点不同，既讲经济规律，又提改革。过去讲集中没有解决积极性问题，搞分散助长盲目性。改革的步子要稳，但要坚决走出一条路来。如果没有企业包干，去年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亿元，恐怕九百亿元也达不到。企业因农产品提价，增加成本，又对职工发各种补贴，又让增加了许多人，活儿又不多。正是因为包干，才有现在的财政收入。

参加世界银行工作的人讲，日本战后初期靠什么，很大部分是储蓄，现在储蓄也还是主要资金来源。存一天也是好的。世界各国都发债券筹资，这对投资者有利。而我们只靠财政搞收入，然后量入为出，搞点建设。企业有自有资金、折旧、发展基金，过去一时往上收，一时往下放。今后是否既给企业权利，又对资金使用于哪些方面作出规定，并从经济上加以引导。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今后我们是否实行分权以调动企业积极性，从减少浪费中挖潜，使之变成财富。然后在承认各单位利益的基础上，由银行用各种办法把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主要方面。银行储蓄使待用资金转变为长期资金，由消费基金转为建设资金。

经济办法就要支付较高利息。储蓄、债券，要政治动员加较高利息。要讲爱国储蓄，四化储蓄。提倡节约，转变社会风气。但银行吸收存款、发行债券的利率也要提高，如存放利率倒挂，差额可由财政补贴。贷款利息可考虑提高。财政因此少收的利润，可由银行多上缴来弥补。财政暂不要发公债，还是由银行发行债券。债券由总行发，地方不要发，广东、福建例外。

问题在于银行工作要改进。中国的银行不适应新的情况。世界银行的人说我们计划水平低。他们确定的基建项目，百分之九十五是成功的，采取四大步骤：（1）精挑细选。（2）彻底核算，用影子价格。有些企业赚钱，但不一定创造多少剩余价值，一定要用真实价值彻底算一算。（3）严格审查。（4）系统分析。还要审查企业负责人有无能力。项目从审查到确定，花两年时间。世界银行有几千个专家，由审查的人负经济责任。我们的计委、建委管建设，但没有经济责任。

以后银行搞建设，要让这些花钱的人负责收回投资。我们的银行要吸收人才，也可以委托设计院帮助审查。要规定计委、银行各负什么责任。有些项目，计委不管，由银行择优。国家规定方向，银行落实、监督，保证回收。世界银行的放款都能回收。日本的银行也这样。我们的银行要从下列三方面改进：（1）吸收存款，日本的银行狠下功夫，挨家挨户去吸收，而我们储蓄还要排队，农村储蓄无门。今后储蓄、保险都要发展。银行的机构和工作都要加强。（2）今后对建设项目，银行要审查，银行要负责。（3）银行还要学会经营运转，现在我们的银行是靠存款利息低赚钱。

苏联没有接受银行是社会化大生产最灵活的调节机构这个思想。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生产，离不了银行。城乡钱多，可以办储蓄，还可以试办紧俏商品先交钱后给货。国家按交钱先后次序交货。第二年才能给货的，可付给利息。这就可以清除排队，消除特权。倒卖，原来就有，不要怕。

三、财政地方包干，负作用是助长了地方所有制，许多政策不好办。已经包了的，要收回一点，即基建不包干。全国的基建钱太少。水利经费要全国统一使用，否则华北水源问题，黄河防汛，长江防汛，怎么办？基建支出要统一，财力集中一点。地方只包行政、教育、城建。包仍然要包。一部分省，广东、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要求包下去。要承认，财政包干以后，行政费用确实是节约了。

四、要采取措施，消除财政赤字。只想依靠集中，把预算外的资金纳入财政，不行。(1)要搞烟酒专卖，靠提价和增加一级烟，二三年后可增收五十亿元。混合烟今年试销一百万箱，逐步扩大。(2)税收，整顿企业，可增加五十亿元。(3)正常增加每年五十亿元。(4)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降化纤布价格，提棉布价格，可增收二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样五年增收一千亿元，平均每年增收二百亿元，是可能的。不要去动预算外资金。预算外资金由银行用经济办法动员。让企业把潜力挖出来，然后用计划指导、政府干预、银行吸收、协商筹款等办法引导使用于需要的方面。现在下面提的意见是：“国库券买了，借给中央财政的钱也拿了，剩下的钱为什么还不让我们用？”

五、利用外资问题，不能形而上学，走极端，一会儿用，一会儿不用。如不能用，世界银行怎么会放那么多款？一九七八年利用外资失败在哪里？为什么由企业直接利用外资的来料加工和中外合营就搞得很好？用于资源开发，没有多大危险。铜，我们并不多，还账给他们一半，这不行。资源丰富的，可以。计委一个工程师提工业靠技术，国家要有优势产业。我们要讲计划平衡，立足于国内，但也要讲扬长避短。要有经济支柱，经济优势。某些资源，如煤炭是优势。将来海上可能产油几千万、上一亿吨，但陆上产油可能下降，全国保持年产一亿二三千万吨。煤炭比较可靠。钨也可以加工出口。可以利用外资，是这次调整中的有利条件。

六、不可能在生产萎缩的情况下解决财政问题。开支减少，收入可能减得更多，过几年又欠很大一笔账。生产不想些办法，不仅将来没有新速度，而且原有摊子也会消耗殆尽。现在工业固定资产三四千亿元，消耗下去，维持都困难，更没有新速度。不仅化工、冶金、机械，连轻纺工业也这样。

因此，调整期间，要有设备更新和必要的建设。钱、人、设备都是有的。基建，并不会增加多少投放。基建工人窝工、机械工人窝工、物资积压，全是现成的，就增加一点购买砖瓦灰砂石的货币支出来启动。要利用调整，把企业的设备更新搞起来，把重工业搞活，把经济搞活。设备更新在西方国家，是生产衰退还是上升的标志。四川宜宾金属电解厂，从银行贷款三百万元更新设备，两年已还款二百二十万元，一年增八十万元利润，

还节省了大量电力。设备更新，把机械工业搞活，并使工厂有新的水平，使能源、原材料消耗降低。旧设备换下来，作为废钢铁利用，可缓一口气。

要讲生财、聚财、用财之道。聚财，要明确就是依靠银行集中预算外各种资金。用财之道，就是讲开发煤炭、交通，由银行组织银团，搞三十亿元基金。用世界银行贷款办法办，不纳入预算，不搞成拨款。煤炭不怕多，多了可以出口。中国煤出口，条件好，因为离缺煤国家和地区近，日本、东南亚和港、台都缺煤。澳、美、非、加拿大有煤，但距离较远。其次是设备更新先配合节约能源，改烧油为烧煤。然后是机械工业更新换代。这仅是一些想法。请经济研究中心议出结果，提出建议。

对《济南石油化工厂财务混乱惊人》 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

耀邦同志：

建议将济南化工厂的材料印发给省、市、区座谈会一阅。

目前工业企业财政上缴日益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不能完成，同目前许多企业财务管理混乱，财经纪律废弛，有很大关系。越是大的，赢利多的企业，往往这方面的问题越严重。

很有必要在调整、改革的同时，当前突出抓一下对企业的整顿。把整顿财务管理，遵守财政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作为企业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潜力很大，而且见效会快。据估计，如全党认识一致，大力去抓，留有余地的估计，也可增加财政收入几十亿元。请酌！¹

赵紫阳

七月三日

注 释

1. 胡耀邦在此件上批示：“连同紫阳同志的意见，一起印发。胡耀邦 七月三日。”

对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月

一、国民收入的分配，基本建设的投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石油、煤炭、重型机械、重要的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等等，不仅产品单一，而且重要，必须纳入国家统一的计划，由国家直接控制。与此相联系，大企业的自主权力，也不能过大。至于产品复杂的中小型企业，与市场联系比较密切，它们的自主权，则应当比大企业大一些。对这些企业，有的要实行包干，实行间接计划，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当然，不仅国家在制订计划时，而且大型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应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

二、整顿企业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减轻财政困难最现实的办法。从国家经委开始，各级经委一定要真正把企业整顿工作抓起来。最近听说有些企业相当混乱，有的违法乱纪。要与企业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是对的，但有的不是靠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果，而是搞转嫁负担，化大公为小公，损害国家利益。企业的正当经济利益，一定要保证用正当的方法、正当的手段去取得。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给企业以经济利益，但同时必须进行国家监督，反对违法乱纪。现在有的企业领导人，不去教育工人认识全局利益，而是一起设法对付国家，国家有什么政策，他就有什么办法对付国家，这样会走向反面的。要把这些问题作为整顿企业的内容。整顿企业要和推行经济责任制同步搞。企业实行经济

^{*} 这些意见是根据赵紫阳 1981 年 6、7 月间几次谈话的内容综合而成的。

责任制，谋取经济利益，决不允许化大公为小公，违法乱纪，弄虚作假。现在要注意这种倾向。要反对那种不顾国家利益、脱离国家监督、搞本位主义的倾向。不注意这些东西，资本主义社会里那套用来对付国家的东西都来了。总的是两条：一是实行包干，按劳分配；一是加强监督，制止本位主义、弄虚作假、违法乱纪。讲经济责任制，就是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不注意解决上面这些问题，“吃大锅饭”的问题也就不可能解决。讲包干，按劳分配，就要克服上面讲的这种倾向。

袁宝华¹同志说，整顿企业的“牛鼻子”在搞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把那些造反起家、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清出领导班子，然后逐步使企业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意见是对的。

工厂的按劳分配怎么搞？现在农村搞了联产责任制，形势有很大变化。为什么工业花的钱不少，却起不了大的作用？我在天津就讲了这个问题，这是工业上一个大问题。在工厂，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没有和责任制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也要和按劳分配结合起来。袁宝华同志讲了按劳分配五种办法（注：1、计件工资，2、浮动工资，3、超额奖，4、按利润比例提成，5、类似农村联产责任制的新方式），还可以考虑试行包干的办法。包干是分级核算，一定程度的独立核算，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这个办法简而易行，又比较明确。什么样的企业应采取这一办法，如何试点、推广，要具体研究，总结经验。

三、积极开发煤炭，特别要首先集中力量开发山西的煤炭，因为那里条件最好，花钱少，收效快。秋里同志作了调查，有一个报告，提了很多好的方针性意见。每个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都有“支柱”。我国煤炭资源很丰富，煤炭可以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因此，开发煤炭问题是个经济战略问题。

开发煤炭可以利用外资，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要从国内挤点资金出来；要自己制造设备，包括采掘、提升、洗选、运输、发电、煤炭化工等等设备，以此提高我国机械工业的组织水平和制造能力。对开发山西煤炭应有个综合规划，并与开发全国煤炭的综合规划统一考虑，与开发全国能源的综合规划统一考虑。

当然，煤炭以及整个能源的节约工作决不能放松。近期内，必须以节

能为主。从长远考虑，积极勘探和开发煤炭、石油资源，充分利用水力发电，充分利用低质煤发电，是个战略性措施。

总之，能源的开发及合理利用，应作为我国实现四化的一个战略重点。

四、我国现在的物价很不合理，必须逐步调整。改革经济体制，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要的一条是价格问题。从长远和全局看，价格体系不改革，整个的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前进。

但是，在理论价格没有搞清楚以前，在没有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前，在经济局势没有确实稳定和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没有完全消除以前，物价不能大动。物价怎么动，要讲究战略战术。考虑物价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着眼，而且要重视政治因素。调价特别是提价一定要谨慎，没有全局观点，不作全盘考虑，零敲碎打，必然改不好，甚至要引起很大的问题。

最近两年，物价以稳定为主，或者说是基本不动，只调整个别非常不合理又明显影响生产的商品价格。应当看到，稳定经济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物价刚刚稳住，如果搞得不好，会引起思想混乱，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利。少数产品的价格，调整的步子也不能大，宁肯不足，不要过头；不足的可以继续调，过了头就难以退回。凡是影响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继续实行财政补贴办法，决不能让人民群众吃亏，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城市凭证供应副食品的制度不能取消，以保证低收入群众的生活必需。在生产没有发展起来以前，平价定量供应，至少十年不变。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至少稳定三年到五年。对农民的派购任务不能取消。穷困的地区，经过一两年比较富起来了，也要实行派购，不然，国家负担不起。

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降低化纤布的价格，提高棉布的价格，要做通盘考虑。煤炭、木材的价格怎么调，要先研究妥善办法。

注 释

1. 袁宝华(1916-)，河南南召人。时任国家经委主任。曾任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冶金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物资总局局长，物资管理部部长，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思想要解放^{*}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三十日

我觉得，我们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在对外经济往来领域中思想解放最差。（谷牧¹同志：对。）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观念造成的。应该怎么理解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和贸易完全是两码事。不等于说进口东西越少，越是自力更生。完全靠借债生活，依赖外国，当然不行，但是，以我们之所长补我们之所短，这完全是正常的，这就是自力更生。日本资源有困难，但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点，克服资源缺乏的缺点，这也是自力更生。中国跟日本完全不同，但我们也必须用我们的长处去克服我们的短处。今后中国经济建设走什么道路？是不是还要走基本上封闭的道路，自给自足的道路？这个问题，在党内没有解决。当然，去年在外贸体制改革中，由于没有经验，也确实出了一点乱子，但这仅仅是局部的东西，从总的方面来说，中国对外关系还是应该大大开放，现在是刚刚开了一点门。这是个基本方针，如果这个基本方针不定，就没有方向了。我们自己有很多优点，由于我们认识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还没有能够发挥。不扬长就扬短了。比如国际市场，我们有什么地位？一年两次交易会，这本身就是封闭式方针，世界上很多市场对我们来说是空白。

进出口委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汇报提纲》是好的。基本观点，大政方针，国务院都议论过，我说几个具体问题。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进出口委汇报会议上的发言。

第一，出口发挥优势，究竟我们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在这么几个方面：

(1) 资源。当然，很稀有的金属要谨慎。我们的王牌主要是煤炭。如果我们石油的情况出现一个比较好的情况，还是出口石油好。但从十年、二十年来说，中国的煤炭是个好东西。出一千五百万吨比较少，如果出五千万吨煤炭，就可观了。煤炭价钱肯定是上涨的。缺煤的国家恰恰在太平洋沿岸，运输线很近。煤炭出口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必须下决心解决以煤节油的问题。一九八五年以前，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出口煤而继续烧油。一吨油二百美元，一吨煤多少美元？差两倍多。一九八五年究竟能出多少煤？必须在以煤节油的前提下考虑。长远讲，煤炭出口量应该增加，再把水电搞起来，出口煤就更会增加。

(2) 劳务，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各种技巧劳动，这个局面，我们要逐步打开。

(3) 机械。

第二，进出口本身的经营，进什么，出什么，以什么换什么，有很大潜力。比如进口粮食，把棉花和食糖搞上去。

第三，要从串换上，从运筹上，从经济效益上多想办法。现在没有人组织这个事。怎么进，怎么出，这里面有很大学问，有很大的潜力。进出口委如果有兴趣，可以管管这个事。过去我们不懂，总以为种棉花挤粮食，其实不然，鲁西北农民说，这几年棉花上去了，粮食也上去了。因为棉花多了，肥料就多了。他们的口号是一亩粮食吃饱饭，一亩半棉花作贡献。有些先进队提出种一季粮食吃饱饭。一季小麦就是四百斤。现在他们只要求超产棉奖励二斤粮食要兑现不变。我找临清县委书记谈，他们说，种棉花可以促进粮食生产，三四年内，光鲁西北就可以搞到二千万担棉花。适当多进口一点粮食，发展棉花，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另外，国外化纤便宜，国内棉花便宜，我们可以倒腾，国内降价销化纤，棉织品和针织品出口，这一倒腾，就可以多赚钱。如果东北城市改变一下吃油习惯，改吃菜籽油，把大豆替下来出口，又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我们中国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华北大发展棉花，华南大发展油菜籽，把东北的大豆和华

北的花生拿来出口，非常合算，可以多换回大量外汇。要把进出口搞活一点。以进养出，也有很多文章。

第四，沿海要放手搞进出结合，几年内就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现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办法，我们沿海都可以搞，不外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我们的体制改革，除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外，所有沿海都要研究。我对上海同志说，上海主要是对外，它的条件优越得多。把第一线的外贸真正搞活了，就是一亿多人，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第五，外贸体制改革不要一刀切。我主张，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天津，多放宽一点。特别在来料加工、来样加工、产销结合、内外贸结合方面，要给他们更多的权力。我主张上海搞西装托拉斯，进料出口，产销结合。上海手帕已经搞了工贸结合的公司。

第六，外贸要把推销员队伍的建设放在重要的地位。现在这方面我们非常薄弱。真正接近外国商人的是这些人。这些人要会外语，能谈判。听说上海有四百人，占全国的一半。这四百人中，能独立工作的不到二百人，真正优秀的比例很小。现在是人家进来谈判，将来主要是出去，到国际上去。外贸的收购主要靠政策，重点是推销。外贸部要在国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网，搞自己的推销员，国内就是建立产销结合的公司。我在上海找银行信贷员、财政专管员座谈，他们讲了好多很好的意见。他们讲的意见同王光英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非常熟悉企业的情况，他们说，企业潜力大得很，问题是条条框框太多，卡住了。将来从这些人中间提拔一些干部上来，提一批。他们讲的如何利用信贷等手段挖掘企业的潜力，讲得很好。

请外贸部领导注意，外贸部讲一九八〇年是“左”。你们这样讲，能把外贸部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已经在国务院讲了两次，你们把一九八〇年的问题看得太多了，把成绩看得少了。对一九八〇年的外贸如何估计，直接关系到今后外贸部的工作，你们这样讲，到底要把外贸部那么多干部带到哪个方向上去？你们外贸部党组要注意。你们这种看法，同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书记处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当然，也可能你们是正确的，但是，你们同国务院、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你们还要认真对待。外贸会议主张外贸要稳一点，我也赞成，实际上，今年以来搞得

太死了。比如广交会的服装不够卖，但上海的服装订货却大大减少。机械委员会规定五千万元以上要报审，也卡得太死了。

注 释

1. 谷牧(1914-2009)，山东荣成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进出口委主任。曾任中共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市长，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特区办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企业整顿要把落实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工业上的问题主要是靠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发挥工人的积极性。一定要把企业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问题搞落实。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要设法搞活些。另一方面要把多余的人坚决拿出来，就地学习，就地培训，这对将来也有好处。不要把那么多人窝在那里，只讲整顿劳动纪律还不行。对这项工作至今还没有落实，一定要狠抓落实。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利润留成实行改“环比”大家有些意见。第一年上去了，第二年怎么办？这次我去胶东，他们有个办法，叫三年滚动包干，比如先一定几年（三年），明年再加一年，后年再加一年，总是一定三年，这样就不会发生到了哪一年到期了要重新定基数，谁也不敢翘尾巴的问题。我听吕培俭同志讲，他倾向于全额分成，但企业觉得没有多大油水，比例小，努力不努力区别不大。这次我在上海同他们讲，能不能在1980年（或1981年）基础上一定几年，每年递增包干，或者是三年滚动包干。全额分成就是“早涝保收”，搞好搞坏差不多，还是平均主义。

对经济责任制这个问题采取的方针是大框框先定下来，不宜过早定型，方向定了，允许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推行经济责任制，主要还是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一个是国家对企业，一个是企业内部。现在可以看出推行经济责任制是个有效办法，但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企业的情况、条件不同，具体怎么搞，不要过早定型化。由于价格不合理，企业潜力不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经委汇报企业整顿情况时的讲话。

一样，包干以后，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也要看到工业和农业不完全一样，工业之间有许多牵扯，有的产品利润就多，有的就低。总之，这些矛盾要在实践中去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但是搞经济责任制有可能走出一条路子来。

厂长是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提法怎么样？应该是“厂长是工厂行政的主要负责人，书记是工厂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后我们不要再提“一把手”、“二把手”。

条例中规定厂长的责任提到：“完成国家计划和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要发生误解。“充分发挥”可以不要“充分”两字，按六中全会决议的提法好，去掉这两个字，可以改为“注意”两字。

工厂一直要求有开除权，这个问题要解决，先在一些试点企业里试行，这个问题不解决，纪律整顿不好。企业的财权固然重要，但人权也很重要。过去被开除的人，现在还在闹翻案。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服务工作质量是全国服务行业中最最好的，除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和考核制度外，他们还有对职工的开除权，前后开除了七人，估计以后就会很少开除了。据北京饭店的同志讲，对那些有偷窃行为的要有处分和开除之权，但落实不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被开除了的，现在还到处告状，这怎么行？

整顿企业的问题，你们讲了几条是好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能不能贯彻落实，如何才能贯彻落实？比如企业领导班子问题等。

搞经济责任制，我看可能会引起企业一系列变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许多新的矛盾，虽然搞的形式和农村不完全一样，也比农村复杂得多。归根结底，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毛主席早就讲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发挥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问题在于过去只讲政治，不承认物质利益。搞社会主义，加快建设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既要加强政治工作，又要注意物质利益。企业潜力很大，尽管现在企业有社会负担重等这样一些弊病，仍然有很大潜力。企业越大，潜力越大，就是背了这么多闲人，只要包干搞好了，潜力还可以挖得出来。为什么有潜力？问题是现在企业里吃大锅饭，无人负责。

整顿班子以及基础工作，这些都和推行经济责任制、搞包干是相联系

的。财政部在云南调查的报告，我很欣赏。云南农垦统一搞包干，推动了企业的定额、统计这些基础工作。没有定额，搞计件工资、经济核算都有困难。搞经济责任制，就需要加强企业管理。没有经济利益企业就没有动力。经济责任制搞好了，企业不称职的领导班子、车间干部就混不下去了。如果没有这一条，整顿领导班子，什么人下去，什么人上来，就很难说。不把经济责任制搞好，办好企业就没有基础。企业整顿你们搞了几条，看来推行经济责任制是一个突破口。当然，经济责任制的形式现在还不能定型，但是要很好地抓住这个突破口来推动企业的整个整顿工作，推动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关于定员定额问题。严格按照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劳动部门、工会、经委要组织工作组，一批一批地整顿。必须动手才能改变，只议论改变不了现状，要组织人员下去搞，要有新突破，一般号召部署解决不了，因为确有一些实际问题，没有一点办法谁也不愿去试。

关于整顿财经纪律。整顿财经纪律，仅一般号召不行，也是要组织力量对企业一批一批地去搞，去检查，去整顿。

总的来说，企业整顿要抓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和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

关于厂长工作条例。厂长的职责明确几条我赞成，厂长能完全做得到的、行得通的，可以简要地搞出几条，哪些事厂长能办，哪些事要通过党委，给厂长的权责划个范围，其他比较复杂的纳入工厂法。是不是要一下子像这个条例那样搞那么多，搅和在一起？比如厂长的奖惩势在必行，但在现行体制下，搞不好会引起很多问题。厂长发年终奖，书记怎么办？有的会说：搞好搞坏都是你厂长的，那我不管了。如果马上这样搞，结果会怎么样？这是件好事，但有的条件成熟，有的还不成熟，如果强调全面执行，会带来不少问题。是先把这个条例发下去呢，还是先划出几条简要的能办得到的规定？你们考虑一下。

厂长可以开除工人。但要先搞一批试点，全国所有企业，一下子都这么搞怕行不通。被开除的人劳动部门包下来，你们也可以检查开除得对不对。先搞一批试点，搞好了，第二年再扩大。普遍地搞现在还不行。

利用税收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对长线而利大的产品，要提高税率，适当限制其发展。对短线而利小的产品，要适当调低税率，鼓励其发展。就是说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来调整国民经济的合理发展。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税务工作，1951年就说过，县委宁可少一个常委，也要有一个县委常委来当税务局长。

我在上海召开了一次财政驻厂员、银行信贷员座谈会，了解到他们的作用很大。冶金企业的财政驻厂员提出八九条增加财政收入的合理化建议，工厂基本上都采纳了。这些建议包括实行材料节约单项奖，作用和效果是好的。

现在国家没有一个部门考虑基建项目的投资效果，只考虑每年投资多少，搞什么项目，无人考虑在投资以后如何更好收回投资问题，这是我国搞基本建设的最大弊病。银行信贷员对工厂发放信贷，就要考虑投放多少，效果如何，何时能收回贷款。我的意见，计委今后确定基建项目后，要交由银行负责，认真计算、考核、检查其投资的效果，不如此不行。目前搞基建只从需要出发，不考虑经济效果，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这样对搞一个基建项目，就要进行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

这次我在上海，对外贸体制问题研究了一下。外贸体制要改革，不能搞得太死了。对待出口高亏产品问题，凡是中央外贸部门认为有些出口产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财政部关于“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汇报时的讲话。

品是真亏，而地方认为这些出口产品是假亏，可以让地方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上海服装行业可以搞产销结合的公司，有权进出口。其他几个沿海城市也可以这样做，外贸部来组织协调。

凡是外贸部门认为经营出口的产品是高亏的，可以由地方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自负盈亏，这条原则可以定下来。

我们办什么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窝蜂。外贸体制改革，也不要一刀切。对上海、天津等城市要放宽，权力应大一些。沿海城市放手搞进出口结合，几年之内可以有大的成效。先把沿海城市工贸结合搞活一些。当然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出口更要搞活一些。以后逐步推行到内地。对外贸体制改革，不一定说搞就统统搞，说不搞都统统不搞。这样不行，一定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

目前对有些问题的改革，既要统筹兼顾，全盘考虑，又要对看准了的先进行实践。如我这次到山东胶东，听到反映海带问题。一方面各地很需要，另一方面海带又有积压，卖不出去，我看主要是海带经营环节太多，应划一定地区由山东经营。

改革工商税制，总的原则是对企业产品利润和税收的合理调整，不能影响物价，不能转嫁负担，影响消费者的利益。有些特殊产品（如烟、酒），可以实行专卖。

城乡小商品的价格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调整，有的价格势必要有浮动，有的价格要由国家补贴。

小商品的价格问题，由国家经委牵头，物价总局、轻工部、财政部等部门参加，研究提出一个办法。

山东省搞经济责任制，不仅工业企业搞，而且已发展到商业、饮食业（经营环节），据说效果很好，请经委注意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进行工商税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不是主要目的，而是为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能够得到稳定增长，企业产品利润的合理调整和分配，不能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增加财政收入要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增产增收、增收节支上下功夫，要从整顿财经纪律上想办法。明年财政问题要早研究，如何包法。

最后总起来讲几点意见：

1、改革工商税制是企业产品利润的合理调整和分配，不能转嫁负担。

2、改革工商税制，可以分步骤地进行，有些可以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

3、今天汇报的《改革工商税制的设想》不作为定稿，可以先发下去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

总之，一个企业利润太高，不利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可适当提高税率，多征点税。有的产品利润太高，又不能调价(如手表等)，通过税收形式进行调整，就比较恰当。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找出路 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

一九八一年七月

七月中下旬，我们到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作了一些调查，同省市县的同志、基层干部、驻厂的专管员信贷员、经济理论工作者、工商界人士一起，座谈讨论了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的意见。在此前后，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也曾对编制“六五”计划和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了对策。上次我在四月十四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曾讲了怎样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来。这次围绕调整时期如何保持一定速度，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前进讲一些看法，可以说是上次讲话的继续和补充。下面共分八个问题讲。

一、调整时期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积蓄力量

目前我们正在编制第六个五年计划，速度问题引起了全党的关注。近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在这次调整中，国民经济的发展究竟能有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五年之后能不能积蓄起力量，使我们在调整以后有一个新的起

* 这是赵紫阳在1981年7月中下旬赴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就经济调整 and 改革进行现场调查指导时的讲话综合稿。他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在经济调整时期如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前进等问题。他指出要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的同时，相应地把重工业的调整搞好；抓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以建立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整顿好企业；重点抓好能源交通带动工业的发展；筹集使用好国内资金；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前瞻性。

点？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过去调整的历史，分析当前经济状况，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次调整与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有相同的地方，但有很多地方显著不同。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把“小土群”和许多效益差的企业关掉了，两千万职工精简回到农村，不仅基本建设的投资大大缩减，连消费基金也大大减少，背上的包袱很快扔掉了。所以，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间虽然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但到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很快就恢复过来，提出了搞“三线”建设。这说明已经积累起力量了。这次调整却大不相同，国家的负担比一九六二年大得多。一些工厂关停了，工资还要照发，职工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随着就业人员的增多和工资的调整，工资总额增加了，奖金也增加了；农产品提价以及外贸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使国家补贴大为增加，今年将达二百三十亿元之多；不少基本建设项目下了马，但引进的设备还得进来，贷款和利息要照付，维护保管也得花钱；文教、科研等必要的经费还得增加。总之，财政上的困难很大。形象地说，上次调整是甩掉包袱前进，而这次是背着包袱前进。这种情况决定了：第一，这次调整不可能有较高的速度，因为多年来遗留下来的许多欠账要偿还，我们所采取的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系列调整、改革措施，贯彻落实还有一个过程，有些马上还不能奏效；第二，这次调整，也不能没有一定速度，更不能像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那样速度出现负数。那时候以紧缩求平衡，可以收到积蓄力量的效果。这次单靠紧缩就不行。据测算，要是保持百分之三以下的速度，五年中连财政赤字也不能解决，即使今年基本打平了，后四年赤字还会出现，稳定经济的目标难以实现，更谈不上积蓄起力量。而且，在五年以后，在“七五”期间速度也不可能快起来，生产就有萎缩的危险。这几年困难一点不要紧，关键是要为今后积蓄起力量，奠定好基础，这样，“七五”的后期也才可能有较理想的速度。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六五”期间至少保持百分之四的速度，“七五”期间保持百分之五六的速度，事情就比较好办。有了一定的速度，才能保持一定的财政收入，才有积累。所以，调整期间保持一定的速度十分重要，它有利于当前经济的稳定和今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定和国家的巩固。

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汲取过去的教训，指导思想决不能急于求成，超越客观的可能，搞不切实际、不讲实效的高指标；同时也要防止指标越

低越好，任务越少越好，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应该达到的速度也不去争取。这次调整，同一九六二年相比，有不利的方面，但有利条件也不少。这几年工农业生产一直是上升的，市场供应比那时显著好转，休养生息、藏粮于民、寓富于企业的政策已见效果，国际条件对我也十分有利，物质技术基础比一九六二年雄厚得多。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潜力大得很。只要我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完全可以克服困难，在经济建设上缓过气来，由被动转向主动。

“六五”期间，为了保持一定速度，当前稳定经济、紧缩开支等一套措施，必须继续贯彻，不能松懈；同时为了活跃经济，调整结构，还需要采取一些新措施。陈云同志讲过，先死后活。要看准一个，放活一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说，必须走提高经济效果之路，使投资不那么多，效果比较好，人民能够得到更多实惠。我们所要求的速度，应当是实实在在的，是真正使社会财富增加，符合需要的产品增加，可供分配的收入增加，而不是虚假的、水分很重的产值、产量指标，不要这边从工厂里生产出来，那边又积压在仓库里。以下讲的七条，中心思想就是要从提高效果中找出路，从挖掘潜力中求速度。这样做，才符合我国国情，才会收到实效。

二、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的同时， 相应地把重工业的调整搞好

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是把国民经济搞活，使调整时期保持一定速度的重要一着。今年初，中央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后，已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开始取得成效。据1-7月统计，轻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1.7%，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一九八〇年的47.1%上升到占50.6%。供应市场的消费品花色品种增多，对回笼货币、增加收入、满足人民需要起了良好的作用。看来这条路子是对的，要坚决按照国务院的部署继续抓下去。当前特别要重视广辟门路，提高产品质量，做到适销对路，避免盲目性，反对粗制滥造，以便站稳脚跟，稳步前进。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就是重工业下降比较大，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今年1-7月，重工业的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

8.3%，在一些重工业比重大的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超过了轻工业增长的速度。这种情况在调整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有些小企业，船小好掉头，而一些大企业要改变服务方向，掉过头来就不那么容易。重工业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即使消费品增长很快，也可能弥补不上。今年上半年虽然轻工业增长较大，但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 0.8%，全年要达到 3% 的速度就很吃力。还要看到，重轻工业之间是互相联系、按比例发展的，重工业掉不过头来，继续大幅度下降，必将限制轻工业的发展。如不采取措施，继续让重工业萎缩下去，今年和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应把重工业当成“包袱”，而应当使它在调整过程中，在能源许可的情况下，尽快活起来，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要使重工业活起来，并不是要大办新厂，铺摊子，多耗能源，而是要有一些新的办法。

第一，重工业的根本出路是要调整服务方向。重工业可以直接生产一些耐用消费品，但比重不会很大。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多年来重工业自我服务的状况，更好地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在服务中求得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乡经济活跃起来，社会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多，轻、重工业都有广阔的市场。而且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方针的贯彻，外贸事业的发展，国际市场也大量需要优质价廉的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一方面摊子多，战线长，“吃不饱”；另一方面有很多东西又“吃不了”。所以，最关紧要的是要改变服务方向，提高服务质量。外国公司和我合作，在南海开发石油，预计总投资二三百亿美元。一是设备修理，一是生活服务，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可以拿回一百亿美元，这是一笔大生意。今年底就要投标，明后年就要全面展开。我们是主权国，具备着有利条件，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权。问题是我们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造船工业能不能担当起这个任务。如果我们不及早动手，恐怕这笔生意大部分要被香港、新加坡抢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把中央有关部门的力量、把广东省的力量组织起来，建立起修理基地、生活基地，力争多承包一些项目，这就会带动我们的重工业以及轻工业、服务行业等。至于国内市场需要的许多工业产品，重工业部门服务方向转过来以后，是大有可为的。事实说明，有些企业转变得快，就得到发展。如首钢今年生铁任务比去年减少二十九万吨，钢减少十二万吨，总产值要

比去年减少 9%。但他们却创造了减产增收、提高效益的经验，全年利润上交预计将达到 3.12 亿元(包干为 2.7 亿元)，比去年增长 8.7%。他们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经济责任制，发动职工扭转服务方向，增产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主攻节约能源，低消耗，上半年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只要方向对头，在实践中路子是会越走越宽的。

第二，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来振兴重工业。整个国民经济都需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包括重工业在内。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详细讲。技术改造开展以后，不仅机械、冶金、建材等部门可以活起来，而且过五、六年，原有企业的面貌就会有较大的改观。我赞成对现有库存的机电产品进行清理，不行的就报废，研究个办法来。不报废旧的，新产品就出不来。现在不是“推陈出新”，而是“推陈限新”，限制新产品。今后更换的设备就回炉炼钢，不要国营企业转给集体企业，集体企业转给街道企业，街道企业转给社队企业，从整个社会来看，这样还是增加了能源和交通的负担。

第三，国家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支持重工业的调整、发展。基本建设总是要搞的，像电站、矿山机械等重要的大型设备，要花几年才能造好，在国家计划确定以后，有些项目可以预先安排。还有一些重工企业，只要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帮助解决一下困难，很快就上去了。我国最大的镍生产基地——金川镍矿，第一矿区已接近枯竭，第二矿区设计规模年产三万吨，到去年底，已完成投资三亿一千万元，还差一亿四千万元资金即可建成，一九八三年就可产镍一万五千吨。他们提出向国库借八千吨镍在国内外市场销售，解决资金问题，投产后四年就可将镍全部归还国库，每年利润可以增加一亿元。现在国家储备的镍已达十一万吨，超储很多，借出八千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却救活了一个企业。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只要认真对待，重工业活起来是有办法的，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出现一个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三、抓紧搞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

抓紧调整时期，把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搞好，这对于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积蓄力量都有重要作用。过去，我们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外延，建新厂。即使搞一些挖潜、革新、改造项目，照上海同志的说法，还是搞

“厂内外延”居多，形成“生产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现象。今后在经济建设上，我们必须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内涵上多做文章。调整过程中，扩大再生产在外延方面搞得很少了，如果内涵上不具体、不落实，就有两头失落的危险。通过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来挖掘潜力，是扩大再生产走以内涵为主的道路的主要内容。这项工作不落实，依靠现有企业发展生产的方针就会成为空话。农业上，我们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样，工业上，也主要靠政策，靠科学技术，使技术进步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整个工业，都要通过改组、改造，才能走向振兴、繁荣。当前处于调整时期，基本建设规模大大压缩，钢铁、水泥等材料也没有那么紧张，机械工业大量的生产能力在闲置着，应该是进行技术改造的好时机。如果这几年不把它摆在重要日程上，切实做出成绩来，那么，企业的设备再拖几年，有的磨损加大了，有的越来越陈旧，甚至要报废，成了老牛拉破车，整个工业生产就有可能垮下来。这几年把设备更新、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抓好，一可以使老厂得到改造，增加新的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二可以使重工业有活干，带动机械加工工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发展。看起来不像新建一些厂，增加那么多产量，但却使我们整个工业在质上提高了。扎扎实实地搞几年，就可以使我们的大批企业有了新的装备、新的工艺和技术，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我们的工业就有了新的起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普遍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这次在上海，听到一种说法，“没有任务的企业，天天忙于找任务；有任务的企业，天天忙于完成任务”。领导精力顾不上研究技术改造问题。应当统一认识，下决心把这件事抓起来。

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不是笼统地、单纯地追求搞自动化，而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自动化是需要的，但要分别轻重缓急。中国劳动力多，这个问题现在不迫切。工业上应当考虑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成果，把知识密集和劳动密集结合起来。知识密集不一定是搞自动化，不要在这方面花很大的力量。外国用“集约”这个词，强调减少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讲中国式的“集约”，主要不是强调这点，而要讲提高质量，降低消耗，节约能源等。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业的技术改造、挖潜、革新，要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一是围绕改革产品结构。要使产品日新月异，不断升级换代，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要有大批优质价廉、式样

新颖、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上海市轻工局系统提出今后要围绕日用化学、食品两个行业和十五大类产品，开展技术革新和设备更新，重点研究推广电子、水处理等八个方面的新技术，使轻工产品“数量要增加，质量要升级，品种要发展，缺门要填补”。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二是围绕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改革工艺和设备。比如全国一千二百多万千瓦中低压发电机组，年耗标准煤约四千万吨。用二十万千瓦大机组代替，每一千瓦一年就可节约一吨标准煤，如果几年内改造一半，一年就节约六七百万吨标准煤。三是要围绕充分、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综合经济效果来进行。比如石油化工，很多有用成分由于我们加工的深度不够，没有综合利用，因此赚不了钱，有的还要亏本。要是在技术上、设备上、工艺上进行革新，就能把被抛弃的有用成分提取出来。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过程。

技术改造，不要一哄而起，一窝蜂，一刀切。应当在调整的前提下，在企业的联合、改组的基础上进行。上海的经验，就是按行业统一规划，不能一个厂搞一套，那样容易产生盲目性，形不成力量。企业的改组、联合，由于涉及地区和部门的所有制，阻力很大。根据前一段的经验，看来需要从中心城市或工业基地开始，按行业或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的办法较好。既不是由省、地、县来打破部门的界限，也不是由部门来打破地区的界限。从中心城市、工业基地做起，按生产的需要组织起来，逐步扩展，就较容易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有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解决，如怎样使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制和新技术的采用有内在的动力，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怎样得到解决，等等。有关部门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办法来。我看在计划安排上，还是应当贯彻“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从各方面保证企业的技术改造，进行挖潜、革新。

技术改造，要同发展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使科学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现行的体制，把科研和生产分开，各管各，两张皮。在生产第一线，科技人员普遍不足。上层科研部门却集中大批科技人员，脱离生产实践，这种情况急需改变。去年以来，有些科研部门与生产部门联合，组成经济联合体；有些地方，试行了技术联产责任制，使科研部门能够直接面向生

产，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也有了科研试验场地。现在许多新产品、新技术，还达不到商品化阶段，不能普遍推广，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做到能供生产上实际采用，采用了能见到实效。我们制订的“六五”计划，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划同经济发展规划很好地结合，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把技术改造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认真研究。在“六五”期间，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要有重点，集中抓几件大事。如改造锅炉、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可以节约几千万吨煤炭，应作为一个重点来抓。目前我国铁钢比还大于1，发达国家一般在0.7左右。钢发展到三千万吨的时候，废钢铁就比较多，炼钢应多吃废钢铁，少用生铁。机械工业也要以钢代铁、以焊代铸。钢铁比每降低0.1，按目前产量，一年可节煤六百多万吨。各行各业都有一些经济效果很好的新工艺和设备，如水泥的窑外分解，平板玻璃发展浮法工艺，火力发电搞高参数大容量机组，猪皮多层利用等，应当看准方向、确定重点，规定一些重大的技术措施和技术政策，组织力量，促其实现，使科学技术在调整期间发挥更大的威力。

四、以建立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整顿好企业

整顿好现有企业，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果，增加财政收入，克服困难的最现实的办法，也是使我国工业建设走上新路子的根本措施。这几年在企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努力下，完成了国家计划，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所改善。但是必须看到，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产品消耗高、浪费大，许多经济技术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在国内是个经营得比较好的企业，花了七亿美元的投资，我叫他们都按国际价格算，他们说，这样每年只能盈利五百万美元。可见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目前工业企业利润上交减少，亏损面大大增加。今年1-7月，工业累计上交利润229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2%，除纺织、轻工外，其它部门都有下降。企业的亏损面上半年达到31.5%，亏损金额达到2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5%。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经营管理的不善、财务管理的混乱，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当前必须在调整、改革的同时，突出抓一下企业的整顿，

向企业的落后状态开战。企业不整顿好，我们经济建设中千百万个基层细胞活动不正常，调整和改革的措施不能很好贯彻，就无法实现良性循环，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整顿企业，国家经委提出了六条标准和要求。我看重点还是要抓好整顿、建设领导班子和整顿、完善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全面经济核算。整顿班子和基础工作，这些都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相联系的。抓住经济责任制这个突破口，就可能引起企业一系列的变化。办好企业，归根到底，要依靠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靠人的作用。调动企业和人的积极性，一方面要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他们的物质利益，二者必须结合。全国几十万个工业企业，几千万职工，如果他们没有什么积极性，什么事都搞不好，不管你上边怎么着急，电话会、现场会不知开多少，也是收效甚微，事倍功半。把政治思想工作和承认人们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适当地调节人们的物质利益，就会出现一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农业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战线也开始有这方面的好苗头。现在企业各方面的潜力非常大，这点大家都承认。可是许多事无人负责，潜力挖掘不出来，问题就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情况没有解决。实行经济责任制能有效地克服这两方面的平均主义。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通过包干或利润留成等办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同时企业内部也要建立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正确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从而使企业和职工都有了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抓好建立经济责任制，可以推动企业的其它工作。最近，我看了财政部的一个调查材料，云南省农垦系统过去长期亏损，统一搞包干，推动了定额、统计这些基础工作，很快扭亏为盈。因为没有一套比较先进、合理的定额，搞经济核算，搞计件工资或记分计奖都有困难。一实行经济责任制，这些工作都要跟上去。过去吃大锅饭，领导班子差一点还可以混下去；实行经济责任制后，你这个厂长当得不好，车间主任当得不好，与大家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群众就不选你。没有这一条，不进行管理教育，什么人选上来，什么人下去就很难说。所以，当前要以推行经济责任制为突破口，来带动企业的整顿工作。

今年以来，工矿企业和商业服务行业，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

正在试行以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不少省市通过包干，一层包一层，把年初难以落实的财政任务基本落实了下来。天津市就是按行业一个局一个局包干。山东济南市对企业采取“上五包”、“下五保”的办法，即市包局，局包厂，厂包车间，车间包班组，班组包个人；个人保班组，班组保车间，车间保全厂，厂保局，局保全市，层层负责，奖罚分明，目标明确，人人主动。全市国营工业企业今年上交利润落实任务20115万元，比去年增长7.6%。上半年已完成952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目前价格不合理，外部条件不稳定，给包干带来一定困难。包干基数如何定，要很好研究。但是，有个总原则：国家的收入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要保证增加。在这个前提下，兼顾企业、个人的利益，决不能挖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要把管理工作跟上去，制定先进合理的定额，认真搞好核算，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多下功夫。现在包干的方式，多种多样，具体形式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过早定型化，要允许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通过包干、按行业利润分成等办法，实践一个时期，可能为今后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以税代利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整顿企业，要把加强财务管理、遵守财政制度、严肃财经纪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不少企业的财务管理混乱，财经纪律废弛。少数企业领导干部，迎合某些职工的落后情绪，弄虚作假，损公肥私，截留上缴利润，偷税漏税，搞邪门歪道，乱发奖金和名目繁多的补贴，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制止。光偷税漏税一项，今年只是稍微抓一下，全国就是五六亿元。如果把企业的“跑、冒、滴、漏”堵住，那么一年增加几十亿财政收入不成问题。我们坚定不移地主张改革，把微观经济搞活，把作为基层细胞的企业搞活。但放活以后，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有的人以搞歪门邪道来对付国家。过去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现在权、责、利挂钩了，他开动脑筋了，好的、坏的点子都会有，就可能以不正当的手段去攫取利益。对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回头走老路，一切都收回来，统得死死的。而是应当在对企业放活的同时，在宏观上加强对企业的计划指导、管理和监督。这两个方面要同步，活一分，监督的东西要强化一分，在矛盾中前进。过去往往是用唐僧念紧箍咒的办法对付孙悟空，以后要用如来佛的办法，让他在自己手板心里活动，就在这个范围内活，超过这个范围就要限制。

既放活，又监督，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要么就活，要么就死，“死”“活”没有走出一条路来。在新的形势下，要研究这个问题，走出新的路子。我认为，一是要加强经济立法，从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做起，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逐步制订一大批经济法规、条例、条令、办法来，使企业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二是有大批人进行监督。企业的合法权利，不能加以干预，但是，越轨的行为，要有人代表国家进行监督、检查。除了各经济主管部门，财政、银行、税收、工商行政等部门要加强监督外，我在上海同派驻工厂的财政专管员、银行信贷员座谈，感到他们工作得很好。这些同志很有经济头脑，既监督企业，又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看来驻厂的税收员、专管员、信贷员，这几员是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大批人找企业的毛病，并帮助它解决。我们要研究和创造这方面的经验。

整顿企业，一定要把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搞落实，把轮训工人和干部落实。经委、工会、劳动部门和各主管部局，要组织工作组，一批一批地整顿。车间里泡那么多人，没多少事干，把人都搞懒了。定员以后，坚决把多余的人拿出来，就地组织轮训。上海金山石化总厂是个现代化企业，在国内也是搞得好的。日本朋友对他们的建议有两句话：管理要努力，队伍要培训。这有一定道理。我在渤海采油平台上也看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现在设备现代化了，职工队伍的水平也要求现代化。我们引进的一些现代化设备，花钱是按现代化的要求花的，但是使用时不是按现代化的方法用的，我们的硬件是现代化的，软件不一定能现代化，以致造成很大浪费。应当强调，在调整时期，必须把职工轮训这项基本建设抓好。现在老工人一天天退休，新工人如不抓紧培训，我们工人队伍的政治和技术素质会日益下降。要抓紧培训工作，进行智力开发和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别轮训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的学习侧重解决基本功的问题，技术人员学习侧重解决技术老化的问题，管理干部侧重解决经营思想问题，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要整顿劳动纪律。工厂的许多干部一直要求有辞退工人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劳动纪律难以整顿好。广东珠海市石景山旅游中心，服务质量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好的。除有严格奖惩制度、考核制度外，他们有对职工辞退的权力，而且实行了。这件事可先搞一批试点。辞退工人，要征求

工会意见，辞退以后由劳动部门包下来，另行安排。要制订具体办法。

整顿企业领导班子，除了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散、懒问题，老化问题外，还要解决企业里党政分工的问题。我们现在普遍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厂长的职责要明确几条，哪些事厂长能办，哪些事要通过党委，要划个范围。厂长是行政的主要负责人，要把生产、行政的指挥权交给厂长，由他对生产、行政和经营管理全面负责。

副厂长必须对厂长负责。要尽快把厂长工作条例制定出来，公布试行，逐步完善。现在，企业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有了工作条例，再加上一个厂长工作条例就比较齐全了，企业就有所遵循了。

五、抓能源、交通带动工业的发展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制订“六五”计划时，我们既要考虑当前的困难如何渡过，又要考虑什么时候国民经济能够出现转机，开始良性循环。在“六五”以后或“七五”后期，国民经济有没有一个较快的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得怎样。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石油的产量是直线上升的，由五百多万吨，发展到七六年的近九千万吨，支撑了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次调整以后，国民经济靠什么支撑呢？当然，石油必须继续抓。要稳住现在一亿吨的产量，并抓紧海上石油的开发。除此以外，必须下决心挤出力量抓煤炭。我国已经探明的煤炭储量有6500亿吨，居世界第三位，是我国经济的又一张王牌，应当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调整时期经济上各方面矛盾很多，一定要综合平衡，一定要有重点。通过抓煤、石油、水电、交通，机械、冶金、建材、建筑等行业也有活干了，重工业也就带活了。正如邓小平副主席指出的，抓能源、交通，以能源带动工业发展的路子是对的。在制定长远规划中，必须考虑这个由被动转向主动的战略布局。

能源问题，近期内主要靠节约。节油、节煤、节电、节水，要大造舆论，要有强有力的措施。上次讲的以煤代油、以水电代油，节油出口的措施必须坚决落实，节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决不能放松。同时，要认真

考虑能源的开发，否则下一步棋活不了。既要抓当前就能见效的，也要抓五年、七年才能见效的，把当前与长远结合起来。

要把开发山西煤炭作为重点来抓。山西的煤炭资源丰富，品种齐全，投资小、见效快，距海岸线也较近，应当把它建设为面向全国的能量基地。山西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为二千亿吨，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且煤质好，埋藏浅、面积大、煤层厚、倾角缓，建设大中型矿井的投资和建设周期，都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三分之一，吨煤成本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四分之一。现在年产1.2亿吨，调出7200万吨。根据山西省、煤炭部和专家的测算，到一九八五年产量可达到1.55亿吨，调出一亿吨；一九九〇年达到二亿吨，可调出1.5亿吨，比今年净增八千万吨。能源研究会建议，要像五十年代搞大庆油田那样来开发山西煤炭，这个决心要下。这不仅是缓和近期能源紧张，摆脱国民经济困境的应急措施，而且关系着今后国民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全局。

为了把晋煤开发好，余秋里同志提出要充分发挥现有矿井的作用和老基地的作用，坚持两条腿走路，贯彻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经过专家论证，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开发山西煤炭，要从调整时期的现实情况出发，立足于近期内多出煤。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这几年怎么办，这一段如不能增加煤的产量，就不能缓过气来，困难就不能渡过。所以，在开发的方针上，应该是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近期内以多搞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中小矿为主，大的项目不能多搞，像平朔露天矿那样年产千万吨以上的现代化大矿，只能搞个别的。即使是大矿，也要一次设计，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以求早出煤、多出煤。秋里同志提出的坚持老矿的挖潜、革新、改造，对一些储量丰富、开采和运输条件较好的矿井，进行有计划的改造、扩建或在老矿区建一些新井，再加上认真对煤矿进行整顿，我看这是近期增产煤炭的有效措施。为了调动山西各级开发煤炭的积极性，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在粮食上，要给予支持，今后在煤矿就搞两种劳动制度；帮助山西统筹规划，建立以煤矿为基础的综合生产基地，逐步形成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科研、机械部门要为开发山西煤炭提供精良的设备等。计委、能委、煤炭部、财政部等单位应会同山西省研究制订出方案来。

开发煤炭，必须同交通运输同时考虑。山西现有五条铁路干线，境内铁路运输能力已超过饱和临界限度。加上铁路车辆不足及省内短途集运能力的限制，致使全省积压煤炭一千多万吨。与晋煤外运相关的省外运输线路通过能力和港口吞吐能力，也相差很远。交通运输已成为开发晋煤的重要限制因素，必须坚持运输先行的方针，大力进行建设。据专家估算，开发煤的投资和交通运输的投资为1:1，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对煤炭的采运失调问题，要统一规划，加快步伐，综合治理。铁路、港口的建设，应抓紧进行。此外还要注意加大洗煤比重。山西煤炭的入洗率只有百分之九，比全国平均入洗率18%低一半，这个问题要解决。还可利用洗下的煤，建设坑口电站，外送电力，尽量减轻铁路运输负担。

为了适应煤炭工业发展的需要，应改革管理体制，实行产运销统一。煤炭的产、运、销工作，原来是由煤炭部统一管理的。一九七八年开始，改为煤炭部门管生产，物资部门管运销。现在看来，这种体制使产销不能直接见面，难于合理组织生产，合理利用各类品种的煤炭资源。化工部的专家提出，晋城地区的无烟块煤成分适合作化工原料，一吨要顶普通煤二吨用，但过去却调去烧了。如果统一管理，产销结合，将晋城煤1200万吨调给中南、华南、辽宁的化肥厂作原料，可顶出现在用的原料煤2000万吨，而且可以使中小氮肥厂每年增加利润近十亿元。经征求经委、能委、计委等单位的意见，看来煤炭的管理体制应当改革，有步骤地把产运销统一起来好处多。

开发山西煤炭的资金问题，主要是靠国内积聚资金，也要利用一部分外资。平朔露天矿与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资经营问题，经过技术经济中心组织专家论证，认为是可行的，应组织力量把论证、规划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开发方案与外商深入谈判。利用出口煤这个条件，借用一些低息的外资是可能的。我们从各方面挤一挤，想些办法，把晋煤开发这件事抓紧，几年之内是会见效果的。

此外，水电建设也应重视。特别是对在建的大中型水电站，如葛洲坝、白山等，能多投一些资，加快建设步伐，几年之内可多装二三百万千瓦投产，顶出烧的油、煤，这也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的办法。

六、筹集和使用好国内资金

调整时期最大困难是财政赤字，资金短缺。我们不仅要消灭赤字，摆脱财政困难，而且必须积聚一定的资金投入建设，为今后经济的发展争取有个较理想的速度创造条件。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应当很好研究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

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四个办法：一是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二是紧缩开支，适当控制消费；三是利用好国内资金，把分散的、该集中的资金适当集中，同时把人民的消费基金的一部分，通过银行聚集起来，转化为积累，用于建设；四是适当利用一定数量的外资。

解决财政困难和资金不足，根本办法是要把经济搞上去，使城乡经济活跃起来。当前一方面财政很困难，另一方面经济上的潜力又很大。如何把它挖掘出来，增加财政收入，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采取一些新办法，不能完全搬用老办法。现在第一位的问题，不是中央能拿多少钱，地方拿多少钱，列入国家预算的多少钱，而是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加。要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努力生产，减少浪费，提高效益，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来。只要生产上去了，经济效益好了，不管钱在哪里都好办。所以解决财政困难，第一位的问题是提高效益，增加财富，其次才是搞好分配，看国家拿多少，地方拿多少，集体拿多少，个人拿多少，实行三兼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方和企业的钱多了，工人、农民手中的钱也逐渐多起来，这是同一九六二年那次调整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应该说回旋余地比那时大多了。我们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长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很快，一九七九年增加 205 亿元，一九八〇年又增加 318 亿元。企业存款一九七八年为 368 亿元，一九七九年增为 469 亿元，一九八〇年增为 573 亿元。城镇储蓄一九七八年为 154.4 亿元，一九七九年增为 202 亿元，一九八〇年为 282 亿元，今年六月末为 323 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也由一九七八年的 56 亿元，增加为一九七九年的 78 亿元，一九八〇年的 117 亿元。这说明，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积极性调动起来，创造的财富多了，钱比以前多了。但这些钱比较分散，不可能都纳入财政上来。如果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收上来，由国家高度集

中使用，一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就没有了，第二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钱了。在资金这样分散的情况下，矛盾怎样解决呢？国家搞必要的建设缺乏资金，而某些地方和企业有了钱，就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横冲直撞，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冲击很大。对这些分散的资金，不能简单地去收，应当采取经济办法，因势利导，集中起来。钱，你的还是你的，但要引导用到国家需要的方向上来。如果采取老办法，就山重水复；相反，如果走新路，就会柳暗花明。我们一方面应采取切实措施，增加财政收入，这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要发挥银行在筹集资金中的积极作用，通过银行再分配，作为财政再分配的补充。

筹集国内资金，可以采取储蓄、债券、保险、办信托吸收游资等办法。日本战后资金也很困难，日本政府通过银行把分散在千家万户的闲散资金集聚起来。日本一九六四到一九七三年，平均储蓄率为12.8%，一九七八年我国的储蓄余额中，定期存款占80%，有200亿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投入建设用的。目前我国职工的储蓄率才上升到9%，发展的余地还相当大。各种形式的储蓄，包括有奖储蓄都要积极开展。同时，每年可以视情况发行一部分能源建设债券或重大建设项目的公债券，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购买。这样每年几十亿元是可以拿到的。长期储蓄的利息和放款的利息，可适当提高一点。有些建设项目需要贴息的（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财政上可酌情给予补贴。上海郊区，对凭票供应的自行车、缝纫机，试行预收货款、分期交货的办法，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回笼货币，限制倒卖票证、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据几个试点单位的调查，农民预购自行车、缝纫机的货款，约有20%—40%是从银行提取的，大部分是家里贮存的现金，这对回笼货币也是有作用的。还有其它一些办法，可以试验。集中起来的资金，不纳入财政预算，主要通过银行去办，让银行真正发挥作用。

银行筹集的资金。如何使用？应当实行计划指导，资金的筹集和贷款的发放，都要纳入综合的财政计划和基本建设计划，进行综合平衡。贷款要有物资保证，做到有钱、有物。贷款的项目，由计委安排，但需由银行进行核算，择优发放。我国现在没有一个部门和机构认真考核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只考虑每年投资多少，搞什么项目，没有考虑投资后如何收回。计委管计划，建委管施工，银行管拨款，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成发钱的

不管收钱，用钱的不负责还钱，这是我国基本建设工作上的最大弊病，造成的浪费不知有多大。今后要逐步进行改革，建设项目的拨款，要转给银行管，投资的回收也由银行负责。对建设项目，一定要讲效益，不要花了投资，长期不受益。基本建设应当有个总体规划，特别是对大的建设项目，要考虑从哪里搞起，是从头搞起，从尾巴搞起，还是从中部搞起，要认真进行核算，选择出最佳方案，做到逐步受益，不能十年不受益。这样，对银行、对计划、基建部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银行发放贷款的经验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他们要求做到“精心挑选，彻底核算，严密监督，系统分析”，每一个项目都要经历六个阶段的建设项目周期，即项目的审选、准备、确认、谈判、执行和监督，最后评价。确定一个项目一般要两年时间。他们选定的项目，95%以上都是成功的，基本上按期收回了贷款。我们也要注意改进银行的工作，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把资金管好、用好。

七、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战略上不能囿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墨守国内自我循环的陈规，必须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开放的方针，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把国内市场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大力开展对外的经济技术交流。我们讲坚持自力更生，这同发展对外贸易并不是矛盾的。不能说出口越少，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就越好。在经济上，以人之所长，补我之所短，形成我国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这就是坚持了自力更生。这个基本方针要定下来，否则没有明确的方向。这几年我国对外贸易有了显著进展，四年来平均出口增长速度为13.7%，高于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的速度。一九八〇年出口达到180亿美元，比一九七七年增长1.4倍，进口203亿美元（含地方的15亿美元），增长1.8倍。这是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反映，是外贸体制初步改革的成果。不能认为前两年外贸搞了“高指标”，搞“左”了；更不能把“外贸工作有个大的发展”的提法，也当成错误的东西来加以批判。从我国的国力、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看，外贸工作不是发展过快，而是不相称。在调整时期，外贸工作需要也有条件搞得快一些。这对于我们克服当前的困难，积蓄更多的力量是有益的。

外贸出口，要发挥我国的优势，确立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拥有一大批拳头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我们要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资源。钨、锑、钒、钛等稀有金属和稀土等资源，我国在世界上很有地位，但这些都是战略物资，出口要谨慎。石油和煤炭，是我国经济的两张王牌。随着节油和海上石油开发的进展，要增加石油出口量，赚取外汇。煤炭，我国藏量丰富，而太平洋沿岸不少国家缺煤，运输比较方便。国际市场对煤的需要量持续上升，价格上涨也较快，要积极开发出口，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骨干商品。

我国农业上也有许多优势。大米的产量，我国占世界第一位，大豆、花生、芝麻等也曾大量出口。我们应当有计划地逐步改变食物构成，从城市首先做起，由吃大米为主逐步改变吃小麦，由吃豆油、花生油为主逐步改吃菜籽油，腾出大米、大豆、芝麻、花生等出口换回小麦、玉米，这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改善食物营养成分也有好处。我国还有传统的土特产品，应大力发展，占领世界市场。

二是劳力。承包工程、劳务出口刚打开局面，近年来已对外签订4.6亿美元的合同，今后发展的前景是好的。此外，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技巧劳动产品的出口，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工艺品享有盛誉，要发挥我国文化艺术的特色，尽量使日用品美术化和工艺品日用化，以适应国际市场广大客户的需要。供观赏的贵重的高级工艺品，只能搞少量的；大量的还是要搞实用的美术工艺品。服装，尤其是上海的西装是有基础的，这实际上也是劳务出口。要认真搞好设计，适应世界的潮流，研究外国人的特点和服装的发展趋向，加上中国的特色，独立设计自己的出口服装，做到新颖、美观、适用，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三是机械产品。许多机电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已逐步减少和停止生产，要抓紧时机走出去，进入世界市场，特别要注意发展成套设备的出口。缪云台¹先生建议，自行车的出口我国应当占世界第一位。船舶出口也很有希望，到今年四月底，已签订六十万吨民用船舶的出口合同，成交金额五亿七千万美元。香港联成轮船公司董事长包玉星²先生估计，由于地理条件和劳力、技术条件，到一九九〇年中国的船舶出口将达三百万吨至四百万吨，在十年至十五年内逐步取代日本。这个估计可能有

些偏高，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只有中国具备条件取代造船业日益走下坡路的日本。增加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是改变出口结构的重要方面，是外贸方面调整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在设备更新换代和填空补缺中，把引进技术与自行研究设计结合起来，积极研制创新，树立信誉，创出牌子。

进出口的经营应当改善和加强。要讲运筹、经营、串换。出口什么，进口什么，经营得当可以搞得很划算。怎样搞才对我国有利，这里学问很多。比如现在国际市场上是化纤织品便宜而棉织品贵，而我们国内却相反，棉织品便宜而化纤织品贵。我们可以多进口化纤，少进口棉花，多消费一些化纤织品，腾出棉织品增加出口，再配合进行一些价格上的调整，这样一进一出，可增加收入十多亿元。

这次在上海座谈时，许多企业都认为现在外贸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脱节。工厂反映是：“捆住手脚搞生产，蒙着眼睛搞外销。”对外做生意，跟着走是不行的。现行外贸体制，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把经营外贸的实体放在企业和企业联合体上，把外贸部门由收购经营改为代理业务，要逐步地朝这个方向改。现在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工贸结合，组织专业性的出口联合，按口岸组织出口协会等。外贸体制的改革不要一刀切，要说搞，就统统搞，要说不搞，就统统不搞，这样不行。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指导。福建、广东的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既不同于福建、广东的特区，又不同于内地。这次在上海，我就向他们讲，上海要向外挤，不要向内挤。他们的条件较好，对外关系历来就比较多，比较熟悉，灵敏度比较高。要利用这个条件，让上海等沿海城市放手搞外贸，搞产销结合，工贸结合。沿海工业缺乏原料，国内原料供应不足时，可到国外找米下锅。比如炼油厂，现在普遍吃不饱，可否考虑进口原油加工后出口，以进养出。对沿海城市进料加工、来样加工，应放宽政策，多辟渠道，大力发展。还有一些出口商品，到底真亏假亏，各有各的说法，争执不下，可否确定一条原则：凡是外贸部门认为是高亏的出口商品，而生产部门或产地认为不是的，可以由产地或生产部门实行工贸结合来经营出口，自负盈亏，外贸部门只负责统筹协调。我国沿海地区近一亿人口，这些地区外贸发展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际市场上，我们还有很多空白，要有计划地开拓市场，扩展贸易。既要巩固传统的市场和原有的客户，又要在中东、拉美以至西欧、北美开辟新阵地，发展新客户。要组织好国际商情网和销售网。外贸部门要把建设推销员队伍放在重要位置。这支队伍力量非常薄弱，懂业务、会外语、能谈判的全国不过八百人，而能出国独当一面谈判的还不到一半。现在是以请进来谈为主，将来要以走出去为主。外贸收购固然很重要，但外贸工作的重点要放在推销上。要下力量培养精明能干的推销员队伍。广东机械设备出口公司派出一个五人推销组，到巴西、阿根廷等四国，推销了机电产品二千六百多万美元。对做出成绩的优秀推销员要提拔。推销员应当有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好的推销员级别可以相当于副经理、经理，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都应当提高。有了一支精干的推销员队伍，我们的外贸事业才有希望。

八、千方百计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

努力把农业搞上去，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调整时期保持一定速度的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的情况是喜人的，农村是欣欣向荣的。尽管遭受了较严重的自然灾害，今年夏粮仍获丰收，预计比去年增产六十亿斤以上，油菜籽增产五成以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结束了吃进口油的局面。尤其是后进地区这两年变化更大。像皖北、豫东、苏北、鲁西北，以及其他地区，可以说出现了多年所没有见到过的大好形势。这次，我们沿途看见，许多农民早出工，晚收工，在所包的那块土地上真正是在“绣花”了，积极性非常之高。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在调整时期争取农业稳步增长。

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的潜力都很大。政策的威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不止是管两三年，而是会长期起作用的；至于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更有广阔的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两个方面抓住了，就把调整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它将给整个农业生产和农村形势带来巨大的变化。

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落实农村各项政策的中心环节，必须认真抓好。一年多来，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如雨

后春笋地涌现出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有的联产，有的不联产；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人、包到户；统一经营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是农村生产关系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去年、今年这样严重的旱涝灾害，如果没有联产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取得这样的好收成是不可想象的。应该看到，各种联产责任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农民的愿望。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和大包干以后，会不会瓦解集体经济，走单干老路。我认为，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创造性，切不可低估。在我们党多年的领导和教育下，我国农民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农民要求摆脱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以及各种“苛捐杂税”，即不合理的负担。这是问题的实质。我在四川时，就听农民说，第一锄头是给国家挖的（上征购），第二锄头是给大队挖的，第三锄头是给队长、会计挖的，第四锄头是给八大员挖的……，最后一锄头才是给自己挖的。这样，农民哪有多大积极性呢！多年来，我们在农村中最大的教训，就是许多事不是顺着农民的劲干，而是与农民憋着劲干，老说群众落后，越批他越不起劲，越没有积极性。为什么各种责任制，特别是联产责任制一出现，就有不可阻挡之势呢？就因为它合乎民意，顺乎民心，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皖北、在内蒙古、在贵州、在鲁西北，看来变动的结果都相当好。许多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地方，又出现了向统一经营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经济联合的因素逐渐增多。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好的社队，在专业承包的基础上也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现在，责任制正在发展、变化，究竟如何变，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必硬性规定一个模式，应当在群众的实践中去不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实行联产责任制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烈军属的优抚、干部的补贴、民办教师的待遇、水利灌溉、农田基本建设等，只要同群众商量，是可以迎刃而解，找出办法的。在这方面已经创造了一些经验。各级领导的注意力，不应当在概念上打圈子，而要密切注意新情况、新问题，细心研究和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引导群众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要忧心忡忡，硬性去“纠偏”；也不要撒手不管，任其自流。现在农民还是惊弓之鸟，怕变。我们的各项经济政策，要稳定。政策有连续性，人心才稳定。

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这是繁荣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是致富的道路。农业科学工作者提出，要树立“大农业”、“大粮食”的观点，这是有道理的。粮食生产我们必须始终抓紧，丝毫也不能放松。但是过去我们在“左”的思想和主观主义的指导下，不顾客观条件，不因地制宜，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扩大播种面积，为此而搞了一些人造平原、围湖开垦、深翻土地等投资大、费力多、效果小，甚至破坏了生态平衡的蠢事，加重了群众和社队的负担，结果一些地方越搞越穷。今年年初到兰考，那里的老农就对我说：“这里是多好的落（花）生地呀！一亩要收三百斤。可是以前老叫我们种粮食，‘过长江’，结果一亩只收几十斤，多可惜呀！”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措施上要从有利于促进农业因地制宜出发，使粮、棉、油、糖、烟等作物合理布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把我国的自然资源充分地、合理地利用起来。现在，北方发展棉花、花生，长江流域发展油菜，东北发展甜菜、葵花子、大豆，看来是一种趋势。比如鲁西北棉田由一九七八年的三百多万亩发展到一九八〇年的八百万亩，产量从189万担增加到821万担。我与那里的地、县委书记座谈，他们提出，只要按现行政策不变，超产一斤皮棉国家奖售粮食二斤，加价百分之三十，那么他们可以再扩大面积，全省可以由现在的九百六十万亩，扩大到二千万亩，争取产量再翻一番。这对国家、对社员都是有利的。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按国际市场价格，进口一斤棉花至少顶七斤小麦。从国外进口一吨棉花需人民币5800元；在国内，包括加价、粮食亏损在内，只需要3900元。因此，国内多发展棉花，粮食不够，适当进口一些也是划算的。从山东的实践看，棉花地多属于轻度盐碱地，种粮食并不高产，有许多社队把好地换来种粮食，虽然粮食面积减少，但总产仍能不减或少减，能收到以粮保棉、以棉促粮的效果，鲁西北的口号就是“一亩粮食吃饱饭，一亩棉花作贡献”。所以，在种植上，要给社队以自主权。当然，调整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作物布局，使之合理化，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要积极地、稳妥地进行。像山东的棉花、花生，东北的大豆、甜菜，内蒙古的甜菜，福建、广东、广西的甘蔗，都要在长远规划中作为专题进行研究，有计划地搞，使我国的农业能够逐步周转过来，有个良性循环的结构。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许多地方还没有摆在议事日程，这方面的潜力更大。杂交水稻、鲁棉一号大面积推广的成功，已经显示出威力来。我国农业要走一条投资不那么大、效果比较好的路子，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在这方面实践已经提出了很多课题。比如，种子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极端重视。现在良种的蜕化很严重，不论种植业和养殖业都迫切要把良种繁育和推广的体系建立起来。拿养猪来说，现在大膘肥猪已不大适应消费者的需要。每头活猪出口到香港，瘦肉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的，90公斤要卖170美元；而瘦肉占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只能卖70美元；瘦肉不到百分之四十的，只能卖40美元，三头顶不上一头，我们一年向香港出售120万头肥猪，就要少收一亿多美元。现在湖北、北京等畜牧研究部门，已经培育了一些瘦肉型的品种，要逐步试验推广。又如肥料问题，现在我国的肥料结构很不合理，氮、磷、钾肥的比例是1:0.23:0.003，用磷肥很少，而钾肥更谈不上。农业科学工作者建议，今后应大体维持1:0.7:0.2的比例比较适合。我们要发展复合肥料，增加磷、钾肥的比重。同时讲究效益，计算投入产出，看肥料用在什么地方最合算。高产地区每亩一般已施氮肥一百多斤，主要应改变肥料结构，多施磷、钾肥。原来低产缺肥的地方，氮肥增产的效果还比较大，同样施一斤氮肥，要多拿几斤粮食。还有农药问题，要着重研究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随着家禽家畜的发展，配合饲料的研究、推广要跟上去，并投入工厂化生产。此外，林业、畜牧业、渔业都有一些急迫的科研课题。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以后，学习农业科学技术逐渐形成高潮。农业科研部门和科学工作者，要投入这个高潮。

在农业上，我们应当有战略设想。要从长远打算，调整好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发挥我国农业的优势，逐步改善基础脆弱的状况，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使农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为此，建议制订新的农业发展纲要，使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面地发展起来，使广阔的农村真正走向繁荣。

注 释

1. 缪云台(1894-1988), 云南昆明人。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民国时期曾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 国民参政员, 行政院政务委员, 立法委员, 国大代表。1949年去港后赴美, 1976年回国定居。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 包玉星(1920-2005), 浙江宁波人。时任香港联成航运公司董事长。曾在上海多家银行任职, 并在其兄包玉刚经营的香港环球航运公司供职, 后自己创业成立联成航运公司, 1980年曾在大连造船厂订购两艘2.7万吨级货轮, 并就发展中国造船和航运事业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 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

我今天是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看望大家来了。学位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各方面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专家，特别是许多第一流的专家都到会了。这是我们今年继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以后，科学界群英云集的又一次盛会。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从今以后，我们新中国的学位制度，去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学位条例，就可以逐步地、具体地实行了；不久将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博士、硕士和学士了。我看这是中国的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解放以后的创举。全国人民对这件事都会是非常高兴的。

这次开会期间，正是连续高温、盛暑时节。这几天非常闷热。而且到会的很多专家、教授都是已届高龄的老人。我看了会议统计的材料，七十岁以上、以至到八十岁以上的，占到会的差不多四分之一，但是大家不顾炎热不辞辛苦、振奋精神，为实现新中国的学位制度，为培养和选拔我们的高级专门人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十分感人。党中央和国务院感谢同志们，并且向同志们表示祝贺。祝大家在祖国的繁荣、发达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财政工作要适应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

只要有钱，不管在哪里，都好办事，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现在群众有钱，企业有钱，中央各部的钱也比过去多，就是财政部钱少。

对外债，讲得那么厉害。实际上，偌大一个中国，才四十几亿美元外债，除了其中几笔账（二十几亿美元）是一九七八年一脚踩空搞坏了以外，到今年年底就只有十几亿美元的外债。很多债是借得好的。菲律宾借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外债，波兰这样一个国家也借了二百亿美元外债。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搞。

除了低利贷款以外，欧洲贷款一个钱不用不行。中国人办事就是喜欢一窝蜂，一刀切，要么就什么样的钱都借，曾经想五百亿、八百亿美元的借，借买方贷款；要么就高利贷一个都不借，为了保护民族工业，买方信贷也不要了。我们过去是忽而都进口成套设备，忽而都不进口。宝钢连耐火砖都是进口的，说是进口快，我们自己生产慢。打摆子¹的毛病很厉害。我们要正常温度，不要打摆子。要搞点中庸之道，学孔夫子的办法，不要搞绝对化。欧洲的买方信贷主要是设备，不能多借，但为什么不能用一点呢？我们国内和它配套嘛。用二三十亿美元的欧洲买方信贷，我看没有什么危险。现在进口设备花五千美元都要拿到北京来批准，这么大国家，花五千美元都要中央批还行？整个利用外资问题，各种资金如何搭配使用，由进出口委员会拿总，然后由计委综合平衡。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财政部汇报时的插话和讲话。

老干部的安置是要花一笔钱的。

到今年年底，大概军工各部可签五十亿美元的出口合同，这样搞很有好处，军队自己的装备、科研费，都可以解决。

煤、电、冶金可不可以包干？为什么不可以包干？上海冶金局包干后，国家不投资了，上缴利润没有减少，本身的科研费也解决了。中央几个部前几年的包干，现在看效果是好的，农垦的包干是好的，还可以考虑扩大几个部包干。总之，吃大锅饭的办法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包干要逐渐搞，原则上要包，但不要一下子都搞，要搞稳当点。

对农用柴油，国家完全不补贴不行，要定个优待价基数，超过部分不优待。如果价格完全不优待，农民年底一算账，会说刚得到一点好处，你们又拿回去了。我考虑，可以使用这种办法，即柴油、电可以搞定额，定额不要搞高了，不要一年一定，可以多定几年，定下来以后，今年节约了，明年还可以用。这样可以解决天旱天涝用多用少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到年底把多余的油拿去做饭的问题。农业上用油、用电有个季节性，大旱大涝不给是不行的，但吃大锅饭敞开口供应的办法浪费太大。没有经济办法不行。各条战线都要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有两大问题，一是上层建筑扯皮体制的问题，二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的问题。扯皮体制一下子不容易解决，解决吃大锅饭问题一抓就灵。农业上优待供油、供电不能吃大锅饭，要用经济的办法。水利也有极大的浪费。如果实行多用水多交费，少用水少交费的办法，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的效益，大大减少浪费。中国要提高经济效益，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要消灭浪费；而消灭浪费，就要同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考虑问题，用经济的办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农业、工业都要这样办。农业搞了责任制，开了脑筋，很见效，工业也已开始见效。在用水不交费的地方，也可以规定超过多少就交费。现在农村用电没有电表，用水没有水表，在这方面，要搞点设施。现在是没有水的地方连喝的水都没有，有水的地方就敞开用。

要认识到，水就是能源，节水就是节能。对这些问题，将来经委都要研究，搞些经济的办法，做出规定。

这个办法不行。（注：指财政部汇报提纲提的对粮棉油的收购根据国

家批准的征购基数，核定一个超购加价补贴数包给地方，超过部分，外调的由国家补贴，内销的由地方自己负担的办法。)这样搞，就是政策变了。有些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定收购数字，只收多少，超过这个数字就不收了，你自己到市场去卖。但粮棉不存在这个问题，多收粮食比进口粮食好得多，多收棉花也比进口棉花好得多。花生油也不存在这个问题，豆油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用的葵花种子不对，是食用的种子，出油率低，要改用国外的油用葵花种子。现在多余的葵花籽可以卖给人吃，有很多地方缺。

这里有两笔大账：甲乙级烟增产，提价，提高质量，一年可增收五十亿元；税收调整，加上整顿“跑、冒、滴、漏”，一年也可以增收五十亿元。这两笔就是一百亿元，五年就是五百亿元。烟酒提价，明年就可以见效。有人会骂，但骂还是骂，买还是买，拿这个去鼓动造反也鼓动不起来，这和肉提价不一样。

烟提价主要是提甲、乙级烟的价，丙级的提几分钱，丁级以下不提价。抽烟的是整个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因提价受到影响的又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不大，但收入很可观。所以，烟酒是生财之道，增财之道。

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发行公债，群众从银行取出存款买公债，还不如银行认购。日本等好多国家解决财政问题都是靠发国债，日本国债的百分之六十是银行认购，它每年发的国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我们是通过银行解决，还是通过财政解决，可以研究。

我赞成利息高一点。今后国家银行投资、贷款的利息也可以高一点。这样，对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也有好处。如果贷款利息高，就不会发生自己有钱不用而向银行贷款的事。这样，国家的资金也不会搞得那么困难。

我们国家现在财政困难，除了十年干扰外，原因之一，就是情况变了，我们国家对外开放了，进出口贸易扩大了，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了，但是财政的办法没有变，解决资金的办法没有变，一方面是有钱，另一方面又没有钱。财政问题基本上是个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按照老路子走，确实是山穷水尽；如果按照新路子走，就是柳暗花明。按老办法处理新情况，没有出路。我在上海听一个民主人士讲了一个很尖锐的意见，他讲，要讲求时效。他说，外国高利贷是个基本趋势，外国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

的利息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的利息都不敢用，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的周转快，我们的周转慢。我们中国搞基本建设，是一个企业全面搞，从头搞到尾，整个投产，十年都可以不受益。这是外国人不敢搞的。外国人搞建设，从头开始的也有，从尾开始的也有，从中间开始的也有，三四年后就可以受益，受益以后资金再周转扩大建设。任何一个国家，百分之十的利息十年不受益也不得了。我们可以先搞一部分能受益的，逐年受益，逐年偿还贷款。

财政部这个汇报，有相当一些内容是在经济中心讨论过的；有些是一家之言，不一定对；有些是属于财政本身增加收入，减少“跑、冒、滴、漏”的措施，可以马上执行；有些还需要研究。

财政问题，我最近想得比较多，我对财政问题提出几个基本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出现赤字，今年、明年的困难相当大，这是事实。第一个观点，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得把经济搞上去，还是从生产、从经济上面想办法，这是一个总的精神。现在一方面我们财政很困难，另一方面我们经济上的潜力很大。第二个观点，我们现在考虑财政问题、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必须要考虑到新情况、新问题，要有新的办法，不能走老路，不能完全搬用老经验。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涉及到我们经济的路子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我认为，讨论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我们经济上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到新情况。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的政策必须适应新情况，如果不适应新情况，财政上的措施可能同新情况对立起来，就会限制中央采取的新方针、新政策和新改革，而且矛盾会越来越大。因此，财政要适应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这样路子就会越走越宽。这是两个基本的观点。最近大家也是按这个精神讨论的，但也不完全是，我认为有些观点不完全符合这个精神。

第二个问题，除了财政本身如何采取增加收入的办法以外，这里面有很多办法是可以采用的。现在比较，关键的东西，第一位的问题，还不是说中央拿多少钱，或者列入预算多少，首先是要增加我们整个社会的财富，提高经济效益，使全党各级干部，所有的企业和广大职工，包括农民，能够减少浪费，增加财富，提高效益。钱不管在哪里，只要不浪费，只要经济效益有了显著的提高，文章就好作了。第二，才是我们如何把钱用得比

较集中，合理分配。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得不恰当，从一方面来讲，好像减少了困难，从根本上来讲，却增加了困难。比如现在国家财政困难，把钱都集中起来，从中央财政上看，增加了些钱，结果把经济搞死了，把企业积极性打掉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就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反过来，如果我们整个经济搞活了，效益增加了，在这个基础上，中央财政的困难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考虑问题首先从哪方面去考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想来想去，我们现在和一九六二年有很多相同点，也有很多不同点。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按一九六二年的办法，搞高度的集中，就是企业也没有钱，农民也没有钱，机关也没有钱，简单地把钱集中到中央财政上，那我们就很可能不是出现良性循环，而是出现经济萎缩，结果，财政渡不过困难。因此，我们现在首先是应该把经济搞活，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去挖潜，大家去消灭浪费，大家去提高效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考虑如何使用钱的问题。我很欣赏建设银行刘礼欣同志的意见，他说，国内到底有没有资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没有钱，理由是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物价上涨。另一种认为，国家财政没有钱，但是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地方财政有钱，企业有钱，人民手里也有些钱，只要方法对头，还是可以筹集一些资金，用于必要的建设。他说，他同意后面一种意见。他说，要在国内筹集建设资金，以银行的再分配作为国家再分配的一种补充。我同意他的观点。绝不可以单从解决财政的困难出发，而把企业搞死了，把企业的积极性打掉了。

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中国虽然经济困难很大，但另外确实潜力很大，问题是如何把潜力真正挖掘出来。要把潜力挖掘出来，必须依靠大家的积极性，依靠企业的积极性，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积极性，依靠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这一条，不可能把潜力挖掘出来。要使他具有积极性，就必须给他以经济利益，必须同他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要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给企业以物质利益；要把个人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给个人以物质利益。当然，这要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我在上海讲了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今天提出来。解放后，毛主席关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搞群众运动，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解决困难。我认为，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对的。为什么毛主席这样一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

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不同。战争时期，我们依靠政治思想工作；建设时期，政治思想工作还需要，但没有物质利益不可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方面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物质利益的原则，不承认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毛主席的这个方针不能实现。吃大锅饭的问题不解决，大家的积极性就不能调动。农业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归根结底，是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承认了他们的物质利益。我们的工业、商业浪费大得很，但是很多单位一包干就变了。当然，包干怎么样完善是另外一个问题。包干不包干大不相同，联系物质利益同不联系物质利益大不相同。财政部的调查很说明问题，军工各部的包干，实践证明是好的，有很大的积极性，农垦的包干有很大的积极性，企业包干有很大的积极性。要包干，就会发生财政分散的问题，相对的说，国家财政账上的钱就会减少。现在同一九六二年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很好的情况，现在我们预算外还有一大笔资金，这笔钱，我们还可以用的。如果反过来，我们经济现在搞得很死，就不可能有这笔钱。现在预算外资金三年增加了一百二十亿元，一年增加几十亿元，如果我们现行政策不变，今后还会增加，现在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嘛。搞经济责任制（现在我们讲经济责任制，确切不确切不管它），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去挖潜革新，去向浪费开战，这样一搞，社会财富就增加，但是这个社会财富并没有完全集中到国家财政手里。资金分散，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外面钱这么多，个人、单位钱这么多，财政部钱这么少。照我们过去的想法，很简单，全部冻结，你的钱也是我的，马上可以拿回一百多亿元，但是明年就没有钱了，以后就没有钱了，这就是我们过去走的路子。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走这条路子。要适应我们的新情况，一是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在收入增加、资金分散的情况下，合理调度、合理使用，而不能采取把资金简单的收回集中的办法。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值得很好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要发挥银行的作用，通过银行，把分散的资金合理的使用，这是我们目前不走老路而又能解决新的矛盾的好办法。

除此之外，在经济上还有一个总的问题，就是在调整时期，必须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这也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现在正在

研究这个问题。五年规划，计委初步想工业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四。百分之四行不行？还能不能再多一点？至于如何使速度再多一点，这里面还有些问题要进一步研究。一是挖潜，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高效益，减少浪费。二是使国民经济有一定的速度。有了这两条，财政困难就可以渡过，财政问题就比较好办。财政本身，我看有些措施可以先搞，比如解决“跑、冒、滴、漏”，实行财政监督等。

总之，企业合法的收入，应当得的利益要保护，不能变来变去。非法的东西，歪门邪道的东西，必须加强监督，这样就不是鞭打快牛。

物价问题，就是不要在消费者身上打主意，但有些方面牵动不会有多大，比如烟酒提价和某些税收的调整，可以搞，这不会有什么问题。还有些生产结构的改革，也不影响消费者。比如降低化纤价格，提高棉布价格，一年可以提高二十多亿元。

当前一个工资不能提得多，一个农产品价格不能提得多。

今天听了财政部一篇汇报，大家考虑考虑。编制五年计划，集中反映在财政问题上。如果财政问题解决得好，五年计划就好搞；如果财政搞不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通过财政把经济问题解决好，既对经济有好处，又对财政有好处。财政部的很多意见是好的，有的可以早点执行。

在改革中，必须对企业违法乱纪的东西加强监督，不是只要活，不要监督。越活越要监督。

注 释

1. 打摆子，即疟疾病，由带疟原虫的疟蚊叮咬人体后经血液传染的疾病，其症状为周期性发冷发烧，有时浑身发抖，俗称发疟子或打摆子。这里借以形容经济工作中忽冷忽热、忽高忽低的现象。

关于煤炭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秋里、谷牧同志：

请你们主持开会专题研究一次，提出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扩大地方煤炭出口这个问题，如果把政策搞活一些，以出口煤炭所得外汇，解决出口中运输、港口的困难，路子就会越走越宽，办法越来越多，就可逐步改变目前这种困境。如何？请酌定！此件印发财经小组各同志。¹

赵紫阳

八月二十五日

注 释

1. 谷牧阅后批示：“请能源委和进出口委一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提出方案。谷牧 八月二十七日。”

余秋里阅后批示：“新三同志：遵照紫阳、谷牧同志批示办。我意请你同进出口委员会、计委、铁道部一起研究，究竟能出口多少合乎标准的煤？今年多少？”

* 这是赵紫阳对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普的一封信的批示。

‘六五’期间多少，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请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先由我和谷牧同志一起听一次汇报，然后报中央财经小组审定。余秋里 八月二十九日。”

新三，即王新三（1914-1991），辽宁抚顺人。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曾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抚顺矿务局局长，国家计委燃料工业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

既要精神振奋 又要实事求是*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关于速度问题。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工业生产发展有一定的速度，以便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是，不能勉强提出那种经过努力而达不到的速度。总的要求是，既要精神振奋，又要实事求是，二者缺一不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情况、政策和措施上，不能脱离实际去追求高速度。经验证明，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了，速度也就上去了。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也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目前，精神不振的问题在我们干部中间确实存在，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经济问题，要从经济方面仔细认真地进行研究，要根据实际情况定指标，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不能单纯从政治、从需要出发。要接受过去的教训。指标定多高比较合适，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如果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了，可能会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比较快的速度。当前，我们要沉住气，要保持正常温度，不能打摆子，不要刮风。

二、关于工业生产推行经济责任制问题。总的方向是明确的，要继续搞下去。考虑到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与农业上推行责任制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在推行经济责任制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预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研究解决。要防止有的企业根据利润多少来安排生产，发生生产与国家计划、社会需要相脱节的问题；有的企业一搞包干，就忽视产品质量，甚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至转嫁负担。另外，还要注意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职工收入要稳定增长，个人所得部分不能搞得多了，不能今年钱多就多发，明年钱少就少发，不要反复。企业多得一点问题不大。对这个问题，如果不加强领导和监督，不严加控制，就会出大问题。这次工交座谈会不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明年就可能往后退，作检讨。

推行经济责任制后，对工厂多余的劳动力如何安排，应当注意研究解决。对工厂里不合格的领导班子，要加快调整，不要再等待。采取什么方法，可以研究。

三、关于企业挖革改问题，主要指的是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今后几年，除较大的能源、交通运输和军工项目以外，我国的工业主要依靠现有企业。过去我们只注意量的扩大，不注意质的提高，搞“外延”，不搞“内涵”。这样不能改变工业的面貌。今后要坚决把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转到“内涵”上去。这个方向要定下来。要考虑如何把各种渠道的现有资金合理利用起来，搞挖潜、革新、改造。还要有计划地引进一些新的设备，加强技术改造。有些旧设备，特别是机械设备，要逐步换掉、回炉。企业搞挖潜、革新、改造，有些要纳入计划。这次工交座谈会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计委、建委、财政部、机械委都要派人参加。国务院准备召开专门会议，全面系统地研究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问题。

四、关于计划安排问题。明年的工业生产能早安排的要早作安排，如今后要用的重型设备，只要看准了的，都要尽可能地早一点定下来，不要等年度计划。进口原材料所需的四十亿美元外汇，要抓紧研究解决。

对于库存积压的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要认真清理，哪些可以报废，哪些经过改造可以利用，哪些已经改进了可以继续安排生产，不要笼统地认为有库存就不安排生产。机械工业更新设备，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也可以允许用户招标。

五、关于联合问题，现在不要只是一般号召，要一个个地搞，一批一批地搞。打破部门、地区界限，要从城市开始，首先从中心城市开始，从工业基地开始，就地搞联合，然后逐步向外扩展。这可能是个捷径。上海高桥地区以石油化工为中心的联合企业，搞得比较快，要认真总结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搞联合，关键是要讲求经济效益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目前全国

有七千万吨石油可以加工，如果再增加一些，打破部门界限，搞好联合，合理进行加工和综合利用，几年之后，就可以拿回一笔很大的财富。

六、关于城市用水问题，要采取紧急措施，认真抓好。一方面投一点资开辟新的水源，另一方面要狠抓节约用水。今冬明春，华北和北京、天津的农业用水，要让一部分出来，保证城市的生活和工业用水，这是全局。农业上除了蔬菜以外，要多种旱田作物。天津交国库券和借款以后剩下的一亿二千万元资金，解冻了的应先用来解决水的问题。¹

注 释

1. 此件赵紫阳曾经送请陈云审阅，送审时写道：“陈云同志：上面谈了有关速度和责任制的问题，文字不长，可看一下。如有指示，希告。赵紫阳 九月三日。”陈云批示：“紫阳同志：此件今天才看到，完全同意。陈云 九月九日”。

关于“六五”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 控制数字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三日、四日

总的同意这个《说明》，特别是第一部分“对今年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二部分的第一点和第二点“六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课题”和“六五的速度”。至于具体展开的部分，比如财政等，还可再研究。讲几点看法：

一、速度。同意工农业生产、国民收入“六五”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定为百分之四。执行结果，会超过百分之四。当然，工作要做好。小平同志说，不带水分的百分之四不简单；陈云同志说，不带水分的百分之四有后劲。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现在与一九六二年不同，有这么大的摊子，经过十年破坏，浪费大，效益差，一方面是困难很多，另一方面是潜力很大。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速度定为百分之四比较稳妥，比较主动，定高了各方面矛盾更多，又没有好的措施，落实不了。特别是过去的长期计划多次没有完成，这次一定要完成。我对今年财政实现基本平衡很注意。这是一个政府信誉的问题。年初讲了，年末做到了，这很重要，可以提高人民对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否则，不管你讲多少理由，分析得再好，你再讲明年的就没人听了。现在至少可以讲，经过今年三月人大常委会议批准的调整计划可以基本实现，形势的发展基本符合人大常委会议的预计，这就比较好。所以，留有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的说明》汇报时讲话的要点。

余地好。今年财政不要勉强平衡，有二十亿元赤字就算基本平衡。前年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赤字一百二十一亿元，今年二十亿元，一年比一年好嘛，没有坏处。要瞻前顾后，如果今年勉强平衡，明年再出赤字，反而被动，没有好处。

如果这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能够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或者超过一些，下个五年计划增长百分之五或者超过一些，总的十年平均可能达到百分之五甚至以上。下个十年，速度还会高一些。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日本人士认为，中国头十年的速度可以安排百分之四，在这十年中打好基础，作好准备，后十年的速度可能达到百分之八。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估计，中国“六五”的速度百分之四至五，“七五”百分之五至六。在定“六五”速度为百分之四的时候，要展望一下今后二十年。原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在去年基础上今后二十年实现两个倍增，也不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速度百分之五，大体可以增长近百分之七十；第二个十年速度百分之七，大体可增长一倍，基本上就是两个倍增。我说这个问题，目的是要说明，第一个十年干什么，第一个五年干什么，第二个五年干什么。第一个五年，甚至第一个十年，不能完全从增长速度上看工作，速度可能慢一些，但是有调整、改革和各项准备工作在里面。如果这十年勉强搞快，第二个十年再下降就不好。本世纪内逐步往上增长，对人们有鼓舞作用。

计委这个本子上说，“六五”计划要以调整为中心，我也同意。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个五年是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五年以后，经济要进入良性循环，以后步步高。因此，这五年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产业结构要基本解决，产品结构要有相当大的变化，组织结构要有所突破。现有企业经过技术改造要在面貌上有相当大的变化。另外，在能源、交通方面要有适当的建设规模，为以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这五年，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同时为全面改革作好准备。全面改革，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二是彻底的官商分家、政企分开。改革中最大的困难，也就是价格问题和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的问题。这五年速度虽然只有百分之四，但上面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下一个五年就会快一些。不然，下个五年可能还是老样子。所以关键要看下一个五年是呆滞的，甚至后退的，还是走上良性循环，稳定增长的。要做到这一点，

“六五”没有必要的速度也不行，不然周转不过来。速度问题，要作科学论证，给人以信心。这五年时间非常重要，有些老框框要冲破。各方面都要围绕搞好这五年多想些办法，围绕五年计划中的矛盾考虑采取措施。这五年没有什么作为，下个五年就只好办。世界银行说，中国现在借点外债，实际上是买时间。这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五年中，我们的战略储备，包括黄金储备，能否压一点？现在卖黄金，是买了时间“重振家业”。现在不卖，将来搞不下去了再卖，那是“破落户卖家当”。又比如借外债，只要真正用得恰当，这五年不要顾虑太多。现在借外债，可以为能源、交通作必要的准备。是要付一些利息，但目前国内大量工人窝工，通过利用外资使他们有事可干，实际上抵销了一部分利息。这比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干好。罗斯福¹在一九三三年危机时期搞田纳西的建设，是有道理的。我赞成你们的第二方案，再借一百亿美元。这五年多借了，下个五年可以少借。“输点氧”，现在有这个条件。如果看准了，一个黄金，一个战略储备，统统压低一些。卖点黄金，压点储备，多借点外债，把经济搞活了，以后再补偿。所以，这五年关系很大，不能从完全正常的情况去想问题。一是能否走上良性循环，二是能否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做到这两条是最大的胜利。

二、财政。这个五年能否过去，财政是第一位的问题。财政困难怎么克服，如果没有办法，那为以后作准备等就都谈不上。这五年要寄希望于挖潜力，基本的道路与农村差不多。农村形势好，好就好在农民积极性高了。这是不是唯心论？不是。为什么？因为过去多年来农业生产的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被人的积极性不高抵消了。现在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物质条件发挥了作用。这个道理在工业上也是一样。现在工业增加的固定资产和增加的能源、原材料，由于吃大锅饭，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实行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工业上搞经济责任制，形式与农业不同；那是形式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前天陈云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实行责任制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特别是对打破吃大锅饭、打破铁饭碗，将起很大作用。小平同志说肯定会见效。生产责任制，农村先搞了，情况很好，工业、商业势在必行。当然，比较复杂，步子要稳。定额、质量、成本工作要加强。

只要政策对头，使人们有了积极性，并且把积极性引导到改进经营管理上来，避免那种单纯追求利润，工业的潜力就会发挥出来。这种潜力在于：一是经营管理，二是技术改造，三是综合利用。前提是要用政策调动积极性。我们要搞个惩罚条例，第一罚款，小错罚款；第二开除。干部也要有记过、罚款。现在我们不搞运动，但是光有奖没有罚不行。

现在解决财政问题，主要是两条：一是采取政策，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推行技术改造，搞好综合利用；二是通过银行，集中一部分资金。此外，财政本身也要有几条增收节支措施。本子上讲了几条，有些打少了，我认为要打足。看准了的措施，要把任务提出来，然后去落实。比如烟、酒方面的增收措施就打得不够；企业违反财经纪律，截留收入，偷税漏税，“跑、冒、滴、漏”，整顿好了，一年可以增收几十亿元；减少棉花进口，增加化纤进口，加上多生产一些名牌高档产品，每年可增加几十亿元收入。此外，各种补贴，外贸亏损，都会有变化。对企业不能竭泽而渔。不要一方面采取政策搞活，另一方面又用各种办法把企业的钱收走了。年年向企业、机关、团体发行二十亿元国库券行不行？企业要实行经济责任制，要舍得给他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样，他会有办法的。吃大锅饭不行，要采取包干的办法。包干的里面有许多复杂问题，我们要进行研究，逐步加以解决。但凡是包了的都有效果。农垦部包得最早，就好起来了。军工各部不包，也不会有现在的局面。当然，包了以后，钱就分散了，财政集中的资金相对的要下降。那要用另外的办法来解决，通过银行把资金集中起来使用。增加财政收入，不能光盯着增加产值，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到降低生产成本。现在光讲人增加了，原材料涨价了，不讲浪费。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只增收四十亿元，主要是浪费大、效益差。安排计划，不能不考虑减少开支，增加收入，要把企业潜力挖出来，节省开支，减少浪费。真正搞得好，生产增长百分之一，不是增收十亿元，而是增收更多。要抓一批企业的技术改造，投入很少，马上能为国家增收。过去从增加生产能力上考虑多，从效益上考虑少。今后要从提高效益、增加收入上多考虑。增加收入，国内用各种方法筹措资金，加上国外借款，一是目前日子可以过得去，二是可以为今后作点准备。

国家预算外的资金，把它用好，是篇大文章。今后五年，通过提高效

益、增加收入，预算外可能有一大笔钱，这是好事。问题是如何把它的使用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怕它钱多不行，拿过来也不行。拿过来，就没有了。搞好了，很多事情可以靠它，减少财政的负担。将来要统一安排，多种渠道。要解决重复建设和物资平衡的问题。统一安排，分头去办，统统通过银行也不行。这样就活了。实际上，这两年已向这方面迈步了。

这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搞什么不搞什么，投资用在哪里？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钱看，另一个是向前看。就是说，一个是用在提高效益的方面，哪个来得快，经济效益好，就用在哪里；哪些生产增加收入多，就要优先安排。一个是要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即能源、交通等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建设和挖潜、革新、改造资金都要这样用。要抓大企业，减少浪费，有很大潜力。各部要下去蹲点，一个副部长包几个企业，抓它几千万元。钱多了，归谁都好办。计划的粗线条定了以后就要搞这个，不能撒胡椒面。今后几年，办什么事，最后都要落实到钱上，我给你多少钱，你交给我多少钱。实际上是让大家去提高经济效益。对所有的工厂，要搞两件事：一是要按国际价格计算一下他的原料和产品，计算一下他的成本，计算他的盈亏，让他知道落后多少；二是搞内部价格，不与市场联系，作为内部计算、考核、奖惩的依据。现在我们搞“影子”价格，一方面是为将来改革价格作准备，一方面也可用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总之，克服财政困难，要作为整个五年经济安排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能源、交通，这个东西非搞不行。能源、交通搞了，其它方面差一些将来也好办。煤矿建井规模，转到“七五”的最好不小于一亿二千万吨，不行就借钱。整个经济好转了，背一点利息没有关系。为今后发展作准备，有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交通的建设，一是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当然，技术改造要有重点。还有个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特别是西北、西南水电多，有些矿产资源，开发不十分困难，也可借点外债。我们要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的观念。我们已经是开放的国家，搞平衡不能只限于国内。有色金属是我们的优势，要以我之长补我之短。当然，也要量力而行。这样做，虽然欠些债，但过几年总有东西了。如果光怕冒风险，局面永远打不开。有条件不用，很可惜。当然，要用就要用好。

山西煤炭的开发，国家和各省都投些资。国家的投资首先满足铁路。在基本条件上国家要下功夫搞，全部都包下来不行。最卡脖子的、最困难的、谁也不愿意搞的，由国家搞。现在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有钱不愿在国内投资，除扯皮体制外，缺乏基础设施是原因之一。因此，“六五”留缺口不要留在铁路，宁可留在工厂企业，有潜力可挖。如果铁路解决了，会有人到山西去投资开发煤炭。

每年能转到能源、交通的投资有多少？不搞水平法，需要的就搞，不需要的就不搞。每年能否给能源、交通增加五十亿元？包括内部转移和借外资，再加上油改煤资金。小平同志说，再穷也要搞能源、交通，不搞是不行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压得很少了，挖、革、改主要靠企业、地方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有一部分挖、革、改，如节能，财政负担利息补贴。基本上甩出去，外国都是这样搞的。

能源的开发计划，一定要把南海、海上石油开发考虑进去。

请韩光²同志研究，建设周期长的项目，如何边建设边受益。要提出规程，分期投产，以投产后的收入来扩大再生产。

今后不要盲目扩大生产能力。要改进工作，从北京开始。讲浪费，在我们这里，在计委、建委。很多项目是在我们这里拍板的。

由于现在采取的政策与六十年代不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并不能减少多少社会购买力；相反，如果适量扩大建设规模，并不会冲击市场，而且可以减少物资积压，减少窝工。有的同志提出，现在的论证都是讲道理、没有量的分析，这很对。我们的工作粗就粗在这里，什么“正确的”、“必要的”、“适当的”、“科学的”等等，如果没有数据，这些都是空话。界限究竟在哪里？要有数字根据。比如，基建投资减少到多少，就是得不偿失，上到多少是适当。要寻找合理的界限，不要在概念上争吵。并不是基本建设搞得很少，购买力一定减少。如果下得过多，得不偿失；上得过多，又出问题。

四、发展消费品生产。看来门路很广，如化纤、糖、食品、日用化工、建筑材料等等。适应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要很好发展消费品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少，耗能也少，利用外资容易。

消费品生产要好好抓。要发展日用化工，日用化工可以搞很多东西。

还有食品，包括饮料，很多野生植物可以搞饮料。葡萄酒、果子汁，不是没有销路。食品、建筑、日用化工，要搞，不用多少投资。现在老讲农副产品收购多就补贴多，如果变成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出卖，情况就不同了。这个思路是对的。从长远看问题，粮食部门要经营食品，把一部分粮食加工成制成品出售。要看到购买力提高后出现的新情况，农民用起牙膏、香皂、雪花膏、洗发膏就不得了。一定要看到购买力是促进生产的动力。因此，一方面要控制购买力，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现在回笼货币的措施跟不上。

你们的农业指标是否列低了？我看棉花一九八五年可能搞到八千万担，只要政策不变。北方的甜菜，要下决心放手让他发展。棉花、糖料主要靠北方。有些地种粮食产量很低，可以种甜菜嘛！这样农民也富了，经济也搞活了。粮食想很大增长不大可能，其他会有大的增长。不是讲自力更生嘛，拿我的东西换国外的东西也是自力更生。现在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除非发生战争，可以以我之长，通过国际交换，补我之短。不要仅从国内市场考虑，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棉花搞到八千万担，情况就大不同了，可以不进口棉花，进口化纤。棉纱，要花功夫搞；糖，今年要花些钱，可由银行贷款。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调整农业结构，一斤棉花奖给二斤粮食。食品、饮料多了，人们的粮食消费会减少，不一定很紧张。

这次从新加坡回来，路经广州，发现广东的物价涨得很厉害，蔬菜三毛钱一斤，有的四毛钱一斤，同水果一样价，无外快收人的干部意见很大。工人问题不大，主要是机关，特别是军队。郊区工业占地要限制，要发展蔬菜。成都过去蔬菜不成问题，现在也发生问题。问题在于农民愿意搞工副业，不愿意种蔬菜。这个问题要系统解决一下，要有个办法，必要时也要搞个文件。蔬菜的价格一定要稳住，不能完全讲经济规律。城市近郊区的种菜面积和所需劳动力要保证。如果蔬菜地搞工业，一亩地要征它多少税。不然发展下去，城市将没有菜吃。这个问题请依林同志找人论证、探讨、分析，总之是要解决的。形势再好，没有蔬菜吃不行。

五、技术改造。这既是使这五年有一定速度所必需，也是为今后作准备。重工业要有一定速度，不外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二是为技术改造服务；三是能源、交通一搞，也会给重工业提出任

务。我们对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如果不搞节能，不提高质量，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不采用新技术，那就不能为今后发展作准备。那就是老牛拉破车，会越拉越慢。

如果在调整时期不下决心搞设备更新，让设备继续破旧下去，再过五年还要搞调整。不搞设备更新，很多工厂将难以为继，包括鞍钢这样的厂子。还有上海的厂子，如果不抓设备更新，再过七年就要垮下来。调整时期不搞技术改造，就不能积蓄力量。而且这样一搞，重工业就活了，能源消耗也就少了。光讲利库不行，现有的六百多亿元库存机电设备，哪些必须报废，要查清，如果把不能使用的报销一百亿到二百亿元，国民经济的情况就会好些，不能采取“推陈储新”的错误政策。现在确有很多陈旧观点，算小账不算大账。许多问题要从新的观念考虑，不能老算小账。搞了二十多年，许多设备已到了更新的时候。对设备现状要作分析，五十年代的设备，再过几年就是三十年，对整个工业摊子怎么估计，如果不把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提到重要地位，我们将前进不了。

关于节能问题，请能源委会同经委，提出今后五年的几大措施，不要多，三大措施也好，四大措施也好。先准备，在国务院专门讨论一下。国务院今后不再讨论一般方针，一般方针都已经定了，要讨论重大措施。比如，计委黄毅诚³同志提出的集中供热和热电联产，可行性究竟如何，算不算一大措施？又比如玻璃的浮法生产，水泥的窑外分解，等等。在这些技术改造方面的措施，需要多少投资、材料，先搞哪些城市。要目标明确，落到实处。

六、国际市场。要充分利用开放以后的有利条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现在主要是如何更充分利用，而不是利用过头。乱子是有，这只是发展长河中的曲折。我们对现在这种有利的新的国际条件，还没有认真研究，还没有真正认识和适应。多年来的自给经济根深蒂固，不善于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筹划。外国人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利息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利息的外资也不敢用。现在国际上有没有本事，就看敢不敢用高利贷。我们国家资源丰富，这是有利条件，但不要因此忽视通过国际贸易解决问题。特别是沿海一带，有一亿多人口，几个大的中心城市，本事、人才、国际联系等都有，要发挥这个优势。

讲物资平衡，要包括国外市场，以我之所长补我之所短。不是什么都靠自己才叫自力更生，这个观念要打破。这也是个框框，正在破，还没有完全破。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有些东西在国内平衡不了，通过国际市场就解决了。至于打起仗来，转入战时经济，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扶持棉、糖生产，把农业搞活，作用很大。

总而言之，财政、能源交通、消费品生产、技术改造，还有国际市场，五大问题，抓好了，局面就转过来了。

计划大的盘子定下来以后，比较重要的大项目要有十年设想。一是要确定明年就要上的项目，新上的要有新章法；一是要排十年的，十年中搞什么不搞什么。在建项目中，十年不搞的，要坚决收摊子。

我讲的这些问题，计委这个本子上基本都有，已经议论过多次了，以后还要一个个讨论。

“六五”计划控制数字，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一九八二年计划控制数字可以先发下去。十月份还要开一系列会，对一些重大措施进行讨论。

注 释

1. 罗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生于美国纽约。1932年当选美国总统，为应对经济危机实行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扩大就业、刺激对外贸易、加强银行监督和振兴工业、农业等一系列改革，取得了成功，史称“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中曾连续四届当选总统。

2. 韩光 (1912-2008)，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时任国家建委主任。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3. 黄毅诚 (1926-)，湖北枣阳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北京重机厂厂长，国家能源部部长。

挖掘企业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

我今天着重讲一个问题，就是挖掘企业潜力、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我看到《财贸战线报》上有田欣毅¹同志的一篇文章，后来听了他的意见，又看了他在这个会上的讲话，有些新的启发，趁这个机会来讲一讲。

抚顺市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它是个重工业城市，今年内煤、油、钢、铝都减产，但是可以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做到减产不减收。北京首钢也是这样，今年铁产量减少30万吨，钢产量减少12万吨。按原来的计算方法，收入要减少，但是他们没减少。我在上海听冶金系统的财管员讲了一篇道理，他们搞了八项政策，挖了不少潜力，努力完成财政任务。今年二月在天津，我同王光英²同志谈话，他讲了一个观点，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和商业企业，遍地是黄金，但是被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工业潜力很大，浪费更大。集体的、小的企业可能好一些。对我们的企业怎么看，一方面要看到企业有很多困难。例如能源不足，交通紧张，社会负担过重，原材料和燃料提价，成本提高，征地要钱等等，还有工厂像个小社会。当然，这些问题有的如工厂的社会负担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但是企业还有多大潜力、多大浪费，就讲得不够了。企业潜力大，浪费大，到处是黄金。认识不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今后几年的经济工作关系极大。

我今天讲的企业潜力，主要是讲经济效益，讲成本，讲节约，不是讲生产增长多少，能力扩大多少。企业有多大潜力的问题，需要我们搞工业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

的同志很好地重视和解决，中央各部的同志要到大厂去解剖解剖。今年、明年以至整个“六五”期间，产值增长速度有一定限度。

我主张调整时期要有一定的速度，要振奋精神，不能指标愈低愈好，但是调整时期要有太高的速度也不可能。因此，收入的增加，要着重从提高经济效益上打主意。

我们工厂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制，造成企业、工人缺乏内在动力，不关心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地区所有制、部门所有制造成部门、地区分割。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这么大的工业摊子，这么多的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长期没有很好发挥经济效益。今后几年，由于能源、交通、原材料的制约，我们的产值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多高，但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大。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能不能走速度不怎么高，经济效益比较好，国民收入比较高的那样一条路子。多年来潜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今后有这个可能。最近几年，我们解决财政困难，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现在工业速度与财政收入大致有个比例，产值增加1%，财政收入只增加10亿元。如果每年增长4%-5%，财政收入只能增加40亿-50亿元。但是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抓一抓，一年就不是10亿元，而可能是几十亿元。田欣毅同志讲了抚顺钢厂和石油二厂的例子，石油二厂原油加工量年年减少而上交利润三年跨了三大步。看来，如果我们还是单靠增加产值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事情就并不乐观。如果从企业挖掘潜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想办法，情况就好得多。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业有很大成绩，有很多好的经验，但总的来看，工交企业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差的。我们每个工厂从购买的原材料到出售的产品，如果都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恐怕很多要赔钱。如果工资、燃料动力也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能站得住的就寥寥无几，特别是加工工业和制造部门。现在农副产品提价，轻纺工业就吃不消了。这说明我们的工业技术落后，特别是经营管理落后。从原料到成品，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作这样一个对照和比较，对促使我们加强经营管理很有好处。搞石油化工本来很赚钱，但是我们的化纤纺织厂，如从原料到产品都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很多企业甚至要赔钱。今后我们应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认真研究如何挖掘企业潜力，减少浪费，降低消耗，降低成本。这样，每年产值同样

增长4%—5%，而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就要高得多。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对以上问题认识一致，接着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潜力挖出来？为什么我们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权，搞利润留成、包干，在企业内部搞奖金，搞计件和超额计件工资、浮动工资等等呢？主要是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来挖掘潜力，搞经济责任制，也是这个出发点。现在之所以浪费那么大，消耗那么高，除了设备落后、经营管理落后外，就是企业、职工的经济利益没有落到实处，就是一个企业经济效益好坏和企业、工人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要使几十万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几千万职工来挖掘企业潜力，就要给职工以一定的物质利益。毛主席一贯讲，办工业要依靠群众，发挥职工的积极性。

这是正确的。不能只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同时，要讲物质利益，只讲一面，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就上来了，大家关心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起眼睛向下，挖掘潜力。

一九七九年我还在四川工作时，到中央开会，讨论财政包干，当时我有一个提法，调动第一线的积极性，只要大家关心经济效益，就能创造出可观的社会财富。田欣毅同志讲，全国六千个重点企业，如果每个企业都能节约挖潜100万元，就是60亿元，等于工业增长6%所增加的财政收入。我是相信这个话的。为什么现在搞经济责任制？就是要动员千千万万人挖掘潜力。田欣毅同志讲，给企业让一小步，国家财政收入进一大步。这就是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我们一些搞财政工作的同志尤其要看到这一点。搞工业的同志，要看到搞责任制就是要使工人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关心工厂，搞好工厂的生产，挖掘各方面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一定要明确这一点，不然搞经济责任制的路子就会走歪。

搞了利润留成、包干、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和工人挖掘潜力有了动力。我们一定要因势利导，抓住企业整顿这个环节，把经营管理认真提高一步。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的同志说，经济责任制这个办法是好的，但必须在领导班子强，经营管理有基础的企业才能实行。我看有些道理。但是也有的同志说，如果不同企业、个人利益结合起来，经营管理就

落不到实处。因此对少数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企业来说，就要进一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对多数企业来说，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积极性后，要迅速把企业整顿和经营管理工作跟上去。如果经营管理混乱，不仅达不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还有可能搞歪门邪道。今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摊子铺的这么大，是由于财政任务完不成，仓促上马的。现在推行的经济责任制，主要是从利润上包干。目前由于价格等不合理因素，利润这一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工人创造的价值。但是，企业的职工的积极性起来了，把这种积极性引向哪里，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用在认真改进经营管理上，还是不择手段，搞歪门邪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因势利导，把企业领导和工人的劲头引到整顿企业和改善经营管理方面来。总之，这次会议讲经济责任制，要注意如何乘机会狠抓企业整顿和经营管理，把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这不仅是今年，也是今后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挖掘企业潜力，一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二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搞技术改造；三是合理利用资源。这就是田欣毅同志讲的向经营管理要财富，向挖、革、改要财富，向综合利用要财富。他最后还讲了一条政策。抚顺市就是靠这些要财富，做到了减产增收。

企业整顿要抓经营管理工作，但不只是这一条。还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整领导班子，推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对企业整顿都是很重要的。我今天主要讲讲经营管理。

第三点，昨天耀邦同志提出要深入实际抓问题，打破框框闯新路，这个话讲得很好。我们要少开会，少发文件，要面向实际，眼睛向下。

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工交各部都要抓一批潜力大的企业，把经济责任制落实，把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包括围绕经济效益搞技术改造，加强资源合理利用和组织联合、协作等。今后，除一般的计划安排外，投资、设备、材料要围绕着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一些大的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进行安排。我接触了一下石油化工，愈感潜力大。这种情况上海有，抚顺、江苏、天津也有。纺织部科研院一个所长，提出一个观点，说现在炼油厂一年放空，烧掉的丙烯、芳烃多达60万吨，若用来作为涤纶和绵纶的原料，经济效果很好。中国是一个年产原油1亿吨的

国家，炼油厂能力 8000 万 -9000 万吨，实际加工 7000 万吨。但是，石油、纺织、化工的炼油厂各有各的搞法，有一些炼油厂只搞粗加工，其余都当作燃料烧掉了。

当前，工业上有两大弊病，一是吃大锅饭，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二是地区、部门分割，扯皮体制，资源不能合理利用。如果把它们改过来，也就是两大潜力。例如：火电站的炉渣可以作为生产水泥的原料，但是电站归电力部管，水泥归建材部管，利用炉渣生产水泥，就没有人去考虑。四川有不少煤炭和硫铁矿是共生的，但是搞煤的只挖煤，丢掉硫铁矿；搞化工的只要硫铁矿，丢掉煤，就看他们的上级是谁，就听谁的话。为了综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势必要走协作和联合的道路。实行了经济包干，企业有了自主权，这些问题可能解决得好一些。今天讲的这些，对今后几年国民经济能否搞好，对全国大范围推行经济责任制能否搞好，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再补充说一点，工交各部，还有地方，都要由负责干部下去，选一些潜力大的真正能提高经济效益的重点企业，看它们有些什么办法，凡是可以发挥最好经济效益的，你们就可以提出要安排的项目、资金和材料，开出单子，送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审查，研究安排。今后，特别是工交各部的领导同志，一定要眼睛向下，抓一批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去挖掘潜力，要财富。我们的计划工作，就是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来考虑问题。经济效益大的，优先安排。哪里投资少、见效快，资金就放在哪里。

注 释

1. 田欣毅(1928-2016)，时任辽宁省抚顺市财政局局长。曾写文章主张“给企业让利一小步，国家收入进一大步”，应邀在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2. 王光英(1919-)，北京市人。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改革挖潜 聚资生财*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抚顺市财政局长田欣毅同志关于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意见值得重视，现推荐给你们参阅。

抚顺市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今年由于调整，许多企业任务严重不足，生产下降。照过去的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降低、收入减少，似乎是“天公地道”的。然而抚顺市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制订了减产不减收的三十条措施，取得了成效。全国还有相当一批企业也做到了增产增收或减产增收，节支增收。抚顺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不是个别企业而是全市性的。

抚顺和全国很多地方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企业的潜力极大，尤其是那些大的企业，确实是遍地皆黄金。由于多年来实行大锅饭的体制和政策，使工厂经营者不关心自己的经营成果，劳动者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对到处存在着的增收节支的潜力熟视无睹，不去过问，以致管理混乱，开支大，成本高，浪费严重。目前整个国家面临着财政困难。克服财政困难的重要途径，就在于要通过政策，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积极主动地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降低消耗，减少浪费，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真正做到提高经济效益，抚顺市的三十条和各地推行的经济责任制就体现了这一精神，这是当前克服财政困难应

* 这是赵紫阳就田欣毅关于解决财政困难的意见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位副总理并有关部委的一封信。

当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其次，在实行这种办法以后，总的讲，经济效益提高了，社会财富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会增多，但相对地说所占的比重要比过去少一些，而企业和个人手里的钱会逐渐多起来。这就有一个如何搞好分配的问题，除了通过财政的分配以外，有一个通过银行再分配作为补充的问题。银行要运用经济办法，积聚资金，用好资金，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到国家建设需要的方向上来。以上两个方面，就是财政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解决当前财政问题的重要方针和政策。抚顺市的同志说：“一方面我们国家很穷，另一方面又挥金如土，根子在于现行的一些办法把企业捆得很死，使他们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话讲得很好。所有财政、工交部门的同志都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如果仍然按照老框框、老办法去办，就好像“山重水复”；如果根据新情况，按照新办法去办，就会“柳暗花明”。

中央各部、各省市的领导同志要像田欣毅同志建议的那样，少开会，少发文件，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亲自下去抓一些潜力大的骨干企业，研究增收节支的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切实改进经营管理，扎扎实实地解决一批问题，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作出贡献。

关于今年经济情况和 “六五”计划设想的通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日

今天主要是向政治局的同志通报一下经济情况。今年的情况还只是预计，因为刚刚进入九月，至少到十一月才能完全看清楚眉目。关于五年计划的问题，现在正在讨论，过一个时期可以提到政治局来通过。我只是把一些情况，一些议论，简要地吹个风。

第一个问题，关于今年的经济形势。

总的说是好的。今年年初人大常委会修改通过的一九八一年的计划，现在看可以实现。这里我主要说几个大的轮廓。

一、财政开支。现在看来，可以做到基本平衡。去年开人大，财政部的报告讲，今年财政收支平衡，后来在人大常委会上就改口，叫基本平衡。现在看，基本平衡可以做到。到八月底，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同期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比去年多六十七亿元。估计到今年底，赤字不会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前年我们的赤字是一百七十亿元，去年是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可以做到赤字不超过二十亿到三十亿元，就是基本平衡。

二、农业。今年的情况看来是一个全面增长的形势。粮食，预计夏收报上公布是增产六十亿斤，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些。早稻是增产二十亿斤，也就是说，早稻加夏收增加了八十亿斤。秋季是一部分地方受

* 这是赵紫阳向中央政治局所做的关于 1981 年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设想的汇报。

灾，大部分地方长得比较好。当然，还要看东北早霜怎么样。全年预计可以增加二百亿斤左右，当然，估计不同，有的说可以增加更多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和副业，绝大多数地方都比较好。棉花大概会到六千万担，去年的五千四百万担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油料，大家都知道，油菜籽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成），花生也是大增产。糖料，预计今年可以达到七千七百万担，就是可以增长百分之十三，这就可以增加三十多万吨糖。生猪，情况是好的，多数地方还是猪多，不好卖。这里特别说，烟叶的情况很好，预计可以收到一千九百万担，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二。由于今年烟叶的丰收，加上现在采取的烟酒专卖措施，估计明年烟的供应会有较大的改变。农业的产值，估计可以达到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三、工业，预计今年增长可以达到百分之三。轻工业，可能达到增长百分之十一（一到八月数字是百分之十二）。重工业，一到八月下降百分之八；从二季度以来，情况逐渐好一些，估计全年要下降百分之五。现在我们轻工业与重工业的产值大体上也是一半一半，轻工业的增长补了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以后，预计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工业，截止到八月，总的增长百分之一。但是现在看来第四季度是个翘尾巴的形势，因为我们第一季度是负数，从六月以来逐渐回升，八月份的情况比七月份好，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二点五。

四、市场、物价。一月到七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是一千三百亿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八点六，预计全年可以增加百分之九，这就等于实现的购买力。商业库存增加了百分之八点六，这个情况是好的。油料增加，混纺布（化纤）增加，自行车增加，手表增加，这都是比较好的东西。外贸进出口总的也是好的，进口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八点五，全年计划可以完成。由于今年实行了冻结物价，加上农副产品和消费品增加，物价形势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上半年社会物价总的水平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七，这主要是指国营商业卖的东西，不包括集市贸易（城乡集市贸易上升百分之三点二）。

五、上半年净回笼货币没有完成计划，原来计划回笼五十亿元，实际只回笼四十亿元。虽然没有完成计划，也是建国以来回笼最多的一年，截止到八月底，大概净回笼二十三亿元左右，预计全年增加投放六十亿到七十亿元。货币问题，一方面是票子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情况。新的

因素，特别是农村，手头存放的票子多了。今年一月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最多的时候达到四百亿元。一个是手头存的增多，一个是现在市场渠道扩大，比如农贸市场这个范围就比过去扩大了，商业的渠道也比过去大了。还有一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经营单位划小，都要直接用货币支付(过去很多不用货币支付)，这方面都需要增加些通货。究竟这些因素要增加多少发行量，还要研究。现在还说不清楚，看法也不一致。人民银行讲，大概是五十亿元左右。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总的形势好，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当然，还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个，就是蔬菜问题，今年以来，多数城市都不好，城市人民反映强烈，这个问题还要专门很好地研究。看来，除了其它原因之外，城市近郊兴趣不放在蔬菜上，可能是主要原因。因为他主要的兴趣是搞工业、搞副业，因此，蔬菜种植面积没有那么多。最典型的例子，像北京四季青这个地方，那么好的菜地，他在那里搞了个很大的厂房。这还不是个别的。还有一个，煤炭情况不好。最近刚刚开了会，报上发了消息，万里同志抓了一下，秋里同志一直在抓。煤炭如果九月以后没有大的转变，冬季取暖用煤都会紧张。再一个，就是华北的水荒，特别是天津和北京。首先是天津，很有可能到明年以后，天津相当一部分工厂要停工。现在官厅水库的水只有四千万方，密云水库的水只有八千万方。

总的来讲，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稳步前进，经济工作正在逐步走上轨道。这么大的调整，社会比较安定，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这是不容易的。今年工业的增长速度只有百分之三，当然这是最低点了。从今年以后，会逐步有所回升，当然不会很高。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是能够稳步上升的。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稳一点，工作要抓紧一点，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中央提出的调整结构，稳定经济，逐步改革，这个大章法和大措施，主要是继续落实的问题。最近小平同志同外国人谈话后，大的章法就是这样，不宜搞很多章法，不宜出很多主意，主要是个贯彻落实的问题。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六五”计划问题。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这是初步议论的，初步的看法)：

一、速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准备定在百分之四。执行的结果可能要超过，但是看来还是以定在百分之四比较好。过去，除了第一个

五年计划以外，其它的长远规划，统统没有完成过。所以，为了提高信心，宁可把计划放得低一点，将来能够完成，超过当然更好，不宜搞得太高。（邓小平：不要有水分。陈云：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四。）工业、农业都是百分之四，轻工业大体上是百分之七到八的样子。重工业增长定到百分之一，因为有个能源问题。重工业增长定高了，能源解决不了。想把国民收入也定到增长百分之四，就是刚才小平同志讲的，经济效益好一点，产值的指标搞得稳妥一些。过去一般概念就是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四，大约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三。国民收入低于生产总值（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而国民收入只有百分之六点一）。今后五年主要靠挖潜，工业、农业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是增长百分之四。估计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会稍高一些。“六五”定到百分之四，今后怎么样？小平同志问过这个问题。“七五”会比“六五”要高一些。经过“六五”的调整，我的看法，第七个五年计划肯定要超过百分之五。搞得好，这个十年有可能达到平均递增百分之五。第一个五年低一些，第二个五年高一些。如果我们第一个十年能够这样搞的话，第二个十年会更好。这是我的看法，姚依林同志他们都这样看，第二个十年就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七。这样，我们以前讲过的二十年里两个倍增的计划，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最近我也看了一点外国的材料，在日本箱根开的中日两国的经济讨论会，日本的一个专家也是这样讲的。他认为，我们第一个十年不要搞那么高，搞低一点大概是增长百分之四、五，第二个十年可以搞到百分之七、八。还有个世界银行在中国的调查报告，基本上也是这个论点。就是说，我们在第一个十年真正把国民经济搞成一个良性循环，根本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真正把企业的经济效益搞好。（小平：还有比例关系。）比例关系搞好，使资源、能源、交通这些基础结构有所改进，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好一些。（陈云：六机部讲，造船公司代替了部，这种形式将来会多起来。现在条条块块很多。）把这个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管理体制解决好，中国人是聪明的，资源有，如果更多地考虑些经济效益，不忙于追求速度，总的经济情况会好。“六五”定到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决不是说我们的经济没有前途。

二、财政。现在讨论“六五”计划，主要就是财政比较困难，建设资

金比较困难。现在准备五年方针怎么定呢？基本平衡，每年准备有个二十亿到三十亿元的赤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到五年中间我们既能基本平衡，建设又有一定的规模？途径有这么一些：

(1) 财政本身要采取一些增收节支的措施。举一个例子，譬如烟酒专卖，加上高级烟适当提价。第一，烟要发展，要多搞烟。烟叶情况，估计今后也会好。第二，要多搞高级烟(甲级、乙级烟)。第三，实行专卖。烟叶专卖，就好调整，就好统一使用。现在很多烟叶是在小烟厂加工，加工成很差的烟。专卖，烟叶能统一调整，烟叶生产能够多一些，好一些。第四，甲级、乙级烟适当提高点价，丙级烟稍涨一些，其它不涨。这四个措施，每年可以多收三十亿到五十亿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字。当然，也会挨骂，但是也值得。骂的人不多，少数人骂，抽好烟的人骂。(李先念：骂是骂，买还是买)。

再一个，税收方面，现在管得不严，漏税非常严重。税还想适当增加一点。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搞得太少了，太简化了，要适当增加一些。主要是整顿一下税收，加上财政监督、财政纪律。这个大概可以多搞二十亿到三十亿元，今年大概就多搞十几亿元(今年抓晚了)。每年还要发国库券三十亿到四十亿元，个人也要买一点，大概一半向个人发放，一半向企业和地方发放。

还有一个，在纺织上想些办法，现在纺织有比较大的潜力。国际上化纤便宜棉花贵，我们国内是棉布便宜化纤贵。如果我们国内棉花搞上去，不进口棉花，多进口化纤，在国内扩大化纤的比例，而且化纤还准备降价。有一个专家算了一个账，一年可以搞四十亿元，至少可以增加二十亿元左右。再加上搞一些其它的高档产品(一九六二年陈云同志搞高级糖果，现在要搞一些高档产品，搞糖果不行了)，价钱就要卖高一点。加到一起，大概可以搞到三十亿元。

另外，外贸的亏损要设法控制一下，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要控制一下。这样也可以减少很多开支。按原来算账，这里头也可以有一、二十亿元。这都是可以搞的。这是财政本身。

(2) 从国内筹措一批资金。现在我们资金困难，一个就是向国外借，另外也可以筹集一些国内资金。因为按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经济体制，企

业有钱，地方上一部分省份也有钱，中央的钱比较少。现在预算外的资金增加，预算内的有一千亿元左右，预算外的资金大概还有五百亿元左右。预算外，包括挖革改都在内。还有分成，企业的钱，留成的钱，各种各样的钱。另外，城乡储蓄增加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一九七八年以前，每年的储蓄最多增加一百亿元。一九七九年以后，一年就可以增加二百亿元，不完全是个人储蓄。银行存款，过去每年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亿元，这两年增加比较快，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百零五亿元，一九八〇年又增加二百一十八亿元。这是总的，下面分开讲：企业存款，一九七九年为四百六十九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五百七十三亿元，今年六月底就已经达到了五百六十二亿元。城镇个人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二百零二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二百八十二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三百二十三亿元。农村社员储蓄，一九七九年为七十八亿元，一九八〇年为一百一十七亿元，今年六月底就达到一百四十四亿元。而且相当大部分是定期储蓄。看来，我们的消费品也没有那么多，将来要通过银行把地方的存款、企业的存款、个人的储蓄拿一部分来作为建设资金。多了不行，能拿多少还要研究。办法是通过发行债券，或者银行来办。就是说，把银行储蓄中本来用作消费资金的，转一部分为建设资金。甚至将来还可以把长期储蓄的利息提高一点，鼓励他长期储蓄。长期的好动用，短期的不好动用。国内的资金，中国不能完全按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我们中国也不能完全只按过去的旧制度，只是财政这么一个口，收多少然后开支多少，还要通过银行筹集点资金。

（3）借国外的资金。国外的低利资金，将来还可能配一部分买方信贷。买方信贷不自由，低利资金有一部分是自由的，世界银行的，货币基金组织的，这是自由的。买方信贷，譬如说欧洲给我们钱，利息也不高，但是你要拿他的钱买他的设备。这些不能用多了，用多了对国内机械企业影响太大，但是可以用一部分。因为我们要搞能源、交通，在这几年内不搞一些，以后的准备就比较困难。究竟国外的借款借多少，还要研究，现在计委初步提出个意见，折成人民币，一年可以用五十亿元，那就是十几亿美元。我想，还可以稍微多一些。多到多少，还要研究。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用我们借到的低利贷款、自由外汇，加上国内

的黄金，首先把一九七八年搞的一批高利贷冲掉。因为这个我们负担很大，一九七八年搞的这一批，明年光还本付息六十五亿人民币，要连续二三年，三年以后高峰才能过去。

(4) 企业降低成本，减少浪费。这个有很大潜力。要从增加财政来讲，它比生产的增长还要可靠一些。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每年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财政收入只能搞十亿元左右。如果成本降低百分之一，也是十亿元。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多年来吃大锅饭的办法，加上多年的经营管理混乱，浪费很大。我说的浪费，还不是人多，就是不负责这种浪费。所以，现在企业的潜力特别大。这两天报上发了个消息，抚顺市今年生产全面下降（因为它是重工业多），但是它今年财政收入不减少。首钢，铁少炼了三十万吨，钢少炼了十二万吨，今年财政收入大概比去年还要增加。就是说，企业的潜力是很大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政策，要能够把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觉得，今后这几年，一个是靠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一个是要靠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来增加收入，这里我估计潜力相当大。

(5) 中央财政的负担要逐渐收缩一些。有一些事，将来中央财政不负责。中央对基本建设的拨款，将来主要用在能源、交通、城市建设一些关键项目上。一些轻工业，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又比较大的项目，依靠地方、依靠企业来搞，刚才讲的通过银行的办法。中央财政的投资范围适当收缩，一开始能搞多少，还要研究。

三、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农业，今后几年还是个持续增长的趋势。当然，天灾人祸，哪一年不怎么样，这完全可能。总的来讲，今后几年，农业还是个持续全面增长的趋势。粮食不可能增很多，因为有些地方粮食面积还可能减少一点。但是，棉花、糖、油料以及其他的各种土特产，包括山货，会有个持续的较大幅度的增长。我觉得，陈云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讲到的一个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是这样讲的，宁可进口二千万吨粮食，解决经济作物，解决畜牧业等。陈云同志讲的是二千万吨，现在还没有一下子搞这样多，现在还不到一千五百万吨，是一千三百万吨。今后五年内，就是按进口一千三百万到一千五百万吨搞下去，不动摇。这样，我的看法，今后我们的棉花很有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我在这里冒讲一句，如果我们政策不变，到一九八五年，我们很有可能搞到八千万担棉花。棉花主要的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光鲁西北就可能搞到二千万担。它原来是四百万担，去年达到一千零七十万担，今年还超过去年。我在鲁西北做过调查。北方种棉花，包括河北、河南、山东，这是非常合算的。在北方来讲，两斤粮食可以换一斤棉花。按国际市场来算，一斤棉花可以换十斤粮食。所以要多进些粮食，把棉花搞上去。再一个是糖，也是北方的甜菜希望最大，关键都是个粮食问题。我们用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把国内的农业结构逐步进行调整。我看，这在我们国内是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当然，现在还没有搞到陈云同志讲的那个数字（二千万吨）。他讲是几年之内，可以长期地搞。总的我觉得，我们棉花、糖、畜牧业、水果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大发展。

轻工、纺织、建筑材料。轻工里边，特别是最近耀邦同志讲的食品，包括各种各样的饮料。我们的饮料太少，为外国人搞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就是啤酒、矿泉水、汽水三样东西。青年一代和我们老年人不一样。不仅是旅游，国内市场，各种各样的饮料都很需要。还有个日用化工，农民生活改善以后，就可能冬天要用点雪花膏，农民如果每家买一瓶雪花膏，这就是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小孩子、独生子女再用点花露水，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总之，我们中国的日用化工，香料香精、化妆品，当然不能和国外比，但现在化妆品在街上很多都买不到。这些东西都是一本万利。食品和化工，我认为都有可为，这都是些赚钱的东西，可以回笼货币。

重工业主要还是围绕着发展消费品，调整服务方向。不是不搞重工业，是重工业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任务。

四、能源、交通。小平同志讲的那句话，就是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五年计划里头，我们还得下点力量，搞能源，搞交通。中央的投资，无论如何也要挤一些搞这些。外资也还要用一部分搞能源，搞交通。能源和交通如果不搞，肯定会妨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当然，搞能源，一是开发，二是节能。五年之内，节能的技术改造是重点。我们这五年能不能为下一个五年作些准备，关键是两个：一个是能源、交通问题，一个是老企业的技术改造。

五、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现在的企业所以效率低，一个是管理问

题，一个就是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五十年代苏联援助我们的一百五十六项，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落后的设备，特别是消耗能源比较大。再过上几年，我们现在的工业有相当一部分到了“更年期”了。当然，不是说全部设备都不要了，都要重新改。但是，原有企业在这五年要设备更新，技术改造。而且这一个挖革改不像我们过去讲的，专门是为了增加产量，应该重点是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挖、革、改过去主要是为了量的增加，今后应强调质的提高。这样，经过五年到十年，我们原有企业的面貌逐渐有了变化，这本身就积蓄了力量，就是生产力。而且，因为我们这一段新搞的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了，原有的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都能够多搞一些。这样，重工业、机械工业不至于下降太多。现在我们的机械力量很大，完全有力量搞这个。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也可以引进一些技术。技术改造在这五年里也应该很好地抓一下。

六、进出口。我们要继续发挥现在国际的有利条件，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以我们的优势来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国际上交换。既然现在已经不是闭关自守了，就不能完全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来搞，应当利用自己的长处，同国外来交换，弥补自己的短处。无论农业、工业，都需要这样。讲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拿粮油这个问题来讲，如果我们善于同国外交换，有很多是非常有利的。刚才我讲的棉花是一类，现在讲油料。现在我们长江流域的油菜籽是大发展的趋势，因为农民收入也多，而且茬口也合理，也比较稳定。如果我们逐步地在东北从城市开始不吃豆油，吃菜籽油，把东北的大豆转为出口，那就非常合算。东北一年用三十亿斤大豆榨油，而东北的大豆，大家都知道，根本不是榨油的大豆，东北是含蛋白质高的大豆，美国对我们这种大豆非常有兴趣。它榨油出油率很低，但在国外卖价钱很好。如果说东北都少吃豆油了，那就是一大笔财富。因为长江流域的菜籽油多的是，这几年控制不住。菜籽油出口不行，不合算；国外也不愿意买这个东西。我们的大豆可以搞高蛋白质的食品和饲料，很多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种大豆，因为它的蛋白质很高。我们过去只强调自给，拿这种大豆去榨油，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逐步地把农业结构加以改组，少种小麦，多种油菜籽；如果全国能够逐步逐步都吃菜油的话，这就能把东北的大豆、山东的花生替下来出口。当然，这要有个过程。如

果逐步来搞，能够拿十亿斤也不得了。还有一些这样类似的东西。上一次我跟粮食部讲小麦和大米的问题，我们中国虽然大米很紧张，但中国是在世界上生产大米最多的国家。不仅现在，再过些年也是这样。总之一斤大米可以换两斤小麦，甚至还会更多一点。如果我们城市里边采取一些措施，多吃一些面粉（这要采取些政策措施），逐步挤出一些大米出口，一百亿斤大米就可以换二百亿斤小麦。当然，这不容易。像江苏、浙江一直到广东，主要都是用大米作食品，喂猪也是大米。湖南也是。但是，大米喂猪，养分并不好，还不如苞米。如果我们将来把饲料工业搞好，用好的饲料换大米，又便宜，又把大米换出来出口，那是很合算的，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一些。我们现在不是闭关自守，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国际市场有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研究善于经营的问题。耀邦讲的善于运筹，就是通过交换，通过国际上的贸易，以己之长，补己之短。我觉得，这个方面，无论农业、工业，都有极大的潜力。现在我们很多人考虑问题，好像还是什么东西都靠自己比较好。我觉得，真正的自力更生并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拿自己的东西换另外的东西，这怎么不叫自力更生？我并不是依靠你，我是拿我的东西跟你交换。如果我们不是自力更生，他也不是自力更生。这个框框，现在还束缚我们很厉害。再一个，就是沿海城市和沿海地区怎么样把它的工业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进养出。上海、青岛、天津、广州已经这样做了，从国外进原料，加工产品，然后出口。当然，全国其他地方也可以搞，但这些地方有很大的优势，经验、技术、交通、电讯、社会联系都有利。我在上海讲，将来上海相当大的力量是对外。还有天津。这样一搞，沿海这些地方，二亿人口，可以创造很多财富，也可以克服很多弱点。

最后，人民生活。那一天小平同志说了一下，大概这五年，人民生活不能提得太高，对消费的部分要有所控制。农产品提价问题，工资问题，奖金问题，都要有所控制，消费的部分不能增加太多。主要的是搞点宿舍，搞点房子。虽然个人的购买力是促进消费品生产的动力，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压力太大了不行。所以，还要控制一下。

以上只是些初步的看法。

计划生育政策要放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有人告诉我，真正在农村不超过两胎，到本世纪末，人口年增长率不超过百分之一。中国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我们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四以上，粮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人口增长百分之一，我们的人口就没有什么危险，就比较稳妥。

中心问题要讨论清楚。我在四川从来没有提农村实行一胎化。城市里面肯定可以做到，肯定不要开一胎化这个闸，农村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要求，要有一个比较坚定的长期的政策。如果农村政策严重脱离实际，即使一个地方，一个时候，搞出点东西来，不能持久下去。我跟慕华¹同志谈过，这是一个大政策。如果我们定政策定到一个不可能的基础上，形成基层干部和群众严重对立，最后反而会变成放任自流，人口会泛滥。农村不能因为搞计划生育，而不实行生产责任制，把各方面的螺丝都拧得很紧。

现在农村的计划生育有两个问题：第一，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如何适应新的情况，防止自流状态。现在，相当一些地区责任制落实以后，自流了，搞不好，几年以后人口会大泛滥。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二，要抓紧，政策上不适当放宽也不行，多数地方农民不接受，结果也会使基层干部撒手不管。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政策上适当地放松，同时又抓紧工作。政策适当放宽，和多数农民取得一致，我们的计划生育还有希望。如果不注意这个情况，结果相当一些地区，包括四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计划生育问题会议上的发言。

川，会出现自流。至于政策放宽到什么程度，有两个方案：第一，干脆提倡一胎，采取切切实实的办法来鼓励，农村还是有些人响应，可以生一胎。还有一些人，因为生理上的关系，只能生一胎，还有不能生的。剩下的可以生两个，第一个生女孩子，第二个还生女孩子，再生不行了，群众舆论也通不过。真正做到这一点，增长率就超不过百分之一。这样搞，可能解决大问题，经过工作，跟相当多的农民站在一起，避免严重的强迫命令。现在我们要注意，真正工作抓得紧的，强迫命令相当严重。在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只要一胎是不可能的。硬着头皮搞一胎化，命令主义还要大发展。四川的命令主义也够严重的，相当一些地区，跑到外地去生，生了以后带回来，你能把她杀了？

第二，也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办法，一般的还是一胎，但是第一胎生了女孩子，可以同意再生一个。这样讲有个毛病，公开承认重男轻女，好像生女孩子不算孩子。文件上不能这样写，可以用另外一个话，比如说某些人确实有需要，思想上实在不通，也可以批准生第二个。

城市生一胎，农村提倡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或者农村一般也是一胎，某些确有需要、思想特别不通的可以二胎（实际上指第一胎是女孩子，还可以生一胎）。万里同志主张，这个话上面不要讲，可以叫基层干部掌握。

总而言之，为了真正把计划生育工作搞下去，我们的政策必须放在农民能够接受的基础上，以避免严重的强迫命令，避免自流。如果政策不符合农村的实际，会从另外一个方面助长自流，基层干部搞不通，就撒手不管。特别是在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针对这个实际，定得越严越行不通，最后人口大泛滥，这就是辩证法。搞包产到户，搞责任制以后，根据新的情况，抓紧工作，政策上从农村实际出发，这样下去，人口不一定像刚才讲的那样。应该看到，这几年搞计划生育有点基础了，多数农民不一定要求多生。

搞包产到户，搞责任制以后，做计划生育工作，除了政治上进行宣传教育以外，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奖励和惩罚。比如独生子女包产可以低一点，田可以多包一点。超过两个，不允许生的生了，经济上罚，交多少公益金、公积金。甚至可以考虑正式立法，农村超过二胎的，城市超过一胎

的，征一道税。罗琼²同志有个材料，如果在农村只准生一胎，独生子女有优待，农村生产队矛盾解决不了，生产队的负担也吃不消。有些可以生两胎，有些生一胎，经济上负担不一定那么大，矛盾也少。

我的基本观点，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只要本世纪减到百分之一，到下一个世纪，人口就不会再增加。关键是这个世纪，只要不超过百分之一，经济上没有问题。在中国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硬是要减到千分之五、千分之六，本身就脱离中国实际。如果中国这个国家还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中国没有前途。农村真正杜绝了三胎，一般不到两胎，城市一胎，或者一胎多一点，基本上一胎，这样，递增率我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一。整个发展中国家百分之二以上，如果我们减到百分之一，很了不起了。

注 释

1. 陈慕华(1921-2011)，浙江青田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部长，外经贸部部长，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罗琼(1911-2006)，江苏江阴人。时任全国妇联书记处第一书记。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常委。

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日

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都议论了今年的经济形势和“六五”计划的问题，今天把一些主要的看法吹吹风。具体计划数字，计委很快就发下去。

一、今年的经济形势

现在已经过了八个月，总的来讲，今年的经济形势是好的。据预计，今年二月姚依林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修改了的今年计划可以实现。

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今年财政情况究竟怎么样？前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赤字一百二十亿元。依林同志那个报告讲，要争取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根据现在的情况看，这个任务今年可以做到。截至八月底，全国财政（包括中央和地方）节余四十三亿元，去年八月底是支大于收二十四亿元，两项相加是六十七亿元，就是说，今年财政比去年少六十七亿元的窟窿。什么叫基本平衡？就是赤字在二三十亿元左右。国务院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今年硬是要做到财政平衡，一点赤字也没有，也是可以做到的，不外乎把今后四个月的开支进一步压缩就是了。但是这样对整个经济建设不一定有利，而且要考虑今后每年是不是也安排得一点赤字也没有？根据目前各方面情况来看，“六五”期间每年保持财政基本平衡，恐怕对经济有利，不一定做到完全平衡，赤字多了当

然也不行。是不是今年就做到一个赤字没有？经过全面衡量，得失相较，不一定非得勉强这样去做。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也谈过这个论点。所以，今年还是要作到财政基本平衡，赤字控制在二十亿元左右。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事情。如果今年十一月下旬开人代会，我们再来讲有一百多亿元赤字，人们就会没有信心了。今年二月讲的，最后做到了，这对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有好处。中国的财政赤字由前年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今年做到二十亿元，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

农业情况。虽然这一段灾害较多，但总的讲，今年农业情况很好。农业靠政策，今年是真正发挥了威力，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作用。假如说，今年农业减产，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灾害严重嘛。但从全国来看，今年是全面增长的形势。一个是粮食，我估计大体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农业部门估计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还有的同志更乐观一些。如果今后不再出现更大的灾害，今年的粮食生产有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总产六千六百亿斤。另一个是经济作物以及农村的各种副业，今年的增长幅度会是比较大的。棉花，今年可能达到六千万担左右。只要我们的政策不变，今后棉花还是会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要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限制发展棉花。棉花的主要希望在北方，而不是南方。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后逐渐减少棉花的进口，甚至不进口。糖料，形势也很好，大概会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只要有适当的政策，北方的糖大有前途。问题就在于要改变我们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经济的指导思想。北方，一个粮，一个棉，一个糖，如果能够很好地贯彻因地制宜的方针，可以增加很多产量。像黑龙江、辽宁、吉林西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盐碱地种粮食产量并不高，种甜菜相当好。进口粮食要外汇，进口糖需要更多的外汇，那为什么一定要少进口粮食多进口糖？没有必要嘛。中央的方针定了，下决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以便我们在国内合理地调整农业结构，使那些不适合种粮食而适合种棉花、糖料、花生的地方，去种棉花、糖料和油料。这也叫合理地利用资源。中国的农业，如何能够在可能的条件下（每年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很有文章可做。盐碱地、沙地硬去种粮食，它就对不起你，如果沙地种花生，盐碱地种油料、棉花，就会发挥优势。至于家庭副业、畜牧业

情况都是很好的。今年的农业产值，原来计划增长百分之五点六，我看有可能完成。因为家庭副业、多种经营有很大的发展。

工业情况。今年的增长速度很低，到八月底，工业产值才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一，估计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百分之三，主要问题是重工业下降很多。一至八月，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二，重工业下降百分之八。这是个累计，从第三季度起，重工业开始出现回升。估计全年轻工业增长百分之十一，重工业减少百分之五，相抵之后增长百分之三。这可能是我们国家工业增长速度少有的低的一年。但是要看到，今年这么大的调整，整个工业没有下降，还保持了百分之三的速度，这如果没有强调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方针，大力发展轻纺工业，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么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一下压缩几百亿元，很多重工业没事干，在这样情况下，整个工业还保持了百分之三的速度，是不容易的。当然，在第一季度，我们在工作上、思想上有一些问题。一个，客观上是这么大的调整，重工业一下要把服务方向改变过来，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另一个，对调整的理解上、认识上有些不一致；再一个是，精神不那么振作，松下来了；还有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有些搞得过死了一点。当然在去年那样的情况下，有些事情一下看不那么准，先把它稳住，先搞死一点，看一看，也是必要的。

市场的情况也是好的。一至八月，社会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全年可能达到百分之九。一方面社会商品零售额有增加，另一方面截至八月底商品库存增加九十六亿元，增加的东西有粮、棉、油、化纤、自行车、手表等。农贸市场是稳定的。由于农业的丰收，工业消费品的增加，加上冻结物价等原因，物价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当然还有一些不够巩固的因素。上半年农贸市场市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三，国营商业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不到百分之一。货币的情况，原预计今年上半年回笼五十亿元，下半年投放八十亿元，相抵之后全年投放三十亿元，这个数字看来打不住，可能要超过，估计达到五六十亿元，这同农副产品收购大量增加有很大关系。这个不可怕，不是财政性发行。另外，由于全国经济搞活，有很多新的情况，完全用过去的一些观点、数据来分析现在货币的情况，也不完全适合。陈云同志提到这个问题，说大家手中的票子多了，特别是农民手里钱多了，家里就要放点钱，这是不参加流通的，总有多少

个亿吧。这个问题还在继续研究中。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货币流通量大增加了。过去农村卖粮、买化肥不需要用货币，转账就行了，现在农民卖粮不少是各自去卖的，要给现钱，货币当然就增加了。还有农贸市场扩大等原因。看来增加货币投放，有它的客观原因、客观需要，有客观的新情况。当然，总的是票子多了，这也是要承认的事实。

财政、农业、工业、市场、物价、货币问题，总的就是这些情况。这么大的调整，出现这么个形势，应该看到总的来讲是好的。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方针分不开，尤其是农村。陈云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农村也好，工业也好，都是很好的形势。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下边我还要讲。

二、关于“六五”计划的一些设想

第一，速度问题。

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怎么样？经过计委反复考虑，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定为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工业、农业、国民收入都定为百分之四，比较恰当。今年已经过去了八个月，今年是百分之三，明后年是百分之四，八四、八五年超过百分之四。今后粮食生产不可能增长那么多，但是，农业的多种经营，包括经济作物、副业、畜牧业增长速度会大于粮食，农业产值的增长不会太低。工业的增长，执行的结果可能超过百分之四，但是现在定到百分之四，比较恰当，留有余地嘛。这个百分之四，大体上是说，轻工业递增百分之七，重工业递增百分之一。我们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外，所有的长期计划都没完成过，我们这次制定的“六五”计划无论如何要完成。这次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定到百分之四，国民收入也定到百分之四，是不是太低了，是不是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了？不是。我的看法是，调整时期要有一定的速度，速度太高不行，如果速度定得过高，可能给国民经济造成新的不协调，增加更大的负担。如果速度太低，国民经济很可能会萎缩下去，那样我们就积蓄不起力量，以后就无法前进。我认为，如果有百分之四的速度，经济效益也就是国民收入情况又比较好，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克服五年中间的困难，而又为

以后的发展准备条件。按照现在的设想，如果我们这个五年能够有百分之四的速度，执行的结果超过一些，下个五年，就是“七五”期间，增长速度可能定到百分之五，执行的结果可能超过一些。这样，八十年代，我们就可能有个百分之五的速度。下一个十年，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速度。这个新的速度是多少呢？据计委的测算，下个十年可能是百分之七。这点同最近日本经济学家和世界银行一批人的看法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中国“六五”计划，速度不宜搞得太高。如果按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执行结果是百分之五的速度，第二个十年是百分之七的速度，我们就能基本上实现两个倍增的计划。这样，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情况就比较好了。“六五”期间这五年，是什么样的五年呢？我的说法是，这是我国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五年，把基础打好，使国民经济出现一个稳步上升的形势。我们的政治形势是稳定的，这五年经济调整得比较好一点，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如果这五年摆布不恰当，我们也还有可能走一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这五年当中，我们还是要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个方针。必须使我们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合理，产品结构有相当大的变化，组织结构有所突破，现有企业经过技术改造在面貌上有相当大的变化，能源交通要有适当的建设规模。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为全面改革作好准备。这五年，我们既要有一定速度，又要使整个国民经济摆脱不良循环。完全没有速度，不可能摆脱不良循环；片面地追求高速度，也不能摆脱不良循环。可以说，这五年是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的五年。这五年内，我们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就没有生产资金，人民的消费也保持不了，那就不行了。这个速度就是百分之四，或是百分之五，保持这样一个速度，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

要实现上述要求，关键是三个问题：

一是发展消费品生产。发展消费品生产包括农业、轻纺工业等，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领域和很大的潜力，眼光不能只限于自行车等几大件。比如，我们最近议论的建筑材料的生产问题，或者说整个建筑业的问题，这是非常有活力的积累资金的产业，世界上很多国家把建筑业作为一大经济支柱。但是，我们的建筑业却完全没有活力，等于一个服务行业，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当然，这里有很多矛盾一下解决不了。把建筑业搞活，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些同志熟悉香港，熟悉新加坡，建筑业在他们那里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建筑材料在我们国家来讲，已经成了工农联盟的问题了。农民有了钱就要盖房子，建筑材料既可以大量地回笼货币，又可以满足农民的需要。盖房子，城市没有玻璃，农民更没有玻璃，只要有玻璃供应，我看可以销售几千万标箱。再如食品工业，包括饮料，路子宽广得很。我们这里举行一个招待会，端出来的三样东西，第一个矿泉水，第二个桔子水，第三个啤酒，就是这三样东西，再多的没有了。如果到国外，端出一盘子，有上十种。当然，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有像外国那样大的市场。但是，现在青年人的嗜好同老年人不一样。饮料这个路子很宽广，饮料的原料，利用农村的山地，发展多种经营完全可以解决。至于食品，更是如此，人民生活稍微提高一点，对食品的要求也就提高了。我最近宣传日用化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看中国的妇女总还是要打扮打扮。农民生活改善以后，每家用点雪花膏、花露水、香皂等等，这就有很大的销售量。总之，日用化工方面的东西我们很缺。刚才我只讲了化妆品，其实日用化工，何止化妆品。要看到中国的变化，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扎紧腰带只搞重工业。群众的生活水平高了，特别是农民收入多了，就有多方面的需要。我国人民的生活虽然不像有些发展快的国家那样，但生活要求也在逐渐多样化，这在城市、在农村都可以看得出来。总之，发展消费品生产，农业、轻工业的路子很宽广。消费品发展起来以后，积累问题，消费问题，财政问题都比较好解决。而且生产这种东西，消耗能源少，投产快，多数可用银行贷款进行周转，不需要国家投资。

发展消费品生产本身会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不要把消费品生产同重工业对立起来。消费品的生产需要重工业为它服务，也就推动了重工业的调整，促进重工业改变服务方向，这是重工业搞活的关键。重工业的调整，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第一位，而不是离开消费品的生产孤立地去发展重工业。消费品生产没有重工业，也发展不起来。在今后的五年里，这是第一条重要方针。

二是抓技术改造。就是现有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我们这五年，要使重工业不要下降的太多，而且还有一定的速度，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我看很关键的问题是企业的技术改造。企业的技术改造如果

排上议事日程，重工业首先是机械工业就有事情干了。机械工业一活，其他原材料等行业也就有个如何跟上的问题。有两种方针：一是抓紧技术改造；一是现有企业都摆在那里，有形损耗、无形损耗五年，那时想走也走不动了。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我们的工业不少到了“更年期”，就是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到现在也二十五年多了，而且当时那些设备在世界上也不是最先进的。应当围绕节约能源、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进行技术改造，在一些老企业里，采用先进技术，搞先进设备，意义很大。

为什么突出讲技术改造，而不讲挖革改？挖革改的概念不太明确，挖革改中的挖潜力，很多是在落后的基础上加落后，扩大产量。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工厂进行技术改造，首先是机械工业，使它技术上有所前进，浪费减少，消耗降低。我们过去的挖革改，主要是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质的提高。当然，现在也不是对过去的设备一风吹，全部换新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究竟怎么样改造，是一篇大文章，要专门讨论。如果不这样做，设备会越来越破，形成老牛拉破车，越走越慢。我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现在仓库里的不少东西必须报废，老是利废，很落后的设备再来装上去，没有必要。现有库存的六百亿元机电设备报销它多少个亿，我们的情况就会好一些。现在我们仓库里还有钱昌照¹先生那个资源委员会的东西。这些东西占在仓库里，没有任何意义。把旧东西回炉，作为废钢铁，至少可以腾出仓库来嘛。无论如何不要像广东过去卖咸鱼那样“推陈储新”，新的咸鱼来了存起来，先卖臭的，臭的卖完了，新的也臭了，所以老是吃臭咸鱼。我们现在也有类似的问题，物资部门仓库里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要报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街道工业，街道工业拆下来的设备交给社队企业。汽车就是这样的问题，很老的汽车还在那里跑，新的汽车不能生产。当然，仓库里的东西有些要利用，有一些必须要报废。挖革改必须突出技术改造，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设备、技术、工艺，要有一个新的面貌。这样经过五年，原有的企业就有新的变化。当然，这是长期的任务。中国现在不适于大量地采用最新的设备和技术，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也不能在很落后的技术上越搞越落后。主要应当采用适用技术，来

改造原来很落后的技术。我国劳动力比较多，特别是在自动化的问题上要分轻重缓急。工业发展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同时要为今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那么，技术改造问题，就必须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来。

三是以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能源的问题，第一是节约，五年中间，甚至“七五”计划的前期，靠新建项目解决能源问题，跟不上。技术改造要把节能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节能我们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这是依靠改善经营管理，依靠轻重工业结构的改变节省的。节能，更重要的是技术改造，在五年内要把关键的技术措施搞上去，计委、能源委已经有了一些想法，要具体落实。既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又要使重工业有一个最起码的速度（百分之一也是起码的速度），如果不节约能源，就是空话，就要回到老问题上去了。为什么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呢？为什么重工业不能不调整呢？能源紧缺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一搞消费品，回头一看，重工业下降太多，又要重工业上，重工业一上，消耗很多能源，消费品又要下。为什么这两年轻工业能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前进，根本问题是重工业让出了能源。如果是重工业一上，就像翘翘板，这头翘起来，那头下去，这头再翘起来，那头又下去，没有出路。所以现在我们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又要使重工业有起码的速度，这样我们这五年就好办了。做到这一点，关键的问题是能源的节约。这个矛盾只有靠节约能源去解决，因为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终究是有限度的。节约能源应该摆在技术改造的第一位。

当然，只靠节约也不行，还必须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必须下决心挤出资金（包括内资、外资），使能源交通建设有一定的规模。最近国务院会议讨论，能源、交通问题，交通是第一位，特别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当优先放在交通上。因为有了交通，能源才有人投资，地方愿意投，企业也可以投，甚至还可以集股。如果交通问题不解决，就是再好的煤矿也没有人去开，开了以后运不出来。现在能源中的煤炭问题，首先还是卡在交通上，如果交通情况好一些，煤炭还可以多搞一些，还有潜力可挖。从发展上来讲，首先把交通落实，至于能源，可以调动其他的力量来搞，比如山西煤，余秋里同志讲，如果交通没问题，很多省愿意投资搞。当然，不是说，对煤炭不下大力量投资。世界上搞工业，都得先解决交通问题，资本主义发

展也是从交通开始，有交通才有贸易，有贸易才能刺激商品生产，然后生产力才能发展。过去我们长期按自然经济的模式搞，对基础结构的东西太忽视了。

我认为，有了以上这三条，在五年中间就会有一定的速度，并为今后的前进作好必要的准备。

这里顺便说一下，方毅²同志讲的优势产业，稀有金属和稀土金属问题，我认为值得注意，过去其他同志也提过这样的建议。当然，当前规模搞得太大不行。看来，早一点下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很有必要，这是国内的需要，也可以出口换外汇。

第二，财政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困难，没有钱。要消费，又要建设，又要开发能源，又要进行技术改造，出现财政赤字，等等。这个问题怎么办？从财政本身采取一些措施，包括调整价格、税收，严格财政纪律，加强国家财政监督等，可以解决不少问题，这方面我不多说了。看来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出路，在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现在是一方面财政困难，一方面浪费极大，遍地是黄金。完全靠产值速度的增长来解决财政困难并没有很大的作用。由于各种原因，去年财政收入只占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五左右，按现在的经济效益，每年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四，只有四五十亿元的财政收入，也就是每增加百分之一，只有十亿元，这说明经济效益太差，浪费大，成本高。所以只从增长速度上来解决财政困难还不行，就是再提高百分之一，只能增加十亿元，百分之二，二十亿元，五年加起来也不多。今年有许多企业减产增收，最近专门请了抚顺市财政局长田欣毅同志作报告。抚顺是重工业城市，生产全面下降，但收入可以不减。北京市的首钢，今年铁少产二十九万吨，钢少产十二万吨，收入不减少。什么原因？就是企业的潜力很大，挖出来就是很大的财富。长期以来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职工不关心自己劳动的经济效果，以致浪费很大，成本很高。最近国务院讨论，提出每个企业从原料到产品，一律按国际价格算账，这样算下来，亏损企业可能占百分之八十。如果工资也按外国的标准算，亏本的企业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多企业说是有利润，实际上很多是原材料价值的转移，铁、煤、木材便

宜，过去还有个农副产品便宜。农副产品稍一提价，轻工业就吃不消了。什么原因呢？过去靠农产品的剪刀差，靠农产品价格低。这是长期以来管理落后，技术落后，浪费大，成本高，经济效益太差的结果。这既是我们很大的弊病，又是很大的潜力，问题是怎么搞法。现在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在解决吃大锅饭上开刀，我认为选择这个突破口是对的。现在讲经济责任制，不外乎企业不能吃大锅饭，工人不能吃大锅饭。企业经营好的，可以多得一些，经营差的少得一些，工人也要解决按劳分配的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讲来讲去，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为什么这几年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没那样多，投资也没那么多，农业生产上得很快呢？根本问题，就是不能吃大锅饭。这一条非常灵。工业搞经济责任制，肯定会出现好的效果，当然，工业比农业要复杂些，有个生产的连续性，一环扣一环，还有个外部条件问题，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要根据工业的特点，研究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形式。最近在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同志高度评价这件事，说现在搞的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其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他还说，农业搞的结果，很有效，工业、商业势在必行。当然工业、商业跟农业不一样，我们要搞稳当一点，要具体分析，要精心地从实践当中去寻找好的形式，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完善。要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使企业关心经营管理，工人关心劳动成果就必须同他们的利益结合起来。当然，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如领导班子振奋精神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两条：一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振奋精神；二是要通过政策，把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实行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企业关心改善经营管理，工人关心自己劳动的经济效益，这是个基础。但能不能搞好，会不会出其它的毛病呢？这就得对企业进行整顿，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跟上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因为我们讲政策，讲经济责任制，主要是同利润联系起来的。而利润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今天的情况下并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经营的好坏和劳动的好坏。如果其它方面的工作跟不上去，这里面漏洞甚多，可以搞邪门歪道的东西很多。经济责任制只是个突破口，能不能搞好，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是能不能把经营管理抓上去，把整顿企业抓上去。没有经济责任制，整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就

没有群众基础，企业本身没有积极性，工人也没有积极性。建立经济责任制后，要因势利导认真地搞企业的整顿，认真地搞企业的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纪律。这样就不仅仅是同利润挂钩，而是把企业的整个经营管理水平抓上去。经济责任制只是个突破口，各个省、各个部都要抓自己的骨干企业，把企业整顿搞上去，把经营管理搞上去。越是大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部管的企业，比下面管的企业浪费大，潜力也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搞了一个骨干企业的材料，很说明问题。全国三十五万个工业企业，有大中型企业四千四百个，骨干企业二千一百多个。这二千一百多个骨干企业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利润加税收五百亿元，占百分之五十二。所以要抓骨干企业，抓大头。这五年，关键是要提高经济效益。这五年不是一般的五年，困难是很多的，怎样把各方面的力量用好，如果能达到刚才讲的结果，就过了一关，三十几年积累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积累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就能取得主动。各个工业部门，都要作个计划，抓企业的整顿，最后出什么成果，讲多少条都可以，如整顿领导班子等等，但最后没有一条提高经济效益不行。拿多少钱出来，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税收，减少多少成本开支，得拿出成果来。部长、副部长下去抓一个骨干企业，搞那么几条，增收节支一千万元、五百万元，我看就是很大的成绩。当然，不是乱来。就是思想工作加政策，把整顿企业搞上去，把经营管理搞上去，把劳动纪律、财政纪律整顿好，在这个基础上搞技术改造，作到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综合利用也有很大的效益。各部门领导干部下去后，要为企业着想，研究如何增产，增收节支，尽快地、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这就能出成果。

以上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是基础。按这个路子走下去，效益会好，财富会多，钱会多起来。但是并不是统统归到财政部，因为渠道多了，相对地说财政收入占的比例甚至还会比过去下降。这是个新情况。但是，不能走老路，不要看到企业有钱，部门有钱，又觉得不好，又想改变政策，把它统统拿回来。拿回来以后，第二年就没有了。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资金分散的情况下，如何用经济的办法使资金的使用符合宏观经济的要求。看来主要应发挥银行的作用，就是发挥银行集中资金和

调动资金的作用。过去是统收统支，钱都拿到财政部了，银行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现在发挥银行作用既有必要，也有了可能，要加强银行的集中、调动、运用资金的作用。今后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基础结构，搞那些收益少、周期长、没有钱赚的、非搞不可的项目。凡是那些有利可图的，周期比较短的，逐步转给银行贷款解决。我对田欣毅同志讲话的批语讲了两个方面，解决财政问题，第一通过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挖掘潜力，把经济搞上去；第二通过银行集中资金，运用资金。这是解决财政问题必须走的路子。

除了筹集和使用好国内资金外，还有个利用好外资的问题。现在国际条件很好，外资一定要利用，不要顾虑太多。只要真正使用得当，对我们克服困难，争取时间是有利的。

现在很多单位不敢用我们银行的贷款，不敢用外资。在外国，高利贷都敢用，我们是低利也不敢用，这说明我们经营没有本领，有本领的也发挥不了，这个要破掉。哪有搞经济不用贷款的？将来银行的利息还不能太低，银行为了筹集资金，需要提高存款利息，因此，贷款利息也要提高，这样就逼着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缩短建设周期。计委计算，我国建设的项目平均建设周期八年，比美国、日本长得多。建设周期太长，与战线长、无偿拨款有很大关系。反正上马了，上马了就慢慢地搞嘛。资本家背利息就要算账，日本人讲，哪有建设项目搞八年的。他们是边建设边投产，外国的企业大部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是百分之十儿的利息，一搞十年不受益，哪个资本家受得了？将来国家财政担负两部分，一部分是急需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也不能是无偿，要由建设银行收一定的利息；一部分是利息补贴。有些项目建设周期长，利息高，国家财政只负责补贴一部分利息。我们要逐步往这方面过渡，开始可能有些困难，但这样搞，我们的工业才真正有希望，才能真正出人才，出实业家。现在这种搞法，搞好搞坏一个样，不可能出实业家。建设周期长，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政治因素，有计划不周、无息拨款等等，也还有设计上的问题，要研究如何缩短建设周期。计委搞的数学模式，认为周期缩短，在同样的条件下，就可以减少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这个论点是对的。为什么外国的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没有我们那么严重呢？除了生产的目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比例关系等问

题以外，还有个建设周期问题。周期越长，积累同消费的矛盾就越尖锐；周期越短，积累同消费的矛盾就适当减少。也就是说，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安排恰当的话，周期要是缩短些，积累就可以稍微多一点。我们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然有些问题一下解决不了，但要逐步着手解决。又如开发煤炭，余秋里同志主张多搞中小型的，我支持这个意见，因为来得快，周期短嘛，投产后，投资很快收回了，又可以再投资。《资本论》第二卷讲资本的周转、资本的循环问题，我们要认真进行研究。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讲资金周转，不讲资金循环是不行的。现在不少单位两个钱不顶一个钱用，如果周转合理，一个钱可以顶几个钱用。过去有很多原因，其中有政治原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得真正按经济规律、按经济办法研究经济建设问题。今天给建委的同志出个题目，就是如何缩短建设周期，以及建筑业如何搞活，这两个问题要作为大事进行研究。上面讲的是生产、建设领域的经济效益问题，至于流通领域内的经济效益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研究。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目前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扯皮的体制，这是外国人讲的，我借用过来，部门、地区、条条、块块扯皮；二是吃大锅饭的政策；三是自给自足经济的观点。这三个问题，如果不逐步地改，我们的经济没有出路。关于体制问题，是比较麻烦的事，还要在实践中摸索。吃大锅饭问题，要下决心解决。这里讲一下自给自足的经济观点问题。应当看到这个问题根深蒂固，做生意、搞计划就是从自给自足的观点出发。社会化大生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交换。今天的世界就是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取长补短。根据地时代过去了，帝国主义封锁的时代也过去了，我们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今后的基本形势就是这样，不会哪一天又回到封闭的经济里。有的会说，战争打起来怎么办？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战时经济问题。什么是自力更生？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这样一个观点，以自己的长处通过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就是自力更生。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才是自力更生吗？如果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力更生。我们又不是靠外国人恩赐来生活，我们是靠交换，用我的劳动来同你的劳动相交换，而且是有利的交换，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优势，这还不是自力更

生！只要思想转过来了，这本身就有很大的潜力。比如，粮食部利用国际市场善于经营，我看就不会赔钱。我们要研究中国怎样发挥优势产业，怎样同外国交换，怎样交换才有利。我们不能完全在国内求平衡，必须把圈子打开。有些东西我们硬是短线，硬是没办法，但是，我们也有优势，为什么不能发挥我们的优势，来弥补我们难以克服的弱点。也可能我们的优势，对有的国家来讲是劣势。如中国再怎么搞小麦，也赶不上加拿大和美国。但是中国的盐碱地可以种棉花。国际市场上总是棉花贵，小麦便宜，这是不能够改变的，种小麦容易机械化，劳动生产率高，棉花生产总是困难些。所以，我们要以自己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就是说，有一个善于利用国际有利条件来经营的问题。不少行业就有很多这类东西，要善于运筹，善于经营，这本身就是很大的学问，也就是说有很大的潜力。我国现在是个开放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被封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每个同志思想上一定要适应这种形势，适应这种新的情况，这样才能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中国人历来是会做生意的，商业部和外贸部许多同志也都是会做生意的。但是，就是有长期传统的观点束缚着，不能使他们的才智得到很好的发挥。要通过改革，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特别是沿海地区，有二亿人口，有上海、天津等大的中心城市，在经营管理、技术水平、交通运输、同国际的联系等方面，都比内地具备更多的有利条件，应当采取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作用。我们学会利用国际市场，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今后国民经济搞得快一点或慢一点，搞得好一点或差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我今天讲的轮廓，第一是速度问题，怎样看这五年的问题；第二是财政问题；第三是国际市场问题。我们今后制定五年计划必须考虑这些问题。

注 释

1. 钱昌照（1899-1988），江苏常熟人。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

2. 方毅（1916-1997），福建厦门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保证经济责任制的健康发展*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

今年推行经济责任制，国家不可能拿到很多钱，但企业的收入会有很大的增加，问题是个人拿多了不好办。第一年企业的潜力大、浮财多，第二年再搞老办法，不一定上得去。企业职工要保护已得的利益，今年奖金分一百元，明年得五十元，就会影响积极性。因此，一定要考虑明年、后年怎么办，不能以后无以为继。个人所得不能弄得太高，不能太冒尖，必须加以控制。这是一条重要的政策。这样做，一方面使个人消费基金不致增加太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轨道，否则就会为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设置新的障碍。因为，现在个人一下子拿得很多，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真正改善了，而奖金又不可能有更多的增加，工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要看到今年搞包干，主要不是从体制改革考虑的，是由于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才搞起来的，是仓促上马的。包干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唯一的指标，从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看，很不完善，容易发生很多流弊。利润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利润大的企业不一定贡献大；有些利润小的企业，不一定贡献小。这样包下去，形成一个不合理的基数，以后再动它就很难。人都是往高处走的，往低处走很不容易。眼光要看得远一点，要把可能出现的麻烦考虑在前面，把工作做在现在。一方面要实行包干调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北京市关于工业、交通、建筑、商业等行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汇报时的讲话。

动企业的积极性，但又要看到利润包干有很多不合理的因素。现在就怕头脑昏昏，指导思想不清醒，只看到暂时的好处，看不到可能出现的麻烦。总之，一要调动积极性，二要克服平均主义，三要不使个人所得太多，这三条一定要掌握。现在要做好企业职工的思想工作，特别是要把企业领导的思想做通，要讲为国家分忧，要讲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思想工作做好了，办法就有了，可以做到既不给个人发得太多，也不一定就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北京搞经济责任制劲头很大，人人都在算账，说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要防止搞歪门邪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承认企业的利益，企业没有积极性，企业一旦有了利益，就拼命扩大它的利益，所谓经济的内在动力就在这里。那些好的企业就会在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上下功夫，而有些企业就会搞歪门邪道。不把歪门邪道堵住，企业就不会真正在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改革就达不到目的。因此，监督就要跟上，但也不要像过去那样一管就死。要看到，有些地方的工业局并不完全代表政府，他们要为企业谋利益，因而对企业的监督有所削弱。要看到这个变化，国家要制订监督、控制的办法，对企业各种违法行为要给予制裁。

要使企业在改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必须做好企业的整顿工作。推行经济责任制可以促进企业的整顿，但不能代替企业的整顿。过去搞利润留成等，都是在经营管理好的企业搞，现在一下子都包了，好的、差的企业都搞，情况就比较复杂。企业的整顿工作必须跟上，现在，各主管部门要组织大批的人下去抓企业的整顿。要定出几条大框框，作为整顿企业的依据，北京市要很好讨论一下。经委、财政、银行、工会都要组织人下去，首先抓大型骨干企业的整顿，以大带小，把经营管理抓上去。一批消耗高、长期亏损的企业是关停并转的问题，对于这类企业，光讲救活不行，有的企业不宜救活。小铁厂非关不可；小化肥厂有的不关，有的就要关。

管理企业不能光有奖，没有罚。北京市可不可以开除工人？是否北京市带个头，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立个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开除、辞退工人。开除、辞退的职工，劳动服务公司可以吸收。工厂不能开除工人，劳动纪律就搞不好。此外，还要有经济处罚。厂子里有一批所谓“尖子”人物，人数不多，影响很坏。没有一套办法，无政府主义解决不了。治国

要有一套办法，治厂也要有一套办法。新加坡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小国，受世界各地的影响，但社会风气比较好，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执法很严。在禁止抽烟的地方抽一支烟就要罚款，乱吐一口痰也要罚款。个人私自携带武器，被查获就要判处重刑。治理国家、治理工厂，没有法、没有纪律不行。当然，也要防止不应该开除的乱开除，开除职工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被开除的也可以上告，由法院仲裁。总之，管理企业一个要有奖，但不能搞得太多；一个要有罚，包括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今天请总工会、劳动总局的同志来，就是想在北北京试点，搞一个整顿劳动纪律的办法，包括干部失职造成损失要罚款、扣工资。对企业中的贪污盗窃案件，要像抓治安整顿那样严肃处理。

对企业的奖金必须控制，确定一个最高限额，超过这个限额的转为集体福利基金或储备基金，现在没有核实到企业的要核实到企业。定额落后不能搞计件工资，计件工资问题要认真研究。包干不能只包利润，还要把产量、质量、成本包进来，只包利润现在条件还不具备。要提倡递增包干，一定三年，稳定增长；或者搞滚动包干，过去一年，再加一年，使企业提前知道。

国家整个价格要调整合理，时间还相当长。企业里可以搞两种价格。一是内部价格，就是生产价格，这是考核指标。首先从纺织行业搞起，搞出一个比价，棉布虽然市场价格低，但生产价格高；化纤市场价格高，但生产价格低，化纤的利润要在内部转移一部分给棉纺。二是有些工厂搞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比较，用以考核企业的经济效益。搞起两种价格，就有利于判断我们现在的改革是越来越合理，还是越来越不合理。

我讲这些都是肯定经济责任制的前提下来说的。陈云同志讲，体制改革、经济责任制，其意义不下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现在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其它行业势在必行，但问题是工业比农业复杂得多。现在不要光讲它的好处，要注意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为此，要拿出办法。由国家经委牵头，计委、体制改革办公室、财政部、劳动总局、总工会参加，搞出几条意见，再找山东、辽宁、京、津、沪五家研究。经济宣传要按照现在讲的精神来宣传。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最近在北京听到了一些情况，感到有些问题需要注意，今天请你们来座谈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业上实行经济责任制问题。企业搞经济责任制，就是包干了，这个方向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截至现在，从主流来看，从效果来看，总的是好的。但是，对这件事也是很担心，如果搞不好，不可能出一些相当大的乱子？不久前国家经委召开企业整顿座谈会，国务院听取汇报时，也曾提出过一些问题。经济责任制要搞，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已经解决了。问题是一下子就搞那么多，要防止出问题。陈云同志也专门打过招呼。现在搞经济责任制，企业包干，基本上是一哄而起，是一下子搞起来的，全国大概有百分之六七十，甚至还多，而且是仓促上马的。为什么说是仓促上马的呢？各地方搞这个东西，多不是从改革上出发的。因此也没有试点，没有一批一批地搞，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财政任务分不下去，才一下包的。我七月份去山东，听山东同志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只听到好的一面，很多问题没想透。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实质上我们对企业搞了一个从利润上挂钩的办法，就是苏联的利别尔曼¹的办法。具体说就是企业的分配，企业得多得少，工人得多得少，就是看完成利润多少，就是利润指标。当然利润是一个极大的动力，我们始终不能离开这个东西。从根本道理来讲，城市对工业搞包干，包括商业，农村包产到组、到户、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到人，道理和原则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决吃大锅饭的问题。但是，工业、商业的情况，比农村要复杂得多，不一样。农村包得很简单，一个是集体所有制，一个是它的产品是一次完成，它也没有上下左右这种复杂的关系。但是，工业不同，工业有很多前后左右的关系，而且很多是全民所有制。农业包干，问题简单得多，交国家多少，交生产队多少，留给自己多少，发挥积极性没有问题。但是工业如果只跟利润挂钩，别的东西跟不上去，流弊就很多。比如说，跟利润挂钩，还按不按计划去办；再如纺织行业，他少搞白布，多搞化纤，一下子利润就上来了。还有一种情况，他生产以后还有一个销售问题，卖得出卖不出？按我们现在的这套制度，产品制造出来了，利润也就有了，但那边收进去压在仓库里边。他可以不考虑社会需要，搞突击生产，生产多了，利润就高。如果只跟利润挂钩，利润包了干以后，不接着把其他措施跟上去，如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等，那就会发生好多问题。

过去有一种说法，我们搞经济责任制，就是包干要在企业经营搞得比较好的一些厂子，企业经营管理差的条件就困难一些。后来也考虑过，通过包干来促进企业的整顿，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改善。也讲过，经济责任制，也就是包干，要做为整顿企业的突破口，推动企业的整顿。现在这样一包，由于面很大，有很多企业的管理很乱。现在的问题是，在包干以后，是不是能够把整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跟上去，跟上去问题就会少一些，就能前进一步。跟不上去，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会搞邪门歪道，就会大大助长企业的邪门歪道。所以，在经委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时，我专门讲了这个观点。就是经济责任制要因势利导，要能够推动企业的整顿，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改进。我们各级领导，要拿出很大的力量抓这件事，避免经济一包干，其他工作跟不上去，出现一些邪门歪道，转嫁负担。表面上看利润很多，收入很高，实际结果不是那种情况。现在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不按计划，北京市一些小商品大量减少，有些已经绝迹，不生产了；再就是哪个赚钱，搞哪个。还有一些长线或短线的产品，企业生产以后，就转给另外的部门。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果说，我们的整个价格是符合价值的，那按利润包干，抓利润这个牛鼻子是可以的。利别尔曼的理

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价格和价值背离得很厉害，价格并不能反映价值，利润的多和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情况。比如，搞煤炭、白布的，利润就很少，搞另外一些东西就比较赚钱，它不能反映实际状况。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大一批企业的承包搞了包干，退也退不下来了。而且退下来也不行，原来的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是靠这个包下去的。现在一定要集中力量，抓经营管理，抓企业的整顿。我们是从分配入手，从包干入手，去推动企业的整顿，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使企业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

第二个问题，关于奖金问题。从当前情况看，如搞不好，今年第四季度，奖金很可能要大翘一下尾巴，因为包干了。包干的好处使大家有积极性，这里边有的是正常的挖潜，但有些是搞的邪门歪道。据了解，现在很多地方企业，都准备把相当大的一部分钱作为奖金或计件工资发给个人。今年上半年，第一季度工作做得粗了一点，有点影响，弯子转得太陡。第二季度很多地方情况好一点，开始好转。可不要从第三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又来一次奖金的大泛滥。我的看法，如果今年给群众发钱发得很多，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造成极大的困难。因为你这个企业发多了，那个企业也要多发，就要互相追逐。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个人消费的购买力已经没法对付了，没有那么多东西卖给他。我以前讲过，如果企业同个人比较起来，企业要多得一些；企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地方一下扭不转，企业多得了一点，当然也不好，还是应该国家多得一点，这个后果还没有那么严重。如果分给个人很多，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你明年怎么办？如果有一部分企业一下子分得很多，这势必造成大家向它看齐。因为现在有些问题我们一下子说不清楚，它正道走不通，那就走邪道。去年的事实就是个证明。去年下半年奖金泛滥了一下，今年第一季度就造成很大的困难，向下一压，工人情绪马上低落。今年第二季度情况开始恢复正常一些，如果下半年又冒上去，那明年还得向下压。与其明年压，不如今年少发。这个问题上次讲了一下，这次再打个招呼，有关部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各地同志回去，在省、市、区委讨论一下，应该采取切实的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宁可按现在的办法，应该发给他的，留一部分

作为公共福利，也不要分给个人，将来可以盖房子嘛。要作为奖金的部分很多是重复的。比如说，原来有一个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五作为奖金，现在一包干，又有一个完成包干定额的多少，有的还不只是一个重复，有好多重复。这样，加到一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还有一个计件工资，现在看来，计件工资也必须有控制地进行，不能普遍号召搞。已经搞了的，要认真进行整顿。特别是全额计件，完全计件。现在我们一些工厂连定额都没有。陈云同志经验还是多，他一听说搞计件工资，马上提出，计件是可以的，但必须要把定额搞好。搞“计件工资不封顶”的，只能在有条件的企业进行。今天听说，山东济南第一机床厂实行计件工资，它的计件都是零件，根本配不成产品。有的零件多，有的零件少，统统搞计件，按计件发工资，最后厂里根本配不起套，机床出不来，怎么办？还有很多市场上销路不太好的产品，也搞计件。有的搞计件没有一点限制，他就加班加点，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在目前我们整个经济还很不协调，企业管理还很差的情况下，普遍地搞全额计件工资，恐怕条件不行。当然，能够按计件的应该搞计件，这是对的。普遍搞全额计件，条件不行。从按劳分配的道理来讲，能搞，但必须把工作跟上去。现在大面积地搞，我看工作跟不上去。超额计件的问题要小一点，因为它原来还有定额嘛！但超额计件有很多也是重复奖，这就不对了。

总之，今年第四季度奖金不能发得太多，这是一条原则。工作现在做我看好做，到明年再往下压难度就大了。我们宁可现在受点影响，也不要造成明年更大的困难。因为很多厂子的甜头，群众还没有拿到手嘛！办法就是，一部分按原来的杠子分给个人，一部分转作集体福利，如果第四季度奖金大冒一下，就不单单是国家多拿少拿的问题。一个根本原则是不能够再让工人的工资和奖金超过劳动生产率很多，这几年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工资加奖金是上升的，而且是上去就不能下来。这将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困难。要按劳分配，但总的钱不能发得很多。这是两个问题。究竟发多少合适，经委在研究。总的原则，还是要控制在原来各地根据国务院补充规定的奖金杠杠上。还有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包干以后，超额这一部分，不要急急忙忙地发给个人，这同工人关系不是很大。

第四季度总的生产形势是会好的，包干以后的形势也是好的，但现在

已经看到很有可能在奖金问题上大翘一下尾巴。这就会出现一些企业奖金搞得很高，对周围产生影响；一些企业今年这样搞了，明年还得往下降；还有一些很不合理，搞了一些邪门歪道。我们现在这样的包干，因为是全民所有制，很可能出现越是落后的企业，越是经营管理混乱的企业，包干以后，一下子增加收入很多。如果放到企业里也没多大的问题，它可以搞技术改造，如果分给个人，明年肯定要下降。四川搞过，有这个经验。第一年它很落后，一说利润分成，马上调动了积极性，当年增加很多收入，第二年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个人收入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分得太多，现在把工作做到，比明年再往下拉困难要少得多。

第三个问题，关于农村问题。我们讲农民富，主要是靠农民生产致富，就是发展生产。这个我们不怕，农民收入越多越好。但不能在价格上再打主意。我说的价格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提价。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中有许多价格不合理，如果按照合理不合理讲，还得提价。但提价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状况。除了提价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是议价产品失去控制，扩大议价范围，降低计划收购基数，等于变相提价。许多同志知道，由于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水平比较低，工业经营管理比较差，技术也落后，现在农副产品的价格再提高，国家是吃不消的。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棉花国家收购以后，纺织行业除了化纤以外没有多少钱赚。这是一个大变化，纺织行业过去从来都是赚钱的，现在纺纱、织布没有钱赚。因为棉花价格提高了，一个是提价，一个是增产的棉花加价，一个是进口棉花成本也高。所以，现在大家愿意搞化纤，拿化纤补棉花。现在化纤也卖不出去，已积压了十二亿米，到年底还要增加五亿米。化纤也得降价，不降价销不出去。前一段小平同志讲，工人、农民的消费得适当控制。真正依靠生产发展增加的购买力不可怕，问题在于城市用奖金，农村用农产品提价，或者用这样那样的国家让利的办法增加收入，是必须控制的。讲让利，就是按征购、派购²的基数，再超过部分，如搞加工等，让一点利是允许的，但基数不能下降。我们有相当一些地方原来是有计划收购数字的，现在很多没有了，相当大部分变成了加价或议价。我看，第一，降低国家计划收购基数，把它转为议价或加价，不能再搞了，当然超计划的可以。第二，过去有计划收购任务的，去年一下子搞掉了，我主张有些还得

恢复。最近看到广东一个电报，提出要进行整顿，这个意见很好。近两年，国家在关心人民生活方面，根据现有的财力，是尽了最大努力的。现在，在城市、在农村，还得讲“三兼顾”，农民还得讲支援国家建设，工人还得讲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让利问题、降低收购基数、扩大议价、加价范围都得整顿，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陈云同志说，我们的国家总得是两条，一是吃饭，二是建设，不能光讲吃饭，不讲建设。工人生活的改善，应当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要依靠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依靠把属于国家的收入转归农民。这样搞的结果会是老百姓收入增高，国家收入减少，不能维持，搞不下去；老百姓的收入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农业上的问题，以前我在四川也讲过这样的观点，如搞农、工、商联合企业，把一些加工转给农民，办社办企业，就是把一部分加工利润，转给农民，原则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但究竟搞多少，归根结底，要看工业有多少积累。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是工业补贴农业，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如果工业积累很少，国家就没有力量去补贴农业。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划个杠杠，原来的基数不能再变，今后增长部分可以采取一部分归农民、集体，一部分归国家。现在不少是降低了国家收购基数的，主要是扩大议价范围问题。另外，整个农产品价格恐怕要稳定一个时期，当然个别的不是完全不解决。总的讲，调价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

第四个问题，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现在不论是搞工业的同志，搞农业的同志，搞县、区、公社工作的同志，还得讲一下三兼顾的问题，不能站在一边，只顾一头。工业里现在普遍存在一个相当严重的现象，就是小平同志批评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叫做涣散、软弱。现在很多企业领导干部对一些不良倾向不敢抓，不敢管，迁就一些群众中间的落后的东西。有些企业领导干部现在实际上已经跟一些工人中的落后情绪结合在一起，对付国家。不管怎么样，先抓一批钱，发给工人，工人就拥护他，日子就好过。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现在很多厂子的财会人员出现两本账，不给国家讲真话，了解一些情况相当困难。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如不及时注意，发展下去是很严重的事情。总的来讲，要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承认企业的、社队的、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这是非常对的。但是，还

要有一个全局观念，还得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只搞一头不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前面讲的奖金要少发，不要搞歪门邪道，农副产品不要变相涨价，就解决不了。

今年总的情况是好的，财政能做到基本平衡；农业情况也是好的，虽然有些地方遭灾不少，但粮食还是增产的，原来估计接近一九七九年的产量，就是历史最高水平，其它也是大丰收的。物价，由于冻结和其它一些原因，稳定了下来，现在就担心年底物价上涨，有这种危险。工业，今年我们进行了这么大的调整，没出什么乱子，比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不是负数，估计到年底产值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五，轻工业上升百分之十一。明年预计增长百分之四。

今天就讲这么几个问题，打一个招呼，大家还可以议一议。

注 释

1. 利别尔曼 (Evsei Grigorievich Liberman, 1897-1981)，苏联经济学家。1962年9月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前苏联经济改革提出建议，主张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刺激企业挖掘潜力，完成计划，多得利润和奖金，引起了普遍重视。但在中国曾将其视为“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2. 征购、派购：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农产品分三类进行管理：一类指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统一征购，禁止上市交易。征购系国家按粮食折实向农村社队即农民征收农业税和统一收购农民余粮及大宗农产品的简称；二类指畜、禽、水产、水果、糖料、茶叶等农产品，由国家下达收购计划即派购任务，农村社队和农民完成国家派购任务后，超产部分由国家收购或加价收购，也可在当地集市上销售；三类指除一、二类之外的小宗农产品，农村社队和农民可以在当地进行集市贸易，但禁止长途运销。

在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

我代表国务院，向参加演习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任务！祝贺你们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全军面貌迅速改观。这次演习，士气这么高，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这么好，这么多部队，这么多军兵种，这么多科目，组织得这样严密，协同得这样准确，整个演习进行得有条不紊，我们看了以后，大家都精神为之一振。这决不是一日之功，这是我军优良军政素质的体现，也是我军整个工作和战斗力水平显著提高的集中反映。前天下午，我们又请北京军区的同志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区来的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组织这次演习的经验。大家看了演习，听了报告，都认为启发很大。目前在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着一种涣散软弱、松垮疲沓、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的习气，对工作危害极大，必须坚决克服。如何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适应于四化建设的要求，是我们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同志，都应当通过这次演习，受到教育，振作精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发扬团结协同的风格和扎扎实实

* 这是赵紫阳与邓小平、胡耀邦等观看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后发表的讲话。

的作风，把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建设成为有高度效能的工作系统，把各项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同志们都很关心经济工作。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一九七九年初，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但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没有统一，中央的方针并没有落实，计划指标仍然偏高，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比例失调的问题仍在继续发展，积累和消费的总和超过了国民收入，以致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票子发得过多，物价上涨。去年第四季度，中央察觉了这一潜在的危险，提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全党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策。特别是解放军，带头响应号召，带头克服困难，对调整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次调整，总的情况是好的。这么大的调整，没有出什么乱子，形势比原来预计的要好。今年已经过了八个多月，预计可以完成今年二月人大常委通过的修改后的国民经济计划。前两年财政赤字很大，前年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由于坚决压缩基建规模，增收节支，今年可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尽管气候反常，灾情严重，但今年粮食产量不仅不比去年低，而且有可能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各种经济作物是全面增长的形势，预计棉花可以创纪录，达到六千万担左右，油菜籽增产五成，糖料增产一成多，烟叶增产三成。农业总产值可以完成计划，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到六。由于调整，重工业困难很大，预计将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但轻工业是大发展的局面，全年将上升百分之十一。轻重工业升降相抵，工业总产值可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由于农业、轻工业都搞得比较好，市场供应和货币回笼的情况也比去年好。就全国范围来看，国营商业零售价格上升幅度不到百分之一，农贸市场价格上升百分之三点二，应该说，物价是基本上稳住了。今年进行了这么大的调整，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到了最低点，但从全年来说，并不是负数，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速度。第一季度是负数，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第三季度又比第二季度好。由于各种比例关系正在逐步趋于合理，第四季度的情况肯定比第三季度好，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好。

中央提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根本转折。过去我们的经济工作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走的是一条不讲

经济效益、浪费大、消耗高的老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这条路子，投资比较少，积累率不那么高，效益比较好，增加的社会财富多，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现在，从生产、建设到流通领域，各方面的浪费都很惊人。浪费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潜力大，只要把它挖掘出来，就是巨大的社会财富。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我们要着重解决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个关键，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方针：

（一）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这样，既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又有利于繁荣市场，回笼货币，增加收入，安排劳动力。同时，又有利于使重工业活起来。要切实改变“重工业自我循环，轻工业自我服务”的状况，使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转向主要为消费品生产服务。

（二）依靠原有企业，认真进行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由以外延为主，逐步转向以内涵为主；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主要围绕着节约能源、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花色品种进行。企业的专业化协作和改组、联合，要同技术改造、合理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技术改造搞好了，既可以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带动重工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而且几年以后，就可以使企业在重要的设备、工艺、技术上出现新的面貌，为以后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

（三）抓能源、交通带动整个工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当前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它严重影响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能源方面要认真贯彻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从改善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等三个方面，大力节约能源，以适应调整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还必须下决心拿出一定的资金、材料、人力，使能源、交通建设有一定的规模，这不仅是缓和近期能源、交通紧张，渡过当前经济困难的应急措施，也是积蓄力量，为今后的建设打好基础的战略部署。

（四）开辟生财之道、聚财之道、用财之道，解决财政困难。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资金短缺、财政困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出路，在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益。一方面要通过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挖掘潜力，减少浪费，搞活经济，增加收入；另

方面要通过银行，运用经济办法，把分散的资金筹集起来，用于国家必要的建设上。就是说要以银行再分配作为财政再分配的补充。除了运用好国内资金外，还要用好外资。

（五）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发展对外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作用。我们要冲破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观点的束缚，打进国际市场，加快进出口事业的发展。通过国际交换，互通有无，以我之长，补我之短，这就是坚持了自力更生。我们要学会同外国做生意，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骨干商品，注意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对外开拓市场，扩展贸易。

（六）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套完整的方针，调整和改革是相辅而行，互相促进的。当前，一定要以调整为中心，同时进行有利于调整的改革。陈云同志最近指出，改革经济体制，解决吃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其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在宏观方面，要加强计划指导和监督管理，搞好综合平衡，把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调整好；在微观方面，要把经济搞活，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把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和职工劳动成果的好坏联系起来。有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体制、方针、政策，就可以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一条投资少、效益好、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现在正在讨论制定“六五”计划，已经有了一个轮廓。“六五”期间，要认真贯彻上述各项方针。整个“六五”，应该是争取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五年。这五年的速度不可能过高，但必须有一定的速度，才能为今后的发展准备条件。五年当中，要在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方面做出显著成绩；要把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在扎扎实实地抓好节能的同时，积极加强能源建设和交通建设；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并为全面改革做好准备。达到了这些要求，也就是打好了基础，积蓄了力量。这样，就可以摆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虽然速度不是很高，但后劲会越来越大，整个经济就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形势就会一年比一年好。总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希望的，但是，不能走老路，必须走新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病是有办法克服的，但是，一定要把基础工作做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只要振奋精神，实事求是，

注意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我们的经济建设是肯定可以搞好的。

最后，我想讲一讲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拥军优属的问题。我们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从来都是非常好的。军民一家，几十年来，历来如此。“四人帮”的破坏，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可贵。今年以来，在广西法卡山和云南扣林山抗击越南侵略的战斗中，在四川、辽宁、陕西、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抗灾抢险斗争中，军队广大干部战士奋不顾身，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在这次演习中，各部队进一步发扬了“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积极帮助群众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人民办好事。十万大军，进驻三县一市，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实兵演习，不仅没有出现什么纠纷，而且涌现了这么多的拥军爱民的生动事例，掀起了军政、军民团结的热潮，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张家口地委反映，军队同志是“以身作则、拨乱反正”的模范，处处为人民着想，不愧为人民的子弟兵。我们军队的形象，是同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从事地方工作的同志，都应当讲团结，顾大局，自觉地维护解放军的威信，积极支持军队的工作。各级政府，都应该根据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的新情况，进一步把优抚工作做好，都有责任把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做好。从军队退休干部的住房建设问题，到海防、边防部队的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问题，都应当抱主动热情的态度，尽力解决。这次演习，阵地正好选在长城脚下。在张家口一带的山上，可以看到古代长城的遗迹。新的长城，真正的长城，完全打不破的长城，是军政、军民的亲密团结。我们应当为巩固这座新的长城，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景大有希望*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了。各位来宾和朋友应邀出席今晚的招待会，和我们一道庆祝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节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一九八一年对我国各族人民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我国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分清了是非，进一步统一了我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团结，鼓舞了前进的信心。今年，我们对国民经济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解决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形势比预计的要好。农业生产，尽管气候反常，不少地区暴雨成灾，不少地区旱情严重，但是，由于政策正确，农民积极性很高，粮食产量预计可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九年，各种经济作物将全面增长。工业生产，在使内部各种比例关系趋向协调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在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积极努力下，情况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重工业正在调整服务方向，轻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市场物价基本稳定，财政收支可以实现基本平衡。我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少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干群团结，军民团结，这些困难正在被我们一个一个地战胜。

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

* 这是赵紫阳在庆祝国庆三十二周年招待宴会上的祝酒词。

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要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在经济建设上走出一条投资比较少、经济效益比较好、各方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来。我们国家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是大有希望的。

今天，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委员长的谈话，充分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早日实现全民族大团结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我们携起手来，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努力，来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七十周年。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七十年来又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我谨向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需要和平，世界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多种形式的合作和交往，继续增进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当前十分动荡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将坚定地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和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的了解和支持。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同情和支持我国的外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提议：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
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
为世界和平，
为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为出席今晚招待会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想方设法把引进的石化项目搞起来*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

最近想了几个问题，提出来请你们研究一下。

一、要不要把二十二项引进项目中的几个石油化工项目搞起来？我多次说过，要研究这次调整和上次调整有什么不同。我感到我们往往把这次调整的困难方面讲得多，而对有利方面讲得少，实际上这次调整比上次调整有不少有利条件。以前我们讲有些引进的建设项目难以下马，包袱丢不掉，也是当作困难来讲的。其实这里也有有利的一面，问题在于这些被我们当成包袱的项目是停下来放在那里好，还是设法把它利用起来好？放在那里，大宗的设备费已经花出去了，还要花保管费、维护费，而且搞不好还会腐蚀损坏。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设法把它利用起来。因为主要的钱已经开支了，安装起来，再要花的钱就少了，而收益却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这些项目也可以说是投资少，见效快。两相比较，动用起来比把它当成包袱放着对我们更有利。前一种做法是上策。

为什么说动用起来是上策？因为，搞别的新的基本建设项目花钱更多，时间更长，经济效益不如上这些项目。而搞这些项目，有的搞两三年就能见效，到“六五”期末、“七五”期间就能大大增加收入，获得效益。当然，不能由此否定确定二十二个项目时的错误。但错误既已铸成，如何正确处理，减少损失，并为国家生利，就要好好斟酌一下。

* 这是赵紫阳与房维中、马洪、赵维臣等的谈话。

上这些项目要考虑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原料。现在一亿吨原油使用极不合理，大部分烧掉了，要设法合理使用，用煤代油，并搞综合利用，深度加工，把油省下来搞石油化工，提高效益。二是电力。我想应该用挤小保大的办法来保证这些石油化工项目上去以后所需要的电力。即把那些耗电过多，效益很差的小钢铁、小化肥停下来，节省电力，保证大厂的需要。三是投资。前面说过，主要投资已经花了，还要花一些，可以利用一部分国内的储蓄存款，也可以借一些外资。

这件事，要从宏观经济上作些论证，看看是否可行。

二、企业要进行调整。以前我们讲调整，主要是讲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工业内部是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等等，这可以称之为工业调整。这种调整工作，现在基本上接近尾声。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种工业调整而是企业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要把耗能高的、效益差的、重复生产供过于求的、质量低劣的企业下决心关掉。这大部分是小企业，但也不是把所有小企业都关掉。效益好的小企业当然不能关。而是关掉那些耗能多、长期亏损、产品质量很差，而又属于长线的企业。关掉这些企业节省下来的能源，来保证那些耗能低、收益高的大企业、先进企业。这也可以称之为“挤小保大”。在确定调整方针时，曾说企业要关停并转。执行这个方针，有一个过程，去年是提少关停多并转。这是考虑到政治上安定的要求。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先关停后并转，多关停少并转。明年调整的重点是不是要放在这方面。这样做，可以腾出电来，腾出煤来，保证大企业的需要，保证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的需要。从目前的形势看，只要我们对关停企业的职工安排得当，政治上不会有大的风险。

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调整。这是指某些吃电、吃煤最多的产品的生产，在地区安排上，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现在有些地区电力供应很紧张，而又承担着很多耗电多的产品的生产任务，如华东、东北。有些地区则电力比较富裕，例如甘肃等地。是不是可以考虑，根据电力生产和供应状况，对某些地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任务进行一些调整。例如，可以把东北、华东地区一些耗电多的产品的生产任务调整到甘肃等地。这样既可以减轻前一类地区电力紧张状况，又可以充分利用后一类地区的电力。现在东北电力很紧张，但又是生产铁合金，又是生产电石，又是生产铝锭，

耗电很多，需要从外地运进很多煤。只是辽宁省就要运进一千多万吨，这是很不合算的。我想，与其运一千多万吨煤到辽宁去生产这些产品，还不如让甘肃或其它电力充裕的地区生产这些产品。例如炼铝，甘肃既有这类工厂，又有电力。这种调整困难并不很多，而效果却好得很多。上海地区也有与辽宁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采取同样办法处理。还有华东、东北地区有很多小化工厂，耗能很多，其中能耗低的可以保留，但那些能耗高、效益差的，可以关掉，以省出一部分煤电，保当地的大企业。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关掉小化肥厂的地方对化肥的需要，国家应该以大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予以满足。这个问题，请房维中¹同志协同经委的同志搞一个文件，在十一月初交稿。

三、整顿企业。这一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年，有一定的成绩。最近经委又提出关于整顿企业的六条原则性标准。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具体化，真正落实，不能流于口号，要见诸具体的行动。特别是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做出显著的成绩。整顿的内容很多，如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组织、劳动纪律、财经纪律、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等。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有实在的内容，要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例如，现在企业普遍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整顿劳动组织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整顿劳动组织，就要有合理的定员定额。广东江门有个食品厂，规定职工都要经过认真的考试，及格的列为编内人员，不及格的列为编外人员。对编外的要进行正规的训练。训练后，经过考试合格的再进入编内，不合格的和本厂不需要的，则转入服务行业。转入服务行业，也要经过有关专业的训练。如果不服从分配，就要扣工资以至停发工资。关停并转的企业，也要对职工进行各种业务训练，有的通过训练转入服务行业。职工不遵守劳动纪律屡教不改的要处分，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要警告、记过甚至留厂察看、开除厂籍；党员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还要受党纪处分。

又如，现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也很严重。整顿财经纪律也是整顿企业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规定一个制度，财务人员造假账的要受法律处分。如果厂长或党委书记指使财务人员造假账，要加重处罚。今年十一月要从各部抽出一些精干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训练，然后下去对工厂进行抽查，对于弄虚作假严重破坏财经纪律的，要大张旗鼓地处分一批人。

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要整顿，并围绕上面这些整顿工作来做。做好这些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总之，在整顿企业方面要提出具体要求，订出具体标准，要想出些具体办法。请马洪同志组织计委、经委和有关的同志，在十一月份搞个文件出来。

四、要研究政府机构主要是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问题。现在国务院有很多部，又有很多委，往往互相牵扯，要考虑如何改革现有机构，解决扯皮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希望社会科学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五、企业技术改造究竟叫固定资产更新好，还是叫什么别的好，可以研究。技术改造目前要以节能为主。

注 释

1. 房维中(1928-)，辽宁海城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国家计委研究室负责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

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

一、收购农产品定基数我同意，可以办。但是现在基数低的不能提高，基数高的要降下来。这样两头来，国家吃不消，要说服农民。我在山东说，胶东生产那么好，不全是农民自己的力量，也有国家的扶植。鲁西北过去那么穷，刚刚翻身，你不要攀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行了。在确实具备条件时才有可能解决。要从全局着眼，我们努力的基点是发展生产。

定了基数，对基数外的产品，紧缺时价格允许向上浮动；多余卖不出的，如猪、菜籽油，价格是否也可往下浮动。两者同一原则。基数外价格浮动，就可以给农民一个信息。要全面研究这个问题，有些农产品卖不掉，是前几年物资缺时提价过高造成的。

商业不要着重从价格上打主意，要多从流通上想办法，这是很重要的。

有些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糖，基数外的不能自由处理，还要卖给国家，但给予加价奖励；有些可以自由处理。今年高产区降基数主要是粮食，其它一步步地搞。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从根本上说，农产品价格还是低的，但不能很快调整。在农产品价格上，要统一思想。这几年农业增长，农业振兴，靠三条：一是政策放宽；二是收购价格提高；三是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当然，政策是主要的。进口粮食这一项每年要补贴三十多亿元，提价要一百二十亿元。调价我们不后悔，但年年动是不行的。那样下去国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农委党组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民经济要崩溃，工业生产没有发展，积累没有增加，你没有东西向农民交换，东西又得涨价。光靠增加消费品生产也不行。当前影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不是价格问题。当然，将来到一定时候，提价也有必要。

今天农民富裕主要是靠发展生产，而不是靠提高价格。现在要适当稳住，过几年经济好转后再提。十年、二十年提高一倍（依林同志：恐怕要更长些），还是有剪刀差。几年内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大文章，也不要用法那法来冒。耀邦同志谈的思想非常对。目前每年补贴二百亿元，价格再提高，实在吃不消。现在收购、进口都是要补贴的。方向是要减少统购、派购，但也不能像广东那样大量变成议价。这样怎么办？二类商品还是要派购，像柑桔，北京这样的城市一点不吃不行嘛？总得派点，供给城市和外宾。可以有个基数，基数外的加点价。有些农村很多东西都变成议价。现在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够统一，主要是中央没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

我们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开通渠道。有些东西不是多了，而是渠道不通。各省和中央部门的同志要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

县以下供销社要使其独立经营，可以自己到各地去找销路。

把基数定下来好。这次开会来的人中农业方面的，同财贸方面意见不尽一致，可把文件带回省里去议一下。

基数定了后，超基数部分有的自己处理，有的享受加价，照顾一下农民，搞基数是好办法。

二、供销社改集体可以今年拿几十个县试点。可能有些问题事先想不到，一试点，矛盾就会暴露出来，光争论解决不了。试一年，看有什么问题，总结一下，好的话明年就推开，搞得不好，试点再延长一点。

三、农民负担问题。有些问题，如民办教师都由国家发工资，将来也不一定采取这种办法，这涉及国家教育方针和国家财政状况。经济落后的地方，问题出在不分情况平均摊派。有些事情，国家可以出多少钱，农民再看自己的财力办。

四、要给同志们说一下，不要带个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回去，本来大家希望这次会议有个大突破，今天听了，好像有点失望。75号文件、13号文件刚刚实行，还将继续起很大作用，还有很大潜力。现在不是另外找一

个更大的窍门，主要问题还是继续贯彻 13 号和 75 号文件。耀邦同志讲方兴未艾，贯彻的是少数地方，不到一年发个文件，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是必要的，但带有根本性大突破的文件是不可能的。

责任制各地总的情况是好的。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楚，不要急急忙忙说得过死。除了继续完善，总结经验，还要继续注意群众在责任制中创造的新事物和带启发性的问题。

除了责任制，有两件事农业上要很好注意：

第一，真正从科学的角度上研究要做些什么事。科学技术问题提到日程上还很不够，多年不注意这个问题。山东出个鲁棉一号就起了很大变化。这个领域要很好来抓，当然不是去提大而空洞的计划。要从这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第二，在农业措施方面，如果能从取得更大经济效益的角度，从投入产出上考虑，还有很大潜力。这么多年干了不少事，但过去农民积极性不高，显示不出作用；现在农民积极性高了，就显出作用了。就肥料而言，如四川把温江的氮肥拿出一部分给产量不高的地方，就能比用在温江增加更多产量。给温江换用一点磷肥、钾肥，也能更多增产。水利也是如此，已有的水利如能解决好配套管理，就可增大效益，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潜力，现在水的浪费很大。要从经济效益、科学技术投入产出来研究生产规划经营上的合理性，当然国家还要投点资。恰恰多年来搞农业的同志对这方面很不重视，包括我在内，把这些抓好就可达到耀邦同志方兴未艾的论断。

顺便提一下土地问题。珍惜土地，节省每一寸土地要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去潘家口水库，沿途看到唐山农村城镇到处建新房，围大院，不知占去多少土地！农民盖房当然是好事。对此要有个立法，除了正在搞的土地法，先把占地问题搞个东西出来，首先是不能放任占用土地。而有些工业必要的建筑用地往往要价很高，久拖不能解决。毫无节制地占地，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日

报告要写得鼓舞人心，同时要使人感到踏实，能解决人们许多疑问和困难，从中找到信心。

讲今年的成绩时，背景要讲清楚。这次是又一次大的调整，同一九六二年那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么大的调整，如果没有轻工业的增长，不会有现在的局面。重工业非调不可。开始时，有的同志感到基本建设投资由五百亿元压缩到三百亿元，搞不好，可能要出乱子。现在看，这次调整进行得相当顺利，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好。当然，对调整所采取的措施，开始时不可能全面，是逐步认识、逐步发展的。要把这些都写出来，除了讲好的，也要把当时的背景、形势、怎么走过来的，作些叙述和分析。这次是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大调整，不调整，潜在的危险消除不了。调整了，至多速度跌到百分之三。今后是回升，今年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明年肯定比今年好。

对去年十二月工作会议必须充分肯定，不能搞一段又怀疑起来。最近讲重工业的气氛太浓了。

不要再笼统提轻、重工业的概念。要从消费品生产及为发展消费品生产服务来着眼分析工业。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不是短期的事

* 这是赵紫阳两次召集起草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人员座谈时讲话的要点。

情，不然不能回笼货币，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满足人民需要。在现阶段，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调理妥当，发展消费品生产是重要方面。贵州的同志提出，抓消费品生产把两头带起来了，一头是农业，一头是原材料工业，这有一定的道理。苏联现在已明确提出生活资料的增长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增长。苏联、东欧国家多年来商品匮乏，我们也一样，不抓消费品生产，经济活不了。要讲我们面临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突出消费品生产，讲清它同经济全局的关系，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不要把轻、重工业对立起来，要展开讲，回答一些问题，讲清利弊得失、经济内在的联系。讲清了，使人感到有新意。

今年的成绩，离开调整说不清楚。今年形势好的第一个标志，不能讲农业。讲农业，也不能只讲农民的积极性，要看到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和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作用。第一个标志，要讲财政赤字下来了，做到收支基本平衡，物价稳住了。要讲保持了经济基本稳定，还有一定的速度。我们这次调整，代价无非是降低了百分之二三的速度。当然，现在财政收支的平衡、经济的稳定还不巩固，还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方针。

要利用起草报告的机会，搞清一些问题。可以不讲“六五”计划的具体内容，但要设想划分发展阶段。我看大体上七年左右是一段。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永远就是现在这个数字，以后有可能高，但七八年内不可能出现。为什么速度低下来了？因为多年比例严重失调，急需调整。要从国情出发，分析现状，找到正确的方法。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本事比较大的一个，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几年的时间，调理好了，能够出现一段高速度。从长远来讲，中国会有一个经济振兴的时期。应当看到这个趋势，要有这个雄心壮志。过去发生急性病，不对，但也要反对悲观论。这几年理顺了，后劲就大了。从战略上讲，本世纪后一段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出现发展速度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时期。但是，关键是要在这几年内打好基础。五至七年这一段的重要意义，不在于速度要高多少，而是要贯彻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基础工作做好，积蓄力量。这样就会先慢后快，有后劲。

我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是好的。我国现在整个经济的基数并不高，劳动力也不困难，资源还远远没有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很

好发挥出来，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两个倍增、小康水平的口号不要丢，但不要“起飞”这个词。对中国经济的展望，要给人们以希望，要从发展趋势上作判断，把最近几年要做的事同远景联系起来。我们一方面要把当前的工作如何做得更扎实，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中国今后究竟如何发展。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要政治稳定、方针正确，经济发展的速度都在百分之七八以上。我们马上达到这个速度不行，跑不起来，但经过一段调整、改革时间，到八十年代后期，会出现一个新的速度，中国的振兴一定会到来。

要把“六五”期间搞些什么事情提出来。除了搞好调整，把其它基础工作搞好外，要着手通盘规划、具体部署并开始进行体制改革。我们在改革上打了几个前哨战，活是活了，但流弊很多。一个价格体系，一个劳动工资制度，这是宏观上的两个大问题。搞一段时间，经济稳定后，总得来一次大的改革。

企业要分别几种情况，不能一律对待。我的想法是把企业、产品分成四类，关系国家命脉的关键企业，以及关键产品，搞指令性计划；一些不需要纳入计划或无法纳入计划的产品和企业，搞市场调节；中间的两类企业，有的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的以市场调节为主，加以计划指导。我们五十年代就是这样搞的。这是改革的大部署。

整顿企业的一条，要把改组和调整的内容加进去。企业调整，具体说就是关停并转。要摆脱被动局面，一是整顿，一是调整、改组。一九六二年关停并转的是“小土群”，现在关停并转的是长线和高消耗那部分。还要解决大厂吃不饱、小厂盲目发展的问题，但阻力很大。要把整顿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揭露各个领域的严重浪费。不把企业整顿好，真正讲究经济效益，调整工作也不能进行。

要对国情作出分析，对经济现实作出分析，引出前途光明的结论。从基本条件讲，没有理由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本世纪内实现“两个倍增”计划，要有一段扎扎实实的工作，理出头绪，才能由过去比例严重失调转变为新的振兴。要从战略角度讲清楚五至七年内由比例严重失调到新的振兴的转折，这是争取经济根本好转的时期。这一段最根本的是贯彻八字方针。从调整来说，砍基本建设投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不能再砍了，但调整的内容还有很多，要把各方面的事情理顺。要充

分地讲清这一段工作的意义，由不良循环转向良性循环。结构不合理，速度就有虚假。搞好了这一段工作，中国的经济就过了关。

战略上要乐观，战术上要重视。讲国情，一方面要分析有很大的潜力，一方面当前又存在巨大困难，要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才能达到光明。这两面都要看到，只看到一面就不能有正确的决策。要认真对待，采取正确的方法，促使转化，不能急于求成。同时，又不能消极悲观，一定要振奋精神，努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现在实行开放政策，有个资产阶级“香风臭气”的问题，一定要警惕，要教育干部有抵制的能力，经得起考验，进行这场斗争，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开放。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确有必要，但我们并不是因为有糖衣炮弹就不进城了。

在合作与发展的国际（坎昆）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主席先生：

我很高兴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对于东道国墨西哥政府所作的周到安排，我表示衷心感谢。

当今世界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维护和平，一个是促进发展。这两个问题紧密相联，不可分割。我们这次会议，在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如能取得积极成果，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也将是有益的贡献。

战后国际形势中的一个根本变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却与此远远不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发展正在继续受到外部条件的重重阻挠。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经济困难。三十多个最不发达国家，至今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大多数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国际收支逆差日益增加。许多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和债务负担的加重，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慢。就是石油输出国，也由于在国际市场中技术、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垄断控制，难于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而且它们以有限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换得的国际货币盈余，还由于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而无法保值。总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有共同的处境。他们过去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掠夺，现在都在继续遭受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束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

为发展中国家的强烈的共同要求。他们的要求，是符合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正义的，完全合理的。

发达国家当前也确实处于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困境。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有其本身的深刻的社会原因。过去发达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独立，广大人民日益觉醒的情况下，这种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于继续维持下去了。如果发达国家继续坚持以不公正、不平等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的紧张势难避免。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得到顺利的增长，发达国家势必遇到日益缩小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因此，发达国家强调自己的经济困难作为拒绝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理由，是不明智的。发达国家许多有远见的人士，即使从他们本国的利益出发，也认识到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的这种符合时代潮流的见解，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提出了在南北关系中“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主张。

无庸讳言，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不断改革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否则，合作将难以维持，对抗将难以避免。因此，无论是国际经济援助、私人投资、技术转让、贸易、金融，都应当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必须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他们的内政，不得操纵他们的经济命脉。必须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而不应该加深他们的依附；他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无权状态必须改变。当然，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要根据本身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但是，现在正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严重地妨碍着发展中国家为此而作的努力。只有改变这种国际经济旧秩序，才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从而使南北关系得到改善，使世界经济有所复兴。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采取全面和整体的解决办法，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扎扎实实的努力。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确有一些紧迫问题，需要优先予以解决。这种解决，应该是实现全面、整体解决的步骤，应该符合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应该有利于推动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进程，而不应该成为脱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的有限措施。

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了及早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多年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认为可以按照以下原则，促进为发展而进行的国际合作：

第一，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切努力。

第二，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

第五，积极推动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南北谈判，以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

主席先生，为了改善南北经济关系，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发动联合国主持下的全球谈判，并使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也正是这次会议邀请信所明确提出的一个主要目标。现在许多国家提出，第三十四届联大决议规定的全球谈判应该在今年年底以前或至迟在明年年初实际开始。中国坚决支持这一主张。

我向在座的各国领导人呼吁，让我们共同表示早日召开全球谈判的意愿，共同表示我们将竭尽全力使全球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十分严峻。南北关系能否改善，同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密切相关。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问题。世界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会议寄予巨大期望。我们不应该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们的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愿意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怀念陈郁¹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日

陈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每当我回想起与陈老相处的十多年，眼前总浮现着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工人运动前驱的高大形象。

陈老对党非常忠诚，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党。在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他英勇战斗达半个世纪，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陈老无私无畏，品德高尚，襟怀坦白。他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他坚持原则，是非爱憎异常分明。

陈老对工作，对同志，对群众，都怀着满腔热情。他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密切联系群众，作风平易近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很感人的。

我在五十年代与陈老相识，当时他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但是，仍然朝气蓬勃，焕发着革命青春。陈老在困难面前总是保持革命乐观主义。后来我知道，他在三十年代，即使处于逆境之中，也对革命充满信心。

陈老还有一种十分可贵的品质，就是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他对那些落后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东西大胆改革；而对新事物则满腔热情，积极支持。

陈老这些突出优点，体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优秀品质，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当前的“四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我们要学习陈老的高尚品质，为创造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

陈郁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

1. 陈郁(1901-1974), 广东宝安(今深圳)人。1925年入党,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辽西省委副书记,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 中央燃料工业部部长,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

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要围绕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来进行，技术改造要有重点，更新设备也要有重点，不能提全面更新设备。

看来向坂²、小林实³的意见有些道理。解决城市拥挤的办法，一个是生产专业化，分出部分产品让别的厂生产；一个是立体化，楼上楼下，尽量少占面积。上海市产品要向外挤，扩大出口，和内地搞联合。但市内老工业区要坚定地向立体发展，不能再走“生产挤辅助，辅助挤仓库，仓库挤马路”的老路。要体积小、占地少、压缩生产占地。老市区要有一个规划，有多少面积，发展多少工厂，如何建住房和仓库，仓库也要社会化，不要各企业都建。

有个好消息，北京市住房价格只降低百分之四十，就有人买了。买房的有教授，有干部，也有工人。我原想能收回三分之一的建房投资，也可以。住房要商品化，个人和小企业都可以买。旧城市改造要找出一条路子，天津、上海、沈阳、广州都有这个问题。要向上发展，要分一部分出去，要专业化。企业技术改造一定要和城市改造结合起来。

技术改造，引进外国技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盲目追求自动控制化程度高。资金不够要利用外资，借自由外汇，买国内设备是否可以，要算一笔账。这可作为一个问题研究。把外汇换成人民币，把人民币换成外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李人俊¹关于上海技术改造汇报时的讲话。

汇，按 2.8 元兑换一美元计算，中国银行要起沟通媒介作用。这样一搞就活了。中国银行要有在一年里控制兑换的限度。上海市利用外资太少了，才三千多万美元，天津用了一亿美元，北京用了多少？上海牙膏厂改造得很好，工厂占地少，品种多。

顺便说一句，要支持荣毅仁⁴的工作，要把他们的工作搞活。他们现在离不开我们的体制，要像天津王光英一样，另开一个渠道。我们现在的体制有很多赚钱的事不能办。他们可以向国外借钱，买东西，换成人民币。有几个企业比较活动一些，可以拾遗补缺，补漏洞，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但不能都这样搞。

原来说生产速度上不去，但一抓就上去了。十月份生产形势很好，什么原因，要总结经验。要利用外资搞技术改造，搞良性循环不能离开增产来搞。国外搞城市改造进行得很快，钱从哪里来的？我这次到广东，从边境上看到香港比前几年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建了很多大楼，我们的老城市改造多少年搞不成。在国外用推土机把老城市一推，看起来是个大浪费，但实际上把建筑业带动起来，把建筑材料工业也带起来了，这样可以养活很多人。外国把建筑业作为一个支柱是有道理的。老城市改造方式值得研究。

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是一个重大问题，新产品试制、产品升级换代费用，可由人民银行给贷款，从新产品收益中来偿还，若归还不了从企业承包自有资金来偿还。贷款是个办法，也可以再开一个小口子，摊入成本，但同时也要强化财政监督。科学与生产结合是很大的问题。

非机械部门愿意自己制造设备，也是过去造成的。过去一机部主要服务对象是基本建设项目，主要是通用设备，不供应专用设备，不负责供应配件。所以，非机械部门都自己搞机械修理厂。纺织机械过去是搞得好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但现在不能提倡。机械工业与冶金工业密切，机械与冶金要扭在一起，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有个钢材质量问题。冶金要为机械服务，机械要为冶金技术改造服务。可以先选这么几个试点，计划部门要组织协调。经委要抓这项工作。

增税比调价好，税可以上交国家。利润过高的产品，一是应提高原材料价，但可能影响面大；一是提高制成品税收。价格改革不能拖得太久，

完全用税收调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价格问题，还有劳动工资问题，这是两个前提条件。这是从生产环节上来讲。

上海的技术改造有自己的特点，上海是老工业基地，很拥挤，技术改造一定要少占地。我向上海的同志说，一是向外挤，多出口，一是与内地联合。老城市改造要走出一条路子。解决厂房拥挤，一是向上发展，搞高层建筑；一是向外发展，与外地搞协作，专业化协作。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听听你们的意见，一是和你们讲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大城市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危害大的还是不负经济责任的部门所有制。要扩大城市的权力，就是搞中心城市，首先是沿海几个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搞规划，比如上海市计委、经委来搞技术改造规划报经国家计委、经委审查批准。

技术改造要与工业改组结合，以地方为主。几个大城市的技术改造要列入国家计划。不是一般号召，至少要先搞上海、天津、北京、沈阳等几个大城市的规划，以大城市为主，结合工业改组。讨论时各部参加，列入计划，由市负责执行。列入计划就带有法律性。抓中心城市既是解决部门所有制、又是解决地区所有制的突破口，从中心城市突破可以打破条条块块问题。中心城市改造计划经批准列入“六五”规划，讨论请各部参加，定了以后，由地方执行。就照此办。搞联合比较复杂，搞协作比较简单。大城市一搞协作，带有地区性，全国性，要逐步积累经验。

还有大工业基地的改造。南京石化公司最近提出把现有上缴的两千七百万元减少七百万元，用来进行技术改造，几年后上交可达到一亿元。

不能讲全面技术改造，全面设备更新。要有重点，特别是设备更新要有重点。设备更新，提高折旧率要进行分析，比如房屋的折旧率可以低一些。生产中的关键设备、最活跃的设备要提高折旧率，总的折旧率要稍为提高一下，特别是机械行业，一时不能提高也要把核心部分设备提高。随着财政情况的好转，整个折旧率提高一些，现在是不得已的办法。法国在二战后抓了设备改造更新，现在比英国发展得快了。我们现在有些办法不是从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来着想。

这个五年计划第一抓消费品生产，第二抓技术改造，第三抓能源、交通，第四抓体制改革，包括机构改革。

技术改造是个战略问题。大城市技术改造要弄个新章法，今后把某些大城市的技术改造列入国家计划。这个月薄一波⁵同志回来后要讨论一次技术改造问题。你们可以根据今天的精神搞个文件，技术改造与工业改组相结合，技术改造与老城市改造相结合，技术改造要与利用外资相结合。

注 释

1. 李人俊(1914-1999)，浙江温州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华东财经委秘书长，燃料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建筑工业部部长，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董事长。

2. 向坂正男(Sakisaka Masao, 1915-1987)，日本经济学家。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局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首席代表。

3. 小林实(Kobayashi Minoru, 1932-1993)，日本银行家。曾任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调查部长，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日方代表，访华七十多次。1996年其亲属遵照遗愿捐赠7000万日元在清华大学设立“小林实中国经济研究基金”。

4.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

5. 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机械委主任。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财政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中顾委副主任。

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 实现讲求效益的增长*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这次计划会议开得是好的。大家学习了中央常委同志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五年计划主要方针的讲话，进一步了解了经济全局和中央的指导思想。在讨论明年计划草案时，改变了过去争投资、争项目的现象，对解决财政、煤炭等困难问题作了比较恰当的安排。

我想说几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一、明年和今后几年，要继续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 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

今年经济形势总的看，比预料的要好，越来越好。取得这样好的形势，从根本上来说，是来自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和一系列稳定经济的重大措施。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有明确的认识。在这一年中间，我们在某些事情、某些措施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那是局部性的。

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逐步走向稳定。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在矛盾非常突出时，大家都很警惕，一到矛盾稍有缓和，就容易大意。应该看到，现在不稳定的因素虽然缓和，但并没有根本消除。所以一定要巩固调整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减少、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消除这些不稳定的因素，绝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加重不稳定因素的措施。否则，刚刚缓和下来的矛盾，可能重新激化起来，那样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对于这个问题，在明年和今后几年，都要掌握住，形势好的时候更要注意。

第一，财政赤字问题。原计划明年赤字四十亿元，现在计划调整后，有的省财政收入任务减了一点，中央背了一点。明年计划安排的财政赤字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果。中央多背一点，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超负荷，并能够前进和超收。明年财政上不仅五、六十亿元的赤字不能出，而且四十亿元的赤字也不该出。今年赤字预计不超过三十亿元，明年如果超过四十亿元，群众马上会有明显反应。赤字增加是经济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在国内会使一些人丧失信心，对国外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年初在人大常委会上讲，今年财政要实现基本平衡，我们做到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前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去年一百二十亿元，今年不超过三十亿元。就这一条，对于增强人民的信心有很大的作用。现在人民最怕的是再折腾，出乱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经济发展慢一点，但稳一点，不出乱子，人民就高兴。不能今年基本平衡，明年又冒出很大赤字。所以，尽管计划上列了几十亿元赤字，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增收节支，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第二，基本建设。现在经济形势好一点，明年基本建设无论如何不能重新冒上来，又出问题。基本建设中，财政拨款部分容易控制，但要防止信贷和筹款部分失去控制。我赞成通过银行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这是今后集资的一个方向，是大有可为的。但明年究竟能够搞到多少，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出乱子。不要财政拨款收缩了，而信贷又膨胀。不能今年刚好一点，明年又冒一下子，后年再调整，忽上忽下不得了。宁可明年有意识地少搞一些，看准了力量确实没有用完时，后年再上。迟一年问题不大，搞冒了，再收缩，钱就白丢了。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各种资金渠道要利用，但是必须有控制，要有综合的财政计划，宁可留点余地，切不可冒了。筹款、集资不要搞很多渠道，如投资信托公司等，最好通过银行办。不然就会把银行存款变成基本建设资金，又没有一个部门统一调度，就会使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今后恐怕还是搞两个渠道，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银行，其他的可以委托银行办理。头绪太多，就可能发生

信用膨胀。还是要两点论，一方面，经济搞活后，财政上钱少了，企业和个人的钱多了；但从另一方面看，经济搞活才两年，企业和人民手中究竟有多少钱能够集中起来搞建设，恐怕不会很多。当然将来会多起来，但明年还不会多。所以对信贷必须要有控制。

第三，现在货币发行较多，仍然是潜在的危险。当前，货币发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因素。老百姓手持现金多了，流通渠道多了，必然要求增加货币流通量。因此，今年年底全国货币流通量可能达到四百亿元，比两年前增加一倍。总的还是可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认为目前票子发得不多。事实上，票子还是发得多了些，只是没有超过警戒线，不致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在军政费用减少、基本建设拨款压缩、信贷控制的情况下，货币投放的增加，主要来自奖金和农副产品的议价、加价方面。

这两年人民生活的提高，包括农副产品提价、工资奖金总额的增加和增建民用住宅等，带有还账的性质，是正确的。但工人的工资、奖金，农副产品的提价、加价、议价，今后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大幅度增加了，只能做些小的调整。归根结底，消费的增长，不能超过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然经济就不能稳定。今后工人、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生产的增长。

关于奖金的问题，明年要定个方针，就是奖金总的水平基本维持在今年水平上，不能超过。当然，不是把每个企业、每个人的奖金搞死，而是讲全国奖金总额不能再增加了，要稳定一下。这一点，要向工人进行教育，经过工作是可以说通的。这个方针早一点确定下来后，可以防止明年在奖金发放上，上半年冒、下半年压。总之，奖金总水平要稳定，要经过整顿，在分配上搞得合理一些。

农副产品不能随便降低征购、派购基数，议价要整顿。原有的征购、派购基数随便取消了的，要恢复，即使工作艰巨也得搞。必须看到，农村确定征购、派购基数后，农民多卖给国家的商品，大部分是议价、加价的，有的比原来的收购价要高一倍。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农民手中这么多的票子，国家用什么办法回笼，国家有没有那么多的工业品同农民相交换。当然，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可以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另外，以农

副产品作原料的工厂可以搞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用来解决因原料提价而带来的成本增加或企业亏损问题。农副产品如果再降低派购、征购基数，扩大议价品种，增加货币的投放，农民就会有钱买不到东西。农村里有的农民收入增加很快，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农副产品超购部分都是议价、加价，而工业品供应是平价，这样是不能持久的。长此下去，势必造成工业品被迫涨价。有人主张对一些高档的名牌紧俏产品搞优质优价，这个问题要专门研究。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让农民搞多种经营，主要是讲不能随意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议价的面也要适当控制。今后商业部门对农民有两个任务：一是帮助把农副产品收购起来，推销出去；二是对市场过多的商品，通过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加以指导，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如油菜籽，长江流域今后几年还是个大发展的趋势，如果都加价收购起来，最后可能是大批菜籽油在仓库里积压变质。有些农副产品确实供过于求，不能都要国家加价收购，那样国家就负担不了。农副产品除了向国内推销外，还要打开国际市场。对苏联、东欧这一块的贸易还是要搞。比如猪肉，就可以向苏联和东欧出口。总之，农副产品增产了是件大好事，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至少要做到不能随便提价、扩大议价和降低收购基数。

第四，利润留成、盈亏包干等经济责任制以及其他管理体制的改革，总的要求是明年要稳定一下，总结经验，加以完善，不迈大的步子。经济责任制，是在今年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的情况下实行起来的。没有经过很好的试点，实际上是一下子铺开了。它的方向是对的，效果是好的，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需要很好总结，加以完善、消化。当然，有一些改革明年还要抓紧，如外贸方面，特别是沿海城市，政策还要适当调整，把进出口搞好、搞活。

以上讲的四点，主要的意思是要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不要助长不稳定的因素。这些问题，都贯彻了一个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要集中统一的思想。我们既要看到微观经济搞活、宏观经济调整，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要看到相互矛盾的一面。现在看来，如果不创造条件在宏观经济上进行改革，只强调微观经济搞活，那么，矛盾就很大。因为目前处于调整时期，宏观上不能搞大的改革，这对微观经济搞活不能说不是个制约。微观经济

搞活不能超过调整的要求。不能脱离了宏观经济，脱离全局，只讲企业搞活。由于体制、价格和经济结构等不合理，经济杠杆作用和经济立法跟不上，就使微观经济搞活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大。不能放弃中央集中统一这个基本方面。

明年速度“保四争五”必须是没有水分的、质量好的、产品适销对路的，是真正有经济效益的。要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不要一讲速度，又去盲目追求产值，长线产品、质量差的产品大量增产。这边产量产值上来了，那边仓库里积压起来了，这实际上是浪费了原料、材料、能源、运力和资金。这种蠢事，我们绝不能再干了。今后，看一个地区的速度是快是慢，要看它那里生产的产品构成，以及产品是适销还是积压。我建议今后立个制度，凡是哪里发生积压，就要迅速组织人下去检查，如果积压的产品质量差，不适销，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就要停止收购和停止贷款。现在已经出现降低产品质量，盲目扩大长线产品生产，以致造成积压的现象。我们要求在产品质量好、适销对路的基础上求速度，这才是真速度。过去的那种形式主义不能再搞了，在这一点上要拨乱反正。明年的速度要求比今年高，产品质量和适销对路方面必须比今年做得更好。各地同志回去要很好检查一下。现在有些东西仓库里积压很多，可是还在拼命生产。有些生产长线产品的企业就是要关停并转，要搞死，不能搞活。它越活，对整个社会危害就越大。

二、要把整顿企业放到重要位置上

明年要下力量整顿企业。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当前克服严重浪费、增加国家收入、减少以至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物价的一个重要手段。怎样整顿企业？关键是要整顿、提高领导班子。现在有些领导班子，除了不够年轻化、专业化以外，就是涣散、软弱，成了落后意识的代言人，不敢抵制不良倾向。这种情况，在有些企业中相当突出。

整顿企业的具体内容，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二是整顿劳动组织。现在企业普遍人多，明年下决心搞定员定额，多余的工人去学习和培

训，有的可以去造林、修路等。工厂这么多人，要是不搞定员定额，讲什么经营管理、加强劳动纪律、健全原始记录、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那就很困难。工厂应当有考核制度，合格的工人定员定额，分班轮换，不合格的去学习。当然，合格的也要组织轮训，提高水平。总之，不要泡在企业里。否则，整顿好企业没有指望。康永和¹同志讲，首钢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就是搞别的工作。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劳动就业的文件，今后就业主要安排到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搞个体劳动，不准再往人员过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塞人。三是整顿劳动纪律。要有奖惩条例，如北京市就搞了一个奖惩条例。四是整顿财经纪律。现在有的企业财务管理相当混乱。今年冬季，中央各部门就要组织人下去，对企业执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抽查，各地最好也组织一下。整顿要抓骨干企业，要派人下去帮助和检查，把全面整顿和重点整顿结合起来，一批一批地搞。

三、调整企业结构

我们今年的调整，抓了压缩基本建设、紧缩开支，调整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这些方面明年要继续抓，同时还要抓调整企业结构。现在企业结构不合理，属于长线产品、重复建设、盲目设厂的，必须关停并转。比如机械加工工业，虽然有的方面还不够，但总的讲是厂子多了，人多了，国家没有那么多原材料，也没有那么多生产任务，就是再过几年还是如此。所以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实行改组，关停并转一批。

今年上半年讲过少关停多并转，工人工资照发，对稳定局势有好处，但不能长期这样下去。重点搞并转，结果放松了关停。有些企业不首先下决心关停，就不可能合理地进行并转。现在有的企业自己找饭吃，你挤我，我挤你。于是，什么“推销奖金”、“回扣”、贿赂等都出来了。今后企业调整必须抓关停并转，否则，企业结构不会合理。

东北、华东地区要围绕解决能源紧张问题进行企业调整。这两个地区能源将长期紧张，要有综合对策，不能只是一个办法，要采取多种办法。一是加快能源开发，加强交通运输，增加能源供应；二是大力开展节能。除此以外，还要按照地区能源平衡的原则，进行企业调整，对耗能多的企

业进行布局调整。有些炼铝、铁合金企业要向西部有动力的地方转移。另外，还必须按照能源投入产出效益进行择优，把能源首先供应给那些耗能低、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当然，这会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问题，但利益的分配毕竟是第二位的。首先要考虑怎样能多为国家创造财富，其次才是各级财政收益的分配。要择优，绝不能以劣挤优，这应当成为一个大的政策。调整企业结构，解决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长线产品的问题，在这两个地区更有紧迫性，应该做出规划。

四、基本建设经济效益问题，应该引起全党的重视

今后几年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搞基本建设，整个基本建设规模不可能有较多的扩大。当然可以利用一些外资，但不会太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基本建设投资不算少，预算内和预算外加起来，还是有相当数量的。问题是投资的浪费太大，今后能不能从各方面研究一下，在投资效益上下功夫，把投资效益真正提高。前天，吕正操²同志到我那里，他讲铁路建设投资不算少，就是效益太差。一九六五年以前，十六年投资八十八亿元，修了一万三千公里铁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〇年，投资二百五十九亿元，修了不到一万二千公里。不仅铁路如此，整个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都差，主要是建设周期长。这同计划上的大上大下，建设的前期工作差，没有搞好设计就施工，施工组织与经营管理不善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内部、外部各方面向基建伸手、揩油。现在一说要上什么项目，大家都揩油。征地，农民揩油；城市建房，关系户就不得了。现在是老章程不适用了，新章程又没有。例如，征地现在是议价的办法，有的生产队漫天要价，这怎么行？这方面要立法，至少搞些条例，制止各种混乱现象。

五、技术改造和科技问题

技术改造是今后我国走上经济振兴的一项战略措施。最近经济研究中心讨论这个问题时，薛暮桥同志讲，今后五到十年，企业的技术改造是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关键之一。从明年开始，把挖革改资金的百分之四、

五十真正用于技术改造上。要在原有的水平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搞节能等等，而不是用于扩大外延的基本建设。

赵东宛³同志关于科技问题的发言是好的。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考虑怎样把计划、科研、生产拧在一起。赵东宛同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要有推广现有科技成果的规划，并且要计算出今后的发展速度靠科技增长多少。各地都要把推广科技成果排出项目，算出效益，列入计划。第二，对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要组织攻关。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科技的服务方向，以及如何把分散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的问题。陈云同志最近跟我讲，科技战线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力量分散。他回忆五六十年代，靠攻关搞出很多成果。关键是计划与科研结合起来，工厂生产与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围绕攻关课题把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这样，才能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

注 释

1. 康永和(1915-2013)，山西交城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兼劳动局局长。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书记，劳动人事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

2. 吕正操(1905-2009)，辽宁海城人。时任铁道兵政治委员。曾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3. 赵东宛(1926-)，河南南阳人。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曾任富拉尔基第一重机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劳动人事部部长，人事部部长。

物价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这次调价总的是顺利的，但也引起了一些市场风波，在一些地方这个风波还不小。烟酒提价，多数群众是理解的。但也有些群众，主要是一些又吸烟又喝酒、又准备结婚的青年人反映比较强烈。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抢购粮食、白布、白糖、呢绒、火柴的情况。原来估计烟酒提价会挨一些骂，但没有想到反映这么多。对这些问题，我们绝不能小看。群众对物价是很敏感的，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物价波动可能会酿成政治问题。我们的工作要紧紧跟上，对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解除人们的疑虑。宣传解释工作做得粗的，要进行补课，讲清这次调价的意义。对于谣言，不能放任不管，要采取适当方式辟谣。现在谣言很多，越传越多，有的很离奇。说什么“面粉要涨价，今后不用粮票了”，“从明年开始不发布票了”，“明年全面涨价，每人要补贴几元钱”，等等。根本没有这些事，而我们一些干部却信以为真。对那些别有用心煽动性的谣言，要进行追查。首先要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听信谣言。至于那些违反物价纪律的案件，则要及时严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拖而不决。

二、烟酒提价后，要采取一些严格措施把物价稳住。现在群众就怕以烟酒开路，其它跟着涨上来。有的说“联想过去，担心未来”。就是说，联想一九七九年八类副食品调价后许多商品涨价，就心有余悸，担心今后再出现这种情况。一九七九年那次调价，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对连锁

* 这是赵紫阳在与北京市、商业部、物价总局等单位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

反应控制不够。有些企业，特别是国营企业带头，趁机捞一把，不该涨的也涨上去了，到现在群众还有意见。目前，群众的心理状态是，怕涨价风又要刮起来。这次可要汲取上次的教训，要特别谨慎，马虎不得。凡由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管理的零售价格，不经国务院批准，谁也不能提价，即使日前价格不合理也不能涨价。这要作为一条纪律定下来，零售价格无论如何要管住。至于内部价格，工商、工农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该解决的应经领导机关研究解决，但市场价格不能动。现在许多企业要求涨价，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部门，都说利润少，亏损大，至于调价以后的连锁反应，那就不考虑了。还是要强调继续贯彻去年国务院 295 号文件精神，切实把物价稳住，因为这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也是稳定经济、发展生产的需要。

三、对企业的提价要求应很好分析，不能一有亏损就要提价。现在，一些企业要求提价的理由，就是企业发生亏损。而且，这种要求常常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表面看来，似乎都有一些道理。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一些提价要求是不合理的。现在，各方面统一认识至关重要。企业亏损，有客观原因，如原材料、燃料提价等，但有许多是主观原因造成的。只要检查一下企业财务，认真分析一下商品成本，就能发现许多费用不该摊到成本里。若把这些不合理的成本剔除出去，有些企业就不一定亏损，或可以少亏损，有的商品不提价也有一定利润。现在，在改善经营管理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从这方面下功夫，好像不提价企业就活不下去了。不应有的亏损，也要国家补贴，或通过提价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种不合理的提价要求就不能答应。至于小商品，现在却有不少企业由于亏损不积极生产。你们提出由工商双方协商定价，对这一点我一直很担心。我的意见，不能在这个时候凑热闹。总而言之，有些小商品，宁可在这段时间少生产、不生产、脱销，也不能在价格上搞自行提价。要从多方面想办法解决小商品的生产供应问题，有些可以采取减税或补贴的办法。即使将来采取协商定价的办法，也要严格控制，分品种有步骤地进行，再不能一哄而起。

四、农副产品价格要整顿。这几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总的看是正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财力的可能。今后一段时间，调动农民的积

极性，不能再从价格上打主意了。要使农民富，应是增产致富，不能靠提价。提价只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并不创造社会财富。经过这一段时间，对派购逐渐认识一致，估计现在任务能够派下去了。但基数不能太低，减基数就等于变相提价，就要加重财政负担。各地自行规定的加价、补贴、利润返还等都要整顿，议价范围太宽的就要缩小。加价收购的部分，有些要控制。油菜籽、葵花子价格，万里、依林同志已经讲了，要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一下。我看这件事早定早主动，不然，国家包袱越背越重。农副产品价格的调整，不能只从农民考虑，必须首先考虑国家全民的利益，要“三兼顾”，要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现在，确实有些人不大懂得购价动了销价难于安排的道理。购价提得过高，一是城里人吃不起，用不起；二是国家补贴不起。我们财政收入一年还不到一千亿元，要开支的方面却很多，再增加多少补贴确实很难。请依林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讲整顿农副产品价格问题，把道理和危害讲清楚，以统一全党的思想。明年上半年再开一次物价会议，研究整顿措施，下达执行。

五、蔬菜价格要坚决稳住。现在，城市群众对蔬菜最为关心，意见也最大。有个别地方，集市菜价与水果价格差不多，群众怎么吃得起？如果我们对蔬菜问题再不加注意，会脱离群众。要稳住菜价，关键是大中城市、工矿区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对建筑用地和种菜用地统筹规划，制定计划，把蔬菜生产切实搞上来。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看，当前对蔬菜生产必须实行计划种植、计划收购，并要解决好近郊区农民的生产经营方向问题。郊区社队要以种菜为主，对近郊农村办工副业，必须采取限制的方针。要研究解决社队企业的征税问题。（依林：种菜和工副业的矛盾已存在二十多年了，现在越来越尖锐，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城市的蔬菜问题没法解决。）请段云¹、田纪云²同志召集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要同国有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前一段，商业部开了九个城市的蔬菜会议，搞了一个文件，国务院已经转发，对有些问题做了规定。为了引起各地领导同志对蔬菜问题的重视，请王磊³同志搞个材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议一议。

注释

1. 段云(1912-1997),山西蒲县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物价小组组长,国家计委顾问。

2. 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四川省财政局局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王磊(1914-1994),山东莱州人。时任国务院财贸组组长。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商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

各位代表：

从去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政府对于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工作，先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过六次报告。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和各位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就当前的经济形势，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向大会作以下报告，请予审议。

* 这是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是系统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and 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个重要报告是在综合赵紫阳当时十几个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形成的。报告中很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提法，都用的是赵紫阳的原话。理解这篇文献，要和阅读本书所载的其它重要文章结合起来，同赵紫阳与报告起草小组的两次重要谈话（见本书第314页）结合起来。这个报告连同其它几篇重要文章，是赵紫阳从四川省调到国务院工作后，多次深入改革和建设第一线，同各地负责人、广大基层干部、工农群众一起座谈总结形成的。他的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还广泛吸收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最后修改定稿。从指导思想到文字表述，都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总结与创造。

一、当前的经济形势

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在巩固已有的成绩、克服面临的困难中前进的，是在进一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过程中前进的。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对当时的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分析，发现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九七九年以来，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支出大大增加，尽管步子走得快了一点，但总的说是做得对的。在这同时，国家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减得很不够，行政费用还继续增加，这就使各项开支的总和超过了财政收入。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连续出现很大的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一九八一年还会有一百几十亿元的赤字，那么，几年来人民生活所得到的改善必将丧失，比例失调的状况将进一步加剧，国家经济生活将发生严重混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难以巩固和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国务院在去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召开全体会议和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讨论。随后，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召开工作会议，在对全国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估量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决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今年二月，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出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报告，对原定的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概算进行必要的修订，以便在今年争取实现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并把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这个修订方案。

今年以来，各级政府坚决执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一系列紧急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根据前十一个月的实绩，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会报告：一九八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可以胜利完成，稳定经济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今年进行这么大幅度的调整，又遇上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工农业生产总值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将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以上，整个经济形势比预想的好。我国国民经济已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经济的稳定，首先表现在实现了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从去冬以来，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加强集中统一，严格对财政金融和

物价的管理，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和各项行政费用，增收节支，开辟财源，使今年的财政收支计划得以实现。财政赤字从一九七九年的一百七十亿元、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二十七亿元，预计降低到今年的二十七亿元。在很短的时间内，财政收支从有很大赤字达到基本平衡，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对政府的高度信赖，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却比较顺利地做到了。这证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我在这里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感谢。

在取得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同时，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的上涨幅度今年比去年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但有些商品价格确有上涨，有些地方蔬菜价格上涨得比较多。我们一定要努力增加生产，改善供应，加强物价和市场管理，严格物价纪律，坚决地、认真地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

农业的全面增产，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尽管今年不少地区遭受到严重水旱灾害，全国农业形势依然很好。粮食总产量预计可以接近一九七九年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棉花继去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之后，又有新的突破。油料在连续三年大增产的基础上，又增长百分之十七左右。糖料产量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林业、畜牧业、渔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社队企业继续有所发展，社员家庭副业的发展更快。全国农村生机勃勃，广大社员喜气洋洋，农业发展方兴未艾，一切关心八亿农民命运的人们，对此都感到极大的振奋。如果不是努力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

今年我国许多地方遭到的水旱灾害，是历史上少有的。经过当地党政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们的团结战斗，全国各地的积极支持，战胜了灾害带来的种种困难，迅速恢复了生产，群众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社会秩序稳定。长江上游和黄河上游都发生特大洪峰，出现严重险情，经过沿岸广大军民的英勇奋斗，终于使洪水驯服入海。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龙羊峡水电工程和刘家峡水电站都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成昆铁路、宝成

铁路和陇海铁路宝天段遭到洪水和泥石流袭击，破坏严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修复。国内外对灾情深切关怀的人们，对此无不表示欣慰和敬佩。在这里，我谨代表国务院，向受灾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向参加抢险救灾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铁路员工，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轻工业生产，由于采取了着重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有了大幅度增长。今年轻纺工业的总产值预计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等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有的增长了百分之几十，有的成倍增长。棉纱、棉布、化学纤维、食糖、纸张、卷烟等主要产品，都可以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轻纺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增多，质量继续有所提高，高中档产品显著增加，日用百货日益丰富多采。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的市场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日用消费品生产连续几年的大幅度增长，对于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繁荣市场，活跃经济，保持整个工业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增加财政收入，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重工业生产，由于正在调整中，今年的产值预计比去年下降百分之五左右。这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批重工业企业停止了能源消耗很高、积压严重的长线产品的生产，腾出能源用来保证轻工业生产的需要，这是必要的、合理的；有相当一批重工业企业，过去长期主要为基本建设服务，今年由于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设备和其它生产资料的订货相应减少，以致生产下降，这在重工业内部调整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过程中是难免的；还有一种情况，由于有些同志对于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行动迟缓，应该早转产的转晚了，造成一些重工业产品的生产不该下降的也下降了，这种倾向正在纠正。今年下半年以来，重工业在改变服务方向、压缩长线产品、增加人民生活急需的产品和出口产品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已初步见效，重工业生产从第四季度起已经开始回升。此外，地质勘探工作取得了近年来较好的成果。铁路、水运、公路、民航和邮电部门完成计划的情况是好的，各项重要物资和旅客的运输基本上得到了保证。

基本建设要退够，是今年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投资的使用比过去合理了。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今年二月修订计划时减少为三百亿元，后来又追加了八十亿元。这八十亿元中，有三十五亿元是用于增加住宅建设投资，其余用于增加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增加石油和交通的建设，以及一部分必须恢复的国外引进项目的建设等等。今年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首先是放在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上，其次是放在能源、建材、交通运输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城市公用事业方面所占的比重，都比过去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已经施工多年的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加快了建设步伐，今年六月已经通航，第一台十七万千瓦机组已经试运转，并开始发电。辽阳、天津、四川三大化纤厂，已基本建成投产。原定今年全部投产的项目，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按计划实现。这种情况是多年以来没有过的。

科学研究工作，在密切结合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农业、工业、国防和其它方面，应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推广新技术，消化引进的先进技术，步伐都已加快，效果更加显著。一九八〇年全国涌现出重大科研成果二千六百多项，今年又继续增加，已经应用于生产的比重达到百分之五十。杂交水稻、鲁棉一号等优良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在粮棉增产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今年工业部门试制的新产品和试验的新工艺有上万种，其中半数已投入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使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卫星的成功，是我国科学技术继去年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以后的又一项新成就。

对内对外贸易都有了扩大。国内市场商品货源增加，供应情况比较好，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预计将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九。为了平衡社会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原来估计今年要动用商品库存几十亿元，结果在购、销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今年的商品库存不但没有减少，还可能增加近百亿元。城乡集体所有制商业和作为国营、集体商业补充的个体商业都发展得比较快，在增加经营网点、商品品种、服务项目、营业时间等方面弥补了国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不足，方便了人民的生活。我们同国外的经济技术交流有了新的扩展，进出口总额今年将比去年有较多的增长。合资经营、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方面，做得比过去扎实，有了显著的进步。

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随着农业的全面增产，农民收入在前两年有较大增加的基础上，今年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收入大幅度提高的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集体分配平均每人在三百元以上的大队，一九七九年有一千六百二十二个，一九八〇年增加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个，今年比去年又将有较多的增加。特别可喜的是，原来条件较差、生产落后的一些地区，如鲁西、豫东、苏北、淮北等地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有大幅度提高，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新建住宅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农村新建房屋达九亿平方米。在城镇中，今年一至九月安排了四百七十七万人就业。对中小学教师、部分医务人员和体育工作者，决定从今年十月份起提高工资级别。在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今年职工住宅建设投资仍然保持了去年的水平，全国各城镇职工住宅的竣工面积可达到八千万平方米，相应的水、电、公用交通等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去年好，交付使用的面积比去年多，城市人民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城乡人民的储蓄存款，今年一到十月增加了九十五亿元，达到四百九十四亿元，这是广大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对我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这次进一步的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这次调整难度很大，原先估计，可能会出一些乱子，结果进行得相当顺利，大乱子没有出，小乱子也极少，并且迅速得到了解决。经过调整，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经济全局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

从一九七九年，我们就开始调整农村政策，保障生产队的自主权。在近三年的时间内，我国农村广泛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是社会主义农业在我国具体情况下新的管理形式和分配形式。我们紧紧抓住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发展多种经营这两个重要环节，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决定每年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这对于调整作物布局，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对于农村的休养生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工业方面执行八字方针的情况和农业稍有不同。在工业中是以调整内部比例关系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改革。在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方面，去年底作出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决策之后，更好地落实了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挖革改、基本建设、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交通运输六个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发展的措施。今年以来，又进一步确定从重点工业城市抓起，以生产名牌优质产品的工厂为中心，组织专业协作，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进行大批量生产，并且组织有条件的重工业企业和军工企业生产人民生活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使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上升。同时，重工业为轻工业、农业服务的部分扩大了，这就促使工业内部的结构开始趋于合理。与此同时，三年来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些初步的改革，使企业增加了活力，对于克服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现象，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国家由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共计减少财政收入五百二十亿元，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三年城镇共安排两千多万人就业，加上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国家增加财政开支和减少财政收入共四百零五亿元，相应地增加了职工的收入。这两部分共计减收增支九百二十五亿元，比原来设想的六百亿元多出百分之五十四。此外，国家用于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农机、化肥、民用煤，以及外贸进口的粮食、棉花、糖等的价格补贴共二百三十四亿元。正是因为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解决一些多年遗留下来的困难，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使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上升到今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积累所占的比重，相应地由百分之三十六点五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应该说，过去那种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一年来的经济调整，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的潜在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主要是在紧缩支出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不巩固的。要继续保持财政和信贷的基本平衡，做到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相适应，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还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和作出艰苦的努力。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全局性的、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自觉性和严肃性，就仍然有可能重犯过去多次犯过的错误。

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曾经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做好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于这一方针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就调整来说，既要调整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又要对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等进行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而经济调整的内容比原来设想的要广泛得多。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更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国务院认为，有必要从今年起再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

各位代表：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确是好的。今年的经济情况是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好。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总产值第一季度下降百分之零点二，第二季度增长百分之一一点七，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六。明年和今后的经济发展，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一年来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经济战线上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作了艰苦的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政法、外交等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体育战线今年以来捷报频传，最近女子排球队又第一次夺得了世界冠军，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国各族人民是一个鼓舞。我谨代表国务院，向上述各条战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人民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积极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守卫在边防的部队和民兵，保卫扣林山、法卡

山的英雄们，时刻警惕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挑衅和入侵，保卫着我国的神圣边疆。全国公安干警、司法人员在维护社会安全、打击犯罪分子、改造教育失足者的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就。我谨代表国务院，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

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调整，不仅要努力解决大量财政赤字的问题，控制市场物价的上涨，消除潜在着的危险，迅速达到经济全局的稳定，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为此目的，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曲折，但是总的来说，成绩是巨大的。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八点一倍，国民收入增长四点二倍，工业固定资产增长二十六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一倍。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同时，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我国三十二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比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低得多，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又大大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

我国经济建设效益不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经济文化解放前十分落后，解放后又长期受到国外敌对势力的威胁甚至侵略，因而需要集中财力物力，迅速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增强国防力量。我国长期处于被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封锁的状态，因而在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人口既多，增长又快，生产发展所增加的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要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很不利于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这类客观原因以外，在经济建设

的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左”的错误，很多方面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再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不能不严重地妨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妨碍经济建设的发展，妨碍经济效益的提高。过去“左”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直到现在，不少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不仅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且低于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当前，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工业布局和经济布局都不很合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存在着许多弊病，这些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最大障碍。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

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十条方针。这些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的经验积累，特别是近三年来的经验积累。

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是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增长的关键。今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虽将逐步增加，但不可能很多。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村建设，仍然主要靠政策，靠科学。

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早已建立并且巩固起来。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一方面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要求摆脱过去管理体制上的集中过多、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各种不合理负担。近三年来，我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农村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多年来创造的物质技术条件得到更好的利用，农业生产得到又一次解放。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总结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努力改进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各项经济政策。

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合理利用现有的耕地，同时一定要把大片的山

地和丘陵，广阔的草原，大小江河和星罗棋布的湖泊塘堰，以及海涂海域，都逐步地、合理地、充分地利用起来。过去发展农业，常常把视野局限于现有的耕地和粮食种植业，以致路子越走越窄。今后要强调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动员三亿多农村劳动力，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我们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在保证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前提下，使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各项经济作物和其它农副产品得到普遍增长。要巩固和发展商品粮生产基地，继续办好国营农场和农垦事业，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积极发展中要注意合理布局。城市郊区的农民要以种菜为主，蔬菜的种植面积要切实保证。要大力保护和合理使用现有草原，积极加强草原建设，努力提高载畜量，同时在广大农村发展家畜、家禽等各种养殖业，使我国畜牧业有个大的发展。总之，在祖国的大地上，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处处充满无限生机，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生聚有方，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就能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个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应该是我们的国策。要积极开展农业自然资源的调查，分别制订全国的和省、县的农业区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社、队的土地利用规划，努力实行科学种田。现有耕地中，如黄、淮、海地区的盐碱地，南方的红壤土等，都应该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群众的努力，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二十多年来积累的科研成果，逐步进行综合治理。基本建设即使非占用耕地不可，用地也要严加限制；农村建房要有规划，绝不能乱占滥用耕地。

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情况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对这一点重视得很不够。今后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宣传，使广大群众和干部了解开发、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节约用水的重要性。我国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利用得也不充分、不合理。现在有些地方水源十分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必须同整个国土的整治结合起来，对全国

的水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勘察，作出合理利用的规划，逐步做到统一管理，大力提倡节约用水，防止水质污染。现有的水利工程必须管好用好，充分发挥效益。

我国森林面积小，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的状况越来越差。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加以有效的解决，就将犯下影响子孙后代的历史性错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现在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严禁滥伐，防止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发动全国人民植树造林。当前植树造林的重点，应该放在广大平原和丘陵地区。燃料紧张的农村，首先着力营造薪炭林。在农村和城市郊区，在沿海和边疆，凡是有条件营造成片林木和果树的地方，都要以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为单位，组织专业造林队，坚持长年造林。国家林业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保护和扩展现有林业基地，认真抓好林地更新，发展综合利用，同时在黄河、长江和其它江河的上游大力造林种草，搞好水土保持。国务院已经拟定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提请大会审定后公布执行。

在发展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整个农业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和安排整个农村的建设。农村的交通运输、小水电、沼气、建材、建筑、农副产品加工，村镇的公共建设，农村的商业服务业、银行信贷、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等等，都可以而且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发展。我国农村拥有大量劳动力，根本不用愁有事无人做。问题在于，一是人们乐意去做，有积极性，这就要有正确的政策；二是做得好，收益大，这就采取适用的科学技术。各门各类、各行各业、每件事情，都要制定适合各自情况的具体政策，采用合乎需要的科学技术和方法。要把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合理地使用几亿农民的劳动投资，进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经济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富裕繁荣。

我国农业要走出一条投资较少、经济效益较高的路子，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放在重要的位置，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向自然界索取我们所需要的更多农产品。建国以来，在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良种的培育和推广，得到的经济效益往往是全部研究经

费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更多，充分显示了科学研究这种智力投资的巨大威力。现在，我们希望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制度、搞好作物布局、改变化肥结构、实行合理施肥、生产高效低残毒农药、有选择地推广适用的农业机械等方面，有关部门能进一步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作出更加显著的成绩。

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政策和科学还是要靠农村干部和农村科技人员来推行的。随着各种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干部、科技人员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干群关系一般说来是更加亲密了。对于那些光荣地艰苦奋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农村干部和科技人员，全国人民是尊敬和感谢他们的。我们要从政治上、业务上、生活上对他们切实地加以关心，并采取具体措施，鼓励他们安心地积极地做好工作。

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农业向轻工业提供的原料愈来愈多，城乡人民的货币收入年年增加，这对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消费品工业的更快发展，就会通过交换，进一步促进农业、重工业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更好地适应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同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市场物价，安排更多的人就业，从而有助于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巩固。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还将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着重发展消费品工业放到重要地位。为此，能源和物资的供应，贷款和投资的分配，科学技术力量的分配和科研课题的选定，以及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引进，都应该注意保证消费品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发展具有广阔的领域和很大的潜力。目前，城乡人民迫切需要的是耐用消费品、纺织品、食品（包括饮料）、民用建筑材料、日用化工产品、文化保健用品、旅游和其它服务业所需产品等等。对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规划。要充分利用我国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的条件，多发展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要兼顾农村和城市，内销和出口，以及各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组织供产销的平衡，加强计划性，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克服盲目性。在增产社会需要的高中档商品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人民群众需要的利润不高的大路货、

小商品的生产。要强调提高质量，做到花色新颖、品种多样、质优价廉、适销对路。决不能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进一步发展消费品工业有很多优势和潜力，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并且要努力同其它城市和地区协作，从经营管理经验和技術方面，把其它城市和地区的消费品生产带动起来。各地要保证完成各种消费品工业原料的收购和外调任务。原料的分配，要首先保证老工业基地的需要。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加快发展消费品工业生产，不仅不会妨碍而且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增长，对重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越是协调，交换和周转越快，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加迅速。保持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的长远方针。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一些重工业过多地为新建项目服务的偏向。今后，重工业的发展，除了适当生产一些耐用消费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调整服务方向，扩大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提高适应能力，更好地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服务，为出口服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重工业的出路所在。重工业部门调整服务方向和内部结构的工作做得越好，抓得越紧，就越主动。

重工业的发展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鉴于重工业生产一般周期较长，准备若干年后建设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要的设备，现在就要着手设计、生产。发展重工业要十分重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如对能源和矿产的勘察及开发设计，对重要新产品的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工艺设计，以及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等，都必须及时做好。以上这些工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不可少的，重工业部门的广大职工要为此作出努力。

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解决能源问题的方针，是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我国目前能源的产量仅次于美国、苏联、沙特阿拉伯，但是单位能源所创

造的国民收入却比许多国家低得多，比我国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也低得多，能源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说明节约的潜力很大。这几年节约和少用的能源，主要是通过调整轻重工业结构得来的。通过改进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来节约能源，进展还很小。必须在这些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规定各类产品的能源消耗定额，关掉一批严重浪费能源、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工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落后的耗能高的设备和生产工艺进行技术改造，以保证节油、节煤、节电等各项节约任务的完成。首先争取单位能源所创造的国民收入超过我国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然后逐步接近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

世界上年产石油一亿吨以上的国家不到十个，我国是其中的一个。一亿多吨石油是我国一笔很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这笔财富，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的作用。现在全国作为燃料烧掉的石油有四千万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应该烧的，这是很大的浪费。国务院已经决定，在今后十年内采取必要措施，逐步用烧煤来代替烧油，把替出的石油用于国内加工或出口，由此而增加的收入，再用于能源和交通的建设。目前我国原油的加工深度很低，许多可以作为化工原料的成份没有裂解分离出来，没有合理利用。一亿吨石油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业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很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要大力改组、改造现有的炼油、石油化工企业，提高原油加工的深度，发展石油化工综合利用。这不但可以增加出口，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化纤、塑料、橡胶等化工合成产品的发展，增加市场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总之，用好一亿吨石油，是一件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大事，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务必完成。

能源的开发和生产，要兼顾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发展。我国煤的储量极为丰富。煤的开发，近期内要以改造、扩建现有的矿井为主，新建矿井应以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中小型矿井为主，大型矿井也要分期建设，分期投产，以求早出煤，多出煤。要把开发山西的煤炭作为重点来抓，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内蒙古、贵州等地煤炭的开发也要做出合理安排。电的生产和建设，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火电和水电，逐步把重点放在水电上，有水力资源的农村要发展小水电，以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

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发电成本。石油的生产和建设，要抓好大庆等现有油田的技术改造和挖潜革新，近几年把总产量稳定在一亿吨的水平上，还要尽可能地集中一些资金，加强新油田的开发。要大力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普查和勘探，增加后备储量，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我国海上石油的勘探情况，是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很关心的。我在这里高兴地向大家报告：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南海、黄海部分海域已完成地震普查工作，渤海、北部湾已经有一批探井出油，前景是良好的。我国政府确定，根据互利原则，近期内招标，同外商合作，加紧勘探，尽快投入开发和建设。

能源和交通的建设要结合起来进行，交通还应该先走一步。因为有了交通，开采出来的煤炭才能够及时运出。若干年内中央的建设投资，应该首先考虑交通包括港口建设的需要。目前运输能力不足的铁路区段和吞吐能力不足的港口，必须首先加强技术改造。交通和水利部门要通力合作整治内河航运，大力提高航运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沿海的海运能力。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加强公路建设，组织好各种运输工具来加强短途运输。要加强邮电通讯的建设。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交通运输适应整个生产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对现有工交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既能改变重工业任务不足的状况，使当前的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并且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又能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今后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储备力量，这是使我国经济走向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许多企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说明，这样做比新建企业投资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

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由于我国人力资源丰富而又资金不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统统要求最新技术，片面追求自动化。进行技术改造要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降低消耗，降低生产成本；二、

改革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性能和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三、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综合利用水平。

进行技术改造要有总体规划和各行业的具体要求，首先抓好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一批骨干企业，分批分期地进行，决不能不作研究，不讲效果，一哄而起，各行其是。各行各业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技术装备政策，拟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全面规划，有准备地进行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的改造和革新。机械工业要及早进行改造和改组，努力设计和制造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适应各行各业技术改造的需要。技术改造规划，要列入国家计划。改造的项目，要一个一个地安排落实。

我国一部分重点企业，设备陈旧，效率很低，耗能很高，应该有计划地代之以效能更高的设备。但是，这项工作要量力而行，在目前条件下，绝大多数企业主要是增添或更新个别的关键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和运行流程，加强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应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实现生产技术的革新。

为了有效地推进技术改造，今后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要把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资金统一安排使用。应该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符合我国情况，有利经济发展的设备更新政策。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情况逐步提高，以利于合理地缩短企业设备更新的周期。今后凡是企业的折旧基金、利润留成部分中的生产发展基金，以及上级部门拨给的有关资金，都应该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都要纳入财政计划和信贷计划，不得用于新建项目和其它支出。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外资，把技术改造同技术引进结合起来。

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为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必须分批地有计划地对现有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企业的全面整顿，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是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搞好全面计划管理、质量管理和经济核算工作。二是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有计划地进行全员培训，坚决克服人浮于事、工作散漫的现象。三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劳动好的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而

又屡教不改的，企业有权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经济的或行政的惩处，直到辞退和开除。四是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工作。违反财政纪律，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截留上交利润，偷漏税款的，对有关人员和领导人员要追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围绕以上工作，要着重做好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克服某些领导班子存在的涣散、软弱、臃肿、老化等现象，同时把中青年干部和技术业务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以厂长为首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指挥系统。

在企业整顿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和完善经济责任制，首先要明确企业对国家、职工对企业承担的经济责任，同时赋予企业一定的经济权限，给企业和职工应有的经济利益，使责、权、利三者结合起来，发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健全厂内经济核算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目前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问题十分严重，实行经济责任制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使企业和职工都有办好企业、挖掘潜力的内在动力。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重要环节。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推行经济责任制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实践中稳步前进，努力创造出适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特点的责任制形式，不要一哄而起，不要一刀切。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必须有平均先进定额，产品质量只许提高不能降低，成本只许降低不能提高，流动资金的周转速度必须加快，产品必须适销对路，不准违反国家纪律擅自提价。必须切实加强对企业监督，要制定财务、工资、奖金、福利等各种规章条例和实施办法。增收部分的分配，要坚持首先是国家多得，其次是企业多留的原则，企业利润留成的增长幅度不能超过生产或利润的增长幅度。必须坚决制止各种通过歪门邪道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结合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企业和职工真正认识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而把他们的积极性真正引导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正确轨道上来。

企业的整顿工作要点面结合，有步骤地进行，准备在两三年内，分批完成。第一批先选择对国民经济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近三百个企业，用半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整顿完毕，然后总结经验，再一批一批地整顿下去。整顿工作原则上应当在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国务院各工业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应该带领干

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协助搞好整顿。各级都要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加强指导，使企业的整顿工作真正取得实效，切忌走过场，流于形式。在整顿企业的同时，要整顿和加强主管部门的工作。

企业的整顿工作，要同企业的调整和改组结合起来进行。首先要对那些产品产量供过于求而质量很差、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很高、长期亏损、污染严重的企业，分别不同情况，坚决地实行关、停、并、转，使国家有限的能源和原材料，用于那些产品质量好、消耗低、经济效益高的企业。全国地县小铁厂由四百六十六个减少到现在的二百七十六个，保留的小铁厂加强了管理，结果炼铁焦比由九百五十公斤降到七百零五公斤，生铁成本由三百零三元降到二百四十三元，亏损由六亿三千万元减少到一亿元，可见搞好关停并转的经济意义是很大的。国务院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制定不同行业、不同产品的设厂标准，规定必须达到的生产批量、产品质量和物资消耗的最低要求，凡是限期内达不到这些要求的，必须停产整顿或者关闭。在能源短缺的华东、东北地区，要严格限制耗能多的产品的生产，尽可能把这类产品安排到能源比较富裕的地区去生产，以利于能源供需的地区平衡。各地区、各部门要识大体，顾大局，树立全局观念，做到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中切实保护好国家财产，妥善安排好停产企业职工的学习、培训和劳动。利用停产时间和生产任务不饱满的时间，抓紧对职工进行政治的和技术的培训，这是一种花费很小收益很大的智力开发。现在，许多生产任务紧张的企业的职工，正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学习；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特别是需要关、停的企业职工，更要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进行学习。这种学习，实际上是增加我们潜在的生产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六、讲求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财政困难，资金不足。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采取正确的政策，调动全体职工、所有企业和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也就是真正的生财之道。目前在我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增收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按照现在的生产规模，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要降低百分之一，一年就可以增加收入二十亿元。全国流动资金大大超过了应该拥有的数量，如果能够加速周转，减少百分之二三的占用量，就可以节省出七十亿到

一百亿元的资金。现在许多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很长，只要努力加以缩短，就可以大大减少施工队伍的工资支出，早投产就可以早为国家提供利润和税收。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一定能够把客观存在的增收节支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坚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而且可以多筹集一些资金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

千方百计地增产增收，增加社会财富，这是一切经济部门都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基础。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多了，国家的财源就充裕了。财政部门要尽力帮助经济部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同时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保证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防止浪费。经济部门要密切协同财政部门，做好聚财、用财的工作。各级政府不仅要把生产单位应该上交的税利收上来，而且应该想更多的办法，用更多的力量，扶助生产，发展生产，以增加更多的收入。决不能因为财政有困难，就取消既有利于调动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全局的改革。如果那样做，就会堵塞增产增收的路子，反而加重财政困难。

在各方面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要从财政、税收等方面采取适当的办法，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要加强税收和海关工作，恢复一些税收，开征一些新税，实行烟酒专卖，堵塞“跑、冒、滴、漏”，把一切应该收上来的钱都收上来，把一切应该集中的资金都集中起来。在这同时，还要通过银行的信贷业务，有计划地运用一部分地方、企业以及个人的存款作为建设资金。这样，既可以把相当部分闲散的资金和消费基金转化为建设基金，又可以适当缓和购买力的增长和商品供应之间的矛盾，减轻市场的压力。这对于存款者和国家都是有利的。许多基本建设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效果很好，应当积极扩大这种办法的实行范围。另外，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开展保险、信托等业务来筹集资金。筹款、集资也要防止失去控制，防止信用膨胀。必须加强和发挥银行聚集、调动及统一管理信贷资金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活跃和地方、企业财政权力的扩大，国家预算外的资金数量将逐步增多，目前约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把这部分资金同国家预算内的资金结合起来，统筹安排，纳入计划，合理使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很多事情可以用预算外的资金去办，以减轻国家的负担。今后，中央

财政的投资范围应该逐步收缩，主要用于能源、交通、新兴工业等。至于一些投资周期短、利润比较大的项目，城市建设的一些项目尽可能用地方和企业的财力去兴办。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监督，严明财经纪律。对企业、部门和地方的合法利益要切实保护，对其非法所得要坚决制止。

总之，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是有的，增产节支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例如，抚顺市是以重工业为主体的。今年由于调整，许多企业任务严重不足，生产下降。照过去的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降低、收入减少，似乎是“天公地道”的。然而抚顺市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不这样看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发动群众挖掘潜力，制订了减产不减收的三十条措施，取得了成效。全国还有相当一批企业也做到了增产增收，节支增收。所有财政经济部门的同志都要像抚顺的同志一样针对我们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实际出发，探索解决财政问题的新办法。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应当很好地研究生财之道、聚财之道和用财之道。如果仍然按照老框框、老办法去办，就好像“山重水复”；如果根据新情况，按照新办法去办，就会“柳暗花明”。

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国被封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已同世界上一百七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往来，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所有这些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国际间平等互利的交换，补自己的短处，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在经济工作中，我们应该彻底抛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点。一切闭关自守、墨守陈规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一切单纯依赖外力、迷信外国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

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的经验还不够，必须认真学习。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

扩展对外贸易，增加出口是关键。应该放开手脚进入国际市场，争取

出口的增长率经常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要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发挥我国资源丰富的优势，增加出口矿产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发挥我国传统技艺精湛的优势，发展工艺美术品和传统的轻纺工业品的出口；发挥我国劳动力众多的优势，发展进料加工；发挥我国现有工业基础的作用，发展各种机电产品和多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加工产品的出口。某些产品，可以采取以进养出的办法来扩大出口。把产品拿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接受检验，将有力地促进我们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品种，改进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几年来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误的事例，应该加以总结。既要反对束手束脚，拖延不决，也要反对轻信轻诺，草率从事。今后主要应该引进技术和进口自己不能制造的单机、关键设备，不要都搞成套设备进口，不要重复引进，不要只进口设备不引进技术，不要在引进后不加以消化和推广。

尽量多利用一些外资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是完全必要的，首先要利用那些低息的、条件比较优惠的贷款。在工作中，使用外资一定要细致地、谨慎地进行可行性研究，讲究经济效益，不能仓促行事。能在多大规模上利用外资，归根到底，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国内的工作，主要是偿还能力、配套能力和消化先进技术的能力。近期内可以利用的长期低息贷款，主要应该用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对于那些生产国内外市场急需产品的中小企业，在使用外资、引进技术上应该更加放手一些。这些企业数量很多，它们大都只要引进一些适用的关键技术和设备，所需资金不多，就能很快大幅度地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而且很快就能偿还。这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对于我国发展生产是很有利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主权国家。我们根据平等互利原则，欢迎外国人来投资，联合开矿、办厂、办其它事业，但是外国投资者必须尊重我国的主权，遵守我国的法律、政策、法令。我国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了经济特区，这方面的经验应该及时总结。特区在采用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方面，在利用外资方面，要放手去做。我们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特区工作中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保持有关部门职工和当地居民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道德风貌。

为了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展，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作用。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福州、厦门等城市，应该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还要及早动手，采取各种方式，培养一大批熟悉国际市场和国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对外经济贸易专家、技术干部和推销人员，组织好国际商情网和包括销售后服务的推销网。对现有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制，要继续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既坚持国家的统筹安排和统一对外，又能调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性。

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国际的合作。各国政治、经济界有远见的人士，也认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及其对今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深远意义。我们应当审时度势，积极做好工作，不断扩大和加强同一切愿意与我们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交往的人士的联系和合作。

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国过去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在管理方面是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在分配方面是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近年来，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这些改革还是局部的、探索性的，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前后不衔接、相互不配套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反复的科学论证，尽快拟定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逐步实施。

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我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对于带全局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要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不同企业的经济活动，要给以不同程度的决策权，同时扩大职工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改变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经济

法规来管理经济。根据上述改革的基本方向，我们对改革的轮廓有如下一些设想：逐步实行政企分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改变那种由地区和部门互相分割、壁垒森严的现象，按照专业化协作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把企业合理组织起来，同时建立为企业服务的各种行业组织；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建立多渠道、少环节、开放的商品流通市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与这些改革相配合，需要在计划、统计、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劳动工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陈云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说过：“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对当前的改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设想，根据企业在国计民生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根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根据企业产品的重要性和种类、规格的多少不同，可以分别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大体上有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的。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骨干企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它们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品种不是很多。二是按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生产的，这是品种繁多的小商品，分散在许多小企业和个体劳动者中生产，不可能也不便于统一计划管理，它们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小部分。在这两大类之间，还有两类产品和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自行组织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前一大类，但又有所不同；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一类基本上接近后一大类，但也有不同。这样一种管理体制，既不同于过去我们那种统得过死的体制，更不同于资本主义那样的市场经济。它可以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提高经济效益，按照社会需要组织和发展生产。

要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更好地发挥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的作用，控制长线产品，发展短线产品，促进工业改组，调节企业利润水平，

鞭策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外，还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工作，发挥工商行政、统计、财政、银行等机构对经济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使企业经济活动符合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国民经济从管理制度到管理方法的大变动，是各方面经济权益的大调整，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因此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妥。每项改革都要认真调查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制定周密的方案，经过试点，逐步推广。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前进，稳步地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我们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需要培养大量的各类各级专门人才和大批熟练的劳动者。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我们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明确的，这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又红又专的人才，坚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现在的任务是要根据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情况来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个方针。高等教育在数量上要积极稳步地发展，特别要注重质量上的提高。它们的专业设置、领导体制、教学方法和内容等方面，都要在周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除正规大学外，要大力发展业余、电视、函授大学，鼓励自学成材。在中学教育方面，要逐步改变普通高中过多、职业中学太少的状况，积极发展中等专业学校，大量培养技术工人和中级专门人才，以利于劳动就业和提高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与政治思想水平。同时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关心他们学业上的成长，不能片面追求升学率。最近，叶圣陶¹代表发表了题为《我呼吁》的文章，批评了当前中学和一部分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词意恳切，表达了学生、教师、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希望有关各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小学教育也要切实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使学生在身体、知识和品德方面得到全面的健康的成长。学校、家庭、社会要互相配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学校都要加强中国历史和地理

的教学，这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要加强法制教育，设置相应的课程。此外还要培训大批合格的幼儿教师，使更多的学龄前儿童能够进入幼儿园，并且能够受到适应他们身心特点的教育。

我们必须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切实加强对全体职工的教育。这里要专门讲一下农民教育的问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非常繁重的任务。现在是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了。各级政府要努力把农民教育办好。农民夜校、冬学等形式历来为农民群众所欢迎，应该广泛采用。但不能用它们来代替正规的中学和小学。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农民认识到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有学习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又想让他们子女从事辅助劳动，舍不得送他们去上学。各级政府要针对这种情况，对农民进行教育，说服他们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到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也是明确的。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基础研究决不能削弱，但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现在的任务是要把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强大的生产力，真正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当前要抓好已有的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近年来我们积累了大批科研成果，同时也引进了不少先进技术。这些都是已经到手的财富，如能抓紧消化和推广，将会产生很大的效益。要组织好科学技术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去年以来，不少科研、设计部门同生产部门组成各种形式的联合体，采用了一些新形式和新方法，如合同制、有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农业技术联产责任制、农业技术咨询合同制等，使科研、设计部门能够直接面向生产，为发展生产服务，同时使科学的普及和技术的推广有了内在的动力。这些做法，对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

我国的科学技术总的来说还很落后，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落后。就某些领域来说，我们在科研力量、实验手段和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and 水平，不应低估我们自己的力量。为了适应今后一个相当时期

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现在有必要向全国科学技术领导部门、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人员，提出一项任务：组织起来，加强协作，进行科学技术攻关。我们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和专家反复研究和论证，选择一批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如培育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水土保持、植物保护、农药更新等方面的农业增产技术，食品的储藏、保鲜和加工技术，纺织品的后整理技术，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技术，煤炭和石油综合利用技术，有色金属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技术，以及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带关键性的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的研究等，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攻关。这是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希望大家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够攻克较多难关的时候了。我们应当相信，我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是有决心有能力攻克这些难关的。

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在基本建设中，又片面强调扩大重工业的建设规模，忽视消费品工业的建设，忽视住宅和城市其它公用设施的建设。其结果，经济效益很差，人民生活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进一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坚决纠正这种偏向，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城乡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后，国家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调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工资、奖金中某些不合理部分，并且扩大职工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建设。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只能逐步发展，人民生活也只能逐步有所改善，改善的步子不可能一下子迈得很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比重。所有这些，都是客观经济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只顾当前生活，不顾生产和建设，在改善生活方面要求过高过急，必然会损害人民和国家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目前存在的滥发奖金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损公利私、损大公利小公的违法行为必须追究责任。有些企业和单位的领导干部，迎合一部分不顾大局的人们要求，用各种办法损害国家利益，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为了保证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严格地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家建设逐年扩大；或者是控制不严，措施不力，听任人口继续大量增长，从而既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经济、文化、国防的建设。二者必居其一。厉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农村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原有的一些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部分地区出现了出生率回升的趋势。这种情况不能放任自流。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做好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并且不断加强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改进技术措施。现在许多地区已经实行的奖励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限制二胎和多胎的办法，应该继续贯彻执行。同时，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违法乱纪的行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我们要求全国上下为着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前途，为实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目标，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各位代表：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上讲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原则上都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又应该从本地区的特点出发，同本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全国解放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牧业、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去年，我们特别

重申了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允许各民族自治地方采取适合各自经济条件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这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起了良好的作用，必须继续坚持。国家要在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等方面，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必要的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提高文化，改善生活。我们要在各族人民和干部中认真地、反复地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坚持民族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方针，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

国务院提出的以上十项经济建设方针，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方针之所以到今天才能够比较系统地、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更早些，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实践还不够，国民经济的现实发展还没有把各种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暴露得现在这样充分，以致人们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做出应有的判断和结论。不久以前，中共中央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重新衡量利弊得失，提出上述的方针政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分析和明确区别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成为我们研究我国经济问题的更加锐利的武器。各位代表可以看到，国务院提出的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其中的根本精神、根本原则，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这十条方针经过大会审议、修改、通过后，还要在各方面的实践中，反复接受考验，不断补充修正，使它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完善起来。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当前，国务院在努力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同时，正在继续抓紧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安排上都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以充分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实行调整、改革、

整顿、提高的要求，走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体现上面讲过的十条方针及其提高经济效益的中心思想。这个计划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研究基本轮廓和主要指标，但是因为忙于进一步调整经济，也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一些，至今还没有编制完成。计划草案制定以后，国务院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现在我向大会报告的，是正在拟定的方案的一些要点。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六五”期间，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时要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继续合理地降低积累基金所占的比重，适当提高消费基金所占的比重，使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六五”期间，要把主要的力量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现有企业，对重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样，就可以积蓄力量，为在“七五”期间进一步对现有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打下较好的基础。

我们要用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调整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使之逐步合理化，同时对各种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进行全面的改革。由于这个期间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十分繁重，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还在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六五”期间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一定的增长速度。我们要争取的速度，必须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扎扎实实的速度。也就是说，是经济效益比过去好得多，又能够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打好基础的速度。

只要我们在这个期间能够打好基础，消除经济中现存的各种弊端，比例关系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后劲”就会越来越大。“七五”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比“六五”高，再后十年的发展速度有希望更高一些。这就是说，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将很有可能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在这个振兴时期到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将有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和实际效益。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我国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国防也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

振奋精神，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作出这样乐观的展望，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们全部工作的重心已经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将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端正。我们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并将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我们已经建设起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利。当然，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还存在着不少的不利条件。这些不利条件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它们毕竟是暂时起作用的因素，是能够克服的。而我们的有利条件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的因素。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我国丰富的资源还远远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这些当然是我们应该正视的弱点，但是也表明了我国在各个方面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且还可以借鉴、利用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不需要一切都从头做起，重复人家已经走过的弯路。因此，只要路子走得对，从一个长时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是比较快的。

我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废除了剥削制度，原来为剥削者侵吞的那部分社会财富已全部归人民所有，从而整个社会财富可以合理地有计划地增长和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优越性。由于过去长时间内经济指导思想上存在“左”的错误，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固有的优越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行等等，对于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将起重大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发展前景问题上，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既要防止那种看不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对前途缺乏信心，对现代化建设悲观失望的情绪；又要防止那种看不到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困难，看不到我们的任务非常艰

巨复杂，企图速胜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必须树立长期建设的战略思想，实事求是，讲求实效，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努力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各位代表：

一九八二年是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也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第二年。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我们必须鼓足干劲，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明年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继续保持财政、信贷的收支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今年高一点。一九八二年的计划，要求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今年预计的百分之三提高到百分之四，并在执行中力争超过。国民收入也安排为比今年增长百分之四左右。这就要求明年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继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重工业要由今年的生产下降转为上升。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要求消费部分增长百分之五点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百分之八；积累部分增长百分之三点二，国家预算内直接安排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五点七。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费用的支出增长百分之五点九。积极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必要的劳动者个体经济，采取各种方式妥善安排城镇待业人员就业。要使城乡人民的生活继续得到改善。明年要用很大的力量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对那些消耗高、产品质量差、长期亏损的企业，下决心实行关、停、并、转。为了实现明年的计划，无论是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商品流通和财政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都必须狠抓经济效益，争取做出显著成绩。《一九八二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点(草案)》，已经提交本次大会讨论，建议大会予以原则批准。国务院将根据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后，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各位代表：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两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我们只有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久发展，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精神文明的范围很广，它的主要内容必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任何社会都要发展它所需要的这方面的精神文明。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这方面的精神文明，有更普遍更迅速的发展。我们要大力加强智力开发，增加智力投资，使智力投资同生产建设投资的比例相协调，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这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并且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性质的。目前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它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我们的社会成员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关系，包括各民族人民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军民之间、先进后进之间、较富裕者与较困难者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买方卖方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都要求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团结、互相帮助，能够顾大局，讲原则，讲公平信实，做好本职工作，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在处理同外国人的关系上，能够做到既不骄傲自大，也不卑躬屈节。在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能够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逐步完善起来，坚信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成熟而逐步实现，并且能够为实现这种理想而作出脚踏实地的持久不懈的努力，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阴暗面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既不抱天真的幻想，也永不悲观失望。发展这种思想方面的精神文明，对我们的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办法。一年多来，在克服官僚主义弊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改变干群关系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干部作风中出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气象。但总的说来还不能令人满意。最近，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又进行了多次研究和讨论，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坚决

改变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副职虚职过多、工作效率很低这类不能容忍的状况，以便有效地领导现代化建设工作。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进行机构改革，限期完成。政府机构的改革，对于振奋广大干部的精神，进一步改善我们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对于我们整个经济的调整 and 改革，都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务院所属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应该在实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任务中，为地方各级政府作出表率。在政府机构的改革中，国务院各部门将作较大的裁减或合并，人员将尽量精简，领导干部将有较大的变动，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人大常委会，届时予以审议和批准。

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各个行政机构内部的各个组织和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要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严格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坚决纠正相互推诿、办事拖拉、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的恶劣习气，坚决扫除热衷于搞文牍旅行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衙门作风。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要有计划地把思想政治好、有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有领导才能的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努力实现领导人员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到下级、到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从明年一月起，准备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由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带队，下去帮助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恢复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新的成绩。

各位代表：

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有各条战线的密切配合、促进和支持。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努力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统一战线一直是我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法宝。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同中国共产党有着

长期合作的传统。广大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建设，关心着祖国的强大和统一，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对各级干部认真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再教育，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和认真听取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我们要按照叶剑英²委员长宣布的方针和原则，按照胡耀邦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促进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统一祖国愿望的早日实现。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要提高战备观念，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为巩固国防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我们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奠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奋勇前进吧！

注 释

1. 叶圣陶(1894-1988)，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2.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曾参加广州起义，历任八路军参谋长，北京市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同人大代表讨论物价等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

物价问题，大家都关心。当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稳定的，但有些商品价格确有上涨，特别是蔬菜。物价为什么有些涨，从基本上讲，同票子发多了有关系。三年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减轻部分地区的农村税收负担，提高职工工资，以及城镇安排就业，实行奖励制度，国家减收增支，累计起来是九百多亿元。这使工人、农民相应增加了收入。如果按全国人口平均，三年内每人在这方面多收入九十元。当然，国家工作人员、文教科卫人员等，比较起来收入少些，但广大农民、工人这几年的生活，确实有显著的改善，购买力确实增加了。过去，人民生活水平多年没有提高，在粉碎“四人帮”后，采取上述措施是必要的，不迈这一步不行。但是，这几年消费的增长超过生产的增长，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而有些群众在心理上还不满足，同外国比，总想生活能够很快地提高。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是对的，但要正确引导，使大家懂得，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居民购买力增加的幅度要同社会消费品供应增长的幅度相适应。如果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这样下去，我们的经济就会崩溃。

现在，工厂企业中存在滥发奖金的问题，互相攀比，不管生产搞得好坏，奖金都向高的看齐，结果，奖金总额控制不住，效果也并不好。农村中，有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拿不上来，都成了议价、高价。很多东西

* 这是赵紫阳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四川代表团讨论时的发言。

价格倒挂，都要国家补贴，在这方面投放的货币越来越多。今后，对群众消费的增长要稳一点，就是适当抑制一下。在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搞活流通，使货币尽快回笼的同时，还要想办法减少票子的发行。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企业必须整顿好，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高经济效益，这方面潜力很大。二是奖金总额必须控制，不能滥发，不能再膨胀。三是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上，要坚持“三兼顾”的原则。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必须完成，多余的产品，才可以加价议价。对那些发展过多的、滞销的东西，不能长期要国家用高价收购。要通过价格政策，对农民的生产起到指导作用。

关于最近部分烟酒提价、涤棉等化纤产品降价的问题，这是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我们国家要发展化纤，不降价，就发展不起来。总的算账，降价比提价的金额多。烟酒提价幅度大的，主要是中华烟、五粮液等高档货，原来以为影响面不那么大，没有估计到现在青年工人中抽好烟、喝好酒的也不少。提价后，北京摆出一批高档的烟酒，一下子就卖光了。有个老太太，准备儿子结婚，一下拿一百三十多元，买了十条中华烟。这是个普通工人的家庭。这说明，人民的购买力确实比过去提高了。

关于蔬菜问题。每个人天天都要吃菜，这个影响最大。近两年，许多城市的蔬菜很贵，不是个好的趋势。一个重要原因，是郊区农民认为搞工业合算得多，不愿意种菜，又有大片的菜地变成了工厂。有的是办社队企业，有的租给城市企业单位作仓库、堆货场、停车场等。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报告里强调，城市郊区的农民要以种菜为主，蔬菜的种植面积要切实保证。对于近郊区发展社队企业要加以适当限制。要拿出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把蔬菜的生产和供应搞好。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后的民事纠纷》 一文的批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耀邦同志：

这篇材料是光明日报内部刊物《资料与文稿》上刊登的，反映了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

看来，农村实行各种责任制，特别是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必须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基层发生瘫痪、瓦解的现象。作为集体经济单位的大队、生产队，必须的经济领导职能仍应保留；特别是公社（乡）、大队（村）作为基层政权的职能必须相应强化。不然的话，农村的各种混乱现象，就难以避免地会蔓延起来。

请你考虑，这篇材料可否印发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参阅。¹

赵紫阳

十二月十三日

注 释

1. 胡耀邦在此件上批示：“将这个材料和紫阳同志的批语印成书记处参阅文件并发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同志们。胡耀邦 十二月十四日。”

研究经济新情况 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十九日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讲话

我要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财政情况是不错的，我在人代会上讲今年财政有二十七亿元的赤字，实际上估计不会到这个数字，二十亿元也不到，这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今年报二十七亿元呢？因为明年财政紧张。因此，今年我们提前还国外的账，今年替明年还账十亿元，减轻一下明年的负担。明年就看我们的整个经济效益怎么样了。现在算账那还是差得很多了，会议上我讲了三十亿元，不敢多讲，人大代表都强烈要求消灭三十亿元赤字。就算账来讲，明年的财政问题还不小，至少是五六十亿元赤字。上次计划会议讲是四十亿元，我后来讲，无论如何，我们明年赤字不要搞到四十亿元。今年如果二十七亿元，明年三十亿元，明年的报告就比较好讲；如果今年二十七亿元，明年搞个五十亿元，报告都不好做。当然，不是为了报告。因为人民把这看成是整个经济好转的状况怎么样。但是，应当说潜力也是很大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是提高经济效益，整顿企业，对违法乱纪、违反财经纪律的，好好整顿一下，全党真正努力可以争取明年的财政进一步好转。今年财政情况比原来预计要好一些，但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的外债，明年、后年是还账高潮。所以要留有余地，提前做好还债的准备。

* 这是赵紫阳在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

我看了一些材料，生猪主要是两个问题。我同意这样的提法，这个情况现在很严重，但是，也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抓的话，明年全国会真正出现猪肉紧张的严重情况，那当然后果就很严重了。因为现在城市承认农村形势好，首先就是有猪肉吃。生猪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两条：

第一条原因，就是过去农民养猪，除了国家奖售以外，生产队也有一定的奖励。比如说，很多地方生产队或者给饲料地，或者给饲料粮。我所知道的，像四川，两三年来就实行斤猪斤粮，不管国家给多少，生产队和农民算账，是斤猪斤粮，一斤猪肉一斤粮食。国家给的粮食当然现在没有变化。生产队给的这一部分粮食过去是拿牌价来算，牌价粮食养了猪，猪肉调价以后，农民养猪是合算的。为什么这几年猪发展得很快？一个是农业情况好转，一个是政策鼓励，因此，社员养猪这几年发展很快。为什么今年有下降的苗头，几乎是不分南北。从东北到广东，从四川到山东，丰收的也好，不丰收的也好，去年受灾不受灾的，生猪都下降？当然不是粮食问题。我前几天问了一下，四川的同志说，现在那里猪肉供应没有问题，收购也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卖猪还难。但是，实际上养猪数量也在减少。那就是说，猪肉紧张的情况今年没有出现，明年就可能出现。出现早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地方的县城以下，甚至中等城市，现在猪肉供应已经紧张了。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没有把生猪奖励的措施同时落实下去。当然，去年大家感到猪肉比较多，研究的问题不是鼓励养猪，都是限制养猪也是一个原因。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没有把养猪落实下去。农民包了土地以后，粮食是自己的，这个他要算账了，是拿粮食养猪还是卖高价？因为粮食是议价的。因此农民就不愿养猪。过去生产队鼓励养猪，按牌价给你粮食，你去养猪卖；现在地到了农民手里，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是自己的，除了完成国家公购粮以外，剩下的粮食是到市场去卖呢，还是养猪？就是说，饲料地的问题没有落实，没有随着粮食到户以后，把养猪的任务也落实到户。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请河南刘杰¹同志讲一讲，他们最近抓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根据你分的土地，养多少猪，或者叫饲料地，或者叫养猪地，养猪多，多分地，不养猪，少分地。必须有个任务。因为完全由农民哪个合算就干哪个，那问题就会很多。

第二条原因，如果不把养猪作为一个任务，现在农民就算账了，是养猪合算，还是养兔子合算，还是养鸡养鸭合算？

生猪下降，主要是这两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根本的东西，如果完全由农民什么合算干什么，而不是作为一个任务，如果我们没有随着责任制的变化而相应的采用新的鼓励养猪的措施，没有跟上去，这样一下子就发生问题了。我最近找了几个同志谈，他们讲，大概主要是这么两个原因，当然，其他原因还有了，养牲畜多了，养牛呀，养驴呀，因此不大愿意养猪了。现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从市场上看，猪肉的收购和供应还看不到紧张，但是，农村养猪在下降；另一种情况，现在市场供应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猪肉一少，就发生很多问题，二道贩子就来了，国家就收不到手了。但是，我认为这是派生的。因为去年我们就不怕投机倒把，有二道贩子去卖更好，那时的根本问题是卖猪肉难嘛。现在猪开始一紧，肉就高价收购了。这是派生的。当然，也增加了紧张，但看来这不是主要的。

现在农村里面有几个新情况、新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们有些工作要跟上去。城市几乎全国没有例外的是蔬菜紧张，一直有这个问题。郊区不愿意种菜，愿意搞别的东西。农村就是养猪问题，郊区就是蔬菜问题。看来，给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还得有计划。当然，计划不能像过去搞得那么死了。我看，主要的还是通过任务、合同、政治思想工作。总之，主要的东西还得有个计划，如果完全由农民哪个合算就干哪个，那将来确实发生一个问题。现在就有这种情况，国家不需要那么多的，它偏偏去生产，产生积压；而整个社会很需要的东西，它不去搞，而我们又不能够完全用价格去调节。对农业生产的问题，主要用价格去调节，今天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计划调节取消的话，那当然会发生问题了。那就会发生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却大量生产，社会上需要的东西不生产。各地方反映，烟叶明年可能要搞到一千二百万亩。面积种得太多了。当然，有些东西我们不急于去改变政策。比如长江流域的油菜籽，今年基本上种上了，面积大大扩大了。现在国家仓库里已经积压了很多油菜籽，如果明年再搞得很多，就发生一个处理不了的问题，而且收购价格又比较高。总之，对农业生产，还得根据社会需要有所指导。陈云同志讲的，我们今天还不具备完

全用价格去调节的条件。如果完全用价格调节可以解决，油菜籽多了就降价，猪少了就涨价，涨价就促进生产嘛。但现在价格又不能动，随着市场变动，总得有个办法来指导它。现在很多问题是边走边看。去年猪很多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农村会发生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问题，不要久拖不决，该解决的就解决。蔬菜问题看来抓得晚了。蔬菜是什么问题呢？原因也可以讲很多，但是根本的问题，是郊区农民只愿搞工业，不愿搞蔬菜。而这个问题完全由农民随着价格走，那就不行。当然，也有对农民教育的问题，对农民指导的问题。城市蔬菜、农村生猪，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通过银行聚集资金，同时通过银行支援建设，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今后聚集资金的一个重大措施来讲，我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有利的，而且路子会越来越宽。问题就是，明年一年究竟能搞多少，在我们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以前，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要把这么一件好事搞乱。如果搞乱了明年，后年又收，这就不好了。因此，上一次计划会议上我说了一下，首先一条，就是不要离开银行另起炉灶去搞筹集资金。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去统一调度，把把口子。比如企业资金，个人储蓄，本来这个钱在银行里，如果另外搞很多投资公司，那就是说，银行存款可能大大减少。我们现在银行大量的钱是流动资金，周转资金。如果很大一批钱不通过银行，而通过各种投资公司变为基本建设投资，又没有一个总的口子去掌握这个情况，那就会发生实际上把现在银行用于流动资金的部分转去用于基本建设。总的来讲，除了财政以外，我们另外调节资金，还是要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也可以办一些投资项目，最好通过银行去办。盖房子也好，城市盖宿舍也好，都可以通过银行筹集资金，发股票也可以。总而言之，我们刚刚开始，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明年能够搞多少，看一看。后年可能还可以搞得更多一些。不要一下子撒开，最后出问题。总的来讲，我们经济经过调整以后，今年各方面有很大的好转，但是潜在的危险没有完全消除，或者说没有根本消除。在这方面，如果不谨慎，也可能把我们今年一年来的努力，已经缓和下来的矛盾，明年又重新激化起来。这样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是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搞不好，明年物价会来一个波动。总而言之，票子的问题很值得注意，不管基本建设也好，农副产品收购也好，

奖金也好，票子发得太多，就要出问题。又要稳定物价，又要多投放，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统一的，根本的经济规律没法改变它。发很多票子出去，基本建设也好，农副产品价格也好，奖金也好，工资也好，开了很多口子，又要稳定物价，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很多事情都有个承受能力问题。我们前几年农副产品提价也好，奖金也好，总的来讲，我认为，迈这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多年来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提高。农村十多年，每人每年增加收入不到一元钱，江苏这个富地方也是这样子。如果不迈出这一步，今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这样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光讲责任制还不行，责任制是第一条，还有个价格。总的来讲，农村提价减税加上城市奖金和各种补贴，三年国家多开支九百个亿。总的说，迈这一步是必要的，我历来讲不后悔，但是看来步子迈得大了一点。这个步子迈这么大以后，我们必须用几年缓过来。经过几年积累，我们情况就好了，就会有一些钱去搞建设了。已经迈得比较大了一点，从政治上考虑，也是必要的。如果现在还按前几年的想法去搞，我们经济上不可能稳定。而这一点，我们全党要统一思想。我认为，现在很多问题，提出都是必要的，而且我认为也是不难解决的，关键在于党内能够思想统一起来。

今年调整就是证明，只要统一思想，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为什么着重说这个问题呢？主要的是我们今年形势好了一点，有些矛盾缓过来一些，只怕我们形势稍微好一点，明年再反复一下。当然，这一次提价也证明，物价很容易波动，不那么简单。

指标问题看来问题不大，“保四争五”，甚至更多一些都有可能，关键是怎么能够多收入。昨天小平同志问我，贷款为什么没有用呀？还有世界银行的人讲，你们为什么软贷款要那么多，硬贷款不可以多要一点？这很有道理，软贷款期限是五十年，实际上没有利息；就是硬贷款多搞一点，利息也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国内财政困难，没有配套资金。我们国家在财政上不想一些办法去克服困难，筹集一百亿元的资金，是不行的。不外乎少开支一些，工人、农民少花一点，多收一点。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讲话

说一个问题，农业调整作物布局的问题。调整作物布局，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效果很好，因地制宜，对过去多年来瞎指挥造成的作物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很大的纠正。另外，对现在国内必需而又大量进口的主要物资，一个糖，一个棉花，这两年扩大了播种面积，产量大大增加，这个对国家、对人民都是非常有利的。

现在提出这么个问题，因地制宜种植这个方针，还受不受别的因素制约？是有一个东西制约着它。这个制约的因素就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大政策来讲，我们只能够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不能再多进口。这个我们过去谈过多次。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能够了解。（杨易辰²：长期进吗？）现在也没有准备短期进，没有准备减少，至少在本届政府，没有准备减少。下届政府我不敢讲。我的想法，下届不管谁来，只要有这个可能，最好也不要减少。但是，这是我们进口粮食的极限，受这个制约。如果由于我们调整作物布局，粮食面积减缩过多，进口一千五百万吨打不住，那我们国家就会发生问题。因为，国际上再多买，有困难；另外，如果我们确实粮食进口过多，就会造成依赖性，被国外卡住脖子。所以，因地制宜和因国制宜必须结合。我们国家十亿人口吃饭还是头等大事，不能离开我们整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来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考虑因地制宜。这是一个大局，影响到很多方面，这是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根据这么一个情况，中国调整作物布局只能限制在这个范围内：第一，多年来的瞎指挥，就是过去讲的“以粮为纲”，过分强调粮食的结果，把很多不适合种粮食、而且过去也不是种粮食的土地勉强去种粮食，这于国于民都不利。这种情况是应该作调整。据现在了解，这个问题这两年来应当说步子迈得不小，已经基本解决了。第二，根据我们整个国家的需要，现在还在大宗进口的两种主要商品，一个是棉花，一个是糖，适当地、逐步地、有计划地扩大一些面积，主要是北方的甜菜和北方的棉花，不是南方。我认为，南方的甘蔗面积，除了荒地，不要扩大了。主要是北方的盐碱地，像东北、内蒙古这些地方，发展一些甜菜。因为这些地方种植面积比较大，产量也低，潜力比较大。根据这种情况，按照国

家已经确定的政策，北方的糖、棉花，面积上有所发展。其它地方的作物的调整，恐怕要控制。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大量缩减不行。从全国总的来讲，粮食播种面积就到现在这个水平差不多了，不宜再减。现在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概十六亿亩多一点。我们现在没有很大的把握今后每年单产有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粮食面积再过多地减少，最后势必又要被迫把经济作物砍掉。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是限死的。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农业的多种经营，就没有门路了呢？不是。今后农业的多种经营应当主要放在还没有充分、合理利用的一些丘陵、山区、水面、海边。就是说，利用还没有充分、合理利用的资源，而不能把眼睛只放到现有的耕地上。现有耕地上的经济作物，应当主要是提高单产，提高质量，而不能继续把眼睛放到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面积上，这个方针要定下来。在原有耕地上，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布局基本上到此差不多了。当然，局部的小量的作一些调整那还是允许的。总的来讲，在原有耕地上，经济作物和粮食播种面积的比例要在现有水平上稳定下来。

第三点意见，粮食包干问题。原来万里同志、依林同志已经把这个问题定了。我最近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大家都要求包干，中央也采取包的办法，这是好的。我在这里告诉同志们一个底，现在包干的水平，就已经包括了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中央手里只有四十亿斤机动粮。我今天要讲的，这四十亿斤不能作为救灾粮。粮食各地方包干以后，上调不增加了，但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用粮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业用粮还会要增加，这是肯定的。这样就和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发生了矛盾了，势必进口一千五百万吨粮食打不住。所以，各省必须自己在包干的范围内以丰补歉，多年调剂，就是中央的四十亿斤再不能用来救灾。比如说，云南包干调进十亿斤，如果云南发生了大灾，十亿斤可能不够，怎么办呢？这个年度来讲，中央调进可以超过十亿斤。但是，如果第二年云南丰收了，调进就要少于十亿斤，那就可能是七亿斤，或者六亿斤。包干要几年算总账。这以前我跟周惠³同志讲过这个想法，给各省包干的粮食要多年调剂，算总账，中央起调拨、周转的作用。不能你包了十亿斤，哪一年丰收了，粮食你自己用了；受了灾，中央调给你粮食，那就不是包十亿斤。因此，中央没有

救灾粮，中央只能协助各省进行多年调剂。我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各地注意一下。我们前几年为了休养生息，有一些省份当时定的调进粮食的基数比较高，包括云南、贵州、内蒙古，还有其他一些省份。是不是需要呢？是需要，因为前几年搞得很苦。但是，农村情况一好，我认为，不应当销那么多粮食。过去我们一开始考虑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使农民少吃国家的统销粮，而使国家虽然不能够多购，但可减少一点返销。现在看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省份不要农村情况一好，粮食用不完了，就缩小粮食面积。不要这样，粮食还是储备在那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生产不稳定的地方，要准备应付灾害。丰收年，农民少返销的粮食储存起来，以丰补歉。我们也不要你的，存到仓库里。不要丰收了，粮食多了，就搞协作呀，出口呀，改经济作物呀，山区粮食补助呀。第二年或第三年发生灾害了，怎么办？还向中央要粮食？这个是没有的。因此，受了灾，中央给你调拨了粮食以后，必须还。没有受灾以前，必须把能够节省的粮食积蓄起来，准备以丰补歉。不如此，明年、后年就可能突破进口粮食一千五百万吨。就是这样，中央的余地也很小。

再一个，原来老的商品粮基地，尽管有很多矛盾，还必须搞粮食。原来产粮的地区不搞粮食，统统一个省一个地区来考虑问题，那不行。至于有一些矛盾，群众中间有一些实际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国家的财力，逐年考虑如何解决，以调动生产商品粮地区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产粮的地方还必须继续生产粮食，这一条要定下来。

注释

1. 刘杰(1915-)，河北威县人。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地质部副部长，三机部副部长，二机部部长，河南省省长。

2. 杨易辰(1914-1997)，辽宁法库人。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省长，黑龙江副省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顾委委员。

3. 周惠(1918-2004)，江苏灌南人。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交通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

关于科技工作的一封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耀邦、小平同志：

杨振宁¹先生对我国科研方针和重点的来信送上，可抽空一阅。

我是同意这种看法的。从我国的情况出发，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来，而不应该在基础方面花很大的力量。据张劲夫²同志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

不久前，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田长霖³先生在北京科技界有一篇讲演，也是主张中国科技力量应当主要用在应用上，讲得很尖锐。科学院有录音带（我只看过记录，未听录音），你们如有时间，可以听听录音。因为我知道，在科技界思想认识上有分歧，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是会有影响的。

以上看法，不一定正确，供参考。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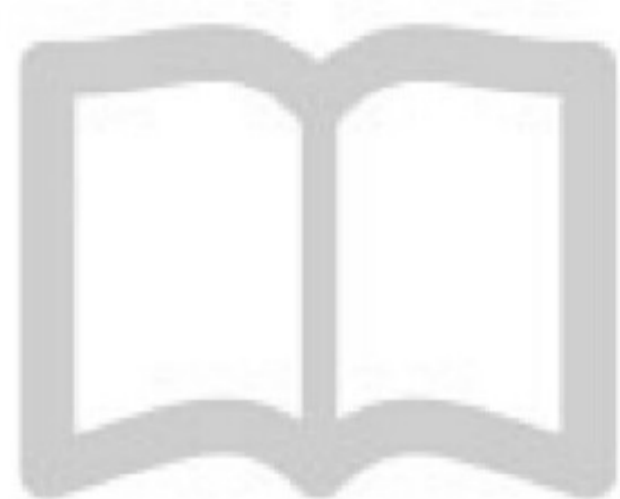
注释

1. 杨振宁(1922-), 安徽合肥人。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1957 年与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 张劲夫(1914-2015), 安徽肥东人。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财政部部长, 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 中顾委常委。

3. 田长霖(Chang-lin Tien, 1935-2002), 美籍华裔科学家, 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

一九八二年



此頁空白
Blank Page

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

我去首钢看了一下。实行经济责任制以后，全体职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心工厂，工厂的经营管理和职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厂容环境确实有了改变。大厂的环境污染，完全靠国家计划来安排不行。集体福利，消除污染，要靠厂子的机动财力逐步解决。我很注意在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工厂，如何把实现国家全面计划结合起来，一个是改善经营管理，一个是完成国家计划，特别像首钢这样的大厂，在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之下，如何发挥经济机制的作用实行责任制，实行利润包干分成，不能把企业搞得光光的。要使企业有点财力，搞点改造，搞点福利，也减少国家负担。对企业管理要考虑两个东西，一是要有全局观点，一定要完成国家计划和财政任务；一是要有相对的自主权，有机动财力把企业搞活。

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如何按照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也就是在计划指导下发挥经济机制的作用。实行国家指令性计划，企业不等于没有机动权。国家安排的基建计划、生产计划，要有一定灵活性。企业实行利改税的办法，大企业实行所得税加调节税的办法和实行利润递增包干，哪一个办法好，还可以研究。小企业可以征收所得税，自负盈亏。

总的说来，1982年要把经济责任制搞清楚，怎么看待，放在什么位置上？在国家同企业的关系中能不能把经济责任制同加强国家计划指导，

^{*} 这是赵紫阳召集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周太和、廖季立、宋平、房维中、梅行、白美清等座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谈话。

把各种指标统一起来落实下去。企业对职工的关系要与全面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再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使企业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进行整顿，走上健全的轨道。

实行经济责任制，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要与宏观经济的控制统一起来，与企业的全面整顿结合起来，要认真总结一批好的典型，通过一些典型调查，解剖一下，解决一些带方向性的问题。有一批大型企业，还要有一批中小型企业。据说北京实行经济责任制好的企业有三分之一。今年的工作全面整顿企业从实行和完善经济责任制入手。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如何进行规划和工作部署？我国管理体制还要偏重中央集权，哪些事中央管？哪些事地方管？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关于企业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如何分管，以及政企分开如何分法，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搞，分成几种类型，如何实现，分几步走，要搞出来，总之，既要统，又要活。

中央机构改革，只是精减机构和人员。现在的体制改革，要考虑我讲的四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计划，一种是间接计划，还有是中间两种。还有企业的隶属关系如何解决好。

今年内要拿出几个月时间，把苏联的体制研究一下。我们不能把苏联的一套完全撇开。苏联的体制，中间已改革了几次，但是并未改好。最近勃列日涅夫¹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讲了几句真话，认为苏联国民经济计划未完成是僵死的指标造成的，讲了苏联的食品匮乏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认为苏联农业减产，不能只归之于天气。他们已经感到这些矛盾问题，但是不敢动。我们敢不敢动，我们还落后于苏联。我们体制改革的设想，还要从大的方面考虑，只研究东欧国家的还不行。要把苏联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研究清楚，特别要研究他们的生产联合公司及运用经济机制的情况，把整个历史上的改革，包括赫鲁晓夫²时代，并结合东欧的改革，研究清楚。

一是要研究苏联改革的经验，二是要研究我国五十年代的经验，包括三大改造以前的经验。

可以组织一个小组，到苏联大使馆去搞一个时间。要研究苏联如何改

革的，还要突破苏联的一套。这些，只有把苏联体制弄清楚以后再办。苏联有计划经济，也有市场调节，有的搞活了，也有的搞乱了。

由宋平同志负责，计委牵头，组织四至五人，体改办参加，作为我驻苏大使馆的客人，去苏联进行系统的体制改革的调查，决定后写一个报告，给外交部去办。

体制改革工作，一是抓经济责任制，发挥责任制的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把奖金发放等问题也要整顿一下；二是搞一个长远的体制改革方案，以及具体实行步骤。

重庆试点你们搞不搞？沙市也可以。关于企业的调整，关停并转的文件，周太和³同志建议缓一下发，可以再研究一下。

调整、整顿、改革、改造要综合起来研究一下。

今年财政工作总的搞法，要拟出一个眉目来，然后再看明年，近两年怎么办，现在的办法不要轻易动。当前的问题，如要调整财政包干基数，关键是基本建设投资。要不要划给地方包，只要地方包行政费，不包基本建设，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还是把问题弄清楚，搞不清楚就办，问题可能更大。现在财政上的根本问题，是财政困难，有较大的赤字。还不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如何划分的问题。去年财政收入是不错的，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还是要把问题摸清楚，现在财政问题虽有困难，还可以过得去。烟酒专卖和调价，到明年可以增加三、四十亿元，关键问题是现在把物价稳下来，就可以前进一步。

注 释

1. 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 1906-1982)，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苏联元帅。

2. 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 1894-1971)，生于卡利诺夫卡，曾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周太和(1914-2010)，江苏淮阴人。曾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国防工办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顾问。

改进工作作风 提高办事效率*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这是一个好消息。办事拖拉，效率低，几乎成了我们国家机关工作的一个通病。我们主观上都希望把经济建设搞得快一些，但许多部门办起事来却慢吞吞的。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财富。但在我们不少同志的头脑中，对时间的价值往往毫不在意，多一天少一天无所谓。须知在我们国家里，一天创造的国民收入就是十亿元，提供的财政收入就有二点九亿元。许多宝贵财富就在画圈圈、踢皮球中跑掉了。这不仅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消磨人的意志，把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进取精神也搞掉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必须解决体制、机构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解决精神状态、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责任心和主动性、创造性是大不一样的。电力部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建议各部委讨论一下这件事，在当前的机构改革中，切切实实地抓一下改进作风、提高效率的问题，使我们不但有新的机构、新的班子，而且有新的作风、新的面貌，把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一步。

* 这是赵紫阳对《电力部一周之内办妥一件涉及到两部一省的事》简报的批语。

关于国务院一九八二年上半年的工作部署*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根据党中央指示，国务院今年上半年要着重抓好以下四件事：

一、切实抓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工作

机构精简，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中央的已定方针。国务院要把精简机构作为今年上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邓小平同志讲，这是一场革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必须切实搞好，搞到底。这个决心要下。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是也要看到：第一，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第二，要相信广大干部的觉悟。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多年的老干部绝大多数是顾全大局的，我们的党是有战斗力的。只要领导的态度坚定明确，相信群众、相信党，是能够做得好这项工作的。

根据中央书记处一月二十八日会议讨论的精神，做好这件事，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一）改革机构。坚决改变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层次繁多、分工不合理、职责不明确的情况，重叠的要撤销，业务相近的要合并，要大大减少国务院直属机构和部委内部的司局。

（二）配好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真正把部、局两级班子搞精干。每个部配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三人、三至四人，每个司局配正副司局长二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至三人。要向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革命化迈出一大步。为了避免部、局班子成员的年龄过于集中在较高的年龄界限，这次部、局级班子成员要有出有进，不能只从现有班子成员中挑选，必须选拔一些新的、年轻优秀的同志进领导班子。

（三）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从这次开始，使干部的退休、离休制度化。要制定退休办法，规定退休年龄，部长不超过六十五岁，司局长不超过六十岁，女同志不超过五十五岁。这次要强调按退休规定办事，除特别需要的个别人经过上级批准继续任职外，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离休。对退休的同志除个别确有专长、身体又能胜任的可以在协会、学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研究工作外，一般的不要再作安排。不能把各种学会、行业组织也搞老化了，使它们缺乏活力。中央组织部考虑对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按革命年限发给补贴的办法。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问题，也应该按历史问题加以解决。这种办法是人民对老革命干部的功劳给予的荣誉和报酬。

（四）轮训干部。书记处研究认为，这次我们的口号是“精简机构”（或“改革机构”）、“轮训干部”。不提“精减干部”，而是讲对干部进行轮训。我们的事业是要发展的，是需要人才的，安排好干部的轮训非常重要。对那些三十岁至五十岁的比较年轻的同志，要轮训，学业务、学文化。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现在认识了，就要坚持这样做，使这部分同志经过学习，提高业务能力，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中央还决定，这次对各部门的编制只定额不定人，不定谁是编内、谁是编外。多余多少人，抽调多少人轮训，学习后工作，工作一段后又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分别进行考核。采取这个办法，一般干部情绪就稳定了。

另外，凡是部门从其他地方、单位借调的人员，除个别优秀的、属于培养提拔的对象以外，一律回到原单位。

现在，外贸、内贸、水利、电力等部正在试点，进行得比预想的要顺利。除了试点单位外，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领导同志按书记处决定和分工要抓好主管部门的机构改革工作，帮助部委党组酝酿制定领导班子配备方案，特别是一、二把手的配备。工作要做细，但时间一定要抓紧。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已经传达了，要抓紧工作，争取机构合并和领导班子配备在二三月份就要搞出头绪，上半年基本完成。

二、要严肃处理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

这件事中央已有明确方针和具体部署，国务院也曾提出过，这是关系到我们党风政风的大事，到了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陈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决不简单是沿海地区的走私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投机倒把、贪污受贿，还有哄抢国家财产等，都必须严肃加以处理，刹住这股歪风。证据确凿、情节严重的，一定要从严从速依法处理。国务院要带头伸张正义，维护社会主义经济，主动地配合纪委和司法部门搞好这一工作，这是政府的责任。对这件事，关键是要抓，要有人管。今年要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开个头。我们虽然不搞运动，但抓大案要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一抓到底。大案一抓，人心为之一振，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会议决定由杨静仁¹、杜星垣同志具体负责抓这项工作。

三、搞好生产

搞好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政府的中心任务。领导干部的精力放到精简机构上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抓好生产，上半年就要做出成绩来。今年一个月来，全国生产形势是好的。为了进一步安排好工业生产，准备在二月中下旬，以国务院名义召开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主要解决把今年工业生产搞上去的一些关键问题：

（一）今年工业要努力实现“保四争五”的任务。但必须是没有水分的、不徒虚名的增长速度，产品质量要好，成本要低，要适销对路。对那些已经积压很多的产品，如涤卡等，要采用行政和经济手段限产或停产。不要一面大量积压，一面又盲目追求产值，大量生产。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再不能重复了。

（二）要研究怎样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搞上去。重点解决好山西等地的煤炭运输问题和节约能源问题。节能的潜力很大，今年要进一步下功夫抓。现在，一些耗能大的产品，如华东、东北的铁合金还在出口，这是很不划算的，该关停的要关停，该限产的要限产。不能一般号召，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今后国务院抓经济工作，应做到：一是要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有些政策规定不要搞那么死，重大问题要同地方协商解决；二是有些事关系到全局的利益，看准了后，要敢于决定，

决定以后，要坚持到底。要有权威，令行禁止，不能听之任之，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要着重研究和部署企业的整顿问题。今年必须围绕提高经济效益，按照中央二号文件的规定，把整顿企业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抓好，务必抓出成效来，这是我们工业今后能否上得去的一个关键。要统一部署，作好安排。会议开完以后，各部委都要抽调得力干部下去，协助各地抓好企业整顿，结合解决企业的调整和必要的改革问题。必须关停并转的企业也要确定下来。社队企业的调整、整顿问题要搞好，要从改变税收等方面进行一些调节，使它同城市的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竞争。财政部要会同农委、农业部、经委研究一个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这次会议由经委准备，杜星垣、袁宝华同志具体负责。计委、农委、进出口委、机械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综合部门参加。会议作好准备后，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次，然后再开。

四、编制好“六五”计划

国家计委要抓紧时间在上半年编制出“六五”计划草案。计划草案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要注意两点：一要有能源、工业技术改造、消费品工业、科技等方面的专题规划和政策措施；二要有今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重大项目，把建设的骨架子定下来，主要是能源、交通方面的项目，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设想。五月份要拿出草案报国务院讨论审定。七月以后报书记处、政治局审定后，提请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

注释

1. 杨静仁(1918-2001)，回族，甘肃兰州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发挥城市作用 促进工农业和地区经济发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五日

一、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充分发挥城市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城市，如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沙市等。这次，我们重点了解了常州的经验。常州城市人口三十八万，一九八一年工业总产值达到 4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4%，上缴的税利人均近一千五百元。以一九五二年为基数，三十年来，工业产值每年递增 10.7%，财政收入每年递增 11.7%。人民生活也有相当的改善。全市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四年来新建职工住宅一百二十多万平方米，人平居住面积达到 4.4 平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率、百元产值的成本率等经济指标，在江苏居于前列。常州的经验比较全面，值得我们重视。

常州的经验，过去有许多调查和概括。如说它善于组织“一条龙”大协作，重点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等。其实，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只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不占主导地位。“一条龙”是一条好经验，但也不是它的根本经验。我们认为，常州经验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它的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一条龙”之所以能组织得好，关键就在市委领导有力。没有市委这个“龙头”，“一条龙”是形不成的。常州市委能够从全局出发，

* 这是赵紫阳考察华东鲁、苏、浙、沪四省市与当地负责人和沿途基层干部群众谈话的要点。

把全市的经济工作统起来，统筹安排，集中指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常州有四百多个企业，但市委是有权威的，由市委牵头，能够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企业拧在一起，为着一个统一的目标而协同动作。围绕不同时期生产发展中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他们组织了全市的力量，多次攻克了难关，使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全市的技术力量，可以统一调配；各种资金，可以捆起来统一使用，叫做“吃拼盘”；重要物资由市物资局全行业包干，统一调度，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把企业三天以上的存煤都调出来由市里统一调拨使用。当然，这些都不是无偿平调，而是既有统一安排，又照顾经济利益。在组织措施上，除重大问题由市委拍板外，还设有“一条龙”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集体办公，联合审查，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当机立断。

常州市的集中领导的权威，是建立在善经营、路子对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断地充分地利用原有企业，组织综合生产能力，“滚雪球”式地向前发展。用他们的话说是“桌子上唱大戏”。他们以名牌优质产品为中心，突破地区、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对现有企业充分利用，合理组织，统一规划，积极改造，组织“一条龙”协作生产和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定点协作，配套成龙，从而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和提高了竞争实力。全市现已组织“龙”五条，专业公司九个，总厂十二个，工艺协作中心十一个。而且，横向联系发展到上海，到苏、皖、晋等省。在协作、联合的具体作法上，一是坚持产品归口管理，隶属关系可以不变；二是坚持平等互利，利益均沾，在市场价格不动的情况下，通过内部协作价格来调节主机厂和配件厂的经济利益；三是坚持必要的思想教育和行政干预。经过改组、改造以后，新产品、优质产品不断涌现，现全市共有金质奖商品二个，银质奖商品二个，优质和名牌商品六十个，畅销国内外，经久不衰。在全市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轻纺、电子为主，内外结合，以外为主的经济结构。常州这种立足于现有企业，围绕优质产品就地就近组织专业化协作，使联合、改组、改造紧密结合，是投资少、效益好、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条正确的路子。

在大城市中，上海也有同样的经验。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市虽然也有一些中央部属企业，但市委有权威能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在全市组织

协作、联合，挖掘生产潜力，提高生产水平。这是使上海发展快，经济效益在全国最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常州的经验在许多城市却推不开？汤永安¹同志深有所感地说，在南京，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能力就是抓不住，组织不起来，市委无能为力，不像常州那样一呼百应。原因就在于，在南京市，中央各部、省属各厅局插手管企业多，体制多头，管理分散，厂子的块头大，效益差，工业的组织程度很低，形不成综合的生产力。这在许多市，尤其是省会所在地，是个普遍现象。如在四川，成都市比重庆市的组织水平就差得多，重庆市委有一定的权威调动各个厂，因为重庆市过去是个直辖市，有这个基础。

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总结、研究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步伐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我们认为，上海、常州等地的基本经验，是我们管理城市三十二年来经过曲折、不断探索得来的，它们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投资小、速度快、人民能得到实惠的新路子。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在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全国二百一十六个市的不完全统计（不含市辖县），人口约有一亿二千多万，拥有的工业企业数占全国的24%；职工队伍近二千万，占64%；固定资产原值二千四百多亿，占全国的67%；工业总产值三千二百多亿，占71%；一年上交的税利七百多亿元，占82%。但现在城市的平均经济指标一般要比上海、常州低一至二倍，如果能够通过调整和改革，把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一步，使城市的建设加快，将对整个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起重大的作用。在调整期间，需要通过稳步的改革，把上海、常州等先进城市的经验推开，适当扩大城市管理经济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在组织领导经济中的作用。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城市建设起来的工业摊子是相当大的，问题是条条、块块的分割，不能很好组织起来。从城市来看，它在经济上与外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少受块块观念的束缚，如果说一个省、一个地区可以闭关锁国，搞自成体系，而一个市却比较困难。因此比较容易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在调整、改组、联合、技术改造上打破门户之见，合理地组成综合生产能力。这里的关键是要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一些改革，适当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市，创造条件，让它有

权就地就近组织联合，然后由中央有关部门进行全国性的协调。这可能是使城市经济上得最快的办法。

初步设想：政企分开是改革的方向，目前要逐步过渡，是否可以考虑，中央各部、省属各厅局，不要直接管理企业，主要管规划、协调，管产品、质量标准、技术规程，管情报、科研、服务、监督，管全国性的协作、攻关。这样各部、各厅局没有直属企业这个“亲生儿子”，超脱一些，反而能公正一些，站在全局立场上处理问题。即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由中央直属（如石油、铁路、煤炭、电力、邮电等），但协作、配套、联合方面的权力，也要下放一些归市。对像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要学习上海的经验，把权力下放给市委，天津市可以试行。同时也可以考虑增加几个中央直属市（如重庆）。对中小城市，省的各工业厅局应当大大裁并，不直接管企业，由市里把企业统管起来。可以先选择一两个省会试点。各省可以有条件地增设一部分省辖市。在中小城市，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应加强市经济委员会管理企业的职能。市属工业局可以合并、撤销。一个单位可以多挂几个牌子，应付上面各部和厅局。经委下面直接管厂，管公司，并使公司、总厂逐步成为经济实体。公司、总厂也要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公司以抓经营为主，企业以抓生产为主，这样联合体才有生命力。这些改革设想，要由点到面，总结经验，逐步推行。

二、工业经济责任制问题

去年，从落实财政任务入手，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一下子推开了。现在看来，总的讲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对改变企业面貌，提高管理水平起了推动作用。当然，问题也不少，现在真正搞得比较好的企业，从北京和济南的情况来看，大约只占20%—30%。如果把搞得好的企业，像首都钢铁公司和济南市几个厂的经验，认真加以总结，在其他工厂中推广开来，那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首钢原来管理水平就比较高，去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把全厂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每个班组、个人，才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使改善经营管理变成了广大职工的自觉要求。过去他们也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但那时不能完全落实，搞了经济责任制之

后，由于工人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了，增强了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有了改善管理的积极性，这样原来那一套管理制度才得到落实，并且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首钢的经验和济南同志们讲的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工业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势在必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七九年扩权试点，重点在于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现在实行的经济责任制还要求进一步解决好调动企业内部工人积极性的问题。

实行经济责任制，改变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使人们自觉地关心劳动的成果，这个根本道理在城市和农村是一样的。但是实行起来，工业比农业要复杂得多。农业分工不太细，包产也简单。工业有个长线短线、利大利小的问题，还有配套协作的问题。因此，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要真正搞好，使它健康发展、逐步完善，可能要比农业生产责任制走一段更长的路程。中央二号文件把完善经济责任制作为企业全面整顿的第一个内容，今年要狠狠地抓，下更大的功夫，花更大的气力。实行经济责任制，一要达到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不要盲目追求产值，但必须追求效益；二要做到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关系。增加的利润，国家应当多得。

当前，完善经济责任制，需要研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一定要把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加强计划管理结合起来。去年是从财政任务落实不下去而搞起来的，因此，给人们的印象好像经济责任制就是搞利润包干。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如果只考核利润，就容易产生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偏向，同国家计划脱节，同社会需要脱节。比如生产化纤布利润高，工厂得利多，但生产多了，造成积压，对社会就是浪费。靠价格这个经济杠杆来调节，这在理论上是对的，但目前物价不能随便动，因此必须把利润包干和加强计划管理统一起来。通过实行经济责任制把国家对企业的计划管理加强起来，使企业能够按国家计划生产，按社会需要生产。

第二，一定要把实行经济责任制同加强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在企业内部要层层落实责任制，把责任和利益落实到每个职工，推动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技术改造，而不是离开这些东西，离开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的正道，去片面追求利润，搞歪门邪道。实行经济责任制，把职工的利

益同企业的经营成果挂起钩来，目的是为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更好地挖掘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果。过去我们提出企业内部要搞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以及推广优选法、统筹法，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内在动力，往往搞了一阵，坚持不下去。搞这些东西，工人是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如果职工得不到什么利益，积极性就不能持久，不能成为他们自觉的要求。现在就要有意识地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同改善经营管理，搞好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第三，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生产水平下，职工个人所得不能增加太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对职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把职工个人所得基本稳定在现有水平上，不能增加太多。消费基金占多少，这关系经济的全局。票子发多了，国家没有那么多东西。这几年就业面扩大了，加上奖金和各种补贴、福利，工人实际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农村搞了生产责任制，实行了其它经济政策，农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目前城市里工资级别低而又没有奖金的一部分人生活存在一些困难，需要逐步加以解决。但总的来说消费总额不能增加太多，步子不能迈得太大。今后几年里，在生产发展、职工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基础上，还需要逐年增加一定的积累，用于建设。奖金问题，总原则是在原来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分配。企业留成基金要用于技术改造，改善环境卫生、劳动保护、集体福利、修建宿舍等，还可以贮备一部分，以丰补歉。

关于计件工资问题，纺织部写过一份报告，要求在纺织系统推行岗位工资全额计件的办法。在这个部门实行计件工资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算了一笔账，工资大体上要增加近一倍，这就要慎重从事了。搞计件工资，不仅有条件具备不具备的问题，还有一个工资总额如何控制的问题。这几年职工人数增加很多，许多工厂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搬运工、煤矿井下工等少数工种以外，原则上计件工资在全国目前不再扩大了。已经实行的，要加以整顿，定额要先进，单价要合理。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要停下来。

总之，要使工业经济责任制真正完善起来，还要做很多工作，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要认真研究，努力工作，在今年作出成绩。

三、工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问题

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海市提出的当前技术改造的八个重点，是应该引起所有工业城市注意的。这八个重点是：(1) 围绕发展日用消费品生产，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有重点地更新落后设备，发展品种，提高质量；(2) 以节约能源为中心的技术改造，重点是能源消耗大的电业、冶金和化工，要继续改造中低压发电机组，大力发展集中供热，推广使用沼气；(3) 积极抓好为农业服务的技术改造，着重研究开发适合多种农作物需要的氮磷钾复合肥料、高效低毒的农药和配合饲料；(4) 加快港口、码头和铁路编组站的改造，合理组织分流，改进运输方式；(5) 发展基础原料、材料、基础元器件和基础件，包括金属材料、化工材料、建筑材料、电子元器件和液压件、密封件、轴承等；(6) 机械、仪表工业要为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并从中不断地提高本身的技术水平；(7) 加强科研及测试基础；(8) 开展对“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每个城市，特别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都应该学习上海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拟定本市技术改造的重点，并付诸实行。

进行技术改造，需要机械工业以先进的技术设备，装备各个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有步骤地转移到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来。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机械工业应先行一步，进行自身的技术改造。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其性能、质量、效率和水平，节约能源、原材料和劳动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瞄准五到十年国内外的需要，形成成套的生产能力，增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品种和产量，扩大机电产品的出口。

在目前经济调整时期，一方面机械工业面临着任务不足的严重困难。现在我们钢材积压 2100 万吨，许多机械厂闲着，基建队伍也没多少事干，还照样开工资，照样出管理费。另一方面，许多工厂设备又日益老化。能不能想办法从哪里“启动”一下，有所突破，使工业实现良性循环呢？可以考虑通过国家银行贷一点款，把钢铁材料转供机械厂，机械厂加工成设

备，赊销给所需要的单位，把旧设备换下来。这并不花很多钱，设备就占投资的85%，其它要搞一点土建，投资可由地方或企业自筹解决。这样一搞，积压的钢铁有了出路，废钢铁增多，钢铁比会减少，机械工业活了，冶金工业也带动起来，国家的税利收入增加，工厂的面貌也发生新的变化。这件事今年就要起步，要抓几种产品，抓几个市，抓几个大企业。就是说，要围绕节能，抓锅炉、汽车、变压器、水泵、风机等五种产品；抓上海、天津、北京、沈阳四大市，逐个审定他们的方案，组织实施；抓鞍钢、南化几个大企业的改造。取得经验以后再推广。

技术改造中，要尽量选用国产设备，保护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可适当引进外国的适用的先进技术和某些关键设备。常州、南通、杭州、宁波等地利用一些外资或中国银行的贷款进行技术改造，花钱不多，效果很好。常州利用一美元外资，可以增加12元产值，2.5元税利，搞得快的，一年多就可以收回，银行得息，财政得利，工厂也上去了。看来沿海、沿江城市，有消化能力，多引用一些这种中小额贷款是有好处的，没有大的危险性。

同技术改造有关的，还有一个技术标准问题。我国的技术标准，相当大的部分是沿用苏联五十年代的旧标准，许多已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必须抓紧重新审订，公布施行。

四、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问题

我们国家的经济，是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根本的方针。这次考察，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在编制计划时，如何把中央的直接计划同地区的协作计划更好地衔接起来，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

我国人口多，幅员广，经济、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发展不平衡，经济又很分散，组织程度低，加上统计不准，情报不灵，中央要想通过一个包罗万象而又符合实际的直接计划把经济统起来是不可能的，硬要这样，只能计划和实际两张皮，最后等于无计划。

计划不反映实际是我们工作中一个大问题。比如，年初增长速度订为

4%，年底却搞到7%—8%，这倒是好事，但说明我们的计划准确程度不高。南通市去年23亿元产值，计划只下达15亿元（包括省的），三分之一靠自己找饭；那里烧了50万吨煤，计划供应的只有30万吨，其余是通过协作同山西换来的。计划外很大一块就是地区协作。

现在看，计划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上而下的中央直接计划，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计划和地区协作计划。地区协作计划过去一直没有在全国计划中反映出来。要真正解决计划、实际两张皮，在进行综合平衡的时候，应当包括这一部分。两者综合起来，构成国家的统一计划。

地区协作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调节？看来还是属于计划经济，因为地区协作计划是地方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承认它比不承认好。有许多产品只靠中央调拨是不行的，中央也管不过来。地方之间搞协作，产品进行调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有。广东汕头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订合同，用油换米，不然，汕头地区适于种花生，却不得不种大量番薯解决粮食问题，珠江三角洲适于种稻谷，也不得不种花生解决吃油问题，一协作，这个问题解决了，各自发挥了优势。四川温江地区也和河南协作，用小麦换玉米，解决猪饲料的问题。我们不少地区的协作，是沿海和内地的协作，实际上是“东西对话”，中国资源多在西部，而技术、资金、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内地，出于需要，互通有无，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山西多调一些煤给江苏，江苏多搞一些消费品给山西，大家都有好处。从全局看，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地区协作计划，成了中央直接计划的补充。

承认地区协作计划，可能与中央计划有矛盾，麻烦也会多一点，但可以不断地进行调节来解决矛盾。使这一部分进入国家综合平衡的范围之内，实际是加强了国家计划；若把它排斥在外，反而削弱了国家计划。

这样做，有三种发展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地区协作计划不断扩大，冲击了中央直接计划；第二种可能是中央直接计划不断扩大，地区协作计划不断缩小；第三种可能是两者都有所调整和发展，中央直接计划部分，更加符合价值规律，逐步缩小价格和价值的背离程度；地区协作计划更好地反映中央直接计划的要求，增加统一计划的成份。国家只能管大的，管其中的主要部分，而给地方主动地留出一部分，让地区之间互通有无，弥补

国家计划的不足，发挥地方的优势。这样发展，可能使国家计划不断完善化、合理化。

这样做会不会冲击中央计划呢？只要引导得当，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行政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要通过行政干预，保证实现中央计划的主导作用。为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央手里必须有几个硬东西，例如，一个是有权给地方安排任务，地方非完成不可；一个是牢牢地掌握住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适当调节。税收权一定要掌握在中央手中，否则就会乱。

计委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地区协作计划，帮助各省搭桥，进行综合平衡，不合理的协作可以干预，但又不要统死。把地区协作计划综合到全国计划中去，只能加强而不是削弱对经济的计划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论证，做出合理的决定。

五、坚持实行农副产品收购基数制度问题

浙江省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对茶叶、蚕茧、柑桔、黄麻、木材、毛竹、桐油、糖料、水产、松香、生漆等十四种二类农副产品，分别确定了收购基数，一定几年不变，超产留成或议价收购的办法，一九八一年又对油菜籽的收购确定基数，实践的结果是好的。

比如，茶叶：确定全省收购基数为 110 万担，按同年调拨给指定的国营茶厂的实绩为调拨基数，一定五年，超产部分 60% 由供销社统一收购和调拨，40% 由社队自行处理。结果，一九八〇年收购 135 万担，一九八一年达到 156 万担。

柑桔：一九八一年确定 120 万担基数，一定两年不变，是按重点产区收购 70%、一般产区收购 60% 的购留比例确定的，完成派购任务后，社队可以自行处理，也可以由供销社议购议销和代购代销。过去一年只收购 60 多万担，而一九八一年却收购 149 万担，其中牌价收购 113 万担，议购 36 万担。牌价收购的除去外调后，还平价在杭州市、宁波市等城市供应了一部分，卖完为止。其余的卖议价。

油菜籽：近年来，油菜籽的面积上升很快，浙江全省 1979 年与 1981

年相比，面积由 275 万亩增加到 375 万亩，收购量由 26400 万斤增加到 51000 万斤。为了适当控制油菜的发展，1981 年起省政府规定收购基数为四亿斤，一定三年不变。超过部分，不再加价，按牌价收购，农民也可以自行处理。这个政策下达后，今年油菜籽播种面积下降约 60 万亩，控制了盲目发展。

浙江省对农副产品实行定基数派购的制度，虽然不尽完善，有个别产品也还收购不起来，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体现农业经济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一个好办法。可以说，它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村生产和交换方面必须坚持的两项基本制度。定基数，实际上是一种计划指导。基数以内的，农民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在价格上予以保护；超产部分，要根据社会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紧俏的产品，可以加价；滞销的产品，可以降价，按市场供求情况实行浮动。这个办法，农民是能接受的。台州地区的农民就提出：一要确定基数，二要定得合理，三要几年不变，四要超过计划部分多渠道收购。农民的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倒挂的补贴大量增多，成为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实行这个办法，能体现“三兼顾”的原则，有利于减少国家补贴，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发展生产，也有利于改善城乡关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看来，对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在农村实行派购基数的制度同城市实行定量供应的制度是必须的，互相衔接的。供应城市居民的东西，定量以内的平价，定量以外的，高进高出。菜油目前实行了这个办法，效果是好的。这种办法，看来相当长时期内要实行。浙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

六、在城市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城市都为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作了最大的努力，大多数群众是满意的。但也要看到，现在城市一部分人中间，有一股无名之火，动不动就骂人，有的大城市更严重。虽然，真正不满意的是少数，但这些人有市场，影响不可低估。其中还有个别别有用心分子，唯恐天下不乱。城市有些人不满，固然与物价上涨有关系。

一部分人口多就业少的家庭生活困难，而社会福利和救济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有气。我们的思想教育也配合不够。看来需要在今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在城市普遍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向城市居民全面算一算账，把问题摊开。应该让群众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国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物价涨了多少，国家对城市人民补贴多少，就业增加多少，工资奖金总额增加多少，住宅增加多少，耐用消费品销售增加多少，城市储蓄增加多少，都一笔一笔地摆开算。全国有一本账，从一九七九年到去年，三年共安排回城的、城镇待业青年二千六百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二亿多平方米，国家每年对农副产品销售倒挂的补贴增加到二百多亿元，等等。每个城市也都有一本账，通过事实、数字来说话。存在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比如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教师，集体企业一部分职工实际收入提高不多，甚至有下降。可以让群众公开把意见讲出来，便于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也便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样做，多数群众就会搞清真相，消除误解。我们在宁波市绣衣厂，听一位女党支部书记讲了几句很深刻的话，她说，工人讲，这几年，一是(口袋里)钞票多了，二是物价也涨了，三是算算(口袋里)钞票还是多了，四是人们的要求也高了。工人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如果我们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经济宣传，老工人就不敢讲话，正气树不起来，流言蜚语就有相当大的市场。这项工作应该先找几个城市试点，再全面铺开。

注 释

1. 汤永安(1925-2015)，山东莱西人。时任南京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常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江苏省工交办副主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常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家体改委顾问。

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

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

请找轻工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儿童玩具一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要对儿童玩具一类产品的销售作市场预测，看看消费者究竟需要些什么产品。

最近我的老伴带着外孙，到商场买了一辆儿童三轮车，款式陈旧，质量粗糙，同五十年代的产品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差。这件事使我很有感触。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特别是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成了父母亲的“皇帝”，大人想方设法来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全国的城市有一亿多人口，农村有八亿人口，我们生产一些什么样的消费品来满足城乡儿童的需要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的玩具以及其他儿童消费品，可能主要销在城市，要作调查研究，如何把广大的农村市场也打开来。现在国际上玩具的生产和智力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了，玩具生产变成了一个行业。我们的玩具生产以及其他儿童消费品的生产尽管也发展了，但总的说很不适应社会需要，这件事很值得认真研究。再说，这件事办好了，对回笼货币也有好处。请专门开会研究一下儿童玩具以及儿童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把问题摆出来，产生一个报告，并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请李智盛¹同志向有关方面传达这个意见，并负责督促检查。

* 这是赵紫阳在一次会议上关于重视发展儿童消费品生产的谈话。

有的同志说，生产玩具需要木材，请研究一下，能否少用木材或不用木材，多用些铁皮和塑料。

注 释

1. 李智盛(1925-)，陕西神木人。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研究员，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副主任、副部长。

提高经济效益

搞好企业整顿和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

一

先按这个准备的内容到天津去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中间回京汇报一次。这次会议要突出三个重点。

第一个问题，今年怎样实现一个没有水分的，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生产速度。现在大家的劲头大，产值搞上去，不仅5%，可能5%以上。今年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不注意经济效益的问题上。要避免搞无效劳动，不搞那种不为社会承认和需要的劳动，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万里同志：我们搞经济工作，就要搞经济效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那是硬功夫。年初开这个会很重要，要抓经济效益这个硬功夫。）

化纤布限产怎么样？恐怕要有点硬办法。讲了这么久，一月份仍然生产这么多，一般号召不解决问题，要直接通到厂，生产涤纶混纺布的主要厂要按日上报产量，这件事要立即去做。如果再盲目生产，要追究责任。东北、上海的铁合金要限产，也非这样搞不行。不能把能源、原材料、活劳动、物化劳动消耗了，压在那里卖不出去。

长丝停止进口了没有？总的讲，长丝不是多了，而是突然一下子进口太多，国内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能否采取简单的办法，通知海关，停止进口。要采取断然措施，看准了的，没有一个硬办法是刹不住的。进出口委和有关部门赶快研究一下，哪一些东西现在不能再进。

* 这是赵紫阳等在听取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准备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年度计划应该根据产销情况进行调整。如涤纶混纺布首先要坚决限制生产。限多少，请计委、经委、纺织部很快研究，落实到厂。其次要积极疏通渠道，扩大化纤布的销售。但愿是个大畅销的形势。第三，从总的趋势来看应逐步降价，但不急于去降。一年之内两次大幅度降价，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搞不好造成人们的观望心理。

第二个问题，把能源、交通的生产、调运、节约安排好，使今年的工作有所前进。

第三个问题，企业整顿问题。今年企业整顿怎么抓法，文件都有了，在提问题时要更突出一些，做出具体部署。

这次工交会议一定要解决问题，已经有了政策规定的和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不要拿到会上去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抓落实、抓具体。

关于政策问题，总的是要稳定、完善，不会有大的变动。包干、扩大自主权、所得税等都要稳定。必须改和能够改的，搞几条，在会上议一议，经过修改报国务院审批。例如社队企业纳税，除个别产品外，按统一税率纳税，不能优待，否则就挤垮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万里同志：不能保护落后。）

关于关停并转问题。体制改革办公室搞了一个调整文件，还不成熟，可以先到会议上讨论。对关停并转，总的还要搞，一些同志说，上半年事情比较多，强调过分会引起一些问题。是否作为企业整顿的一个内容，不单发文件。

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要扶正压邪，敢于同错误的思想、行为和歪风邪气作斗争。（谷牧同志：要有点斗争性，一般说不行。）（万里同志：给正气撑撑腰。）

现在有必要在城市里认真进行一次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在城市里，好多问题我们没有讲清楚，有些人有点无名之火，动不动就骂人，还很有市场。我们要讲清楚给人民干了一些什么事，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三大爱（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三小爱（爱企业、爱集体、爱本职工作）的教育，贯彻落实陈云同志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使多数人把真相弄清楚了。宣传工作的重点应该是正确进行经济工作的宣传，认真抓一下。城市究竟怎么样？很多同志有点灰溜

溜地，好像对不起人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三中全会以来，党给人民办的事，任何时期都比不上。六百万人就业，国家一年补贴几百个亿，宿舍盖了多少，工资、奖金的提高，要摆开来讲，每家都要算账。

经济工作的宣传报导，要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致起来。新华社对冒尖户宣传要注意，不要再宣传了，在农村没有普遍意义。一年靠什么搞一万元，有些是投机倒把来的，在城市有很大的副作用。顺便打个招呼，请人民日报、新华社注意，对冒尖户不要宣传了，特别是万元户。我国农业发展极不平衡，逐步富起来的地方，农民手中的钱多了，要提倡首先把钱用到发展生产、改善住房条件等上面去。对极个别的冒尖户、农民坐飞机旅游、进城吃烤鸭等一类事情，不要再广为宣传，防止引起副作用。（万里同志：对老干部安排的宣传也要注意，不然老工人有意见。全国发展很不平衡，要照顾全局。）

二

关于工业企业的调整、改组、联合问题。我去常州的时候，建议采取广东清远县的办法。常州的经验很好，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常州没有中央企业，没有省属企业。社会主义大协作，“一条龙”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市委说话算数。常州经验的精华，是能组织协作。现在，常州的工业书记调到南京，他说，我到南京就毫无办法，很多看得到、摸得着的生产力，就是组织不起来。南京真正搞活，不得了，一个南京可以变五个南京。因此，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两种工业城市：一种是上海，权力很大，不管什么企业都能调得动，都能组织起来。第二种是中等城市，如常州、无锡、沙市、襄樊等，事实证明，这些城市搞成功了。但省会就不好搞，哪一个省会搞得好了？重庆就比成都好。成都，都是山头，都要插手。陈丕显同志在湖北增加了几个省辖市，就好搞了。地辖市都不大好搞起来，干预太多。城市组织联合、协作，是很大的生产力，但现行体制限制太大。上海和中央体制并无什么矛盾，统一管理企业。能不能再试一个天津？扩大它的自主权。

三

关于技术改造问题。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特别是鞍钢等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机械部门、科研部门和使用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如何改造。利用国内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很重要，要把国内已有的先进技术好好用起来。二汽就是以“聚宝”为主，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像鞍钢这样的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定下来以后，由冶金、机械部门组织去搞，尽可能采用我们已有的先进技术，不要各搞各的。

关于技术攻关问题，会上要集中讲讲。今年技术攻关从什么地方开始，每个部门还有企业如何组织攻关，要把这个课题突出出来。工业部门的科研单位，要坚持以应用技术研究为主，积极为生产服务。各个部门、各个企业要围绕技术改造、节能等，组织攻关，明确任务，提出课题。没有任务、课题，很难组织攻关。计委、经委、机械委、科委，要在一起好好研究一下攻关怎么搞，从今年内开始着手搞起来。

关于有偿技术转让和打破封锁问题，这次能不能订几条，在会议上征求意见。要订出几条打破封锁的办法。例如，到外地择优购买设备，任何人无权干涉。现在机械工业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样才有了服务态度，才有质量，才有新产品。现在封锁严重极了，有的地区用行政命令，不许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有的省规定，谁买他的汽车就供油，银行就贷款。应该规定，谁也无权这样搞，这样搞是犯法的。要保护竞争，这样，调整改组才有可能。这些问题，光讲道理不行，还要有硬性规定，行政办法。我不相信，实行了财政包干，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国务院是中央政府，要有明确态度，银行贷款一律不能支持搞封锁。（万里同志：在报上公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不能搞地区封锁。经济上一方面要进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办法，这次你们要议几条。

打击走私贩私

继续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我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广东、福建两省几年来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广东、福建两省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方向都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要继续坚持，不断总结，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前进。

第二点，要进一步认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现在揭露的材料，已经令人触目惊心，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特别是要看到对党、对干部队伍的腐蚀相当严重，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毒化相当严重。

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如此严重，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的有利条件，对外坚持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必须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不能因为实行开放政策，就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能因为看到这一点，就对已定方针发生动摇。要清醒地充分地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长期性，并认真对待。只有这样，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也才能取得成功。对此，既要有充分的信心，也决不要掉以轻心，更不能昏昏然，糊里糊涂，那样肯定会招致严重后果。

^{*} 这是赵紫阳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次会议的重大收获，是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进一步提到了全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第三点，坚决地把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进行下去，搞到底。

无论广东还是福建，领导上都要继续以大的力气抓好这件事。通过斗争，一则打击犯罪活动，一则教育干部。要通过办案子，揭露材料，使广大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虽然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教育干部。要坚决地搞下去，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能“水过鸭背”。

打击走私贩私、惩治贪污受贿，总的精神应当是坚决一些，严厉一些，必要时还要开杀戒。当然，要搞准，不能多杀人。但是，对这个问题不采取坚决、严厉的态度，就制止不下来，而且会越来越陷入积重难返的境地。我估计，受贿问题广东会相当严重。为什么这样讲？从国内发生的问题看就可以说明。我这次去浙江，宁波地委书记郑重地向我提出，他说，现在不搞点关系户根本办不了事情。如果不搞，我们的社队企业都要垮，搞不到原材料，货运不出去，产品销不出去。这些问题谁也觉得不对，但谁也不得不这样搞。一个企业不这么搞，马上产品就销不出去，来不了原料、材料。据反映，现在下面到北京一些单位来办事，要是不送东西也难办成。香港、澳门反映，跟一些国人打交道，就要给东西。广东同外商打交道的人相当多，收东西的面也会相当大。开始是占点小便宜，沾了边不改，就会越陷越深，愈演愈烈。现在如不下决心转过来，发展下去，我看至多三年就无法收拾。如果这些问题刹不住，精神文明搞不起来。不反对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提倡不起来。

我赞成不搞运动，抓大案、要案，而且重点是内部。但是，下一步如何解决？要通盘考虑。这场斗争不只是办几个大案，更重要的是通过办案教育干部。今后要加强立法，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要研究制定一整套监督、检举、检察、处置的条例、办法。如果只是办几个案子就结束，现状不会有多大改变。干部在一定的的时候要洗手洗澡，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贪污受贿的财物全部退出来，并保证以后不再干了。不仅广东、福建，全国都要这样做，要有全盘布局。

现在需要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惩治走私贩私、贪污、行贿受贿的条例，加以公布，从严执行。不要只看到面大、人多的一面，而且要看到另一面。

人民对这些东西是极为不满的，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将会大大增加全国人民搞四化的信心。要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并认真坚持执行，使我们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中自己不腐化，党不变质。今年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件深得人心的大事抓好：一个是进行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一个是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严肃处理经济方面的重大犯罪案件，那么就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人民的精神会为之一振，社会的风尚会为之一变，国外对我们也会有一个新的看法。

第四点，陈云同志讲，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两省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目前也是要认真学习总结经验。两省成绩是主要的，总的说，已确定的方针政策今后要坚持；当前主要应总结经验，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对某些不适当的规定、办法也要作一些调整。这样做，正是为了使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好地、更健康地实行。经过总结，认识统一了，政策界限更明确了，管理跟上了，也就为采取进一步灵活、特殊的政策措施作了准备。不是说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已经够了，还有不够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总结一下，使干部头脑清醒一下，把工作跟上去，这样会搞得更好。本来有些还可以开放的，但现在还不能搞，就是因为干部水平跟不上，管理跟不上。所以当前一个时期要集中抓一下总结经验。

有些什么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你们还要留下来谈。上午姚依林同志讲的我同意。

（一）关于计划管理问题。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也好，灵活措施也好，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搞好综合平衡。当然，计划工作要注意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

（二）进口消费品向内地省份倾销、高价抢购外省农副产品出口问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

（三）统一对外问题。现在两省的一些县社企业都可以对外发生经济贸易关系，一些港澳商人同县社企业直接挂钩，这就为走私行贿、投机倒把、腐蚀干部制造了温床。两省既然实行特殊政策，对外适当分权是可以的，但像现在这样多头对外，放得太多是会发生混乱的。还是要适当集中，统一对外。应研究一些措施，制止这方面的混乱现象。此外，对地方留成外汇的使用，也必须加强统一管理。

（四）物价和货币投放问题，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农副产品议价太多，怎么转过来？我认为，要开好县委书记会议，准备一场大争论。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搞起来不容易，放开容易；放了以后就不好收。我估计，没有一场大的争论收不回来。二是奖金不控制不行，要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

（五）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当然，两省可以搞快一点。但是，看来两省的力量用于技术改造少了，用于搞新摊子多了。基本建设规模在全国要调整压缩，广东、福建不同一点，但也要适当控制，量力而行。如果要求过高过急，也容易助长下面乱搞。

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省委认真调查、研究。

厂长必须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和实践经验^{*}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八日

燕山石化总公司原向阳化工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李力¹同志对新颁布的厂长条例提的几点意见值得重视，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常务会议并全国工交会议参阅。

李力同志特别提出，对于国家的骨干企业来说，厂长必须实际上具有大学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实践经验，副职只设一人，这是他多年来当厂长的经验，切中企业的时弊。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利于改变我们企业的落后面貌，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然，厂长条例刚刚颁布，不必急于修改。我意可在企业整顿中，先选少数企业试行。根据试行效果，再作考虑。

注 释

1. 李力(1921-2006)，锡伯族，辽宁沈阳人。时任北京燕山石化向阳化工厂厂长、党委书记。曾任沈阳化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化工部合成材料处处长。

* 这是赵紫阳对李力来信的批语。

关于组建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批语和指示

一九八一年七月至一九八二年二月

一、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在上海高桥炼油厂《组织联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报告上批示：“必须直接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着手第二个，第三个。”同年十一月，成立了我国首家特大型跨行业石化企业——上海高桥化工公司。

二、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对联合石化、化工、纺织等部门的企业新成立的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做出指示：“公司一成立，就已经实现了联合。石油化工总公司是联合的产物，要发挥联合的优势，使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和经济效益有比较明显的增长。”¹

注释

1. 石油化工管理体制改革，牵动条条块块的利益，方方面面议论纷纷，很多人赞成，也有些人不赞成。1982年2月19日赵紫阳对于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四个部委《关于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报告》做出明确指示，对原来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等部门主管的炼油厂、石油化工厂和化纤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筹规划，对产供销，人财物、内外贸实行统一管理。198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正式成立。李人俊任党组书记、董事长，陈锦华任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该公司的成立，对于用好一亿吨石油，搞好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打破了条块分割，改组改造石化企业，实现石化企业的联合，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让文明礼貌成为全民行之久远的风俗习惯*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全民文明礼貌月从三月一日起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都来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干部在这项活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国人民通过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努力改变我国的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的面貌，清除环境脏、秩序乱、不讲礼貌的现象，使它变得清洁，有秩序，所有的市民和各方面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要讲礼貌。城市首先要这样做，乡村也要逐步跟上来。

全国城乡都来讲清洁卫生，讲文明礼貌，就能增进健康，振奋精神，整顿公共秩序，加强团结互助，减少混乱现象，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社会风气。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目标，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对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

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做事从来就讲“认真”两字。我们决定开展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和扎扎实实地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都要根据当地具体条件，订出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从切实易行、人人做得到和人人应该做的事情着手，做好组织工作，深入进行督促检查，使文明礼貌月的活动取得明显的成效。

* 这是赵紫阳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始时的讲话。

我们立志改革，一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在全国开展了“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五讲四美”活动。这是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活动得到了各族各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今后，我们要把这项活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要做到有计划，有目标，有组织，有措施。从今年开始，我们年年都要举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逐年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使它成为我们全国人民的一项行之久远、功效卓著的风俗习惯。

我们中国素来以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著称。在过去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以讲清洁，讲秩序，讲礼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扬。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

让我们大家动员起来，人人讲清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清洁美丽、团结友爱、繁荣昌盛！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

各位委员：

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工作，是举国瞩目的一件大事。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以后，两个多月来，这项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好。现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国务院精简机构的方案和进展情况

现在，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安定团结的局面日益巩固，政府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条件也已成熟。抓紧做好这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一结束，国务院根据这次大会决议的精神，在对政府各项工作做出全面安排的同时，立即有步骤地着手进行国务院和所属各部、委的机构改革。中共中央对此作了

* 这是赵紫阳就任国务院总理以后，首次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所作的报告。这是在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破坏后，国务院为适应新形势需要进行的首次重大机构改革，从而揭开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序幕，为政府系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精简机构、提高效能，搞好宏观调控，促进职能转变，准确发挥政府功能，打下了基础。阅读本文，要和阅读他《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和三项议案的说明》（见本书第463页）以及《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见本书第453页）等文结合起来，以便全面了解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有关情况。

明确的原则指示，胡耀邦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经过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反复研究，经过多方面地听取意见和充分酝酿，现在精简国务院机构的总体方案已经初步拟定。各部、委的精简工作，正在积极而又深入细致地全面展开。先行一步的十二个单位，在机构设置、部局两级领导人选和机关人员编制等方面，已经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国务院机构的改革，首先必须改进国务院本身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以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因此，我们建议，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现有副总理十三人，减为二人。国务委员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级，一部分兼任部长或委员会主任，一部分为专职委员。他们受总理或国务院常务会议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和重要的专项任务，在对外事务中经总理委托可代表总理进行重要活动。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国务院的日常领导工作机构，在总理主持下，负责对国务院职权范围内的各项重要工作进行领导和决策。

国务院各部、委和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机构的设置，必须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机构精干，提高工作效率。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拟将现有的九十八个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裁减、合并为五十二个左右。其中，部、委由五十二个裁并为三十九个，直属机构由四十一个裁并为十个，办公机构由五个裁并为三个。此外，国务院现在还有临时性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委员会等各种非常设机构四十五个，这些机构绝大部分都要撤销，其工作由各有关部、委承担。国务院和各部、委的机构精简之后，工作人员编制约为三万二千人，比现在的四万九千人减少三分之一左右。

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后，国务院第一位的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特别是搞好战略性的长期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日常经济活动的指挥必须集中统一，目前领导多头、管理分散的状况必须改变，为此决定重新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并扩大其职权和业务范围。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农业、工业、基本建设、铁路交通、财政金融、

内外贸易各部门当年经济技术活动中需要组织协调的事项，统一由国家经委负责。国家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由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实施。撤销现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和国务院财贸小组，它们主管的业务一部分由重新组建的国家经委负责，一部分划归有关的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会同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提出重大的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组织协调科学技术力量进行攻关；科学技术规划和生产技术工作分别划归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办公室合并，统一管理国防工业的科研试验和生产工作。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各部、委行动很快，第一批先行一步的十二个单位已经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的方案，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组建商业部的方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方案，都已经分别酝酿成熟。国务院管理供销合作事业的行政机构同商业部合并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这个群众组织仍然对内对外开展必要的活动。保持部的建制不动的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已经分别提出了内部机构精简方案。裁并部、委的方案和新的部长人选经这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后，就可以立即付诸实施，按新的建制开始工作了。

从以上十二个单位的改革方案来看，机构臃肿、领导班子老化和人浮于事的状况，将有很大的改变。这些单位精简后，部级单位由十二个减到六个；部内的司、局级行政机构由一百八十个减到一百一十二个；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由原有的八千六百九十三人，减到五千八百六十四人，减少百分之三十三。变化最大的是部、局两级领导班子精干了，副职大大减少了。部长、副部长原有一百一十七人，现在配备二十七人，减少百分之七十七。正副司、局长原有六百一十七人，现在配备三百零四人，减少百分之五十一。

这些单位精简后，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将由六十四岁降到五十七岁；司、局级干部的平均年龄，将由五十九岁降到五十三岁。大学文化程度的干部，在部级领导班子中，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一提高

到百分之四十八；在司、局一级，将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新提拔的领导干部，有部长二人，副部长五人，正副司、局长五十七人。这些情况表明，在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方面，向前迈进了可喜的一步。

在机构改革中，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许多老同志认为，我们这次主动地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搞好新老干部的交替，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为子孙后代立个榜样，定个规矩，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许多老同志高高兴兴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满腔热忱地推荐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们说得好，退是为了进，个人退下来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定将更好地前进。许多老同志在主动申请退休离休或退居二线以后，为了把机构改革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他们仍然为国操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思考种种方案，物色优秀人选，认真负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这种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忠心耿耿的高尚品德，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许多中、青年干部表示，一定要很好地向老同志学习，谦虚谨慎，努力工作，接好革命的班。我们的干部队伍，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培养教育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这支队伍，胸怀全局，不谋私利，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们以革命事业为重的高度觉悟，是机构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两个多月来，尽管机构改革的任务很重，牵涉面很大，但它没有引起任何纷扰或业务的停顿，政府的各项实际工作都一直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国家是稳定的，全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是好的。这充分表明，经过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强有力的拨乱反正措施，政治秩序已经稳定，政治生活已经正常。这也充分表明，关于改革政府机构的决策深得全国的人心，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项重大改革。那种畏难的情绪，悲观的情绪，无所作为的情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国外有些幸灾乐祸的人评论说，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改革。这种预言只能以彻底破产告终。

二、基本方针和几项主要工作

我们国家政府机构的改革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总结经验，乘胜前进。

今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机构改革问题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但这是一场对于机构、体制的革命，而不是对于人的革命。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十分重要的。目前，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职责不清、效率很低的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进行这场革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充分贯彻，官僚主义严重和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真正克服，那样，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用革命的精神来进行这场重大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我们的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决心要大，工作要细。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心，同时要稳步前进，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国务院前一段的机构改革工作，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今后，我们还要这样做。

国务院认为，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和前一段的实践，在机构改革中，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工作，重点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首先明确各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任务和职责范围。通过这次机构改革，一定要坚决改变那种分工不合理、职责不分明状况。只能因事用人，决不能因人设事。一个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许多机构；一级机构可以办的，就不要设几级机构；一个人可以办的，就不要配备几个人。每个机构，每个人，负什么责，办什么事，都要有个章程。第一批先行单位的精简工作，就是从认真讨论机构的职责范围入手的，今后各单位也都要这样做。机构精简之后，还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各部门上下左右之间的工作关系。举例来说，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关系，国务院各部、委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所属厅、局之间的关系，行政组织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机构怎样才能更好地管理企业事业单位并为它们服务，这些问题都要一一研究清楚，订出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过去种种互相扯皮、互相推诿和无人负责的现象，固然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

但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职责不清、分工不明造成的。我们只有认真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为人民办事。

第二，选贤任能，配备和建设好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国务院各部、委，关键是配备好部、委和司、局两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精干，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部的正副职配备三至五人，司、局的正副职配备二至三人。部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五岁；副部长和正副司、局长的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考虑到干部的现状和工作的交替需要有一个过程，经过上级批准，个别的年龄可以大一些，作为一定时期的过渡。配备领导班子，不能只从现有成员中挑选，必须注意选拔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干部。要注意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以及近几年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撤下去。

第三，认真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的工作。从这次开始，要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使干部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这件事制度化。我们的国家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批的老同志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在建国以后为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这批老同志为中坚，为骨干，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了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三十多年来，我们所以能够战胜许多风浪，克服许多困难，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同我们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分不开的。我们要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继往开来，必须继续依靠这支队伍，并且有秩序、有步骤地解决好新老干部的接替问题。国务院各部、委都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要退休离休，各单位要认真负责地把这件事安排好。老干部退休离休之后，主要的任务是继续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写好写完自己的革命历史，教育青年一代，并尽可能采取适合于自己条件的方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基本政治待遇不变，对在生活上和医疗上确有困难的同志，物质待遇略为从优。这样做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除了退休离休的以外，有些老干部身体还好，有比较丰富的领

导经验和专业知识，但因年龄或名额的限制，没有进入领导班子，退到了第二线。这些老干部，有的可以担负一定职责的顾问，有的可以参加一定的调查研究、参谋咨询和检查监督工作，有的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科学教育文化活动或多种社会公益活动。总之，这些都要一一落实，使所有退休离休和退居二线的老干部，都能各得其所。

第四，切实加强干部的轮训工作，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建设。建国初期曾经着重进行过这项工作，但是后来中断了，吃了很大的亏，是一个严重的失策。现在必须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下决心，花本钱，进行智力投资。目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过多，其中许多人又没有认真钻研和精通专业，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大多数人毕竟已经有了相当的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能够继续在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这对我们在精简机构以后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因此，这次精简，各部门编制只定额不定人，不定谁是编内、谁是编外。只要有条件学习的，都要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轮流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种本领。学习一段再工作，工作一段又去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中分别进行考核，从中陆续选拔优秀干部到更需要更适当的重要岗位上去。我们的事业在发展中，迫切需要各种具有新的专业知识的人才。干部轮训搞好了，干部才干增长了，我们的事业肯定会发展得更好更快，由此而产生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国务院认为，坚决执行上述基本方针，认真做好上述主要工作，机构改革肯定会健康地向前发展。机构精简了，工作效率必将有所提高，但要真正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我们不仅要革臃肿的机构的命，而且还要革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的命，革形形色色官僚主义作风的命。如前所说，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深刻的革命，是要改革国家行政机构中那些同经济、文化、政法等各项建设需要不相适应的部分，而不是革什么人的命。为了更好地解决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建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主任，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今后我们在各项改革中不

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阻力，都要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去克服它们，努力把国务院建设成为机构精干、工作效能高、密切联系群众、很少官僚主义习气的政权组织。

三、提请批准和任免的事项

(一) 提请原则批准国务院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批准增设国务委员；批准将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组建水利电力部，将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组建商业部，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

(二) 提请批准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兼主任。

(三) 提请任命钱正英¹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刘毅²为商业部部长，陈慕华为对外贸易部部长，秦仲达³为化学工业部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仍由高扬文⁴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仍由郝建秀⁵担任。

(三) 提请免去李鹏⁶的电力工业部部长职务，钱正英的水利部部长职务，王磊的商业部部长职务，牛荫冠⁷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职务，赵辛初⁸的粮食部部长职务，谷牧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郑拓彬的对外贸易部部长职务，陈慕华的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职务，孙敬文⁹的化学工业部部长职务。

各位委员：

我们政府机构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现在只是开了一个头。就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来说，第一批已经提出精简方案的单位，待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方案付诸实施，还要继续做大量的工作。尚未提出精简方案的单位，待方案确定后，将由国务院分批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在精简工作中，一定要确保工作、精简两不误，决不允许发生松懈、脱节和混乱现象，决不允许贻误工作，影响生产。各省、市、自治区政府的机构改革，除个别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在适当时机进行试点外，一律从明年开始。总之，我们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把机构改革工作做好，不断地完善政府工作制度，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政府机构的工作作风和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我的报告完了。请各位委员审议。

注 释

1. 钱正英(1923-),浙江嘉兴人。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曾任水利部副部长、部长,电力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刘毅(1930-),山东乳山人。时任商业部部长。曾任山东省财贸办主任,商业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

3. 秦仲达(1923-),山东荣成人。时任化工部部长。曾任大连化工厂厂长,化工部生产办主任,燃化部生产组组长。

4. 高扬文(1917-2004),山东蓬莱人。时任煤炭部部长。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国家能源委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5. 郝建秀(1935-),山东青岛人。时任纺织部部长。曾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青岛市委副书记,纺织部副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6. 李鹏(1928-),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时任电力部部长。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7. 牛荫冠(1919-1992),山西兴县人。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曾任江西省政府副主席,商业部副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

8. 赵辛初(1915-1991),湖北黄梅人。时任粮食部部长。曾任湖北黄冈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副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9. 孙敬文(1916-1998),河北黄骅人。时任化工部部长。曾任城建部、石油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石化部副部长、部长、顾问,全国人大常委。

围绕提高经济效益 做好工业交通和整个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三月四日

这次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搞好今年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交流了经验，研究了措施。大家反映，这次会议抓得早，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中心比较突出，开得是好的，对今年的工交工作将会有很大推动。现在讲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提高经济效益问题

全国工业生产在去年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今年一开始又有新的进展。从一、二月份的情况看，势头是好的。看来，今年实现“保四争五”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今年的危险，主要不是能不能增长4%或5%的问题，而是可能发生不注意经济效益的问题。据反映，目前层层加码、压产值指标的情况还是不少的。中央提出今年“保四争五”，已经考虑到各省的计划增长速度，列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但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下达指标时，又不顾条件层层加码。大家想把产值搞多一些，把增长速度搞快一些，这是无可非议的。在调整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能认为速度越低越好。问题在于要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我们要努力实现效益又好、产值增长又快的目标，这样的速度高一些当然

* 这是赵紫阳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好。如果只追求产值，不顾效益，这样的“速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如搞扎实一点好，以免务虚名，受实害。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忽视产值，而是忽视效益。一些地方和单位在增加产值上劲头很大，对提高经济效益却重视不够，或者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国务院认为，当前有必要强调端正工业生产上的指导思想，就是说，要讲求经济效益，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速度。不仅工业生产上是这样，在基本建设、流通领域，以至整个经济工作中，都有个端正指导思想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工业生产上不顾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增长，办了很多蠢事。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产值的水分相当大，浪费十分严重，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去年虽然水分比过去少了一些，但是许多地方在第四季度上得很猛，也带来一些问题。各省都要对去年速度中的水分计算一下，使头脑清醒。盲目追求产值增长的结果，势必造成大量物资积压。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1年末商业部门库存超储积压的主要产品有58种。有些产品从局部看，增产是有利的，但从全局看，就恰恰相反。像华东、东北等地本来能源就十分紧张，有些地方却大量超计划生产铁合金等耗能高的产品出口，使华东、东北电网能源供应，不得不靠“寅吃卯粮”超负荷发电来维持。这样下去，不仅使比例失调加剧，而且必然会重复发生过去那种“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现象，最后还得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如果说过去没有经验，做一点蠢事难以避免；那末，现在应当学得聪明一些，绝不能继续干过去那种蠢事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注意经济效益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我们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挖潜力，求速度。去年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提出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其核心就是提高经济效益。既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针，我们在行动上就要体现这一方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今年我们一定要在提高经济效益上有个大的转变，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我们讲经济效益，首先应当明确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要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是讲要尽可能地节约，使活劳动和物质的消耗尽量减少；后半句是讲要创造出

更多的社会财富，在这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只是讲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还不行，这个提法不能体现经济效益。如果产品不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得越多，浪费就越大。所以，我们生产的产品，包括质量、花色、品种，也包括一定的数量极限，必须符合社会需要，适销对路。这种需要，是现实的需要，是适合于现实投资水平和购买力水平的需要。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有生产的需要，有生活消费的需要，对两大部类的产品都有要求。社会需要是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不断地变化的，各个阶段各有不同的需要，各个地区也各有其特殊的需要。不论生产高中档产品，还是生产大路货，都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只有产品符合社会的需要，才能使它的劳动消耗得到社会的承认，才能使它的价值和使用权得以实现，不致成为无效的劳动，成为无用的东西。

我们的计划，应当从全局出发，瞻前顾后，尽可能地反映社会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不适销对路，就谈不上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恰恰忽视了这个根本点，因而发生许多问题。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很好地研究社会需要，不断地满足社会需要，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这个指导思想，必须牢固地树立起来。全党搞经济工作，应当在尽量节约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上下功夫，在符合社会需要上下功夫，努力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难度相当大。符合社会需要为什么不容易做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认识上的限制。社会需要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的，特别是事先不容易看得那么清楚，往往是在市场发生商品脱销的时候才知道缺，在仓库里积压得满满的时候才感到多。这就需要及时了解社会需要，了解市场的变化和趋势，改进和提高计划工作水平。另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关系问题。我们要给企业以一定的利益，也要承认和照顾地方一定的利益。不承认这种利益就会吃“大锅饭”，大家都可以不负责任；但给了一定的利益，部门、地区、企业就容易按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部门、地区、企业的决策有些是符合社会需要的，

有些是和社会需要背道而驰的。有些产品，明明同社会需要对不上号，还要照常生产，工厂可以照拿利润，地方可以多得分成，商业部门、物资部门收购起来积压在仓库里也不着急，因为到最后要由国家的财政包起来。这样，产值中的虚假现象就长期存在而得不到解决。因此，提高经济效益，除了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以外，从根本上来讲，牵涉到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问题，要靠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体制来解决，否则没有出路。但是，我们也不能等经济体制改革好了，经济结构调整好了，再来行动。在当前体制不合理、结构不合理、价格不合理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充分发挥领导的作用，就是说要加强计划指导和行政干预，加强监督和检查。各级计委、经委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发现积压的情况要负责查清，进行具体分析和认真处理。凡是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只是由于流通环节上的问题而积压下来的，要积极加强推销工作，特别是要打开农村的销路，有的还要打开国际市场的销路；对那些明明社会不需要的产品，从全局看属于不合理的产品，就要采用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坚决实行行政干预，不要怕得罪人。有些产品，的确生产过多了，就要限制生产。有些产品一时短缺，也不要一哄而上。我们讲经济效益，不仅要看到眼前的、局部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长远的、全局的效益。为了使生产的产品符合社会需要，除了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计划，采取行政干预和经济措施外，必须加强市场预测，改进计划工作。同时要尽快制定、公布产品的经济技术标准和建厂标准，严格执行，以制止盲目建厂、盲目生产。

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做出成效，这是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新考验。

关于当前的工业交通工作，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是能源、交通问题。我讲三点：第一，煤炭部、铁道部、交通部要进一步作出努力，把煤炭生产搞好，把调拨和运输搞好。今年头两个月煤炭生产情况是不错的，运输也是好的。但按计划调拨执行得比较差，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扭转这种状况。第二，各地要按照能源供应情况安排生产，对工业生产增长速度的要求，应同当地的能源供应求得平衡，否则就会落空。现在有些地方自己提

出很高的指标，然后又要求国家多调煤炭，这是办不到的。第三，能源供应当前不可能再增加，出路主要靠节约，要千方百计在节约能源上想办法，不如此矛盾无法解决。

二、关于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和全国一盘棋的问题

陈云同志最近对经济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建设必须是全国一盘棋；必须执行“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根本方针。同时还指出，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这些都是经济建设中的重大方针、原则问题，是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指示，同我们在经济工作上近几年所采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是一致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计划指导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这些改革，就没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这是首先必须肯定的。但是，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上述几项原则。这也是我们党多年来坚持的根本方针和政策，不能放弃和削弱。现在，我们既要看到开放、搞活所取得的成绩的一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开放和搞活以后，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敢于利用目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对已定的正确方针发生动摇；同时又必须足够地看到带来的问题，不能熟视无睹，放任不管。我们现在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强调全国一盘棋，也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头脑清醒，采取措施，防止和解决出现的问题，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为了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知识以及能够为我所用的资金引进来，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然开放，总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坏东西、坏影响。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活动会在某些地方和单位泛滥起来，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腐

朽思想会侵蚀我们党的肌体，干部队伍中某些意志薄弱者可能被“糖衣炮弹”所击中，党风、民风可能被污染。我们党曾经有过几次在实行新的重要政策和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的时候，提出要警惕被资本主义腐蚀的问题。一次是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当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克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走出去，打开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同时，党中央明确指出，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防止党内发生问题。那一次我们搞得很好，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大大发展了我们的力量，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我们党没有被腐化，反而变得更加坚强。第二次是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由农村进入城市，面对花花世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接着又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那时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状况非常好，经受住了考验。这一次我们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又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在国内国外，特别是国际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影响，比前两次大得多，也严重得多。而且，由于经过十年动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损害。所以，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及时向全党提出警惕被资本主义腐蚀的问题，敲起警钟，清醒头脑，振奋精神，坚定意志，经受住这个考验。

现在，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这些东西对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的腐蚀相当严重，对整个社会风尚的毒化相当厉害，如不从现在开始立即开展坚决的斗争，再过两三年，在某些地区就会积重难返，无法收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和对内实行搞活经济政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突出表现。同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在新时期内整个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的。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们国家兴旺还是衰败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我们要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提高我们搞好这场斗争的自觉性。如果对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不给予坚决有力的打击，不只物质文明的建设必将受到

很大破坏，而且精神文明的建设也根本提倡不起来。现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又搞“文明礼貌月”活动，群众讲，这样搞好，有希望了。经济战线各单位，一定要把这一斗争坚决进行到底，决不能走过场。当然，我们进行这场斗争，不采取搞运动的办法，而是采取办案的办法，特别是要抓一些重大案件的处理。这一斗争要结合企业的全面整顿、财务大检查来进行。要通过整顿和检查，发现线索，加强调查，查清问题，严肃处理，打击犯罪分子，教育广大干部。同时，要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使犯罪分子无空子可钻。这样做，就会对改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起到推动作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经济领域中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近来有所滋长。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又一重要问题。我们在国内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对地方下放部分权力，对企业扩大自主权，是为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振兴我国国民经济。扩权、搞活以后，也容易产生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削弱和摆脱国家的统一计划，干扰和分割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影响全国一盘棋。有些地方和单位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观察和处理问题，而是从局部、从自己的利益上打算盘。对上，不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损大公肥小私；对左邻右舍，以邻为壑，损他人以利自己；对外，不执行统一对外、联合对外的政策，自相倾轧，肥水落到了外人田。比如，现在不管社会需要，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盲目建设、盲目生产的现象还不少。有些地方，统购派购任务也被冲掉了。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比较严重，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我们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国内市场，决不能搞成一个省一个市场。如果那样搞，对我们国家政治上、经济上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又如在对外贸易上，地区、部门、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互相拆台的现象比较突出，已蒙受到不少损失。这样互相拆台，结果地方、企业得小利，而国家受大害。

为了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必须坚持大计划、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摆正全国一盘棋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对那些错误做法，国家就是要干预，要令行禁止，决不能各搞一套。

（一）在对外贸易上一定要坚持统一对外、联合对外。在扩大地方、

部门的某些外贸权限以后，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多头对外、竞相削价的错误做法。在外贸上适当扩大地方权力，这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切实解决同类产品联合对外销售的问题。要以主要口岸为中心，组织同类产品出口的联营，加强协调，加强管理。特别是沿海九省市，按地区扩大外贸权力后，更要加强同类产品的联合对外，切实防止在外贸上自成体系的倾向，以免割断传统的、历史的协作关系。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必要的办法，以中心城市、主要口岸为依托，加强协调和联合。

（二）国家计划调拨的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必须严格按计划执行。不得扣留自用，或拿去搞协作，议价出售。

（三）坚决纠正地区之间搞经济封锁。凡是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合格产品，按国家计划定点生产的产品，除按计划调拨的以外，允许在全国销售，企业有权自行选购，各地党政机关不得干预。如有违反，企业有权抵制。要关心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适合由当地生产的产品，要从技术、设备等方面给以支援和帮助，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有更大的发展。

（四）物价和税收管理制度必须集中统一。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地方、部门、单位都不得擅自变动税率，自行减税或加税。凡属国家物价管理权限范围内的产品价格，不经国务院批准，不准擅自提价或降价。

陈云同志讲，当前经济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总结经验。我看不仅特区，也不仅广东、福建两省，全国都有个认真总结经验的问题。国内搞活经济的一些改革，外贸体制上的一些改革，都需要回顾和总结，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解决出现的问题，以便使经济体制改革健康地深入地开展下去。比如企业扩大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必须坚持的，但确实有个利润如何分配的问题，如何做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兼顾，国家得多少，企业得多少，个人分多少，采取什么分配形式较为恰当等，都要认真研究。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也要相应跟上去。对地方适当分一些权是必要的，但应研究怎样避免块块之间搞封闭式经济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不使它影响全国经济上必要的集中统一，影响全国一盘棋。外贸体制一方面应注意如何发挥各级各单位的积极性，一方面又要防止在外商面前，自己同自己竞争，挖自己的墙脚，这也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总之，对外坚持开放政策，对内坚持搞活经济的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对存在的问题要重视，经验教训要总结。这样做，正是为了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

关于改革问题，初步的打算是：

（一）已经实行的经济政策今年总的不变，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处理经济利益的政策上，国家对企业，国家、企业对个人，大体稳定在去年国家规定的做法和水平上，但个别单位存在极不合理现象的，要作适当调整。

（二）今年还要考虑明年怎么办的的问题。要通过总结经验，提出对已实行的政策、措施明年如何补充、完善和调整的意见。看来大致有二种情况：一种是方向对、效果好的，就坚持。另一种是方向也是对的，但有某些副作用，只要管理跟上去就能解决的，应继续实行，加强管理，使它巩固和完善；如果根本方向是对的，但在相当时期内管理工作不可能跟上去，副作用还不能消除，这种情况就要作适当调整。再一种是政策措施不恰当的，明年要适当改正。不管怎么改，总的精神是把加强集中统一和搞活经济结合起来，在全国一盘棋原则和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

（三）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三、关于企业的全面整顿和企业的调整问题

要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下功夫把企业整顿好。否则，一切工作都没有基础。关于整顿的目的、要求、方针、政策，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作了明确规定。我再着重说几点：

（一）今年第一批整顿的，要选择那些问题比较多、潜力大、急迫需要整顿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好的企业不要占很多，问题多的要先整顿。这些企业整顿好了，经济效益可以很快提高。有些企业领导班子强、基础工作好，由他们自己搞，或者放后一点搞。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确定的企业整顿的名单要重新调整一下。

（二）要重点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配备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从国务院

这次机构改革的情况看，调整充实企业领导班子的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搞得精干有力一些。中央机关一改，对企业会有很大推动。企业里人才很多，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熟悉业务、德才兼备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有人在，应选拔一批进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能够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方面大进一步，有个明显的变化。为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次整顿中，选配企业的正副经理、正副厂长，应该有一个年龄限制。除了像鞍山钢铁公司这样的特大型企业，或者像中国船舶公司这样的全国性公司以外，正副经理、厂长应尽量配备五十岁以下的，最多不超过五十五岁。党委书记、职工代表大会负责人年纪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有些同志在企业里不到退休年龄，身体还好，可以退到二线，做参谋、顾问、咨询工作。有的同志建议大型骨干企业要选相当于大学程度的、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同志当厂长，这个意见好。有的企业如果选大学程度的人当厂长有困难，至少也要选具有中专程度的，或自学成才的。在这次整顿中把企业领导班子配好，企业的面貌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三）认真实行定员定额和职工轮训。这次机构改革以后，中央机关的大批干部都要组织学习、轮训。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事。在这次整顿企业中，随着经济责任制的落实，也要下决心把多余的职工调出来学习，坚持搞下去，几年后我们整个职工队伍的水平就会发生变化。把多余的人都泡在车间、班组里，弊病很多，一定要改。各地要努力创造这方面的经验。

（四）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全面整顿企业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各级经委和工业交通各部、各厅局要具体抓，蹲点组要真正蹲下去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今年暂不进行机构改革，以便集中精力做好企业的整顿和其它各项工作。中央各部也要有专人负责，不要因为机构的变动而影响工作。要求有关各部立即开会研究，制定规划，派出蹲点组。国家经委要检查督促。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搞两三年整顿，把企业的各项基础工作做好，达到中央的要求，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个企业调整问题。关停并转那些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耗能很多、长期亏损的工业企业，制止盲目地新办工业企业，这是

提高社会综合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结构合理化、工业布局合理化的一项积极措施。考虑到今年要重点进行企业整顿，又要处理经济违法案件，还要实行机构改革，工作量很大。因此，1982年企业调整的工作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首先是关停那些耗能特别高的冶金厂、化工厂，产品质量很差的机械厂、电子厂，经济效益很低的炼油厂，以及同先进企业争原材料、燃料、动力的某些县社工业企业。还要组织力量对企业摸底排队，制订调整企业的规划和关停企业的具体处理办法，为明年有计划地开展这一工作做好准备。

同时，还要注意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好企业的技术改造。在目前经济调整时期，一方面许多机械厂任务严重不足，而两千多万吨钢材却存放在仓库里，基建队伍也没有多少事干，还照样开工资，出管理费；另一方面工厂设备又日益老化，有些已到了非更新不可的地步。能不能想办法从哪里“启动”一下，使各方面都活动起来呢？可以考虑通过卖方信贷的形式，由银行贷一笔款给机械厂，把钢材转给它们，由它们加工成效能高的新设备，卖给需要的单位，把效能差、耗能高的旧设备换下来。这并不要花很多钱，因为进行技术改造，在一般情况下，设备就占投资的85%左右，其它还要搞一点土建，费用不多，可由地方或企业自筹解决。这样一搞，积压的钢材有了出路，机械工业活了，可供回炉冶炼的废钢铁增多，冶金工业也带动起来，国家的税利收入将要增加，工厂的技术装备水平也会发生新变化。第二汽车制造厂去年试行这个办法，效果良好。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今年就要起步。要围绕节约能源来进行，首先抓锅炉、汽车、变压器、水泵、风机等几种重要产品和一些基础元器件的改造。要抓好鞍山钢铁公司、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大企业的技术改造，取得经验再行推广。

四、关于财政问题

1981年由于贯彻前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抓了调整，财政情况比预计的好。财政收入完成年计划的102.8%，收支相抵，财政赤字比向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报告的27亿元还少。但是，财政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今年的财政预算还列有赤字30亿元。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形

势好的一面，又要看到今年财政上有潜在危险的一面。如果不能实现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增大，势必增发货币，影响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今年总的精神是要巩固稳定经济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稳步前进。无论如何不能在经济初步稳定以后就掉以轻心，把潜伏着的危险重新激化起来。因此，中央和国务院要求，要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继续保持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解决财政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努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搞好增收节支。除了已经部署的要继续大力发展消费品生产，改变重工业服务方向，认真整顿企业等以外，还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稳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现在货币投放多，各种补贴多，财政负担很重。1981年国家对30多种商品补贴达到320亿元，其中80%以上是和农副产品的价格有关。这两年农副产品虽然提价很少，但加价、议价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农副产品的实际收购价格仍在步步上升。解决这个问题，总的来讲，政策要稳定，但超过政策界限、突出不合理的，应加以调整。要参照浙江等地的做法，确定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基数；原来放弃了这个办法的地方，应当把它恢复起来。有些新产区到今年已过了三年，明年要考虑重新确定合理的征购任务或征购所占的比重。对超购加价、议价，也要予以整顿和控制。

（二）奖金的发放要加以控制。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今年大体稳定在去年水平上，重点放在解决发放中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使奖金真正发挥作用。乱发奖金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三）严肃财政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堵塞跑冒滴漏。现在不少企业乱摊成本、偷漏税款、截留上缴利润等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年初进行的财务大检查收效不错，应继续进行。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四）基本建设投资一定要控制。现在列入计划的属于财政支出的基本建设，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但用自筹资金、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搞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已经相当大。这里面问题不少，各省、市、自治区

要检查一下，有些项目效益很差，该停的要停下来；该继续进行的，要研究怎样把资金用好。再一个问题是，有些地方自己设立投资信托公司，拉走银行存款去搞建设。总的看，钱就是那么多，你这边搞了投资信托公司，他那边银行的存款就少了，实质上是把本来一部分用于流动资金的贷款，转向了基本建设，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现在重申，除了由国务院批准和委托有关部门批准的投资信托公司外，所有投资信托公司都交给银行。筹集、使用资金的任务一律交由银行办理，不能脱离银行另搞一套。总的讲，现在我们的整个经济形势已经走出“锅底”，但潜在的危险并未根本消除，宁可把问题估计得重一些，绝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

五、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題

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加强。多年来我们的政治机关忙于搞运动，如何做好经济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经验。我们应当下功夫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根据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同职工思想实际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真正解决问题。这次会议讨论了怎样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介绍了大庆油田加强职工队伍建设的经验，天津碱厂通过学习厂史和中国近代史，开展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这些都比较生动，比较实际，具有说服力。我们要通过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坚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根本指导方针和原则，在职工思想上扎根，在工作中落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城市都为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了最大的努力，大多数群众是满意的。当前城市人民的思想状况总的说是稳定的、向上的。也要看到，现在城市里有少数人还不大满意，有一些牢骚。看来有必要在今年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在城市普遍进行一次生动的经济形势的教育。要通过这一教育，向城市居民全面地算一算账，让广大群众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国家是在什么情况下来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物价涨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多少，

国家对城市人民补贴多少，就业增加多少，工资奖金总额增加多少，职工住宅增加多少，耐用消费品销售增加多少，城市储蓄增加多少，都一笔一笔地摆开算算。全国有一本账，从1979年到1981年三年：安排回城的、城镇的待业青年2600万人；新建城市职工和居民住宅2.2亿平方米；国家每年对农副产品销售价格的补贴增加到200多亿元。职工工资总额1981年比1978年增加251亿元，增长44%；职工年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14元，增加到1981年的772元，增长25.7%，等等。每个城市、每个企业、每个单位也都有这样一本账，要通过事实、数字来说话。对存在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比如党政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教师，集体企业一部分职工，实际收入提高不多，甚至有所下降。可以让群众公开地把意见讲出来，便于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也便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从上海、辽宁、徐州等地进行教育的结果看，这样做，大多数群众会明白真相，消除误解，感到党和国家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人民谋福利。上海第二织布厂通过算账，原来一谈生活问题就有牢骚怨气的职工，也变得心平气顺，干活有劲了。宁波市绣服厂一位党支部书记，她讲了几句很深刻、很客观的话。她说，工人讲，这几年，一是口袋里钞票多了，二是物价也涨了，三是收入支出仔细算算，还是口袋里钞票多了，四是青年人的要求也高了。工人群众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认真进行经济形势教育，正气就能更好地树起来，流言蜚语就没有市场。

通过经济形势的教育，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引导人民群众，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树立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思想。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各方面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生活的改善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实现，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是不对的，不能实现的。在生活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类比，也不能同盛产石油的国家或某些靠加工繁荣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类比。为了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了使全体人民达到“小康”的水平进而过更富裕的生活，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这就需要认真落实“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人民生活需要逐步改善，但也有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投入建设，不断扩大再生产，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只讲生活

享受，分光吃光，不搞建设，富裕的生活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我们要通过教育，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建设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目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我们深信，今年经过打击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加上经济形势的教育，人们的精神就会大振，社会的风尚也会大为好转。

关于抽纱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谷牧、慕华、拓彬同志：

陈云同志的批示和潘彤¹等同志的来信及陈云同志 1973 年对抽纱出口的谈话，请你们找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解决办法。

对目前抽纱出口多头对外和收购库存积压问题，我同意：一、发许可证；二、不够自营条件的口岸，不经营这项业务；三、由总公司负责，组织口岸协调小组，加强管理，有仲裁权。至于是否划为一类商品，收上来由总公司统一经营，请你们研究提出意见。

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紫阳

三月十六日

注 释

1. 潘彤，时任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抽纱处处长。

* 这是赵紫阳就陈云对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抽纱处来信的批示和 1973 年关于抽纱出口的谈话写的批语。

技术改造是振兴机械工业的重大步骤^{*}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

今日我又把机械工业技改的文件看了一遍，感到很好。特别是首批改造，抓三十个产品、一百个厂、三百个协作厂及科研设计单位，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将由此入手而逐步展开，这是十分正确的部署。可以说是向着振兴机械工业进军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对整个机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希望机械委（未交接前）、一机、四机部继续抓紧组织落实。

昨天国务院常务会议似有几点还未明确起来：（一）首批改造单位提高折旧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原则同意，可以同财政部一起，逐个厂子解决（有些厂自有资金多的，也可暂不提高）；（二）对首批改造的科研、设计单位，或改造花钱多而对本单位受益不大的企业，可以从机械行业折旧费上缴国家经委的部分中拨出专款解决；（三）机械行业的研究、发展费用，国家要逐年增加一些，增加的费用，集中用于首批改造单位的新产品研制上。

如你们同意，可附在昨日上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纪要上。

^{*} 这是赵紫阳关于机械工业技术改造问题写给薄一波、吕东和万里、姚依林、袁宝华、财政部谢明的一封信。

有重点地建设山西特大型煤矿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请将山西煤管局副总工程师徐成山的来信摘要印发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经委、计委、煤炭部、城乡建设部、技术经济中心参阅。我认为徐成山同志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早出煤，多出煤，我们在如何开发山西煤矿的问题上，一方面要抓紧对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并在老矿区新建、扩建一些中小型矿井。这样投资小，工期短，出煤快。这一方针必须坚持。同时，应根据山西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地质精查储量，有步骤、有重点地建设浅部特大矿井或露天煤矿。从西曲矿井的施工经验看，在四年左右即可开始早期生产，五六年左右即可建成。当然有些大矿也可以采用一次设计，分期建设的办法。来信中提到的西曲矿井的施工经验等，值得重视，煤炭部和有关部门要加以总结。

^{*} 这是赵紫阳对山西煤炭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徐成山来信的批语。

对当前财政和银行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今年要继续做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赤字不能超过三十亿元。目前财政、经济情况是好的。但是，要实现今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财经纪律大检查和抓经济大案这些有利条件，大力组织收入；同时，要制止乱开减收增支的口子。财经检查要很好地抓下去，第一要查彻底，第二要争取多收回。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我们的企业，现在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违法户、严重违法户，要将这个名称叫出来，我们的政策不能使违法户占便宜，使守法户吃亏。今后应当始终坚持这个原则。目前较突出的问题是，各方面对控制财政支出有所放松，新冒出的问题和要求追加的支出比较多，这对财政平衡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今年财政平衡的关键，还在于控制开支。同意批转财政部《关于严格财政管理，制止乱开减收增支口子的报告》。

关于增加税收、银行工作人员的问题，此事要抓紧，发个文件，规定两条：一是招收条件，二是限定招收期限。

二、今后财政必须再筹集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必须的重点建设。可以研究如何想办法把分散在部门和地方的钱，集中几十亿元，比如三十亿，一是搞煤炭交通方面的建设，二是搞原来已经进口的一些成套设备项目的建设。现在住宅的建设固然还是要搞的，但不能搞得太多。近几年每年竣工八千万平方米，国家可以少搞一点，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去搞。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汇报后的讲话要点。

三、要综合研究外汇的使用问题。去年我们的外贸是顺差。现在一方面中国银行及外贸外汇低息存在外国银行不用，另一方面国内建设又大量借用外国人的高利贷款。其原因是，借用外资可以免税，而用国家自己的外汇资金，却得不到这种照顾。从一个部门、一个企业来看，借用外国人的钱，尽管是高利贷，也比用自己国家的外汇合算。但从国家这个全局来看就不利了。我国的财政资金不足，可是外汇是顺差，而又不利用，这不是正常现象。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情况看，有少量外汇逆差是正常的；外汇顺差多了，不好。现在首先要考虑，用自己的外汇提前偿还外国的高利贷款，力求今年内还完。我们自己的企业，欠自己国家银行的债，总比背外国的高利贷要好。这条原则定了后，就决心去办，办得越早越快越好。中国银行的外汇还贷款后，剩余的部分还可以用一部分来搞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的建设，也可以用来支持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另外，对国际黄金市场趋势，也要进行预测，注意行情变化，价格低的时候，也可买一点黄金。外汇的使用问题，要统盘研究。由计委牵头，组织财政、银行、外贸以及经济研究单位进行研究，提出解决办法。

四、要少发票子，必须坚持第一控制开支，第二控制投放的原则。除用外汇搞点必要的建设项目外，基建规模一定要严加控制。为此，就要控制银行贷款。还要研究进口一些不排挤国内生产，而市场需要的原料性的产品，如生产复合肥料的原料，还有糖和木材等。这样既可以减少外汇顺差，又可回笼人民币。

控制货币投放的措施，一方面是要压缩和减少滞销商品的生产 and 收购，一方面是积极组织商品的推销。今年的商品销售额增长不快，主要不是供不应求，而是有些商品质量下降，或者是货不对路。要研究商品结构问题。有些商品在城市滞销，到农村可能就销出去了，甚至是畅销商品。现在的一大问题，还是销售渠道不通，主要是商品下不了乡。商业部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作为今年的重要工作来抓，要采取有力措施，光开会不行，要做具体的组织工作，大力推销。新闻宣传部门也要密切配合，推广一些好的经验。

流动资金的使用，也要加以控制。明确规定，生产无销路的产品不给贷款，销路不好的产品减少贷款，减少收购。农村议价、加价农副产品的

收购也要控制，超过国家收购计划的产品，国家可以少收，也可以不收。浙江省对这一条执行得坚决，他们那里油菜籽的生产基本上控制住了。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暂时看是刺激了生产，到头来反而会起破坏生产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对新产区可以把基数适当提高一些。对老产区的原则是既不伤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超计划收购的产品也作必要的控制。

关于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

一、国家体改委要组织各经济研究机构、各经济管理单位有经验的干部来共同进行工作。北京有几十个研究所，可组织各方面经济学家、专家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少数人到体改委来是需要的，大部分应和研究单位建立固定的协作关系。各地体制改革的“种子”，可以暂时不调。调人要以经济研究人员为主，要从研究单位选人，搞实际工作的人员不要太多。应有研究能力。搞研究工作的也要有点实际，理论与实际要结合。

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的人员可以互相兼一下，下面各组人员也可以兼任。经济研究中心要四个同志都可以调来。经济研究和技术经济研究两个中心属于社会组织性质，顾问可以用聘请的办法。

二、体制改革归根到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二是条条与块块即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的关系问题。其它问题都可围绕这两个问题来研究。第一个问题更带根本性，条条、块块问题实际上也和计划与市场问题有联系。所以体制改革问题，在我国归根结底是要搞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不能说计委拟定计划体制改革的方案，由体改委将其纳入总体规划中，这样不确切。体制改革要把计委、经委组织起来一起搞。一起搞经济体制改规划，也就是以计划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

* 这是赵紫阳召集薄一波、杜星垣、薛暮桥、马洪、安志文、周太和等研究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谈话要点。

三、对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或四种模式：

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情况有多少差异，基本上是市场经济；二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模式，两国虽然有不同，但都不用指令性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杠杆来进行计划调节；三是苏联模式，它的改革，主要是使计划指标体系合理化和更多地利用物质原则；四是我们自己如何使计划和市场结合，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苏联是实行指令性计划，用计划体系来控制，我们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也可以说是计划体制改革。

陈云同志讲过，计划经济为主，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他去年在杭州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计划经济，同时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在去年人代大会上讲过三句话：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当然这种设想是长远的，当前还是第一步需要研究。

川大一位经济学者(陈力)提出能否把企业分类，我和陈云同志谈过。陈云同志说，他从来没有说过把什么产品都纳入国家计划。我提出可以把企业分四类：一类是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二类是市场调节，按市场变化的需要进行生产；还有两类企业，一类是大部分按国家计划生产，小部分由企业按市场需要自行组织生产；另一类是大部分由企业按照市场变化组织生产，小部分按国家计划进行生产。这种分类是改革的第一步，还是长远的，还待深入研究。

四、必须研究我国五十年代的经济管理经验。在三大改造以前，为什么经济管理又统又活，研究一下，直接计划占多少，间接计划占多少？当时，个体农民是汪洋大海，城市集体和个体经营仍占相当比重，计划管理很有效，并未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国按产品计划，不到50%。苏联计划经济也有改革，匈牙利也不是完全搞市场经济。要研究苏联、匈牙利和我国自己的经验。

五、改革的总体设计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可以是分步骤地改革，同时要考虑同步配套。根据今天的调查研究和对过去的经验总结，搞出一个设想目标，也不一定是最终目标。同时根据两年改革的结果，提出明年需要改些什么。

你们提出的成立体改委的意见，先把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主要人员名单，以及当前工作安排两个意见修改一下，提出报告。至于工作任务与各部委关系还可以研究修改。总之，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计划与市场，一个是条条与块块。过去曾说过要打破条条块块的束缚，要把企业从部门和地区分割管理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现在来看各企业要完全摆脱行政部门管理还相当远，这个问题未解决前，就有一个管理经济的部门原则和地区原则如何结合的问题。苏联赫鲁晓夫看出苏联经济管理缺乏横向联系的弊病，因此搞经济区，除军工部门，其它经济管理部门都撤销了，结果地区的联系加强了，专业削弱了，地方主义发展了，比条条的危害更大，发生了问题。以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搞得比较稳，保留了地方一定的分权，加强和恢复了专业管理部门，比如中央集中的财政收入，赫鲁晓夫改革前占80%，赫改后只占40%，现在占60%，但仍面临改革前的矛盾，现在又在搞共同体，这些经验都值得研究。

归口部门不一定直接管企业，纺织部的经验值得研究，中央部只管方针政策，规划、计划、技术经济指标、标准化等，搞得较好。轻工部也是这样，不过管的行业比较复杂一些。上个月在天津开会时，曾约广东李建安¹、江苏汪冰石²等座谈，他们认为中央归口部不要直接管企业，省也不管，由中心城市来管。除了有些部门，如电力、石油、造船等，可以搞全国性的托拉斯外，很多部都可不直接管企业，这个路子如果走得通，才可以发挥大、中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要总结现有的经济管理经验。不可能设想中央部都取消。部可以管企业，但不是都直接管企业。要总结纺织部的经验。

体改委机构设置、人员编制需要调进人员，我同意。你们去同有关部门协商，办理手续，房子及行政事务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办理。

注释

1. 李建安(1922-1993), 河南遂平人。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曾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省经委主任、省计委主任、省顾委副主任。

2. 汪冰石(1918-2003), 安徽怀远人。时任江苏省副省长。曾任南京市委地方工业部部长, 南京汽车厂党委书记, 江苏省经委副主任, 徐州市委第一书记, 南京市委第一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关于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 及借用外债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二十日

第一，稳定经济；第二，在不影响稳定的前提下，可以稍有赤字，一年有三十亿元赤字没多大关系。物价要涨一点，没有什么可怕。这就是边缘政策，不一定绝对平衡。

我认为长期计划打点赤字也不要紧。现在有赤字，年度努力结果可能没有赤字。

现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话讲多了。过去占那么高是剥削农民的结果。三中全会以来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十五年的欠账，不能再回过头来，说分配政策发生了错误，走一步否定一步。当然，我也讲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紧一点。

赤字我讲过了，打一点没什么问题。对农民，想紧一点，又怕农民不满。城市不满，农民再不满，那就不好了。农民用柴油，可以定量，定基数，以后再买到市场去买。这样简单易行，农民也可以接受。

总之，我们国家每年保留点赤字，外贸上有些逆差，借一点外债。这三条都在可能承受的基础上，使经济能稳定的基础上。这三条对我们有利，否则不利。当然，过头不行，要很谨慎。

总的是计委这个盘子。二千亿元之外加二百亿元。一能源，二交通，三搞活企业。一面解决“六五”速度，一面解决与“七五”衔接。总盘子按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六五”计划时的发言要点。

计委的定。讨论中提的问题，计委再去研究。农村问题，还要谨慎一下，不要一下子搞急了。农产品问题，可以从农民打点主意，但不能搞多了。（万里：棉花、油料、烟叶搞基数，我同意。）今后控制不能那么增了，过去已经拿的，不要轻易动。

很大的潜力，还是两个。第一，企业好好抓整顿，效益还会提高的，这个靠得住。第二，在几年内，分配关系，指公有的，需要有一个变化，企业利润留成不能搞那么多，地方也要打紧一点。国家应当多掌握一点，用于重点建设，小的少搞一点。大的不上去，小的搞起来也没用。不仅财政，银行也如此。

一是提高效益；一是从企业、地方挤一点，银行挤一点；再是利用外资。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九日

一、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

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仍然是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一）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同第三世界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正义事业。中国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可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我们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共同斗争。我们坚决支持“七十七国集团”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做的努力。

（二）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认为世界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争夺的态势是苏攻美守，所以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苏联出兵捷克，特别是出兵侵占阿富汗，支持越南出兵侵柬，并加紧在波斯湾、印度洋争夺，咄咄逼人。中国之所以把反对霸权主义的重点指向苏联，是因为它到处采取攻势，打着国际主义和支持第三世界人民斗争的招牌，自命为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具有欺骗性。中国侧重反对苏霸，

* 这是赵紫阳会见几内亚比绍外宾时的谈话。

绝不是认为美国不是霸权主义，也不是不反美霸。中国既反苏霸，也反美霸。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有原则的，独立自主的。美国仍在搞霸权主义，如在南部非洲，美国一直支持南非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广大非洲国家相对立；在中东，美国顽固地支持以色列，与阿拉伯人民为敌；在拉美，它支持反动独裁政权，压制广大人民的反帝民族民主运动；在朝鲜，它拒不从南朝鲜撤军，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中国，美国实际上坚持搞霸权主义，直到现在仍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其在太平洋上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中国在反对苏霸的同时，也反对美霸，不管美国在哪里搞霸权，我们都坚决反对，对所有受美霸之害的国家我们都支持。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采取团结的政策，决不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制造分裂，中国也不以某个国家对苏态度如何来排队。中国不反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接受苏联援助，只要有可能，他们从苏联得到一些援助，也是好的。我们决不因此而对他们抱偏见或嫌弃，决不把他们视为亲苏国家。但我们根据自己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愿意提醒朋友们在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不要上当，因为苏联在给你援助时往往是别有用心。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它们的地位和处境不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美国，需要苏联的一些援助，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有些国家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把美国视为斗争的主要敌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是支持的。但是，要注意前门拒狼后门防虎。国际斗争历史上这种教训是很多的。

（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同几内亚比绍一样，都面临着严重、艰巨的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世界和平能否维护，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所以我们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二、关于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

我国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上解决了十亿

人民的温饱问题。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基本上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同我国人民所付出的劳动是不相称的。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过一些较大的挫折：一个是五十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总结经济上遭受挫折的教训，就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政策上过激。建设上的过急，使摊子铺得过大，超出了我们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一进一退，损失很大，也耽误了时间，由主动变为被动。政策上的过激，往往挫伤人民的积极性。结束十年动乱后，一九七八年又犯了些错误。这是由于看到十年动乱，经济停滞不前，急于把经济搞上去，摊子又铺得过大，引进技术设备也过多，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货币投放量过多，物价上涨，使我国出现潜在的危险。所以不得不从一九八〇年起进行经济调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百分之三十。采取这些坚决的调整措施后，去年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基本上消灭了财政赤字，稳定了物价，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了下来。从今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开始回升，脱离了危险期，重新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在开始执行调整政策时，干部和人民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都看清楚调整的方针是正确的。

我们在调整时期，除压缩基本建设外，在政策上作了适当的放宽，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以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过去搞得过死。现在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行允许全民、集体、个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存在的经济体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但过去搞得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影响工厂、农村的积极性。现在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发挥基层单位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国家统一计划与生产单位的自主权结合起来。这些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但在组织起来后，统得过死，分配上长期搞平均主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劳动报酬没有同他们的劳动成果紧密地

结合起来。这几年推行了小组或个人生产责任制，即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采取了小组或个人承包制，使小组和个人的劳动报酬同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既发挥了集体的优势，又调动了小组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进展情况 和三项议案的说明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各位委员：

自从二月下旬召开的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以后，机构改革工作在国务院各部、委全面展开，取得了新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上，国务院向这次会议提出了三项议案。现将情况说明如下，请予审议。

这两个月，我们集中力量抓了国务院各部、委的机构设置和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因为只有把这两个问题首先解决好，才能实现机构改革的各项要求，保证各项工作有秩序地进行。经过这一段的紧张工作，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务院各部、委的组建工作，并且提出了新的领导人选。进展得比较快的部、委，它们所属的司、局机构及其领导人选也已确定。其他部、委的司、局机构和领导人选，在五月份内基本上可以定下来。总起来看，进展是很顺利的。原来设想到的一些难点，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先行一步的部、委所取得的试点经验，对工作的全面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在上次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曾经建议减少副总理，设国务委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作为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集体领导机构。上次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现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审慎的研究，我提议：由万里、姚依林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继续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任命余秋里、耿飚¹、方毅、谷牧、康世恩²、陈慕华、薄一波、姬鹏飞³、黄华⁴、张劲夫为国务委员，其中，耿飚继续兼任国防部长，方毅继续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黄华继续兼任外交部长，张劲夫兼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陈慕华兼任对

外经济贸易部长，已由人大常委会上次会议批准。国务院秘书长由杜星垣继续担任。原副总理杨静仁、张爱萍⁵分别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担负着负责工作，不再提名他们担任国务委员。过去国务院副总理人数过多，经过这次调整，副总理由十三人减为二人。至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人员，原有十五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必要的，人数并不多，现在仍保持十四人，应该说是恰当的。

国务院原有五十二个部、委，经过这次机构改革，裁减合并为三十九个，加上上次已经批准设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这次提议设立的广播电视部，总共设置四十一个部、委。

关于部、委一级机构的变动问题，我已向这次会议提出了专门的议案。由于裁减合并而组成的新的部、委，在议案中都讲了，还有几个建制不动而改了名字的部，这里说明一下。原地质部增加了矿产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的任务，改名为地质矿产部。原第二机械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部，原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航空工业部，原第五机械工业部改为兵器工业部，原第七机械工业部改为航天工业部，这几个部过去用的是代号，现在看来不必再这样做了。

在四十一个部、委中，有七个部、委的部长、主任人选已由上次会议确定；有十一个部、委的部长、主任没有变动，除了前面已经讲到的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外交部、国防部的部长以外，还有财政部长仍由王丙乾⁶担任，公安部长仍由赵苍璧⁷担任，地质矿产部长仍由孙大光⁸担任，邮电部长仍由文敏生⁹担任，航空工业部长仍由莫文祥¹⁰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仍由李梦华¹¹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仍由杨静仁担任。对其余二十三个部、委的新的部长、主任人选，我已向这次会议提出了请求任命的建议。上次已任命并公布了六个部的副部长，其余三十五个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人选，将由国务院任命并公布。

经过这次机构改革，据三十八个部、委的统计，除兼职的部长、主任以外，共有正副部长、正副主任一百六十七人，比原有的五百零五人减少三百三十八人，减少百分之六十七；他们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八岁，比原来减少六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原来占百分之三十七，现在提高到了百分之五十二。据二十八个部、委的统计，原设有司、局机构七百二十

个，现在减少到四百八十八个，减少百分之三十二；正副司局长原有二千四百五十人，现在减少到一千三百九十八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三；他们的平均年龄原来是五十九岁，现在减少到五十四岁；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干部原来占百分之三十六，现在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九。

各位委员：

现在，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的组建和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从机构改革的第一步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从机构改革最终要达到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来说，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因此，我们还要本着革命的精神，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必须进一步明确各部、委的职责范围。各部、委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怎样完成这些任务，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前一段在这方面已有了大体的规定，现在要进一步具体化，并且让全体工作人员都知道。国务院副总理减少了，机构和层次也减少了，部的作用就更重要了。这就需要加重各部的责任，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各部、委的领导干部都要振奋精神，大胆负责，认真做好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凡是各部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独立负责地主动解决好，不要事情不分大小都向国务院请示。各部对于自己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适当扩大他们的权力，加重他们的责任，不要包揽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克服官僚主义、事务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各单位之间过去长期不协调、相互推诿的事情，这次一定要摆到桌面上来，讨论清楚，作出明文规定，记录在案，认真遵行。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前一段在国务院主持下开了几次会，明确规定了相互间分工和协作关系，计委和经委还确定了定期举行联系会议的制度。可见只要把问题摆出来，是不难解决的。各部、委间凡是需要经常会商的问题，都要定出定期会议的制度。各部、委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和各项工作制度，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守则和工作纪律，都要很快地制定出来。所有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充分发挥主动精神，勇于把对人民、对全局有利的事情担当起来。

二、必须认真做好老干部的安排工作。国务院过去对干部退休制度已

作过规定，最近又对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应该认真按照这方面的规定执行，该退休、离休的就退休、离休，使干部的退休、离休经常化、制度化。对退居二线工作的老干部，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要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本人的条件，实事求是，不要因人设事。既要发挥退居二线的老干部的作用，又要使新的领导班子放手工作，把担子挑起来。

三、必须切实抓紧干部轮训工作。这是进行智力投资，积蓄力量，准备发展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有计划地抽出大批干部去学习。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在有一种轻视业务技术学习的现象，有些单位不愿意送干部去学，有些干部自己也不愿意学，这种风气必须坚决加以改变，否则必将延缓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今后干部的学历和业务技术学习的好坏，要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一项重要依据。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从现在开始把这件事放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立即着手筹备，及早付诸实施。各部、委的干部轮训，原则上由各部、委自己负责，并且要同本部门、本系统的工作业务密切结合起来。干部轮训的规划、课程和所需要的教材、师资、房子等，都要一一落实。各部、委不论现有的公用房屋多么紧张，也要挤出房子来用于轮训干部。

四、必须保证完成紧缩国务院工作人员编制的任务。定额不定员不等于没有编制。国务院整个工作人员编制精简三分之一左右的要求要努力实现，并且要把编制定额落实到各个具体单位。紧缩编制必须是真正的紧缩，绝对不允许弄虚作假。今后任何部、委要增加编制，必须经过国务院批准，不得擅自增加或变相增加。过去借调的干部，除确因工作需要列入现有编制的以外，应一律送回原单位。

以上任务是繁重的，工作是大量的。如果不把这些工作做好，不仅难以巩固机构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将功亏一篑。在一九八二年内，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工作，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也应当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机构改革以及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连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整顿党风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四件

大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使这次机构改革善始善终，达到预期的目的。

注 释

1. 耿飏(1909-2000)，湖南醴陵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2. 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石油部副部长兼大庆石油会战总指挥，燃化部部长，石油部部长，中顾委常委。

3. 姬鹏飞(1910-2000)，山西临猗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中联部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4. 黄华(1913-2010)，河北磁县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5.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四师师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工办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获上将军衔。

6. 王丙乾(1925-)，河北蠡县人。时任财政部部长。曾任财政部预算司司长、副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7. 赵苍璧(1916-1993)，陕西清涧人。时任公安部部长。曾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兼省民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委员，武警部队政委。

8. 孙大光(1917-2005)，安徽寿县人。时任地质部部长。曾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计委地质总局局长，地质矿产部部长。

9. 文敏生(1915-1997)，山西垣曲人。时任邮电部部长。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河南省委常务书记、副省长，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10. 莫文祥(1923-2013)，山东夏津人。时任三机部部长。曾任沈阳松陵机械厂厂长，沈阳市委书记，三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

11. 李梦华(1922-2010), 河北平山人。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曾任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 国家体委副主任, 中国奥委会主席, 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组织“一条龙”开发新产品大有希望*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四日

现将上海市组织“一条龙”开发化纤新材料推荐给你们，请参阅。

大家所熟知的常州、苏州组织“一条龙”的经验，更多的是进行专业化协作，扩大生产能力。从上海这个材料看，其实组织“一条龙”也是开发新产品的一种有效办法。上海市围绕化纤新产品的开发，把纺织系统的三十个厂同生产化纤原料的金山石化总厂及有关科研所组织起来，从生产到科研，从原料到加工，从前道工序到织物后整理，从龙头到龙尾，都紧密配合，协同动作，从而能够在开拓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上取得成效。这个办法，不仅对化纤行业，而且对整个工业新产品的开发，都具有普遍意义。

当前工业战线特别是消费品工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切实改变产品式样陈旧、性能落后的状况，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努力研制更多的新材料，采用更多的新工艺，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只在“小而全”、“大而全”的工厂内部兜圈子，是难以适应这一要求的。上海的作法，给我们以启示。在开发新产品上采取“一条龙”的办法，适当调节各方的利益关系，打破部门分割，互利互惠，通力合作，把各方面的力量围绕一个共同目标组织

* 这是赵紫阳就上海组织“一条龙”开发化纤新产品写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人员并有关部委的一封信。

起来，就有利于把蕴藏着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各级经委和工业部门要认真注意发现和研究这方面的新情况、新经验。在产品的升级换代上，要像上海、常州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那样，有一股子劲，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好，人好我转”，那么，我们的工业战线就大有希望。

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 是搞好煤炭生产的关键*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是一个好报告。看了后使人感到煤炭部这一段的工作确有起色，问题抓得比较准，措施比较有力，效果也是好的。

在煤矿，充实加强井下第一线，是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关键。如果第一线的斗志不高，思想波动，队伍不稳，就很难把煤炭工业搞上去。而要稳定井下第一线，当前必须把大量采掘工人倒流井上的问题切实解决好。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子弟要带好头。干部端正作风，子弟带头下井，才会出现“许多人二话不说就下井”的局面。这件事再次说明，要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改变涣散无力的状况，除了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搞好经济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以外，还应紧密结合生产，不断调整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们的企业里，人与人之间要恢复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对职工群众，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觉悟，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心情舒畅、全力以赴地投入四化建设。

* 这是赵紫阳对煤炭部关于全国统配煤矿动员倒流采掘工人归队下井情况报告的批语。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应适当放宽政策*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此件值得一看。

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同引进大型成套设备不同，应当放手一些。政策适当放宽，审批权限适当下放，手续力求简化。应当注意防止大量重复引进，但对某些我们还不能制造（或虽勉强可以制造，但不能保证质量），而经济效益又很显著的，短期内有一点重复引进，也并不可怕。现在应当采取措施，进一步扫除障碍，以促进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这项工作的开展。

建议由经委牵头，计委及有关部门参加，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议定几条办法、措施，通知各地执行。

目前有些地方已经采取的由有关部门集中会审，多少个图章一次盖的办法，我看是可以提倡的。另外，最主要的，是要加重大、中城市的经委、计委在引进技术、改造原来企业上的权限、责任。许多问题，只要依靠他们就地就近协调解决，就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一些官僚主义，基层企业就会感到方便一些。

* 这是赵紫阳对国家经委邱纯甫、董绍华关于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改造中小企业调查报告的批语。

对制定“六五”计划的几点意见*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月

一、关于农业

粮食问题需要好好研究。现在有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为了多收入，改种了别的，这种趋势对国家很不利。还有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仍然种粮食，自然也不合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宜种粮的种粮，不应改种别的作物；不宜种粮的，应改种适宜的作物。但我国人口多，吃饭是个大问题，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又不多，从全局考虑，应首先保证粮食稳步增产。凡是适合种粮的地方，不应改种别的，并且要努力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不宜种粮的地方，要合理开发，有的地方可用来发展食品原料。比如承德地区，在很陡的山坡上种粮食，产量很低，而且不利于水土保持，如果改种板栗、红果，产量很高，收入多，也有利于食品的多样化。因此，在处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上，粮食的播种面积不能再减少，同时要因地制宜地分别不同地区进行适当调整。总之，首先要保证粮食稳步增产，同时要逐步解决有关生态平衡和合理种植问题。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先后三次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六五”计划编制情况时发表的一些谈话。

二、关于能源、交通

解决能源问题，要考虑今后一、二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原来计算，到2000年我国平均每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需要标准煤20亿吨，这是按落后的消耗定额算的。从各种条件看，那时要生产这么多能源，根本不可能，实现人均1000美元的目标也就毫无希望。最近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上日本学者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能源消耗增长之比，1973年以前为1:1，现在是1:0.7，九十年代将进一步下降为1:0.4。日本能源消耗低，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在今后二十年内，科学技术会有很大发展，只要把耗能定额大大降低，到2000年时可以不消耗那么多能源。当然，我们在降低能源消耗的同时，还必须加快开发能源，否则也没有出路。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所关心的，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的建设规模究竟多大？可否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再适当增加一些重点建设项目。比如，煤炭的在建规模可否再大一点，铁路修建是否再加快一点，电力投资能否再增加一些。这样，一些正在施工的项目，建设进度就可以加快。只要交通、能源的重点项目搞上去了，我们就可能在“六五”期间实现“保四争五”，“七五”期间实现“保五争六”，甚至还可能有更快一些的速度。

日本五十年代经济很困难，但他们看准了煤炭、交通确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环节，就集中力量去搞。他们把这种做法叫做“倾斜式”的建设方式。我们同日本当时的情况不同，但对确实看准了的重点，还是应当下决心去搞。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冒冒失失，又来折腾，但对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事，应努力去争取，不要过于求稳，无所作为，贻误时机。今后几年是很关键的时刻，除了继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外，要从各方面挤出资金投入重点项目的建设，主要是开发能源和进行交通运输的建设。这样才能理顺比例、提高效益、打好基础、积蓄力量。重点建设搞不上去，就谈不上在八十年代为以后发展做好准备。当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一，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搞“高指标”一类的蠢事；第二，可以做到的，一定要努力争取做到。

能够做到而不努力去做，明明做不到而去乱碰乱撞，两者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原谅。

为了加快重点项目的建设速度，在计划上、资金分配上，既要防止不切实际的贪多求大，冒很大风险，又要适当地把弦拉紧一点，否则不行。我们在近期内不要勉强去追求多么高的速度，而是要抓住重点，为今后的发展作准备，打基础，使实劲。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把库存、储备搞得太多，应该把资金搞活，变“死宝”为“活宝”，用于建设。

三、关于基本建设

增加的能源、交通投资加到哪里？主要加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项目，使之缩短建设周期，提前完成；二是新项目的勘察设计，搞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增加投资，怎么用，是个重要问题。要把钱用在最急需的能加快建设的方面。

中国工业的发展，总应该在一个时期内有较高的速度，如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这就要求逐年都有一定的建设规模。可不可以考虑：一是在原有项目上增加投资，加快速度。比如水电，新上“二滩”一下子不行，但把投资加给葛洲坝，建设进度就可以提前，这就是速度。煤矿也是这样，山西的煤矿，不仅小窑改造可以加快，大矿的改建扩建也可以加快。二是要抓紧准备好一批新项目，搞好前期准备工作，一则可供选择，二则以应急需，一旦有钱有物，要上就上。

今后无论是利用外资的项目，还是国内资金的项目，必须改变基本建设不按程序办事的状况，再不要搞那种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事了。安排基本建设项目，首先要搞好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后十年经济振兴作准备，应是全国上下集中全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关键是计划，在计划中要列勘察设计项目。过去是急功近利，没有钱搞准备工作，长期打被动仗。以后凡是下一个五年要搞的项目，上一个五年就要把这些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可行性研究和勘察设计等工作都搞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内资或外资，就可以上去。凡确定要上马或者已经上了马的，不要再论证来、论证去。准备工作需要花点钱，但是前期工作做好了，就

能真正缩短建设周期，摆脱被动局面。要下决心从计划上转过来，经常准备一百来个大中型项目，把勘察、设计、可行性研究等工作都事先做得好好的。这样，整个基本建设工作就主动了，长远规划也有了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四、关于财政

要考虑适当集中财力，但现行政策不变，财政分灶吃饭、扩大企业自主权继续搞，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中央集中的比例要提高，也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基数。中央财力增加后，就不向地方借钱了，但国库券还照发。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进行重点建设，中央没有一定的财力不行。中央财力集中多少，用什么形式集中，分成比例和财政基数动多少，要搞一个方案。中央适当集中财力以后，重复建设也会减少。

为了适当集中财力，要适当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同时从控制财政补贴方面打点主意。看来，对农民的利益不动一点不行，但要谨慎，不要搞猛了，各方面都好好议论议论。比如，对化肥、柴油，可不可以提点价或减少些补贴；或者考虑搞定额供应，定量内的不动，超过的提价，行不行？农民现在卖农产品给国家也是这个办法，即有平价有加价。这样，高对高，低对低。这个办法，穷的地方因为用化肥少，主要享受平价，将来生产发展了，化肥用得多了，超过定额，再加价。

油菜籽，现在多了，超过需要。明年确定实行“倒四六”的收购办法，可以限制一下。但是，光这一条，播种面积可能还控制不住。估计今冬还会大发展，小麦和绿肥的播种面积还要减少。可否考虑规定一个收购数量，超过的，由农民自己处理。浙江采取了这个办法，油菜籽就控制住了。四川、安徽等省没有这样做，面积还在扩大。现在必须这么办，过几年需要发展时，可以取消这个规定。现在适当控制油菜籽的发展，对国家、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都有利。

计委汇报提出1985年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打赤字。我赞成。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应当争取做到这一点。

五、关于利用外资

要采取积极态度，尽可能多利用一些外资，“六五”期间不包括合营项目，准备借 200 亿美元，主要用于能源、交通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

使用外资要合理安排，今后应尽可能不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凡是国内有制造能力，又有资金、材料，可以自己生产的，就不从国外进口。但有些设备，国内虽有制造能力，但目前没有资金和材料，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又比较合算，也可以适当进口一些。比如电站设备，为什么不可以进口一些呢？这样进口设备，对国内机械工业也有好处，因为总要搞些配套的东西。所以，考虑问题不能只从一个侧面去想。国内能不能制造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引进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是否有利，有利的就可以干。当然，立足点还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现在国内资金不足，经济建设想快快不了。要为九十年代作准备，办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利用一些外资。当然，方向要对，不能盲目。第一是搞基础建设，第二是搞技术改造。要搞确能很快见效的。

除了一般的利用外资以外，与外资合营的局面必须打开。要统一思想认识，现在是老怕吃亏，局面打不开。资本家为了取得利润，有时投资也要冒点风险。我们不能把政策搞得太死，要使外国人感到有点吸引力，愿意同我们合营。因此，我们要研究吸引外资的具体办法。

六、教育、劳动工资

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要加强教育。从“六五”开始，教育要加钱。用在哪里？是大学还是中小学？要很好研究。

购置和发射广播卫星，电视、教育可以共用。地面站国内自己搞，有关地区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广播卫星搞起来了，可以扩大复盖面积，大大发展广播电视教育，还可以举办农业科学等各种讲座。这是为教育为广播办一件大事。

我们的经济效益不好，与管理人员水平不高和缺乏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充分发挥中年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中年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他们现在是科研、生产以及管理等方

面的骨干力量。但是，这部分人的工作任务重，家庭负担重，而工资待遇又很低，健康状况不好，使他们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六五”期间国家要挤出一部分钱来，增加他们的工资，从今年开始就行动起来，争取三年以内基本解决，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工作条件。要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方案。中年知识分子的工资解决了，年青的看到有奔头，情绪也高了。这样一来，整个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当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不要怕，可以以后再研究解决。

妥善安排待业青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主义训练，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进行技术业务学习，参加一定的劳动，如城市绿化、环境卫生等，并发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费，等到招工时，择优录用。这比都安排在企业里要好，也可以避免实行子女顶替办法（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盐业除外）的弊病。

七、关于企业的调整和整顿

“六五”期间，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要下决心搞。“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企业由 19 万个增加到 38 万个，增加了一倍。特别是机械工业增加很多。据最近从苏联考察回来的同志说，苏联工业很集中，州以下不搞机械工业，因此重复建设少，技术比较先进。而我们不是这样，大量的钢材消耗在这里。计委、经委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机械工业太分散，需要集中，这要作为一条方针定下来。这对减少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减少浪费、亏损，很重要。各行各业，凡是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效益很差、能源消耗高、与先进企业争原料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调整、改组要与企业的整顿、技术改造结合起来进行。社队工业也得进行整顿，社队企业要发展，问题是搞什么。调整和整顿，对缓和能源、原材料供应的紧张，提高技术，提高效益，改进产品质量，增加财政收入都有好处，虽然工作难做，但不下这个决心不行。

八、关于加强计划管理

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计划管理，包括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间接计划（即指导性计划）两部分；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计划，一部分为间接计划，一部分为市场调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除中央的计划以外，还有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这些经济协作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该加强对这一部分的计划指导，成为国家统一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合法化。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十分必要的。对这个问题要研究和总结经验，不要回避。各级计委把这项工作搞好了，计划工作就会闯出一条新路子。

对于小商品，可以考虑实行市场调节，随行就市，国家不统一规定价格，也不补贴。当然，要有步骤，不能一下子都放开。要根据国家的经济状况，逐年放，一年放几个品种。对于小商品，一是放出去，一是把一些生产单位改为集体所有制，适当发展个体所有制。

九、关于制定十年计划和专题规划

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后10年，这是全国经济工作大的战略部署。前10年的主要任务：一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效益和一定的速度，二是要为下一个10年作好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主要是：（1）调整、整顿、改革。（2）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3）重点建设，主要是能源、交通。（4）培养人材，加强干部训练。

“六五”计划搞好以后，接着就要集中力量搞“七五”计划，也就是前十年的计划。同时，要搞几个专题规划，如：十年农业规划、十年能源交通规划、二十年科技规划。

听取国家计委赴苏考察小组汇报苏联经济 管理体制时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十四日

一、经济效益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弊病，这一点现在大家都认识了，但治的药方不一样，药的剂量也不同。苏联包袱重，不敢轻易动，他们还强调部门所有。保加利亚各部不负经济管理责任，强调发挥经济组织的作用，各部只管计划、技术、协调。保加利亚企业的权力比苏联大，企业只上交税收，一般占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余下的部分再做出几项扣除。国家不包工资，企业经营得不好，工资发不出去，得靠企业基金，或向银行贷款。国家向企业下达七个计划指标，价格由国家定，外贸由国家控制，除个别企业外，不允许企业直接同外商签订合同。匈牙利提出反垄断，把大企业分成小企业，使其具有法人地位。

现在可以说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南斯拉夫，走的最远；第二种，是匈牙利；第三种，保加利亚，价格、外贸比匈牙利死，但企业自主权不小；第四种，是苏联。看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不管走的远一点、近一点，或者停一下，走一下，有时甚至后退一下，只是步子不同，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从长过程看都是前进的。就是南斯拉夫理论上也承认有计划。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指标，但宏观经济的活动要求有个东西去影响，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学会运用经济杠杆，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受许多条件限制，如价格、灵敏度等，所以在改革中完全把指令性指标搞掉，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 这是赵紫阳听取柳随年、刘国光、郑力汇报考察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情况时的讲话要点。

对企业没有个东西制约不行，但你搞一个指标，他就会想另外一套办法来对付你。过去在这方面矛盾不大，因为同企业没有利害关系，企业什么指标都可以接受。现在要讲企业利益，不能再回到大家都不讲利益、都不负责任、消极怠工的老路上去了。但一讲企业利益，就会发生许多矛盾，看起来很麻烦，实际上比过去那种没有矛盾要好的多，这是一个进步。我们要承认企业利益，又要调节矛盾，经济体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解决好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解决了。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都在前进，苏联在前进，匈牙利也在前进。赫鲁晓夫是搞改革的，开始因为没有经验，走了一些弯路。但他揭露了苏联体制中存在的许多毛病，说明这种体制不是完美无缺的。苏联和匈牙利改革了一下，又后退一下，但每次前进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苏联对改革持慎重态度是对的，我们也应当慎重。不能说苏联就找到了一条路子了，他们也在完善。我们要注意苏联的经验是对的，因为它是大国。

二、苏联工业管理坚持部门原则，说这样利于技术进步和专业化，既然如此，那就让部门主要管技术、管规划行不行，为什么非要把企业管起来？有一个例子对我有启发，纺织部管得就不错，纺织企业都在地方，部管定技术、规划等，管得很好。相反有的部直接管企业管得并不那么好。能不能有另外一种考虑，除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中央管外，哪些权力应当集中在部，例如建新厂要报部审批，部还要负责统一规划、搞新产品试制等等，企业的具体经营由地方负责。要对不同的企业、不同事情有个不同的处理办法（马洪同志：能不能使企业既不归部，也不归地方）。要研究一下，不要先从原则出发，要从实际出发，企业同国家关系是一层，国家中又有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企业只向国家纳税是个长过程，一下子不行，还有个联合过程，这个路程比较长。可望见的时期内还有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要解决。如何把城市的潜力发挥出来，企业横向联系不能靠搞托拉斯。常州发展很快，因为它靠统一组织了几条“龙”，如果上面几十个部插进去就办不成，就会把城市搞得支离破碎。常州一个市委书记调到南京就无能为力了，因为条条太多。但如果国家从上到下都搞块块，又要出现重复建厂、划地为牢的问题，科技进步、专业化协作也会受影响。现在的企业，有部门领导、地区领导，外边又加一层中央领导。条条强了，就

把地方给吃了；地方强了又把部门吃了，这是个相当难的问题。要研究给予地方哪些权，限制他们哪些权。以省、以县来管不行，以城市工业为基础，组织协调，又不影响专业化，行不行？

三、苏联企业一个婆婆，这点好，值得我们研究，至少在政企没有分开以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企业的婆婆太多。现在呼声很高，下达给企业的指标互不衔接，遇到问题找谁，谁也不负责任。许多企业留恋五十年代，也是这个原因。通过企业联合当然是个途径。苏联的食品纲要加强了区一级，要求以区为单位搞综合体，把食品加工、储藏、运输都联合起来。

四、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把原来超计划加价部分都加到采购价格上，是全国平均计算呢，还是以地区以农庄为单位计算呢？如果按农庄计算，这样，每个农庄的价格就不一样了，这种办法恐怕不行，如果全国统一计算，那就会使原来一些加价多的集体农庄减少收入，从而影响生产。广东1966年实行超购奖励，外调粮食12亿斤，文化大革命一批判，奖励条件也没有了，粮食产量也下来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不管你采取这种或那种形式，总的趋势是提高的，东欧、苏联都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改革，看来，重点一要放在搞活上，把政策放宽一点；二要放在价格上，提高一点农副产品价格，使农民多得点利益。

五、里根¹攻击勃列日涅夫25%的农业人口，养不了2.6亿人，说美国百分之几的农业人口不仅养活美国，还有余粮供全世界。苏联搞了那么多军队，还有很多工业，否则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些。苏联现在城市还帮助农村抢收，我们这些年算是不下去了，实在是劳民伤财。苏联农村落后，看来根本问题还是集体化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对农业问题看得很清楚，归根结底，没有农民的积极性不行，但是积极性大了，盲目性就出来了，无论农业、工业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让他有点盲目性肯定不行。有点盲目性不要怕，只要积极性带来的好处超过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就行。但有些东西要卡死，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产品、大企业要强调统一性、计划性，有些小的就让他有点盲目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总是有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着。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大的方面避免经济危机就不怕。小型项目的引进不要怕重复，半年就偿还了，怕他干什么，但是，上亿元的关键项目不能重复引进，我们要悟出这个道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发挥，有些积极性会带来一些盲目性，要研究他们的得失。首先要把宏观经济计划好，宏观经济摆不正，局部是补不上的。

我同苏联的观点有点不同，我说小企业的自主性可以大些，大企业的自主性不能太大。对小企业也有个哪些要管，哪些不要管的问题。有些定了点的企业不一定就搞得不好，没定点的企业因为它要生存，必然拼命地搞，也可能搞上去。我们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大批淘汰企业，但完全没有一点淘汰也不行。

六、市场调节要稳步搞，走稳点。计划为主，70%、80%、90%都是计划为主，但计划和市场的杠杠划在哪里，现在还说不准，要在逐步放的过程中摸索。苏联经济发展的量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从粗放转入集约阶段，节约能源，节约劳力、原料，不搞这个不行，但也不容易。

实际上，经济越大越好管，大企业、大产品的规格质量都比较好管，不容易管的是轻工业和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可以考虑走农业的路子。农业由国家供应生产资料，农民自负盈亏，农产品多了，国家不能包收购，让他们自己去卖，少了采取加价的办法，这也是计划，服务业、缝纫业、饮食业可以搞自负盈亏，或包给集体经营。农村有些专业户养鸡、养猪效果很好，一个养鸡户比过去一个集体养得还多。现在要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别人为他们服务，要求有几个帮手，这个问题城市已经解决，农村还没解决。这里有个经营者与劳动者之分。如果政策再活一点，我看还可以发展。现在农村有一批会经营的人。城市小工业，这样一搞也就活了。

七、苏联的这套管理办法适合于管理大工业、重工业，要高度集中，也要搞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这套办法可以用。

苏联对重大项目的确定比较细致，科学性强，我们个人拍板的，不一定准确。

八、我们现在是计划上有些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又管得太多。我们的国家这么大，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灵，小的管不了，要有所抓紧，有所放松，大的不能撒手不管，要管，要严格纳入计划。小的工业搞市场调节，重要的企业要加强计划。苏联的石油、天然气上去了，对苏联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天然气管道一通到国外，他的外汇收入又可以使经济更活些。

九、对苏联的体制要注意研究，它的建设搞上去了，他们搞那些建设是由部长会议定的。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有个建设问题。国家建设同企业的自主权是两回事，钱少了搞不了多少事，中央必须集中一些财力，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集中也挺厉害，对地方、对企业都不例外。

还是我讲的四类企业、四种产品，不能把全部都纳入计划，要抓主要的、大的建设。生产力布局要集中管，不然中央干不了什么事，大的物资分配权也要管起来。总之，要有死有活，大计划、小自由；小的放松点，出了乱子也不要紧。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是通过财政集中财力搞基础设施的，大的基础工业国家不搞，上不去。

十、宏观经济他们下的功夫比我们大，基础也比我们好，他们搞了20年规划、10年规划、5年规划，我们连十年规划还搞不出来。

十一、小企业容易掉头，市场也正需要这些厂子满足。煤炭、重型机械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容易搞计划。我国三大改造前，“一五”计划时期的经验要总结。那时对还没有实行合营的私营企业就是采用经济手段，国营企业是起主导作用。

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纳入计划，否则会管死，造成积压。我们也不能全部搞市场。马克思说，计划经济有可能实行，是因为工业的集中，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就可以搞计划。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大企业决定我国经济命脉的，必须搞指令计划，一是需要，一是可能。现在有些东西不能直接计划，为什么出现一放就乱的情况，主要是价格不合理的问题没解决。一些改革放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讲的价格不是自由价、而是官价，价格不合理，一放宽就乱，增加了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价格要达到基本合理，不改不行，但改不好就会出问题。看来，如果国家价格基本上合理，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不搞官价，宏观与微观的矛盾也就不大。

价格应当走个什么路子，看来，零售价不动，先调批发价格是个过渡办法。

十二、体制改革。匈牙利的步子大些，但它是个小国，依附性大，靠进口能源，价格同国际市场挂钩。苏联总的是前进的，它国家大，步子搞得稳当点，宏观经济、关系国计民生的要加强计划，步子搞稳一点是应当的。苏联的办法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不能轻易否定它，应当历史地看。苏

联是老二，除美国外，英国、法国、日本都不如它，有它优越性的方面，不要抱成见。它农业没搞好，有一定自然条件因素，产量不稳，幅员大，搞水利有困难，用五年平均水平计算产量是对的，这个五年平均比上个五年增长就不错。

十三、你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方法是对的。苏联的有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你们要在小范围内组织一些讲座，不登报。不一定大家都取得统一的认识，哪些办法是可取的，哪些不可取，我们哪些进行得好的，证明是对的，都可以议论议论，明确几条。

十四、最近经委搞了一个关于企业联合的材料说，联合企业的产值已占全部产值的 38%。上海最近在纺织业搞联合，按最终产品（化纤产品）搞了 20 条龙，从最终产品向上、向外搞联合，把一些企业、科研单位都联合起来了。常州也是这样开始的。看来，在一个城市搞联合是可以的，交给一个部就不行。搞新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按上述办法搞联合。日本的机械工业同冶金工业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就不如他们密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计划经济值得研究，宏观经济搞得很好，国家干预受到企业的欢迎，他们穿一条裤子。

苏联企业对工资不封顶这一点有启发，但这样，每年实际发的工资肯定要超过计划数，因为对完不成计划的企业要保证基本工资，对超额完成计划的企业要增加工资，这就是为什么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

苏联对冷、背、残、次商品一年处理两次，这一点比我们还好，我们都压在库里动不了。山西一位同志关于改革基本建设管理提了八条意见，我看有些还可以，其中有一条，把一个工程项目的投资一次拨下去，不准追加，我把他的意见批给经委研究去了。

什么是定额净产值？我们国家实行什么指标好，是定额净产值、销售额，还是几种指标加在一起？他们现在还在研究用什么指标比较合适，而不是取消指标，把指标搞的更合理一些。

注 释

1. 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1994), 时任美国总统。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皮科城, 曾任电台广播员, 电影和电视演员, 美国电影演员协会主席, 电影业委员会主席,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 1984年连任。

农业和粮食是我国的头号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

一、农业长远发展问题

农业发展长远规划上有什么矛盾问题，搞几个题目，由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一下，国家计委参加领导。

国民经济要搞三个专题规划：要专门搞一个农业十年规划，还有能源十年规划和科技二十年规划。

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着眼来搞农业长远发展规划，对农业问题要系统研究，清醒地看到问题的所在。现在，农业形势转过来了，形势很好，但还有许多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就是一个。责任制今后如何发展，也尚待解决。

现在，对发展农业的办法提得不少，但能改变局面的办法不多。只是一般的提倡，不能改变局面，这样下去不行。要搞地区开发，比如黑龙江农场贡献很大，一年提供商品粮三十多亿斤，改变了黑龙江的农业局面。印度在旁遮普邦搞绿色革命，搞好一个地方，解决了40%的商品粮。苏联开荒也不能讲是完全失败，也是改变了局面的，商品粮占到全国的40.9%；开发中亚地区发展棉花，成绩也很大。我们在鲁西北地区发展棉花，也是成功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种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在十年、二十年内一定要有所作为，打开局面。瑞士雀巢公司在专门研究

* 这是赵紫阳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等的谈话要点。

世界食品问题，公司的负责人说正在搞一个如何维持世界这么多人口食品的关键性研究，他说文章作在大豆上。粮食的概念可以宽一些，不光讲谷物，而要讲食品。农业是基础。最近，小平同志讲了，耀邦同志也讲了，我国的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问题，八亿农民问题，解决好了，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都好办了。

在组织讨论时，可以展开争论，为农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依据。除了请农学家参加讨论外，还要请经济学家、食品工业等方面的专家参加。只讲战略不讲战术也不行。要算经济账，看怎样办经济效益好。我们越穷，资源越不能合理利用，越是浪费。先要搞清哪些是不合理的，怎样才是合理的，用什么办法（政策上、措施上、步骤上）使它达到合理。要从经济学上研究怎样搞好过渡，使设想转化为现实。农业要看五十年。

可以发一些材料，比较一下外国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农业是成功的。国外一致认为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看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材料，他们也说 2000 年的农业，主要靠单产，搞立体农业，间作套种，搞劳动密集型农业；搞耗能太多的农业，不适合我国的情况。

二、粮食与经济作物问题

我最近曾对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讲，我国进口粮食一千五百万吨左右，这是个限度。用这些粮食调整农业结构，搞好了，还要逐步少进口一些。农业规划只能建立在自己解决粮食问题上。

吃饭是我国的头号问题，要研究到 2000 年时十二亿人的吃饭问题。

我国适合种粮食的耕地不多，再开荒潜力也不大。我国的农业资源不差，但按人口平均则不能说很多，粮食耕地尤其少。因此，我认为，从全国整体考虑，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不宜再种别的东西。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要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可用来发展其它的食品原料，如搞畜牧场，产肉奶，搞木本粮油，淀粉，搞植物蛋白的直接食用等。食品工业是个大问题。中国不能走外国的路。日本、美国的食品工业，大体是：占工农业产值的 10%，占劳动就业的比重也是 10%，食品费支出占工资收入的比重

也是 10% 以上。他们也都是六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这与购买力和消费水平有关系。不搞加工不行，日本的水果在加工不发达时，也常常大批地烂掉。有人说，“方便食品”是食品工业新纪元。我们一下子搞成这个样子还不可能，可以慢慢地搞起来。

搞多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这是对的。但不宜把适合种粮食的耕地改种经济作物，这样，势必使很不适合种粮食的坡地继续种粮食，影响生态平衡。现在粮食主产区和高产区感到种粮食吃亏，这要从整个社会效益来考虑。国家对这些地区应采取政策，给予一定的补偿。除了别的办法外，例如对苏州、烟台、嘉兴一类地区，可以在社队工业上给以特殊的支持，别的地方不准搞的，可以准许这些地方搞，靠社队企业养农业，保持这些地方的粮食优势，使这些地方的农民种粮食与种经济作物得到大体一样的收入。这样，可以使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多种些粮食，再搞些加工业，以增加收入，达到农业生态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粮食与经济作物价格悬殊太大，要逐步缩小。

我国的食物构成，我看一百年内也要以粮食为主，但要逐步补充其它食品。将来人口增加了，我国人均粮食能保持现在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加上其它食品的发展，如水果、木本粮油、肉、奶、鱼等，增加一些热能，就很不错了。

南方发展畜牧业，要注意到那里的草山，有些是退化的结果；有些海拔太高，很多草是牲畜不能吃的，必须加以改造。在那里要采用改造草场和割草圈养的办法，不宜搞放牧。

要因地制宜，搞好经济区划。南方棉花可以减少，北方可多发展棉花。南方的甘蔗要适当控制，在北方发展甜菜，使南方多生产些稻谷。黄红麻不能多搞了。

水土保持不解决不行。有相当一些地方，要山区大量开荒种粮。这主要是缺粮食的压力大，以致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得种，这要逐步调整。过去山区历来是用山货来换粮食。如果平原地区适合种粮的不多种粮，从全局来说，作物布局就无法调整。“两湖熟，天下足”。棉区与粮区可挂钩搞协作。

总之，良田不许随便占用，这要定为国策。

几个地方的开发，如三江平原、黄淮海等地，要好好研究论证。“六五”中三江平原的开发要搞，那里一定要修水利。新疆的棉花要发展，条件比较好，主要是要解决水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年，统计上粮食年年增产，每年平均增一百多亿斤。如果真有那么多，怎么会出现那样多缺粮的紧张状况？实际没有增产那么多而报得多。这几年，粮食确实多了，但上报的数偏低。

三、农产品中商品性的产品应有计划地发展

过去搞农业，没有商品化观念。商品化，要有一系列的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定要同时抓好储存、运输等基础建设，农产品才能变为商品。农业上有些东西，成不了商品就是废品。现在总的看，东西不是多，而是少（有的是季节性的多），但搞不好，少的也会嫌多了。不能随便地普遍号召家家户户搞，一哄而上。例如，我在四川提倡养山羊，因加工、运输等许多措施没跟上，不到三年，山羊就卖不出去了。想降低羊肉价，提高羊皮价，动员农民卖羊皮，自己吃羊肉，推动起来困难也不少。养兔也是这个问题，也要建冷冻厂。专业户养兔很好，但普遍号召家家户户养不得了。要搞商品基地，小而全的自然经济不行。要适当区域化，一片片地搞，同时要搞加工、冷冻、储存、运输，否则，多少年问题都解决不了。其它方面跟不上，就使得有些资源无法利用。有的东西好一点，如干果比较好办些。

总之，商品要搞专业化，要适应集中，要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只靠普遍号召家家户户搞。

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问题

这几年农业形势好转，粮食多了，原因是人的积极性起来了，责任制解决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民积极性问题，使多年来水利、农机、化肥等投入发挥了作用。但这些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今后还必须继续搞投入，继续建设物质基础，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否则增产不能持久。要研究如何合理地

投入，使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不改变撒胡椒面的办法，就没有奔头，就改变不了局面。

水利问题要专门研究，认真总结，摆脱过去的框框，建议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好好议一议。不是说不搞水利，我历来没说不搞水利，但要好好总结。三十年来，水利事业第一有伟大的成绩，第二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水利发挥的效益，同国家和群众所付出的代价不相称，差得很多。过去搞运动，大呼隆。瞎指挥在水利工程方面是严重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不要怪哪些部门，如果多听听水利部门的意见，情况还会好些。这是全党的事，主要是各级党委。现在要认真总结，希望把这次水利讨论会开好，给中央写个意见出来，取得一致的看法。

五、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科学技术的力量绝不能忽视，今后二三十年内，世界农业会出现一些新东西，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要看得远一些，现在农业的路子太窄。过去我们太轻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各级领导干部不熟悉科学技术，知识太缺乏。

农业科学技术问题要好好研究。一定时期内着重抓哪些项目？当然是多层次的，各地区都要抓，但是中央抓什么，要提得明确些。

农业科学技术今后五年、十年主要搞什么，真正能见效果的，要花一些力量，投一些资，把它搞上去。比如：种子、复合肥料、高效低毒农药等要下功夫。农业的地域性大，不同品种适合于不同地区。如杂交水稻，在一定的地区长得很好，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就不行。扬花时期，受气温的影响很大，温度低了不行，太高了也不行。

搞农业技术推广站，要注意搞不好就会吃了饭干不了活，农业事业费成了人头费，花了钱作用不大。科研经费也要适当集中，力量要组织起来，有重点抓几件有成效的事，不集中就办不了事。

把山西建设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山西要发挥自己的煤炭资源优势

山西省的特点是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得天独厚。煤炭的储量有二千亿吨之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目前年产一亿三千万吨，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多；调出八千五百万吨，相当于全国调出量的百分之八十。山西的煤田储量大，煤质好，埋藏浅，投资省，成本低，统配矿吨煤成本只有十五元，比全国统配矿的平均水平低四分之一，而且全省上上下下都有开煤的积极性。据省里规划，今后每年可递增煤一千万吨（其中统配矿三百多万吨，地方国营矿二百多万吨，社队矿四百多万吨），预计到一九八五年产煤一亿六千万至一亿七千万吨，调出一亿二千万吨；一九九〇年规划产量二亿吨，调出一亿五千万吨，如铁路运输条件允许，产量可达二亿七千万吨，调出二亿吨。这次到山西看了以后，更加深了这样一种认识，开发山西煤炭确实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山西煤田与内蒙古准格尔煤田连成一片，要把山西省和内蒙古西部、豫西、陕北、宁夏的煤田联起来考虑如何开发。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片离天津、石臼所等沿海港口，都不过五六百公里，比苏联的东煤西运、美国的西煤东运的两千公里的距离要近得多。如能积极开发利用，山西将有希望成为中国的鲁尔、萨尔。

要发挥山西的优势，把它建设成为以煤炭为主的重化工基地。山西省

* 这是赵紫阳在山西考察时关于煤炭开发问题的谈话。

不搞煤炭，不搞重化工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山西省也讲农、轻、重，恐怕行不通。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只能就整个国家来讲，或者就一个经济区来讲，不能每一个地方都讲，不能每个省、每个县都这样要求，那就会成为“大而全”、“小而全”了。从山西来讲，农业当然不能放松，轻工业也应结合本地的特点搞一些，但重点是要搞重工业，搞煤炭，搞煤化工，搞耗能多的重工业，因为你有这么好的资源条件嘛。至于轻纺工业品不够，可以从外省调一些进来，不必过分去追求自给率。山西不能离开与国内各地的协作，不能离开与国际的联系。应该通过交换，以己之长，补己之短。要看到，有了能源，就什么东西都可以转换，不一定样样都要配套，都自己搞。不能抑制自己的优势，而花很大的力量去勉强搞不是自己所长的东西。

从长远、从全局来看，山西不仅要向全国供应煤炭，成为能源基地，而且要逐步建设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化工基地。由于向外运输困难，山西要想办法多吃掉一些煤。一是发展煤化工，搞炼焦、煤气、焦化产品，搞化肥。山西潞城化肥厂已确定上马，要加快建设。二是搞电站，有些可以搞坑口电站，向华北、中南、华东输电。电厂用水问题，要妥善解决。从匈牙利引进的风冷发电设备，比一般机组要节水一半，可以考虑引进技术，自己多制造几套。现在地方对办电不积极，感到无利可图。应从政策上考虑给地方分一些利，如交一点地方税，利润分一点成等，以调动地方办电的积极性。山西增加电站的问题，计委、水电部要很好研究。三是发展一些高能耗、少用水的工业。如利用现有的基础加以扩大，多生产一些耗能高的合金钢、铝锭、电石等产品。应利用进山西的空车皮运一些矿石进来冶炼。在全国的工业布局上，要考虑让山西、西北多发展一些耗能高的工业，而让沿海多发展一些耗能少、技术高的工业。

山西省各项事业的发展，要有一个统盘安排和长远打算，因此要搞长期的综合规划。鉴于开发山西的重要性，为了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协同动作，加快山西重化工基地的建设，建议国务院批准设立以山西为中心的国家计委、经委分会，协助山西省委、省政府开展工作，组织协调，制定综合开发规划，组织实施，尽快把这个基地建设好。这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将有重要作用。

开发山西煤炭一要解决运、二要解决水的问题

开发山西煤炭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能不能运出去，二是有没有水。煤、运、水是互相联系的。运输畅通，煤炭也就有出路了；水解决了，煤炭可以就地多发电，多搞煤化工，运输的压力也就减轻了。如果运输不出去，水源解决不了，那么挖出来的煤也不能有效利用。所以煤、运、水，要综合开发。

开发山西煤炭，关键在运输。现山西各地压煤很多，主要矛盾是运输能力不足，特别是铁路运输能力不足，互相挤。有煤运不出去，就打击了群众挖煤的积极性。而且存煤自燃，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开发山西煤炭，铁路要先行。目前全省不论统配矿，还是地方国营矿、社队煤矿，普遍是“以运定产”。百姓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叫，经济活跃”。如果运输能力加大，煤炭放开手搞，还能够大量增产，群众也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我们从雁北走到晋东南，到处都议论运输紧张。在制订长远规划中，可否这样考虑：在一九八五年以前，山西省煤炭不要再增加多少投资了，多搞些技术改造，把投资加到铁路上，集中解决运输问题，一九八五年以后转过头来，再增加煤炭投资。

增大铁路运输的能力，除了要按已定的计划，加快老线的技术改造外，在新线建设上，应有个战略布局，作通盘考虑，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认为，铁路建设应同海运联系起来考虑，把山西与海港之间的运输线打通，使晋煤可以出口，也可以沿海运输到华东、华南。能不能设想在几年之内集中力量修一两条铁路直通海港（如秦皇岛），搞适合我国情况的长大列车，专门拉煤，这样全局就活了。南北运输，要充分考虑水陆联运。请计委、铁道部、交通部组织一些专家，包括经济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方案。另外，还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增加一些机车、车辆。东欧国家的记账外汇也可以利用来进口一些机车、车辆，国内也可安排多制造一些。

平朔露天矿是中外合资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搞好。现在合资经营是两面怕，我们怕当李鸿章，外国人怕陷进来吃亏。就这项合资经营来看，总的还是合理的，不给一定的好处，外国资本家是不会来的。但运输是个大问题，这个矿开工时间、出煤时间，都要与运输的建设同步。如果我们

的运输能力一时跟不上去，又要保证运走外国人分的四百万吨煤，那就会把我们的出口煤挤掉，搞得我们很被动。要注意没有准备好，运输跟不上，就不要轻易同意开工，工程的进度要有个合理的安排。

金、木、水、火、土五行，山西是缺少水和木。水的资源不多，要统筹安排，搞好规划，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做到合理用水，节约用水。挖煤要消耗水，但挖煤本身就可以开发水资源。山西煤管局的资料，挖一吨煤，包括洗煤、生活用水在内，用水量是一点二吨，但挖一吨煤本身要排水零点八吨。要是把这些水利用起来，就会起很大作用。山西潞安矿务局五阳煤矿年产煤一百一十万吨，他们把挖煤出的水回收了百分之九十二，利用二百五十万方水，但投资并不多，只花了六七十万元，每吨煤的投资不到一元。这个经验很值得重视，山西在水的利用上，应该走在全国煤矿的前面。

加快山西煤炭开发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

这几年要重点转到抓紧对现有煤矿的技术改造，并在老矿区新建、扩建一些矿井，这样投资省、工期短，出煤快。看来综合采煤机组在山西的效果是好的。它的支架并不难造，主要是采煤机的电机部分，我们制造的还赶不上国外的，过不了关。可以引进一些技术和材料，组织有关部门协作攻关。山西使用的综合采煤机，现在没有提折旧，这不利于维持再生产。煤炭部、财政部要研究定出一些办法来。煤矿技术改造中，要重视安全生产的问题。现在煤矿的伤亡事故还是不少。煤炭部的同志说，只要出口五千万吨煤，就可以把煤矿安全方面的制造技术引进来，这是值得的。引进来以后，国内再逐步制造，解决全国煤矿的安全问题。

在山西，地方国营和社队煤矿的产量，约占全省产量的一半。像我们看过的襄垣县煤矿和夏店公社、麂亭公社合办的煤矿，都是办得好的。地方和社队，是一支很大的力量，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管理，去掉他们乱采乱挖的盲目性，调动他们办矿的积极性。社队小煤窑，一要联合，二要改造，坚决走这条路子。夏店公社和麂亭公社合办的煤矿，去年产煤三万六千吨，盈利十万元，改造扩建后，到一九八四年可达年产二十一万

吨的能力，盈利一百四十多万元。这个煤矿成立了理事会，大的事情如生产计划、经济开支、上多少人，由理事会决定。经理对如何完成任务有自主权，可以当家作主。两个公社和所在大队出劳力，出资金，按股分红。所在的范家岭大队占一股，夏店公社占七股，麂亭公社占二股。这个矿管理得比较有秩序，效益较好。这种联办的方式，应予提倡。社队煤矿所得的利润，也不要分光了。要预留一部分生产基金，用于技术改造。生产基金留多少，福利基金留多少，分红多少，将来要立个法。小煤窑的改造，除了自筹资金外，还可以使用一些低息的贷款。也可以和外省合作，吸收一些资金。总之，小煤窑的技术必须提高，安全必须搞好，但要保持自己的特点。统配矿和地方社队小矿，要互相学习，取其优点。在合理开采、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方面，小矿要向大矿学习；在与农民结合上，在勤俭办社上，大矿要向小矿学习。整个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上，都要考虑吸取小矿的优点，这要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研究。

山西一方面要抓紧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这个方针必须坚持；另一方面，也要有重点地建设特大矿井。建大矿井，应尽量缩短建设周期，力争早出煤，多出煤。根据已有的经验，一个办法是多开井口，一个办法是一次设计、分期建设。比如三百万吨的煤矿，规划好了，第一期先搞一百万吨。这样就能合理利用资源，投资省，周转快。矿井的基本建设，可以试行包干制。全部投资的概算定下来以后，由基建部门承包。多年来我们基建投资概算，一再突破，有些部门搞“钓鱼”政策，预算一再增加，工程一再延期，几乎成为一种通病。要想法改革，搞承包制，搞包干建设，一次包定，提前完工、节省投资的受奖，否则要受罚，双方订立合同，共同遵守，国家监督执行。这方面要闯出一条路子来。

煤炭系统有一些特殊问题，矛盾很多。现在，不少矿使用了轮换工，从全局考虑，这是合理的。山西的农民也要靠挖煤吃饭。一个是社队自己办煤窑，农民自己挖煤；一个是当轮换工，参加国营矿挖煤。这样做好处很多，可以保持职工队伍的健壮，同时，也可以减少临时户口。轮换工，可以三五年一换，一个队五个人，这五个人回去，那五个人再来。当然，试行轮换工也要注意保留一些技术骨干。煤炭部要搞个轮换工的条例，订个统一的办法试行，逐步完善。现在用轮换工，只能少量的搞。因为大多

数煤矿并不缺工人。不能为了搞轮换工，原来的工人不动，加些农民进来，增加国家负担。要从实际出发，真正需要多少，就搞多少，逐步推行。

因职工顶替，女工大量增加，有些矿成为女儿国了。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研究顶替制度如何改革。矿区要通盘考虑，多发展一些容纳女工的行业。比如搞些服务小组，三五个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上边有个公司，管组织，管业务指导，管教育，不管经济核算。有些职工家属也可以在家里照管孩子和家务，把家务搞好，也是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我们现在是低工资、就业多，一个工人平均只赡养 1.8 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么低。当然，这方面的改革还有个过程。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过煤矿中的“以工代干”问题。基层干部制度要搞活一点，基层干部实行选举，谁选上来当队长、工段长，就拿队长、工段长的津贴。当什么干部就按什么干部待遇，不当干部就是工人，拿工人的薪金，当干部时的津贴也就相应减下来。原来的“以工代干”，要考核录用。如果笼统把“以工代干”的都提为干部或定为干部，有些人搞干部工作又不胜任，将来有很多麻烦。符合条件的，可以定为干部。不能胜任干部工作的，就仍去当工人。

统配矿有不少临时户，长期是“黑人黑户”，这个问题要研究个办法，可不可以由煤炭部、公安部、商业部会同拟个条例，规定具备什么条件的，允许带家属，上户口。比如说，当了多少年工人，还有什么条件，划出具体杠子，报国务院批准实行。这些多年积压下来的问题，原则上是要想法逐年解决。将来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实行轮换工的制度。

煤价太低，不利于生产，像东北、四川等地，许多小煤窑都关了，统配矿也亏本。但煤矿调价，牵动面很大，要慎重。也可以考虑计划内定基数供应的部分是一种价格，超出基数供应的部分是另一种价格。这个问题很复杂，应由计委、煤炭部、物价局会同研究，提出办法来。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关于调整农作物布局问题

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制订农业长期规划问题。我国农业的基本特点是，人多地少，适合种粮食的耕地不多，再开垦荒地潜力也不大；但是，可供利用的农业资源还是不少的，今后若干年内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在制订长远规划中，想到1990年，想到本世纪末，首先谈到的是粮食问题。我国现有人口10亿，估计到2000年是12亿，吃饭是第一位的大问题。适合种粮食的土地本来就不多，由于种种原因，还在日趋减少。现在每年进口粮食1500万吨左右，虽然对10亿人口来讲还是很少的，但对合理调整作物布局有很大作用。进口粮食也有一定限度，太多了也不行。所以，粮食生产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从整体上来考虑，我国适合种粮食的土地还是要种粮食。不要因为解决收入问题，每个地方都拿出一些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比如长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区、珠江三角洲等，适合种稻米，就种稻米好了；还有你们这里的一些坝子、平川适合种粮食，也得种粮食。至于这些地方农民感到种粮食收入低，不如改种别的划算，这个问题国家应从政策上考虑解决，给以适当的补偿。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要种粮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目前还在种粮食的地方改变过来。现在山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坡地，坡度很陡，叫“挂地”、

* 这是赵紫阳在山西考察时关于农业问题的谈话。

“大字报地”，仍在种粮食。上次我在承德，这次在五台，都看到不少这样的坡地。这样搞的结果，水土流失严重，旱灾呀，下游河床淤积呀，生态平衡问题永远不能解决。这样对全局是不利的。现在看来，作物布局的调整在有些地方还必须搞。有些还得退耕还林、退耕还牧。这样的土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还不清楚，可能还不少。如果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改种经济作物，粮食的产量要减少，那么这些地方就无法改过来。所以，要从全局上考虑，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真正能够因地制宜种植，发挥优势。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农业资源不少，有很多山区、丘陵、草地、水面可以利用，可以解决一部分食品问题。在我国人民的食物构成上，有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一种认为，中国可以向外国学习，以吃肉为主，这行不通；另一种认为，中国要完全靠吃粮食，这也不行。从长期来看，中国仍然是以吃粮为主，但是要逐步改变，增加其它成分。食物的构成是很多的。比如在山区发展畜牧业，养牛，养羊，养兔子呀，太行山还可种柿子、核桃、枣树呀，这些都是食物嘛。这样，就需要发展食品工业。中国人总不能老是这么穷，随着人民购买力的提高，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食品中制成品总得占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个过渡的时期。

在制定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中，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经济政策。现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许多地方都想减少粮田面积，扩大经济作物。每个省、每个县、每个公社这么一搞，适合种粮食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改种经济作物，那势必使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还得开荒。这样，既不能实现生产上的良性循环，又不能实现生态上的良性循环。在山区，过去历来是出山货，吃平川的粮食。现在搞得山区没山货，不管条件如何，都开荒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用力很大，收效甚小。大寨田有些是可以搞的，比如坡地比较缓一些的，搞了后效果好；有些坡度那么高，搞成大寨田，费劲很大，很难巩固，大雨一场就冲垮了。去年四川发洪水，就冲坏了不少。不如植树种草，发展多种经营更适合一些，同样可以解决收入问题、吃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转弯大概需要10年、20年。

调整作物布局，有些地方如平原解决得差不多了，有些山区还得调整。现在看来，没有全国的布局，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不行。要搞区域规

划。有的地方就是要种粮食，如果收入少，应该从另外方面考虑解决，如支持他们发展社队企业，或在价格上给以补贴等，使农民种粮食同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大体相当。这样，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山区就可以解放出来，山货就多了。从长远来考虑，要有许多过渡，一下解决有困难。

这里，就联系到一个水利方针问题。水利是要修的，过去30年修水利，第一有伟大成绩，第二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水利所发挥的效益，同国家和群众付出的代价不相称。光是修水利，要是水土保持、造林问题没有解决，水利的效果也不好。一个是没有水；一个是上边植被越破坏，下边修的水库淤积就越厉害。这方面应摆脱老框框的束缚，很好总结经验教训。

在制订规划中，食品工业要很好研究。今后粮食、多种经营，都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商品生产不同于自然经济，它有它的规律。只要是商品生产，就要有一系列的设施跟上去，像加工、运输、储存等。比如，在山沟里养牛羊，就要加工、往外地运输。因此，发展食品工业，发展商品生产，除了普遍号召以外，作为规划讲，各地要有重点，有所侧重。要搞商品生产就要专业一些，集中一些，以便解决相应的基础设施。现在，一般来讲，我们搞多种经营还带有副业生产性质，有啥搞啥，还没有商品生产的观念。商品生产的观念，同自然经济的观念、发展副业生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同志还不熟悉商品生产，将来的规划要考虑这个问题，要用商品生产的观点去指导生产。

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这两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质上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大调整。经过两年时间，基本上调整过来了。这次大的调整，不但农业生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持续增产，欣欣向荣。这主要是责任制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像晋北、豫东、鲁西北以及全国许多很困难的地方，情况比以前好多了，解决了吃饭问题；原来物质条件好的地方，什么水利、机械、化肥呀，现在更发挥作用了。这次调整，中央有号召，群众自觉搞，可以说是符合群众的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不然的话，农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是说到此为止了，农村生产关系也不是调整到这里就完了。现在，要防止两种现象：一种认为现在群众积极性这么高，就大事告成了；另一种就是老框框，一说要有统有分，在包的基础上搞联合，马上又是过去“左”的那一套，那就会把农民的积极性又压下去。农民怕变，就是怕这种变；因势利导的变，实际是农民的要求，他并不认为是在变。在保持农民积极性的基础上，如何根据农民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是全党面临的新课题。我们要总结经验。从发展看，中国农村不可能是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尽管现在有些地方一搞责任制，实际上是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搞法，在一个时期内，这也是必要的。因为，目前生产水平很低。实行责任制后，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了积极性就好办了，生产就发展了。但还要解决发展商品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问题。当然，这个路子比较长，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今后路子怎么走，不能用一个固定模式去套。要密切注视群众中间的新创造，研究它，分析它，取其利，去其弊，使责任制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全党要像合作化时期领导合作化那样，集中精力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报上登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的调查报告，讲责任制中统、分、包的关系，讲得比较确切。责任制中有统有分，包是统与分的结合。承包是一种好的形式。雁北地区实行的工副业专业承包，农业实行“以劳划成，以成包产，以产定地，土地联片”的办法，劳力强的多包，劳力弱的少包，无劳动能力的包，这是比较先进的，但也不要排斥其它办法，几种办法可以并存。当然，就是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不大好解决：一是定产比较麻烦，大家愿意定低一点，不容易定准；二是受了灾，评减产多少也比较麻烦，好坏地受灾不一样，种什么作物也不一样，评灾比较复杂，农民怕基层干部不公平，容易引起纠纷。当然，其它几种形式，比如按人劳比例承包土地，完全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也各有优缺点。是搞专业承包，还是按人劳比例包，按人头平均包？统哪些，分哪些？先专后包，还是先包后专？包到户，还是包到组？是联产，还是不联产？这些都要根据群众的自愿和生产的发展来定，不拘一格，出现一点问题也不要大惊小怪。凡这类问题，我看有两条：一是方向明确，二是不必着急，可以慢慢来。等

到农民都感觉到是个问题的时候，自然就可以解决。有一个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问题，勉强搞不一定好。1979年最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那时上上下下都不那么明确，有的就走过了曲折的路。农民第一年搞包产到户，不仅平均包土地，而且拖拉机也拆的拆，卖的卖，机井也不要了，渠道也填了。第二年觉得不对头，又开始买拖拉机，把渠道、机井也恢复了。去年1月我去兰考，县委书记给我讲，一开始包，地都分成一条一条、一垄一垄的，第二年农民感到不利于生产，就作了调整，比较集中成片了。现在有些按人口平均包地的地方，一开始农民都高兴，愿意都包一块地。慢慢在实践当中，有些人就愿少包一些土地；有一些劳力强、技术高的又愿意多包一些土地。还有一些能工巧匠，专业户、重点户呀，多种经营搞开以后，他就做不过来，感到包土地是一种负担，很可能愿意少包或不包土地。责任制是会起变化的，农村终究还是要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农民需要有经营的自主权。在我们国家，家庭式的或小组为单位的承包制，这种经营方式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各种层次的经济联合。因为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劳动力多地少，我国的农业将来可能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而不一定搞耗能多、自动化程度高的。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就是劳动加科学，这样一种性质的农业，它不一定需要大规模经营。农业大规模的统一经营，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不一定适合，多年来证明了这点。从实践上来看，这种农业并不是规模越大越好。美国的农业到今天，还是家庭农场为主；西欧国家基本上也是家庭农场。所以农业跟工业不同，当然工业也不是和过去人们想的，都是大的，还是有大有小。美国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成功的并不多，往往竞争不过家庭经营的农场。家庭农场需要别的方面来配合，需要什么呢？农业机械公司呀，饲料、化肥公司呀，植保公司呀，商业的购销公司呀，等等，需要这样一些社会化的生产前的、生产后的公司来为它服务。当然美国的家庭农场比我们还是大，土地还是多。我国又是山地，又是平原，自然条件也很复杂，人多地少。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将来也不一定都再回到以生产队或大队为单位统一经营，像农民家庭式的承包制、小组的承包制，很可能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但是，以家庭或小组的承包单位搞“小而全”，什么都有一点，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这种形式将来

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如果那样长期存在，我们农村就没有出路了。作为方向来讲，我认为它还是要变的，变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生产，同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看来这个过程是相当长的，而且全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早，有的可能晚。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的需要，来因势利导，逐步过渡。我们从现在算起，准备10年、15年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也不要一个早上都搞，也不要全国一样，有的可能快一点，有的可能慢一点。

在完善、发展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培训基层干部的工作十分重要。山西省搞责任制起步比较晚，但训练教育基层干部这一条抓得紧，省委专门拨出经费，一年多来下功夫训练了35万干部，解决了同群众“顶牛”的问题，工作很快就跟上来了。据我们知道的情况，全国相当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对这一次大转变、生产关系的大调整是“不理解”，“不适应”，思想不通，发牢骚。出现了混乱现象后，他不摇头，不点头，放弃领导。加上对新的一套不适应，“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出了问题不知所措。因此，必须进行再教育。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是什么，该怎么样办，通过轮训，向干部讲清楚。这样就可以使基层干部明确方向，改变领导不力的状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各地都要继续抓好。

关于专业户、重点户问题

专业户、重点户的出现，是一件新事物，它是专业化商品生产的雏型，是农村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过渡形式，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值得重视。像晋东南地区，目前专业户、重点户已发展到14万户，占总农户的14%，还有继续发展之势。

专业户的发展，它就慢慢从“小而全”里面分离出来了。第一步首先是与农业和种植业分离。专业户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可能不搞种植业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或者其它业自己也要分离。养鸡的，也不是从孵小鸡开始，而是有的专门孵小鸡，有的专门养大鸡。养猪的，可能有的专门养母猪，有的专门养公猪，有的专门养肉猪。种植业里面将来可能有人专门搞育种，搞植物保护，慢慢就分离开了，专业化了。专业化本身就要求社

会化。一专业化，就你为我服务，我为你服务。还有个产供销问题。比如销售，你现在自己养鸡，自己到街上卖鸡蛋，将来就可以专业化了，卖鸡蛋专业化，可以托人专门去卖嘛！当然这个东西有个前提，是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农村畜牧业的发展，就可能产生牛奶加工的问题。将来农业的发展结果，就可能产生食品加工的问题。这都需要人去做，他一搞，就专业化了，从农业里就分离出来了。总之，发展方向是专业化、社会化，但经营单位还是很小的，还是承包的办法。

现在农村政策一放宽，马上出现一种情况：会经营的人、有技术的人就大有用武之地，会出现一批冒尖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大体上是两种人：一种是有手艺的能工巧匠；一种是回乡知青，他们钻研技术，有文化，接受新东西快，脑子灵活。在全国农村，特别是在商品比较发达的地方，才搞了两年，就出现了这样一批人。他们的本事很大，非常善于经营，技术水平又高，经营的事业发展很快。像襄垣县桥头大队的重点户王明安，过去生产队猪场5个人搞饲养，现在他一家包了，饲养生猪46头，还种地17亩，每天磨粉100多斤。武乡县石窑会大队高庭朝父子二人，承包林业，两年荒山造林530亩，育苗67亩，一户两年造林等于该大队30年造林总和的一半。专业户、重点户中已出现不少万斤户，也有万元户。随着重点户、专业户的发展，就出现了联合的问题。一种是专业化联合，户与户之间，或者是会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联合。善于经营的人和一般的劳动者怎样联合，是个新课题。这当中要注意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光有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不行，还要照顾经营者的积极性。这就不能像办过去合作社那样的合作形式，社长和社员一样评工记分。要采取适当形式，使会经营的人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有些地方搞合股，也可能是一种形式，在实践中继续去创造。将来可能出现多种形式的专业联合、专业联合体。联合固然是一种形式，但专业化不一定都搞联合，也可能有一部分是一家一户的专业分工长期搞下去。在专业的基础上社会化，客观上也是一种经济联合。我搞一种专业，你搞一种专业，你搞一道工序，我搞一道工序。我这种专业离不开你，你这种专业离不开我。它不是自然经济，不是“小而全”。

最近，看了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报道浙江金华地委书记提出的意见，值得研究。这些意见概括起来有三条：第一，今后农村发展的道路必

须走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第二，必须使农民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有些将来可能走上集体联合公司，相当一部分还是家庭经营，就是承包的办法，由农民自己经营。这一条很重要。过去，主要的问题是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因此，农民没有积极性。实行责任制后，农民同集体的关系是承包关系，和整个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但是，经营还是农民自己负责。第三，必须突破以队为基础的框框。金华地委的同志认为，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分配单位则太大，作为生产社会化的协作单位、多种经营单位又太小。广东的同志也提出，双包到户后，生产队的作用不大了，应以村为单位，副业可以承包到组、到户，农业承包到户。村子很自然形成一个单元，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的文化、教育建设，都要靠村来搞，发挥村的作用。比较小的村，几十户的村庄，百把户的村庄，这样搞有利。太大的村，几百户上千户那就不行。以上这些东西，同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一致的。一定要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解决。不能靠政治运动，不能靠主观随意性，想怎么就怎么。

农村有些问题我们要沉住一点气，看一看，明显的经济犯罪要抓。凡是有对的，又有不对的，有些虽然看来不是发展方向，但社会又需要的，最好多看看，将来能找到一个存利去弊的方法。把起积极作用的方面保护起来，消极方面加以限制，去掉副作用。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简单取缔的办法。戴上帽子一下子没有了，矛盾并没有解决。每一个东西的产生，都有它的需要。我们要研究用什么办法代替它，如何引导它，不要用简单的办法把它割掉。雇工问题出现了，农村中有一些户刚刚开始产生雇工，不一定马上采取行政措施去解决，要研究用什么形式来代替。重点户、专业户、会经营的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必然会超出家庭的范围。他要发展商品生产，人手不够，怎么办？采取什么好的形式，现在还没有找到。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办集体的办法，走老路，搞来搞去，又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城市里我们开了口，一个人可以找2个帮手，带5个学徒，还是叫个体经济。农村现在还没有研究好。广东高要县有个叫陈志雄的，他会经营鱼塘，一开始包了8亩鱼塘，产量提高得很快。很多队愿把鱼塘包给他，他包了300亩，产量很高。他管不过来，又雇了人，工资高，每月100元左右。完成了生产队的承包任务，生产队满意，被雇的人也满意，

他自己也发了大财。让他搞下去，可能包到上千亩。安徽芜湖市有一个炒“傻子瓜子”的，这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各地炒瓜子的方法他都作了研究，取各家之长，他现在炒出的瓜子质量好，价钱比别人便宜，他雇了10来个人，每月90多元工资，他自己更多，生意很好。对这些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资本主义，要取消；另一种认为，这些事给我们以启示，这样会经营的人才，为什么30年来不能发挥作用？我们能不能找出这样一条路子，既能发挥人才的作用，又能克服消极的方面。北京郊区就有些人很会养鸡。将来能不能搞集体经济承包制，同集体经济挂钩，吸收他们来搞。但要让善于经营的人来牵头，这样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个人也有利。现在的小饮食店，服务行业，也可以考虑采取这种形式，包给一个人来经营，吸收其他人参加。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取其利除其弊。这些善经营者、有技术的人，让他们把才能发挥出来，对社会生产力会有很大提高，这是利；弊病，就是雇工、剥削、投机倒把等。要研究一下，因势利导，逐步寻找、研究恰当的办法，把积极的方面保存起来，把不利的方面加以限制、去掉，不要简单从事。

专业户确实是个突破。这刚刚开始，还要发展，在发展中有些什么问题，要很好地研究，当然有些明显的影响比较大的违法的要处理。总的讲，要调查研究，要沉住气，天塌不了，不要急急忙忙。各种意见都可以讨论，可以动口，不要动手。不要一棍子打死，打死就没有了。这些事也不要再在报上宣传。从根本讲，要从群众的实践创造中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在办公室里是很难想出来的，要从群众中精心去发现好的经验。有些东西刚出现，不完善，要研究；有些东西可能要允许，但要加强管理。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央指示中专门讲了，一条是不要把运动搞到农民、工人中去；还有一条，经济搞活以后由于管理制度、办法没有跟上而发生的问题，不要作为违法问题处理。有些事界限还没有分清，比如长途贩运，什么可以贩运，什么不可以贩运，现在国家还没有规定，所以还不要打击。当然这些问题要调查研究，等讨论后，将来要立法。再搞上一段看。

关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问题

这次我们看到，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给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农业生产要持续地增产，要靠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要靠推广科学技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对科学技术的力量，决不可忽视。今后20、30年内，世界农业一定会出现一些新东西，可能有大的突破。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今后5年、10年搞什么，真正能见效果的，要下功夫扎实抓几项。像种子、复合肥料、高效低毒农药等，要千方百计搞出成绩来。各地也还有许多好的生产技术，应因地制宜推广。比如，壶关县晋庄大队“有机旱作”的经验就很好。秋天雨水比较好，雨后土壤水分保养好的时候，就深翻，加进农家肥、磷肥，第二年播种时不犁不翻，可以保水抗旱。1973年广东海南岛有些地方种植甘蔗时采用过这种办法。那里有很多荒地，过去种甘蔗种不成，后来采取这种办法，在台风后，深开沟、深挖、深翻，下有机肥，秋天种上；长半年，第二年春天旱时，已扎了根，抗旱能力强，旱不死；到5月下雨，就长起来了。后来我们提倡这种办法，1亩地甘蔗由半吨产到3吨以上。看来这种办法特别在北方有普遍意义。

专业户、重点户是学科学、用科学的带动力量。我们的科研人员应当把他们作为联系的重点。要提倡搞技术联产责任制；还有防疫，可以搞技术承包合同制，保险也可以搞，也需要。养多少猪，养多少鸡，收一点费，万一发生了问题，发生瘟疫死掉了，可以赔偿一部分。这样，专业户、重点户的顾虑就少一些。防疫的人员，可以和重点户签订合同，我来包，检查、指导、打防疫针，你也出些费用，如果发生了问题，也要赔一些。要研究这些办法。这样，搞科技的、防疫的，也就有用武之地了。也不是像过去应付差事，吃大锅饭。谁搞得好，专业户、重点户就信任他，欢迎他，他的事业就发展了；不好的，不负责任的，谁也不找他。好坏就考验出来了，这样就把科技、防疫带动起来了。还有饲料工业，重点户一发展，饲料工业就重要了，加工、储运这一套就带动起来了。

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这些科学技术推广机构如何设置，也应好好研究，总结经验。过去用行政的办法，一个公社设一个，人配齐了，成了机关，结果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即使服务搞得不好，推广成绩大的，也

局限在一个公社，作用受到限制。我们不少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推广机构，经费养了人，吃了饭，要搞研究和应用，一无手段，二无经费。看来一个公社设一个摊子，没有那么多的科研人员，钱花了，起不了多大作用，不一定再采取这个办法。有关农业、畜牧业、多种经营的科研和应用，可以考虑在一个县搞几个服务中心或科技咨询处，同农民签订联产承包合同。搞得好的事业就发展，搞不好的就赔本。这样，科研的成绩越大，经费就越多，科研的力量也越大，科学研究事业也就搞活了。

正确认识经济形势 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点，当前的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经济形势是好的。无论农业、工业、财贸，工业中无论轻工业、重工业，形势都是好的。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主要是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今年各个方面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信心增强了。但是，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我国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要达到这个要求，还要经过长期、艰巨的努力。我们说财政经济情况没有根本好转，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

首先是财政还存在很大困难。财政是国家经济情况的综合反映，虽然去年比前年好，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又增加二十多亿元，但要看到去年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在大量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情况下取得的。今年的计划原来安排三十亿元的赤字，从上半年的情况看，财政收入虽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但支出增加更多。上半年收大于支不到二十亿元，比去年同期少了三十亿元。如果不抓紧，今年赤字有超过原来计划的危险。讨论“六五”计划的时候，预测最近几年都还有赤字。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能够承受的情况下，一个短时期内有少量赤字，也不可怕。但不能靠大量赤字来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现在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为了今后的发展，想办一些必要的事，也感到有些捉襟见肘，周转不过来，原因就是财政困难。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财政困难有多种因素。我们认为，主要来源于工业的经济效益差。当然，工业企业本身也有许多困难，如要安排就业，农产品和其它原材料有些提了价，工资和奖金增加了一些等，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但必须看到，企业的整顿工作还抓得很不够，工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转变还不大，许多企业在改进经营管理、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还很不理想，使工业利润上缴计划完成得不好。其它行业也都存在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来自工业的收入是财政收入的大头，工业的效益不好，就势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二是能源和交通严重落后的情况，短期内还不可能根本改变。这几年，我们在调整农、轻、重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同时，虽然在能源的节约和开发上、在交通运输的建设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从国民经济的总体上看，能源、交通的建设仍大大落后于加工业的增长，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年以来，油、煤、电、运全面紧张，供需之间的矛盾很大。还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才能得到缓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没有大的改观，要实现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

三是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严重不合理。现在，适合社会需要的和短线的产品生产不足，而产销不对路的和长线的产品又生产过多，库存积压加大，工业企业产成品占用资金上升很快。今年五月末，全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占用资金为二百一十二亿元，比去年底又增加二十三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品种花色陈旧、质次价高、产销不对路的滞销货。改变这种产品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需要做艰苦的工作，不是一下就能做到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也是这样，全国企业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万个发展到三十八万个，有不少是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消耗高、质量低、效益差，亏损面相当大。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加重了我国经济上的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 and 企业的整顿，有待于具有相当深度和相当范围的改革。

总之，对经济形势既要看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年各方面又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也要看到财政经济情况还没有根本好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第二点，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

大家很关心的“六五”计划的编制即将完成，在制订“六五”计划中，我们也联系讨论了今后二十年如何发展的问题。根据中央常委的多次讨论和去年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精神，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战略阶段：八十年代这十年，主要是理顺比例，提高效益，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到九十年代的十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小平同志最近接见外宾也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在本世纪末，将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这中间，八十年代的十年，变化不会很大，主要变化在九十年代，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那个时候，中国的日子就好过了，但也并不富裕。到那时，我们将建立起很可靠的、良好的前进基础。然后花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真正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们要积极做好当前的工作，为今后经济的振兴创造条件。

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能不能实现，决定于八十年代这十年究竟怎么搞。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前十年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太高，但基础工作、准备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做好，这是关键。前十年基础打好了，后十年有可能出现高速发展的时期，比如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水分少，效益好。我看这是完全有希望达到的。耀邦同志讲，不能把困难留给后代。要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八十年代把工作做扎实，这样就给后人奠定基础，开辟经济振兴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代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关键是抓好四条：

(1) 搞好调整、整顿和改革。六月初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记者问我，中国的调整原来说搞三年，现在又说要搞到一九八五年，究竟调整要搞多久？我说，作为一九七九年提出的那种意义上的调整，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缩小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现在讲的进一步调整，不是简单地下马、收缩，而是要进一步使我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包括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这个意义上的调整，还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抓好了调整和整顿，把各种关系理顺当，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这样才有“后劲”。除了进一步抓好调整和整顿外，中国的经济体制必须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的合理化。不改革没有出路，但要有计划地、稳步地进行。八十年代要解决这个问题。

(2) 要认真抓好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对大多数行业来说，主要不是扩大生产能力，而是要真正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为了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把机械工业的改组、改造放在重要地位。劲夫同志的讲话中提到，我国机电产品二点八万个品种，其中需要更新淘汰的有一点六万个，约占百分之六十。现有的风机、水泵，大多数是仿苏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老产品。轻工业产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六十年代水平，百分之二十左右是三四十年代水平。设备落后、技术落后、工艺落后，因此产品就落后。如果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不认真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我们就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当然，这件事也不能一下子全面铺开，应当分别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像机械工业首批抓三十个产品、一百个厂、三百个协作厂及科研设计单位，使整个机械工业的技术改造由此着手而逐步展开。这就是正确的部署，是向着振兴机械工业进军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对整个机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都具有重大意义。

(3) 集中力量搞好重点建设。中央常委很关心为下一个十年作准备的建设规模问题，最近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形成一个观点，就是要千方百计挤出一些资金来搞重点建设。由于财力、物力的限制，“六五”计划以至“七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总规模不可能铺得很大，需要适当控制。但在计划安排中，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点一定要突出。所谓重点建设，主要是指能源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也包括救活一九七八年以来引进的一些成套设备，把它安装起来。抓好重点建设，加快煤、电、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之在今后十年内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是使整个国民经济由被动转向主动的重要一环。基础设施太薄弱的问题现在不解决，将来还得搞调整。日本五十年代经济也很困难，但他们看准了煤炭、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就集中力量去搞，他们叫这种做法是“倾斜式”的生产方式，后来取得了

成功。世界上也有不少类似的经验。我们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凡是看准了的事，一定要下决心搞，宁肯把弦绷紧一点，各方面挤一挤，也要拿出力量来干。搞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不能像过去那样冒冒失失，又来折腾；但对一些经过努力能做到的事，要努力争取去实现，不能过于求稳，无所作为，贻误时机。当然，搞重点建设也需要量力而行，讲求实效。除了适当增加一些新项目外，对一些在建工程，要增加一些投资，缩短建设周期，加快建设进度；还有一些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也要抓紧搞，列入计划。只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搞上去了，我们就可能不仅在“六五”和“七五”计划期间实现“保四争五”、“保五争六”的速度，而且九十年代会有更快一些的速度。

（4）大力培养人才。前十年除了在物质上作准备外，还必须在人才培养上为以后的发展作准备，要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要通过各种方式，培训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大力提高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为此，对教育方面的投资要适当增加，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待遇，特别是对中年知识分子的待遇要抓紧解决。

第三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一些要求

今年上半年预计全国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以上。由于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上升的幅度很大，基数高了，所以今年下半年增长速度会减慢。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全年还是维持“保四争五”的目标，不作更改。

下半年总的讲，要继续认真抓经济效益，切实解决产品的质量、品种、消耗、适销对路等问题；努力增收节支，完成利润上交任务，确保全年财政收支计划的完成，财政预算打的三十亿赤字，只能少，不能多，劲要用在这些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一个水分比较少的增长速度，经济才能继续保持稳定。要看到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跟不上，搞不好就会今年上明年下，各方面都造成不良影响。

今年下半年要继续认真抓企业整顿。几年来我们大多数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确实有少数企业很不像话。最近看了一个材料，甘肃盐锅

峡化工厂一位同志写信反映该厂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厂从一九七一年投产以来，年年亏损，一年比一年多，十一年共亏损二千五百二十万元，即使全厂工人什么都不干，每人每月发二十五元生活费计算，也可发四十五年。厂里歪风邪气很厉害，经营管理混乱。这个厂很典型，但也不是个别的。这样的企业只要整顿好了，潜力很快可以挖掘出来。各地对整顿工作要加强领导，决不能走过场。

下半年要在开发能源、增加运输力量方面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同时要强调进一步抓节约能源。谭启龙¹、鲁大东²同志对我讲，四川今年抓了安三个表：水表、电表、气表。这样一抓，许多单位天然气节约一半，水、电也节省很多。浪费遍地皆是，稍微一抓就见成效。前面说的全国现有的风机、水泵多是性能落后、耗能很高的老产品。据统计每年耗电占全国用电量的百分之二十八，应加快步伐，一批一批进行更新改造。锅炉比较复杂一些，也要有计划地改。节能的问题，决不能松劲，看来还得采取一些有力措施。包括对那些消耗能源多，而产品质量差，供过于求，大量积压的，要限制生产。经验证明，解决产品大量积压的问题要抓两头，一方面要沟通城乡商业渠道，扩大销售；另一方面必须及时调整生产计划，进行限产。这就是要实行“灵活反应”的计划指导。

下半年除了继续突出抓企业的整顿外，对企业的调整，企业的关停并转也要开始着手抓。质量差、消耗高、亏损多的企业不进行关停并转，社会经济效益是不可能提高的。我这次到山西，长治市委讲，去年还有亏损企业十八个，今年以来进行调整，关了三个，并了一个，到五月份，大部分企业已扭亏为盈，只有二三个还有亏损。总之，对企业的调整，要逐步列上议事日程，明年要进一步抓。要搞好调查研究，制订规划，狠抓落实。

第四点，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国务院机构改革前一段时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展是顺利的。但机构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各单位一定不要松劲，不然就会功亏一篑。各部委除了继续抓好老干部离

休退休和安排、完成紧缩人员编制的任务、轮训各级干部工作外，还必须把改进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作为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切实抓好。机构合并精简以后，适应新的形势，各部委要制定工作制度，明确职责范围，改进工作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使我们不但有新的机构，新的班子，而且有新的作风，新的面貌，把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一步。以上这些，工作量还很大，也很艰巨。当前机构改革这件事，也如同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如果松下来，不仅不能扩大成果，原有成果也巩固不住，还可能走回头路。所以一定要善始善终，继续前进，不能半途而废。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不可能是很彻底的，并且势必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已经改革了的机构，不仅同多年的习惯势力、传统作风发生矛盾，而且同尚未改革的现行经济体制会发生很多矛盾。比如现在一个部只有四五个正副部长，要是按照老办法，开什么会都要部长来，这一条就吃不消。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已经改革的行政机构是向前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还是遇到困难就后退，走回头路呢？这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所以，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就必须相应从工作制度、作风、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加以改进，甚至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干部减少了，机构精简了，就要考虑把有些权力下放一些，不要过于集中，以发挥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今后遇到矛盾，遇到困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领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一点。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我们是在经济体制没有全面改革以前先进行机构改革的，因而是很不彻底的。但应利用这个改革，去促进经济体制和许多方面的改革，为今后的全面改革创造条件。

注释

1. 谭启龙(1913-2003),江西永新人。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政府主席,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省委第一书记,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省人大主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四川省顾委主任。

2. 鲁大东(1915-1998),河北馆陶人。时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四川省顾委副主任。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解决野蛮装卸等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八日

上海港装卸队长李仁源同志反映的材料值得重视。“文化革命”以来的一个长时间里，由于思想工作薄弱，制度废弛，装卸工作和储运工作中较普遍地存在着随意偷窃、野蛮装卸、保管不善等问题，不仅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声誉，政治上的损失更不可低估。上述情况，尽管国内外曾有过多次反映，中央和国务院也作过多次批示，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看来，对这样一个“老大难”问题，仅仅是一般地批一下，讲一下，已经不够了。要真正地彻底地加以解决，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增强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外，还必须深入下去，对包装、运、储、装卸中的技术装备、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等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找出症结所在，提出综合治理的措施。此事建议请经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并吸收一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热心于改变这种状况的、退居二线或离体的老同志参加，先以港口为重点，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应采取的对策，报送国务院审定。上述意见，请抄送外贸、交通、铁道、商业部及物资管理局。

* 这是赵紫阳对上海港八区装卸队长李仁源反映野蛮装卸问题材料的批示。

商业要对工农业生产发挥促进引导作用*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一、商业要在生产流通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商业对生产不是“砍”和“赶”的关系，应是“促”和“导”的关系。“促”就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导”就是引导生产部门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生产。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都由商业包下来，对消费、对生产都不利。

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在生产、计划管理、体制等方面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商业部门要十分认真地分析、研究农村的新形势。商业工作要有利于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现在农业生产实际上是以农民家庭或小组作为承包单位进行的，从长远看，农业生产必然要向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商业要促进这种发展，不能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

过去的管理体制有许多弊病。主要是工厂不关心市场，市场的变化也影响不了工厂的生产；工厂不关心技术进步，甚至抵制技术改造；城乡有本事的人不能发挥作用等。现在经济一搞活，能人就出来了，他们搞商品经济很能干。当然，发展中也难免会出现缺点、弊病，但要沉住气。采取简单的办法消灭这些东西很容易，但搞不好往往把有能力的人也打下去了，把搞活经济的优点也消灭了。要研究如何因势利导、存利去弊的路子，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听取商业部汇报时讲话的要点。

通过实践找到更好的代替形式。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货畅其流，活跃市场，一富国家，二富农民，这是件大好事，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适应这个形势的发展。

二、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优质不优价，劣质不降价，这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要把价格调节和计划指导对立起来。对农业生产要实行计划指导，价格调节应作为计划指导的一种重要手段。农村的自主权要多一点，限制措施要少一点，办法要活一点。

农业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农民同国家交换的商品就多了。商业就要通过价格调节农业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把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系。

对价格问题要作全面分析研究。如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趋势如何，购销能力究竟有多大，有关部门要提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对农业生产实行价格指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要定得合适，有许多东西应该逐步实行浮动价格，这样有利于农业的合理布局。价格如果定高了，会刺激生产的盲目发展，并把销路堵死。

城市小商品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试行工商企业协商定价的办法，打开一条路子。现在的小商品，一种是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价格高，销不动；另一种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价格低，造成生产萎缩。有的省有计划地把小商品的价格开放了一点，就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市影响大，小商品价格的调整可以放后一点。

有些滞销产品完全走降价的路子，最后不一定多销。有些东西，在这个地方降了一点价，可以多销一些；但如果各地同时降价，销量就不一定增加很多。如化纤布，要研究市场的购买潜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大幅度降价，财政上就受不了。总之，要全面分析，不能让表面现象掩盖问题的本质。

三、农副产品收购政策要稳定

现在农副产品的生产和收购总的情况是好的。对已经发现的一些问题，可以研究，但改革收购政策要慎重，全面改革需要有一个总体设计。现在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不要因几十亿斤粮食的缺口就对农副产品收购政策进行大的变动，要防止把刚刚好一点的形势又搞下去。

粮食统购、派购、加价的政策不能轻易改变。要坚持粮食收购基数，基数就是任务，就是义务负担。粮食不怕超产，要下决心使适合种粮的地方安心种粮。从长远考虑，粮食增产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此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重点产粮区要逐年降低一点收购基数。第二，多生产的粮食通过议价或加价收购，使农民种粮食的收入与种经济作物的收入不要悬殊太大，保持他们种粮食的积极性。算总账，加价、议价粮还是比进口粮合算，可以考虑增加国内粮食收购数量，减少进口，把减少进口粮食的补贴转为对产粮区的加价补贴。第三，不要给山区压粮食生产任务，要鼓励、帮助山区发展土特产品生产，但价格不能定得很高，以免过分刺激山区土特产品的发展而加剧与产粮区的矛盾。本来适合种粮食的地区，为了增加收入而改种经济作物，既不符合自然规律，也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调整农业布局就很难落实。

棉花收购政策不要变，还是一斤棉二斤粮，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现在有些地方缩小粮田改种棉花，从根本上说是钱的问题，这是农民的自发转移。可以搞粮棉挂钩，在完成粮食基数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作物，多交棉花，多给粮。我国的棉花（包括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还要因地制宜，继续发展。有些农民投机取巧，在应种粮食的地方不种粮食而种棉花卖高价，不能允许。

当前农副产品收购方面，一是粮食问题，不要因为暂时有缺口就大动干戈，要搞稳一点。这两年粮食购销平衡如有困难，可以暂时多进口一点，以免把农村经济搞死，得益不多，失利甚大。二是有几种农副产品多了，主要是价格太高，盲目发展，如油菜、烟叶、红黄麻等，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限制。三是南北方、新老产棉区收购基数高低悬殊、收益不均的问题，要逐步适当调整一点基数，但不要太猛。

对于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

(一) 原则同意把现在的一、二、三级批发改为两级批发，大大收缩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二级站，但步骤要稳一点。

(二) 对农副产品今后应当逐步减少定基数的品种，扩大按比例加价的品种。属于在相当时期内鼓励继续发展的品种，可规定牌价收购和加价收购的比例；属于需要控制发展的品种，在实行比例加价的同时，确定收购计划，计划外的实行浮动价格。

(三) 将商业部食品公司经营的业务(包括经营机构、设施、购销调拨)划归农牧渔业部，是一项大的改革。把生产和供应拧在一起，可以减少矛盾、提高效益，从长远看，这条路非走不可。但具体做法需要认真研究，目前暂不作决定。

(四) 对高利商品要加税，收入归中央，可以按比例返回给地方一部分。这样既可以保护地方积极性，又可以减少盲目生产的弊病。

(五) 要关心商业职工的生活，逐步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涉及工资制度的问题，要通盘考虑，目前一律不动。

企业整顿必须抓住主要矛盾*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

一、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和能源的可能相平衡

东北不再热衷于更高的增长速度了，这很好。更高的速度就要烧油，绝不能再把石油用于燃料，不然这个门一开，好上不好下。拿油发电去争那个速度，好多东西生产出来又积压，不如直接出口油合算。我主张国内国外统一算一算账，用烧油生产铁合金上算，还是进口一些铁合金、出口油上算？要怎么合算怎么干。拿油发电，要很谨慎，搞不好，上去容易下来难。在特殊情况下一定要烧，也必须限期限量，明确什么时候停止烧油。根本的问题是工业的发展速度要和能源的可能相平衡。我们不能勉强争那个速度，把煤炭库存吃光，又去烧油，搞不好明年速度还要下降。用这种办法缓和煤的压力，这不是个好办法。不是说绝对不能烧油，暂时周转一下还是可以的。不顾能源的可能去强求速度，不可能有好的效益，势必造成被动。用油去发电，本身就违背经济效益的原则，这就是把速度放在效益之上了。有很多事情就是一步一步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对烧油的问题就一定要注意不能造成这样一种形势。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全国企业整顿座谈会汇报时的讲话。

二、整顿要出成果，出效益

要把辽宁、黑龙江的材料再分析一下，如果真是整顿的结果那就很好。整顿要出成果、出效益。要分析一下，胸中有数，真正整顿出了多少效果。有很多地方搞整顿是从反浪费人手的。不光是沈阳，牡丹江也是这样。牡丹江市通过搞查、比、算活动，今年头五个月，地方预算内企业上交利润比去年同期提高 73%。上海有一个材料分析，原材料占总成本的 84%。企业原材料的浪费很大，不能光讲社会负担重、原材料提价、贷款利息高等客观因素。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企业应该把这些变为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通过挖潜节约，把外部增加的负担补回来，而且还要超过。日本政府就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原材料、能源价格的提高，通通不能简单地进入成本、减少利润。油价提高了 1.5 倍，物价只许提高 22%。因此，第二次石油冲击，对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美国就不行。美国条件比日本好得多，大部分油是自产的，进口的只占三分之一，而日本全部靠进口。

三、对企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

我们对企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同志们要求给企业以利益，以自主权，给予一定的活动余地，这都是对的。不能把企业捆得死死的，无论如何不能走这条路。最近，苏联一个院士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苏联工业生产下降，主要是企业自主权太小，成堆的指标把企业捆死了。一个生产一亿米布的企业，连动几百卢布的权都没有。解决的办法，他只讲了物质刺激，没有讲改善经营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要求是对的，是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动动摇摇。

但是，另一方面，当前工业领导上有一种倾向，就是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划给企业一块，企业多得，国家少得，而不是通过一种政策，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要给企业以利益，另一方面也要给企业以压力，有压力才能显出来企业经营的好坏。想在优越的条件下，简单地把国家的利益划给企业一块，这不是改革的目的。企业要有一种思想，要把加税、加利息等等当成一种动力，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挖掘潜力，

提高经济效益。不能打破了“吃大锅饭”又搞另外一种“吃大锅饭”。要吃“小锅饭”，只能发那么多“米”，经营好的够吃以外还有节余；一般的紧紧张张刚够吃；经营不好的吃稀饭。

我们的政策、办法要奖勤罚懒。特别努力，经营好，收益大的，得到的利益就大；经营一般的，能够过得去；经营得差的，理所当然地不应得到利益，甚至要受到适当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锻炼出一大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真正把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当然，企业有困难，负担很重，但是主要是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解决。企业不能又想改革，又想旱涝保收。要想一种办法，即在不吃“大锅饭”的条件下，让企业紧紧张张地过日子，这样有好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一些，就是没有人给它开“包饭”。这两年，有些企业任务不满，其中相当一部分打开了局面。但是有的“三大件”定点的企业，因为打了保票，进步就不大。没有定点的企业，却紧张起来了，努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很有进步。这说明，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让企业躺在优越的条件下“吃大锅饭”。要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去搞，扩大企业自主权就能发挥作用，就能使企业领导干部和工人的注意力转到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内部的潜力上来。

企业的浪费，主要是原材料、动力消耗大，废品多。社会的浪费，主要是质量不好，产销不对路，产品积压。吉林省安图县出的牙签，剔一次牙就断一根，而且还断到牙缝里。剔一回牙，过去用一根，现在用四根，社会效益降低了三倍。去年我去墨西哥，从上海买来的棉毛衫，质量不好，穿了两次就开线了。上海整个工业，原材料、动力消耗占成本的84%，如果降低1%，就可以增加利润2.5亿元。企业要认真从这方面努力。应当从改善经营管理，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来克服浪费，挖掘潜力，增加收入。

总之，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使它有用武之地。但是要有个限度，就是不努力挖潜就没有利益，经济利益必须建筑在努力挖潜上。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不能光讲权、光讲利。决不能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但是给企业的条件很优越也没有好处。要靠政策，不能靠照顾。不能靠减少国家的利益去搞改革，要凭企业的真本事。苏联那个院士的文

章说，对什么样的厂长，国家应当给他较大的权力。我看有两种厂长，一种是以首钢周冠五为代表的，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把企业搞好，对国家多做贡献，这种厂长就要给他权大一点；另一种就是光想着挖国家，对这种厂长，权就不能给他。

四、企业整顿要敢于触及尖锐矛盾

对尖锐的问题不敢触及，就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克服领导软弱状态。领导班子、劳动组织、人浮于事、关停并转，这几个问题不敢触动，那还算什么整顿？根本的是决心问题。领导班子还是那么老，人还是那么多，有能力的上不来，这怎么行呢？企业里那么多人放进去，连拿出来学习都不干，我们党的战斗力哪里去了？

整顿企业，必须抓住企业的主要矛盾。不敢触动主要矛盾，整顿就流于形式。在整顿中，要认真把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经济责任制的完善；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整顿劳动纪律；整顿财政纪律等工作做好。但是，目前企业整顿普遍存在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一是领导班子，二是劳动组织，三是人浮于事，四是关停并转。解决这些问题，不要光看到困难的方面，还要看到这是广大干部、工人的要求，是有群众基础的。不要光听表面上的种种议论，不能空泛议论企业整顿的重要性，重要的在于敢不敢动手。决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对党的事业采取敷衍的态度。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领导态度要坚决，把道理摆到桌面上，群众是会接受的。优柔寡断，犹犹豫豫，阻力就更大。中央和国务院机关改革，对企业整顿领导班子是很有利的形势。中央机关都能解决，企业有什么不可以解决呢？根本的问题是软弱、消极，怕得罪人，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把多余的人拿出来搞智力开发，搞培训，又不是失业，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要有信心。黑龙江就敢碰硬，为什么他们敢碰，别的地方就不敢碰？

多余的人不能光搞学习，还要搞劳动积累，哪能坐着吃！城市有很多事情可以作，如搞土建、植树等等。社会上有那么多事没有人做，工人又放到车间里没事干。只要领导坚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对领导的考验。对参加学习的人，可以拿工厂工人奖金的平均数，用这个钱，买

一点书，买一点学习参考材料，为学习创造条件。搞体力劳动的，可以搞定额，超额的有奖。

整顿企业不能花花哨哨，经验出了很多，面貌依然如旧。这样，那叫什么建设性整顿？我说过，成绩不能估计过高，这些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化。企业整顿大量的就是这四个问题，就是黑龙江所说的，要敢于碰硬。这些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一个省、一个市抓住几个企业，在这几个问题上把它搞开，整顿就会势如破竹。有的企业，领导班子老化，工作不负责任，还发牢骚。这些问题不解决，工人的精神也不可能振奋起来。企业整顿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现在是决心太小。首先是要有决心，没有决心，企业就整顿不好。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情况说明，只要领导有决心，就会得到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要敢于解决企业中的问题，影响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不解决，企业就没有希望。

什么叫整顿？整顿就是要解决主要矛盾，解决尖锐的矛盾，要不为什么说整顿？！整顿不是要你抹稀泥，搞蒸馏水消毒。我们整顿企业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是顺乎潮流的，是正义的事业，有理走遍天下，为什么不敢下决心呢？

五、关于领导班子年龄问题

我在天津全国工交会议上讲的是50岁，现在55岁，已经作了让步了，不能再退了。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明确年龄界限，年龄界限不能突破。不突破阻力小，一突破阻力就更大。中央都没有照顾，基层企业更没有什么可照顾的。有的部长超过了年龄但身体很好，跑步能跑几千米，都退下来了，退下来以后，再根据情况安排。企业应允许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搞二线工作，担当某一项任务，某一方面的代表，这个厂不行，可以到另外一个厂搞二线工作。你们可以向干部讲，中央那么多老同志，为什么让耀邦当主席，让我当总理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能退居二线，企业里的老同志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六、关于企业自主权问题

给予企业的自主权不要变，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但是地方和企业所得比例，要比原来稍低一点。这样才能使国家有点钱，办成几件有益的事情。有很多事情不从全国考虑就不行，例如能源、交通问题。如果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能源、交通没有大的改善，谁也活不了，谁也快不了。能源、交通、铁路、港口、电力建设周期都很长，必须由国家来搞。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表现。

七、加强基础工作必须训练人才

要训练人才，没有人才不行，特别是财会人员。不训练人才，再讲也不行。这也是基本建设。基础工作要加强定额管理，要搞技术标准。说了很多次了，哪个部搞了？

对专利法问题要讨论一次，早定下来，我看要搞专利法。有人说这要受国际专利法的约束，对这个问题应该从长远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小利、保护落后。我们搞专利法，对国内发明创造和企业技术改造都会起促进作用。

八、关于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

关于在整顿企业中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同意你们的意见，按中组部《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座谈会纪要》办。

以工代干问题。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原来的以工代干；一个是今后的以工代干问题。对原来以工代干的要严格考核一下，确实够条件的就当干部，不够条件的还是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些人确有一些文化、技术，够条件的，经过严格考核，合格的可以算干部。今后不要再搞以工代干，工人选上当干部，就享受干部待遇，落选了就回去当工人。这个问题，劳动人事部和组织部要搞一个正式文件。

部队转业干部问题。转业干部，地方必须安排，要多方面安排。来了先热情接收下来，家庭、生活先安排好，然后分别进行培训。大企业可以

以企业为单位，小企业可以以市为单位，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好了再进入岗位。除转业干部以外，工厂干部主要从本厂提拔，一般不从外边进入，当然工厂之间调剂是另外一回事，要同各地打个招呼。

关于1%晋级权问题，同意列入成本，从工资总额里开支。你们提出的几条限制很好。将来再过几年职工升级了，要不要扣指标呢？我看还是扣好。扣，他可以不乱来。过几年，国家有个升级面，因为你先升了，就把指标扣回来，比如，一年升1%，五年加起来就是5%，就应该扣5%。这样老实人就不吃亏了，也可以避免有了这个指标他当年就随使用掉。如果你那个厂没有能人，1%的指标今年没有用，明年还可以用。如果当年没有用，到年底指标不算了，那厂长就要挨骂了。既给他这个权力，又要他不能滥用，这样才能鼓励厂长认真负责，把这个1%的晋级权用好，真正奖励那些有特殊贡献的人。

总的来说，你们这个文件都是好话，关键看能不能实现。这几年重点是抓整顿，整顿要和调整、改革结合起来。整顿的好坏最终要看经济效益。一是要看敢不敢触动主要矛盾，解决问题；二是要看经济效益有没有提高。对企业的自主权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总的一条，真正搞得好的可以得到利益，搞得不好的就不能得到利益，不能搞歪门邪道，形成另一种“吃大锅饭”。要扩大企业自主权，给它活动的余地，也要给它压力，不能让它躺在国家身上。

这几年的调整中，在生产资料方面出现了一点买方市场，虽然是不自觉的，但也显示了它的好处，使企业关心市场了，不要重新再把它统死。在消费品方面，也出现了买方市场，一定要有意识地引导企业把它作为动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苏联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横向联系，市场和消费情况反馈不到企业里来。所以企业要有一定的自销权，要掌握一定的产品，比例可大可小，不能把企业搞得太死了，搞死了对国家不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是向前发展的。财政部讲了好话，财政问题不能推到财政包干上，很多是调整上发生的问题。如果不改革，那些问题一样存在。一方面要看到改革使财力有些分散，但也必须看到改革调动了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总的财政收入还是多了，财政还是好转了。财政部

也不同意取消财政包干。所以，改革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完善，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问题，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

中央财力要适当集中。现在企业留利水平大约是 12%，要稍降一点，降到 10% 左右。什么都要有一个适度，要想让每一个企业都得到好处恐怕不行，要奖勤罚懒。

开发西北新的产粮区与 调整贫困地区农业结构问题*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一、开发新的产粮区

这是作长远规划时需要研究的问题，否则，粮食无法解决，农业结构也难以进一步调整。

中国农业资源不算差，但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并不多。宜种粮地必须种粮，这样，才能使那些非常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过来。

现在，相当大的地区，特别是南方平原地区，农业结构已经调整得差不多了。但确有一部分地区，主要是山区，南方北方都有，很不适合种粮食，仍在勉强种粮。结果粮食产量很低，破坏了生态平衡，水土流失严重。这样的地方，应该继续调整。调整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因为归根到底，调整的关键在于粮食，没有粮食，是调整不过来的。

这几年进口粮食，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今后要继续进口。但进口总有一定限度，至多一千五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再多就不可能了，外汇、运输都有问题，国际市场也供应不了，何况还有风险。

所以，从长远考虑，要采取大一点的措施，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开发新的粮区。

* 这是赵紫阳考察甘肃、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时的谈话要点。

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开发，已在进行论证。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宁夏的河套地区，条件如何，前途如何，是否宜于开发，也需要调查研究，组织论证。

河西走廊的可垦荒地很多。酒泉地委的同志说，这个地区有五百万亩宜农荒地。甘肃省委的同志说，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共有五百万亩。数字不一，可能是标准不同。要进一步摸清底子，数量看来是不少的。

河西走廊的荒地，只要能灌上水，就能长草，长粮食，“有水就有地”。酒泉地区年降雨量虽然只有几十毫米，但祁连山脉下来的雪水，从三月到十一月，径流量达三十一亿立方米，加上地下水三十七亿立方米，共六十八亿立方米，全区七十四万人口，平均每人九千多立方米水。这样丰富的水资源，合理利用，潜力大得很。酒泉地委的同志说，三十亿立方米地表水，现在十亿立方米流掉了；引入渠道的二十亿立方米中，又渗漏蒸发了十亿立方米；利用了十亿立方米，浇了一百五十万亩地。如能再利用一些水，比如减少五亿立方米渗漏，就可以开发七十五万亩地。这里日照长，土质好，粮食产量高。开荒头两年，亩产就有二三百斤，种到三年以后，一般能打四五百斤粮，比在现有耕地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容易得多，而且都是商品粮。看来，开发河西，比较可靠，比搞引洮工程划得来。一九五八年为什么搞引洮不搞河西？其实，河西有了粮，定西也就有了。

河西走廊，水渠已经普遍修起来了，问题是渗漏。已经引进渠道的水，又漏掉了，很可惜。宁可少修新的工程，也要把现有渠道的衬砌搞好。衬砌搞好了，渗漏问题解决了，一条水渠可以顶两条用。这等于铁路修复线，是最现实的，事半功倍，来得快。这叫挖掘现有渠道的潜力，也是一种改造挖潜。这里有卵石，有石灰石矿，又有电，可以建水泥厂，就地解决衬砌用料。规划一下干、支、斗、垆渠，上下有所分工，逐步来。要多少投资？用贷款的方式行不行？这里农民比较富，酒泉地区每人平均收入二百五十一元，四口之家就是一千元，可以搞点劳动积累。

一是搞好衬砌，防止渗漏。再就是加强管理，节约用水。四川抓节能，企业职工家里普遍装了三个表（电表、气表、水表），非常见效，节约了一半。这里水资源多，也不能浪费，要多想点办法，把节约用水同扩大耕地结合起来。浇地要有人管，实行责任制。要研究如何节约用水，比如能不能搞

喷灌。收费要合理，定出标准，不超过标准的如何收费，超过标准的如何收费。一亩地到底浇多少水合理，值得研究。现在酒泉地区每亩用六百立方米水，到底怎么样？水浇得过多，从长远看，并没有好处，容易盐碱化。酒泉地区有四十万亩下湿地，能不能改用井灌？不要以为反正有雪水，就不必打井了。井灌和开沟排水相结合，既可降低地下水位，改造低洼地盐碱地，提高产量；又可节约地表水，扩大新的耕地。总之，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

柴达木是盆地，水流不出去，地形和河西走廊不同，但也有一些条件是类似的。这里有昆仑山脉的雪水，水资源更丰富。日照时间也长，昼夜温差很大。

青海省委的同志说，柴达木有三十亩小麦，亩产高达二千斤。面积虽小，说明潜力很大。世界上不少小麦高产区出在高原。柴达木盆地已有耕地七十万亩，省委考虑，准备逐步开发二百万亩。条件如何？如何开发？将来能不能一部分作粮食基地，一部分作饲料基地？需要综合研究，搞个区域规划。

宁夏河套地区潜力也不小。十一个县，现有三百五十万亩水浇地，亩产稳定在五六百斤上下。还有三百万亩没有浇。自治区党委认为，有可能再搞一百万亩自流灌溉。这里电多，可以提水，提了水，不一定都种水稻，也可以种旱粮。河套地区有一百二十万亩盐碱地，用井灌沟排的办法综合治理，效果很好，亩产可从二百斤提高到五百斤。

初步印象，河西、柴达木、河套地区，很可能是有开发前途的。到底如何，需要论证。如果河西能开发五百万亩，柴达木二百万亩，河套扩大灌溉面积一百万亩，改造盐碱地一百万亩，那也很可观了。

我们在新疆垦荒，是成功的。苏联在中亚地区开荒，出过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也是成功的。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自然条件，同新疆比较接近，同苏联中亚地区也有类似之处。要注意运用新疆的经验，也要注意研究苏联中亚地区的经验。

二、调整陇中和西海固¹地区的农业结构

甘肃中部山区，包括整个定西地区在内，有十八个县，五百多万人口，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年降雨量约三百至四百毫米，但集中在八九月份。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极不稳定。解放以来，大灾重灾有十一个年头。人均收入不到五十元，现金收入更少（定西地区每人五元）。吃粮经常靠返销，养牲口没有草，烧锅烧炕没有柴，几十万人没有水喝。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七个县，一百五十万人口，同陇中毗连，也是最困难的地区。

过去是恶性循环：越穷越开荒，越开水土流失越严重。要走上良性循环，必须有两个转变：改变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一定要有长远打算，否则，困难会越来越大。

今年大旱，上半年只下了六十毫米雨，但从榆中到会宁，到定西，一路上看，柠条，红柳，沙打旺，草苜蓿，都可以长。据说，通渭的申家山，种红豆草，长得很好。兰州水土保持站的技术人员说，“灌草为主，恢复植被”，讲得很有道理。同沙漠研究所的同志座谈，同甘肃省委和宁夏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座谈，意见一致。看来，第一位是恢复植被，其次才是种什么。种草，种灌木，最容易成活，既能保持水土，又能做饲料，做燃料，做肥料，有的还可以做编织的材料。这就可以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同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了。饲料和燃料的问题不解决，群众就来铲草皮，“斩草除根”，不良循环就会继续扩大。过去破坏植被，是从砍乔木开始，然后砍灌木，铲草皮。现在恢复植被，就要倒过来，从种草种灌木入手，循序渐进。能够种成花果山，用材林，当然好，但一下子办不到。乔木要下山，种在川地，有水的地方，公路两旁。坡上主要是种草，种灌木。

一下子退耕太多，也吃不消。先退陡坡地，缓坡地可以缓一缓，一步一步来。

缓坡地，川地，要集中肥力，劳力，提高单产。这样，粮食总产量不一定会减少。可以搞点工程，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十几、二十度以下的地不一定都要修梯田，梯田也不一定修得很平，当然，搞点防护措施是必要的。提高单产，主要抓保墒，把仅有的一点水用好。这一带，正常年景，有三四百毫米雨，如果能把保墒问题解决好，一年一季庄稼是有保障的。

压砂地产量高，就是因为能保墒。要多想点切实可行的保墒办法。晋东南的壶关县，有个山区生产队，他们种谷子是秋天深翻，春天不犁。第一年秋天深翻后，施下土杂肥，封起来，第二年春天下种时，不犁不翻，亩产可达六百斤左右。秋天深翻，可以蓄水，春天不犁，避免蒸发。这种办法，对陇中和西海固地区是否适用，可以试验试验。定西地区在山上种树，秋天挖坑，春天再种，成活率高，看来也是这个道理。

除了保墒，还要选择耐旱的作物，培养耐旱耐瘠的品种。种什么，要根据这里的条件，不能光看高产不高产。高产的作物常常不耐旱，今年雨水多，捞一把，明年雨水少，又输光了。过去我们常吃侥幸心理的亏。要研究寻找适生作物，这个领域里，未知的东西多得很。

沙漠研究所的同志说：雨量在四百毫米左右的，可以搞旱作农业；二三百毫米的，就得搞半农半牧；雨量再少的地方，只能根据水资源条件，搞灌溉农业。这种分析的方法是对的。在陇中、西海固这样的地方，如何搞好旱作农业和半农半牧？如何保墒？采用什么作物品种？要把题目出给科研部门，向科学家提出来，请他们研究。还要重视群众的经验。定西群众用淤洪的办法治理沟坝地，对上下游都有利，就是一条好经验。修水窖，也是群众创造的，多少年来山区群众就靠这个办法解决喝水问题，一度丢掉了，现在回过头来还得采取这个办法。会宁的姑娘出嫁，要打听婆家有几口窖，可见水窖的重要。

调整农业结构，要有规划，有责任制，一步一步落实，不能一边退耕，一边又去开荒。西海固七县的粮食征购任务已实行减免。要把减免同退耕、恢复植被联系起来。减免多少，就应该退多少陡坡，把草和灌木种好，否则就不能免那么多。同时，还要提高粮食单产。随着单产的提高，再进一步扩大退耕，还草还牧。甘肃省委研究，打算对陇中地区的穷困队在粮食征购上实行减免政策。可以考虑，把工作做得细一点，根据几年的平均数，把粮食包干基数确定下来：购销相当的，免掉；购大于销的，定购；销大于购的，定销。一个县内，可以有征有购有销。在确定粮食基数的同时，把调整结构、恢复植被的任务落实下来，使农民心中有数。有了方针，有了规划，实行责任制，政策稳定，坚持下去，搞它多少年，肯定是会见效的。

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在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给点支援，给点粮，给点钱。甘肃同志提出以工代赈，这是对的。与其单纯救济，不如帮助改变生产条件。同时，要教育群众，不要养成依赖心理。国家也有困难，补贴也不能太高。

河西和定西，河套和西海固，要联系起来考虑。河西和河套开发起来了，商品粮增加了，就能支持定西和西海固地区调整农业结构。干旱地区，也可以向地广人稀的灌区搞点移民。但是，有组织地移民，很多是失败的；自动移民，倒是能巩固住。可以考虑，结合搞水利，衬砌，开荒，定些政策，定些办法，吸引农民自动地流向这些地区。这样可能慢一点，但花钱少，效果会好得多。

这里是黄河上游。调整农业结构，改变生态环境，搞好水土保持，对下游关系极大。陇中和西海固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治理黄河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篇大文章，内容很多，很值得加以研究。

注 释

1. 西海固，指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六盘山区的西吉县、海原县和固原地区。

对大连市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 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八月八日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联合形式(不久前上海为开发新产品组织二十条龙,也是这种形式),值得重视,应继续总结、宣传这方面的经验,予以推动。大、中城市在这方面应大有作为,这里的计委、经委,科委应协同配合给以支持。中央各部对所属企业、科研单位,应鼓励他们参加当地这种联合,不要从中限制。

“六五”、“七五”要为九十年代 经济振兴作好准备*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开了 20 多天。开始时依林同志作了报告，讲了“六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和需要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8 月 14 日听了宋平¹同志关于全国计划会议情况的汇报，大家对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六五”期间还是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努力“保四争五”，并使“七五”的情况比“六五”更好一些。“六五”以至“七五”，要从两个方面为九十年代经济振兴作好准备：一方面，抓好调整、整顿和改革，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使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逐步合理化；另一方面，抓好重点建设（主要是能源、交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过讨论，意见比较一致。

讨论中大家反映，矛盾比较大的，是财力分配问题。去年下半年，我们较多地讲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邓小平同志也讲要积极利用外资改造中小企业。这是很重要的。九十年代要出现经济振兴，如果企业的面貌没有改变，设备、工艺、产品还是那个老样子，就没有什么希望。这就需要认真搞好以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为重点的技术改造。但是，我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能源、交通严重落后，光搞技术改造还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能源、交通没有一定的建设规模，那么我国的经济，八十年代不可能有一定的速度，九十年代也不可能振兴。因此，近半年来讲重点建

* 这是赵紫阳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设讲得多一些。现在看，决定后10年经济发展的，除了前10年要搞好调整、整顿和改革以外，就是要搞好技术改造和重点建设。这就发生一个资金问题。重点建设，地方、企业很难考虑。虽然地方也可以联合起来搞能源，毕竟有一定限制，恐怕主要是由中央投资。如果中央不掌握必要的财力，就不好办。当然，可以利用外资开发能源、交通，我们有这个条件。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要办的事情很多，如果不尽可能利用一些外资，矛盾不好解决。但是，借用外资也要有自己的资金配合，而且借用买方信贷、进口设备搞多了，对国内机械工业也有影响。所以，还是要多从国内集中一些资金。会议提出集中200亿元搞重点建设，不集中过不去，就是这个原因。能不能咬咬牙，大家承担困难。当然，不止这200亿元，还要从农民、企业那里想些办法。从会议简报反映的情况看来，各地同志对此顾虑比较多。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想清楚。不采取措施集中200亿元，国家的重点建设成问题，“六五”计划就要重新调整。但是这样做，会不会挤地方、挤企业挤多了，又把大家的积极性搞下去。200亿元能否拿到，或者这一头拿到了，那一头又丢掉了（指影响积极性，生产下降）。如果拿到200亿元，而企业的技术改造被挤掉了或者搞得很差，这就有问题。因此，对于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两者也要统筹兼顾。究竟合理的界线划到哪里，很需要仔细研究一下。矛盾就在于：如果不集中这200亿元，我们的建设规模就不能搞那么大，就必然影响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如果不统筹安排好，集中搞得不适当，挫伤了大家的积极性，影响了企业技术改造的开展，这也不好。

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最好的方案，是既按原来的盘子，多拿200亿元保重点建设，又不挫伤农民积极性，企业的积极性也不挫伤，技术改造不受大的影响。这就要很好研究一下，拿多少，如何拿。现在既顾虑拿多了，影响积极性，影响技术改造；又顾虑拿少了，影响建设规模，而地方和企业的钱也不一定能真正用得恰当。怎样能集中一些，又不影响其他方面，很值得好好研究。解决的办法，要很好地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总的看，企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有相当潜力，要把这作为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力的、可靠

的措施，全党思想统一，真正面向企业，去挖掘潜力。应当看到，中国经济现在这么大个摊子，今后只要搞得不好，是会明显地出效益的。这几年企业增加不少负担，3年城镇安排劳动就业2600万人，直接间接压到企业，实际上许多企业并不缺少劳动力。企业的奖金、福利、实际工资总额增加很多，还有农业原料的价格上涨。因此，这几年企业负担加重，表现为利润减少。今后几年不会再给企业加这么多负担了。最近新华社记者写了一篇材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3年企业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利润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当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这个情况，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差别很大。如首钢，一直是钢铁行业经济效益最好的厂子，今后几年之内经济效益还将有很大提高。它实行了经济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积极性起来了，今后3年产量不增加，每年上交利润递增6%（3年上交的利税等于它的全部固定资产）；还要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本厂的技术改造，每年总的要递增百分之十几。所以，今后向企业怎么拿，要想个办法。国家拿多少，要有个区别。企业挖潜搞得不好，可以多留一些。这几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有些企业确实搞得不好；也有些企业确实搞得不好，等于挖国家。目前企业利润留成由6-7%上升到13%。现在要集中一部分资金，不能简单地作个规定，比如10元钱，国家拿7元，企业剩3元，或者国家拿8元，企业只剩2元，而是要鼓励企业多创造利润，既多上交给国家，自己又可以多得。这就是说，解决国家集资进行重点建设和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矛盾，在于挖掘潜力，提高效益。要通过挖潜，增加上交，也增加自己技术改造的资金。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今年下半年要在抓好企业整顿的同时，做好调整、改组企业的准备工作，明年坚决把那些消耗大、质量差、盲目生产、与先进单位争能源和原材料的厂子，进行关停并转。这项工作的难度较大，有些地方不大积极，但非下决心不可。

总之，要考虑怎样把全党的注意力放到企业的整顿、调整、改组上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应当使搞得好的企业有更多的资金去武装自己，搞得不好的只能处于困境，甚至不能存在。考虑企业的改革，调动积极性，不能简单地给企业以利益，而不承担什么义务，不能搞好搞坏都得利。要使它努力挖潜，搞得不好，多交

了国家，自己的技术改造资金也有了，职工福利也有了；如果搞得不好，国家要的必须照交，自己就没有福利，不能盖房子，甚至不能生存。不能搞平均主义，搞得好的资金紧张，没有力量进行技术改造，搞得差的既得利益照旧，“旱涝保收”。这个问题要很好研究。应当看到，放宽政策后，许多企业是为国家作贡献的，但也有挖国家的，要迫使企业不去挖潜就不能存在。把企业的潜力挖掘出来，一是要有政策，二是要有好的领导班子，有“明白人”。光有政策调动积极性，没有好的领导班子不行。现在有一批懒人占了国家便宜，也确有一批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闯出一条路子。不能搞好搞坏都是留成10%或者11%，这样，肯定社会财富增加不了。今后不是简单地你拿多我拿少，而是不提高经济效益就没有出路。应当研究一些办法，如何通过挖潜提高经济效益，解决矛盾，这要作为一个方针。

第二，上面讲到，一个重点建设，一个技术改造，在资金分配上有矛盾。今后如果搞得不好，很可能有相当大一部分资金，既不用在重点建设，也不用在技术改造，而是用在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大上。这个问题，多年来很难解决。今后几年能否下决心改变过来，把这部分用于扩大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资金减下来，一部分转向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一部分转向企业的技术改造。现在担心的，不是国家集中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而是需要搞的东西搞不上去，不需要搞的东西继续扩大。如果能源、交通上不去，一般加工工业扩大了生产能力也开不了工。如果现有企业的设备、工艺、产品的落后面貌五年、十年没有什么变化，就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地步，那就确实希望不大。只要下决心少搞一些一般的加工工业，就会适当缓和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的矛盾。有什么办法，能把一般加工工业的建设停下来，要很好研究。这笔钱集中起来用于搞能源、交通也不算少。

20年内单位产值能耗要比现在降低一半，如果达不到，就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只要大家思想一致，鼓起干劲，做好工作，是有可能的。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平均每人国民收入也就是800美元左右，相当于现在中等发展国家的水平。连这个也达不到，那实在讲不过去。如果企业不进行技术改造，不降低消耗，到那时就需要20亿吨原煤，这根本不可能达到。而且消耗那么大，国民收入要增加那么多也不可能。世界银

行代表团的经济学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算慢，但还是比较穷，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效益比较差，搞了一些东西不产生效益。现在东北、华北因能源不足，有相当一批生产能力闲置，“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大家都吃六、七分饱。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这与现行体制、政策、制度有关。全面改革体制、政策、制度要有个过程，不能完全等。如何通过计划和各级领导解决这个问题，即真正搞企业的技术改造，而不是名为技术改造、实为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在今后的长远规划中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控制住，把资金转到技术改造方面来。要尽量在政策、制度上采取一些措施，鼓励他搞技术改造，限制他搞一般的扩大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

过去的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产销脱节，生产者不关心市场，不关心社会需要；社会的需要，市场的要求，对生产不能起及时的反馈作用。几乎苏联、东欧国家，也都是这样。因此，始终是卖方市场，产品质量差，大量积压，服务很差。二是企业不关心技术进步。这些总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现在很多政策措施促使企业不关心技术进步。苏联想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收效也不大。应当说，我国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指导工业生产中，没有占一定的位置，不少地方和企业还是满脑子的追逐产值：“一季度开门红，二季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三季度战高温、夺高产，四季度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要研究一些政策，促使企业也好，迫使企业也好，总要把发展生产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国家盲目竞争，搞不好就倒闭，但迫使企业关心市场，关心技术进步。我们国家的好处是企业不倒闭，但企业没有搞好技术进步的动力、兴趣和积极性。今后20年，真正抓科技，依靠技术进步，许多现在看来是困难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否则，“翻两番”确实相当困难。从领导机关到企业，要考虑如何把精力转到抓技术进步上来。只要真正这样做了，经济效益就出来了。最近有些好的经验，比如上海围绕新产品开发，搞了“20条龙”；大连市围绕新产品、成套设备，搞生产、科研共同体，把不同企业从头到尾、各个工序连接起来，把科研、设计、生产连结起来，办法好，投资少，改进了设备、工艺、设计、管理等。还有天津市按行业搞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发展规划，都是值得重视的。现在盲

目扩大生产能力花钱不少，而在改进技术方面，企业没兴趣，上边没渠道。这些问题，在计划上、指导工业生产上都必须想法去解决。如果我们用很大的毅力、决心去做好这件事，那就大有希望。各个大中城市，各个工业部门，都要抓技术改造，抓技术进步，按行业搞出规划，规定每年搞些什么事情，按期完成。

中央集中一些资金，可能有两个后果：一是搞得不好，挤了技术改造的钱；一是搞得好，把那些搞一般加工工业的建设压下来，真正用于技术改造的钱并不减少。现在企业技改资金中用于技术改造的只有20%左右，70-80%用于一般的扩大生产能力（其中有一部分是需要的）。这20%的钱不能减少，还要增加。国家怎么拿，拿多少，要通盘考虑。要防止中央挤地方、地方挤企业、企业挤技术改造。否则，虽然集资搞了能源、交通，但是企业的技术改造没有搞，设备、工艺不更新，能源的消耗降不下来，甚至更大，那么新增的能源可能还抵不上消耗的增加。因此，今后20年如果不依靠科技的进步，那是没有希望的。不能靠落后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去实现翻番。一定要解决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问题，克服企业盲目扩大生产能力、不关心技术进步的倾向。

总之，关于集中资金的问题需要很好研究。但是，解决的途径只能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考虑。光考虑集中多一点，少一点，不能解决问题。要做到中央能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而企业的积极性又不受过大影响，技术改造还能够有步骤地进行。出路在于努力挖掘企业潜力，坚决把盲目扩大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的钱减下来，这个决心必须下。当然，究竟集中多少，还要进一步研究。财政部还要召开财政厅局长会议进行讨论，要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出路，包括拿多少，怎么拿，采取些什么措施。

下面简单讲一下农业问题。

（一）赞成这么个观点：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同时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适当增加农业的投入。但是，投入什么，用在哪里，增加什么效益，还要很好研究。不赞成一个省、一个省地分投资，不能撒胡椒面。有限的资金要真正用在有效益的地方。各省区也应这样做。

（二）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关系。汇报提纲中说，“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目前的17亿亩水平上”，总的看，需要有这么多。但是，势必有些不适

于种粮食的耕地要转到其他方面。最近去甘肃定西地区看了3个县，如果不保证一定的粮食供应，那里不可能有农业的良性循环。没有饭吃就开荒，越开越穷。一闹旱灾，不仅人没有吃的，牲口也没吃的。如果上述17亿亩是包括全部的话，那非减少一些不可。比如定西地区，还有承德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就得减少，不然调整不过来。当然，现在讲的17亿亩也包括不全，估计有相当部分，不包括在这17亿亩之内。这几年有些山区盲目开荒，破坏水土，不调整不行。当然，要逐步解决，步子太大也不行，现在要强调的是，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再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洞庭湖地区、鄱阳湖地区和成都坝子等，要严格控制，粮田面积决不能再减少，要能增加一点才好。

全国要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再开垦一些，“六五”后3年做好规划，作好准备，有些地方可以开始起步，到“七五”期间真正着手搞，一直搞到下个10年。看来能开垦的耕地不多，但总还有些地方可以开发，有些可以用来种粮食，有些可以用来种经济作物（原来种经济作物的面积就可减少一些）。开垦，需要的投资大一些，在哪里搞，要很好研究一下。黑龙江三江平原是个地方，新疆、甘肃河西走廊也是比较好的地方。现在祁连山的冰川不是减少而是扩大了，即山上的降雨量增加了，山下的水多了。新疆、河西、柴达木，水资源很好，问题是要搞点水利工程。柴达木地区，小麦一季1千斤没有问题。河西小麦一季也有五六百斤，如果肥料、技术跟上去，七八百斤没有问题。这些水资源好的地方，粮、棉都可以种。采取一些正确的政策，不要从内地移民，依靠当地农民和自动流入的人口去开发，国家给以支持，主要是搞水利，几年时间就搞起来了。如何开垦，要作些调查研究，搞好规划。

（三）森林破坏没有停止，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搞个文件，考虑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据去湖南凤凰县拍电影的同志反映，那里还在大量砍伐树木，有个7万亩的林场，砍得只剩1万亩了，还在分和砍。要组织点人，把情况集中一下，研究森林政策，哪些分，哪些不分；大树是否一定要分到户？现在农业、养殖业的情况很好，但盲目开荒、砍伐森林还在泛滥。这是解放以来第三次森林大破坏，还没有停止。要采取紧急措施，搞那么几条，坚决予以制止。盲目开荒、砍伐森林，几个月带

来的损失，几十年恢复不了，一代人恢复不了。今年的植树造林搞得很好，但如破坏森林的行为不制止，会出现造的少，砍的多。要组织大检查，通过立法，追查破坏的责任，严重的要判刑。

注 释

1. 宋平(1917-)，山东莒县人。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曾任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局长兼劳动部副部长，西北局计委主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

去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计划生育问题，后来中央、国务院发了十一号文件，中央一直很关心这件事。现在谈一些意见，概括起来讲四个问题。

一、控制人口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要长期坚持下去

控制人口，是我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重大方针，要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定下来，长期地持续地真正地贯彻下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地做下去。

控制人口，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有重大的影响；也关系到我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四个现代化就会遭到绝大困难。可以这样说，我国四化建设的方针也好，政策也好，要真正能够取得好的效果，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控制人口。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其它再好的政策都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

中国人口不控制不行。这是一件非抓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放松。我们现在制订的长远规划，不仅是经济规划，而且要搞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就要围绕着人口问题来考虑，如教育、卫生、住房、交通等都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汇报时的讲话要点。

我们现在人口太多了，必须看到人口问题的尖锐性、紧迫性。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东半部和西半部情况不一样。只一般地讲 960 万平方公里、10 亿人口，还不能说明中国人口问题的尖锐性、紧迫性，还要看到大约 94% 的人口，住在东半部的 48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另外 6% 的人口，住在西半部的 48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里面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如四川省面积有 57 万平方公里，有 9000 多万人，其中有 7000 万人口住在 10 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盆地里。从全国看，大概有四、五亿人口住在很狭小的地方，比如珠江三角洲、福建东南部、江浙、胶东、辽东等沿海地区，人口很稠密，住得非常挤。中国的基本情况，第一叫做人口多，耕地少，适合开垦的耕地也很少；第二，我国的农业资源总的来讲是丰富的，但按人平均还是有限的，不能够说是很多的。人口太多，吃饭、住房都是大问题。展望十年、二十年，食物构成不会有很大改变，粮食还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吃不饱就会影响人民的身体素质。人口太多，普遍地实施教育就有很多困难，普及中等教育难度很大。这就会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受到影响，人口素质受到影响。

总之一句话，中国人口不能过多地增长，增加那么多不得了。我们一定要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是不是能够控制到十二亿，关键是要看我们的工作。

二、中央十一号文件的基本精神，不是放松计划生育，而是要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能够行得通、取得好的效果的基础上

中央十一号文件怎么正确理解呢？我的理解，不是放松计划生育，而是为了使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能够真正长期坚持下去，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比较符合实际的基础上，建立在行得通的基础上，要使多数人支持，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任何一项政策没有群众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下 70-80% 的人成为积极力量不可能，至少要有 30-40% 的人是积极力量，再团结一部分人，就形成一种舆论。这样，我们计划生育的路子就会越走越宽。随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化程度、思想觉悟的提高，医疗、避孕药具供应的改善，计划生育就会逐渐变成中国人民的一种习

惯。有的人担心计划生育稍微放宽一点就可能收不住，结果证明放宽一点能更好地贯彻。山东的同志说得好：“开了小口子堵了大口子，开了前门堵了后门”。我看这个思想很重要。现在我们有些人还有点迷信，好像政策稍微实事求是一点，就怕什么浪潮啊。你不实事求是，靠生硬的办法，靠搞计划生育的同志在那里坐催，我看是不能持久的。这样搞，干部在农村也很孤立。那种担心开了口子会收不住的想法，是多余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把工作做好。

我们的政策要定得适当，合情合理，特别是在那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政策合理一些，能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农村又形成了一种舆论，少数人完全无计划生育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政策如果不放在能够做得通的基础上，就不能持久，结果会助长超计划生育。我相信，应当解决的问题干脆给他解决了，把各项工作跟上去，那么超计划生育的就可以大大减少。现在有些地方计划生育只是在公社以上讲，到村里根本没人听你的，那里完全无计划，还是自流状态。

形成自流状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领导不重视，对计划生育的重大意义不认识，工作抓得不紧，这个就是领导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要求太高太急，同群众距离太远，结果没法贯彻，欲速则不达。

考虑人口政策、生育政策，既要看到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又要瞻前顾后，不能光顾目前。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点。比如，从长远来讲，男女的比例问题还得考虑，还有每一家如果都只生一个孩子，将来赡养人口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这些都是领导上要思索的问题，不必宣传，也不能因此而影响我们的决心，现在还是要狠抓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还是要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中央十一号文件下去以后，你们各省都有一些办法或规定，刚才不是讲四种情况嘛（指农村生育政策全国有四种执行情况），我主张稳定，现在就按各省自己定的办。各地现在的规定，将来证明可能有的严了一点，有的宽了一点，宽或严，反正现在都不动，就按照这个去做。在做的时候，领导机关要探索、研究、分析，经过两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能不能立个计划生育法。这个法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况，定出什么人可以生一胎，

什么人可以生二胎；就是在同一个农村里，什么人可以生一个，什么人可以生两个，都必须明确地立法。立了法不能装在葫芦里，要公开宣布，使大家心中有数。这样，政策订得合理，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超计划生育的可以大大减少。你只应当生一个，生了两个，你就违法。他不应当生两个，干部允许他生两个，那也是违法。要是他本来有条件生两个，你不让他生，他可以告状。没有法不行，有法不公布也不行。去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搞计划生育的同志都主张把这个主动权放到下边去。作为一个过渡办法，我是赞成的，现在只能这样。但是，这个主动权都交给基层干部，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他可能首先把生二胎安排给自己家里，安排给他的亲朋好友；有些同他关系不好的，明明人家够条件可以生二胎，他就不让生。你执行政策不公，人家就不听你那一套。基层干部如果掌握上有亲疏，不公正，就容易引起矛盾激化。

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因地制宜搞计划生育，但要适当放宽。

三、要总结农村实行责任制后，如何搞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

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怎样使计划生育能够适应，工作能够跟上，需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农业生产责任制一搞，人们的积极性起来了，但是不要因此使计划生育出现自流，造成人口泛滥，把责任制带来的好处抵消了，甚至还会出现负数。现在看来，情况还是好的，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两种生产一起抓”的经验要总结，好的经验要介绍。

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农村和城市就不一样，沿海地区与边疆地区也不一样，文化水平、经济状况、工作基础都不一样，差异很大。为什么在城市一胎就容易被接受呢？无非是城市人民文化水平高一点，又是靠工资吃饭。拿工资的人要算算账，反正一个月工资就是五十元、六十元，多养一个孩子就多花掉二、三十元。农村就不一样，我们讲人多生活差，而农民的实际经验是人多了还比较好办事，现在许多地方实行生产责任制就是按人口平均包地。当然和开始搞计划生育时也不一样了，现在农民要生很多的孩子，也不行了，首先他自己就不好意思，其次也没有很多人支持，这

两年农民的思想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舆论在农村变了。这是我们计划生育的伟大成绩。

实际困难还是要照顾的，完全不照顾，硬干是不行的。在一些地方，生育政策如果规定得太严了，或者那里经济、文化、工作基础又差一些，他要是第一个生的是女孩子，就可能要溺婴、弃婴，反正他要生一个男孩子。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不要夸大，但是很值得注意。

计划生育是移风易俗的事，过去要求又这么急，工作中发生一点命令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过多的责备。但是也不能听任这样下去，还得想办法从各方面逐渐减少这种事。

我听到你们反映的一个问题，觉得有必要考虑解决。就是计划生育工作搞得越多，花钱就越多，财政负担就越重，这个事要研究一下。将来能不能搞个“平均征收”的办法，在一个省一个地区内统一收费，集中使用，可以在地区之间、县之间进行调节，按照实际工作多少去开支，这样就比较合理。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的奖励问题。奖励一层一层都包下来，那里的独生子女越多，那里越负担不起。我觉得如果真正政策搞合理了，不能主要靠奖金。这个问题一下也不要轻易改动，究竟怎么解决，要调查研究，看将来有没有一个好的代替办法。

四、搞好避孕药具的科研、生产和供应， 这是搞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保证

认真做好避孕工作，是减少工作粗暴的一种办法。药具问题如果能真正搞好，就会减少阻力，减少后遗症。避孕药具的科研、生产、供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不大力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增加很多阻力，就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你们给各地讲讲，要下点力量，中央要搞，地方也要搞，经委、计委、科委和卫生部等有关部门都要把这件事摆到一定的位置上。

计划生育搞得好不好，是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如何的一个反映，光靠发动群众，没有科学技术指导是不行的。有些医疗条件差的地方，大月份引产搞不好，造成死亡事故，或者产生严重的后遗症。一个地方发生一

起这种事，影响周围几十里，影响好几年，增加很多阻力。要特别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计划生育，工作量大，难度大，有些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工资没评上，提级没提上，还有的挨打、挨骂。这些同志在工作上为国家为人民作了贡献。

给《四川日报》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四川日报》党委：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

在《四川日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向报社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祝同志们进一步办好报纸，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九日

^{*} 《四川日报》社为纪念创刊三十周年，曾致信赵紫阳请求题词。赵紫阳未题，复信表示祝贺。

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我简单说个概念。一、财政困难；二、根源在于多年来经济工作不讲经济效益。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投了相当大的资，三线就一千亿元，但经济效益差，对人民欠下了很多的账。农产品价格低，工资多少年没有调整，房子没有建。这种状况掩盖了经济效益。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能这样了。农产品价格不能不提，工资不能不加，劳动力要就业，房子要盖。这样，企业成本就要增加，利润就减少。没有这些措施，就没有今天的好形势。企业包袱很重，利润下降。什么时候才能变？要靠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这要有一段时间，工厂利润才能增加。到那个时候，才能说“四人帮”造成的问题，过去错误造成的问题，解决了。这就是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企业经营面貌有个根本的改变。过去的利润，是靠低原料低农产品价格、低工资赚的。现在不行了，要靠提高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今年一至八月，工业上升有百分之九点一，利润只增长百分之一，但这也比去年强了。现在有两种看法不对。说人民福利提高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这非搞不行，是还账。当然，长期不行。还有人说，打倒“四人帮”，你们还讲这个问题。“四人帮”打倒了，但问题并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财政负担已经到顶了，今后改善管理，增加的部分都可以转

* 这是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六五”计划财政平衡问题的请示》时的讲话。

为财政。“六五”财政平衡，今天不讨论。也可能支出打少了，也可能收入打少了。

今天讨论集中资金。财政预算内只有二百亿元，能源交通搞不上去。于是提出今后三年集中二百亿元资金。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原则拥护，但都不赞成拿。我也不赞成到会上去讲。我犹豫。不拿，能源交通上不去。地方可以搞一点能源交通，但规模不会大。后十年振兴，没有相当规模的能源交通，就实现不了。现在算的账，不那么准，但大致不差。产值翻两番，能源要增加到二十年翻两番，就可能是放空炮。但是，我也很担心，刚刚地方、企业搞活一点，又集中，把积极性搞掉，把技术改造挤掉。计划会议结束时，我讲了一次话，两个方面都能接受。又能集中资金，又不影响积极性。两个方面都能接受，我知道没有解决问题。我所以去东北，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宋平同志愿意同我去，就是想说服我同意集中二百亿。我现在提出的方案，报告里讲了，没讲清楚。现在预算内资金一千零五十亿，预算外资金五百七十亿。五百七十亿中有一些不能动。我主张来一个简单办法，除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原则上都要抽一点能源交通费。比例不大，比如百分之十。不能取得太多，取多了搞不成。一家都集中一点，加起来就可以办些事情。假如有四百亿可以抽，那百分之十就是四十亿。企业只要努力，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各地方用的钱并不完全适当。只要安排适当，也不会受多大影响。要你百分之十，影响你少搞点盲目建设，不影响你技术改造。搞得不好，不会影响你积极性。中国的事，面宽一点，好办事；面窄了，抽少数人头上，不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除了抽能源交通费外，靠银行集中一部分信贷搞能源交通。保险收入，中国银行利息，都要集中一点。吕培俭，听说前年你们开支六亿，去年就开支二十五亿，你至少压下十亿，三年三十亿。银行要挤一挤。现在财政困难，银行肥，要多交一点给财政。财政拨款三十亿，是不是一点不多？财政还有潜力。这样二百亿差不多。拱拱手，大家都抽百分之十，作贡献。

关于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下午请大家来，只谈一个问题，就是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讲的四大方针中的一条：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问题。今年七月的计划会议上提出集资二百亿元，并提了十条集资措施。会后基本的反映，一是赞成，二是对集资办法意见甚多，顾虑也比较大。后来请各省的同志来，我讲了讲自己的一些想法。主要意思是，前十年要真正做准备，不下决心集中资金搞能源交通建设不行。但要集中资金，确实又怕把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掉，特别怕挤掉企业的技术改造。我们今后十年，一手是搞重点建设，一手是搞技术改造。因此就要想一个办法，既能集中二百亿元资金，又不影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技术改造又能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是可能的。我们的企业潜力还很大，如果真正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集中一点资金，不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改造。现在各地方用于扩大一般加工业生产能力的钱还相当多，只要能把这部分资金减少一些，集中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那次我讲了以后，各省多数同志说可以接受，计委也说可以接受。但具体采取什么办法集中二百亿元资金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上次我去辽宁，跟同去的综合部门的同志议了一下，共同找了个办法。回来后又议了一次。昨天在耀邦同志那里又谈了一次，耀邦同志认为可行。

* 这是赵紫阳召集参加党的十二大的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座谈讨论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问题的发言。

我们议的办法，主要是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叫税也可以，就是从全部预算外资金中提取百分之十。东西南北中，包括中南海、大会堂的参观票收入，也包括科研设计单位所得的报酬，还有各单位的小金库，国家行政机关的节余经费等，统统一律平等，从自有资金中拿出百分之十。想来想去，要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就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哪一个单位都穷，钱比较紧张。但你拿一点，我也拿一点，大家都拿一点，集腋成裘，国家就能办成几件大事。每个单位拿一点钱出来，不至于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就要你预算外资金的百分之十，你有本事多搞，也不多要。原来的政策不变，不把企业捆住。

今天把我们议的原则、办法跟大家见个面。大体讲三个问题，一是要不要集中，二是集中多少，三是怎么集中。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原则、办法定了，然后十月才能开财政会议，再开计划会议。

一、征收能源交通建设费，或叫能源交通建设税，从全部预算外资金中提取百分之十。范围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和省、市、县所属大集体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广东、福建两省也在内。据统计，一九八一年全国预算外资金共有五百七十七亿元，提取百分之十，是五十七亿七千万元。估计其中有一部分，如大修理基金、农业税附加、中小学学杂费、育林基金等，不宜提取，所以确定每年实际提四十亿元，三年共一百二十亿元。具体范围和办法，将在十月召开的财政会议上进行专门讨论。

二、人民银行的中短期贷款，抽一部分转到能源交通建设上，每年十亿元，三年共三十亿元。

三、人民银行的利润，每年多上交财政十亿元，三年共三十亿元。

四、国家财政每年增拨基本建设投资七亿元，三年共二十一亿元。

原来实行的发国库券、向地方借款的办法，继续实行。

开创外交和国内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

我看你们的会议开得是好的，很有收获。主要的收获就是听了耀邦同志的讲话，这是今后外交战线加强团结、改进工作的指导思想，应该很好学习。耀邦同志提出要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这次会议应该成为一个起点，成为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的一个动力。十二大以来，外交部是中央各部中第一个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部，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外交队伍是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工作的，有很多特点：你们的工作环境主要在国外；工作对象主要是外国政府、外国的上层人士、外国人民；而你们的身份则是国家的代表，中国人民的代表。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应当首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要求应当更严格。

去年，我出访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以后到了广东的深圳和珠海特区。我听了当地同志的汇报，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特区究竟应该“特”在哪里？所谓特区，就是在经济上要实行特殊的政策，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不能只限于这一个“特”，只要求这一个“特”。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应当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好的风气，特别好的道德，特别严格的纪律，特别高的工作效率。不是只有一个“特”，而应当有好几个“特”。

* 这是赵紫阳在接见出席驻外使馆政工会议的大使、参赞时的讲话。

这样，那一个“特”才能起到好的效果。如果只注意一个“特”，其他都没有了，那个特殊政策也就搞不好，不可能起到应该起的作用，甚至会发生副作用。在深圳，我对市委的同志说，对调到深圳来工作的干部要把这一点讲清楚，不要光讲什么工资高、待遇高、高级耐用消费品多等等，否则就要打败仗。现在我建议做外事工作的同志都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你们是在特殊环境下工作的，要很清醒，特别是在现在。现在我们讲对外开放，讲生动活泼，同外国有了更多的交往，这都是很必要的。但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又在这样的政策下，同外国的接触大大增加了，更要清醒地想一想自己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工作的，应当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因此，我说外交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重要。

十二大决定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明年下半年起，要开始整党，这是对全国、全党提出的普遍要求。外交部门怎么办？我看不能降低标准，降格以求，应当从高、从严。希望你们在贯彻十二大精神，建设精神文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走在前面。特别要注意党性和党风的问题。要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就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二

谈谈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专门讲了外交政策。写外交这一部分是下了很大力气的。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比过去更明确、更完善了。这就对我们外事、外交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耀邦同志讲要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我认为提得很及时。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外事工作的方针、政策，提法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实际上是在逐步进行调整。这次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外交政策这一部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总结了这一段实践的经验，包括对美、苏两霸的问题和对第三世界的问题，确实是更明确、更完善了。只要按照十二大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去贯彻，就一定能够开创出外事工作的新局面。

过去我们总的外交路线是正确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但应当说，在实践中有些界线还不那么明确。

举一个例子：在同第三世界各国的交往中，能不能以它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来划线？过去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不很清楚，不是全面深入地分析它们的情况，而往往是自觉不自觉地主要以它们对苏联的态度来决定我们对它们的态度。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这个问题在认识上逐渐解决了，在工作和行动上也在调整。“反对两霸，侧重反对苏霸”这个总方针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就以对苏联的态度来划线。把这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分清，不仅同我们总的方针不矛盾，而且有利于执行我们的总方针。两霸是客观存在。我们为什么反两霸？就是因为客观上有两个超级大国在搞霸权主义。为什么要侧重反苏霸？因为苏霸有更大的进攻性和欺骗性，这也是客观存在。现在这个基本形势还没有变，所以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但如果以苏划线，就不能壮大我们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削弱反霸斗争的力量，不利于执行我们的总方针。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对苏联推行霸权主义是不满意的，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它们同美霸的矛盾更大。如一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矛盾就更尖锐、更突出。它们从自己的具体处境出发，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就会脱离本国的人民。我们应当坚决支持它们的斗争，加强同它们的团结。如果采取简单的办法，不加分析，以苏划线，就可能冷落和疏远它们，使它们无法理解我们的政策。这种情况不能说很严重，但也曾经出现过，有些国家感到不能理解我们的态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它们反苏，并不是反对它的霸权主义，而是由于它们从根本上就是反共，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丝毫不涉及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苏联的态度是“六十年一贯制”，列宁在，它反；斯大林在，它也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政，它都反。在反对苏霸的斗争中，它们有可能和我们采取某些联合行动，我们不应当拒绝；但从本质上说，这些国家掌权的人物是一些反动的、腐败的、名声很臭的统治集团（如塞拉西¹皇帝、巴列维²国王等等）。他们迟早要被自己的人民打倒。因此，我们

在同他们采取某些联合行动时，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把关系搞得很热。否则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造成错觉，似乎我们同这些统治阶级拉得很紧，而苏联霸权主义反倒同这些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似乎苏联在支持进步力量，我们却在支持腐败的统治阶级。如果那样，就有可能影响我们国家的形象，有可能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增加苏联的影响，显然这是很不利的。

我举这个例子，并没有责怪同志们意思。从过去长时期主要反对美帝，到七十年代初主要反对苏霸，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样大的转变中，要求所有的同志一下子都把界线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出现一些模糊思想也是很难避免的。事实上，尽管认识上存在某些模糊，但是在中央的领导下，工作上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认识确实已在实践中逐步更加明确，在工作上开始进行调整，中央的精神已被更多的同志所理解和掌握。现在又开了十二大，我们的外交方针政策确实是更加明确、更加完善了。因此，我们就有条件更好、更有效地执行中央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独立自主，纵横捭阖，大有可为。我们要很好地分析研究情况，更加主动地开创外事工作的新局面。要全面开创新局面，根本的问题在于很好去领会和贯彻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外交工作的方针、政策。

再举一个例子：对第三世界的工作问题。这是我们外交路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和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概念，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首先，在政治上，必须坚决支持他们反霸、反帝、反殖、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第三世界各国，仅仅讲政治支持不行，还要注意搞经济上的合作和交往，现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都还有一个摆脱贫困，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的任务。因此，我们还必须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和经济交往，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从全局、从战略、从发展上讲是越来越重要。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们穷、技术落后而嫌弃它们。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经常说：如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经济上严重落后，长

期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世界经济就不可能景气，政治上也不可能稳定。第三世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资源丰富，在经济建设方面也各有长处和短处，彼此间加强合作和交流很重要。

第三点，我们不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搞恩赐和施舍。我们没有那么大力量，对他们也没有好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光靠别人帮助，不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没有前途的。革命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我们只能量力而行，只能从自己的实际能力和对方的实际需要出发。如果搞很大的项目，既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对他们来讲，还会成为包袱。

第四点，不搞则已，要搞就要搞好，要负责到底，要重合同，守信用，一定要使对方真正得到实惠。

第五点，区别不同情况，开辟多种渠道，这一条很重要。第三世界各国情况不同，很复杂。我们对最穷、最落后的国家，应当搞点雪中送炭，给点援助，主要是小型的，容易管理、容易掌握的项目。现在看来，这样搞的都是成功的，例如传授农业技术，派医疗队，给他们搞一些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公共设施、公益设施，例如修建小的会场、体育场、医院，人民可以天天使用，我们负担得起，管理上也不复杂。对有钱的发展中国家，就不能同穷国一样对待。看来，对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主要不是搞援助，而是做买卖，应该在互相需要、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要在这些方面多想办法，多开渠道。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过去对这方面研究不够，办法不很多。将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我们同第三世界经济合作的路子肯定会越走越宽。不仅如此，现在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关键是要搞好调查研究。

总之，对第三世界经济上的合作和交往，一定要积极，热情，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下功夫开辟多种渠道，不要搞恩赐，不要作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革命不能输出，建设也不能包办，都必须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我们只能予以促进。

三

现在讲讲国内情况。

第一，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是很好的。我现在主要讲讲经济情况。我们前年开始调整，现在已经出现的好形势，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料。

农业情况是好的。这几年不管气候是好、是坏，总的来说，农业一直在向前发展。今年粮食产量，如果不再发生大的灾害，估计可能比去年有大幅度的增产，有可能超过1979年。1979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丰收年景。现在农副产品比较丰富，有些已造成积压，如油菜籽、烟叶等。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消费品问题。现在国内消费品市场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是1953年以来最好的。五十年代以来，市场上消费品匮乏，许多东西要发票、凭证，这种情况大约延续了二十余年，现在已经大有改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往往不被同志们所注意。商品匮乏现象，大概在实行以中央计划为主或公有制占优势的国家里都没有解决，可能南斯拉夫、匈牙利好一些，苏联这方面也不行。我认为，苏联的经济搞得还是可以的，但在消费品匮乏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解决好。目前我国有些消费品已经开始出现了买方市场，不再完全是卖方市场了。过去物资缺乏，大家非常羡慕上海货和天津货。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新情况，竞争很激烈，很多地方商品降价，挤上海的市场，包括手表、电视机等。现在中国老百姓买东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持币抢购，而是“持币选购”或者“贮币待购”，等待降价，等待质量好的新产品上市。城乡居民储蓄直线上升，总额已超过620亿元。现在有些商品如化纤布，大量积压，卖不出去。消费品生产上来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这种趋势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今年上半年已很明显。

这种现象，并不是在牺牲重工业的情况下出现的，而是在重工业开始回升的情况下发生的。去年下半年重工业已开始回升。今年头八个月统计，重工业增长了9.8%，超过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8.5%）。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困难，在前进中还有很多矛盾，今天不可能展开讲。但可以说，从主流来看，两年的调整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连外国人都开始承认了，讲中国好话的开始多起来了。当前世界经济还是不景

气。去年福特来时，打保票说1982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一定好转。今年尼克松来，又说到1984年可以好转，一下推迟了两年。当然，世界经济会有回升，但幅度不会那么大，时间要推迟。至于我们，只要按十二大方针稳步前进，我们的经济肯定大有希望。

第二，财政方面，今年努力增收节支，可以继续实现收支基本平衡，年初计划有30亿赤字，现在看来不会超过。但还有很大困难，还有赤字，而且是在增加存款、发公债、借外债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需要继续用五年时间，才能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现在，我想讲一下，为什么形势这么好，财政还会有困难？打倒“四人帮”已经六年了，究竟问题在哪里？

我们国家的财政困难，是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后果。从1958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前，我们国家在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搞了很多项目，光是三线就投入1000亿元。花了大量的财力，但由于指导思想有问题，正如陈云同志所说，主体错误是“左”的错误，所以经济效益很差，在人民生活方面留下了大笔的欠账。严格说起来，从1957年起，职工的工资就没有进行过大的调整。农副产品同工业品的比价非常不合理，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城市住房长期不建，越来越紧。两千万以上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没有就业。这些情况，直至粉碎“四人帮”前后，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四人帮”打倒了，欠账要还，这就是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从1979年到1981年，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国家多花了442亿元；提高工资和实行奖金，多花了300亿元；增加城镇2600万人就业，花了105亿元；城市修建职工住宅，三年建了2.2亿平米，又多花了152亿元。仅以上四项，国家在三年内多花了1000亿元，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平均一年330多亿元。增加城市就业、提高工资和实行奖励的巨额支出，很大部分由工厂负担起来，这提高了工业品成本，也就不能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我们这三年的调整，同1962年的调整很不一样。1962年是甩包袱，城市人口下乡，工人减少，粮食定量减少，农副产品价格冻结。而这次调整，国家花了1000亿元。这种情况下，还能出现现在的好形势，这是很了不起的。能不能不还账？如果不还的话，中国人民再好，也是不可能永

远接受这个状况的。所以“四人帮”粉碎后，账非还不可。这是我们财政困难根本原因所在。应该说，这几年工厂企业做了很大努力。现在，账还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过去三年企业努力增加的收益，大部分因还账而抵销了，那么，今后企业的利润，就会有更多的部分转化为积累，成为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的资金。

第三，到本世纪末，实现两个倍增，翻两番，究竟可不可能？有些同志认为，翻两番算不了什么，轻而易举。这当然不对，但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多。更多的同志，对翻两番信心不足。耀邦同志讲了这个问题。这次中央提出两个倍增，是经过充分分析和研究后确定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有些同志说，过去搞了三十年，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今后二十年如何既能有较好的效益，又能有较高的速度？对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应当作个分析。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搞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时间。1958年后，我们一直是折腾，调整，再折腾，再调整，就是这么个历史。今后二十年，不仅是不折腾了，而且要下决心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就好了。我们的国家，终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因此潜力也很大，而且资源丰富，中国人还是比较有本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完全应当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度发展。苏联虽然在体制、指导思想等方面有问题，但也有过一个相当长期的高速度发展。当然我们中国今后高速度发展的时间，不可能出现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首先要把各种关系理顺，主要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不理顺各种关系，不可能出现高速度。现在能源、交通卡脖子。北京经常停电，而山西、宁夏、青海的煤拉不出来，在自燃。我们多年来不重视能源建设，单纯搞加工。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经济搞不好，能源交通不活，全局活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工厂的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很多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的设备、技术。设备不更新，技术不改造，想快也快不了。扭转经济上失调的问题，比解决政治问题往往花的时间要更长。因此，比较高的速度不可能出在这十年。中央并不要求“六五”、“七五”计划期间有高速度，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如果这十年我们能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搞好，把能源、交通以及企业的技术改造搞好，把教育、科研工作搞

好，下一个十年肯定会有较好的效益和较高的速度。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也是必然的结果。第一个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六，第二个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九，只要达到这个速度，二十年内就可以翻两番。

有些同志认为，基数越高，速度就会降低。这种观点不一定站得住脚。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来讲，一般地说，速度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再一个要看是否把重大的科学技术成就运用到生产中去。简要点说，一个是生产关系，一个是科学技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发生了一个飞跃，除了占廉价石油的便宜以外，就是因为它们采用了新技术。它们的基数低吗？它们搞了几百年了！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把军工的尖端技术普遍移植到民用工业，带来了一次工业革命。从科技上来讲，往往是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带来一个时期生产发展的高速度，然后速度放慢，经过一个时期又产生新的技术上的飞跃。这次在十二大上，经济学家孙冶方³同志说：苏联认为基数越高、速度越低，是因为苏联长期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他们只重视新建，搞新摊子。孙冶方同志的这个分析很有道理。长期以来，苏联片面地搞这样一种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这就不能不使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形成基数越高、速度越低的局面。如果我们走自己的道路，重视能源交通问题，重视技术进步，改造老厂，同时也切实有效地搞些必要的新建项目，使老厂和新厂都充分发挥扩大再生产的作用，我们国家就会有高速度的发展。

所以我的结论是，信心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对我国的具体情况缺乏分析；第二个原因是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的作用估计不足。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十二大报告中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述。中国多年来搞工业，搞经济建设，都是铺新摊子，要发展，就新建一个厂子，再要发展，再建一个，等这个厂建成，那个厂已经落后了。这种搞法，实际上是只让少数新厂担负扩大再生产的任务，而让为数众多的老厂只从事简单的再生产。如果沿用过去这种老的方法、老的指导思想去搞工业，翻两番确实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7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消耗掉6亿吨标准煤。如果按比例扩大，总产值翻两番，能耗也得翻两番，那就是20多亿吨煤。光这一条，就办不到。所以一定要改变一个传统观念，不是在老

设备、老技术、老产品、老工艺的基础上翻两番，那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一次飞跃，靠技术进步增长的部分可能有一半多。我们翻两番，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落后的基础上，至少要有一番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这对我们搞经济技术的领导同志来讲，是个新课题、新的指导思想。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我们提出，今后二十年，工农业生产总产值翻两番，达到 2.8 万亿元，但热能消耗只能增加一倍。做到这点难不难？难！但能做到。我们在这方面大大落后。1 万元产值消耗的能源，且不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概平均比我们要少百分之三、四十。日本消耗能源同我们一样多，也是 6 亿吨标准煤热量，用于工业的还更少，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 1.1 万亿美元，接近于我们的四倍。所以我讲，真正把轨道转到技术进步上，潜力很大，翻两番不成问题。要研究一下，到公元 2000 年，我们能不能普遍使用工业化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的通用技术。这里讲的，并不是它们九十年代的技术，也不是七十、八十年代的尖端技术，而是讲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通用和普及的技术。到本世纪末还有十七、八年，我们应当基本上做到，不然怎么进步？所以现代化问题，不是简单地翻两番，而要解决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否则，叫什么现代化呢？这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讲，是个新问题，还没有这方面的觉悟，搞技术进步的思想还没有树立，一提发展经济，总是考虑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我们现行的很多规章制度，也妨碍了技术进步，使企业对技术进步不感兴趣。这里涉及到价格政策、经济体制等许多问题。沈阳水泵厂最近几年搞了十种新的节能水泵，可以节电 25%，非常出色。但搞新产品，开始时批量不大，成本较高，他们搞了十项新产品，企业留成却减少了 30 多万元，结果是谁搞技术进步谁吃亏。所以，我们要真正把经济建设转到技术进步上，势必涉及一系列的改革，扫除障碍，使企业对技术进步有兴趣。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解决，但他们一直在抓这个问题。严格讲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问题。但中国有一个特点，只要真正看到了问题所在，是可以抓起来解决的。国内经济形势，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经全面讲了。我今天就讲这几点。

注释

1.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 I, 1892-1975), 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曾因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闻名, 晚年被门格斯图推翻, 在幽禁中去世。

2. 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 1919-1980), 伊朗国王。1979年被伊斯兰革命推翻, 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掌权, 巴列维流亡国外, 1980年在埃及开罗病逝。

3. 孙冶方(1908-1983), 江苏无锡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

当前经济工作中应研究解决的新问题*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一、消费品生产的形势问题

总的看，我国现在经济上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形势，市场上不仅农副产品比较丰富，而且日用消费品变化很大，市场供应紧张的状况基本上得到缓和。现在消费品也出现了买方市场，这是我们国家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没有过的。实行计划经济类型的国家除个别小国外，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这种形势。这是两年来认真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结果。但是，也带来一些新问题：

——今年上半年以来，日用消费品滞销、积压，轻工业增长的速度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下降。今年一至八月，轻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 8.5%，而重工业却增长 9.8%。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轻重工业的比例调整到什么程度比较恰当，很值得研究。

——消费品越多、越滞销，群众持币选购的心理就越严重。一方面东西卖不出去，一方面城乡居民储蓄又直线上升，八月底已达 620 亿元。

——消费品开始出现竞相降价推销的情况。据反映，在上海已出现内地产品削价倾销同上海争夺市场的现象。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之间在商品推销上的矛盾在增加。

面对当前这种形势，我们应当正确进行指导，使这种好的势头能健康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经济工作时的发言。

地发展下去。为此，必须对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采取正确的对策。要看到，消费品生产、销售中出现的问题，并不简单是消费品工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系统研究解决。

消费品工业本身，应当千方百计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成本，真正做到物美价廉、适销对路。

在流通环节上，必须解决堵塞问题，特别是要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品下乡，在农村打开销路。要考虑趁现在这个机会，认真解决一下商业上推销工业品相应的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工业品流通按城乡分工的体制为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有些地方、单位认识上不一致，执行不力，要继续做工作消除阻力。目前一、二、三级站机构设置重叠、臃肿，批发与零售利润悬殊（批发利润约占三分之二，零售占三分之一），很不利于商品推销，要研究进行必要的改革。

为了扩大推销，要考虑价格问题。上海的同志认为，化纤、耐用消费品不要急急忙忙降价，特别是不要无计划、无通盘考虑地降价，在目前情况下越降价可能会增加群众的观望心理，并不能多销多少，反而使财政收入受影响。他们主张目前价格稳定一下。当然，消费品价格下降是必然的。是否可以考虑今后选择适当时机，对价格进行一次有升有降的改革。消费品价格确实不合理的，经过认真准备，有领导、有计划地降一次价；同时对价格很不合理，国家补贴很多，负担很重的东西的价格也相应调得合理一些。如城市服务行业的收费现在很低，发展不起来，应适当调高一点。还要注意运用税收杠杆，对那些高利产品加一道税，把一部分利润转作税收上缴。这样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质量，有利于限制盲目发展。

二、技术进步问题

我们提出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到2000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究竟靠什么呢？翻两番不能建立在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的基础上，必须主要靠技术进步。这是思想上、工作上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还是现在的水平，设备技术还是老样子，光所需的能源就无法解决，翻两番是不可能实现的。要实现这个

目标，有一半要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到 2000 年，如果我们能把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基本普及的技术在我国普及，那么，我们就完全有把握翻两番。要把我们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就得靠政策，靠技术进步。多年来形成的要增加产量就靠建厂子、扩大生产能力的传统观念，一定要彻底改变。当然，今后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建设一些新厂也是必要的，但在新形势下，各级领导一定要把技术进步摆在重要位置，下力量抓好。

我国旧的管理体制的一个根本弊病是妨碍技术进步，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都不利于技术进步。在现行体制下，搞新产品、用新技术，费力气，担风险，企业心不在这里。迫切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企业对生产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有兴趣、有实惠，也有压力，要感到非这样不可。这就需要对一系列规章制度进行改革。

在技术进步、技术改造、科学技术工作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科学家、专家，把科研力量、科研机构组织投入到经济建设实际中去。十月份国务院召开的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要特别注意奖励那些在现代化建设中真正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是要讲经济效益。现在我们一方面人才不够，一方面又积压人才，浪费人才。要号召科技人员投身到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办法就是把各个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组织起来，参加攻关，参加搞规划，使科学与生产密切结合。

集成电路对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关系极大，要像五十、六十年代攻“两弹”¹一样，高度集中，组织攻关。各部门要积极支持，军工部门也要参加。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国务院直接抓。

三、要认真抓一批大企业

大企业搞好了，贡献大。要挖掘潜力、稳定财政收入，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抓好一批大企业。首钢的经验给我们以启示，它表明，只要政策对头，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不要多少投资，就可以使首钢每年上缴国家利润递增 6%，用自己的资金改造企业，产值到 1995 年翻两番，累计可上

缴利润 63 亿元，而且使自己改造成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要把挖潜、改造、整顿、改革同为国家多做贡献配上套，一个一个大企业进行研究落实，制定技术改造、挖掘潜力的规划，使这些规划符合国家计划的宏观要求；落实经济政策，通过“包”或“利润分成”等形式，给予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同时整顿充实领导班子。这样，就能逐步闯出一条大企业以计划管理为主，又能调动下面积极性的路子。各省、各部门都要抓几个大企业。只要路子走对了，大企业完全可以搞得生龙活虎。

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城市，也要一个一个抓，研究措施。大城市、大企业形成我国工业的主体，按照国家计划进行改造后，我国经济建设就会出现十分可观的变化。

今后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抓两头，大的抓住，小的放开。对大企业要抓好，对小企业、小商品要放得更活一些。

四、必须适当扩大沿海城市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自主权

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要注意发挥沿海城市的优势。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经济上是存在着矛盾的。从长远看，完全靠内地供给沿海城市原料，加工成商品后再销到内地，这个路子会越来越窄。要加强沿海同国际市场的联系，上海等沿海城市要“内联外挤”，所需原料、材料逐步转向国际市场，商品要往外销售，以改变原材料紧张、销路有困难的被动局面。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捆死。新加坡、香港可以靠加工，日本完全靠外国资源，我们沿海城市为什么不行？关键是要给沿海城市一定自主权，利用外国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除广东、福建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外，首先是要给上海、天津更多的自主权。在引进技术，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等方面，办法要从上海出。各部门要帮助上海提出一个实施办法来。其次是大连、青岛、宁波等港口城市。不要一下铺得很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

五、对原材料工业特别是“三材”²的供需状况要预先研究对策

随着重工业的发展，重点建设的展开，“三材”供需之间的矛盾会更突出，尤其是钢材、设备的需求会日益增多，不事先考虑，过两年又会发生“无米之炊”。或者还是按照老办法搞，又得从矿山搞起，十年见不了效果。当前可考虑多进口一些钢材，这比买设备划算；买旧船拆卸，这等于买钢铁，价格也很便宜；几年内趁世界经济不景气，利用工厂倒闭之机，派专家小组悄悄出去，有计划买一些七八成新的设备。此外，石油价格的趋势、两伊战争后承包工程的竞争、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预测等，都需研究。

六、组织全国石化总公司，用好一亿吨油的问题

把一亿吨油用好，进行深度加工，综合利用，会出很大的经济效益。可否将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的和各地炼油厂、石化厂(原料)，组成全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实行产供销统一，对这个问题的可行性要进行研究。据估计这样石油深度加工后，可为国家增收 100 亿元，这个金娃娃要抱。

注 释

1. “两弹”指原子弹和氢弹。
2. “三材”指木材、水泥、钢材，是当时十分紧缺的物资。

给四川昇钟水库工程指挥部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刘纯夫¹同志转昇钟水库工程指挥部：

你们的来信已收阅。听到昇钟水库大坝即将竣工的消息，我很高兴。昇钟水库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大水库。希望你们继续努力，精心施工，分段建设，分段受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早日全面完成水库和配套工程的建设，为四川省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至于为昇钟水库题词一事，可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著名的书法家撰写，我就不写了，感谢你们的盛意。

祝水库工程的全体同志在今后的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刘纯夫(1925-1998)，山东栖霞人。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曾任南充地委统战部部长，阆中县委第一书记，南充地委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适时调整化纤和棉织品价格 改变居民衣料结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五日

目前国务院正在对今年消费品生产出现的新情况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讨论。待讨论告一段落，将向常委、书记处汇报。

讨论中一个集中的问题，是降低化纤、涤棉混纺布的价格，同时适当提高纯棉布价格，以解决化纤织品的滞销、积压、限产问题，同时又不至因此而减少财政收入，并可促进十亿人民衣料结构（以化纤布代替纯棉布）的逐步改变（这是早晚总得要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决策，虽然影响面广，可能会有不小震动，但对整个经济会带来极大好处，对于合理改革价格也是一个突破。

讨论中，暮桥同志有一篇发言，大家同意他的分析，现送上，可抽空一阅。

* 这是赵紫阳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各成员的一封信。

关于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 规划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常常碰到条条块块的矛盾。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长期按条条、块块管理，搞了几十年，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同我们体制差不多的苏联，长时期强调按条条管理，有时也强调按块块管理（如赫鲁晓夫时期），但时间不长，主要还是按条条管理。现在又搞经济综合体，如在西西伯利亚，就搞了一个油气生产综合体，也是想解决条条、块块的矛盾，把各个部门的工作协调起来。我国过去也搞过大区、协作区，那还是按块块进行工作，结果又多了一层，也不是成功的经验。有些事情，完全按条条或行政区去办都很困难。

我国条条、块块到底怎么搞法好？方向究竟怎么样？五十年代比较强调按条条管理，那时有个好处，部门定了就行，企业办事感到比较方便，但存在不少矛盾，有一个条条与块块如何结合的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部分企业交到地方管理，企业利润同地方财政连在一起了，虽然与地方的关系密切了，但企业中有些事地方又解决不了，比如有些厂的生产纲领、计划安排、原料供应、产品分配等，地方就定不了，还得找各部，于是形成多头领导。现在企业普遍反映：一是婆婆太多，希望由一个头主管就行了。二是现在向企业要东西的单位多，而要解决企业的问题，又找不到一个单位负责，希望下达任务的主管单位，同时必须解决厂里反映的

* 这是赵紫阳与宋平、顾卓新、吕克白等谈话的要点。

问题。看来要解放生产力，现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但又不能回到五十年代的老路上去。

从经济上看，上海市实际上是面向全国，它与长江三角洲的各个城市关系特别密切，如苏、锡、常，杭、嘉、湖，还有宁波，这一批中小城市等于是上海的卫星城，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这是历史上形成的。旧中国行政和经济是分开的，经济上是单独的一套。现在我们的党委、政府要管经济，但我们不能从行政上把这些城市划归上海。因此，需要考虑如何打破条条、块块的框框，真正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这一地区的经济更好地组织起来。这样就提出建立上海经济区的问题。这一工作可先从规划做起。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地区，可以先着手搞统一规划。通过规划，把地区、部门的矛盾解决，而不是从组织上动手，简单地把这些地区划归上海，上海还是上海，苏、锡、常，杭、嘉、湖的行政隶属关系都不变。搞这样的经济规划，既不能从地方的角度出发，又不能从部门的角度出发，而是要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考虑，推动这个地区的经济同全国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就要有一个机构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和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任务。经过规划，促进地区的联合，企业的联合，把生产力解放出来。统一规划后，该列入地方计划的，仍列入地方计划；该列入部门计划的，仍列入部门计划，可以不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关系。这样就把国家的统一计划分解到各地区、各部门去了，使经济区内地区、部门的计划同国家计划紧密衔接起来。经济区发展下去，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情况，还要从实践中看看。这是同整个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联系的。如果将来政企逐步分开，政府对企业不必再过多地进行行政干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企业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经济联合，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企业的自主权也会越来越大。企业服从国家的统一计划，向政府交税，分交一部分利润，企业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能跟上，那就可能出现经济管理体制的新面貌。中间要经过哪些过渡步骤，还有待今后的实践提出来。

看来经济管理体制将来不会再走大区、协作区的路子，也不是条条、块块依旧，而是走依靠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路子，通过中心城市和工业

基地把条条、块块协调起来，形成合理的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当然，就全国来说，在做法上要有先有后，不能一哄而起。现在先选两个点着手试验。一个是上海，这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出口基地。作为经济区来看，这一片总不能以南京为中心，或者以杭州为中心，只能以上海为中心。另一个是山西能源基地，将来是以煤炭为中心的重化工基地。主要搞煤炭、电站、重化工，还有冶金工业的建设。这个区域虽然没有上海那一片复杂，但也有很多部门在山西，还要联系内蒙古的准格尔等地一起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是不同于上海经济区的另一种性质的规划。

这两个地区的规划是试验性质，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也可能走不通，我们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由于这样做会触动条条、块块的某些利益，估计这个试验会是困难重重的，但有个机构专门去研究这些问题，就容易看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哪里，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如果这个试验搞得好，可以解放生产力，那就是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这两块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全国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一个是全国很有希望的煤炭为中心的重化工基地。这两块取得经验了，再搞几片。

条条、块块、中心城市，三者的关系究竟怎样解决？三者的作用究竟怎样发挥？我的想法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企业和重要的产品，由中央集中管理。因为事实上地方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由中央集中管比较好。这些企业也可以组成全国性的公司，如石化公司、汽车公司等。即便这些全国性的、集中管理的企业，包括公司，有一个权力必须交给中心城市或工业基地，这就是参加当地的经济协作。不论哪个部门的公司或工厂，在这方面都必须服从中心城市的领导。经过协作，把企业的一部分潜力挖掘出来。

另一种类型是非全国性的企业，中央各部不直接管理，不是一般地讲交给地方管，而是要交给中心城市管。当然，中心城市也是块块，但它与一般的块块又有所不同，它能够比较多地考虑经济协作的问题。当然这一类企业有一些方面条条也应当管。看来，中央各部门主要是管规划、管技术政策等，这方面我们也有一些经验。全国纺织系统的厂子都是分散由各地管的，但纺织部抓住几件事不放，搞得比较好。从全行业的发展着眼，他们一是抓了生产手段，即抓纺织机械的改造更新，很有成效。现在我国

纺织工业的技术水平并不是太落后的。苏联机械工业的管理也很集中，一般不允许地方搞机械制造业，也是抓生产手段。二是抓纺织行业的定额管理。虽然纺织厂是各省市管，但定额全国是统一的。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三是抓新产品的试制，抓标准化。还有，抓原材料的供应等。对分散到地方管理的企业，部门管什么，纺织部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抓住这几条，整个行业就容易搞好了。

所以，要总结各部、各地的经验，既要使企业领导不多头，又能发挥中心城市、部门的作用，部门管什么，城市管什么，研究出一套合理的管理办法来，不要一说集中就什么都集中，一说分散又什么都分散。过去我们不是根据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来确定如何管，有些时候是单纯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像大庆油田这样的大企业，都交给了地方管理，利润一旦减少，又上交回来。概括起来说，在经济管理上，该集中的，要集中；该分散的，要分散。中央集中管理的，要注意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块块的作用；地方分散管理的，要注意如何发挥条条、部门的作用。

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也要从实际出发。比如，发展对外贸易，沿海城市条件就比较好。首先是上海地区要千方百计打入国际市场。香港、新加坡都没有原料，因为地处沿海，海运方便，靠加工，经济发展了。上海的基础不比它们差，为什么不能像它们那样靠加工发展呢？无非是在体制上，政策、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自己把手脚捆住了，这需要改革。我们应当给上海一些对外经济交流的机动权，别的地方不给，就是给上海，使它有吸引力，能靠加工发展，把周围地区的产品吸引到上海来出口。这主要是指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方面，要使上海比其他地方的权力大一些。历来上海考虑问题，从全国出发多一些，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因此，国家计委、经委的某些权限，可以委托给上海办。我已同上海市的同志谈过，请他们起草一个条例，报国务院批准。

规划上海经济区，必须考虑“向外挤”的问题。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虽然困难一些，但可以挤进去，过几年复苏了，大有生意可做。要充分运用上海地区参加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向，是要吃国外的原料，制成品往外销售，国内着重供给上海的能源。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实际上有一个经济利益关系问题。西部地区的原料运到沿海地区加工，产

品又运到西部地区使用，在运输上不知道造成了多大的浪费。长期这样搞下去，使西部地区永远供应原料、半成品，也是不行的。当然，这只能逐步转，现在还必须保证把上海所需要的原料调拨去。从全局考虑，我们应当把沿海地区搞活，首先是使上海地区发挥作用，积极打入国际市场；同时逐步使沿海地区的技术向西部转移，利用当地的原料就地加工销售，使东部、西部地区的经济都能够繁荣起来。我们的长远规划必须有这个战略设想。上海经济区的规划，也应按这个思路去考虑。

能够利用沿海这个有利条件的城市，还有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广州等。像天津是用上海的方式，还是用别的方式好？还可以研究。要有步骤地先把沿海城市搞活。

关于经济区的规划工作如何开展，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顾卓新¹同志负责；成立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由郭洪涛²同志负责。这两个办公室都作为国务院的派出机构。这个机构的性质、任务，怎么进行工作，先议几条，报国务院批准。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不是站在条条、块块的立场；而是要从全国的角度去研究、处理问题，协调经济区内条条与块块的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个办公室应分别在上海、太原设办公地点，在北京要有个落脚点。

首先搞经济区的规划。经济区规划工作，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掌握这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情况，参考各部委的有关规划方案，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经济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方案。搞规划，也可以先从某些行业开始。如机械工业，上海有什么打算，周围的苏、锡、常、杭、甬等地有什么打算，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结合国家机械工业改造的设想，定出本地区的机械工业规划来。还有外贸，也可以以上海为中心，先搞个外贸规划。是从机械工业、外贸或者从能源、交通的规划搞起，你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派干部参加这两个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在规划工作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要经常与两个办公室取得联系，给予帮助、指导。有一些六十岁左右的司局长、副部长，身体好，能力强的，可以抽调一些参加这个工作。这些同志实际工作经验多，搞经济区的规划能提出许多有见解的意见来。办公室不要很庞大，要搞得精干一些。这是一项新的

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开创出一个新局面来。

注 释

1. 顾卓新(1910-2002)，辽宁义县人。时任中顾委委员。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第二书记、省人大主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2. 郭洪涛(1909-2004)，陕西米脂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曾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六办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计委顾问。

坚决制止乱砍森林和滥占耕地*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

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问题

对情况要有个实事求是的估计，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国务院发过一个制止乱砍滥伐的《紧急通知》，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林业决定》，全国情况虽有好转，但一些地方乱砍滥伐之风一直没有停下来，现在有的地方又在蔓延、滋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怎么得了？中国森林很少，林业又有它的特殊性，破坏容易恢复难，如果不注意，几个月的破坏，就会造成多少年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当前要突出地抓一下保护森林的问题。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把这股乱砍滥伐之风压下去。

乱砍滥伐的原因，主要还不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无政府主义，不正之风，少数人目无法纪，带头向山林进军，抢发“砍树”之财。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致富，而是靠侵占、哄抢国家资财发财。国营林区、林场也有乱砍的。对这些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办。

对于林业管理体制和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关部门要调查研究，逐步解决。但是，绝不能把这些看成是乱砍滥伐的借口。要批驳那些乱砍滥伐还有什么“合理性”、“合法性”、“不可避免性”等等错误说法。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们政策方面不合理的事情还很多，有的一时也难以解决。譬如，木材价格不合理，这是长期形成的，现在一下还不能完全解决；还有木材供应紧张，有缺口，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但这能成为违法乱纪、乱砍滥伐的理由吗？不能。我们不能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再来制止乱砍滥伐，那就会把树都砍光了。现在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先把砍树之风压下来，不准再破坏。保住森林，不准破坏，这就是最大的道理，一切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你们不是讲要“治标”、“治本”吗？不准破坏，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以法治林也是“治本”。我们不能一边造林，一边又大肆破坏森林。要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干预这件事，要严格按法律办事。

只是一般地发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必须有决心，有气势，有切实有效的措施。有决心才能有办法。河南省内黄县前几年破坏森林严重，省委下决心追查，处罚了几个为首的不法分子，砍树风就刹住了。要坚决查处。上面要有决心，但保护森林关键在县，要把责任放到县委头上。有些群众哄抢国有林，就是社队支持、县委放任所致。全国每个县都要进行一次护林检查，如有破坏森林的情况，必须限期停下来。如不制止，就是失职，就要追究县委、县政府的责任。对近几年乱砍滥伐严重，至今仍未停止的地方，要选择典型案件，追查清楚，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

全国要选择几个抢占国有林、乱砍滥伐严重的地区，以中纪委为主，国务院有关部委派人参加，协同省里直接查处一批毁林案件，大张旗鼓地处理一批为首分子。当地如有人抵制、包庇，要认真查处，追查到底。决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查就是“事出有因”，不了了之。新闻宣传部门要密切配合这一工作，多造舆论。

对林业政策方面出现的问题，要注意研究。看来，把国有或集体的大片成材林分给个人，这在方针上有问题。不少地方把成材林成片分给个人后，群众怕政策有变，分到手后把绝大部分大树砍掉了。荒山分下去，群众会种树；成材林分下去，他就要砍。有些地方干部管得好，情况可能好一些。但我们不能把个别的典型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们过去往往拿个别典型到处去套，结果出问题。当然，有的林区群众出门就是国有林，不划点树木给他，那也不行。但是即使这样的地方，也不宜把大片的林子分

下去。没分的不要再分了，已经分了的，也不要收回，但要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不然又可能引起大砍。照顾林区人民的利益问题，根本的办法在于把林区大量的劳务，如整地、修路、植树、护林等包给社队，而不是把大片成材林分给群众。

关于省里超计划采伐问题，计委要研究一下，省里的木材生产计划是不是也可以纳入国家计划。除此以外，不准层层加码，搞计划外采伐。木材缺口大，要研究多搞代用品，要提倡节约用材，不要因为木材便宜就随意浪费。

这次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个《紧急指示》，专讲制止乱砍滥伐问题，别的不讲，就写那么几条。这件事要抓紧，抓晚了损失更大。

关于解决滥占耕地建房的问题

切实解决滥占耕地建房问题。这个问题和乱砍森林一样，都是带有根本方针性的问题。我国人多地少，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节约耕地。这几年来，由于搞活经济，农民开始富起来了，纷纷要求建房，这当然是好形势。但是如果不加控制，滥占耕地，发展下去，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前些时候黄克诚同志看到报纸上报道农村大量盖新房、住的多么宽敞的消息，就给我打电话，说这样宣传会引起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占地太多，要注意。黄老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一位泰国华侨到广东潮州探亲，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回去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潮州最近几年大盖“下山虎”（三面有房的院子）和“四点金”（四合院），这是自杀政策。潮州地区一千二百万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四分耕地，这样占地盖房怎么得了？发展下去，那人就要上天，当“空军”了。建房如果放任自流，不会比人口放任自流造成的后果小。所以，这个问题要注意，要有远见，对农民进行引导。不能只提倡建新房，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农民的居住条件应当逐步改善，但不能提倡住得太宽敞。中国人多地少，就是要住紧一点。一般农村，没有条件盖很多高层建筑，也不能都盖成独门独院，拉开距离，那就不得了。改善农村居住条件，主要是把房屋设计得更合理，改善房内设施和卫生条件，把家里搞得适用、干净卫生一些。占地少，又住得方便

舒适。我们看，日本的房子一般都盖得很小，是有道理的。他们是个岛国，耕地非常宝贵。我们也要从节约土地考虑，研究中国乡村的房屋建设。

当前首要的，是要把城乡建房滥占耕地的歪风刹住。第一，对于机关、企业和干部滥占耕地建房的，要选择一些突出的违法事件，严肃处理，有的要没收，有的要登报。第二，农村建房面积必须控制。一种办法是，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按人或按户规定建房面积，一般以原有宅地为基础，不宜扩大。另一种办法是，规定村子建房范围，只准在规定面积内搞“内涵”，不能扩张“外延”。具体如何搞法，各地可以研究。总之，不能占耕地。第三，农村建设要搞好规划，规定标准设计，有关部门要积极给予支持和指导。

从今天研究的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现在农村政策如果出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所有制问题上，如个人劳动、个体经营等方面，而是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问题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短时间不注意，就会带来长期难以弥补的损失。譬如，农村开展多种经营是好事，有的地方把荒山分到户也是可以的，问题是群众利用荒山去干什么。如果是植树种草当然好，如果上山毁林开荒，只想着眼前抓一把，那肯定要来个破坏。宣传“万斤户”也要注意，如果这万斤粮是靠毁林开荒来凑数的，那后果就很不妙。这是得不偿失。乱砍滥伐树木，滥占耕地盖新房，也都是这样。如果不注意，几年工夫，造成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森林、耕地大量减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事情好的方面，也要看到在好的事情掩盖下的消极的一面。在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限制和纠正那些带有破坏性的问题。

我们要坚持搞活经济的政策，但在有些问题上不能“活”。计划生育不能“活”，森林砍伐不能“活”，城乡占地不能“活”。对这几项要有明确的政策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若干年以后，它所造成的后果可能就把我们搞活经济带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效益抵销了。到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就晚了。

中国人多地少是面临的现实，很多问题需要从这一特点出发去考虑。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就整个国家来说的，要按人口平均，土地和其他资源都不算丰富。这是一个大的制约因素。这一点要提起大家

注意。要十分珍惜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不可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

这个文件（指林业部和城乡建设部的《请示报告》）加个批语，以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党上下抓好这件事。这两件事，难是难，但只要全党一致就不难解决。计划生育这件事是最难的，但只要大家认识一致，下决心抓，也能抓好。这件事使我们很开脑筋，说明只要方向对，决心大，全党上下一致，我国许多重大的、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下决心，全党一致，任何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建材工业要抓紧技术改造*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要靠技术进步。要解决新产品试制和采用新技术推广的问题。

听说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要达到 800 亿元，这就超过了 1978 年的规模了。怎样用好 800 亿元，要很好研究一下，一是用于能源交通，二是用于技术改造。少用在一般项目上。银行的贷款要卡紧。

我们国家要把每年的一亿吨石油用好，把 800 亿元的投资用好。要研究有些什么有效措施。

现在水泥很紧张，特别是大水泥更紧张。今年建材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如何，今后如何打算，你们谈一谈吧。

你们讲与英国皮尔金顿谈判，合资建设上海耀华浮法玻璃生产线，过去英商条件苛刻，要收我国各浮法厂的提成费。这就是因为我国没有专利法，有专利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们说锦西水泥厂生产特种水泥需用重油得不到保证。为什么生产水泥要烧油？为什么还不改过来？即使停产半年也要改，先用进口水泥暂时顶替一下。剩下两个烧油的厂可轮着改过来。

要下决心搞技术改造。水泥工业的技术改造要以窑外分解为中心，窑外分解要快上，今后新增生产能力尽可能搞窑外分解。只是工艺过关还不行，还要使配套设备制造过关。国内解决不了的关键设备要引进，既买设

* 这是赵紫阳在国务院听取国家建材局汇报时的谈话。

备，也买制造技术，要舍得花点钱。高温风机、大型减速机的技术引进，经委、计委要抓紧落实。大连造船厂就是走合作生产的道路，开始自己生产的少些，逐渐增加，就是用“脱壳”的办法。真正关键的东西靠测绘不行，否则就没有专利了。

技术改造问题。经委、计委要抓一下专业设备的引进政策。要有长远打算。那些关键设备国内未过关，必须买的设备，要和引进专利技术结合起来，不需要成套引进。对自己既不要估计太低，也不要估计过高。下决心围绕技术改造引进一些关键设备和专利技术。这样做机械部门也不反对，都上去了。到本世纪末，各行各业都要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成熟的技术在我们国家大量应用起来。跨上这一步很重要。没有这个技术政策不行。各行各业都有个设备更新问题。引进设备结合引进专利。单独引进专利很困难，花钱多。

到本世纪末要生产多少水泥？（杜恩训¹答：估计两亿吨打不住。）按两亿吨计算，就要五千万吨煤，这可不行！加上建材其他产品用煤更多了，建材工业降低能耗是件大事，不搞技术改造吃不消，使用水泥不讲节约不行。节约水泥有什么措施？经委要研究在施工中节约水泥的问题。

你们说发展建材工业要解决政策问题很值得研究。棉花就是靠政策对头，今年又是大丰收。只靠指令，多少年也没上来。要研究政策，要利用经济杠杆，否则就事倍功半。建材是回笼货币的行业，要努力搞上去。不仅销城市，还要销农村。对新型建筑材料要扶植，我赞成免税，免了税就不要免利了。

1985年达到300万平方米新型建筑材料太少了，这不成比例。要多搞一些新型建筑材料，既节省能耗，扩大使用面积，又缩短建设工期，很好，要推进一下，支持一下。

要抓些大企业，像首钢那样。定个政策，企业有了钱，按国家规定的计划去发展。首钢是先包后规划，把经济责任制同长远规划联在一起。明确权责利，一定十年、十五年。通过规划解决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你们建材工业也可选几个企业搞，计划一下，条件不成熟的不搞，成熟一个，包一个。现在大厂的经济责任制找到了一条路子，例如首钢。小厂也有办法，就是自负盈亏，征所得税。就是不大不小的，还缺个办法。

在安徽铜陵建熟料基地，供应上海熟料，这个办法好。在沿江的地方可以多发展些熟料基地，计委要规划一下。我国东部、西部有个加工和原料的矛盾，搞加工的利润高，搞原料的利润少，如果把西部的原料价格提高了，他就不一定搞加工了，矛盾就好解决了。

建材设计力量不够，可以与别的部门协作，签长期合同。你要调他的人很困难，可以找他订长期合同，例如军工部门。这次搞科技规划要动员军工力量参加。按行业搞技术发展中心。

可以中央和地方合资一起搞，分产品，分利润。不论大中小厂都可合资经营。

建材很重要，现在缺口大，真正搞起来也不难，要研究如何搞上去。一是研究搞活的政策，如何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就是这样。我的一个老战友来信讲，他大儿子今年种了10亩半麦子，收6500斤；二儿子种11亩收8000斤；三儿子种8亩收6000斤，比过去产量增加一倍多。农业搞上去了。煤炭也有点办法，经济煤的办法，统配矿怎么办？是不是定个基数，超产部分加价。建材工业也要想点办法，搞点灵活政策，各方面搞活一些，鼓励大家积极性。化纤没人号召，到处都搞，搞的那样快，甚至拿外汇去买原料，就是有个利益问题。计划也能调动，但只靠计划不行，还得有个政策，用经济办法，计委、经委要研究个办法。上调地方水泥每吨补助25元，今年上调250万吨，明年还可多搞些。五十年代发展小化肥、小水泥很快，但是技术没上去，今后要集中资金搞先进的技术。过去不愿搞大的，这我们的政策有关系，一搞大的就拿走了。

建材工业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把建材搞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另一个是技术改造。建材工业现在的生产技术太落后了，不改造，用老技术发展吃不消。目前我国水泥工业基本上是四十年代水平，还有三十年代的，烧成用煤比国际先进水平高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平板玻璃的生产技术也很落后。今后扩大生产一定要采用新技术，不能饥不择食。现在再上落后工艺，以后还得改造。要明确走技术改造的道路。又要发展，又要建立在比较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材是耗能多的工业部门，不改造，能耗高，搞不起。要发展水泥，又要搞技术改造，耗能多就限制了本身的发展。

坚定地走技术改造的道路，搞改造如影响生产，可以采取先扩后改。

讲先进技术当然是适合我国的适用技术。如平板玻璃，要发展浮法，但不一定都搞浮法。

新型材料免税免利问题，请计、经委和财政部再研究一下，搞点政策、措施，搞上去了再取消优待。

建设熟料粉磨站的办法很好，要注意熟料产区的利益。

改进包装很重要。还要重视发展农房所需混凝土构件。

注 释

1. 杜恩训(1919-1990)，河北献县人。时任国家建材局局长。曾任贵阳市副市长，建工部生产局局长，建材部副部长。

经济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

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

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现在，我想就四个同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讲一些意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

一九八〇年，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七千一百亿元。到二〇〇〇年，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翻两番，达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这是全国经济战线、科技战线和其它各条战线共同战略目标。我们财力物力的条件如何，能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从资金、能源、材料的条件来说，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概念，叫做又不具备、又具备。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来计算，资金、能源、材料都严重不足；但是，如果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能够在二十年的建设过程中，逐步地转到新技术的基础上来，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都提高到全新的水平，那么，我们的资金条件、能源条件、材料条件，是可以保证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

一九八〇年，我们生产的各种能源，折合成标准煤，相当于六亿三千万吨。七千多亿元的总产值，就是靠这六亿多吨燃料和动力来实现的。

* 赵紫阳在讲话中提出“振兴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战略方针，对深入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确定了指导思想，推动中国科技工作、经济建设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开拓了新的局面。

到本世纪末，能源供应量大体上可以翻一番。能源翻一番，能不能保证总产值翻两番？又不能、又能。如果继续停留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按照我们现在总产值和能源之间的比例关系，那就只能使总产值翻一番。但是，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总产值和能源的比例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情况就不同了。从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来看，即使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我们也是落在后边的，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了。日本现在每年消耗的能源同我们差不多，大体上也相当于六亿吨标准煤；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的三四倍。当然，这里也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如能源结构不同，产品结构不同，但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技术水平比我们高。到本世纪末，我们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但是，我们应当力争达到能用十二亿吨标准煤来实现二万八千亿元总产值的水平。要达到这种新的水平，光靠少数企业、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提高技术水平是不行的；全国各行各业所使用的耗能高的设备，都必须更新换代；这还不够，各行各业还应该进行一系列的重大的技术改造，改变工艺流程和产品结构。这样，才能把能耗大幅度地降下来。冶金部的同志作了一些研究，初步设想，通过采用新技术和改革产品结构，使我国的冶金工业在不大量增加能源消耗的前提下，做到产量翻一番，经济效益超过一番。所以，能源不足的部分，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来补足。过去每年开计划会议，大家都向能源部门伸手，向计划部门伸手，要能源，争能源。我看，今后肯定要出现一个新情况：各行各业都来向科学技术伸手，向在座的和全国的科技工作人员伸手，向你们要开发能源和节约能源的先进技术。同志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材料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水泥，木材，金属材料，合成材料，各种各样的新材料，代用材料，都得向科学技术要。生产材料的部门会向你们伸手，要你们提供生产更多更好材料的先进技术，使一吨材料能顶几吨用。使用材料的部门也会向你们伸手，要你们提供降低材料消耗的设计、工艺、设备、产品等等。所以，要解决能源和材料不足，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资金问题现在非常紧张。这种紧张情况，还要延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底子薄，就是那么一点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必须统筹兼顾，量力而行。问题是我们现在经济效益太低。拿基本建设来说，一元钱的基建

投资，只能形成七八角钱的固定资产；而在国营工业企业中，一元钱的固定资产，只能实现产值九角六分。如果停留在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上，产值翻两番，投资就得翻两番。何况二十年后，现有的固定资产将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有了固定资产，并不能进入生产过程，还必须投入流动资金。而我们现在国营工业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已相当于固定资产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样计算下来，二十年内得筹集多少资金！现在我们的财政收入，一年也不过一千亿元多一点。当然，在二十年过程中，我们国家的财源是会逐步地增长起来的。但是，总有一个限度。如果硬要拚命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势必压缩消费基金，重新引起比例失调，搞得紧张不堪，造成经济活动紊乱。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出路在于改善经营管理和采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我们当前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改善经营管理，可以很快见效，把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今天我主要是讲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技术进步也可以生财。重大的技术进步，往往可以为国家生大财。国务院最近组织专家论证，如何用好一亿吨石油。专家小组的初步结论是：必须提高炼油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的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水平，抓好这一条，每年可以增加上百亿元的收入。首都钢铁公司是办得很好的一个企业，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出色。他们在发动全体职工深入讨论以后，决定在三年内进行十二项重大的技术改造，改造所需的钱，由内部积累和技术改造所得的效益来解决，不向国家伸手。不仅如此，他们除了上缴税金以外，还准备在三年内向国家上缴利润十亿五千万万元，相当于首钢现有的全部固定资产总值。湖北省襄樊市，在一九七九年在一九八一年的三年内，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已经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可以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我们的资金状况，如果按照现有的技术经济指标计算，要保证总产值翻两番，存在着相当大的一个差额，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解决。

这就是财力物力条件又不具备又具备的情况：躺在老的技术基础上，翻两番的财力物力条件就不具备；力争转上先进的技术基础，就可以更好地运用已有的财力物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翻两番就具备条件。为什么不沿用现有的技术经济指标把战略目标定在条件完全具备的水平上

呢？如果那样，叫做原地踏步，“好处”是轻松，但是，不能前进，现代化实现不了。

从上面讲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老技术、老设备、老材料、老工艺、老产品的基础上，按照现在已经达到的技术经济指标，翻两番是办不到的。但是，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的的基础上，翻两番是办得到的。不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落空的危险。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个目标就有实现的把握。十二大的文件说，要力争翻两番。我们的“力争”，首先在于力争科学技术进步。

因此，工业，农业，各行各业，老厂，新厂，都要抓住技术进步这个环节，把生产转到新的先进的技术基础上来。我们常说，今后搞经济建设，不能走老路，要走新路，不能把宝押在外延扩大上，主要应当靠内涵。当然，我们今后仍要有计划地建设新的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工厂，但是，中国这么大，光靠建设少数现代化的新厂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搞清楚。老厂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它们是汪洋大海。如果汪洋大海的面貌不改变，老是处在落后状态，整个技术经济指标就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新厂，不仅在建厂时要用先进的技术武装起来，建成以后，还要继续不断地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现在技术老化的周期越来越短，再先进的技术，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技术不进步，故步自封，是没有前途的，是一定要被淘汰的。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办好这件大事，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点，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的指导思想肯定下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是强大的活跃的社会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这个道理，小平同志讲过多次。最近在党的十二大上，耀邦同志再一次着重讲了科学技术问题。我们应该把这些思想体现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真要搞现代化，就要真正依靠科学技术进步。部长，省长，市长，县长，厂长，领导经济工作，都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领导干部如何依靠科学技术？主要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可不可以暂且概括成四句话：一是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二是给科技战线出题目；三是为科技

工作创造条件；四是为科研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开辟道路。其中有许多事情，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比较生疏的。但是，既然要翻两番，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一定要学会如何做好这些生疏的、艰苦的、意义重大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学得很认真，做得很扎实。今后，一切财政经济领导部门，包括财政、金融、商业部门，都要吸收有科学技术知识，热心支持科学技术进步的同志参加领导。否则，思路打不开，政策不能很好贯彻。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时候了，不能再晚了。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指导思想问题：搞现代化，振兴经济，翻两番，一定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

第二个问题，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怎么办？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科技工作者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特别是要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来。科研工作领域很广，课题很多，第一位的，是要研究经济建设中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课题。科技工作者应当在各个方面作出贡献，最重要的，是要在推动生产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方面，作出贡献。

这些本来都是老话。去年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科技发展方针，讲的也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一是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希望，翻两番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大家对科学技术工作者寄以厚望。二是因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有些难度很大的理论课题和尖端技术，我们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量大面广的生产技术却相当落后。必须围绕着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围绕着消化吸收和应用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把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力量组织起来，急起直追。三是因为我们国家科技人员少，科研经费少，浪费不得。必须分别轻重缓急，把十分宝贵的人力财力物力，用到刀刃上去，不能分散力量。四是因为现在强调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同时强调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你依靠我，我面向你，水乳交融，通力合作，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共同的战略目标。尽管是老话，根据上面四条实际的理由，很有必要重新说一说。

面向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我看，不仅不会影响，

而且会促进科技繁荣。科学技术所以是生产力，就是因为它可以应用到生产中去，发挥实际的作用。科技现代化所以是关键，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难题。面向经济建设，正是为了使它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我们应当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课题，本来就是为生产服务的。基础研究的许多课题，也是可以间接地为生产服务的。因此，能够直接或间接应用到生产中去课题，是绝大多数。面向经济建设，可以使科学技术中这些最急需的领域首先兴旺发达起来。当然，在基础研究方面，也确有一些课题，现在还无法在生产中应用。对于特别擅长于研究这类课题的同志，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劳动，请他们继续安心研究下去，但是，至少在当前一段时间内，恐怕就不可能投入更多的力量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考察一下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凡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也总是比较发达。为什么？因为它们有经济实力，有钱办学校，有钱办科技，科研设备好，搞科研的人也多。经济是基础。经济上不去，科技也不可能上去。我们的国家，在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以后，经济实力比较雄厚了，就好办多了，那个时候，我们投入基础研究的力量也可以比现在多一些。但现在不行，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科技人员太少，必须组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这样做，国家可以富得快一些，既可以保证实现翻两番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又可以使急需发展的科技领域首先发展起来，也可以为我国未来科技事业的全面繁荣，创造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所以，我认为，明确地提出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有利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意见，我就想进一步讲一讲：怎样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组织科学技术工作。

我认为起码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来确定科研的任务、课题。第二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调整科研体制和科研力量。第三件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完善对科技人员的考核制度和奖励政策。这三件事，都很重要，都要做。我今天主要是出题目。文章谁来做？由科

委会同各有关部门来做。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又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是可以做出三篇好文章来的。今天我也讲一些初步的意见。先谈谈第二件事和第三件事，第一件事放到后面再说。

现在的科研体制，不能适应于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难题，不能很快地反映到科研单位中来。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各个方面的科研力量之间，组织得不够严密，不够协调。有些完全相同的课题，几十个单位都在搞，在低水平上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部门之间，壁垒森严，听说还有一些互相拆台互相封锁的事，这就很不好了。除了体制问题以外，恐怕同不健康的思想作风也有关系。科技力量的分布也不合理，有些单位人多事少，而有些单位，特别是第一线的科技力量，又过于薄弱。某些科研单位内部，人员结构不成比例。有些单位，名为研究所，其实并没有多少科技人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但是长期拖下去不好，对工作不利。我看，科研体制要通盘规划，分步骤解决。牵动面大的，要慎重从事，务必不要打乱重大课题的研究；调整后大有利于工作的，就要抓紧解决。可以考虑，首先抓这样几条：第一条，抓紧建立一些行业技术开发中心，数量不要多，但要办好，让它们真正起作用。任务要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搞本行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规划，搞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成为名副其实的为社会服务的生产技术开发中心。不一定都设在北京。人员既要精干，又要配套，可以以各产业部门或大型企业已有的科研机构为基础，调整充实。如果现有力量确实不足，其它方面的科研机构就应当抽调优秀的科技人员大力支持。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具体条件，通过招考、推荐等各种办法，逐个审查，合格的就收。原单位人浮于事的，用非所学的，应当放行，不得留难。这些中心办起来以后，要面向本行业，特别是广大的中小企业，为它们服务。有的中心可以由一个部门组织；有的中心则应该打破部门界线，跨部门组织，但可以以某一个部门为主。第二条，大的专业公司和骨干企业，特别是已经确定要进行重点技术改造的大型骨干企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也可以仿照上述办法，建立或加强本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它们主要为本企业服务，也可以适当地为其它企业担负一些科研任务。这种中心，数量也不要多，先试点，办好一批，

再办一批。第三条，不打乱原建制，不改变隶属关系，分别情况，用“科研、设计、生产、服务一条龙”、“科研、设计、生产联合体”、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基地、科研合同制、技术咨询服务、兼职等多种形式，鼓励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挂钩。科学院、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科研力量比较雄厚的科研单位，都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科技人员，支持那些科技力量薄弱的企业，帮助他们工作，编制不动。我们许多科技人员，早就有此要求，渴望为经济建设多出点力，苦于渠道不通，“服务无门”。我认为，应当为他们把“门”打开，使有作为有抱负的科技人员，都能够畅通无阻地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来，贡献才智，施展身手。

至于奖励制度，发明者应当受奖励，这一条已经用条例的形式肯定下来了。优秀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创造者应当受奖励，这一点也已经用条例的形式肯定下来了。今天获奖的同志，就是根据这两个条例评选出来的。你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丰富了知识的宝库，创造了物质的财富。许多同志还创造了很大的物质财富。今天获奖的发明中，年经济效益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有十三项，其中在一亿元以上的有六项。一项发明，推广以后，一年就能取得这样的效益，这是多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这对正在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全国人民是莫大的鼓舞。我还想指出一点，就是现在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政策和考核制度不够完善。因为在广大的科技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工人、农民和管理人员中，有许许多多的同志，他们虽然没有发明、发现，但是，他们在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推广应用已有科技成果的工作中，在栽培、养殖、勘探、设计、施工、制造、技术管理、质量检验、标准化研究、计量、测试、劳动保护、医疗卫生、环境建设、物资储藏、交通运输、科技情报等各种工作岗位上，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也为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作出了重大的甚至杰出的贡献。今天请了一百多位这样的同志列席大会。我们也要向全国千千万万这样的同志致敬，向他们表示感谢！应该为他们制定技术进步奖励条例，按照他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有的由企业奖励，有的则应由地区或部门奖励，直至由国家给以奖励。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讲面子，也不能讲资历；就是一条，要讲贡献，讲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贡献越大，越要奖。在

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重大贡献的，更要奖。同样，在对科技人员进行考核时，在处理科技人员的职称问题、待遇问题、工作条件问题时，也必须以他们对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贡献作为重要的依据。还应当制定各种鼓励的政策和办法，支持科技人员到厂矿企业去，到农村去，到边远的地区去，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科技人员本来就少，现在有的单位，对他们重视不够，使用不当，不能人尽其才，对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没有给以应有的关心，这种情况应当迅速改变。我认为，这样做，对贯彻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利，对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有利，对经济建设有利。

第三个问题，把科技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参加规划，参加攻关。

我们想在计划工作上作点改进。要改进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讲三点：一是想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社会发展这三个方面协调得更好。二是想看远一点，作些长远打算、总体设想、大的决策。因为好多问题，特别是最重大的问题，不仅年度计划无法解决，五年计划也无法解决。现在，正在搞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科技方面则要看远一步，准备规划到本世纪末。三是要把全国规划更好地建立在行业发展规划、经济区域发展规划、重点企业技术改造规划的基础上。因此，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搞各方面、各层次的规划。搞规划，实质上就是搞调查研究。为了减少一点盲目性，系统地研究一下各行各业、各个经济区域、以至各个重点企业的发展前景，花点力量是值得的。

那么，动员科技工作人员参加哪些规划呢？上面说的那些规划，都要有科技人员参加。科技规划，科技工作人员当然要参加研究。全国的规划，也必须有科技工作人员参加，但人数终究有限。因此，我认为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必须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行业规划、区域规划和重点企业规划。

行业发展规划非常重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只是按照某种累进率去作机械的推算，因为那种东西靠不住。在行业发展规划中，不要把注意力单纯集中到产量问题上去；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朝什么方向发展，达到什么技术水平，采取什么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全面地透彻地冷静地调查研究一番，系统地思考一番，有个总体设想，通盘规划。方向问题，要按照宏观经济的要求和各行各业之间在发展

过程中的内部联系，作些大的决策。到二〇〇〇年在生产技术上达到什么水平的问题，应当按照我国的国情，充分地进行科学论证。全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总的目标，作过一些初步酝酿，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到本世纪末，把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遍采用了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厂矿企业中基本普及，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技术体系。这是个大问题，到底怎么定，要从实际出发，周密研究，慎重论证，不可能也不急于马上定下来。全国如何定，取决于各行各业的需要和可能。只有在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明朗化以后，全国性的决策才能比较切合实际，比较有把握。各行各业，情况不同，到底在技术上能达到什么水平，要实事求是，不要“争先恐后”地去“赶超”，切忌一刀切。一个行业内部，也要作具体分析。比方说，机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装备部，应该适当超前；但很多大型农机就不必去瞄准人家了。方向问题、目标问题不明确，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就会摇摆不定，攻关也就无所适从。行业规划确定之后，就作为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依据；将来新建工厂，如果不符合技术政策的要求，达不到一定的技术水平，就不允许建设，这对盲目建设也是一种很好的限制。行业规划是一件大事。光经济工作人员参加是解决不好的，必须由经济工作人员和科技工作人员共同研究。

除了对现有的行业作出规划以外，还要在建立新的行业方面有所考虑。比方说，建立饲料行业的问题，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比方说，按照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应该把计算机软件行业建立起来？如果需要的话，应该采取哪些部署？根据我国的特点，可以建立哪些有资源优势的、技术密集的、劳动密集的行业，这事已说过多次，现在到了应该具体化的时候了。

区域规划，不是要各省、各县都去搞面面俱到的规划。重要的是要有一些经济区域的规划，比如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和重化工基地的区域发展规划，以及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规划等等，从中研究一些大的方向、大的决策。许多科技工作同志，过去在这些方面提过一些重要的意见。有些意见，基本一致。有些意见，不尽一致。需要全面权衡利弊，取长补短，择善而从。

全国虽有三十八万个厂矿企业，但作为国民经济骨干的只有千把个，

它们的技术状况和经济效益如何，对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起决定性的影响。所谓把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的生产技术在我国基本普及，首先要在这些骨干企业中普及。国务院已经决定，先对鞍钢等一大批重点骨干企业作出技术改造规划，分期分批组织实施。

刚才说，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现在经济战线正在搞规划，遇到许多问题，必须请科技工作人员来“面向”，共同议论一番，共同研究解决。不仅搞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同志要参加，搞基础研究的同志也不妨参加，看看这些规划同自己的专业有什么关系，自己的专业能为经济建设作出哪些贡献？科技工作人员参加规划，至少能起两个作用：第一，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起一种参谋作用。第二，可以了解经济建设的实际，了解它们当前的和今后的需要，从而使自己在考虑本学科的方向、重点和课题方面，看得更全面，更准确。

接下来就是攻关：围绕着规划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难题，把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力量组织起来攻关。这件事，不能等规划全部定下来再落实。看准一批，就要落实一批。有一个问题要专门谈几句：应该扩大视野，不要把攻关的含义理解得很狭窄。第一，重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应当列入攻关任务。这里有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大的决策如果失当，对经济效益往往会产生极端严重的、无可挽回的影响。第二，国内攻关和技术引进应当相互衔接，既不要重复，又不能脱节。大部分课题应由国内攻关解决。一部分课题，如在国内研究费时太长，花钱太多，就应通过引进，加以解决。引进以后的消化吸收工作，应当像国内研究一样，列为攻关课题，扎扎实实地组织落实。

攻关不是目的。取得成果以后，还要很快应用，推广开来。过去我们也有不少成果，但是没有很好地应用推广。必须组织科学技术成果由实验室向生产转移，单纯军用向军民兼用转移，沿海向内地转移，国外向国内转移。从中间试验、工业试验、小批量生产直到大量生产、普遍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要打通。在技术转移中，要提倡社会主义协作的优良风格，反对技术封锁的不正之风。同时，应当尊重创造成果的单位 and 科技人员的劳动，保障他们合理的利益。

这次搞规划，搞攻关，要真搞，不要假搞。行业规划，尽管是预测性

的，但这是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因此，必须实事求是，有根有据。重点工厂的技术改造计划，重大的科研攻关项目，一经批准定案，就要列入国家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严肃的事。许多同志反映，攻关要有条件保证。这个意见是合理的。攻关项目的落实，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必要的经费，必要的科研条件，必须落实。另一方面，科研责任制也必须落实，必须及时地拿出用得上、用得着的科研成果来。因此，在确定攻关课题时，要十分慎重。没有经济效益的课题不要列进去。凡是需要列为重点课题的，必须是在一定期限内能够产生重大经济效益的。要防止出现“重点项目，重点浪费”的现象。科研管理水平，科研工作效率，都必须努力提高。

组织科技工作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这是领导的责任。这是一项大规模的组织工作，必须有层次、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落实。必须在一个有权威的、有效率的、精干的机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下，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将就此作出决定。

我国科技人员少，是弱点。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好，能够把大家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是我们的优势。五十年代，我们有组织半导体、计算机和尖端技术攻关的成功经验。六十年代，又有组织九大机电设备攻关的成功经验。这次攻关，任务更重，意义更大，应该组织得比前两次更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不管哪个方面的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国家的科技力量，应当打破部门界限，不分主角配角，根据国家的急需，在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下，亲密无间、协调一致地并肩作战。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在保证完成国防建设任务的前提下，也应当组织相当的科技力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在参加规划的过程中，在组织攻关的过程中，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第四个问题，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问题。

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后，大大激发了八亿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相比之下，如何提高工业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显得更为迫切，更为突出。

我想，应当为企业讲句公道话。企业的同志也很苦恼。他们说，搞新技术，缺乏三个力：动力，压力，实力。搞新技术得不到好处，没有动力。

不搞也没有关系，没有压力。即使想搞，也困难重重，新产品试制费太少，没有实力。上个月我到辽宁去。听说沈阳水泵厂搞了二十二种新产品，其中有九种高效节能水泵，可以为社会创造很好的效益，但价格问题解决不了，结果工厂赔了三十多万元，少发了奖金，工人受了委屈。现在大庆油田向他们买水泵，订了个合同，把节能所得效益的一定份额归给制造水泵的企业，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比方说，铁道部生产道岔的工厂，改进了工艺，把产品的使用寿命从一年提高到三年，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怕订货减少，影响产值，对工厂无利，这项新工艺就被搁置下来了。

个别工厂对技术进步不积极，这好办。许多工厂都缺乏积极性，就必须到我们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上找原因。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有两个根本弊病。一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社会的需要，关心市场的需要，其结果是产需脱节。二是不能很好地鼓励企业关心技术进步，其结果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几十年一贯制”。这两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关心市场，不想搞新的花色品种，对新技术就不会有兴趣。不搞新技术，新产品也出不来。

最近两三年，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但问题盘根错节，只能逐步理顺。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着力解决上述两大弊病。应当围绕着解决这两大弊病，来考虑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各项具体措施。在计划体制、经济政策、以至行政手段等各个方面，都要梳梳辫子，通盘考虑，逐步解决。

计划体制方面，要解决计划指标体系的问题。以总产值为主要指标，弊病很大，不利于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不利于采用新技术。施工企业按基本建设工程量提取管理费，弊病也很大，居然出了这样的问题：重锤浅夯的技术和设备都研制出来了，可以加快施工进度，又能节约材料和能源，但是，因为减少了工程量，影响了管理费，施工单位不愿用！治本的办法一时定不下来，就要考虑先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看来，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不仅要有生产新产品、推广新技术的要求，而且要有淘汰陈旧产品、禁用落后技术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明确地列到主要考核指标中去。

必须解决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问题，为技术进步开路。比方说，财政方面，要解决新产品试制费的经常性来源问题。信贷方面，要更好地扶植新

技术新产品。税收方面，要实行鼓励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价格方面，要研究如何切实贯彻按质论价的原则，不仅实行优质优价，而且实行低质低价，对劣质陈旧产品规定惩罚价格。商业、物资、外贸方面都要研究改进包购包销的办法，要使生产新产品的企业有一定的自销权，不能使生产陈旧劣质产品的企业得过且过。现在经济政策方面，很多规定是妨碍技术进步的。我举一个例子：洗煤优质优价等问题没有解决好，结果，煤不洗就外运，运输如此紧张，每年却多运了几千万吨石头。再一个例子是税收：国家的政策是多引进技术，少买成套设备。但在税收政策上，却往往有利于引进设备，不利于引进技术。我们的经济政策应当是鼓励技术进步的政策，决不当成为技术进步的阻力。

我是举例式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也是出题目。文章由各有关部门来做。不要局限于我所点到的问题。要打开思路，从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着眼，全面地进行检查。各有关部门都要做两篇文章：长远怎么办？近期怎么办？不要坐在办公室里写。要到企业里作点调查研究。写好以后，还要送到企业里去，征求企业的意见，请他们发表意见。企业认为真能解决问题了，再报国务院审批。

总之，为了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就要切切实实地去解决问题。要明确方向，一年解决一批问题。

九月间，国务院开会，决定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十月上旬，国务院决定，重点建设前期工作的科研费用，应当从基建投资中解决。十月中旬，国务院又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决定再解决几个实际问题：

一、国家掌握的技术开发费用，在明年原定数额的基础上，追加百分之九十四。

二、各产业部门掌握的技术开发费用如何调剂增加，由各产业部门研究，提出意见。

三、企业利润留成，过去分为三部分，即：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今后改划为四部分，即：一般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必须用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上，不准挪作他用。一般发展基金，也应该主要用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

不要在老的技术基础上去扩大生产能力。在奖励基金中，应有一定份额，专门用来奖励对技术进步作出贡献的职工。

四、担负研究新装备任务的某些机械工业企业，经国家批准后，可以按照产值或销售额的一定份额，提取技术开发费用。其他行业的工业企业试制新产品，凡列入计划的，经批准后，在一定年限内，可以允许把新产品试制费分期分批摊入成本。具体办法另定。

五、由物价局提出实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对劣质陈旧产品采取惩罚价格的实施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希望这五条办法，能够解决一点问题。从根本上说，这里有一个生财之道和用财之道的问题。现在搞一般的基本建设，扩大加工能力，谁都有钱，积极性高得很。但是，搞重点建设，搞技术开发，就没有钱了。该用的钱不用，花小钱得大利的事不办，不该花的钱乱花，症结在这里，出路也在这里。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这一条指导思想明确树立起来以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都应该把它贯彻体现到生财用财之道上去：在开发新技术上用财，又通过新技术生财。这个问题解决了，科技战线和经济战线就都活了。我们常说要搞良性循环，这也是一种良性循环。

当然，除了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以外，在企业的干部结构、劳动力结构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不利于技术进步。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不准备谈了。

同志们！今天我就讲四点意见：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组织科技人员参加规划，参加攻关；提高企业对技术进步的积极性。讲的都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照我看，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振兴的一个战略问题。党的十二大已经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各条战线，都在研究如何开创本战线的新局面。我讲的这些意见，如果对开创科技战线、经济战线的新局面都能有所推动，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给山西省平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复信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平鲁县委、县人民政府：

我非常高兴地读了你们的来信。晋西北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的地区之一。平鲁县今年喜获丰收，粮食总产量突破一亿斤，油料超过一千万斤，社员人平分达到一百三十二元，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改变了“三靠县”¹的面貌，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希望你们在胜利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总结经验，扎实做好工作，继续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注意保持生态平衡，争取农、林、牧和工、副业持续增长，把平鲁县建设得更好。

此致

敬礼！

赵紫阳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日

注 释

1. “三靠县”是对贫困县的一种习惯性说法，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支援、花钱靠贷款”。

端正指导思想 积极推进改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这次全国计划会议开得是好的。宋平同志代表计委党组所作的汇报，我同意。现在讲以下五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其中有些事，是我们的一些初步设想，向大家先吹点风。

一、关于一九八三年计划指标

经过这次会议讨论后，一九八三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就算定下来了，然后按法定手续报人大批准。在讨论中，对少数指标还有些意见，这是正常的。过去的情况往往是在定计划的时候总是说完不成，可是最后到年底还是完成了，甚至超过。明年的计划，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高指标。现在党中央、国务院都不想搞那种高指标了。我们知道，各地方、各部门想留点余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留得太多了，全国计划平衡就有困难。所以，还是按照这次确定的指标去做，大家积极努力去完成。

二、关于翻两番问题

十二大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这对全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但是，怎样实现这个伟大的任务，值得很好研究。我看首先要端正做计划、定规划的指导思想。不要思想没有搞

* 这是赵紫阳在听取全国计划会议汇报时的讲话。

端正，就匆匆忙忙地从单纯增加产值、铺摊子上去想问题。实现翻两番，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搞明确，扎扎实实地把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把注意力放在制订和实施提高经济效益的措施上来，在这方面要多下功夫。这些工作多做一分，翻两番就增加一分保证，增加一分可能性。如果指导思想不搞端正就去算账，尽搞那些产值高、容易搞的，不从整个经济工作的全局、不从提高经济效益上考虑，那就会助长盲目铺新摊子、追产值，从而对今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现在已有这种苗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十二大提出的力争翻两番，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来实现。要是只从增加产值上考虑问题，拣不花气力的事，产值高的就搞，而不愿做花气力的基础工作，不注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过几年产品价格下降了怎么办？对这些事，要有个通盘的长远的考虑。各地、各单位根据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制订规划是必要的。但订规划前首先要把指导思想搞清楚，明确今后经济建设究竟走什么路。十二大开完不久，中央就提出经济振兴靠什么的问题。近几年，我看就是要靠抓好整顿、进一步调整和改革；从长远看，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总之，不是靠去铺摊子、追产值。

三、关于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

明年的工作，“六五”期间后三年的工作，要真正在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上下功夫。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企业整顿的问题，尽管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估计过高。一句话，企业整顿现在没有过关，问题没有解决。应当看到，许多企业问题相当严重，管理混乱，水平低下，浪费严重。像甘肃盐锅峡化工厂那样混乱的情况，整顿一下并没有解决问题。这样的厂矿决不是个别的。上海的同志在座谈会上说：“现在全国一年八百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千亿元流动资金，三百亿元补贴，要研究这三项大钱怎么管好用好，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来。现在全国上万亿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一年只创造这么一点财富，实在说不过去。”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太低，投入多，浪费大，效益差。所以，从明年开始，今后三年各级领导

必须在整顿企业上下功夫，用大力抓好这项工作。这件事抓得不好的话，基础打不好，效益就出不来。在企业管理混乱的情况下去搞技术改造，去搞改革，就是建筑在烂摊子的基础上，一定不会产生好的效果。

企业整顿好的标志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真正把经营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搞好。这包括计划管理、质量管理、财务制度、成本核算、物资管理，还有生产指挥调度等一系列基础工作。我们要认真抓两三年，真正把整顿搞好，把基础工作抓落实，把企业的内部条件搞好。首钢为什么搞得好？主要就是基础工作搞得扎实，有过硬的基本功。要把基础工作搞好，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班子不好，带头人不行，基础工作一定搞不好。二要有合理的政策，使企业有搞好经营管理的动力。领导班子也好，政策也好，都要落实到制度上，推动企业把各项基本制度、基础工作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不实行经济责任制，不解决“吃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企业就没有动力。现在有些小企业，一实行包干就改变面貌，就是因为把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有了积极性，就要引导用在做好基础工作上。否则，就会管理混乱，无人负责。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企业的管理也必须现代化。从长远来看，当前整顿企业，加强基础工作，也正是为管理的现代化创造条件。所以，这几年把企业认真整顿好意义很大。不如此，就很难前进。

从明年开始，还要进一步搞好企业调整。调整有两重意义。原来讲调整，主要是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农、轻、重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等。那种意义上的调整，经过前一段的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效果是好的。当前经济形势这么好，就是调整带来的。当然，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现在讲的调整，是进一步的调整，是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进一步调整。主要是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品结构，还有技术结构，使之合理化。这是含有新内容的调整，比过去的调整更深入了。

现在企业的组织结构很不合理，什么“长线”、“短线”，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以劣挤优、以落后挤先进，等等，使整个社会经济效益很差，造成的浪费大极了。如果不进一步调整，经济联合、技术改造也困难。现在是调整进入了新的阶段。要进一步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就得实行关停并转。不仅工业、交通有这个问题，商业上也同样存在。比如三级批发机构，

同在一个城市，地委有一套，市委也有一套，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实质上是封建割据性质的东西。这一点东欧有些国家也比我们好一些。最近听访问匈牙利的同志回来说，匈牙利把所有工厂的机修、热处理、锻压铸造车间等统统划出来，单独进行核算。这些车间单独核算后，不吃大锅饭了，他们与原来厂子的关系是合同关系。这样它才积极揽活，服务态度也才可能好。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合理的联合和改组。还有些社会服务机构，如食堂、幼儿园等，也应当首先让它独立起来，单独核算。四川攀钢服务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据说也搞得很好。我们就是要定这么几条，组织实施。针对当前企业设置、企业组织很不合理的情况，今后三年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进一步搞好企业结构调整，应当关停的必须关停，应当并转的必须并转，逐步使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这样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才有可能出效益，出速度。

为了把企业调整工作做好，首先要搞好规划。规划，要从全局出发，按行业搞，按中心城市搞（包括工业基地），并使两者结合起来，以避免盲目性。企业的进一步调整，企业的关停并转，在一定意义上说，比前两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农、轻、重比例，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难度大得多，因为它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但这个“老大难”问题必须解决。今后几年能不能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这是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一定要在企业的整顿和进一步调整上做出成效，这一关非过不可。各级领导要提高认识，下决心抓好。

四、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通病。外国人评论说，社会主义类型国家里，有一种“投资饥饿症”，争投资，铺摊子。这个弊病，是我们大批建设资金使用效益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想搞好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得靠大家，靠各地、各部门的努力。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也就是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最近陆续看了一些材料，所有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派，包括波兰的、匈牙利的以及苏联的，他们主张不同程度增加市场调节的部分，增加企业活动的自主权等。此外还有一条，就是都主张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这一点是共同的。没有一个改革派主张把固定资产的投资放开的。而且认为，这种旧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病，在改革中如不加以注意的话，会发展得更严重。东欧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就出了大问题。这几年，我们已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危险性。在今后改革中，固定资产的投资如果搞得太活，问题会更严重。对这个问题一定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体制越是要改革，越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如果不加控制，超出国力的可能，我们整个经济工作、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会发生。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势必拉长战线，延长工期，停工待料。过几年维持不下去，又得调整，一上一下，造成的浪费和损失不知有多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势必挤生产，挤生活，挤维修，整个社会搞得很紧张。这两年经济生活刚刚有些好转，市场商品开始丰富多彩了，如果又大上基本建设，“三材”和机电产品的供应又要紧张，随着能源更紧，刚刚出现的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就会没有了，又都不再讲质量、品种，不再讲服务态度了。市场供应紧张起来，社会经济生活绷得很紧，那么改革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多年的经验反复证明，国民经济失去平衡，不得被迫进行调整，常常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而来的。在我们国家，大家都有盲目扩大生产能力的积极性，没有什么制约。不像外国，一说经济萧条，固定资产投资马上减少。我们国家不受什么制约，搞了几年不行就下马，反正可以向财政部报销。这样上马下马，国家就搞穷了。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经济效益差，浪费巨大，一个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如“大跃进”、“超英赶美”、“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不切实际地提出高指标，追求高速度；另一个就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不少搞法，局部看似有利，但对全局不利，结果局部利益也保不住。由于这两个原因，三十多年来，挫折——调整——好转——挫折——调整——好转，反复折腾。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的了。现在要真正接受教训，千万不能再那样搞了。切不可为局部利益障碍了自己的视线，影响全局。这一点，希望各地的同志回去向党委、向政府的负责同志汇报清楚。摊子铺得大，全局搞得

很紧张，结果谁也上不去。即使一时上去了，没有原材料，没有能源，投不了产。这方面的苦头我们吃得够多了。这次我们无论如何要避免过三年再来一次折腾、又来一次调整的情况出现。今后我国的经济能不能振兴，我们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二十年有无希望，首先就看这三年我们怎么搞法。要是能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按十二大指出的路子去搞，情况就会一年比一年好。现在的形势刚刚好转，加上要力争实现翻两番，就很有可能又旧病复发，盲目扩大基建规模。那么，我们的调整很可能没完没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也得是个调整计划。那可真正要发生“政治危机”呀！有人就会抓住把柄攻击说，这是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你们的根本制度决定的，因为你们过去花了那么多学费还改正不了，还不觉悟嘛。现在虽然还没有出现这种严重情况，但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需要我们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二是掌握好资金使用方向。现在我们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七八百亿元，到底用在哪里？总的规模要控制，又要保重点建设，又要保技术改造，唯一的出路是要压中间这部分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一般性的扩大生产能力的项目。因为这部分一般性的加工工业，现在能力有余，企业又容易得利，积极性高。这就是说，“要保两头，舍中间”。一般性的扩大加工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即使你那个地方是需要的，也不能搞。下决心少搞一些，不影响大局；搞多了，要影响大局。“中间”部分搞少了，容易补救；“两头”搞少了，造成的后果是难以补救的。所以，除了控制规模要有个办法外，对控制中间这一部分建设项目，也要搞一套办法，要卡紧，几年之内硬着头皮不让搞。不是说我们是官僚主义体制，层层批示、互相扯皮吗？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发展一下“官僚主义”，就是要层层报批，经过很多手续，最后使它搞不成。但真正属于技术改造项目，权力不能太集中，还得放活一些。放活以后，有可能发生名为技术改造、实为基本建设的现象。这也不怕，我们可以加强检查、监督。在最近几年，对中间那部分一般性扩大加工能力的项目，我们就是要扼紧一些。宁肯将来检查有扼得太紧的缺点，也不使将来说控制得不严。对技术改造项目，要放宽一点，搞活一点。监督之权交给各有关部门，交给银行。凡是乱来的，要通报，给以经济上的处分、罚款甚至没收投资。

三是加强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许多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像可行性研究、勘探、设计等，都是做得马马虎虎的。常常是争到项目以后，才回头去做这些工作。结果一施工、一投产，各种问题都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浪费，而且往往多少年也改不过来。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要是资本家经营，就是上吊也不行。为什么事前不把地质、水文资料搞清楚，不把设计搞好呢？这是对人民不负责呀！当然，对有些单位来说，过去没有经验，今后决不能再这样干了。前期工作搞不好的，宁肯推迟建设。现在我们同世界银行打交道，它审查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比我们的要求严格得多，细致得多。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应当说我们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今后一定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办事，不能再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上了马再不断追加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不当，是我们国家多年来造成浪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固定资产投资花那么多的钱，但还是这么穷，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基本建设常常规模过大，投资使用不合理，前期工作差。这是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其次才是微观方面的问题，如施工单位的管理不善等。作为建筑工程部门来说，不应该强调其它方面，应该从自己方面努力。作为国家来讲，首先是计划管理的问题。有人说，计委不该管的事管得很多，该管的事又没有管起来。这个说法虽不完全正确，但值得我们思考。作为各级计委，首先要把固定资产投资管好，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浪费。计划工作也要像科技攻关那样，抓那些影响经济效益大的东西，争取这方面对国家、对社会多做一些贡献。这件事主要应由计委来抓，要制订一些办法。当然也不能只靠计委，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大力支持；需要各地、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同，走出一条新路子。

五、关于改革问题

总的讲，现在不改革，就很难前进。现在许多工作，包括企业整顿、企业调整、技术改造、基本建设等，都涉及改革问题。在改革中间，碰到很多困难。有些事没有看准，需要继续探索。但是，有些看准了的，改革后肯定是好的，却很难前进；明明很合理，就是办不通，有点“步履维艰”。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牵制很大：一是价格等经济手段不合理，二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不合理，需要加以解决。

改革，需要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包括价格、税收、信贷等。很多问题应当通过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特别是通过价格来调节，以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合理化。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由于现行价格很不合理，相反会促使企业经济活动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看来价格体系不改革不行。对价格的改革，既要谨慎，又要逐步地进行。就是说，不要贸然行事，要考虑到政治上、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在总的保持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某些商品的价格应当有升有降。看准了的，一年解决它一两个关键问题，明年这方面就要有所突破。要实行优质优价、劣质劣价，有些商品应当有季节差价，使价格尽量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生活。除此以外，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也应当很好利用。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也大大影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造成对企业、对经济工作管理不合理，严重妨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上面讲的价格体系改革的困难，也与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有关系，经济手段的运用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有联系的。我们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条块分割、城乡分割的体制，造成生产重复，流通堵塞，壁垒森严，互相牵制。这种体制不改变，经济体制就很难改革，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很难实现，整个社会的浪费也很难减少。

我们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都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如何减少重复生产、重复建设，流通上如何搞活畅通，我们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和大家研究，有些还要先进行试点。

一个是要注意发挥行业的作用。讲发挥行业的作用，并不是主张按部门的原则管理。全国各地千行百业，各搞各的，就不得了。总得有个部门从全国的利益出发，把本行业的一些大的事情统管起来，如发展规划、技术政策、质量标准、技术改造等，统筹兼顾，进行协调。全国纺织系统在这方面就管得不错。还有一些全国性的公司和少数对全国有重大意义的企业，看来也需要由中央有关部门集中管。但有些权力要交给地方，如组织企业之间的协作之权，要交给所在的城市。

另一个是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我们现行的体制，削弱了城市的作

用：城乡分割，人为地切断了城乡的经济联系；一个城市里的企业，有中央直属的，有省、地、市属的，条块分割，切断了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形成很多不同的体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一些中等城市，地委一个体系，市委一个体系，各搞一套，各有各的工业，各有各的社办企业；在商业方面，各有各的批发站；造成的重复浪费，不知有多大。这种体制，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很不发展的条件下，在过去主要搞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加上照搬苏联的经济管理办法沿袭下来的。现在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社会化生产在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扩大，这种体制就显得很不适应了。在新形势下，要求我们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我们的方向，是要实行条块结合、城乡结合的体制，当前要适当扩大中心城市的权力，让它放开手脚，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发挥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作为经济枢纽的作用，从而带动广大农村和集镇经济的繁荣，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原则，怎么改呢？我们有以下一些想法，这还不是定论，提出来和大家一起酝酿、研究。

（一）适当缩小省级部门管理企业的职权，扩大中心城市管理企业的职权。可不可以考虑，下一步省属各厅局不直接管企业，或只管很少几个，把企业下放给城市去管。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为什么南京工业发展快？就是省不直接管工业。为什么有些地方工业发展慢，就是因为省管工业。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广东省，省里的厅局不要直接管企业了。在广州的，就交广州市管；在佛山的，就交佛山市管。这一条如能实行，省级机关可以大大精简，机构可以搞小一点，精干一点，发挥综合部门的作用。省级厅局今后干什么呢？主要是负责行业的规划，制订技术政策，进行协调，组织检查监督，为企业服务等，抓一些大的问题。

（二）在经济比较发达、有条件的中等城市的地方，实行市地合一，市委既领导工业，又领导农业，既管城市，又管农村。这样农村工作能不能管好呢？从实践看，是可以管好的。六十年代，我们都怕大城市扩大郊区搞不好，结果松江专区交给上海市管，以后通县地委交给北京市管，都是搞得不错的。大城市可以管好农村，中等城市也是这样。辽宁的经验可以证明。辽宁省除了西北部的少数地区外，都是市管县，以中等城市为依

托，把附近的县管起来。他们搞的时间长了，效果是好的，至少是城市工业、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成为一个体系了，对工业的调整、改组、改造，减少重复建设，发挥城市作用，支援农业都有好处。我问过辽宁省的同志，这样管会削弱农村工作吗？他们说，没有削弱，管得很好，县委也习惯了。搞现代化建设，城市领导农村，是一条规律。看来，在有中等城市的地区，与其城乡分割，各搞一套，不如城乡统一管理。浙江的温州、杭州已在这样做了。可不可以在江苏省试一试，再取得一些经验。

（三）增设省辖市。有些城市已经成为本地区的经济中心，可以考虑改为省属市，郊区划大一点，把周围的县管起来。一个省，一个自治区，增加几个省属市也是便于管理的。看来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交给地委管理，不是成功的经验。城市属地委管以后，地委往往从市里收权，市里发展不起来。陈丕显同志到湖北省后，就把一些地属市改为省属市，这几年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这样做好处多。

（四）把地区这一级改为省里的代表机关，搞成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地区委员会和相当地区委员会的组织，是党的省、自治区委员会在几个县、自治县、市范围内派出的代表机关。”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把地区作为实的一级。“文化大革命”前地区一级也是虚的，以后才搞成实的了。今后，凡是没有条件实行市地合一的地方，要逐步执行党章、执行宪法的规定，把地区一级变成代表机关，不要管那么实，权力予以缩小，机构大大精简。它的职能主要就是代表省、自治区督促检查，总结经验，考核选拔干部，协调地区内的一些矛盾。这样有许多事就一下从省会、从中心城市直接通到县了，可以减少许多机构、许多环节。市、县的主动性、积极性也能够更好地发挥。

以上几种形式，根据各省区的条件进行改革。沿海和内地、经济发达的地区和边远山区情况都不相同，在全国允许多种形式并存，不一刀切，强求一律，在实践中去发展、完善。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总体设计、总的蓝图还没有搞出来，但有些事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应该办的，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像前面讲的，调整企业呀，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呀，减少流通环节呀，改起来阻力很大，就是不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我们这次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将起很

大促进作用。这是和全国战略重点转移一致的。至于步骤，可以搞得稳当一些，先行试点，逐步推开，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嘛。我今天之所以讲这些，吹吹风，就是想请各地的同志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积极稳步地把改革搞好。

在全国农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

现在我们说农业生产责任制要稳定、完善和提高，或者说要总结、稳定和完美。讲稳定，农民很高兴，各级干部也希望稳定。在工作中我们也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但要认识到，农民对稳定的理解就是不要变，也就是农民欢迎的东西，你不要变。而实际上农业生产责任制却天天都在发展，在发展中变化。当前突出的是，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形式。这种责任制的主要特点是，以农民家庭为承包单位，生产和经营上有自主权，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这些特点，已经渗透到各种生产责任制中去。看来，联产承包制这种形式还要发展，将从部分地区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地区。究竟什么样的地方不能实行这种办法，我看可能会有，但不会很多，甚至可以说很少。各个地区要有一点精神准备，不要再堵它，不要再筑墙了。上次我去甘肃河西走廊时，当地一些同志对我说，他们那个地方不能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是高产地区，有水利灌溉，小麦亩产五百斤，公共积累和公共财产比较多等。当然，中央历来讲要因地制宜，不能勉强。但是，我从河西到了宁夏河套地区，县委的同志说，他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一年，前后情况大不一样，获得了大丰收。我到了一些生产队，访问农民，都拍手叫好。河套与河西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都是高产地区，而河套的水利灌溉还要好一些。不久前，我去辽宁省，有的同志也说，他们的西部、北部地区可以

实行这种承包制，其他地区农民不要求实行。我建议他们不要说哪些地区一定不能实行。今年辽宁旱灾很严重，但是，凡搞了“双包”的，减产幅度都很小。实践证明，实行与不实行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大不一样。最近，辽宁省委开了会，不再提哪些地方不可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了。

现在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队实行“双包”责任制，有的地区比例还大些。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农业领域还在扩展和发展，而且势必向工业、商业、服务业和科技领域扩展，从乡村向城镇扩展。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农村调查回来的同志反映，承包制使社队工业的弱点、弊病减少了，生产力提高了，脱产人员也少了，并增强了竞争能力。有不少单位，原来亏损的很快变为盈利，而且涌现出一批善于经营的人才。实际上对社队工业是一个改造。从前一段的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工业、商业中推行承包制，在农村完全可以放开一些，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因为它不像城市涉及的问题那么多，没有什么危险。

在实践中，双包责任制本身也得到丰富和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完善，适应性更加普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多种经营开展情况不同，双包制在贫困队是一种搞法，在富裕队又是一种搞法；水田是一种包法，旱地是另一种包法；多种经营发达的地方是一种包法；多种经营少的又是一种包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当然，它的主要特点，即农民有了自己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和分配上克服了平均主义，不论在何种形式中，都保留下来。过去，我们把双包责任制看成只是那些生产水平低下的贫困地区所适合的简单办法，经过两年实践，逐渐发展成为有统有分、“几统一”下的承包制。它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成为当前农村中的主要责任制形式。以前我们讲农村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现在，还可以这样讲。但确切地说，主要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

最近看了江苏宜兴县实行农业包干到户的材料。宜兴是苏南太湖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个县，农业和多种经营比较发达，分工比较细。这里也是以工副业补农业，工副业占全县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集体分配人均达到一百七十八元。他们在农、副、工专业承包，统一经营的基础上，实行

了包干到户分配。开始他们在农业上是联产到劳、分户生产、超产归己，包产以内按工分分配。后来感到按工分分配弊端较多，于是在今年根据群众意愿，改为按户包干分配，把各种上交的提留核算到户，以户为单位出售粮食和进行结算，多售多得，超额归己。实际上是把粮食和收入两部分都包到了户。机械、植保、灌溉等技术性强的农活，仍由专业组(队)统一进行。工副业利润的返还，也不再“洒杨柳水”，主要依照务农社员包产的产量和出售商品粮的多少，核定到户，包产多、出售商品粮多的就多得。工副业人员一般只包“人口田”，不包“劳力田”。其劳动报酬，采取年初确定承包任务，通过调节其包干上交任务和工资总额，达到与务农社员收入大体平衡。如果种的“人口田”包产指标作为自留粮还不足的，需集体补进多少也在年初定死。不论包农业，包工副业，都签订合同，分季兑现。他们采取的这种形式比较复杂一些，但到了农户计算还是比较简单，包定以后，社员都一清二楚。他们不仅在全县中等水平的队搞了，收到好效果；而且在富裕队也搞了，效果也好。目前全县分配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百分之七十二，种粮食和搞工副业社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今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十一亿七千万斤，增产二亿三千万斤，单产上升到一千一百五十多斤，总产和单产都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水平。一至九月，工副业产值四亿多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约百分之九。宜兴县的事例说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生产力水平高低、多种经营内容多少的限制，不同地区都可以采用，原则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具有不同的形式而已。所以，根据两年来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第一，不要再划定框框，硬性规定哪些地方不能搞承包制；第二，要善于寻找不同情况下的承包制形式，予以总结推广。这样，就可以使农户、以小组为承包制单位的积极性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当然，可能经济越发达、工副业越多、分工越细的地方，这种形式就越复杂一些。承包制如同任何事物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总之，农村生产责任制实际上是在不断发展中。这两年来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但没有什么震动，成绩是很大的。主要是这种形式符合生产的需要和人民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此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领导上不要搞“一刀切”，

不刮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允许大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发现和总结群众的经验，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发挥群众的创造性。今后我们还应当继续这样做。

二、关于专业化、社会化和经济联合问题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加上贯彻中央、国务院发展多种经营的指示，农业和工、副业全面发展，农村出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新形势。而且，这种趋势会日益发展。随着承包制的进一步推行，专业户、重点户的大量涌现，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迫切需要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如技术推广、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提供信息等，要求组织专业化、社会化的联合形式。以小家庭为单位承包后，像上面说的那些事，有些自己经营起来是有困难或不合算的，需要从家庭承包中分离出来，联合经营，进行合作。这里所说的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基础上的经济合作，不是再回到原来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框框里的联合，而是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在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植保、良种、机械耕作、水利灌溉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联合。这种联合，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雏形。比如，浙江金华地区成立各种专业公司，与农民建立合同制。广东中山县建立技术服务公司，还组织有专业的协会。四川的新都、内江等地建立技术承包责任制，或进行有偿的技术咨询服务。大竹县通过基层供销社，从事供销、加工、技术服务等工作。这些经验都是好的。

目前各种形式的新的联合，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出来。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农民中间、从专业户中间发展起来的小型联合，如养鸡户中，有的专门从事孵小鸡，有的专门收鸡蛋运输、推销。为一定范围内的其他农户服务，互相建立经济联系。这些事可以由一个家庭来承担，也可以是几户、几个人联合的形式。这种形式的联合，范围比较小。另一种形式是，自上而下地由国营商业系统、供销社系统、农技部门等搭起架子，与农民建立联系，开展服务工作，在服务中发展。这种形式的联合，范围比前一种要大得多。各种专业公司、植保站、畜牧兽医站等，都可能演变成这种形式。从发展看，将来主要的可能是供销社，由供销社

把这些服务工作承担起来。在国务院讨论商业问题时，我曾经讲过，供销社体制改革，一是要吸取五十年代供销社“三性”的特点，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二是要适应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要求，向农工商结合的方向发展。农村生产经营的基层细胞是家庭或小组的联产承包单位。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不同层次的产供销、农工商结合的联合形式。将来供销合作社很可能变成综合服务的合作经济形式，成为开展、组织和推动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技术等各方面服务的中心。当然也不排斥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有些地方以原来的社队企业为依托，形成服务中心。我们现在也不急于说一定要采取哪种形式，从实践中再看一看。我认为，提倡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工作，支持和推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应摆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把它作为发展农村大好形势的一件大事来抓。

还要看到，农村商品生产一发展，就需要解决相应的基础设施问题。农副产品要变成商品，要许多基础设施才行。现在好多宝贵的物资，堆在产地运不出来，只好烂掉。商品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已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个重大障碍。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经济领导部门要制定规划，对重点支持什么、发展什么商品，要连同仓库、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并考虑进去。这些事光靠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除了使农民保证农业自身的投资外，应该鼓励他们逐步把资金用在商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仓库、办加工厂、修公路等等。国家应当制定一些经济政策，包括民办的仓库、公路的收费办法，使农民有利可得，又能促进商品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发展。这方面，我们要开辟出一条路子，既要公办，也要民办。国家可以办，农民也可以集资办，这也是一种经济合作的形式。

从以上讲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推行，组织经济联合，已经成为形势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这种联合，不能再完全回到过去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框框里去；也主要不是三五户承包户的临时互助。这种互助虽然灵活、多样，但它是松散的、不稳定的，不可能发展得很大，也解决不了经济合作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实行专业化、社会化，把农民家庭承包或小组承包的经济，通过各种形式，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大经济的周围，包括

同城市国营大工业、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国营农场、国家科研单位等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并通过合同制等办法。把它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在性质上是经济的联合，不是行政力量的联合；是自愿互利的联合，不是强制吃大锅饭的联合；是计划指导下的联合，不是离开国家计划轨道的联合。这就是列宁所主张的，通过合作制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这种联合，是建筑在社会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筑在小农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联合，加强了对农民的计划指导，加强了承包户经济同整个国家大经济的联系。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也表现在这里。可以说，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前、生产后各种服务工作的经济联合，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现在，许多农村工作干部都在等待如何解决经济联合的问题，需要把这个问题明确一下，这对今后农村工作是有好处的。

三、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问题

这是农村中的一个大的问题，总的方针还是中央 13 号文件中的两句话：“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一说搞粮食就忽视多种经营，一说搞多种经营又对粮食放松。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处理好的。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农业在多种经营上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当然按人口平均，中国的农业资源也不是很多的，如果讲耕地就更少了。但我们确实有很多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而且过去利用面也比较窄。一讲利用资源就是种粮食，不管条件如何，没有水就修水利，土地不平就改平，一切为种粮食创造条件。结果费力大，效果差。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重要性。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必须种粮食。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也不硬去种，而去种其他适合的作物。如盐碱地种棉花，沙地种花生，就很合算。一九七九年我去欧洲的法国、希腊等地看了看。在地中海北岸，包括法国南部，夏季干旱，很少下雨，如果种粮食，水利

的投资大、费用高，水资源也不足，但他们大力发展果树，结果成为很富裕的地区。希腊的荒山秃岭也很多，种粮食是不毛之地，但他们种油橄榄，收入也很高。中国有很多山地，荒山荒坡，还有许多地方水面多，潜力是很大的。如果政策对头，把利用这些资源的路子打开，我看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这里有个界限问题，不要一说多种经营，就把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改种经济作物。由于价格的关系，农民种经济作物的收入可能多一点，把宜粮地改种经济作物，这不能叫因地制宜，也不是经济、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适合种粮食的地方改种别的作物，创造的价值实际并不增多，因目前价格上不合理而造成的多收入一点，只是一种假象。从全局来看，是不利的。这是我们经济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上下应该统一认识。当然，发展多种经营，食品原料来源会多，食物构成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我国也是有潜力的。但是，认为中国在食物构成上可以走西欧的道路，或者走新西兰、澳大利亚的道路，把大量的土地都拿去种草养牛，靠喝牛奶、吃牛肉，那就是奇谈怪论。中国食物构成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道理很简单，植物蛋白转化为动物蛋白，质提高了，量却减少了。如果由主要吃粮食改为吃肉，中国的耕地面积还要扩大很多才行，或者人口要减少。所以，粮食终究是第一位的大问题。从宏观讲，从长远看，决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中国的耕地少，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因此，不管有多少矛盾，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决不能改种别的。这应当成为我们长期的国策，必须下决心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在有条件开发的地方，还要逐步开发一些出来种粮食。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片面地只从农民增加收入、只从农民的眼前利益来考虑问题，应当从全局、从长远出发，做好农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事实上有些粮食产区改种经济作物也并不合算。像江西扩大种棉花，产量很低，要几十斤粮食才换一斤棉花。四川种棉花，产量也很低。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发展甘蔗也是不经济的。连广东北部都不种甘蔗，湘南、赣南种上能高产吗？不如种粮食经济合理。棉花、糖料要逐步在北方、在新疆等地发展。这样，才真正是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我们现在进行作物布局的调整，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把那些适合种粮食的土地坚决保住，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然后才有可能把那些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

有计划地改种别的作物，或者退耕还林、退耕还牧。为了使粮食主产区种好粮食，要研究一些经济政策。一是要考虑有计划地、逐步地适当降低粮食主产区的征购基数，超产部分实行加价、议价收购；二是按牌价出售给国家粮食的，根据合同也按牌价保证供应生产资料，如化肥、柴油等。如果卖议价，那么供应的生产资料也按议价，低来低去，高来高去。总的一条原则是，要保证商品粮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同种经济作物大体相当，不让他们吃亏。具体办法，要进一步研究。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统一认识，对干部和农民群众进行教育，同时要采取一些经济措施。

四、农业区划问题

我们很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把我国的农业区域规划搞好，从总体上研究各个地区的特点、作物配置的最佳方案和所应采取的经济、技术措施，真正做到地尽其利，趋利避害，发挥优势。过去，我们农业上在很多大的方面缺乏研究。就拿北方来说，以前是一个模式，都是种粮食。为了种粮食，土不平就改土，天旱就修水利，很少考虑水资源够不够用这个前提。看来北方相当多的地方，水资源不足，无法搞灌溉农业。据农业科学院分析，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上、分布又比较均匀的地方，可以不搞灌溉农业，只要从耕作制度、作物品种、栽培技术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抗旱措施，也能够夺得稳产高产。在北方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想像南方那样都靠修水库灌溉，是不可能办到的，要十分重视把现有的水资源利用好。在东北地区，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一年种一茬作物，照说水是不够的，要研究为什么一季作物还经常闹旱。华北地区年降水量在四百毫米以上的地方，也要研究通过合理的耕作制度、选育耐旱高产良种、做好水土保持等工作，解决抗旱问题，注意保墒。山西壶关县晋庄大队，针对当地的情况，秋冬蓄水，深翻，下土杂肥，第二年春天不翻耕，点种上谷子，年年亩产五百斤以上，叫做春旱秋抗，这是成功的经验。西北地区农民也有这个经验。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农田水利建设应当继续投入力量搞。但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地方，就要注意保持水土、平地保墒，坡地上有条件地搞些水平梯田，

不要不讲投入、不计成本、不顾后果，硬去普遍搞水浇地。我们要向农业科技部门提出保墒抗旱、稳产高产的新课题，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研究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农业今后要进一步发展，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应当更加重视对自然规律的研究，把农业的各种措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把思路打开，不要只走一条路，否则就会越走越窄。我在四川的那几年，遇到干旱，当时我们就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结果农业连续增产。现在也应当这样，针对北方的干旱地区，针对南方的易涝地区，我们要研究不同对策，采取综合治理的科学技术措施，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

五、农村大好形势下需要注意的问题

农村形势很好，但我们头脑要清醒，尤其要注意那些带有破坏性的问题。我主要是指滥占耕地和乱伐森林两个突出的问题，如不注意，后患无穷。

三中全会以后，农民逐渐富裕起来，适当改善居住条件，盖些新房，这本来是好事，报纸上宣传一下也是必要的。但要冷静地分析一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究竟提倡住得很宽，还是提倡住窄一点，把房子布置得紧凑、适用、清洁一点。我看只能提倡后者。中国人多地少，就决定了不能住得怎么宽敞，城市、农村都应这样。今年六月我去日本，看见日本的房子不少也是鸡窝式的，住得很窄。他们有几个观点深入人心，叫做人口众多，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因此住宅建设注意节约用地。我国过去老是讲地大物博，可是很大一片是高山地区，三四千公尺以上能够都住人吗？我国还有个盖大房子的传统，又高又大又不适用。现在不少城市都盖了不少新村，标准也偏高了，负担不起。搞这样的样板，其他的怎么办？唐山市建筑的住宅也存在这个问题。国家投资都花得差不多了，还有相当多的住户搬不进新房，仍住防震棚。这几年多盖一些房子是应该的，因为多年来没有盖了。这三年住宅建筑面积，农村每年六七亿平方米，城市六七千万平方米，木材和其它建筑材料都很紧张，森林砍了许多，耕地占用不少。今后住宅要继续建，但这个规模难以为继了，需要适当缩小一些，要瞻前

顾后，长期打算。前些时候，泰国华侨回到广东潮州，看到那里到处大盖“四点金”（四合院）、“下山虎”（三面是房子），感到非常惊讶。潮州地区人均只有三四分地，这样滥占耕地盖大院，将来都去当“空军”喝风吗？所以，从长远利益着想，不论城镇和乡村，滥占耕地建房的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各级领导要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现在森林的破坏十分严重，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大破坏。有些地方乱砍滥伐的现象至今没有制止下来，有的还在蔓延。要是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过几年森林就要砍光。木材这种商品，是几十年才能形成的，稍一放松，几天砍光了，几十年都恢复不过来。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说乱砍森林是合理的。对木材这种商品就是要管严、管好。国外对森林的管理严格得很，我们太软了不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听之任之。严重破坏森林的案件，要彻底追查，严肃处理。

上次我讲过，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所有制问题上，而是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不严加制止，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这一套政策所带来的效益就会有不少被抵消掉。

我讲这些问题，涉及到我们的指导思想。现在形势一天天明显好转，很多事情要想远一些。归根到底，我们还是要解决好改善生活与进行建设的关系问题，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前几年改善生活的步子迈大一点，是很有必要的。今后步子不能再迈得太大了。生活的改善，要靠生产的发展，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提倡勤俭建国，艰苦奋斗。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大会审议。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八〇年，也就是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务院曾拟订出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指标。当时，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整个国家正在紧张地进行拨乱反正，国民经济正在进一步调整，许多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深入研究，必要的资料也由于十年动乱的破坏而很不完全，因此还缺乏编制出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的客观条件。这两年来，国务院在抓紧经济调整的同时，对经济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十条方针，经大会审议通过。在这之后，国务院又组织各有关方面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多次的研究和讨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已经编制完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要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力争实现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

要求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五年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就是说要求全国各行业、各企业普遍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在保证经济文化建设费用逐步增加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按照这样的部署，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在这个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计划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计划为三千六百亿元，将兴建一批具有现代水平的新工程，并在部分重点企业中实行重大的技术改造。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经费计划为九百六十七亿元，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五百七十七亿元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城乡居民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计划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一。这个期间，将保持国家财政、信贷收支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的计划，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计划，是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同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前途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已经分送给各位代表。这里，就计划的要点和一些有关问题作以下说明。

一、关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生产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是我们制订计划的一项重要原则。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千七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五十九亿元增加一千五百五十一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由二千一百八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六百六十亿元，工业总产值由四千九百七十二亿元增加到六千零五十亿元，都是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在执行中争取达到百分之五。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重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到一九八五年，全国粮食产量计划达到三亿六千万吨，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三；棉花三百六十万吨，增长百分

之三十三；纱三百五十九万吨，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食糖四百三十万吨，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三；原煤七亿吨，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九；发电量三千六百二十亿度，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四；钢三千九百万吨，增长百分之五点一。实现了这个计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将进一步趋于协调。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的速度是百分之三点四，“六五”计划期间要求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到五，这是不低的，是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六五”计划规定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过去二十八年的平均速度要低，这是因为工业调整的任务还很艰巨复杂，在近期内能源产量不可能有较大的增加，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过去二十八年的工业发展速度虽然不低，但是效益很差；而“六五”计划要求的发展速度虽然低一些，却是以较高的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六五”计划要求，产品质量要不断改善，花色品种要适应社会需要，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要有较多的降低，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比过去高得多。着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计划指标经过综合平衡，订得稳妥一些，留有余地，对于保护和发挥劳动人民和生产单位的积极性，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都有好处。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都超过了“六五”计划规定的年平均递增速度，全国上下都高兴。我们所以没有把后三年计划要求的发展指标调高，也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经过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各方面的关系理顺了，整顿工作做好了，又完成了为第七个五年计划准备的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实现了一批重大的技术改造和科技攻关，第七个五年的发展速度必将高于第六个五年。只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特别是在人才培养、重点建设和实现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第八个五年和第九个五年的发展速度肯定还会再高一些，从而使全国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样，我们就能够按照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到本世纪末争取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二、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重点和企业的技术改造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安排二千三百亿元，大体保持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水平。五年内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共八百九十个，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少得多。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吸取了过去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投资效果不好的教训。“六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的重点是能源、交通建设，这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五，比过去有所提高。同时，适当安排了农业、轻纺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公用设施、商业、外贸等方面的建设。五年内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全部建成的四百个，其余将转入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建设。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现有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资金为一千三百亿元。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年中，这方面的投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六五”计划把这个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将使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得到提高，并有利于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下面，着重讲一下能源、交通、农业的建设计划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

煤炭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一百七十九亿元，重点用于开发山西煤田以及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煤田，同时开发豫西煤田，山东、安徽、江苏煤田和贵州煤田。五年内新建一百万吨以上的大型矿井二十八个，加上中小型矿井的建设，全国煤矿建设总规模将达二亿二千万吨。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前建成投产八千万吨，结转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继续建设的有一亿四千万吨。为了加快煤炭工业的发展，我们的方针是抓两头：一是集中力量开发大露天矿，首先把资源条件好的霍林河、伊敏河、平朔、元宝山、准格尔等五大露天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设起来；一是抓紧现有矿井的技术改造和中小矿井的建设，挖掘潜力。这样投资省，出煤多，见效快，既可以使近几年和十年内煤炭产量有显著增长，又可以为下一个十年煤炭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基础。

石油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一百五十四亿元，重点勘探东北松辽盆地、渤海湾、河南濮阳地区和内蒙古二连盆地，并适当加强新疆准噶尔、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普查勘探，继续加强东部老油、气区的地质普查勘探，争取探明一批新油田，同时积极开展海上石油的勘探和开发。五年内，新增原油开采能力三千五百万吨，天然气开采能力二十五亿立方米。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原有油井产量由于每年采收形成的自然递减，使五年内石油年产量稳定在一亿吨的水平上。

电力工业建设，五年投资二百零七亿元，重点是继续开发黄河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红水河流域的水力资源，建设一批大型水电站，同时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内蒙古东部、两淮、豫西、渭北、贵州等地以及用电量大的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区，建设一批坑口电站和火电厂。五年内新建和续建装机容量四十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十五个，二十万千瓦以上的火电站四十五个，三十万千瓦的核电站一个，加上小型电站的建设，全国电站建设总规模为三千六百六十万千瓦。计划在一九八五年底建成投产一千二百九十万千瓦，结转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续建的有二千三百七十万千瓦。这个安排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要，在计划执行中将根据条件的可能，努力加快电站建设，同时大力节约用电。

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建设，五年投资二百九十八亿元，主要用于铁路和港口建设。五年内全国新建铁路铺轨二千公里，建成复线一千七百公里，建成电气化铁路二千五百公里。到一九八五年，山西以及内蒙古西部、宁夏煤炭的外运能力将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二千万吨，通往东北的运煤能力将由一九八〇年的一千四百万吨增加到二千九百万吨。在大连、秦皇岛、天津、青岛、石臼所、连云港、上海、黄埔、湛江等十五个港口建设一百三十二个深水泊位，到一九八五年全国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将由一九八〇年的二亿一千七百万吨增加到三亿一千七百万吨。继续建设长江等内河航运工程。加强公路建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同时，大力加强邮电通信建设。这些建设任务完成以后，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紧张的状况将有所缓和。

在农业建设方面，重点是加强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的防洪能力；建成河北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和天津引滦输水工程，缓和京津地区工农业用水的矛盾，继续建设黑龙江三江平原、江西鄱阳湖地区、湖南洞庭湖地区、安徽淠史杭灌区等商品粮基地。逐步建立和健全优良种子的繁育推广体系。继续建设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防护林体系，以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和西北地区的风沙化。继续开展全民植树运动，绿化祖国。禁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开荒。扩大人工草场面积，计划由一九八〇年的三千二百万亩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亿亩。建设一批畜禽良种场、饲养场和饲料加工厂。五年内扩大淡水养殖面积一千六百万亩，海水养殖面积五十万亩。这些，对于改进农牧渔业生产的条件，将会起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并且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六五”计划期间要积极加强地质勘探工作，加快找矿和资源评价的进度，同时做好水文、工程和环境地质工作。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重点，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增加社会急需而又短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五年中，要对鞍山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上海动力设备制造基地的所属工厂，大同、开滦、抚顺等大型煤矿，天津、湖北、辽宁、四川、山东的大型碱厂等相当一批重点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逐步改变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的技术面貌。机械工业是为各个方面提供技术装备的部门，技术改造必须先行一步。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对生产量大、使用面广的机电产品，特别是耗能多的汽车、拖拉机、内燃机、工业锅炉、水系、风机、中小型电动机等进行技术改造，促使它们更新换代。要研制一批精密高效机床、仪器仪表等关键设备，抓紧一大批工具、元器件、基础件的升级换代。发展一批农牧渔业和轻纺工业需要的技术水平较高的设备，努力提高发电、轧钢、采掘、洗煤、运输、海上石油勘探和石油化工等方面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制造技术。实现了这些要求，国民经济的生产技术面貌将会发生可喜的变化。

三、关于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不断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既是保证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又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六个五年计划安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其中一九八五年将达到百分之十六点八，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百分之十一有了较大的提高。应该承认，这方面的经费还是比较少的，但是限于财力，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方面的经费还要逐步增加。

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八五年全日制高等学校招生数将从一九八〇年的二十八万人增加到四十万人，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二；在校学生达到一百三十万人，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六。五年内大学毕业生共一百五十万人。在这同时，广播、电视、函授、夜大学等高等教育也将有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五年招收研究生二万人，比一九八〇年增长四点五倍，五年内毕业研究生四万五千人。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水平，国家确定用专款为一批重点高等院校建设比较先进的教学实验设施，新建和扩建一批实验中心。要调整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改进教学方法。过去专业划分过细，学生知识面狭窄，不能适应各项建设和继续深造的需要，对于毕业后的就业和转移工作领域也往往造成困难，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要认真加强对大学生、研究生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加强经常的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真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劳动者。继续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各门各类的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农林牧副渔、医护、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职业学校。普通中学也要适当增设职业技术教育课程。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把部分农村普通高中改为农业职业中学。要注意发展学龄前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到一九八五年，争取全国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城市普及初中教育。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努力全面地提高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逐步改善教学条件。普及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这是全国教育战线的一项十分繁重、艰巨、迫切的任务，全国人民都要动员起来给以大力支持。凡是教育事业发展得

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地、市、县和基层组织，凡是积极为教育事业作了贡献的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都要加以表扬；对教育工作不热心的干部，要给以批评；对挪用教育经费、妨碍教师工作甚至侮辱伤害教师的人员，要严加处分。要在全社会造成普遍重视教育工作的风气，使人人都认识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基础。

在科学技术方面，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在全国推广农业、轻纺工业、能源、电子、机械、原材料工业，化工和制药、运输和邮电等方面确有成效的四十项重大科技成果。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生产建设中带关键性的三十八个科技项目的一百个课题进行攻关，争取其中相当一批项目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成果，并推广应用。在着重发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使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靠的指导力量和后备力量。不论是应用研究或基础研究，都应该按照学科特点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要把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到同科学研究本身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成绩应该同样受到表扬和奖励，克服轻视推广应用的倾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省、市、自治区公用的情报中心、分析测试中心、计量中心、计算中心、应用数学咨询服务中心，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在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发展社会科学，加强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管理学、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文艺学、语言学、国际关系等的研究。要努力阐明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用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要填补空白学科，加强薄弱学科，改善研究工作的条件。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文学艺术、电影、电视、广播、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项文化事业和卫生、体育事业都将有相应的发展。电影故事片的摄制，必须在努力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增加数量，计划由一九八〇年的八十二部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百二十部。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影片和纪录片。广播电视要提高节目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加强节目的制作和传送手段，提高技术质量和人口覆盖率。全国各种报刊、

杂志、书籍的出版总量，一九八五年达到四百五十六亿印张，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积极提高造纸、印刷、出版的技术和质量，努力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基本上做到市市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文化设施。我们的各种精神产品，虽然大多数也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充分认识到，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此，必须注意它们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注意它们在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方面的作用，而不能单纯追求利润。各项文化艺术事业和学术研究，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错误影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堕落腐朽的文化。要继续深入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病率，迅速消灭一些还没有最后消灭的烈性传染病。加强海关检疫，以防一些已被消灭的传染病又由国外传入。在卫生工作中，要继续坚持城乡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五年内增加卫生专业人员六十万人，新增医院病床二十五万张。大力提高节制生育的技术水平，保证控制人口计划的顺利实现。积极发展城乡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

四、关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继续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按照统一计划、统一政策、联合对外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计划规定，到一九八五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将达到八百五十五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八，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出口总额将达到四百零二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一，高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口总额将达到四百五十三亿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二，略高于出口的增长速度，这对加快国内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

积极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努力增加出口，是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基础。要积极扩大轻纺产品、工艺品和各种土特产品的出口，特别是提高机电产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有计划地组织石油、煤炭和某些资源丰富的

稀有金属等产品的出口，对某些消耗能源太多的产品要限制出口。一切出口商品，必须努力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提高竞争能力。这对于促进我国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会起积极作用。根据国内建设的需要，改进进口结构，适当提高新技术和关键设备在整个进口中的比重。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国外贷款，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或同外商合资经营，把对国外资金的利用扩大到适当规模。要特别注意发挥沿海城市在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的作用。除广东、福建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外，要给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引进和消化技术、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和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我们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而绝对不能削弱和损害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

五、关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控制人口的增长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五年内，通过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将在城镇吸收二千九百万人经过一定训练后就业。全国平均每个农民的纯收入将由一九八〇年的一百九十一元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二百五十五元，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六，这个速度高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〇年二十六年中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三的水平。全国职工的工资总额一九八〇年为七百七十三亿元，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九百八十三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四十二亿元，增长百分之四点九。一九八一年已经提高了教育、卫生、体育战线部分职工的工资，一九八二年和以后的三年将陆续提高其余职工的工资，并积极着手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年知识分子多数工资过低，负担又重，他们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增加。这样做，相信全国广大工人和干部是会理解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人民收入的增加，居民的消费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到一九八五年，城乡居民按人口平均的消费水平，将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一，高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〇年二十八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点六的水平。

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点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二。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八五年将达到二千九百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七。

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将继续得到改善。五年内预计农民新建住宅二十五亿平方米，在农村新建公共福利设施三亿平方米。全国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五年合计建成住宅三亿一千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六千二百万平方米，等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八〇年二十八年中平均每年建成住宅面积的二点六倍。与此同时，还将加强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坚决制止环境污染的加剧，并使重点地区的环境有所改善。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根据今年七月一日的普查，我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亿。今后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必须控制在千分之十三以下。一九八五年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必须控制在十亿六千万左右。这两年，人口净增率有所回升，今后若干年将有更多的男女青年进入婚育期，正值人口增殖高峰，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将是一项极端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否则就将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进行有说服力的教育，大力破除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习俗，着重保护女婴和生女婴的母亲。只生一个女孩并且把她抚养好、教育好，比只生一个男孩更应该受到表扬、支持和奖励。全社会对于溺害女婴和虐待女婴母亲的犯罪行为都要坚决予以谴责，司法机关要坚决给予法律制裁。

六、关于财政、信贷的基本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保障人民收入正常增加和保障企业应有自主权的情况下，要通过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开辟财源，使国家财政收入由下降转为上升。要合理安排和控制各项财政开支，加强财政监督，坚决反对浪费，以便把财政赤字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确保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基本平衡。

计划规定，五年合计国家财政收入为五千九百五十三亿元，其中一九八五年为一千二百七十四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一百八十九亿元。五年合计财政支出为六千零九十八亿元，其中一九八五年为一千三百零四亿元，比一九八〇年增加九十二亿元。财政支出的安排首先是保证重点建设，逐步增加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开支，同时保证军政费用必不可少的需要，按期偿还国外借款的本息，适当照顾其它方面的开支。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事业，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五年内，除了国家每年增加对这些地区的财政补贴以外，国家财政还将拨出二十五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这些地区的建设，比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二十二亿元。这五年计划安排平均每年有财政赤字三十亿元左右。一九八一年实际执行结果为二十五亿元。今后在年度计划的执行中，也要努力增加收入，严格控制支出，力争财政赤字少于三十亿元。

市场物价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大事。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以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今年以来各地认真执行国务院《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总的来看情况是好的。国营牌价没有大的变动，有些品种的价格还略有下降，今年一到九月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同去年末持平。今后几年中对少数极不合理的商品价格要作有升有降的必要调整，以利于生产的发展，但这种调整也必须在保持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各位代表！第六个五年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的计划，它既包括建设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精神文明。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除了上面已经讲到的发展各项文化事业以外，还有许多重要内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在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了一个总的纲领，今后需要逐步加以落实。这里只着重讲一讲发展职工教育和改变社会风气这两点。

大力提高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现代科学文化、生产技能的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今后我们要着重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各级各类干部和工人的正规学院和正规学校，同时也要举办一些期限较短、课目较少的训练班，使职工教育比较快地走上正规化。除了国家现有的学校要承担职工培训任务以外，各行业和有条件的企业也

应该举办学校和训练班。我们还希望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都来重视这项工作。正规地进行职工教育，应该有严格的入学标准和考核制度，有一定水平的切合实际需要的教材，有胜任教学工作的合格教师，能够对学员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各种专业知识的教育，能够使学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学习以后确实有明显的提高。除了系统教育以外，还要根据广大职工中实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结合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任务，对职工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寻求和创造新的方式方法，力求使思想工作生动活泼，有战斗力、说服力和吸引力。要大力普及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的教育，普及共产主义思想、信念、道德的教育，普及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革命纪律的教育，普及职业道德的教育，普及法制教育，普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普及高尚的审美观念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育，使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立志振兴中华的革命精神得到发扬，使民族自尊心和荣誉感得到提高，使越来越多的职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积极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内争取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为此，要努力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改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断改进人们的劳动态度、工作态度和服务态度，反对各种极端不负责任、“一切向钱看”、闹本位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营私舞弊、利用职权“开后门”等等不正之风。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同时，必须全力反对和制止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那种连人格、良心、荣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商品化的可耻弊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在党内要按新党章所规定的各项标准进行整党以外，在社会上也要普遍采取守则、公约、文明村、文明街、宣传网等各种形式，扶持正气，祛除邪气，对危害社会的不良风气进行综合治理。我们有党的正确的坚强领导，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国家机器和进步的社会舆论，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在全社会形成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强大力量，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友好合作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经过努力，争取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扭转社会风气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创造出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保障人民专心致志地心情愉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

各位代表！在提请这次大会审议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同时，国务院也提出了一九八三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草案，请一并审议。

第六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生产建设任务是积极的，也是比较稳妥可靠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计划编制过程中曾经进行了认真的综合平衡，但有些地方仍然可能考虑得不周到，在执行中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妥善处理。全国上下，一定要团结一致，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努力解决好各种实际问题，保证在执行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计划中取得全面的胜利。

“六五”计划前两年的执行情况

第六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近两年，这里把前两年执行的情况向各位代表作如下的报告。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正式提请这次大会审议之前，国务院根据“六五”计划的初步设想，曾分别制订了一九八一和一九八二两个年度计划，并经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这两个年度计划，执行情况都是良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一九八一年计划为百分之三点七，实际达到百分之四点六；一九八二年计划为百分之四，预计可以达到百分之六点四。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五。整个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变化。

农业生产持续地全面高涨，农村欣欣向荣，这是全国经济形势以至政治形势日益好转的重要基础。农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七，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五，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三。尽管不少地方连年出现了严重的水旱灾害，粮食仍然连年增产，一九八二年预计达到三亿三千五百多万吨，比去年增产一千多万吨，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预计同一九八〇年比较，棉花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九，油料增长百分之三十九，糖料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点二，茶叶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猪牛羊肉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其它多种经营的发展也比较快。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特别可喜的是，许多农业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在一两年或两三年内迅速地大面积地改变了面貌，这是建国以来很少有的。这就最有力地说明，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八亿农民对党和政府更加信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

工业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市场商品供应日益充裕，消费品匮乏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这是我国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情况。轻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一，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一，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六。一九八二年预计同一九八〇年比较，纱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三，呢绒增长百分之十二，毛线增长百分之四十二，食糖增长百分之三十三，自行车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缝纫机增长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七，电视机增长一倍，洗衣机增长九点九倍。许多消费品的质量有了提高，花色品种增多。商业部门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商业网点，改进服务态度方面，作出了新的成绩。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增长百分之九点八，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九，两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九点四。这两年在人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吃、穿、用各类商品大多数供应比较充裕，人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市场供应情况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改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重工业在调整中抓紧能源的增产和节约，改进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生产由下降逐渐转为上升。重工业总产值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下降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增长百分之九，两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一点九。重工业改变了过去为自身服务过多的状况，为农业、轻工业提供原材料和装备的部分，为技术改造服务的部分，比重都有所提高。许多重工业企业还直接为市场生产了一批耐用消费品。燃料、动力和一些重要原材料的产量，从前两年的停滞甚至下降转向逐步回升。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〇年，原煤增长百分之零点二，原油下降百分之四点五，电力增长百分之二点九，钢材下降百分之一一点七，水泥增长百分之三点八。一九八二年预计比一九八一年，原煤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原油增长

百分之零点五，电力增长百分之五点一，钢材增长百分之一点九，水泥增长百分之八点六。经过调整后重工业生产重新回升，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部门，积极为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服务，也做出了新的贡献。

财政收入连年下降的趋势开始扭转，这是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综合反映。从一九七九年起，由于调整经济和解决长期以来特别是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三年下降。一九八一年国内财政收入比一九七八年减少一百多亿元，减少近百分之十。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不断好转和采取了许多增收节支的措施，这种下降局面今年可以结束，预计从明年起国家的财政收入将转向回升。在这同时，我国外汇收支连续两年出现顺差，为今后进一步扩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全国高等学校由一九八〇年的六百七十五所增加到一九八二年的七百二十九所，招生数由二十八万人增加到三十一万人。高等院校专业设置的调整和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工作有所加强。这两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六千多项，研制成功的新材料有上千种，在经济建设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最近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卫生等事业都在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体育战线连续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新成就。

以上情况表明，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已经基本上趋于协调。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现在的调整工作，就是要在统筹安排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农业、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国民经济在稳定发展中大大提高经济效益。

我国经济这种不断向前发展的新形势，同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年来许多国家的经济先后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境，生产停滞或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债务沉重，通货膨胀。有的国家的失业率和物价上涨指数，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峰。不少国家这种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已经到了难以承受以至影响国内政局的地步。

面对这种状况，许多国家苦于找不到出路。在世界经济如此不景气的时候，我国国民经济却在克服种种困难中胜利前进，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

这几年我国经济形势既然越来越好，为什么国家财政还有一些赤字？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作一些历史的分析。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中，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我们国家在生产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经济体制中存在着许多弊端，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中浪费严重，经济效益很差，在人民生活方面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在这个时期，职工工资没有进行正常的调整，农副产品同工业品的比价很不合理，城市住房越来越紧张，大量待业青年没有得到安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作出极大的努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国家用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支出四百四十二亿元，用于提高职工工资和实行奖金制度的支出三百亿元，用于安排城镇二千六百万人就业的支出一百零五亿元，用于增加城镇职工住宅的支出一百五十二亿元，加上减免农村税收、增加进口商品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共达一千四百多亿元。这样，国家财政增加支出和减少收入的项目很多，而长期造成的经济效益很差的情况，还没有也不可能短短几年内根本改变，这就造成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困难。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着重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情况正在逐步好转。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为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作出更大的努力。

各位代表！这两年经济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好，是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和其它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分不开的。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的社会风尚正在发扬，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出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芒的先进人物和模范事迹。在党的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动，正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的活动。这

个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普及新宪法提出的“五爱”社会公德，无疑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两年通过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今年一月至九月，全国刑事犯罪案件的发案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全国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从今年一月到九月共有十三万六千零二十四件，已经结案处理的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三件，其中依法判刑的有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七人。在斗争的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下，有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四人投案自首，坦白交代。在这些经济犯罪案件中，有一批是非法所得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大案要案，其中的主要案犯，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老虎”。现在有的人还在说什么“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从高级领导干部中抓出一批经济犯罪分子才叫做打“大老虎”。今年打击经济犯罪的大量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目前已经揭露出来的十几万经济犯罪案件中，有极少数或多或少牵涉到个别高级领导干部，比如有的官僚主义严重，受了犯罪分子的欺骗；有的对子女管教不严，以致子女堕落为犯罪分子；有的本人也有某些不正之风，等等。对这类问题，已经或正在严肃处理。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高级领导干部本人有严重经济问题。事实证明，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核心是可以信赖的。前一段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规模很大，而斗争的进展是健康的，对案件的处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没有引起不利的社会震动，没有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妨碍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这表明党和政府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通过前一段的斗争，基本上刹住了猖獗一时的公开的走私贩私活动，沉重打击了一批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化建设。当然，打击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前进和城乡各界居民的安居乐业，我们对于一切拒绝改恶从善的犯罪分子的斗争，是无论什么时候也不会放松的。

总之，这两年执行第六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许多没有解决，这两年的经济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消费品现在大大增多，但出现积压滞销现象，如不认真研

究，加以解决，就必然会影响今后消费品的生产。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面临的困难还很多。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争取在“六五”计划的后三年作出更大成绩。

全面实现“六五”计划的主要措施

我们要在今后三年内全面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就其中的经济发展计划来说，关键在于按照去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今年党的十二大的精神，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从当前国民经济的全局来看，必须切实管好用好计划安排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坚决调整和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继续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只有这四个方面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事经济工作的各级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有显著提高，才能取得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为“七五”计划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条件。下面我先着重讲一讲这四个问题，最后再专门讲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问题。

第一，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按计划完成。

我们要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新的基本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第六个五年计划在这方面安排了三千六百亿元的投资，把这笔资金管好用好，使计划安排的重点建设项目能够按期建成投产，使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取得显著的成效，这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将起重要的作用。

我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建设经验反复证明，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这是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条件。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上发生的几次重大挫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从经济上来说，都是同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分不开的。基建规模过大，不仅会造成建筑材料供应紧张，建设周期拉长，而且必然会挤生产，挤维修，挤人民生活，使企业不能保持正常生产，使人民生活不能得到必要的改善。一旦这种局面无法维持下去，就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大批基建工程下马，大量设备积压

以至报废，许多为基本建设服务的工厂减产停产，大量施工队伍窝工。这种大上天下所造成的浪费和危害，是我国过去经济建设中最大的浪费和危害。经过调整，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又去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这方面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深刻了，今后再也不能重犯这种错误了。第六个五年计划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安排是适当的，可是日前又出现了某些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的现象，许多地方和单位上了不少计划外的建设项目。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加以解决。

在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同时，必须使资金按照正确的方向，得到合理的使用。所谓合理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一要保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二要保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两项是实现我国经济振兴的主要依靠。为了确保这两项，就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把扩大一般加工工业能力的盲目建设压下来。

集中力量搞好以能源、交通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使国民经济中这两个最薄弱的部门得到改善和加强，这是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向主动的重要环节，是关系经济建设全局的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也必然受到制约，想快也快不了。这几年时机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努力从各方面挤出资金、物资，保证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需要，缩短建设工期，提高投资效果。当前，国家计划内的重点建设项目缺乏资金，而地方、企业的自有资金大幅度上升，计划外的建设项目大大增加。必须采取措施，适当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国务院已经决定，所有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国家预算外收入，城镇大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纳税后的利润，除少数免于征收的项目外，一律按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这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应尽的义务，大家应该从大局出发，踊跃交纳，支持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在这同时，对于地方、企业和社队的自有资金，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多种形式，引导和组织它们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方面来。

为了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保证建设资金的合理使用，提高投资效果，国务院作出了以下规定。

一、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包括国家预算内的拨款、自筹资金和银行

贷款，都必须由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进行综合平衡，统一纳入国家计划。不论哪个地区和部门，如果突破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都必须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请上级批准，否则以违反财经纪律论处。

二、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家计委审批；小型基本建设项目，一律由省、市、自治区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不经过国家计委和省、市、自治区计委综合平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确定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除国家规定企业有权自行安排的以外，由各级计委会同各级经委，按照规定权限审批。在国家计划外追加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必须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报国务院审批。

三、所有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事前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没有做好勘察设计等建设前期工作的，一律不得列入年度建设计划，更不准仓促开工。违反这个规定的，必须追究责任。

四、所有确定进行建设的项目，一律实行“五定”，即定建设规模，定投资总额，定建设工期，定投资效果，定外部协作条件，并且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度。计划部门和主管单位，必须按照合理工期分年拨足投资和保证相应的物资供应。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要对基建投资、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实行各种形式的包干制和责任制。

五、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由建设银行统一管起来，按计划监督使用。建设银行必须严格忠于职守，如有渎职现象，必须依法查究。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确保能源、交通建设，确保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目的都是积极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态度坚决，雷厉风行。负责审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有关部委，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原则，提高效率。该管的，一定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管好。需要审批的项目，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审批，不得徇私武断，不得拖延推诿。至于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的节约能源、增加品种、提高质量的设备更新和技术革新措施，应该由企业因地制宜地作出安排，以利于生产的发展。

第二，坚决调整和全面整顿现有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我国现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很不合理，经营管理很落后，这是当前妨碍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〇年的十年间，我国工业企业由一九七〇年

的十九万五千多个增加到三十七万七千多个(不包括农村队办企业),增加近一倍,这固然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加上不少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这种发展当中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许多企业由于原材料和能源供应不上,开工不足甚至不能开工生产;有的工艺和技术落后,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甚至完全不符合社会需要,大量积压;有的缺乏最基本的经济核算制度,消耗无定额,成本不核算,长期亏损;有的缺乏最必要的规章制度,管理混乱,无人负责,纪律松弛,浪费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和整顿,情况有所好转,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到现在为止,全国还有相当数量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没有达到过去曾经达到过的较好纪录,有近百分之三十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今年的亏损额预计达四十多亿元。这种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经营管理落后的状况,一方面使不少先进企业由于能源和原材料被落后企业占用而不能开足马力生产,一方面大量的落后企业却消耗了宝贵的能源和原材料而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这就既加剧了整个社会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紧张,又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严重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状况不改变,整个工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就很难有进一步的提高,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也很难得到实现。这种状况不改变,大批落后企业心安理得地依赖先进企业的劳动成果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不仅不利于鼓励先进和改变落后,而且还由于争夺能源、原材料、运输能力和市场,使各种不正之风得以蔓延滋长,破坏社会主义的正常经济秩序和良好社会风气。因此,在调整和整顿企业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十分坚决。对于这一点,各级政府和全体经济工作人员必须统一认识,以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利益为重,采取坚定有效的措施,毫不动摇地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再也不能拖延了。

国务院决定,从现在起立即按照产品分工由归口部门协同地方组成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制定行业规划,提出企业调整方案。对以下三类企业,必须首先实行关停并转:一、物资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营不善而长期亏损的企业;二、生产供过于求、产品大量积压的企业;三、与先进企业争能源、争原材料、争运输能力、争市场的落后企业,特别是那些盲目发展起来的以劣挤优的企业。各地区和各部门都要制定为期两年的企业关停

并转计划，提出关停企业的名单和实施步骤。所有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的企业都必须限期转亏为盈，做不到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毫无疑问，这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克服许多阻力，需要妥善解决必然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但是非做不可，并且非做好不可。这项工作由各级经委负责组织落实，并进行督促、检查。关停的国营企业，职工必须服从国家统一调配。一时不能分配固定工作的，也要按照严格的纪律，组织起来学习和进行其它有益的社会劳动。关停企业的财产、物资，要由专人负责维护，绝不允许发生哄抢、私分等破坏现象，如果发生，要依法严惩肇事者，并追究工厂和当地主管部门行政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开设新厂，必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的，一律依法取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任何部门不得阻挠干预。社会主义制度是迅速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先进制度。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鼓励先进，决不能保护落后。目前在税收、价格、信贷等方面存在的许多妨碍先进、保护落后的制度和办法，必须逐步予以修订。

整顿现有企业的工作，步伐要加快，质量要提高。在今后三年内，必须把现有企业整顿一遍。企业整顿的关键是二条：一条是建立起好的领导班子；一条是建立和健全各种管理规章和责任制度；一条是制定出以节约能源、原材料为重点的技术改造规划，确定合理的产品发展方向。企业整顿好的标志，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职工都有联系生产成果的明确的责任制，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有明显的改善，产品适合社会需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综合经济效益都显著地高于整顿前的水平。经过整顿的企业，要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联合工作组，按照中央规定的标准逐个进行验收，不合格的必须补课。

在对现有企业进行整顿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抓好大企业，使它们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方面走在前列。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认真抓几个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生产潜力大的大企业，一个一个地进行综合治理。如果各地区、各部门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不亲自去抓一两个重点企业，不和广大群众一道去取得亲身体会的实际经验，只停留于一般号召，就永远也不可能取得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必要知识和主动权，就不能继续胜任他们所担负的领导工作。

结合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要认真加强财务管理、物价管理、税收管理和信贷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凡是侵占、挪用、截留国家收入，违反国家规定乱摊成本、多提利润留成的，一律要加以纠正，并如数追回全部款项。国家规定的产品价格，必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变动。违反物价纪律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国家制定的税收法令，任何地方和单位无权改变。擅自决定减税免税的，要坚决纠正，如数追回税款。企业偷漏和拖欠的税款，必须限期补交国库，并课以罚款。凡是使用国家资金和财政拨款举办的各种建设事业，其实际效益必须达到计划和设计规定的要求，不得造成损失浪费。坚持信贷管理的集中统一，各级银行不得违反国家计划和政策规定滥发贷款，也不允许任何人强制银行贷款。必须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纠正一切化大公为小公、损公肥私的违法乱纪行为。宪法已经规定实行审计制度，审计机构有权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任何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一律不得干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模范地执行和维护国家的财经纪律。任何人违反财经纪律，都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处。执法犯法的，要加重处分。对于那些坚持原则，敢于同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作斗争的同志，要坚决给以支持和鼓励。任何人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必须依法从重惩处。

第三，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目前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总的来说大大落后于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是我们的短处，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认真去做。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进而向更高的水平迈进，更需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翻两番，决不仅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果停留在目前落后的技术水平上，翻两番就会落空。要把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已经普及了的适用于我国的先进技术，逐步在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得到比较普遍的采用。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产业部门，都应该力争技术进步。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必须统一认识。有些同志一说发展生产，往往只是考虑建新厂，铺新摊子，很少考虑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

术进步。这种观点不改变，还是用旧思想、旧方法去指导生产建设，即使建设起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新企业，大量的现有企业却面貌依旧，仍然是老设备、老技术、老工艺、老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显著提高效益，不可能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差距，甚至还会扩大这种差距。这种情况当然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重病中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并就翻两番必须主要依靠技术改造的问题，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于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他指出，“基数大，速度就低”不是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而主要是忽视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结果；只要不再“冻结技术”、“复制古董”，有重点有步骤地把几十万个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做好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就一定会快起来。他建议，应该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缩短折旧年限。国务院认为，这些论点是正确的。今后，应该根据国家财力的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提高折旧率。国务院已责成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共同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便使企业逐步拥有更多的财力来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在推进技术进步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人员很好地组织起来，参加规划，参加攻关。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专家参加，从现在起就抓紧工作，编制行业发展规划，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规划，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规划，以及全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纲要。应该通过规划，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技术政策，提出到本世纪末需要和可能达到的技术水平，并且确定逐步淘汰落后技术的具体要求。举例来说，我国发展合金钢特别是低合金钢的元素资源比较丰富，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努力提高合金钢特别是低合金钢在钢产量中的比重，应该作为发展我国冶金工业的一项重要技术政策确定下来。水泥生产的窑外分解法可以节约能源三分之一以上，这也应该作为发展水泥工业的一项重要技术政策。各行各业都要从实际出发，确定切实有效的适合自己特点的技术发展方向，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电子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我们应该非常重视它的发展，并把电子技术逐步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技术条件较好的沿海和内地的大中城市，要积极帮助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

远地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要根据全国生产发展的需要，围绕着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项目，把各种科技课题配起套来，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各方面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分工合作，进行攻关。特别要认真组织有关专家参加重大建设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和勘察设计，仔细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保证建设前期的工作做得更好。对这方面的事情，国务院将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制定落实措施，力争在两三年内打开新的局面。

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是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过去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很不够。凡是国内迫切需要而又一时解决不了的生产技术，必须在调查研究、统一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手续，及时地积极地从国外引进，并且认真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做好消化和推广的工作。国家要在外汇和国内配套资金上给予支持。国家经委已经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了今后三年引进三千项先进技术的规划，以加强现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要一项一项地加以落实，保证其如期实现。至于国内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当然要首先充分动员国内的力量来解决，不允许舍近求远。

必须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把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建立行业的和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发展科研、设计、生产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国家、地区、部门和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计划，既要规定发展新产品的任务，又要有淘汰落后产品的明确要求。今后考核企业，要把是否增加新产品和采用新技术以达到成本低、产量高，作为一项重要标准。现在许多产品的技术标准已经很落后，要由国家经委组织各有关部门，从一九八三年起陆续修订。重要产品要实行国家发给生产许可证的制度，不合标准的不准生产。要坚决实行按质论价的价格政策，制定和施行专利法，建立奖励新产品和技术革新的制度，同时废除那些阻碍技术进步的规章制度。要广泛发动群众，学习先进生产者，提合理化建议，鼓励企业和广大职工把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经营管理的活动生气勃勃地开展起来。

最近期间，我国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都在悼念和学习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中年科学家蒋筑英¹同志和陕西骊山微电子有限公司中年工程师罗健夫²同志。他们两位在我们国家所急需的科学技术方面作

出了具有世界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发明创造，都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们从开始工作的时候起，就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废寝忘食地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能，直至身患重病，仍然顽强工作。他们遇事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们的事迹是人们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的活教材。我们希望全国科学界、技术界、知识界和各行各业的全体党员、团员、全体爱国青年和全体劳动者，都以他们为榜样。希望一切有知识分子的单位，都能进一步端正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认真落实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信任和保护他们，让他们放手施展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抱负。除了确有组织能力、适宜于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以外，要让他们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这样，我们相信，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一定会有一个迅速的巨大的发展。

第四，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五十年代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次的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那一套旧框框，真正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其意义不下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近三年来的初步改革，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各种重大比例关系正在趋于协调，这就为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要经过周密的研究，可能试点的还需要经过试点，逐步积累成熟的经验。但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应该积极进行。现在整顿企业、调整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搞活商品流通等许多工作，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不改革就很难前进。因此，改革的进程有必要也有可能适当加快。全面的改革，预期可在“七五”计划期间逐步展开。今后三年内，一方面要抓紧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另一方面要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各项改革的试验。

根据多年来的经验，要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地协调发展，必须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把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主要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和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制约。国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上，加强对涉及重大比例关

系的主要经济活动的集中统一管理，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方向和重大建设项目，消费基金的增长，必须按计划严格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商品购销、流通渠道、劳动就业以及社会服务方面，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在工作步骤上，首先要把实行指令性计划的骨干企业和重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管好，把实行市场调节的小企业和小商品放活。至于中间那一块，即实行指导性计划的企业和产品的管理办法，由于情况比较复杂，目前各种经济杠杆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结合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改革，通过更多的试点，摸索经验，逐步解决。

无论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为了克服企业不关心社会需要和技术进步的弊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根据不同企业和产品的情况，积极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特别是价格的调节作用。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现在各种商品比价不合理的现象相当普遍，往往使企业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严重阻碍着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非常有害于国家财政的正常收支，归根到底，对于人民生活的总的改善也是不利的。价格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周密计划，慎重处置，切忌贸然从事。国务院认为，在“六五”计划后三年，全面改革价格体系的条件尚未成熟。对少数极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可在确保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有升有降的调整。对企业之间利润率悬殊的矛盾，应该首先通过推行内部价格结算等办法来逐步解决。工业用燃料和部分原材料价格过低，不利于生产和节约，助长了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逐步进行调整。但调整这些价格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更好地降低消耗，决不允许任何企业借此擅自提价，把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至于三类小商品的价格，可以分期分批改由工商双方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协商定价或企业自行定价，随行就市，上下浮动。从一些地方试点的情况来看，这样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不仅起到了鼓励生产、满足供应、方便生活的作用，而且仍然保持了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为了提高商品质量，促进和调节商品流通，必须坚决实行按质论价，并合理规定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和地区差价。

今后三年内，在对价格不作大的调整的情况下，应该改革税制，加快以税代利的步伐。这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而且将进一步改进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过去，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管理办法，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近三年来，在四百多个工业企业中进行了以税代利的试点，其中有的是全市、县的试点，有的是一个城市范围内的全行业试点。总的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参加试点的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明显地高于总产值的增长，特别是实现利润和上交税费的增长，大大高于总产值和销售收入的增长，说明它们的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部分中，保证了大部分以税金和资金占用费的形式上缴国家，企业所得也增加了，对国家和企业都有利。因此，把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金这个方向，应该肯定下来。这项改革需要分别不同情况，有步骤地进行。对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税利并存，即在企业实现的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对税后利润采取多种形式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合理分配。这一步在“六五”计划期间就开始实施。第二步，在价格体系基本趋于合理的基础上，再根据盈利多少征收累进所得税。对小型国营企业，准备在今后三年内分期分批推行由集体或职工个人承包，租赁等多种经营方式，实行国家征税、资金付费、自负盈亏的制度。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调整部分产品的工商税率，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种，进一步发挥税收集聚资金和调节生产、流通和分配的作用。实现了税利制度的这些改革，将使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深刻的变化，把实行企业经济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推进一步，使企业的利益同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经济生活中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堵塞、运输浪费、领导多头、互相牵制等现象，都同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有关。这种情况不改变，许多合理的事情办不通，整个社会的浪费很难减少。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注意发挥行业的作用，一是要注意发挥城市的作用，特别要着重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要按照这两条原则，结合企业的改组联合，逐步合理调整企业的隶属关系。全国性的公司和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应该由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大量的企业应该逐步改由城市负责管理。对属于城市管理的企业，行业主管部门要从全局出发，负责抓好发展规划、经济政策、技术政策、技术标准、新技术的推广、新产品的

开发等工作。对属于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企业，所在城市要负责组织好生产协作等工作。至于在同一个城市范围内的企业，不管属于哪个行业，它们的铸锻、热处理、机修、电镀等部分，以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要由所在城市负责，逐步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服务，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要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带动周围农村，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经济区。这是改革的方向，需要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实施。

为了使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机构设置适应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最近江苏省政府决定，在即将展开的机构改革中，进行一些试验。主要是：省一级的厅局基本上不直接管理企业，现有的省属企业改由所在城市管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地市机构合并，由市领导周围各县；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行政公署作为省政府的代表机关，负责对所属各县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但原由行署管理的企业改由所在市、县管理。广东省清远县试行由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很好的效果。看来，实行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而且对促进城乡结合、条块结合，推动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都大有好处。

现在，进入交换的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都比过去丰富得多了。这是经济形势中的一个新特点。相形之下，商品流通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于形势的要求。现行的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从五十年代沿袭下来的。当时实行这种体制，有利于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控制货源。二十多年来，客观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把改革流通体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毫无疑问，国营商业应该在商品流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应该注意发挥集体商业和个体商贩的积极作用，注意发挥生产企业在自销商品方面应有的作用。必须坚决打破地区封锁，克服城乡堵塞，积极开辟各种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真正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做到货畅其流。为此，国务院已责成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召集各有关部门，把从事商品流通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和论证，从速提出商业流通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和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

体制改革，头绪纷繁。今后三年内，除了制定全面改革方案外，在具体工作上，重点是做三件事：一、对国营企业逐步推行以税代利，改进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二、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解决“条条”和“块块”的矛盾；三、改革商业流通体制，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这三项工作，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带动起来。

最后，着重讲一讲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

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由于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大包干，最初出现在贫困边远地区，很快就扩展到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富裕地区。不仅生产落后、经营单一的队采用了，而且经济发达、专业化程度高的队也陆续推广了这种办法，现在已成为大部分地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大包干办法本身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有统有分、统分结合、联产计酬、包干分配的家庭（或小组）承包的责任制形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保证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适应各种地区的不同情况，收到良好的效果。据许多地方反映，实行这种责任制以后，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干群关系有很大改善，行政上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贪污浪费等等恶劣现象大大减少。目前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从少数地区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地区，从农村扩展到城镇，从农业扩展到其它领域。它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兴起，受到群众的欢迎，决不是偶然的。这证明它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稳定、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允许存在，在实践中完善、提高。对群众乐意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其他形式，一律不能去堵，应该积极支持，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适应当地的水平和特点，切实解决好统、分、包的问题。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专业户、重点户的大批涌现，农村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组织经济联合已开始成为形势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这种联合已不再是过去旧框框里面的联合，而是围绕着发展商品生产的需

要，加强生产前和生产后的服务，在技术推广、供销、加工、储存、运输、植物保护、提供信息等方面，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合作。通过多层次、多种形式的联合，通过合同制等办法，把农民家庭或小组承包的经济活动，同国营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国营农场、国家科研单位等挂起钩来，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和合作，将不断加强对农民的计划指导，把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更好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长远看，在分工分业、专业承包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前、生产后各种服务工作的经济联合，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光辉前景。现在这种联合已经出现了一些雏形，包括专业性的生产联合，产供销联合，以及技术服务性的联合，等等。我们要因势利导，让多种联合形式在实践中发展提高，不断总结经验，不要急于肯定一种形式或否定一种形式。总之，在联合的问题上，要实事求是，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到水到渠成，稳步前进。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这是指导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完整的方针，对任何一方面稍有忽视都会产生片面性。我国人多地少，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大问题，粮食生产必须抓得很紧很紧。适合种粮食的耕地必须种粮食而不能改种其他作物，这必须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定下来，绝对不能动摇。对主要的粮食基地，应该采取一些具体政策，以保证粮区农民有利可得。另一方面，正因为人多地少，我们决不能把劳动力都集中到有限的耕地上，而必须放眼整个辽阔的国土，重视利用山区、丘陵、草原、水面的丰富农业资源。在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保持生态环境不恶化的前提下，放手发展多种经营，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充分利用农村资金，合理开发自然资源，而且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粮食生产，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发展农业生产，要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尽快建立为农业服务的科技研究、推广体系。要鼓励农民自己举办各种力所能及的科学文化设施，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同时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倡农民依靠

自己的力量，进行资金积累和劳动积累，因地制宜地举办必要的农业基本建设。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主要应该用于那些靠农民自己力量办不到的建设项目上，如大型水利工程、重点林区开发、公路干线、电讯等等。

现在，农村中有两股歪风，一是滥占耕地建房，二是乱砍滥伐森林，后果十分严重。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今后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毫不留情地制止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和农民群众，为全国和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不能只顾局部的眼前的利益而破坏全国的长远的利益。

各位代表！

我们要全面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方针，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继续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要遵循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好地保障全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要继续打击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在今后三年内，要动员政府各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在争取实现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刑事犯罪案件明显减少，坚决打击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反革命活动，坚决消灭那些危害妇女儿童安全和毒化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我们一定要继续加强国防建设，进一步提高国防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提高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加强民兵工作，增强我国的防御力量，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今后三年中，我们还要坚定不移地把政府的机构改革工作继续做好。今年以来，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就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的调整来说已经基本完成，但距离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未完成的任务还很艰巨。目前，工作效率低和官僚主义作风，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且还有使前段机构改革成果重新丧失的危险。国务院各部门，一定要建立起各种严格的责任制度，做到人人职责分明，事事有人负责，坚决扫除那种办事拖拉、互相推诿的坏

作风。一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坚决扫除那种不调查，不研究，主观主义地决定重大问题的坏习气。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政府机构改革，今年冬天就要开始进行，争取明年上半年完成。县和基层政权两级的机构改革，要求在明年冬季和后年春季做好。这样，全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在一九八四年春季就能完成。做到了这一步，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主动了。

各位代表！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第六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八三年的年度计划经过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之后，将使我国人民近期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并且把当前的工作同长远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鼓舞大家更加坚定地向着本世纪末的宏伟目标迈进。各级政府的工作很繁重，责任很重大。我们要开创新局面，既要大胆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又要勤奋学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循序前进。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一定要把广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发挥出来，大力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第六个五年计划一定能够圆满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我们的伟大祖国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繁荣富强起来。

注 释

1. 蒋筑英(1938-1982)，浙江杭州人。曾在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和光学传递函数装置，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罗健夫(1935-1982)，湖南湘乡人，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

关于进料加工出口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六日

将陈云同志批语发国务院常务会议。

转慕华、劲夫同志一阅。进料加工出口，等于劳务出口，首先抓沿海城市，如何使沿海城市放开手，请准备意见，抽时一议。

对环保和出现酸雨等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

宋平同志并高扬文(煤炭部党组)同志：

这是一件大事，请着人论证，采取有效措施。我国用煤越来越多，不考虑环境是不行的。应在长期规划中有切实安排。

赵紫阳
十二月八日

* 这是赵紫阳在时任城乡建设部部长李锡铭《关于解决上海市环境污染和各地出现酸雨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体育战线的成绩

鼓舞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信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今天，书记处的同志、国务院的同志、人大常委会的同志、政协和军委的同志一起来看望你们。你们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了十分好的成绩，为国家争了光，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体育战线这几年捷报频传，我们曾经在三次大的会议报告中，提到了体育的好形势。在十二大上，耀邦同志讲了体育战线的形势；我在去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和今年五届五次会议上，都讲了一段体育战线振奋人心的成绩。在每一次报告中讲到体育战线的好形势的时候，都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鼓掌。体育战线取得的胜利已经远远超越了体育这个领域，鼓舞了全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信心。体育战线能攀登高峰，为什么别的战线不行呢？事在人为嘛！过去我们国家被人家称为“东亚病夫”。当然，“东亚病夫”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但彻底把这顶帽子甩掉，而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我看是你们这次。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耀邦同志去年会见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讲到“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我借用他这两句话来嘱咐大家。体育战线是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但是还要坚持两分法，才能更上一层楼。报纸上是这样评价体育战线的，叫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体育健儿们在世界体坛大显身手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因此，要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

* 这是赵紫阳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参加第九届亚运会胜利归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

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我们的体制问题，像一个个绳结一样，要慢慢解，要按规律解。不能急，越急越不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优点，讲了话是算数的。我们的国际地位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外资，应当照顾到来投资者的利益。总不能谁到中国来让谁吃亏。到大陆来投资，政策上可以放心。在政治上，你们曾担心会不会被指为阶级敌人，我说肯定不会。对你们的企业也不会实行国有化、公私合营。当然，你们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会让你们吃亏。如果你们选的项目正确，不仅你们的投资有保证，也保证你们有一定的利润。

我们的政策是长期稳定的。这方面，你们已有亲身感受。你们几位带头来投资，很有远见，是“勇敢分子”，起了示范作用。外国也有些企业家很勇敢。南海石油就有很多外国人投资，汕头也将要兴建外资或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他们都是“勇敢分子”。我再重复一句，不能让来投资的人吃亏。

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几十年来我们都没有承认。我们将在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恢复行使主权以后，我们的方针是港人治港。英国人来管不行，那没法向中国人民交待。香港要换个旗子，就像小平同志说的，可改称中国香港，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我们不把香港纳入大

* 这是赵紫阳与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副总经理何炳章，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郑裕彤等谈话的要点。

陆的体制。大陆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香港不能这样，要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以，即使是在香港投资也不要紧，放心经营。留在香港的资金也没有问题。

对开发海南岛问题的批语*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

海南岛不作特区，但在对外合作给以较多的自主权，我认为有需要的。建议由你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参加座谈一下，把能够定的问题先定下来。属于政策问题，海南孤悬海外，我认为可以从宽（不会影响内地）；需要中央投资支持的，也应采取积极态度，量力而行。海南虽属广东包干范围内，但可直接给予支持，使该岛上得快些！

* 这是赵紫阳给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谷牧的批语。

充分发挥重庆市西南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发挥重庆重点城市的作用。重庆不仅是四川的经济中心，而且是西南的经济中心；这几年扩大重庆的作用不够。要扩大重庆的职权，要把省管的职权下放给重庆，计划要单列。除了省照顾重庆之外，中央也要适当照顾重庆。省里有的经济实权，市里基本上要有。

二、重庆要开放。经济中心要伸出去，不只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要广泛地进行经济联系，包括外贸，重庆要有一定的外贸独立权。

三、重庆管理范围要扩大。永川地区除少数县外，应划归重庆。如永川、大足、合川、江津、铜梁等县。

四、省厅局不管企业。中央企业(除少数外)、省属企业都要归市里统一组织生产和经济活动。长江运输可以直接去香港等地。

五、经济体制改革要和市里机构改革结合考虑。所有经济工作都归经委管，农委可不撤销，省里计、经委可以合并，市里可以分开。市里的局主要搞成综合性的，实行规划、统筹、服务、监督。

六、财政问题，可能是争执较大的问题。是否可像首钢一样，实行递增包干。

* 这是赵紫阳与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谦的谈话纪要。

后 记

一、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者检索查看，这部文集以时间顺序编排，按年份分为四卷：第一卷（1980-1982年），第二卷（1983-1984年），第三卷（1985-1986年），第四卷（1987-1989年）。

二、编入本书的所有文稿，均系第一手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保存文稿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只对原稿进行了文字订正和必要注释，有的添加了标题。文中的数字和计量单位等，亦沿用当时的习惯表述，未按新的规定改动和换算。

三、参加文集收集、整理、编辑、录入、排版、校对工作的同志，都是一批热心改革开放事业和关心党史国史研究的志愿者，还有许多老领导和老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鼎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四、限于条件和水平，在本书编辑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知情者批评指正。

《赵紫阳文集》编辑组

2015年10月17日